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13

中共党史出版社

数字资源
PDG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三卷

联共(布)、共产国际 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ISBN 978—7—80199—607—7

I. 联… II. 中… III. 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中国—1931—1937 ②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中国—1931—1937 IV. K260.6 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1146 号

书 名: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

译 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 姚建萍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40mm×203mm 1/32

字 数: 553 千字

印 张: 22.125

印 数: 1—11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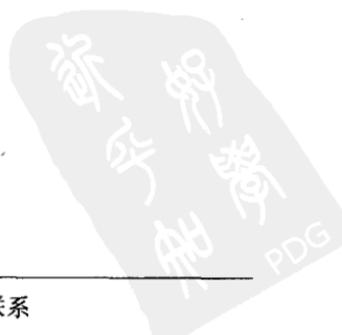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99—607—7

定 价: 298.00 元 (共五卷)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82517249, 82517244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刘宋斌

学术指导

李 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M. 格里戈里耶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B. 舍维廖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31—1937
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ЕЙТНЕР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РАБОТЫ),
К. М. АНДЕРСОН, В. И. ГЛУНИН, А. М. ГРИГОРЬЕВ,
И. КРЮГЕР, Р. ФЕЛЬБЕР, К. В. ШЕВЕЛЁВ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2005年11月

于京郊自得园

译者前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三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即原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四卷(两册)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2003年俄文版译出。本卷文件集共收录自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期间有关档案文件411份,绝大部分为首次发表。有些文件阐述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在上海保卫战期间(1932年1月至2月)、在冯玉祥察哈尔抗日人民军发动过程中(1935年5月至8月),以及在有名的福建事变期间(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对中国事态发展所持的立场,有些文件披露了莫斯科对中国红军于1934年秋放弃中央苏区的计划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和中国红军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所持的态度,有些文件揭示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七大前后制定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和莫斯科对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发生变动的反应。这一卷首次全面公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机构(政治书记处、七大前存在的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七大上成立的并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这个时期对华政策的问题的决议和指示。还公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讨论对华政策问题的会议的记录。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一卷首次发表了1932年至1934年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共中央、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以及远东局与1933年至1934年间驻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局之间往来的电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共中央1936年至1937年间往来的电报。该卷还收录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政治、军事代表给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书信、远东局成员给红色工会国际和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书信等,并且发表了共产国际档案中所保存的反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1年至1937年间工作情况的所有文件。

这些文件都很珍贵,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研究参考价值。为了及时译介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2002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权,并于2003年上半年组织力量进行翻译。中译本分三册,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13、14、15卷。

本书俄文版由前言、文件正文、图书目录、人名索引四部分组成,中译本全文译出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放在第15卷末),第三部分从略。为反映文件原貌,本卷译本仍保持了原文件体例,未作任何删节。在俄文版中注释是文尾注和脚注,为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一律改为脚

注。有些注释对中国读者来说实无必要，翻译时作了删节。译者新加的注释在注后标有“译者”字样。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难题，是准确还原中国人的本名，文件中有些中国人使用的是化名或方言拼音姓名，由于年代较久，又缺乏可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些人的名字难以查实，只好音译或估译，这种情况在行文中或脚注中作了说明。

文件中有些俄国人的名和父名缩写字母，因不知全称，无法译出相应汉字，为统一起见，在中译本正文中一律删去不译，只译姓，但在注释中则注明其名和父名的缩写字母。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助。著名汉学家、原书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A. M. 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和 K. B. 舍维廖夫博士热情地帮助解决语言理解等方面的某些疑难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刘桂生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译稿，帮助订正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在此我们特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翻译工作由马贵凡同志组织。

参加翻译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贵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

王昌滨(中共中央党校译审)；

宋洪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李永昌(辽宁大学教授)；

李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董友忱(中共中央党校译审)。

全书译稿最后由宋洪训、马贵凡同志校定。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文件集第四卷^①所收录的文件,继续阐述本文件集第三卷所阐述的莫斯科对华政策,主要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对中共的政策。第三卷所阐述的是这个运动的初期,即1927年7月至1931年9月,在这个时期,制定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纲领的基本原则以及苏维埃本身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并在华中和华南建立了较大的和较稳定的根据地和红军兵团。第四卷收录了苏维埃运动第二个和第三个时期的文件,反映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在本卷编者所分时期的对华政策。在第二个时期,即从1931年秋至1935年七八月共产国际七大,虽然自1932年底起苏维埃根据地有过短时期(约一年)的扩大,但苏维埃运动开始遭到一系列失败,起先是华中的主要苏区丧失(1932年底至1933年秋),然后是华南的苏区丧失(1934年秋)。被政府军驱赶的红军部队遭到惨重损失,不得不开始先向西南地区转移,并于1933年在四川省建立了苏区,然后又向西北地区转移。在这个时期里,明确了(未作原则性修改)中共活动、苏维埃政策和红军行动策略的基本纲领性指导方针,部分地修订了对一些地区军政集团的政策,目的是在反对南京蒋介石政府的斗争中利用他们的潜力,克服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在因日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莫斯科1994年出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2卷(1926—1927),分两册,莫斯科1996年出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3卷《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分两册,莫斯科1999年出版(以后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4卷)。

本侵略的加强而国内爱国主义情绪和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与潜在同盟军的隔绝状态。在第三个时期,即从共产国际七大至1937年七八月,莫斯科的对华政策是探索从苏维埃化的政策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转变的途径。根据这样的分期法,第四卷收录的文件分为两个部分。

在本卷所述时期,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要对这些过程的内容和后果作出评价,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在国民党旗帜下统一中国的过程,是在国民党内部各派军政势力之间和在南京与地方集团之间的激烈冲突中展开的。实际上,直到中日战争爆发前,虽然到30年代中期南京政府试图控制地方军政集团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家。尽管1931年秋日本占领满洲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阀战争,但是直到1936年前,地方集团与南京的对抗表现为试图建立反蒋联盟,以及由著名的军政活动家所领导的一些部队发起反对南京及其政策的武装行动。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内最大的集团——蒋介石集团控制了南京政权的中央政权机构和军队以及华东、华中的主要省份。与此同时,华北、西北和华南的许多省份仍由一些地方军政集团或一些高级军事指挥官所控制,他们只是名义上承认南京政府的最高权力。只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半时间里,蒋介石才得以把自己的亲信派去领导大多数省份。

流血的军阀战争的停止、南京政府实行的支持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提高进口关税、向引进现代设备的中外企业家提供优惠等)、国家调控的加强、“民族复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引起了中国城市经济自1933年起特别明显的活跃、多数民族工商业部门的发展和外国投资的增长。由于1935年实行了货币流通制度的改革,对粮食和纺织品贸易建立了政府管制,南京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

大增强了。1936年，南京政府着手实施经济发展计划，规定由国家银行向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实行贷款，向从事采矿工业的中国企业主提供贷款。在战前的1936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是整个中华民国时期最高的。

与此同时，经济的增长就其部门和地域来说是极不平衡的。外国资本的涌入有助于提高用比较现代的技术装备起来的企业的比重，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例如在1935年，即使在传统的“中国”轻工业部门，外国企业的份额也占了全部纱锭的46%和织布机的52%。在金属冶炼和电力生产方面，它们的份额则更高得多。工业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展实际上没有触动农村。国民党在20年代末提出的所有农业改革方案，如整顿对农民的捐税，都没有实现。与土地所有者有着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机构的人员、军队的将领和军官，以及传统的农村上层都反对这样做。30年代试图在农村实行的纯技术革新措施（改进的播种方法等）、建立农民合作社（主要是销售合作社）的尝试，由于缺乏资金和相应的干部，只收到了极其有限的成效。农村基本阶层的状况依然极其艰苦。农民的赤贫化和大规模饥荒的爆发成为中国农村的经常现象，在自然灾害发生的年代里尤为严重。

中国城乡状况的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共试图在城市里站稳脚跟并开展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努力屡遭失败的客观原因，同时也说明了中共为什么能够在农村，在南京统治地区和地方集团控制地区之间，甚至在华中和华南的一些地区，建立和一直到1934年保持住自己的根据地（苏区）、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在那里培育有经验的军政干部，而这些干部后来在中共主力被迫向西北撤退之后，在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变的条件下，成了中共力量发展壮大基础。

导致中共在城市里屡遭失败和它同工人基本群众丧失联系的最重要的主观因素，一方面是国民党工会政策的成功，另一方面是

中共在工人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左”倾策略。

国民党建立亲政府的工会，制定国民党式的工会法，使那些有熟练技能的工人阶层得到比较稳定的工作和劳动报酬，就像用一道“长城”把这些阶层同不受工会法保护的广大劳动者阶层隔离开来，使这些阶层紧紧拴在政府周围，使共产党人的反政府口号和赶走“黄色”工会头子的号召不易被人接受。

中共脱离工人、脱离城市广大劳动群众以及青年学生的另一个原因，是低估了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宣传对这些阶层的影响，民族主义宣传是政府当局对居民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日本公然侵华之后。

众所周知，自1931年9月至1937年6月到8月，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华不断扩大侵略的时期。到30年代中期，已经十分明显，日本侵略集团已不限于占领东北(满洲)和保证自己在华北地区的绝对影响，而且企图奴役整个国家。日本的侵略行径和中国丧失民族独立的威胁，引起国内各种各样爱国主义情绪的发动和高涨，这种情绪逐渐波及不同的居民阶层，包括有产阶级、国民党政府官员、南京军队中的将领和军官以及地方集团。中央和地方的所有军政集团都在自己的政策中考虑到日本侵略行动不断加强的事实和国内民族主义爱国情绪的高涨。然而，统治阵营内的主要势力实际上直到中日战争爆发前都未能把国家利益置于自己集团利益、地方主义利益或个人利益之上。

蒋介石集团认为，中国太弱，不能同日本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对侵略者展开人民战争的思想在蒋介石看来是格格不入的，此外，在南京各派和地方集团争夺权力的角逐中有使他丧失个人权力的危险。蒋介石及其亲信指望利用列强在华的矛盾，指望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实际上选择了对侵略者不抵抗的策略。

直到1935年，南京政府时而承诺同日本“开展坚决斗争”，时

而号召不允许采取未经批准的反日行动，乃至对反日行动进行镇压，以期不给新的侵略行径提供借口，这就阻止了零散的爱国主义发动转变成全国的运动。

蒋介石试图利用侵略威胁来把国家统一在自己的旗帜下，镇压自己的敌人，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南京把中共力量看作是主要的“内部敌人”。同时，蒋介石利用“围剿”苏区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把自己的亲信派到从红军那里夺取来的地区担任行政长官。地方集团的首领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情况，他们批评蒋介石对侵略者，特别是对西南集团首领们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他们的分离主义倾向。

此外，在地方上和在南京，亲日派也在活动，他们指望通过向侵略者作出新的让步的代价来在日本的支持下加强自己的权力地位。

实际上，统治阵营内的所有派别都指望，一旦日本扩张的矛头指向苏联，或者引起苏日战争，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进攻威胁就能消除或者削弱。这种对事态发展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935年至1936年间，即蒋介石的代表同苏联外交官讨论中日之间一旦发生新的军事冲突苏联如何帮助中国的问题时南京的立场。

本卷收录的文件表明，日本从占领满洲开始的对华侵略行动（满洲可能成为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爱国主义反日情绪的日益高涨和中国越来越多有影响的势力被逐渐拖入反日运动，成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重新审查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方针的重要因素。

在第三卷的前言^①中，我们已经分析了提出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的口号的缘由，阐述了斯大林、布哈林以及联共（布）和

^①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文版第7卷，前言第3—26页。

共产国际其他领导人在制定和论证苏维埃运动纲领时的作用,还阐述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部状况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直到共产国际七大在对中国形势和苏维埃运动前景的估计上保持着教条主义和日益严重的“左”的倾向,尽管当时苏区和中共武装力量以及城市组织的处境越来越困难,而此后明显遭到了失败,说明莫斯科在1927年至1935年间实行的对华政策彻底失败。在第三卷的前言中,我们还指出了1927年以后通过中国问题决议机制的特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纯共产国际”问题召开会议和通过决议的次数急剧减少,最终决定权集中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手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不再审议这些问题,等等。那里还简要地介绍了确定中共在整个1927年至1937年间的行动纲领和策略的主要文件,说明了1931年至1934年间莫斯科对华政策的某些局部变化——1931年底由于日本公然侵略中国(1931年9月占领满洲)发生的变化,1933年初在三个主要苏区中的两个苏区遭到失败之后发生的变化——还说明了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和七大后对中共方针的内涵所作的重大修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导方针的这一演变过程,在本卷各部分的引言中也作了详细说明。在本卷前言中只应指出,实际上在自1931年9月至共产国际七大的这一整个时期,共产国际执行委会没有通过一项关于中共和苏维埃运动的任务的全面决议。共产国际关于这些问题的主要指令性文件仍然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1931年7月31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①。

还应指出,尽管共产国际七大及其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于

① 见米夫主编:《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以中国为例)》(文件集),莫斯科1934年版,第294—312页。该文件集中注明的文件日期是1931年8月26日。它的确切日期已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3卷第2册第1479页上标明(参见中文版第10卷第341页)。

制定中共新的政治方针具有转折点的意义,但是制定这一政治方针本身却是在七大以后展开的,而决定向全国范围内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变的最重要的一些决议,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根据季米特洛夫与斯大林商量后提出的建议于1936年七八月间通过的(第375、376、379、380号文件)。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关于苏维埃运动问题的大量文件以及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和著述已在第三卷的参考书目中列出。在第三卷付梓后又出现了许多有关这些问题的文献^①和论著^②。

众所周知,反映苏维埃运动年代莫斯科对华政策的许多重要文献资料,其中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和第十三次全会、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工作人员在共产国际各种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其中阐述了各种不同的方针),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许多秘密指令,政治书记处、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一些决议,以及上述这些机构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们的电报和信函,早在30年代就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各种出版物上发表过。稍晚一些时候,这些文献资料 and 以前没有发表过的许多其他文献资料已被收入在一些综合性和专题性学术著作的参考书目里。同时,本书编者在档案馆发现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并把它们编入了本文件集,这些文献资料对于共产国际及其在华活动史的研究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对于深入研究中共党史也很有意义。

-
- ① 在已经发表的文献资料中,应当特别指出的有:《季米特洛夫日记(1933年3月9日—1949年2月6日)》,索菲亚1997年版;亚历山大·达林和菲尔索夫:《季米特洛夫与斯大林(1934—1943)》苏联档案中的信件,新港——伦敦2000年版;施拉姆:《毛泽东取得政权之路》(1942—1949),纽约1999年版第5卷。
- ② 以档案材料为基础的论著有: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2000年版。

收入本卷的文件包括一些新的资料,说明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在“上海保卫战”时期(1932年1、2月),在冯玉祥察哈尔抗日人民军发动时期(1933年5月至8月)和在著名的“福建事变”期间(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的立场,以及莫斯科对中国红军1934年秋撤离中央苏区的态度。这些资料揭示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七大前后制定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莫斯科最初获悉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领导发生变动时作出的反映,提供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首先是对毛泽东的态度的证明文件,使人对苏联给予中共和中国红军的物质支持的规模和意义有了具体的概念。

本卷首次十分详尽地发表了像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前一直进行活动的政治书记处、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以及在七大上成立的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这样一些共产国际领导机构那几年关于对华政策的决议和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些机构在政治问题和干部问题上作出了原则性的和灵活性的决议,它们的决议从总体上说提供了共产国际在华活动的十分完整的情景,反映了共产国际领导对中国发生的事态的了解程度和对这些事态作出评价的水平。遗憾的是,在共产国际档案中没有保存(或许根本没有)东方书记处大多数会议的速记记录。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了1932年至1934年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中央局之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其远东局之间、远东局与1933年至1934年间在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以及编者收集到的1936年至1937年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中央的来往电报材料。本卷收录的这些电报材料的性质需要作一些说明,首先是编者所收集到的这批档案文献的状况,其次是当年在莫斯科、中共中央和远东局机构之间电报通讯的技术能力和渠道,第三是1933年至1934年

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工作人员给中共中央和莫斯科起草和发送电报的实际情况。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 1931 年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和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来往电报材料,在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没有找到,原因不得而知。根据现有材料判断,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代表与中共领导之间的电报往来,是在 1932 年,即在上海恢复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的代表机构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在共产国际政治代表阿图尔·埃韦特于 1932 年 11 月到达上海,然后是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和曼弗雷德·施特恩到达上海之后才具有较经常性质。中共中央(在 1933 年初迁往中央苏区之前和之后的主要时期)、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莫斯科的联络,是通过由国际联络部代表支配的无线电报务员和译电员所掌管的无线电台进行的。与江西中共中央的联络是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功率较小的无线电台进行的,当时上海局有一批自己的报务员和译电员以及从英文译成中文的翻译(翻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和从中文译成英文的翻译(翻译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的电报)。在上海的中共机关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并屡遭破坏的情况下,要物色业务熟练的翻译来从事这项绝密工作是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发往莫斯科的许多电报在文字风格和语法上很不完善且译文常常有错,电报是从中文译成英文,有时甚至再“转译”,即从中文译成英文然后再译成法文,这是莫斯科和上海 1933 年和 1934 年密码通讯所采用的主要方式。

上海地下工作的困难影响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其代表和中共领导机关进行频繁的和定时的无线电联系:在遭到破坏和存在破坏威胁的情况下,远东局工作人员、国际联络部代表机构和中共上海中央局之间不得不暂时停止联系或重新建立联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直机关与其驻沪机构的无线电联系渠道则比较稳

定,也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根据电报页边上的标注判断,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领导利用这个渠道来传达最重要的通报和指示^①。

来往的电报材料表明,1934年9月26日,即红军的主力部队撤离中央苏区前不到一个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中央之间的直接电报联系已建立起来(第292号文件),但很快就长期中断了。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特工机关的努力,1936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当时驻陕北的中共中央之间又恢复了无线电联系^②。联系是通过第四局的无线电台进行的。遗憾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国通过这个渠道往来的所有电报,除了1933年至1934年间最初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无线电台发送的一些电报以及保存在季米特洛夫书记处并收入本卷的1936年至1937年间的几份电报原件外,暂时编者还不能完全看得到。

收入本卷的中共中央领导与驻上海远东局工作人员之间的来往电报材料,通常是一些远东局电报的原件或副本(英文),也有一些是远东局通过信使送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中央苏区的解密通报,由中文译成英文的译稿。这就是为什么有时起草文件的时间与莫斯科收到文件的日期相距甚远,这在相应文件的注释中作了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从上海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常常没有标明发送的日期,这样文件标明的日期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的日期。

-
- ① 可能,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已得到情报,说西方许多国家驻华的谍报机关截获了它们的来往电报。近年来,有报道说,英国谍报机关早在1934年就破译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与远东局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部分来往电报。
- ② 第一批电报往来是在1936年6月8日和11日,见米罗维茨卡娅《苏中关系的中断和恢复(1928—1936)》,莫斯科1975年版,第104页;又见黄启钧:《中共中央在1935至1936年间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的经过》,载《党史研究》1987年第12期。

还应提请读者注意的一点是，在中共中央从上海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没有指明发件人。虽然远东局拥有全权向中共中央发出这样或那样的指示或建议，但众所周知，远东局起草的许多重要文件都是以上海中央局的名义发送给中共中央的。大家也知道，尽管远东局工作人员与中共中央及上海中央局的全部来往电报必须受埃韦特的监督并征得他的同意，但发给中共中央的许多电报是由总军事顾问施特恩起草和发送的，没有经埃韦特过目（第 238 号文件）。在根据内容或标记不能确定文件起草人的情况下，这些文件在编者所作的标题上都称为“远东局电报”，虽然很有可能在中共中央收到的这些文件的中文文本中，发件人可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或中共上海中央局。

还应指出，在收入本卷的以往从未发表过的文件中，有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和军事代表们通常以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名义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和信件（第 76、90、104、117、123、131、135、141、171、172、186、187、194—196、205、227、230、249、259 号文件），远东局成员发给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信件（第 184、206、260、267、279、309、314 号文件），以及埃韦特回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第 280 号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的代表格伯特关于他自 1932 年至 1935 年在华工作情况的报告（第 384 号文件）。

本卷收录了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中的反映当时由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活动（1931 年至 1937 年）的文献资料。对这些文件的研究可以使我們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弄清楚两个问题，首先是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 1933 年至 1934 年间政策上的策略性变动（这些变动为在共产国际七大上重新审查对华政策打下了基础）以及随后的演变过程问题，其次是中共代表团在制定和实施共产国际和中共政治方针中的作用问题。

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活动的文献资料表明,尽管以代表团名义发给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机构的所有重要决议、指示和建议,都是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机关工作人员共同制定并经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批准的(这使毛泽东后来有一定理由认为并说,当时“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但是王明和中共代表团并非只是“斯大林意志”的机械执行者。本卷发表的文件表明,王明和中共代表团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的基本估计和苏维埃运动方针的确定,甚至在这个运动出现明显危机的形势下仍试图寻找有利于它的论据(第283号文件),夸大了这一运动的可能性,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供了关于中共党员人数和群众组织数目的夸大材料(第281号文件)。同时,在这一方针的范围内,代表团和王明本人积极参与了对原先在反对执政当局和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寻求中共同盟军问题上以及在苏维埃社会经济政策和中共党内生活某些问题上的一些方针(包括自己的方针)的重新审查过程。王明和代表团其他成员是这些准备付诸实施的、已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协商好的建议和相应文件草案的起草人或起草人之一。众所周知,这些文件中的许多文件是经共产国际领导批准后以中共中央和(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府的名义,或者以它们的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公布的。还应指出,在筹备共产国际七大期间,根据大会的决议以及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其组织结构的决议(第337号文件),中共代表团的作用(同其他党的代表团一样)被提高了:它直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领导下举行了许多会议和讨论会(第344号决议)。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积极参与下起草的、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原先的方针作出明显修改的文件,迄今在著述中指出了三个。第一个文件是1933年1月10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

会宣言》(在中国的著述中通常简称为《三项条件宣言》)。众所周知,在这个宣言中,建议中国所有军队包括它们的指挥官在下列条件下联合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捍卫中国主权,反对南京政府:(1)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3)武装民众(第100号文件)。尽管这个宣言存在许多缺点,但它明显表露出试图摆脱前途无望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

第二个文件,从重新审查“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角度看,更为重要,这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起草的1933年1月26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在这封信中,虽然只是针对满洲而言,但提出了把各种具有反日情绪的社会阶层的代表,包括地主、中国军队的将领和军官以及地方当局的代表吸收到反对日本占领者的统一战线中来的任务^①。

第三个文件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起草的,而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公布的,这就是广为人知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首先谈到了这个文件^②。随后,王明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阐述了这个文件的一些主要论点^③。(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制定和通过这个文件的更详细情况,见第二部分引言)

收入本卷的还有编者发现的属于这类性质的两个文件,即1933年10月27日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第182号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1991年版,第21—45页。

② 季米特洛夫:《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见季米特洛夫:《在争取建立反法西斯和反战统一战线的斗争中》,莫斯科1937年版,第40—41页。

③ 王明:《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版第25期,第32—33页。

文件)和1934年9月16日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第288号文件)。

中共代表团领导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两封信,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后发往中国,这两封信表明,在反对日本和蒋介石政府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发展过程中,采取下一个更为重大的步骤,即上述1935年《八一宣言》中所包含的呼吁停止内战,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和全国抗日联军^①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中共中央撤离中央苏区并与共产国际和绝大多数省市党组织失去联系,以及与此同时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几次惨重破坏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在1936年初以前,即在陕北重新建立的中共中央开始与华北、华中、华东和华南的党组织恢复联系以前,实际上充当了全党中心的角色。正是以这种资格,代表团起草了《八一宣言》,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对宣言的最后文本确认后,于1935年9月底(第336号文件)着手散发和宣传这一文件。

1935年8月27日至29日,代表团在“如何在中国贯彻七大决议”的口号下召开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对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改革党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成员和参加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外,还有在大会期间未能及时赶到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在本卷第二部分的引言中,我们阐述了这次会议主要文件,即王明1935年8月27日至28日报告的基本论点。

随着出版一些铅印刊物,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授权和监督下为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思想进行了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工作。1934年至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中国报》。1935年5

^① 《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版第33—34期,第106—111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1991年版,第518—525页。

月至11月在巴黎出版了《救国报》。自1935年12月起,该报开始用《救国时报》的名称出版。该报刊登了中共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文件和方针性的文章,其中许多文章出自王明之手。报纸在中国和华侨中心城市的传播,对于1935年国内开展爱国主义的“一二九运动”,对于动员华侨支持这一运动、支持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着手在巴黎出版《全民月刊》和在北平出版《解放》杂志。

更早一些时候,实际上从1932年起,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承担了领导满洲党组织和游击战的工作。这是由于中共中央,稍后是上海中央局与遥远地区联系困难造成的。中共代表团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红色工会国际驻远东代表的帮助下进行这项工作的。在中共中央撤离江西和1934年至1935年间中共临时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后,中共代表团不得不担负起领导满洲党组织的工作。

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没有保存能够充分说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在这方面和上述诸多方面活动的文献资料。档案中也没有保存说明代表团讨论、制定和与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机构协商某些文件的过程的材料,而是根据代表团工作人员(后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顾问)克雷莫夫(郭绍棠)的口述回忆在代表团会议和编辑组会议的中文记录中记录下来的。众所周知,1957年根据苏共领导的指示,在莫斯科保存的很大一部分中共文献资料匆忙地交给了中共中央,没有留下副本和移交文件的详细目录。在移交的文件中,首先是中文文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这一时期活动的许多文章和论著,提到、援引或转述许多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没有保存的代表团文件、书信和会议记录,据此判断,这些文件看来都在

移交中方文件之列^①。

考虑到本卷篇幅很大,编者决定不将主要取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全宗中的很大一组关于苏联对新疆的政策文献资料收入本卷。作为例外的,只是一些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试图建立中国少数民族反政府解放运动并将其与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的有关文件,这些文件在制定中共民族问题纲领时曾加以利用(第85、125号文件)。对有关新疆的材料采取这样的态度还因为,1933年至1934年间在苏联政府和新疆督办盛世才之间建立了十分密切友好的关系,莫斯科对新疆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国家渠道实现的。从那时起,新疆区域实际上被排除在作为苏维埃化对象的地区之外。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为什么把一种政治笑话即盛世才给王明的信也收入本卷(第361号文件),在这封信中,这位由南京政府任命的新疆督办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保证永远与苏联友好。

收入本文件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文件和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活动的文件(给莫斯科的报告、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的来往电报和其他文件),第一次使人能够弄清共产国际这一机构的组成人员情况和重新阐明它对1933年至1934年间的中国政治史中和中共及红军活动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的态度和作用。

首先说一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组成人员的变动情况。收

① 例如,李良志:《关于王明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载《史学月刊》,开封1989年第2期,第64—72页;黄启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载《党史研究》,北京1988年第6期,第3—9页;杨奎松:《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载《近代史研究》,北京1989年第1期,第199—219页;周国全、郭德宏:《王明评传》,合肥1989年版;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合肥1991年版,第64—72、74—79页。

入本卷的材料使我们可以确认，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代表鲁德尼克于1931年6月被捕和雷利斯基离任赴莫斯科（估计在1931年8月）以后，直到1932年夏，留在上海的远东局机构人员中只有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茨维伊奇一人。1932年春，新的国际联络部代表格伯特来到上海，他在中国一直呆到1935年5月，恢复了国际联络部的机构（第384号文件）。1932年8月，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美国共产党员克拉克来到上海，于1933年2月离开中国。

1932年9月，新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国共产党员阿图尔·埃韦特开始在上海工作（第70号文件）。1933年4月，美国共产党员曼弗雷德·施特恩来到上海，被任命为总军事顾问。1932年11月，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被从满洲调到上海工作，作为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第90号文件）。1933年10月初，他到了中央苏区。1933年10月，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建议，美国共产党员赖安来到中国（后以尤因·詹尼斯著名），奉命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为共产国际的学校招募学生，并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工会和反帝工作。后来，后面这项任务成了他的主要工作（第269、310—312号文件）。1933年底至1934年初，埃韦特、施特恩和赖安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核心（格伯特没有进入远东局）。根据政治委员会1933年12月27日决定，贝克作为红色工会国际新的代表被从美国派到中国（第213号文件），他于1934年5月到达上海，在中国呆到1935年4月。

1934年3月，施特恩不得不返回莫斯科（第250号文件），在那里他被任命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军事工作（第318号文件）。1934年7月，鉴于有遭破坏的危险，远东局领导人埃韦特不得不返回莫斯科（278号文件）。1934年10月，赖安也回到苏联（310号文件），根据他在7月至9月间给莫斯科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信判断，实际上他担任了政治代表的角色（第274、

279、284号文件)。随着赖安以及后来贝克离开中国,1934年底成立的中共临时上海中央局直到1935年2月遭到破坏前,仅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的代表与莫斯科保持着联系。

在对远东局1933年至1934年间的活动作出总的的评价时,应该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顾问和远东局其他工作人员在给莫斯科的报告和书信中,对中国事态发展的描述、分析和预测,没有超出莫斯科的相应评价和其对华政策方针的范围。根据远东局的文件来看,它很少提出修改策略的问题。可能这是因为在这方面的最初尝试之一(即布劳恩曾试图指出,有必要纠正共产国际刊物对中国苏维埃运动成绩进行的宣传:避免过分夸大苏区的规模和人口数量以及红军的人数)(第108号文件)没有得到莫斯科支持的缘故。后来,埃韦特自己在莫斯科所作的报告中曾试图指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流传的关于中共党员人数的统计材料被大大夸大了(第280号文件),但遭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严厉驳斥(第281号文件)。

无论施特恩,还是埃韦特都没有下决心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必须较早地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以摆脱包围圈的问题。甚至在1934年9月,当中央苏区的命运实际上已经被决定时,赖安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说,似乎出现了保卫苏区和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利条件(第284号文件)。

在远东局和中共领导的来往信件中,讨论最多的问题首先是军事问题。远东局、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施特恩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除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般性政治指示外,还有他们得到的情报,包括通过苏联在华侦察机关渠道得到的关于蒋介石部队和地方军阀部队进攻苏区的计划、关于这些部队的组成和部署的情报,以及他们关于红军作战计划、关于某些红军兵团的编组或重新编组、关于动员措施等的建议。

成为例外的只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时期,即所谓福

建事变时期,当时上海发给中央苏区的电报,除了关于敌方的情报和关于红军作战计划的建议外,很大部分是关于中共在同 19 路军代表谈判时应采取的立场的建议、关于同福建人达成协议的性质的建议以及对其首领们的立场作出的评价等等,还有关于在同广东当局可能进行的谈判中应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第 202、221、222 号文件)。

根据文件来看,远东局很少涉及中央苏区的内部政策问题。只有埃韦特起草的中共五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是个例外,在这个决议草案中很笼统地探讨了这些问题(第 189 号文件)。

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红军领导的关系直到 1933 年底都是很和谐的。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制定作战计划时都考虑到施特恩与埃韦特协商后提出的建议。远东局在布劳恩的积极影响下起草的许多文件都是(在稍作修改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给其他苏区的(第 105、107 号文件)。根据施特恩的建议,由中央苏区红军部队组成的东方军于 1933 年 8 月至 10 月完成了向闽西的袭击,在那里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建立了几个新的小块苏区。莫斯科把这个计划和它的实施看作是“典范”(第 168 号文件)。

但是,在蒋介石部队对中央苏区发动新的攻势之后,以中共中央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一方和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在反击进攻计划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共中央和远东局在福建事变时期的立场和计划将在本卷第一部分的引言中更详细地加以分析。这里有必要就此问题提出以下看法。众所周知,中共领导内部各派的立场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的作用问题,就在于红军没有给予福建部队以有效的支持,从而加速了它的失败,而在福建事变后不久也招致了自己的失败,这个问题在党内斗争和中共领导内的派别斗争中被用来谴责和反谴责谁是丧失中央苏区的“罪魁祸首”。

至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党史著作中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因而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红军和 19 路军更积极地相互配合确实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局势,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等等。依我们看来,在南京军事机器比与它对立的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和数倍优势的情况下,即使红军和 19 路军密切配合作战,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稍稍延缓它们的失败和以后的事态发展结局。至于这次事变对于以后修改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的政策有什么教训,那是另一回事。

在埃韦特回莫斯科以后,中共上海中央局也根据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的意见,对他的工作表示了不满,指责他不够重视“国统区”的工人运动,甚至“不相信”农民斗争的意义(第 278 号文件)。不能排除,在这方面也表现出埃韦特和整个远东局对中共领导内的派别斗争所采取的消极态度,没有支持中央苏区要对毛泽东及其在江西的拥护者开展“公开批评”并要把毛泽东派到苏联去的意见(第 246 号文件),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反对这样做(第 247 号文件)。

同本系列文件集前面几卷一样,编者特别注意发掘那些反映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学校里培养干部以及它们给予中共以物质和军事技术支持的文件。

根据对有关文件的研究,还不能确定 1931 年至 1937 年间向中共提供的资金的确切数字,原因是缺乏综合统计材料,存在提供援助的多种渠道和“专项拨款”(为苏区、中共上海中央局,以及党在城市里、工会中和满洲地区的工作提供的款项等)。

1934 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确定的每月预算是 7400 多美元(第 266 号文件)。此外,为中国共青团、工会的工作(第 262 号文件)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支付了一些资金(救助中共、工会、共青团被捕或牺牲的工作人员家属,以及为解救被捕者向警察局行贿)。

此外,在1934年,由于中央苏区的形势急剧恶化,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备用金中追加拨款5万墨西哥元来购买药品(第276号文件),还储备了用来购买防毒面具、几架飞机和通过华南一个港口购买弹药和装备的资金(第285号文件)。最后,为供养远东局、国际联络部代表机构和信使,开支了不少费用。从中国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皮亚特尼茨基本人的报告、书信和电报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央苏区的预算赤字问题。但是,说明为弥补赤字而拨款的文件没有找到。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余部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恢复联系以后,给中共提供的资金数额大大增加了。1936年下半年,为答复中共中央关于给予军事侦察机关领导以物质支援的请求,曾作出指示,寻找为红军购买大量武器的途径(通过一家外国公司订货)(第383号文件);1937年3月,中共中央接到通知:汇去80万美元(第397号文件)由它支配。

本卷附录中收入了几份1939年的文件,但从内容来看是与本卷文件所阐述的事件密切相关的。这就是前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曾在中央苏区工作并跟随部队从江西到陕北进行了长征的唯一一位欧洲人奥·布劳恩(李德——译者)的札记(第410、411号文件)。在他的回忆录^①中描述了他是如何在1939年9月由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送到莫斯科的。

早在中国时,在红军撤退时期(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上),以及后来在陕北的一些“批判”会上,布劳恩(和博古一起)因其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时期的军事政策问题上的立场而受到严厉批评。中共代表把布劳恩送到莫斯科,几乎把他说成是红军在江西遭到失败的罪魁祸首,指责他“篡夺”中国红军的最高军事权力,试图把自己说成不是顾问,而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等等。他的札记的“忏悔”语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派他去中国的和与他

^①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莫斯科1974年版。

一起在上海工作的许多人当时都遭到了镇压。他是凭记忆而不是根据必要的文献写的札记,这对他的札记的内容也有影响,但是札记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献——事件直接参与者的见证材料,具有一定的价值。

※ ※ ※

本文件集是根据《苏联历史文献出版规定》(莫斯科 1990 年)编辑出版的。有一些文件不是全文发表,删去了与本文件集题目无关的部分。在发表文件时使用了现代拼写法和标点符号。中文专有名称用现代拼音,未被确证为同一名称者除外。文件集中保留了广州、香港等城市的传统名称,以及当时在文件和通信中惯用的缩写,如苏维埃政府、苏区、国民革命军。保留了当时在起草文件时和词典中常用的缩写词(如党委、党校、工委、工会组织、政工人员、政治部、指挥人员、旅长、师长等等)。

参加本文件集编辑工作的有:俄方的历史学博士、教授 K. M. 安德逊,历史学博士、教授 B. И. 格卢宁,历史学博士、教授 A. M. 格里戈里耶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教授 M. Л. 季塔连科,历史学副博士 K. B. 舍维廖夫、B. H. 谢契林娜;德方的教授 M. 莱特奈尔、教授 И. 克吕格尔、教授 P. 费尔伯 和博士 T. 特拉姆彼达赫。

编者衷心感谢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 Л. А. 罗戈娃、Л. К. 卡尔洛娃、P. И. 帕拉季佐娃和 E. E. 基里洛娃,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学术信息研究所汉语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图书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北京)、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巴黎)工作人员提供的帮助。

本卷前言和各部分的引言由 A. M. 格里戈里耶夫、B. И. 格卢宁、M. Л. 季塔连科、K. B. 舍维廖夫、M. 莱特奈尔、И. 克吕

格尔·P. 费尔伯和 T. 特拉姆彼达赫撰写。数目索引由 K. B. 舍维廖夫编写,并有 И. 克吕格尔参加。人名索引由 B. B. 拉林和 И. H. 索特尼科娃编写,并有 K. B. 舍维廖夫和 B. H. 谢契林娜参加。

远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H. И. 梅利尼科娃对文件作了古文献学方面的加工。

E. K. 斯塔罗韦罗娃进行了电脑排版。

参加手稿技术编辑工作的有 H. И. 梅利尼科娃和 И. H. 索特尼科娃。

本卷俄文版责任编辑 A. M. 格里戈里耶夫, 责任秘书 H. И. 梅利尼科娃。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

(1931年9月—1935年7月)

1. 多尔夫给马季亚尔的信(1931年9月18日) 27
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3号(特字第×号)
记录(摘录)(1931年9月20日) 31
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
会议第180号记录(摘录)(1931年9月22日) 33
4. 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
(1931年9月22日) 34
5. 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
(1931年9月23日) 36
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4号(特字第×号)
记录(摘录)(1931年9月25日) 38
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185号记录(摘录)(1931年10月3日) 39
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185号记录(摘录)(1931年10月3日) 41
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186号记录(摘录)(1931年10月7日) 42
1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187号记录(摘录)(1931年10月13日) 43
1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满洲问题的

- 非常会议速记记录(1931年10月21日) 45
1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非常会议第121
(A)号记录(摘录)(1931年10月21日) 61
1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191(B)号会议记录(摘录)
(1931年10月27日) 63
1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192(B)号记录(摘录)
(1931年11月3日) 65
1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193(A)号记录(摘录)
(1931年11月13日) 66
1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扩大会议速记
记录(摘录)(1931年11月15日) 68
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常设反战委员会关于
满洲问题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1931年11月15日) 73
18. 米夫给斯大林的信(1931年11月20日) 78
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203(B)号记录(摘录)
(1931年12月21日) 82
2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204(B)号决议(摘录)
(1931年12月27日) 83
2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三人小组
(处务委员会)会议第30号记录(摘录)
(1931年12月28日) 84
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反帝

- 斗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1年12月29日) 86
23. 王明给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书记处和东方
殖民地部的信(1932年1月8日) 88
24. 莱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关于在华
工作的报告(1932年1月14日) 90
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三人小组会议
第6号记录(摘录)(1932年1月28日) 104
2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1月31日) 108
2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220(B)号记录(1932年2月5日) 109
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反战委员会给各国
共产党的电报(不早于1932年2月5日) 111
2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
电报(不晚于1932年2月12日) 113
3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新疆工作的
建议(1932年2月14日) 115
31. 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执行局共产党党团局
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1932年2月14日) 118
3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223(B)号记录(摘录)
(1932年2月15日) 119
3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黄平的电报(1932年2月20日) 121
3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224(A)号决议(摘录)
(1932年2月21日) 122

3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黄平的电报(1932年2月27日) 123
3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
 电报(1932年2月29日) 124
37.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会议上的讲话(1932年2月29日) 126
38.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32年3月4日) 132
3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226(B)号记录(摘录)
 (1932年3月4日) 133
4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229(B)号记录(摘录)
 (1932年3月21日) 134
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234(B)号记录(摘录)
 (1932年4月9日) 135
4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236(B)号记录(摘录)
 (1932年4月15日) 136
4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保密工作
 给中共中央的信(1932年4月16日) 138
44. 黄平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32年4月17日) 145
45. 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共中央的
 电报(1932年5月3日) 146
46. 皮亚特尼茨基给佐尔格的电报
 (1932年5月3日) 149

-
47.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电报
(1932年5月9日)..... 150
 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240(B)号记录(摘录)
(1932年5月9日)..... 152
 49.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32年5月16日)..... 154
 50. 皮亚特尼茨基和洛佐夫斯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2年5月26日)..... 155
 51.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的电报(1932年5月27日)..... 156
 52. 佐尔格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2年5月)..... 158
 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工部关于远东和近东国家
共产党秘密工作状况和特务工作情况的
书面报告(摘录)(1932年6月3日)..... 160
 54. 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2年6月9日)..... 164
 55.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摘录)
(1932年6月10日)..... 166
 56. 维经斯基给福京的信(摘录)
(1932年6月11日)..... 167
 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251(B)号记录(摘录)
(1932年6月15日)..... 172
 5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4号(特字
第×号)记录(摘录)(1932年6月16日)..... 173
 59.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32年6月20日)..... 177

6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6月28日) 178
61. 琼森给维经斯基的信(摘录)
 (1932年6月29日) 182
6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6号(特字
 第×号)记录(摘录)(1932年7月1日) 184
63. 中共中央给王明的电报(1932年7月14日) 186
64. 维经斯基给琼森的信(摘录)
 (1932年7月21日) 187
65. 中共中央给王明的电报(1932年7月24日) 190
66. 皮亚特尼茨基给佐尔格的电报
 (1932年7月25日) 191
6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264(B)号记录(摘录)(1932年8月3日) 192
6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265(B)号记录(摘录)(1932年8月9日) 194
69.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2年8月16日) 197
7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埃韦特的电报(1932年9月20日) 204
7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273(B)号记录(摘录)
 (1932年9月21日) 205
72. 琼森给维经斯基的信(摘录)
 (1932年9月28日) 206
73. 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2年9月30日) 208
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

电报(1932年10月3日)	211
75. 中共中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1932年10月7日)	212
76.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 (1932年10月8日)	215
7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278(B)号记录(摘录) (1932年10月15日)	221
78.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32年10月16日)	222
7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10月27日)	223
80. 王明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932年11月2日)	224
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秘密 会议第153(B)号记录(摘录) (1932年11月10日)	227
82.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摘录) (1932年11月11日)	228
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282(B)号记录(摘录) (1932年11月15日)	229
84.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32年11月21日)	233
85. 多尔夫给萨发罗夫的信(1932年11月25日)	234
86.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 所作的关于满洲形势的报告(摘录) (1932年11月28日)	237

8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苏区中央局
 第一号军事指令(1932年11月29日)…………… 251
8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284(B)号记录(摘录)
 (1932年12月3日)…………… 253
89. 中共中央和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
 (1932年12月5日)…………… 254
90.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2号报告(摘录)
 (1932年12月初)…………… 255
9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5号(特字
 第×号)记录(摘录)(1932年12月10日)…………… 266
9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速记记录
 (摘录)(1932年12月11日)…………… 268
93.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的电报(1932年12月19日)…………… 281
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
 电报草稿(1932年12月21日)…………… 283
9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12月22日)…………… 285
96.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2年12月27日)…………… 286
97. 皮亚特尼茨基给格伯特的电报
 (1932年12月31日)…………… 288
98.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的摘录
 (1932年12月)…………… 289
99. 王明给库西宁的信(1933年1月7日)…………… 291
10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

-
- 军事委员会宣言(1933年1月10日)…………… 292
10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1月16日)…………… 295
102. 维经斯基和琼森给洛佐夫斯基和科斯坦尼扬的
信(摘录)(1933年1月16日)…………… 296
103. 马季亚尔给库西宁的便函
(1933年1月25日)…………… 299
104.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3号报告
(1933年2月7日)…………… 302
1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军事指示
(1933年2月13日)…………… 315
106.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的电报
(1933年2月18日)…………… 318
10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
指令(1933年2月21日)…………… 319
108. 布劳恩关于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书面报告
(1933年3月5日)…………… 330
109.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4号报告
(1933年3月11日)…………… 342
110.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的电报(1933年3月15日)…………… 350
11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3年3月18日)…………… 351
11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
电报(1933年3月19—22日)…………… 353
113.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的电报
(1933年3月27日)…………… 356

11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3年3月28日)..... 357
115. 维经斯基给琼森和福金的信(摘录)
(1933年3月29日)..... 359
116. 中共苏区中央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的电报(摘录)(1933年3月30日)..... 364
117.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3年3月)..... 367
11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苏区中央
局的电报(1933年4月2日)..... 369
1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
(1933年4月3日)..... 374
120. 艾萨克斯关于宋庆龄同黄平 1933年4月6日
谈话情况的报告(1933年4月7日)..... 376
12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3年4月7日)..... 384
122.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1933年4月
5日中国苏区军事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的报告的补充(不早于1933年4月7日)..... 386
123. 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1933年4月8日)..... 389
1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4月11日)..... 400
1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非常会议第307(A)号记录(摘录)
(1933年4月21日)..... 402
12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

- 第 15 号记录(摘录)(1933 年 4 月 28 日) 423
127. 皮亚特尼茨基给格伯特的电报
(1933 年 5 月 8 日) 425
1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 年 5 月 9 日) 426
12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 313(B)号记录(摘录)
(1933 年 5 月 15 日) 428
13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
(不早于 1933 年 5 月 15 日) 429
131.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3 年 5 月中旬) 431
132. 青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电报
(1933 年 5 月 17 日) 432
133.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米夫的信(摘录)
(1933 年 5 月 21 日) 433
134. 王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3 年 5 月 23 日) 436
135. 维克多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3 年 6 月 2 日) 437
13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 316(B)号记录(摘录)
(1933 年 6 月 3 日) 439
137. 维经斯基给琼森的信(摘录)
(1933 年 6 月 6 日) 440
13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的
电报(1933 年 6 月 10 日) 443

13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的
电报(1933年6月21日)..... 444
14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6月24日)..... 445
141.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7月2日)..... 447
142.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7月7日)..... 448
143. 对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的信《关于
满洲的状况和中共的任务》的说明
(1933年7月14日)..... 449
144. 维经斯基给洛佐夫斯基和米夫的信(摘录)
(1933年7月14日)..... 450
1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给格伯特的电报
(1933年7月17日)..... 453
14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
会议第325(B)号记录(摘录)
(1933年7月21日)..... 454
14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326(B)号记录(摘录)
(1933年7月27日)..... 457
148.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6号报告
(1933年7月28日)..... 458
149.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3年7月28日)..... 470
15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327(B)号记录(摘录)
(1933年8月3日)..... 471

-
15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8月9日) 473
152. 李竹声给皮亚特尼茨基和王明的电报
(1933年8月11日)..... 475
1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60号记录
(摘录)(1933年8月17日)..... 476
15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
韦特的电报(1933年8月17日)..... 478
15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3年8月18日)..... 480
15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3年9月2日) 484
157.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9月7日) 488
15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非常会议第333(B)号记录(摘录)
(1933年9月9日) 489
15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3年9月12日)..... 490
16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334(A)号记录(摘录)
(1933年9月15日)..... 495
16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334(B)号记录(摘录)
(1933年9月15日)..... 496
162.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3年9月19日)..... 497
16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 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9月22日)…………… 498
164.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
(1933年9月23日)…………… 500
16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3年9月23日)…………… 502
166.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
(1933年9月26日)…………… 504
16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3年9月27日)…………… 506
16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9日)…………… 509
16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3年9月29日)…………… 512
170. 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司令部
的建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报告
(1933年9月)…………… 516
171.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8号报告
(1933年10月1日)…………… 521
172.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3年10月1日)…………… 528
173. 施特恩关于中国红军在1933年8、9月间的军事
行动进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1933年10月1日)…………… 529
1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10月7日)…………… 542
175.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0月10日)…………… 544
17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李竹声的

-
- 电报(1933年10月12日) 545
17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3年10月14日) 546
178.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中国红军状况的情报
(不早于1933年10月14日) 549
179.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
(1933年10月20日) 555
18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电报(1933年10月20日) ... 558
1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电报
(1933年10月24日) 559
182.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摘录)
(1933年10月27日) 561
1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的
电报(1933年10月28日) 574
18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3年10月29日) 575
18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3年10月30日) 576
186.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0月30日) 579
187.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0月30日) 580
188.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0月30日) 581
189. 埃韦特给中共中央的信(1933年10月) 582
190. 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

- (1933年11月2日)…………… 585
191.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33年11月3日)…………… 586
192.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康生的电报
(1933年11月4日)…………… 591
19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3年11月6日)…………… 592
194. 施特恩关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报告
(不早于1933年11月8日)…………… 596
195. 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电报
(1933年11月10日)…………… 617
196.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1月14日)…………… 618
19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43(Б)号记录(摘录)
(1933年11月15日)…………… 619
198. 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3年11月18日)…………… 623
19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1月18日)…………… 624
200.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1月22日)…………… 625
20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1月23日)…………… 626
202.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1月24日)…………… 628
203.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1月27日)…………… 629

-
204. 李竹声给红色工会国际的电报
(1933年12月10日) 630
205. 施特恩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3年12月16日、25日) 631
206. 赖安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信
(1933年12月21日) 641
207. 康生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3年12月21日) 645
208.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3年12月22日) 646
20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2月23日) 648
210. 布劳恩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
(1933年12月23日) 649
211.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33年12月27日) 652
212.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2月27日) 654
21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50(Б)号记录(摘录)
(1933年12月27日) 656

第一部分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

(1931年9月—1935年7月)

收入本卷这一部分的文件反映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从日本侵略满洲开始到共产国际七大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实际纵容下对中国东北、华北和华东实行武装入侵,中国的外交形势急剧恶化。随着南京政府指望借助于国联和美国和平解决冲突以及利用列强之间矛盾的政策毫无成效,国内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包括国民党本身及其政府内部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以及地方军政集团,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

这个时期的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和国际形势,在现有的各种著述和业已发表的文件集中都有相当充分的阐述^①。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也根据公开的史料^②并引用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档案文件作了更加深入的研究^③。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演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31年9月至1932年底,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实际上没有考虑到中国形势业已发生的变化,也没有对自己原先的推翻国民党政府和国家苏维埃化的方针作出原则性的改变。

第二阶段是从1933年初到1935年这一时期,这个时期考虑到各种社会力量代表的爱国主义情绪和发动的不断高涨、满洲游

① 见本卷书目索引。

② 郭恒钰:《毛泽东掌权的途径与共产国际》,帕德博恩1975年版。

③ A. C季托夫:《毛泽东政治传记资料》,莫斯科1969、1970年版第1、3册;A. C季托夫:《毛泽东夺取政权的斗争(1935—1945)——毛泽东政治传记资料》,莫斯科1974年版第3册;A. C季托夫:《中共领导内部的斗争和分裂史略(1935—1936)》,莫斯科1979年版;《中共党史》,莫斯科1987年版第1卷;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北京1992年版;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郑州1994年版;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台北1996年版。

击战的开展,以及在国统区中共组织的活动日益困难和华中苏区开始遭到重大失败的情况下出现了非共产主义势力的各种反蒋运动,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进行了策略性的改变,总的说来,是旨在克服中共和苏区在政治上日益严重的孤立状态。

收入本卷的文件为阐明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政策演变动因和过程,特别是为阐明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在这个时期的立场,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

日本入侵满洲后不久,共产国际就提出了武装人民反对侵略者、争取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民族革命战争口号。然而,进行这场战争能否取得成功,则取决于能否先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红军司令部对战争的领导(第22号文件)。换句话说,不管中共主要任务的提法如何改变,它的内容,即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国家苏维埃化的方针,没有改变。这是因为保持了对中国形势的总体估计,而这种估计决定了提出苏维埃革命口号,因为习惯于以前的方针,把中共力量与执政当局尖锐对立起来,保持了中苏关系上的敌对状态,以及指望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满洲而在南京方面出现的困难会给国统区开展苏维埃运动和革命斗争造成更为有利的条件。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许多文章都十分坦率地提出了最后这个结论^①。

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1931年9月20日决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阐述了利用新的形势来扩大苏区的方针,如占领江西省,包括其他大城市的计划^②。王明到达莫斯科后不久,在1931年11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作的报告中,又重复了这些思想(第16号文

^① 如见《中国的革命危机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1年第31期,第6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1991年版,第401—415页。

件),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里领导了中共代表团,并被任命担任共产国际内的一些重要职务(第15号文件)。

加速扩大苏区领土和红军数量的方针^①,更加全面地写进了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这些决议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早在1931年2月起草的^②。

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其中谈到,国民党政权的彻底破产已经来到,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变动,有利于红军和苏维埃,因此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据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已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区的议事日程上了^③。

1932年1月,日本陆战队在上海登陆,试图以武力迫使南京承认对满洲的掠夺,日本对中国的这次新的侵略行动再次推动了利用形势来开展苏区红军进攻政策的计划。这一事件引起了南京政府的尖锐危机,几乎达半年之久(至1932年5月),束缚了对红军作战的积极性。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把注意力集中在南京政府的困难上,似乎这些困难证明关于它的“危机”和“不可避免破产”的论点是正确的,而对国内兴起的、在1932年1月至3月间形成了广大居民阶层自发地武装抵抗日本在上海的登陆的民族爱国运动的意义估计不足。这次抵抗行动被称为“上海保卫战”,驻扎在沪宁地区的国民党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命令参加了这次战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2年春,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共和苏区领

① 详见《中国的苏维埃(文献资料集)》(增订版),莫斯科1934年版;《中国苏维埃的纲领性文件》,莫斯科1935年版。

②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法令草案》,载《中国问题》1931年第8—9期。

③ 《中共党史文件(1920—1949)》(四卷本),莫斯科1981年版,第2卷第4册,第120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北京1991年版,第42—43页。

导通过了“进攻策略”，即积极扩大苏区领土和红军，包括占领一系列大城市计划。早在1931年11月20日，米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就建议重新审查1930年在反对“李立三路线”时期提出的取消占领大城市计划的方针，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随着红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巩固军事上的成就，将有必要占领一些中心城市，先是江西省的吉安和南昌，后是湖南和湖北省的大城市长沙和汉口。米夫还以必须扩大临时苏维埃政府的活动和克服苏区的经济困难，如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由来说明占领大城市的必要性(第18号文件)。斯大林对这封信的答复没有找到。但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1932年3月初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来判断，这些建议和计划得到了共产国际领导的支持，虽然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方式。中国的作者们写道，在给中国红军领导的这个指示信中，建议要十分注意占领像南昌这样的大城市，以便：第一，促使革命转向更高的阶段；第二，使敌人失去向苏区进攻的基地；第三，促进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①。

看来，193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社论，就是根据这个指示信和上面提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32年1月9日的决议撰写的，文中认为，夺取一省或数省，包括它们的大城市的方针是红军的直接任务^②。

1933年以前，中共在城市里的工作(即在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中的工作)，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31年7月31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条款确定的^③，同年12月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革命工会运动的任务》的

①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255页；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没有找到这份文件。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北京1991年版，第610—635页。

③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莫斯科1986年版，第244—246页。

决议,对这些条款又稍作修改重新提出^①。在本文件集第三卷的前言中和许多其他综合性和专题性论著^②中,对30年代前半期中共在城市中的地位日渐削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收入本文件集这一部分的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上海保卫战”时期的工人运动和城市居民群众性运动的一些重大事件中的立场的文件,大大补充了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众所周知,中共在“上海保卫战”时期的立场,对于党在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中本来就软弱的地位以及它在青年学生和其他城市居民阶层中的影响具有不可避免的破坏性影响。在上海保卫战过程中,共产国际曾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作为独立的力量来采取行动,要组织工人和学生队伍,争取把工人武装起来并把士兵争取到中共方面来(第26、29号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张在上海和其他城市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来对抗国民党的政权机构,随后成立全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建议不要宣布全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一部分(第33号文件)。

由于1931年的逮捕行动和许多富有经验的领导人(周恩来、张国焘等)转移到苏区而受到削弱的党的领导以及上海和江苏省为数不多的党组织,面临的任务是掌握城市保卫工作的领导权。据现有材料,当时在上海只成立了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是从事宣传鼓动工作,而加入由中共建立的志愿队的约有700人,只有约100支步枪和手枪^③。

这些方针和行动,以及号召士兵逮捕和枪杀军官的做法,破坏了在上海自发形成的各种力量(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底层和

① 《争取群众斗争中的红色工会国际。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莫斯科1932年版，第65—79页。

② 如见T. H. 阿卡托娃：《国统区的工人运动》，莫斯科1983年版。

③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254页。

有产阶层的代表、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军人,包括 19 路军军官和指挥人员)行动的统一,导致共产党人的自我独立,脱离了上海和其他城市主要居民阶层。国民党的宣传机器积极利用这一点来破坏中共的威信。

无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无论中共都未能从上海事变的教训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中共未能完成摆在它面前的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这是因为党在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中的地位软弱,共产党人轻视工会工作。在提出党在工人运动中的任务时,又重复号召要加强在大企业中的工作,把大多数工人争取到自己方面来,把红色工会变成群众性的组织,渗透到“黄色工会”中去^①。这些方针忽视了民族爱国主义口号和思想对中国工人和工会的影响,在 1932 年 9 月又补充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的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它们决定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红色工会国际和中国领导几乎直到共产国际七大时对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问题的态度。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就是从这些立场出发来评价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形势及其前景的。远东局成员们经常指出,中共在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中的地位软弱,而从 1933 年起在国统区赤色工会的数量急剧下降,“黄色工会”数量不断增加,他们认为,中共在工人运动中工作困难的原因主要是不善于进行这项工作,缺乏有经验的干部,等等,也就是说是在于主观因素(第 90、104、109、123、148、171、206、249、259、260、274、314 号文件)。

正如上面指出的,1933 年,在国家苏维埃化和推翻南京政权的总方针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开始对实施这一方针的策略进行了一些修订。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的 1933 年 1 月 10 日中华苏维埃

^① П. 米夫:《上海事变的教训与中国共产党》,载《中国问题》杂志,莫斯科 1933 年第 4 期,第 7—8 页。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①(第100号文件)和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②为这些变化奠定了基础,从重新审查毫无成效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和克服中共及其红军脱离潜在的同盟军的孤立状态角度来看,这两个文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后一个文件含有区别对待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的内容,在这方面而且在今后不只是对满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③。

在一些著述中,至今还在争论1933年1月10日宣言的实际意义问题。一些作者认为,这个文件主要具有宣传意义,只是为了“揭露”“统治阵营”内的某些派别,如果它们拒绝接受这些条件的話^④。收入本卷的一些文件反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远东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对1933年5月至8月冯玉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发动和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19路军在福建的反蒋起义的态度,在这两次重大事变进程中,“三项条件”中所宣传的策略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个文件的意义作出切实的评价。

① 在上海发表的这个文件注明的日期是1933年1月10日,而文本是1933年1月17日在瑞金印刷的。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1—45页。

③ 在研究这些文件的著述中,通常公允地指出了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和(或者)王明在起草这些文件过程中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出现了夸大王明独立性的倾向,而忽视或避而不谈这样的事实,即这些文件(和晚些时候的文件)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密切合作起草的,而文件的发表或发往中国是经共产国际领导批准的(如见周国全、郭德宏:《王明评传》第98—121页)。

④ 在这方面,许多作者利用中共当时的领导对文件内容的解释和实际运用来评价这个文件(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立场),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著述中,中共当时的领导通常被看作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而没有注意到在30年代前半期的不同时期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在立场上的差别。

收入本卷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远东局对冯玉祥部队发动^①的态度的文件,还没有提供可能对至今尚不清楚的一个问题作出答复,即究竟谁(除冯玉祥外)是察哈尔军建立和发动的发起人^②。但是,不管是谁发起与冯玉祥建立联系,对于冯玉祥来说,特别是对于中共代表们来说,如果没有1933年1月10日宣言中所公布的方针,他们都是不可能这样做的。然而文件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以及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北方局的领导人)从接触一开始就对冯玉祥抱着极不信任的态度,这无疑有以前与他交往的经验的影响:冯玉祥曾得到苏联的巨大援助,在1927年6月转到蒋介石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武汉与南京之间的对抗

① 冯玉祥于1933年5月26日宣布成立自己的军队并提出其宗旨是夺回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6月至7月,他的部队占领了察哈尔、热河和绥远省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冯玉祥军队的构成人员纷繁复杂,其主要力量是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吉鸿昌和方振武将军的部队。共产党人(宣侠父、柯庆施、张曙时等)占据了军队中的重要职位,成立了地下的前线委员会。他们占据了吉鸿昌部队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的职位,担任许多师、团和营的指挥员。到8月初,由于蒋介石采取“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军队中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大部分指挥员转到南京方面。中共前线委员会试图以党的“左”倾路线的精神提出“武装群众”和“实现民主自由”的口号,这一做法引起了共产党人和冯玉祥之间的磨擦。8月初,冯玉祥丢弃残部,根据中共前线委员会的提议,留下的部队改名为“抗日讨贼军”,开往河北省南部,并在那里建立了新的苏区,试图进攻北平。9月底至10月初,他们被蒋介石部队包围并缴械(见梁玉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的原因》,载《历史教学》杂志,天津1985年第1期,第15—18页;宣侠父:《西北远征记》,北京1982年版,第4—5页)。

② 奥托·布劳恩在回忆录中写到,1933年春他奉共产国际代表之命去北平,打算从那里去张家口与冯玉祥谈判,但会晤未成,因为冯玉祥的联络员被逮捕了(见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37页)。这一点以及A.埃韦特在报告中提到与冯玉祥秘密谈判的事(第280号文件)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可能还有苏联在华军事侦察机关工作人员在准备这次发动中起了积极作用。在中国的著述中,说冯玉祥与吉鸿昌和方振武实行联合的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宣侠父,他是奉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北方局之命行事的(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词典》(总论·人物卷),北京1991年版,第449页)。

结局。作为对远东局关于中共在冯部队中的工作和“巨大影响”的报告(第139号文件)的反应,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给远东局的电报中谈到“很怀疑冯与日本人有联系”,因此“最好不与他有任何联系”(第140号文件)。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远东局“不直接与任何人进行谈判”,但不反对由中共代表去建立这种联系,而在所有重要时刻都须同远东局(和莫斯科)商量。从1933年7月底起草的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和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为防备不能与冯玉祥的力量一起组织反南京的发动,远东局酝酿了在冯玉祥的受共产党人影响的部队中发动士兵起义的计划,并征得了莫斯科对这种起义的批准(第148号文件)。曾打算把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的部队,并调到陕西和湖北省的交界地区,在那里建立新的苏区。中共上海中央局给冯玉祥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也坚持这种精神^①。共产国际执委会坚决反对起义,认为这种起义和湖北的起义运动会挑起日军占领张家口(冯玉祥军队的大本营所在地)和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第151号文件)。

1933年10月初(即冯玉祥军队残部——吉鸿昌和方振武部队被缴械前两星期),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给莫斯科写信说,虽然这些部队的许多军官可能是公开的或不自觉的日本走狗,但是如果认为士兵和志愿兵也是这样那就错了,因此首要任务是使他们接受中共的影响,但“不要过早地打出红旗”。报告中说吉鸿昌是“早就同我们合作”的人了(第171号文件)。

这里发表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在福建事变时期的立场的文件表明,在这个时期,冯玉祥军队发动的教训得到了部分吸取。1933年夏(早在冯军失败前),远东局不止一次地向共产国

^①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262—263页。

际执委会报告说,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试图通过中间人同它和同中共驻上海的代表建立联系,还说它拒绝了这个意图:“我们认为19路军总指挥的建议是不郑重的,我们建议(中共)中央谨慎行事”(第141号文件)。莫斯科也认为,同他“不要进行任何谈判”,同时认为“当他真正开始跟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斗争时,建立统一战线才有可能,而目前谈判可能是个陷阱”(第140号文件)。这可能是受到了关于“上海保卫战”后19路军内清洗共产党员和它曾参与1932年蒋介石部队对红军的“围剿”的情报的影响。

但是10月初,在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同19路军的谈判应该进行,因为:第一,不应把19路军向中共的呼吁看作“只是一个骗局”,它被“夹在”蒋介石、广东政权和中央苏区之间,希望加强自己的地位,需要得到支持。此外,中央苏区及其红军为了反击蒋介石新的“围剿”,至少也对与19路军停战感兴趣(第171号文件)。

到达中央苏区的蔡廷锴的使者提出一些建议,中共中央向远东局作出了报告,远东局在对报告作出反应时,也帮助中共中央去理解上述精神(第167、169号文件)。

远东局在对待中央苏区政府和19路军之间签订协定的态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建议中共在谈判中不要求履行所有条件作为签订协定的先决条件,并认为开始时释放俘虏和停止经济封锁就足够了(第167号文件)。1933年10月26日签订^①了保证停战和可以通过福建把弹药和医疗用品运往中央苏区的协定(第181、183、186号文件),11月底,远东局征询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可否建议蔡廷锴“以自己的力量”,利用他掌握的武器建立工农武装,不称红军,而称人民革命军,将与红军和19路军合作反击南京的进攻(第202号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答复说,这是可以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71页。

但只要该军队的领导权将掌握在红军指挥员手里(第209号文件)。

这个方针以及远东局、中共中央和中共福建省委实行的加速进行城乡激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游击队的方针,也反映了与福建人合作的计划的另一个方面,即试图使福建的运动最大限度地接近苏维埃的立场(第222号文件),不排除将来转向全省苏维埃化^①。

远东局对19路军首领和1933年11月20日在福建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的不信任,还特别表现在埃韦特未与中共中央协商而以“中共负责人”的名义发表的一篇谈话中,这篇谈话刊登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创办的《中国论坛》杂志1933年11月30日版上^②。其中谈到十九路军的发动是企图挽救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权,挽救军阀的政权,这是反对工农革命的斗争,只是方式与南京的政策有所不同,因此中共对福建政府持反对立场。埃韦特在谈话中公布了双方保密的红军和19路军之间关于停战和可能共同同蒋介石部队作战的协定,这绝对无助于加强中共和福建政府之间的信任。

不相信19路军会决心同蒋介石作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远东局、军事顾问施特恩在蒋介石军队进攻福建期间所提出的军事计划决定的。1933年11月底,施特恩提出红军一些兵团向赣西北地区,然后向湖南进行袭击的计划,目的是绕过由北面进犯的敌军的右翼,给它的后方以一击,以打破南京军队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的计划和日期(第218号文件)。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表示反对,认为红军大部力量离开中央苏区及其毗邻地区会导致它们的很快丧失。施特恩试图坚持自己的计划,迫使中共

① 详见《福建事变档案材料(1933年11月—1934年1月)》,福州1984年版。

② 《共产党声明对福建的看法》,载《中国论坛》,上海1933年11月30日第3卷第2期,第1—3页。

中央于1933年12月直接诉诸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计划是,在蒋介石部队和19路军开战以后,袭击从赣北进犯中央苏区的蒋介石部队的侧翼。

正是在这种争论十分激烈和中共中央、远东局诉诸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时候,蒋介石的部队迅速进攻了19路军。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34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和远东局的复电中指出,从莫斯科或上海提出的关于军事问题的一切建议,中共中央只应看作是建议,并建议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等待蒋介石部队和19路军之间发生冲突,甩开南京的进攻部队,在蒋介石部队与19路军开战时,袭击进犯福建的蒋介石部队的侧翼和后方(第218号文件)。但是,当上海和中央苏区接到这份电报时,19路军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决定了。

众所周知,在19路军被消灭后,无论莫斯科还是上海和瑞金,都把19路军失败的责任推到它的指挥部身上,指责它不会贯彻革命政策等(第222、224号文件)。现在,19路军对待“三项条件”的态度被用在揭露宣传方面。

193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苏维埃的经济和军事政策问题也作出一些修订。本卷收集的文件表明,远东局的情况通报在这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2年10月,由于对苏区封锁的加强和那里经济状况的恶化,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必须对苏维埃的政策作出改变的问题:对中农和手工业者作出一些让步,为此,必须重新审查苏区劳动法的某些条款(第76号文件)。这些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支持。1932年12月,米夫也同意“向小资产阶级作出某些让步”(第92号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展和支持了这个方针,于1933年3月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建议对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作些改变,目的是发展和鼓励生产,活跃市场关系和商品流转。指示信中还建议,避免再重新分配土地,固定农民的份

地，只对涉嫌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富农没收其生产资料，不禁止富裕农民出租和购买土地（第 112 号文件）。

在这个指示信中，还包含着新的军事方针，修订了以前的“进攻方针”。正如在前言中指出的，本卷发表的文件表明，在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和远东局活动的文件中，在它们之间以及与中共中央的来往信件中，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占主导地位的是红军的军事行动和策略问题。

1932 年春夏，在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人中发生了关于今后作战行动的性质和中央苏区发展方向的争论。毛泽东主张实行防御策略，反对转入进攻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敌人，主张把红军部队化小并撤退到山区。反对他的人则主张实行进攻策略，认为形势是有利的，并要求对毛泽东的观点进行公开批判，解除他在军队中的领导职务，让他回到后方去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第 45、80 号文件）。

无论莫斯科还是埃韦特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都谴责毛泽东提出的策略，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和埃韦特反对开展批判毛泽东的运动，建议只限于采用同志式的说服方法，争取毛泽东转到“积极路线方面”来（第 51、75、76 号文件）。然而，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个意见，支持中共苏区中央局许多委员让毛泽东回到后方和对他的观点进行公开批判的建议（第 75 号文件）。1932 年 10 月上旬末，中共中央的这一方针在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①。

由于 1933 年 2 月中央苏区红军试图占领江西省县城南城的行动失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正如它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所说，建议中共在 1933 年三四月间等待国民党来犯时不包围也不攻打敌人设防的城市，而是利用自己的力量在开阔地带作战。在

^① 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528—531 页。

这份报告中谈到,在中共领导中,有人认为这个建议脱离了“党的进攻路线”,回到了1930年关于不夺取任何城市的指示(第109号文件)。在远东局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许多文件中,都谈到这样一种意见,认为中共领导机关和红军指挥人员“很容易同意”把很早建立起来的并安排得很好的苏区“让给敌人”,以便像他们所说的“保住军队”。这里指的是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第104号文件)。

莫斯科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关于占领大城市的意见,但不同意它对红四方面军放弃自己的根据地撤退到川北的行动进行批评。共产国际赞同中国红军的这一步骤,指出必须保持红军的游动性,不要不惜任何代价地拴在某个地区。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信中所说,“要预见到可能的撤退途径,做好撤退准备,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障的基地,使红军有可能隐蔽起来,等待有利的时机”。文件中强调指出,主要是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加强红军。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占领苏区领土内仍然是“反动巢穴”的中心城市。至于苏区领土以外的大城市,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建议中共要现实地估量一下形势和力量对比,不力求占领大工业城市和行政中心,只对它采取包围、围困的策略,从而涣散和削弱敌人的力量。同时指示信中还谈到,“保存现有的几个地区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不应与联合邻近苏区的方针对立起来”。从而保存了重新采取“进攻策略”的基地。实际上,占领大城市的方针在1934年秋,随着南京对中央苏区发动新的“围剿”就取消了,据远东局承认,当时红军已转入“持久防御阶段”(第171、186号文件)。

1933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断定,中央苏区的军事形势已有所好转,经过两三个月的准备拟定了中国红军反攻计划(第123号文件)。1933年9月,国民党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才从日程上取消了这项计划。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国民党“围剿”开始后发给莫斯科的最初一些报告中,已经指出了红军面对数量和技术装备上都占优势的敌人所出现的困难,指出了持久防御的严峻前景(第173号文件),甚至至少会丧失部分土地的可能性。还指出了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引诱”策略的困难(第171页)。在军事顾问施特恩的报告中,详尽地分析了实行“围剿”的新方法——逐步把中央苏区集中压缩在包围圈内并严密加以封锁等等(第194号文件)。由远东局发往莫斯科的中共中央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反措施的建议,是试图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敌人来犯纵队的薄弱环节,即其接合部,以期击溃敌人的一些大部队,粉碎他们的计划(第193、194号文件)。

19路军在福建省的发动把蒋介石部队向中央苏区的进攻推迟了两个月。但是,随着起义被镇压下去,说明蒋介石部队能够封住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苏区和红军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而且逐月加剧,无论在上海(3月前施特恩还在那里),也无论在莫斯科(那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军事部门研究了中央苏区的形势)都意识到了这样的事态发展进程。红军部队的战术和计划问题比以往更加经常地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上进行审议。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早在1934年2月至4月间正确地估计到中央苏区红军处境的困难(丧失了战略和战术上的主动性)(第236号文件),估计到反击敌人步步为营、“逐步吞食”苏区的行动成效甚少(第256号文件),但是它未能在这种形势下提出能够改变局面的有效措施。

建议采取的措施,如粉碎敌人一两支大部队(而不是全线作战),积极利用运动战战术,加强对南京发起进攻的战斗部队的后方和侧翼的游击行动,尝试在进攻战线后面袭击一些大兵团,以便把它们从中央苏区引开等等,在另一种情况下抽象地说是正确的,也是有效的,而在1934年春围绕中央苏区形成的条件下则只不过是良好的愿望。

1934年6月中,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收到了埃韦特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央苏区周围的军事形势日趋严重,没有希望从根本上改变局面,使之有利于中国红军。报告中简单地叙述了中共中央的下一步行动计划,提出两个方案: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行动的主要方式,第二个方案是,准备让红军主力冲出包围圈(第259号文件)。埃韦特实际上倾向于支持第二个方案,虽然他含混地有保留地说,“只有在保卫中央苏区的一切办法都穷尽以后并在保存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能采用这个方案(第259号文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4年6月16日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一方面同意中共中央的计划,不排除放弃中央苏区,但另一方面,在该电报中又断言,在外围地区、在交通线上和在敌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运动的情况下,“在夏季,红军尽最大努力是可以取得主动权并改变业已形成的不利局面的”(第263号文件)。

1934年8月15日,埃韦特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作报告时指出,中央苏区的处境日益困难,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让红军向湖南省方向突破,同时还谈到,“还存在在我们地区缩小的地段上固守下来的某种可能性,尽管是没有把握的可能性”(第280号文件)。

随着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对不可避免要放弃中央苏区的认识的成熟,在共产国际的文件和刊物上越来越注意四川的新苏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认为,那里的政治形势……对我们来说可能比在中国任何其他一个省份要更有利得多(第280号文件)。四川的一个地区被认为是苏维埃运动最有前途的证明(第280、283、285号文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拟定了计划并采取了,从苏联与四川的这个地区建立直接联系的实际步骤(第287、307号文件)。

1934年8月底,中央苏区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注定,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在华南的一个港口建立

一个机构,以便把武器、弹药和药品调往中央苏区(第 282 号文件),并在 1934 年 9 月 4 日的电报中通知了中共中央(第 285 号文件),但直到 1934 年 9 月 30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才同意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开往湖南(第 294 号文件)。可以想见,这个问题如此迟迟不决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以下情况有关,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没有谁敢在共产国际七大前夕承担把曾在共产国际的宣传中作为中国苏维埃运动胜利象征的中央苏区及其首都瑞金让给敌人的责任。

这一部分中发表的文件也大大补充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旨在动员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各种力量来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情况。这种活动是与苏联外交在这方面采取的步骤相结合的,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其作了补充。

1933 年 3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向莫斯科报告说,在上海召开了由中共组织的“许多反帝志愿者组织”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的筹备会议。会上提出的要求,除重复 1933 年 1 月 10 日关于三项条件的声明提出的基本条款(停止进攻苏区、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外,还包括要求将全部军队的 80% 投入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以及武装民众和建立志愿者队伍。远东局认为,在正确的领导下,有很大的潜力来扩大这一组织,并在其他城市建立分部(第 109 号文件)。

根据这份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于 1933 年 4 月底责成王明制定“救国会”的纲领草案,以便把人民抗日战争口号具体化(第 126 号文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1933 年 5 月 9 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简要地阐述了这个团体的纲领性方针(第 128 号文件),后来中共代表团在 1933 年 6 月寄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①中又作了阐述。

^① 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第 167—168 页。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没有找到这个文件。

这些方针在王明和康生征得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于1933年10月27日寄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第182号文件),信中建议成立更加广泛的这类组织,名称为“中国人民御侮救国委员会”(1934年4月该组织得名“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1933年10月27日的信引发了1934年主要由负责南京控制地区党的工作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开展的一场运动,争取成立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和宣传信中提出的纲领。从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场运动首先提出的任务是消除南京宣传的影响。南京认为,政府的立场是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抗日政策,而反对政府的中共(和其他军政集团)则是在军事侵略面前破坏国家后方的反民族的力量。此外,运动提出的目的是推动和利用国民党内,特别是地方上的军政派系,以及那些要求坚决抗日的各种社会阶层的代表的反蒋情绪和发动,使之有利于中共。

信中提出了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和隶属于它的省、市、县等武装自卫委员会体系的计划,该委员会由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产生,拥有“决定一切武装抗日问题”的权力,实际上这意味着成立一个在中共领导下与南京政府相对抗的国家领导机构,这个机构的成立及其活动纲领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左”倾特征,但是在这个文件中表现出重新审查许多以往方针的倾向。在应该参加中央和地方武装自卫委员会选举的社会阶层中,提到了“商人”,即资产阶级的代表。建议吸收职业协会、黄色工会、同乡会、国民党地方和基层组织的代表参加各种活动(群众集合、各种会议、请愿运动等)。建议吸引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学者、记者和军人,“甚至以前的反动分子”签署纲领性文件并参加其宣传工作。

在信中提出的纲领中,指出要摆脱以往与所有帝国主义列强

正面对抗的策略,过去把所有列强与进行公开侵略的日本等量齐观,现在则打算利用日本和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纲领中谈到,武装自卫委员会将把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所有国家看作是与中国人民友好的国家。信中指出,宋庆龄在成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发起机构的活动中和对其纲领的宣传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1934年4月20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中共上海中央局发起的以宋庆龄为首的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①。同日还发出了《中共中央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关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信中对基本纲领作了说明并建议执行^②。中国的许多报纸都报道了纲领的内容。共产国际的核心报刊、美国和西欧的共产党报刊也都发表了纲领和支持纲领的文章。1934年7月20日,以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告中国人民书》,其中再一次阐明了成立委员会的目的和步骤。在共产党的报刊上也宣传了这篇告中国人民书。

开展这项运动的实行结果看来是有限的。由选举产生的全国和地方武装自卫委员会未能建立起来。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只有由中共地方组织成立的筹备会进行了活动。除了全国和上海的筹备会以外,北平筹备会的活动最有名。其领导人后来在1935年开展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修订以前策略的下一个步骤是王明和康生1934年8月3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③。信中批评了中共中央五中全会“政治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81—686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248—259页。

③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没有找到这封信。在周国全、郭德宏的《王明评传》(第103—105页)中引用了其中的片段。

决议”中的许多论点,如在决议中对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问题的解释。根据这个解释,占领一省或数省也就是占领其中心城市。信中指出,目前还没有占领中心城市的条件(红军拥有攻打城市的新的军事技术装备,军队的进攻行动与城市郊区起义的配合,敌人军队中发生大规模的士兵暴动,敌人阵营中出现大规模的反政府发动),因此提出占领中心城市的任务“不可能符合目前的条件和未来的要求”。此外,在这封信中,对1933年10月27日信中的许多论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信中说,在目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原则上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列强和所有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应该首先提出反对日本和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口号,以便把能够参加这场运动的所有力量团结在这个口号之下,反对革命最凶恶的敌人。接着又说,“不仅要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团结在这个口号之下,“而且要尽可能地利用和联合统治阶级内的一切反日和反蒋的集团”^①。

本卷中发表的王明和康生1934年9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第288号文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起草的,当时莫斯科已经完全明白,红军主力不久将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虽然当时即使在内部文件上,更不用说是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报刊上,都没有谈到这一点),这是苏维埃运动的重大失败。看来,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已着手调整对待中共与地方军政集团相互配合行动的新的态度,这一点反映在王明和康生1934年8月3日的信中,并从这种立场出发重新看待福建19路军起义失败的原因,重新评价中共对19路军的策略。

如果说1934年1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中,福建人失败的原因被认为是福建将领们的“叛卖政策”,是他们想要扮演“第三势力”的企图(第224号文件),那么现在则认为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红军和19路军在反对蒋介石部队进攻福建的斗争中没有切实

^①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评传》,第105页。

的相互配合行动,是中共领导的观望策略。中共中央 1934 年 9 月 14 日电报谈到,有可能同广东省当局进行谈判,以便签订关于在反击蒋介石部队向中央苏区和广东进攻时采取相互配合行动的协议(第 286 号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 1934 年 9 月 23 日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则说,务必不再重复对 19 路军的做法,不提出过高的要求(第 291 号文件)。

1934 年 9 月 16 日的信反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在 9 月上旬对中共代表团(可能是王明本人)起草的政治决议草案《关于中国的形势与中共的任务》的讨论结果(第 283 号文件)。根据草案的内容来看,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考虑把它作为向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提交的政治文件,应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上述 7 月(1931 年)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水平上,要对苏维埃运动走过的道路作出评价,并明确中共在新的条件下的任务。虽然在草案中“证明”,苏维埃运动具有积聚力量的潜力,而它与开展抗日运动结合起来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是中共的主要任务,但是在其中明显试图说明苏维埃运动所经历的复杂情况。实质上还指出,在草案中,尤其在 9 月 16 日的信中,提出了吸收包括国民党的军阀在内的一切反对南京的势力参加反蒋运动的任务,并强调必须“不要像过去那样等待人们来找我们,而要自己主动地去充当反蒋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同时还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党要力求使这场运动在各地都打着它的旗号进行。

王明在 1934 年 10 月 1 日就党准备迎接共产国际七大问题写给中共中央一封信(第 297 号文件)(其基本论点后来写入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代表团 1934 年 11 月 14 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①),在信的草稿中,王明拟出了建议在党内进行讨论的一些关

^① 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 278 页。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没有找到这个文件。

键问题。对于红军和苏维埃问题,在保留“坚决粉碎敌人力量”的方针情况下,建议从“保存、加强和发展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策略方针”出发,“制定从防御转向掌握作战行动的主动性和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的进一步发展计划”。

至于反帝统一战线,信中则建议要“坚决具体地”谴责宗派主义,“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和组织,利用敌人阵营中的一切矛盾”。信中谈到,务必使党意识到,只有党提出的口号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和深刻的人民性”,为组织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而进行的斗争才可能是现实的和有成效的。

在关于工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部分中,实际上提出了放弃建立(小规模的和封闭式的)赤色工会团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包括同乡会和宗教团体在内的现有一切(传统的和现代的)工人组织的活动上的问题。建议党和中国共青团特别注意爱护干部,“坚定不移地转向青年”,结束对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藐视态度。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给满洲党组织的一些文件中,可以十分明显地感觉到对组织反帝斗争任务的提法的变化。根据上述1933年1月26日给满洲共产党人的指示信,中共满洲省委于1933年5月15日通过了《关于实现反帝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决议》,并对党和军事工作作了明显的改变,对许多义勇军进行了重新整编^①。然而,1934年2月20日瑞金的中共中央在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却不同意1933年1月26日信中关于必须区别对待满洲形形色色军政集团的论点。信的作者只强调“下层统一战线”,严厉谴责与地方部队指挥官建立联系的方针,要求把游击运动转入土地革命阶段,大力开展城市里的工作^②。因此,在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领导1934年9月16日给中

①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评传》,第113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121—141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建议不要将这份文件发往满洲,以免给地方组织的工作造成困难(第288号文件)。同时,为了解决在接到中共中央上述信件后满洲党的机关中出现的争论,派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成员吴平(杨松)去了满洲^①。

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实际上与起草“八一宣言”同时,由王明和康生签署的一封密信于1935年6月3日寄给中共吉东特委领导,信中对以往的方针作了重大的修改。信中指出,满洲目前所处的时期是准备群众、积聚力量和培养军事干部的时期,就是为未来更大规模的行动建立基础的时期。因此,在开展游击运动中,首先应该竭力把它与一切抗日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把愿意参加武装斗争的一切人都吸收进来,并在这个基础上扩大游击组织。信中建议,考虑一下自1933年1月26日信发表以来满洲各种类型部队性质的变化,更广泛地利用“下层”和“上层”的统一战线策略。在关于统一战线的意见中,建议不要提出过高的要求,要从实际条件和可能出发。建议不要在各种军队的名称上冠以“红色的”和“工农的”字样,要把它们称为“抗日救国军”或“人民革命军”,不要在这些部队中照搬红军政治工作的一套办法,要估计到群众的觉悟水平,在军事方面则要采取灵活的策略来对付敌人的围剿^②。

信中建议,要为召开抗日代表大会做准备,成立或改组地方的抗日政权机关,将它们命名为“抗日救国政府”,或者在开始时为“抗日协会”、“农民委员会”。建议取消加入抗日协会的一切限制。信中指出,必须根据这些任务来重新安排党组织的工作,使党的机关更接近游击地区,缩减其庞大的领导机构,力求使地方组织善于根据游击战的环境独立行动^③。

①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评传》,第114页。

②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评传》,第114页。

③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评传》,第115页。

为了加强对满洲工作的领导,在代表团的会议上通过了成立满洲问题委员会的决议,代表团的许多成员参加了这个委员会。1934年2月2日,代表团起草了《关于成立东北抗日联军司令部的决议草案》,建议把这个地区内的所有部队都联合起来,冠以一个总的名称。建议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军”。由代表团起草并以许多著名游击队指挥员名义于1934年^①2月20日发表的《关于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的宣言》散发到各地以后,东北的所有武装部队都使用了这个名称^②。

不仅中共的经验,而且还有共产国际其他政党的经验都提示,迫切需要寻求对“老难题”的新答案,这决定了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所拟订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新办法。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36年——译者。

②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评传》,第116页。

1

多尔夫给马季亚尔的信

1931年9月18日于塔什干

绝密

尊敬的马季亚尔同志：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些新的材料（很可能您那里也有）^①，依我看来，这些材料使我们有可能对新疆运动^②的性质作出某种十分明确的结论。在谈及这些结论前，我想跟您谈一谈地方领导同志的意见。鲍曼同志认为，运动带有民族解放的性质，因为农民群众参加了运动，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不管运动是否将由封建主或其他民族剥削分子来领导，它在客观上是革命的，并将发展成为土地运动，发展成为农民战争。因此，我们应该帮助这个运动，应该开始在新疆进行积极的革命工作。他认为可以把那些天天在口头上和书面上谴责[联共(布)中央]中亚局的维吾尔族人都派到新疆去。

应当说，地方上的维吾尔族人没有袖手旁观，其中许多人准备不顾禁令到新疆去。有理由认为，维吾尔族人为了培养干部去参加新疆的运动和向那里调动人员建立了地下组织。诚然，这里有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的是1931年4月哈密爆发起义后新疆掀起的民族革命运动。详见A. A. 哈基姆巴也夫：《哈密起义——1931至1935年新疆非汉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根据维吾尔族资料）》，载《第十一次“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学术讨论会（提纲和报告）》，莫斯科1980年版第3集，第98—105页；B. C. 库兹涅佐夫：《中国政治史上的伊斯兰教》第三部分（20世纪30年代—1949年），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通报》，莫斯科1996年第9期，第3—28页。

很多间谍分子:例如在喀什有一个组织,为首的是一个维吾尔族人,党员,是从苏联跑到那里去的,冒充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①,这个组织同中国的暗探局和英国的谍报机关有联系,是个间谍组织,其任务是揭露来自苏联的革命分子,并分化我国领土上的维吾尔族积极分子。

军事工作者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还没有拿定主意对运动作出明确的评价,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运动是革命的,因为存在着尖锐的社会冲突,必然使这个运动变为农民革命;〔他们〕认为,有必要帮助运动和相当坚定地反对帮助中国人镇压起义。他们本着这种精神给莫斯科写了信^②。他们和我一样认为,莫斯科的同志^③提出用武器帮助中国人的论据是没有道理的,是与现有的新情况相矛盾的。

现在谈一谈新的材料。运动无疑带有农民的性质,是由于今年的苛捐杂税和赋税重负要比去年高好几倍而发生的。运动的基础是由以前的各种事件打下的,是从农民普遍拒绝交税,与征税人对抗,以及一系列个别小冲突和抗议行动开始的。发生广泛的群众性起义的导火线是解除哈密的汗^④,取代汗实行县长制和中国的一套制度。然而,当一批从甘肃来的东干人神速攻占了哈密和巴里坤时,运动就有了力量和威力。据传,起义者甚至占领了吐鲁番。有消息说乌鲁木齐在疏散。这样一来,参加运动的有维吾尔族人和东干人,这就改变了整个情况,保证了运动的转变。整个新疆的农民群众对起义者都持同情态度。以下事实十分明显地说明了居民的情绪:伊犁地区被动员的人被成对地绑在一起,在加强了

① 何人不知。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指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

④ 指继承的王公那扎尔。

的押送队的押解下遣送到乌鲁木齐。尽管这样,许多人在途中还是逃跑了。从各个地区传来的消息说,有一个秘密组织,在居民中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有消息说东干人和塔兰恰人之间正在伊犁进行谈判。东干人还跟吉尔吉斯人和蒙古人在进行谈判,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至少是保持中立。东干人和哈萨克人成群结队地加入起义者队伍。

封建上层人士对运动采取不同的态度。哈萨克的王公和蒙古的汗倾向于支持政府反对起义者,教权主义分子企图控制运动,为此抛出了对异教徒进行圣战的口号,散布各种各样的谎言,说什么在战斗中走在起义者前面的有毛拉并念着可兰经,等等。毛拉的这种鼓动没有遇到任何对抗,目前谁也没有提出其他回应的、阶级的、农民的、民主的口号。

买办资产阶级也跟大商贾一样惊恐万状,他们准备无条件地支持政府。根据中国人的建议,从乌鲁木齐派来了大商人代表团同起义者谈判,但不得不无功而返。起义者断然拒绝谈判。

有传闻说,起义者中有一些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前来支援起义者的队伍,还有从甘肃来的大量共产党人。伊犁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上层人士把运动看作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担心运动发展下去会导致农民夺取土地和没收殖民者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财产。

至于英国人的立场,最典型的是英国情报处间谍绍姆贝格上校的行为,他曾在伊犁的……^①住了几个月。他鼓动毛拉和汗支持政府,必须镇压这种布尔什维克式的起义。

这样看来,显然:(1)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论据歪曲了真实情况,对运动作出了明显错误的估计;(2)试图把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的反革命暴动^②(顺便说一句,已经被镇压下去)和哈密起义农民的

① 原文如此。字迹辨认不清。

② 关于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暴动的材料没有找到。

行动联系起来的想法只能从张皇失措的印象中产生；(3)帮助中国人镇压起义不仅会给新疆的运动，而且会给甘肃和内蒙古的运动带来重大的打击；(4)不能像有些同志^①那样把起义看作是一种地方性事件。

今天我要去边境上考察队工作的地方。我想在那里搜集更详尽的消息。

招募工作^②总的说来很顺利。以前确定的人选都不得不作废，现在我正在挑选新的人员。

致同志式的敬礼！

多尔夫

如果您要写点什么给我，请按以下地址：塔什干，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常驻代表处列别杰夫同志转多尔夫。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57，第 31—39 页。

手稿。

① 何人不详。

② 指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国际列宁学校招募学生的工作。

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63 号(特字第×号^①)记录 (摘录)

1931 年 9 月 20 日于莫斯科

6.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1)针对日军占领南满和奉天而要采取外交步骤的决定,推迟到收到补充情报后再作出。责成加拉罕同志急速取得补充情报并报告政治局。

(2)责成由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和加拉罕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事先阅读一下报刊上与此问题有关的评论。

抄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加拉罕同志。

12. ——关于新疆问题(报告人:加拉罕、阿库洛夫同志)

(1)不接受鲍曼同志关于维吾尔族共产党人的建议^②。

(2)其余问题撤销。

① 号码没有标出。

②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 3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 2 册,第 1482—1483 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北京 2002 年中文版第 10 卷,第 345—346 页。

抄送：加拉罕同志——全部。

鲍曼同志——决定(1)(用密电)。

中央书记 卡冈诺维奇

全宗 17, 目录 162, 卷宗 11, 第 9—11 页。

打字稿, 原件, 签名为真迹复制。

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 180 号记录 (摘录)

1931 年 9 月 22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2.(2282)——就满洲事变发表的呼吁书草案。

决定:2.——责成库西宁同志为呼吁书最后定稿。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和红色工会国际[欧洲书记处]的名义发表^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139, 第 1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见《不许干涉中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西欧局和红色工会国际欧洲书记处呼吁书》, 载《国际工人运动》杂志, 莫斯科 1931 年第 29 期, 第 1 页。

4

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①

1931年9月22日于莫斯科

绝密 急

日本行动情况还不清楚。

(1)大国的立场除美国外都是消极的,据报刊消息,美国准备表态,认为进攻违背的不是凯洛格公约^②,而是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决议^③。

(2)中国人已在国联提出问题^④,国联将在日内审议这一问题^⑤。

(3)日本报刊在做好军队以保护日本公民为借口进一步向北推进的准备。

(4)[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责成李维诺夫同志召见日本大

① 文件已发表,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日本(1917—1941)》,莫斯科2001年版,第66页。

② 指凯洛格—布里安关于不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公约。该公约于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由包括日本在内的15个国家签署。

③ 关于限制海上武器和太平洋与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在条约中,各方保证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和行政不受侵犯。

④ 指中国政府于1931年9月21日向国联提出的呼吁书,要求采取措施“制止事态复杂化给各国人民的和平造成威胁,恢复战前原状并确定赔偿损失的规模和性质”。见《民族殖民地问题资料》,莫斯科1932年第3期,第44页。

⑤ 会议于1931年9月22日举行。见《民族殖民地问题资料》,莫斯科1932年第3期,第45页。

使^①，以便取得对满洲事变和特别是对涉及和可能涉及中东铁路利益的行动的通报和解释^②。

请告您对我们可以采取的进一步步骤的想法和对报刊的指示。

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

全宗 558，目录 11，卷宗 76，第 76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广田弘毅。

② 会晤于 1931 年 9 月 22 日举行。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莫斯科 1968 年版第 14 卷，第 531—533 页。

5

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①

1931年9月23日于索契

致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

(1)很可能,日本的武装干涉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和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

(2)不排除,但不大可能,美国会为保护张学良反对日本而掀起一阵值得认真对待的喧嚣,因为在目前情况下,它可以保障自己在华的“份额”而不与日本发生冲突,甚至可以征得中国人的同意。

(3)不排除,甚至很可能,日本人征得中国某些有影响的军阀集团,如冯[玉祥]或阎锡山集团,或张作霖之类的老奉天分子^②的同意,或所有这些集团的同意进行武装干涉。

(4)我们当然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因为它只能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而对我们有利的是让他们争吵起来。

(5)询问日本人,让他们使我们了解事态,当然是应该的,但同时也要询问中国人,哪怕是通過哈尔滨^③。

(6)报刊上应该这样处理,使人不怀疑我们是全心全意反对武装干涉的。要让《真理报》大骂日本占领者,大骂国联是战争的工

① 文件发表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日本(1917—1941)》,第67页。

② 指奉系军阀集团成员,1928年夏其首领张作霖被杀害后不复存在。

③ 文件没有找到。

具而不是和平的工具；凯洛格公约^①是为占领辩护的工具；美国是瓜分中国的拥护者。要让《真理报》大声疾呼，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和平主义者正在瓜分和奴役中国。《消息报》也应采取同样的方针，但要使用温和的和极其谨慎的语调。对于《消息报》来说，温和的语调是绝对必要的。

(7)应该让共产国际的报刊和整个共产国际特别关注日本的行动。

(8)目前这样做就够了。

斯大林

全宗 558, 目录 11, 卷宗 76, 第 76 页及其背面。

亲笔签字。

① 见第 34 页注②。

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64 号(特字第×号^①)记录^②
(摘录)

1931 年 9 月 25 日于莫斯科

1. ——关于中国问题

[1]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③给报刊作出指示。

[2]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再一次向苏联驻华和驻日外交代表作出严厉的指示,他们必须:(1)向莫斯科及时通报发生的事件;(2)没有莫斯科的指示不采取任何步骤,也不作任何解释。

[3]向库兹涅佐夫同志指出,他的声明^④是错误的,还向他指出,我们针对中东铁路的所有行动都应该从现有的苏中关于中东铁路的条约出发。

抄送:加拉罕、李维诺夫同志——[2][3]。

中央书记 卡冈诺维奇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11,第 12、13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号码没有标出。

② 文件已发表,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日本(1917—1941)》,第 66 页。

③ 见第 5 号文件。

④ 文件没有找到。

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185 号记录

(摘录)

1931 年 10 月 3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9(2331)。——关于满洲事变问题。

决定:1。——责成各地区书记处在两天内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报告各党开展反对占领满洲运动的进行情况,以及哪些党报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和红色工会国际欧洲书记处就满洲事变发表的呼吁书^①。

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在信中向《国际新闻通讯》^②编辑部指出,《国际新闻通讯》关于满洲事变的社论^③提出了错误的观点^④。

听取:12.(2334)——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组成人员。

决定:12. 询问中共中央,这个临时政治局是由哪个机构选出

① 见第 33 页注①。

② 《国际新闻通讯》于 1921 年至 1943 年用德、英、法和其他几种文字出版。

③ 西一郎:《日本军队入侵中国。帝国主义的火力点是准备世界大战吗?》,载《国际新闻通讯》,柏林 1931 年 9 月 22 日第 91 期,第 2029—2030 页。

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 1931 年 10 月 8 日给《国际新闻通讯》编辑部的信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48,第 135—136 页)。信的主要论点已发表,见约贝:《中国人民应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反抗,国际无产阶级必须一致行动》,载《国际新闻通讯》,柏林 1931 年 10 月 27 日第 102 期,第 2279—2280 页。

的,为什么沃罗夫斯基^①同志没有当选,政治局是否一致选出的;如果是,那么我们对其组成人员没有反对意见。

听取:14.(2336)——中国问题。

决定:见特别文件^②。

听取:30.(2352)——东方地区书记处的领导工作。

决定:30.由米夫、马季亚尔和萨发罗夫三人组成的委员会应实行对东方地区书记处的领导工作。责成库西宁同志与这三位同志一起制定职务分工计划,并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批准^③。

派库丘莫夫同志去主管《共产国际》杂志^④编辑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43,第 1、3、5—6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黄平。

② 见第 8 号文件。

③ 见第 9 号文件。

④ 《共产国际》杂志于 1919—1943 年用俄、德、英、法和其他文字出版。

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185 号记录 (摘录)

1931 年 10 月 3 日于莫斯科 绝密,特别文件

听取:14(2336)——中国问题(日本资产阶级报纸关于蒋介石和共产党人进行谈判的传言)^①

决定:14. 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说明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蒋介石进行谈判。(电报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密电处第×号^②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43,第 7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报纸没有找到。

② 号码没有标出。文件没有找到。

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186 号记录

(摘录)

1931 年 10 月 7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10. (2364)——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职务分工问题。

决定:10. ——由东方地区书记处三位副主任米夫、马季亚尔和萨发罗夫组成东方地区书记处领导委员会,集体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在日常工作中,米夫同志将负责对东方地区书记处机关日常工作的总的领导,萨发罗夫同志将负责中东和非洲黑人国家的问题,马季亚尔同志将负责近东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问题。^①米夫同志应负责远东的问题。

东方地区书记处的扩大处务委员会只作为咨询机构保留下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144, 第 1—3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下面一句话是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亲笔加上的。

1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187 号记录 (摘录)

1931 年 10 月 13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2. (2381)——一些政党就满洲事变开展的运动。

参加讨论的有:科拉尔斯基、克诺林、格雷、曼努伊尔斯基、明古林、梅林、勃拉特科夫斯基、武约维奇、米夫、皮亚特尼茨基、戈帕涅尔、洛佐夫斯基、库西宁、马季亚尔、皮克、萨发罗夫。

决定:2. ——(1)责成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起草给各党的电报作为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1931 年 9 月 25 日指示信(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182 号记录,特别文件^①)的补充,电报中号召各党立即发表[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和红色工会国际欧洲书记处]的呼吁书^②。没有发表呼吁书的各党必须受到警告。(电文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密电处第 2812 号电)^③。

(2)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为《国际新闻通讯》^④写一篇文章,内容包括对共产党报刊中的错误立场的批评,

① 记录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41,第 2 页)。指示信没有找到。

② 见第 33 页注①。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见第 39 页注②。

以及对运动内容的具体指示。期限三天^①。

(3)提请各党注意,整个运动应与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结合起来。

(4)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下次会议上听取关于运动进度情况的报告^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45,第 1、5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约贝:《中国人民应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反抗,国际无产阶级必须一致行动》,载《国际新闻通讯》,第 2279—2280 页。

② 见第 11、12 号文件。

1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关于满洲问题的非常会议速记记录

1931年10月21日于莫斯科

库西宁同志：

同志们！在我们所有共产党内，对日本进攻满洲问题都很不理解。可能是至今我们对这个问题谈论得太少了，但现在不能再沉默了。我们应当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的党，它们在这个问题上，除一两个党以外，都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我要立刻指出，这两个党就是日本党和中国党。我们知道，中国党是多么弱小，它正处在何等难以置信的压力下，它经受了时刻遭到大搜捕的痛苦。在这决定性的时刻，我们日本党是真正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工作的。而我们中国党试图极尽可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在欧洲国家，从所有文章来看，可以说对这次事变估计不足，我们的党在这个问题上都无所作为。这是为什么呢？是估计不足。或许我们的同志认为，还不是直接关系到保卫中国的事，因此这种事不是那么重要。然而，同志们，如果官方报道说，日本政府的直接军事措施基本上集中在南满，那么大家就会清楚，它的计划不限于南满，而要延伸得更远，在日本的扩张计划中列有过去一直与日本结盟的那些军阀所掌握的地区。另一方面，日本的目标还指向北满。今天报纸上报道了日本人在中东铁路地区完全正式策划的冲突，那里已经

发生了大规模战役^①。计划还延伸到蒙古。这是个长远的计划。日本帝国主义从南满开始,而实际上南满已被占领。但计划还要延伸得远得多。如果说仅仅是南满的问题,那就无法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这次占领。然而日本确实有庞大的计划,日本希望现在就得到中国的一部分。

而我们这方面的反应如何呢?我要在这里提及一下,《国际新闻通讯》^②最初对此是如何反应的呢?它写道:“在金元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中国对日本的行为在最近几个月变得越来越具有挑衅性了”。这就是说中国在反对日本。这是恐吓。下面我逐字逐句地引述:“日本帝国主义从对它占领满洲和对满洲实行政治统治的这些攻击中感觉到了极大的危险性。”^③

座位上有人问:谁写的文章?

[库西宁:]西一郎。他在共产国际内不知名。他还把中国人在朝鲜的计划列入三种攻击之中^④。

《国际新闻通讯》编辑部已经纠正了论点^⑤。但事实终归是事实,《国际新闻通讯》对这次事变的最初反应完全是同日本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说得太多了,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期待共产党人说出更多的东西。党当然没有犯这类严重的错误。但是无论如何,存在着惊人的估计不足。对此我们已经有些习惯了。在事态发展的这种节奏下,完全有可能,当谈到满洲问题时,在巴黎、伦

① 详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莫斯科1968年版第14卷,第664—666、827页。

② 见第39页注②。

③ 西一郎:《日本军队入侵中国。帝国主义的火力点是准备世界大战吗?》,载《国际新闻通讯》,第2029—2030页。

④ 西一郎:《日本军队入侵中国。帝国主义的火力点是准备世界大战吗?》,载《国际新闻通讯》,第2029—2030页。

⑤ 见《编辑部的自我批评》,载《国际新闻通讯》,柏林1931年10月27日,第102期第2280页。

敦、柏林、纽约都把这一切当作是小事。

你们知道，我们共产党有共产国际的指示，任何时候都不停止保卫中国。在共产国际的每次公开会议上，在我们的所有全会上，在我们的所有代表大会上，正如大家知道的，中心点就是保卫中国。保卫中国是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一点曾经特别强调过。所有党都同意这一点。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保卫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呢？如果根据报刊来判断，情况很糟糕。共产国际在这里拟出一个不长的呼吁书^①。很及时，我们一得知这次事变就拟出了。我们力求搞得简短些，以便能在我们的所有报刊上发表。同志们，你们以为我们的报刊登了这个呼吁书了吗？没有，没有这样做。那么哪个报刊这样做了呢？我想如果拿放大镜去寻找，那么在整个共产国际的报刊中只能找到一两家报纸。不过这是唯一的例外。存在一些资本主义大国，但那里没有一家共产主义报纸刊登这个呼吁书。可能我们的同志这样想：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帝国主义者间结成了统一战线，它们未必会让日本进行某种侵略，因为心怀妒意，帝国主义者之间有一种角逐精神，因此这件事不是那么重要。很明显，帝国主义者之间是存在着角逐。我们也远不是要否认帝国主义的矛盾对这件事产生的影响。但这能否多少说明对这个问题的这种估计不足呢？不能！现在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的矛盾在那里是如何形成和如何发展的。一方面很明显，日本在同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政府紧密合作。法国不仅企图关闭印度支那的边境，以防止红色影响的传播，而且还在中国实行自己的反苏政策，此外，还希望在瓜分中国时保证得到自己的份额。这样看来，支持日本政府的入侵和进攻是符合法国的利益的，同样也是符合英国的利益的。英国很早以前就在华南，在广州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英国方面来说，对现在就直接来瓜分

^① 见第 33 页注^①。

中国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对于美帝国主义来说,直接瓜分中国是不利的,因为它在中国活动的时间比较短,它还没有把它想要在瓜分中国时得到的很多地盘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关心的是,要把瓜分中国的时间推迟到它能借助南京政府和其他各种集团扩大和加强自己的势力的时候。帝国主义大国的这种利益上的矛盾是明摆着的,而我们应该揭露这些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党揭露这些矛盾同时又保卫中国呢?可能我们的同志认为,这里还没有爆发战争!当然,如果爆发战争,那么有哪个共产党会不来反对战争威胁,不以战争来反对战争呢?这是我们大家郑重承诺过的。而现在是发生了战争!我承认这场战争似乎有点奇怪,因为它完全是单方面的,因为另一方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或者很少做出反对战争的事情。不过在所有殖民地国家都是这样,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而殖民地人民无力自卫,因为那里当权的是反革命集团。殖民地国家的战争都是这样。但这是否比战争要好些呢?即使用资产阶级的法律语言也可以把屠杀和为了掠夺而进行的屠杀区分开。如果试图界定日本人现在在满洲进行的这场战争与两个帝国主义大国之间通常进行的战争的差别,那么可以说这就是屠杀和从肉体上消灭之间的差别。现在在那里进行的战争更恶劣:轰炸和平居民和大城市,大规模屠杀没有进行任何反抗的居民。难道我们在那里每日每时看到的这种战争方式就不是战争,就不是共产党应该敲响警钟的事件吗?我们在决议中常常强调列宁的一句话:每个革命的工人政党,每个共产主义政党在战争时或者在帝国主义侵略时都应该进行首先反对本国帝国主义的斗争^①。决议中是这样说的,但现在履行得怎样呢?日本党履行了

^① 《共产国际与战争:关于共产国际反对反帝战争和保卫苏联的文献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代表大会和执委会全会决议、提纲和呼吁书(1919—1932)》,莫斯科1933年版。

这一点，而法国党呢？法国政府已经最大程度地参与了这场战争，但法国共产党没有进行反对本国政府的斗争。英国党的情况也是这样。有人说，英国在这件事情上很消极。是的，如果只读伦敦资产阶级报纸的话，是消极。但是在中国，英国资产阶级并不消极。所有代理人^①都狂热地为实现瓜分中国的计划而工作。

而美国，那里的人们在谈论日本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对态度。为了什么呢？难道我们的日本党没有足够理由来揭露所有这些与瓜分中国有关的情况吗？

而德国，难道德国没有插手这件事吗？我们知道，从那里定期把武器和弹药运往远东。德国教官早就在那里进行活动了。难道是为了解放中国人民吗？难道德国党进行了反对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参与和反对这种罪恶游戏的斗争了吗？绝对没有。极少。这里有的是无所作为。

座位上有人喊道：那捷克斯洛伐克呢？它也往那里运了许多武器。

[库西宁：]如果说在共产党的报纸上一般都提到了这件事，对此事不能保持沉默，那么全世界的报纸就都谈到了这件事，共产党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一事件，但是笼统地、抽象地报道的，说什么整个这件事是针对苏联的。我们的党已经学会了这样做，这一点应当承认。但是它们解释的过于抽象，丝毫不想加以具体化。当《人道报》^②或美国的《工人日报》^③不作具体化而是很笼统，甚至很愚蠢地同北满事件作比较（座位上有人喊道：这是去年的事），那么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说那时有人使苏联蒙受了耻辱，而现在日本进攻时，有人则想给以赞扬。这是蠢人愚蠢的比较。例如《人道

① 原文如此。

② 《人道报》从1904年起在巴黎出版。

③ 《工人日报》在1924—1958年间出版，先是在芝加哥，从1927年起在纽约。

报》就是这么干的。难道就不能做得更具体些吗？是现在在那里进攻中国北方铁路^①的中国将领和日本将领把事情的实质具体化了。难道白卫侨民和在日本纠集起来的各种集团在进攻中东铁路时没有具体行动，难道他们不主张占领北满并直接向苏联边境推进吗？日本正在到处利用这些白卫恶狼，只要能够找到它们。毫无疑问，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也是指向北满和苏联的。日本党可以很好地将这个问题具体化。关于日本的这次进攻，在柏林、巴黎和伦敦的白卫[和]孟什维克侨民现在是怎样写的呢？他们写道，这没有任何危险。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难道我们党不应该对此作出反应吗？孟什维克侨民阿布拉莫维奇等人^②写的也是用这种腔调。我们却没有听到我们的党有什么反应。什么是科学的必要性和我们的同志该做的最起码的事情呢？是揭露国联。这事也做了，但做得特别软弱无力。

什么是这里最重要的事情呢？可以说，这是总演习，国联正准备一旦反苏战争爆发就进入自己的角色。不过这里所说的还不仅仅是这一点。这里说的是另一件事，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公然进攻。难道不该利用这个例子来揭露国联所扮演的角色的巨大政治意义吗？恰恰是从未来战争的角度看，揭露国联所扮演的帝国主义角色正是现在最重要的，因为那场战争将在国联的旗帜下反对苏联。但这件事是怎么做的呢？应该说是惊人的无可救药。把日本的人侵同苏联红军对中国和白卫匪帮从满洲领土上进攻苏联国土的行动的反击作比较，这显然是完全荒谬的。在只谈中东铁路上的冲突时，情况也是这样。谁也不会争辩，这是苏联的财产，而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堡垒。如果它在华北也有这样的地位，那么华

① 原文如此。指中东铁路。

② 详见Г. 爱林贝格[爱伦堡]：《日本对满洲的占领与白卫分子的活跃》，载《对满洲的占领与帝国主义者们的争斗》，莫斯科1932年版，第98—111页。

北也是世界革命的堡垒。《人道报》编辑部的共产党员记者怎么会产生这样愚蠢的想法，把它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侵相提并论呢？列宁曾告诉我们，在战争爆发时和战争爆发前，我们应该揭露帝国主义的诡辩，说明战争是如何被掩饰起来，如何被伪装起来的^①，在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揭露国联。我们的同志有多好的机会啊！但是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就像资产阶级报纸一样。诡辩之一是：国联想制止战争，但国联无能为力。我们中有些同志是不是以这种精神写的呢？国联软弱，人们在嘲笑它，它是那么的无能为力，以至它只能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它是太软弱，无法制止战争或这场冲突。是的，对日本是软弱的，但谈到对苏联的战争时，它就不软弱了，表现得很有决心！在这里，国联不得不充当战争的工具，就像在即将爆发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战争时一样，同时，国联也不得不支持日本入侵中国，占领中国的大片国土。这对国联来说是项很复杂的任务；在这里，它要在全世界面前跳好这支很复杂的舞蹈。显然，资产阶级政府在拼命地维护国联的道德威望。而我们却全然未做任何工作来彻底摧毁国联在民众眼中的道德威望。

同志们！我不想来谈问题本身和中国的事态将会怎样发展。可能东方部^②的同志们——萨发罗夫同志，可能还有米夫同志，会在这里向我们谈一些很直观的情况，略有涉及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有时间和有兴趣的话。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一个问题，也就是：在共产国际面临最重要考验的时刻，在谈到保卫中国和进行反战斗争的时候，我们欧洲的党，我们美洲的党表现得多么可怜的无所作为。共产国际对这种情况不能不闻不问，对此必须完全公开地

① 列宁：《关于我们海牙代表团任务问题的意见》，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12—314页。

② 原文如此。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

在公开出版的文章中进行评述,借助内部指示十分严厉地提醒我们的党要负起它们的责任。中国的事态还会发展。如果我们像我们的党那样消极,对这种令人惊讶和闻所未闻的实际情况还再容忍一段时间,那么我们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就表现得同样无所作为了。

萨发罗夫:同志们,我主要谈一谈对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刊物上看到的那些关于日本入侵满洲问题的材料的评价。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期共产党的报纸没出现非同寻常的失误和错误。首先,目前表现出来的对满洲事变估计不足的特点是什么呢,总的说来好像是大家都协商好了,大家都竭力在某种程度上不把这个问题与现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具体的和实际的联系。当整个资产阶级报界、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有社会法西斯首领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在俄国、印度、中国,资本的增长、资本出口保障的恢复、稳定和秩序的恢复,这是摆脱现时世界危机的极其重要的阶段,而我们的报刊几乎或者完全没有提及这些重要情况。资产阶级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代表如此卖力地提出这些问题绝不是偶然的。很清楚,这里在最重要的步骤,即开始试图重新瓜分中国与这些计谋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武装入侵满洲与准备武装干涉苏联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正如库西宁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的,正是俄国的白卫分子,他们在日本司令部庇护下异乎寻常的积极,把满洲事变更具体化了,与准备对苏战争联系起来。

与世界经济危机的现状也有完全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第三个因素是帝国主义矛盾的尖锐化,是由于占领满洲而形成的某种独特的关系。我以最近一号《人道报》为例(念法文句子^①),这竟是共

① M. M.:《日本反对美国参加日内瓦解放组织》,载巴黎1931年10月16日《人道报》。

产党报纸的标题！根本不明白。是日本对美国的行为令人愤慨呢，还是它的行为通常都令人愤慨？就像从共产党人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行为应该是令人愤慨的一样？

在同一篇文章的下一页，你们可以读到以下说法（用法文念）：“对满洲的入侵可能很快就变成对整个苏联的战争，还会变成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战争”^①。这就是库西宁同志所说的话的一个实例。

但是，同志们，无论是国际资产阶级还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无论是国联还是美帝国主义，对满洲事变的主要诡辩是，满洲没有发生任何战争，在中国根本没有发生战争，至于战争危险，那是很大的。加尔维在《前进报》^②上说，战争危险首先来自苏联。日本人闯进满洲，但主要危险是来自苏联。

应当说，我不想说这是估计不足，而法帝国主义在《人道报》上的半昏昏沉沉状态带有异乎寻常的性质。完全可以追溯一下，从日本入侵满洲开始的一些日子里，似乎法帝国主义的作用仅限于白里安参加国联并在那里发表各种各样的讲话。《人道报》上有许多说法，如在马奈宁^③同志的一些特别不能令人满意的文章中说，白里安要去日内瓦，据说白里安是凯洛格公约^④的共同发起人，好像他不害臊，打出手势，作出一副凯洛格公约共同发起人的样子，而在满洲发生这么令人愤慨的事，他却视而不见。为了不致空口无凭，我要指出是哪一号报纸。关于凯洛格公约共同发起人的话是在10月10日的那号报纸^⑤上。10月5日的另一号报纸上说：

① 原文如此。文章中的话是：“对满洲的入侵可能很快会变成对华战争，并转为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战争。”

② 彼得·加尔维：《远东的暴风雨先兆。帝国主义入侵满洲》，载柏林1931年9月22日《前进报》。《前进报》1891年至1933年在柏林出版。

③ 原文如此，应为马尼埃。

④ 见第34页注②。

⑤ M. 马尼埃：《日本派21艘舰船进入中国港口》，巴黎1931年10月10日《人道报》。

“当苏联反击入侵时,人们咒骂它,当日本入侵满洲时,人们则赞扬它。”^①除了又是质量不是很高的纯道义上的对比就无事可做了,似乎法帝国主义根本不存在,然而,存在雄辩的事实。最明显的事实是法国资产阶级报刊在评论满洲事变时的一致、惊人的一致。整个资产阶级报界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什么日本在保护自己最切身的利益。每过两分钟,每过两行字,就重复一遍基本的论点:要知道,在满洲有 25 亿日本金元,日本向中国投入 25 亿日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从《晨报》^②到《日报》^③,从《日报》到《时报》都在谈论这 25 亿,在我们共产党报纸上则只字不提,而从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的观点来看好像是应该提出一些原则性问题的,似乎这 25 亿从资产阶级钱财角度看是十分令人信服的 25 亿,没有什么可说的。

接下来,在下一个阶段,在事态进一步发展情况下,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更尖锐地暴露了出来、更急剧地表面化了,这时,又以同样的形式,又以同样错误的形式,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误。

请看,那里说(用法文念):“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在尖锐化”,接着作为说明这种矛盾尖锐化的事实报导说,林肯·沙耶尔团已被从直布罗陀派往上海^④。去干什么呢?很明显是为了稍稍镇压一下中国人,是为了保卫外国租界。然而,林肯·沙耶尔团的出征却被断定为是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有联系的现象。

首先,人们看到的是基本事实,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事实:有

-
- ① 佩里·加布里埃尔:《苏联反击入侵是可恶的》,载巴黎 1931 年 10 月 5 日《人道报》。
 - ② 《晨报》从 1882 年至 1944 年在巴黎出版。
 - ③ 原文如此。指《评论日报》,该报从 1789 年至 1944 年在巴黎出版。
 - ④ M. 马尼埃:《国际联盟理事会非常会议今日召开》,巴黎 1931 年 10 月 13 日《人道报》。

人在进攻中国，在跟中国打仗，在镇压中国，在中国进行掠夺，但这个事实似乎退到了次要地位。我们的英国报纸，我指的是《工人日报》^①，也犯了一些错误，虽然应该说，《人道报》在这方面是绝对超过了所有报纸的。正是在10月15日的《工人日报》^②上刊登了库西宁同志所说的那种不恰当的对比。的确，把1929年的事变与1931年的事变加以对比，给人留下了奇怪的印象。共产党员记者们的这种表现自然只能说明他们对这件事漫不经心、疏忽大意和毫不在意。

事情大概被描绘成这样：1929年苏联合法地捍卫了自己的利益，据说是与中东铁路有关的利益。给予反击后就撤走了。而日本人闯了进来却不撤。在共产党的报纸上读到这样的东西实在是不可思议。而不可思议的还有：同志们不愿意或不知道必须向英国工人说清楚，苏联1929年给予张学良和白卫匪帮的反击不是因为有多少俄国资本投向中东铁路，而是因为它以最直接的方式，第一，保护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免遭定会通过这道门进行的武装干涉；第二，它在这里挺身而出也是捍卫中国革命的利益。但在这篇文章中则把事情简化为完全不恰当的东西。

美国的《工人日报》要比我们其他的共产党报纸积极得多。但同时我们在那里也看到一系列失误。要它为它说句好话，也是完全正确的：《工人日报》相当早，即在9月24日那号报纸上，就出来揭露美帝国主义就苏联军队在满洲边境上集结的问题，以及散布苏联在远东作战的谣言等问题掀起的挑衅性叫嚣^③，它出来进行这些揭露是正确的。但总的调子、对事变所作的总的评价又是与对

① 《工人日报》从1930年至1966年在伦敦出版。

② 原文如此。应为：10月5日，见《远东战争威胁着苏联》，载伦敦1931年10月5日《工人日报》。

③ 《目的是把中国的战争变成反苏战争》，载纽约1931年9月4日《工人日报》。

实际情况的估计不足有关,实际情况是:有人在进攻中国,在中国已发生了武装入侵,已发生了对中国的军事掠夺,已开始重新瓜分中国。日本实际上已闯入满洲,不仅闯入满洲,而且要修筑从……^①到大连的铁路支线,要用铁路网把满洲联结起来,这样可以借助这条铁路线、这些铁路触角来完全直接地占领满洲,并借助这条铁路来抓住它的衣领将其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的轨道。在这些揭露文章中,首先指出的不是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战争威胁发展到了极点,而是侵华战争的直接开端问题被掩盖起来了,争取中国独立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搁置一边,或者说至少对其估计不足。在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上,重点恰恰要转到美帝国主义与日本的冲突上,由此可能产生很大的世界性麻烦,产生主要的危险。这里所说的又不是按语法上表述的现在时,而是将来时,是说将来要发生的事,而对于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好像很少提及,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估计不足。正是由于这种估计不足,我们看到一些完整文章标题。例如我们在9月22日《工人日报》上看到这类标题:《蒋介石要求美国对日作战》,^②嘿,你们知道,总归需要保持点平衡吧,因为蒋介石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帝国主义的走卒,需要把美帝国主义在华的整个行为、它的基本行为方式同蒋介石政府的破产联系起来。美国打算在满洲问题上、在瓜分中国问题上与日本进行较量谈得很少。情况有些不同。

正是那个美国,几乎为对苏区接连进行的三次讨伐提供了全部装备,正是那个美国直接历史性地造就了,或者客观历史性地造就了那种软弱无力的状态、那种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分割现实,这才使得日本能够轻易地占领满洲。当蒋介石派30万大军来进攻我们的苏区(其军队数量之多至少可以根据我们取得的胜利作

^① 这里漏了一个词,可能是:齐齐哈尔。

^② 《蒋要求美国对日作战》,载纽约1931年9月22日《工人日报》。

出判断)时,出现这种局面绝不是偶然的。据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统计,我们红军缴获的战利品光是步枪就有4万支。这表明,大量的兵力被用来对付苏区。这第三次“围剿”以失败告终。但是要知道,有一个基本事实应该直接告诉工人群众,这就是蒋介石政府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可以向苏区投入30万兵力,而当日本入侵满洲时却不能派去一兵一卒。应该讲这个基本情况,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同时应该十分清楚地说明,为什么美帝国主义直到最近一直在采取这种政策。它支撑着蒋介石这个把中国的民族投资都统一起来的大统一者和集中者;美帝国主义声称,它反对把中国分割成势力范围。这说明什么呢?美帝国主义想自己单独占领整个中国,因为它认为别的国家都是不够成熟的掠夺中国的候选国。这里应该把这一点与以下情况联系起来,比方说,英国资本和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投资要比美国资本的投资多得多(日本投资大约是25亿金卢布,英国投资大约是25亿金卢布,而美国投资根据过低的统计,显然不算军费供应在内,可能约有5亿金卢布),在这种表面看来极不成比例的投资配置中,我们同时可以看到美国向中国市场特别迅速的贸易推进,而英国虽然有其巨大的投资额,但在[19]29年只输入1.6亿,在同一时期美国虽然只有少量投资额却输入3.38亿美元。如果翻开资产阶级的刊物,用它来进行这种揭露,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很容易看到的。

英国共产党人的作用从揭露英帝国主义的角度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英帝国主义直接参与了日本帝国主义所策划的各种政府计谋。实际上,英帝国主义的基本行为方式是,它从香港方面说是与反革命的广州政府有某种联系的,后者同香港和同日本都有相当友好的关系,英帝国主义现在或者至少在这以前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携手行动的,力求恢复胡汉民先前的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恢复比他以前所占据的更高的地位。可以说是要把南京政府胡汉民化。这意味着将使南京政府或多或少屈服于英国和日本的

影响,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个政府从美帝国主义的运转中,从它的势力范围中,从它的轨道中夺取过来。具体地揭露这些情况是完全必要的。现在,由于美帝国主义政策的强化,这种方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破产,但借助于对我们的挑衅和与我们的军事磨擦,它制造了国际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略微巩固的某种假象,所以现在特别重要的是要说明各国帝国主义参与各种阴谋诡计的事实。

关于法国。同志们,我应当说法帝国主义对日本的作用是最明显不过了。在所有这些事件发生前的一个半月里,法国总参谋部机关,即沃伊干^①将军(众所周知,他是对我们进行武装干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的机关在《法国军事》^②上写道:布尔什维克有意鼓吹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以便葬送我们向那里投入的资本,不让我们通过投入新的资本来恢复世界的局势。接着又说:我们法国总参谋部,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记者,而是法国的总参谋部。我们法国人应该永远记住,中东铁路是用法国的钱建造起来的^③。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纲领,不会引起也绝不会造成任何怀疑。需要对此再作一点补充:我们的报纸暴露出我们对中国工农的、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的、反封建的、反国民党的运动严重估计不足。诚然,如果按照老的法国风度用赫尔岑的表达方式来摇唇鼓舌的话,那么它经常提到有苏区,好像它是上帝老爷,一切都看在眼里,但不很快说出来。但同时,也不对苏区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

(贝拉·库恩:是谁的过错?)

[萨发罗夫:]亲爱的贝拉·库恩同志,过错首先是,连您也不那么经常看那些德国报纸上谈中国情况时所写的东西。问题正是

① 原文如此。应为:魏干。

② 原文如此。指《法国军事评论》杂志,该杂志从1925年至1936年在巴黎出版。

③ 详见R. C.《俄国人和日本人在满洲的利益》,载《法国军事评论》杂志,巴黎1931年第123期,第387—421页。

这样，只要翻一翻哪怕十来份《法兰克福报》^①就足以看到苏维埃运动的情况是个什么样子了。问题就在于，给这个苏维埃运动作出评价绝对不是很难的事。许多资产阶级杂志，许多资产阶级报纸，用所有欧洲的文字非常详细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要比我们共产党更细心得多。如果您把德国《东方周刊》^②的报道拿来看一看，您就会说，从中国的冲突角度来看，人们确实在实行反苏政策^③。而正是由于在苏区以外地区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席卷最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反帝运动浪潮，我们的苏维埃运动现在面临着新的任务，所以强调并突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现在为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使之有广泛的可能深入到地主统治不占主导地位的地区，至少可以深入到苏维埃运动首先波及那些省份的这样地区。

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运动应该成为并正在成为新的日益发展的反帝运动、土地运动、全中国民族防御运动的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同志要十分具体地来陈述这些问题，并说明，我们正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吸引全世界所有劳动者的注意，吸引中国劳动者的注意，因为他们面对着蒋介石反革命政府，是中国不被瓜分，不变成再次攻击苏联的一个部分和进攻基地的保证。这是非常重要的。

从另一方面说，现在帝国主义正在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一方面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美国工人、澳大利亚工人的生活水平，使之接近最低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是企图通过进一步削减给殖民地的配额，即殖民地人民的生活配额来使自己复活，在这个时候应当说

① 《法兰克福报》从 1876 年至 1943 年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② 原义如此。指的是《东亚周刊》杂志，该杂志从 1920 年至 1944 年在汉堡出版。

③ 《蒋介石在江西开始对共产党人的迫害》，载汉堡《东亚周刊》1931 年第 15 期，第 389—390 页。

明,这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兰开夏的工人开始直接关心在日本发生的事情,英国的《工人日报》应该说:你们看,兰开夏的纺织工厂主是如何受到日本的纺织工厂主排挤的。在印度尼西亚,在叙利亚,在整个近东,在南非都在发生排挤的过程。这种排挤过程表明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倾向,即把纺织工厂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日本无产者的水平,而日本无产者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公民和臣民目前正处于殖民地被迫者的地位。

但是,同志们(我现在就结束发言),需要说明的,不是帝国主义者都是坏蛋,不是他们总是拿着刀准备刺向苏联,不是他们总是黑的,总是代表反革命和掠夺。为了接近广大非党工人群众、非党劳动者,应该具体地进行研究,而现在是具体地研究一是在准备对苏战争方面的每一个具体步骤、每一个转折,二是在进一步入侵满洲方面的每一个具体步骤、每一个转折,三是从帝国主义矛盾进一步激化的角度来进行这种研究。

我认为,从目前的运动中应该得出的那些教训,将会被我们的党,首先是我们的共产党报刊吸取,今后我们不会再有这种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严重估计不足了。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290,第 10—33 页。

德文打字稿(库西宁的发言)和俄文打字稿(萨发罗夫的发言),未经核对的速记记录。

1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非常会议第 121(A)号记录

(摘录)

1931 年 10 月 21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1. (714)——满洲的局势和一些政党开展的反战运动。

报告人：库西宁和萨发罗夫(见速记记录^①)。

决定：1. ——(1)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根据库西宁和萨发罗夫同志的报告起草几篇指示性文章，应在满洲问题上给党指明方向^②。

(2)责成《共产国际》杂志^③编辑部发表一篇文章，评述某些帝国主义政府在日本——满洲冲突中的立场^④。

(3)批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发给[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关于日本占领满洲问题的指示信^⑤。

(4)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必要时

① 见第 11 号文件。

② 例如：《不能容忍的动摇和软弱》，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 1931 年第 28 期，第 12—16 页。

③ 见第 40 页注^④。

④ 《武装入侵满洲与准备大规模的反苏战争》，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 1931 年第 33—34 期，第 3—9 页。

⑤ 文件没有找到。

给一些党发去有关该问题的进一步指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3, 卷宗 290, 第 1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1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191(B)号会议记录 (摘录)

1931 年 10 月 27 日于莫斯科

机密

听取:12. (2454)——关于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①问题(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密电处第 2483 号电报^②])。

决定: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向各党发去关于开展支持代表大会活动的材料^③,并采取措施让各党向代表大会发去贺电。^④地区书记处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名义拟订指示信和贺电,并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①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在瑞金(江西省)附近的叶坪村举行。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见附录。

④ 下面一条建议是皮亚特尼茨基亲笔加上的。

⑤ 文件没有找到。

[附录]

致德共中央

11月初,中国将召开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必须以党和群众革命组织的名义在报刊上发表贺信,强调:(1)中国红军的英雄主义精神;(2)苏维埃运动的成就;(3)只有苏维埃才能使群众摆脱极大的苦难和实现国家的统一;(4)苏区实行的根本革命任务是: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中国军阀制度,推翻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独立,等等,要与日本对满洲的强盗般占领联系起来。要保证支持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尤其要特别注意反对蒋介石部队里的德国法西斯军事顾问,反对为军阀们运送武器,反对为南京人提供借款和贷款,反对国联^①。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48,第 3 页背面—5 页,第 44 页。

记录为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附录为 JI. A. 米夫的手稿。

^① 内容相似的电报(除用黑体字标出的那段话以外)还发给了英共和美共中央。在给法共中央的电报中,除删去用黑体字标出的那段话以外,还加上了以下一段话:反对法国军队再次进犯龙州苏区(广西省,印度支那边境),要强调中国革命与印度支那革命的联系;反对法国政府支持日本对满洲的占领(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48,第 44 页)。

1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192(B)号记录 (摘录)

1931 年 11 月 3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25. (2482)——中共临时中央局组成人员。

决定:25. ——(1)批准中共关于临时中央局组成人员的提议^①。

(2)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任命毛泽东同志为苏区[中央局]的书记(电文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密电处电报)。

听取:26. (2483)——值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给中共政治局的指示^②。

决定:通过。(〔文本〕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密电处电报)^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149, 第 6—8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 63 页注①。

③ 文件没有找到。

1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193(A)号记录 (摘录)

1931年11月13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8. (2501)——米夫同志建议批准王明同志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

决定:8. ①——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通过飞行表决暂时任命王明同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这个问题的最终决定必须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库西宁

① 以下删去:“通过”。

[附录]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
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便函

致政治委员会

请批准王明同志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

[1931年]11月10日

米 夫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150, 第 1、3—4、264 页。

记录为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附录为手稿。

1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扩大会议速记记录

(摘录)

1931年11月15日于莫斯科

秘密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 扩大会议速记记录^①

米夫同志主持。

米夫：同志们，我宣布东方书记处扩大会议开幕。会议日程是王明同志作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

王明：同志们，在作报告以前，首先我要作几点说明。第一，关于我的报告的性质和产生经过。

我的报告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向上级机关即共产国际的报告。因此，我认为在这里谈论问题的一般情况，例如分析经济危机等是多余的。我要尽可能作有关具体事件的报告，[援引]具体的事实和数字，给你们提供一幅反映中国整个现时政治生活的完整情况。但同时，我认为也不可能完全绕过对某些问题的理论分析，因为不作相应的理论分析就不可能提供完整的情况，也就不可能了解中共对某些问题和事件的态度以及他所提出的任务。这是第一。

^① 文件上有批注：“在中国科学研究所”。

第二,关于我的报告所涵盖的时期,这大致是从5月到10月底,因为在5月以前,无论政治形势还是党内状况都已经清楚,因为这里已有从中国回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①,根据他的报告,共产国际主席团曾作出了相应的决议^②。

第三,是关于语言。我用俄语作报告,但是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有讲俄语了,因此我俄语讲得不好,一旦我的表述不正确,我请在座的同志们,特别是懂中文的俄国同志们和懂俄文的中国同志们,帮助我纠正不正确的表述,等等。

我的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第二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党内状况,第三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战斗任务。我先讲第一部分,即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

最近,中央就中国红军取得的胜利和中央苏区成立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的问题通过一个决议^③,对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作了如下估计:中央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发生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其中主要的是:第一,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第二,因为闹水灾^④,千百万挨饿的劳动者起来进行斗争;第三,由于日本占领满洲,中国劳动者掀起了群众性的反帝运动。

最主要的是第一点,即红军取得的胜利和中央苏维埃政府的

① 米夫。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31年7月31日关于中共任务的决议(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莫斯科1986年俄文版,第236—257页。在这份和以前用俄文发表的文件中错误地标明日期是1931年8月26日)。

③ 指王明起草的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共任务的决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1991年版,第401—415页)。

④ 详见甘伯格B.:《中国的水灾》,载《中国问题》,莫斯科1932年第8—9期,第84—102页。

成立。正是这第一点决定着目前中国的整个政治生活[……]①

我简要地谈谈最后部分,即关于党的任务。我讲得很简短,因为在主席团决议中所指出的所有主要任务现在依然有效。我只谈一些最主要的任务,以便向共产国际说明,党目前提出了哪些主要任务。中央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把一切革命运动联合在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的旗帜下。在组织同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争取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方面承担起责任、主动性和组织者②。为了完成这些主要任务必须在红军、游击队、饥民和革命的反帝运动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以便在为建立苏维埃中国而斗争的统一旗帜下和在以其先锋队中共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统一领导下把他们动员起来。只有遵循这个方针,党和工人阶级才能战胜任何反革命。目前,党向苏区提出一项任务,要他们竭尽全力争取在一省或数省内首先取得胜利,先是在江西。党已经向苏区提出任务,要在那里立即成立苏维埃政府③。党责成各苏区采取一切措施反攻蒋介石,击溃他的部队,首先在自己的县里扩大自己的苏维埃根据地,建立新的苏区,建立新的红军,首先在苏区周围动员成千上万工农开展游击战,以便扩大我们的苏维埃运动。此外,党还向苏区提出一个问题——加强和扩大红军,采取有力措施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红军的组成人员。那里也应该立即配备新的红军干部,新的政治委员干部。此外,还应立即着手在那里训练我们

① 鉴于文件篇幅较长,发表时删去了以下内容:关于中国政治形势和中共党内状况的主要部分。这些问题在王明的文章《中国的反帝运动》(见《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1年第36期,第26—37页)和他的1931年12月8日在红色工会国际第八次中央理事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国的革命危机与革命职工运动的任务》(见《红色工会国际》杂志莫斯科1932年第1—2期,第67—71页)中都已阐述过。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

的红军,在军事方面训练城市作战行动。他们不是永远在农村作战。应该说,我们的红军应该学习巷战。应该学习与国民党部队进行广泛的大规模的战斗,并准备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进行决战。我们现在应该首先配备军事专家,以便在这方面切实做好准备。此外,中央再次号召所有苏区坚决而切实地执行苏区的一切纲领和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法令^①,切实加以贯彻,以便在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中把更多新的中国劳动者阶层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周围。此外,党还指出有必要在苏区加强同反革命政党和组织的斗争,[号召]改进自己的措施以便彻底战胜各种反革命分子和改善群众组织。首先应该在江西、湖南、福建、安徽、张西^②等省以及在还没有我们根据地的地方组织新的红军、新的苏区和新的游击队。那里客观条件较好,而我们有能力在这些地区组建新的军事力量、新的政权。应该特别注意饥民的斗争。要加剧这种斗争,争取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使他们在争取建立苏维埃、争取组建红军的斗争中跟随我们。要提出扩大和加深反帝斗争以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要把反帝斗争(抵制运动、学潮等)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还要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要竭尽全力组织群众性的经济罢工及反帝反国民党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使工人阶级在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解放斗争中起到全体人民的领袖和领导者的作用。要竭尽全力去吸引和动员国统区的广大农民群众加入反帝浪潮和反国民党的斗争^③。要竭尽全力在国民党部队和军阀部队中进行工作,分化瓦解它们,使它们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国民党^④的革命斗

①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772—808页。

② 原文如此,可能是广西。

③ 原文如此。

④ 原文如此。

争。此外,党还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要极其认真地注意提拔和培养干部。党应该从工人阶级中提拔新干部,吸收在最近的罢工、示威游行、国内战争中表现出色的优秀无产阶级分子入党,以便扩大和改善党的社会构成,增加和优化我们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而首先是工会组织的干部。此外,党特别提出要加强我们在北方和满洲的工作的任务,以期加强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支持苏联和中国苏区。这就是中央向党提出的所有最主要的任务。中央正动员一切力量将这些决定贯彻到基层,以使所有这些任务能及时和圆满地完成。中央认为,切实完成这些任务的重要前提条件是:第一,从组织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第二,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无情的斗争,既反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这个主要危险,又毫不削弱地反对“左派”和同他们搞调和主义的以及耍两面派手腕的行为。以中央为首的我们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近来已取得一些巨大的胜利。我们坚信,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我们必将在全中国取得胜利。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656, 第 72—73、16、164 页。

打字稿, 经过校对的速记记录, 副本。

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常设反战委员会^① 关于满洲问题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1931年11月15日于莫斯科

秘密

关于满洲问题的指示

1. [共产国际]各支部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不仅向协会^②的会员群众,而且向广大的士兵、水兵、军工企业中的年轻工人、新入伍者群众和全体劳动青年群众,说明在中国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义。应该指出:(1)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满洲的目的是掠夺和极度剥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2)应负战争责任的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通过帝国主义强盗的联盟即国际联盟准备重新瓜分中国并同意发动这场战争的英、法、美帝国主义;(3)满洲的战争有可能引起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革命和中国苏维埃进行新的武装干涉;(4)被掠夺领域的扩大有可能引起对苏联的直接军事进攻,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正企图通过军事挑衅的手法把在中国的战争变为同苏联的战争;(5)在中国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引起了世界各国,甚至与对中国的殖民政策直接有关的国家疯狂地展开反苏运动和加紧备战工作;(6)占领满洲的行动带来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加

① 发件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指德国共产党的军事化组织“红色前线战士协会”以及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

剧,孕育着一场从中国开始,可能迅速超出中国范围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7)对帝国主义战争负有责任的是社会法西斯组织的首领们,他们积极参加了进行和准备战争的帝国主义者联盟,因为他们向群众说国际联盟是和平的堡垒,麻痹群众对掠夺者的警惕,从而支持了使中国劳动者遭受日本血腥占领的反革命的国民党,因为他们开展反对苏联和革命运动,即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统一力量的运动,并且他们积极地使青年工人军事化,让他们准备投入战争;(8)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广大群众带来极大的贫困和苦难,带来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加强,带来实行恐怖和同革命运动作斗争的加强。

2. 与满洲相关的反战运动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并要超出宣传本身的范围。协会应该组织一些会议、士兵和水兵的集会、士兵和新入伍者及士兵和工人的联合行动,应该号召士兵们起来反对武装的本国帝国主义,反对与苏联作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从殖民地召回部队和舰队。要把反对在中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进行军事挑衅的运动与争取士兵和水兵日常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

在通过的决议中,士兵和水兵们应该表示,他们反对同苏联和同苏维埃中国作战,他们不会让别人利用自己来为帝国主义的掠夺目的服务,一旦他们参战,他们就转到苏联和中国苏维埃方面,他们将同“本国”帝国主义强迫他们去与之作战的人一起联欢。

3. 军官们和资产阶级报纸为了在士兵中制造反苏情绪散布关于苏联的挑衅性谣言。例如,在占领满洲时日本是和苏联一起行动的,或者相反,说在被打死和俘虏的中国军人当中有红军战士。应该通过反战报纸,特别是团级的刊物来揭露所有这些挑拨离间行为,向士兵们指出,帝国主义者试图通过说明苏维埃要同日本人一起瓜分中国的谣言来制造反苏情绪,而通过另一种谣言来促使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应该指出苏联的和平政策,指出苏

联在裁军会议上提出的而被帝国主义者否决的全面而有效的裁军方案^①。要用通俗的语言大力宣传苏联、五年计划、红军、中国革命和苏维埃。

4. 在号召水兵和士兵作战斗准备或者发生某种具有军事性质的变动时,应该不仅当即通过士兵报纸在士兵中间加以揭露,而且要向工人们转告这一情况。在兵营中和在军舰上,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开展反对作战指令的运动和组织对这种指令的抵制,组织集体拒绝执行。在着手组织集体拒绝执行指令时,应该让兵营外面的青年参加声援斗争。

5. 当军舰准备向中国航行^②时,应该立即组织拒航,使水兵支部积极行动起来,并且在鼓动中要利用像英国水兵暴动和土伦水兵斗争^③这样的水兵斗争范例。要把这种斗争同反对解雇参与暴动的英国水兵的声援和抗议斗争结合起来。要通过港口工人的大规模声援活动来激励水兵的革命情绪。

要在水兵家属中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一旦出航,在告别时要组织大规模的反战集会,吸收家属成员参加积极要求集体拒航的行动。

6. 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掀起士兵和水兵为争取他们的日常利益而进行的群众性发动浪潮。这种斗争可以瓦解军队,涣散纪律,而主要的它是培养士兵和水兵进行斗争的学校。从这种斗争出发,协会应该通过争取好的食品、反对军官的粗暴态度和严格纪律的斗争,提高斗争的水平,直到使士兵和水兵转到殖民地革命工人和农民、红军、人民解放运动方面来。

① 详见《国际政策和国际法文件汇编》第1册:K. B. 安东诺夫主编:《裁军》,莫斯科1932年俄文版,第134—135页。

② 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各处都应:游弋。

③ 关于英国水兵暴动和土伦水兵斗争的材料没有找到。

7. 要在入伍者中间开展广泛的反战运动,在群众大会和集会上通过决议,反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新的军事挑衅,保卫苏联和中国苏维埃,在日本的各使馆旁边,在外交部旁边,在兵营旁边组织示威游行。组织入伍者的会议,通过给相应团水兵的公开信,说明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意义、与苏联作战的威胁、武装入侵的威胁,号召对士兵和新兵进行声援斗争。要在宣传鼓动中指出,当成千上万新兵由于失业和低廉的劳动报酬而忍饥挨饿时,千百万人却在为掠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为与苏联和中国作战和准备新的战争而付出代价。要把反战活动与争取满足新兵日常要求的斗争结合起来。

8. 要特别注意运输业和兵工厂青年的反战活动。加强我们在年轻铁路员工、港口工人和商船水手中间的工作。要向这些青年指出他们在战时,在运送部队和各种装备时应起的作用,而帝国主义者正是通过这种办法使他们积极参与战争的。为了准备使这些青年去完成未来的革命任务,应该立即在他们中间开展反对与中国和苏联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抗议运动,一旦在目前的战争中利用他们时,要把这种抗议运动与组织怠工和罢工结合起来。要把反战运动与通过一些国家,如德国、波兰即将举行的罢工而进行的反击准备结合起来,与降低工资的威胁、反对合理化,而特别是在波兰与反对铁路员工的军事化结合起来。在德国,应该把水兵中的反战运动与海员罢工,与反对降低工资和抗议对参加罢工的水兵进行解雇、监禁和罚款的活动结合起来。在兵工厂,应该在最近的活动中争取从组织上加强青年的群众性反战发动和对团级部队的指导工作。

在组织示威游行和群众性发动的总的反战行动中,应该广泛利用从苏联广祝十月革命十四周年归来的代表团的报告活动,开展广泛拥护苏联和红军的运动,利用代表团的社会主义参加者来与社会法西斯青年组织的首领们进行坚决斗争。

对日本和中国有单独的指示^①。

全宗 495, 目录 25, 卷宗 1395, 第 188—192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文件没有找到。

18

米夫给斯大林的信^①

1931年11月20日于莫斯科

绝密

斯大林同志：

在我们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问题的以往指示中，我们曾建议中国红军在开始时期不要占领大城市^②。当时我们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我们还势单力薄时，与敌人进行规模巨大的战斗是不合适的，过早与它进行决战也是不合适的。

况且，我们以往的指示是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纯盲动主义的路线^③有联系的，如根本不考虑帝国主义势力都集中在中国的主要中心城市。所以在（[19]30年8月26日）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④中，我们写道：“李立三同志完全不顾事实：在苏区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政府，还没有真正的红军……^⑤然而帝国主义者目前光在汉口就有相当于10个师的兵力，不比在上海少。在这种情况下

① 文件上有米夫的批注：一份已送斯大林同志。

② 例如，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29页；《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卷：《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2册，第997、1018—1019、1103—1104页。

③ 关于所谓的李立三路线，详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三卷：《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第3卷，第2册。

④ 1930年8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电报草案，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第2册，第1018—1020页。

⑤ 此处和以下各处的删节号是文件原有的。

下,没有实际可能去占领大城市。现在号召工人(像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在汉口、上海、北京、奉天等地举行武装起义是极其有害的冒险主义……显然,现在强行占领国内防卫坚固的中心城市是力不胜任的。”

当然,即使现在也谈不上占领汉口、上海、北京、奉天等城市。但那时,除了这些防卫坚固的中心城市以外,我们在指示中还笼统地指出,从进攻大城市开始是不合适的,而最好是进行准备和加强自己的力量,加快组建红军,不立即投入与敌人主力的斗争。

在这方面,现在形势有所不同。早在去年冬天,敌人掌握了与我们决战的主动权。中国红军击退了敌人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进攻^①。因此,关于一些中心城市的问题已经有所不同了。最近几次军事行动的有利结局^②给红军提供了扩大苏区,展开攻势,不停留于占领相应中心城市的可能性,而依我看还有必要性。业已改变和正在改变的一般政治条件和军事战备条件迫使我们去这样做。

(1)击退敌人精心准备的第三次进攻(这意味着粉碎了南京对中国苏区所能投入的主要力量)后,我们不能就此停留,而应该从防御转入进攻,乘胜追击,以便巩固我们的胜利,这就要求占领一些中心城市(现在可能谈得上的是吉安、南昌,而将来则是汉口和长沙)。

(2)把零散的苏区联结起来,把分散作战的红军军团集结起来,以及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广泛开展它的活动,也要求我们占领中心城市。

(3)苏区的内部状况,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困难、日益增长的“剪刀差”(农产品价格和城市产品价格的差别),越来越突出,有必

①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围剿”。

② 指红军1931年9月在反击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中取得的胜利。

要把苏维埃运动扩大到中心城市去。

(4)红军现在占领一两个中心城市,将会促进全中国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的进一步高涨。这将大大加强苏维埃的阵地,提高与背叛民族和使民族蒙受耻辱的国民党政府相对抗的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威望。并且在目前条件下,反帝斗争和各地群众性反帝运动的高涨将会比过去在更大程度上使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活动变得更加困难。无论如何,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公开武装侵略行动现在必然比过去更加引起大规模的反帝革命。

(5)国民党现时的垮台、内外政策的彻底破产、最近的失败和军阀部队的重新调整,在红军大大发展的情况下(光是在毛泽东的第1和第3军、贺龙的第2军和红军第4军中^①现在就超过了12万人),为夺取并保住中心城市开辟了良好的前景(无论如何可以保住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认为夺取中心城市是合适的行动。

然而有些中国同志在反对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盲动主义的斗争中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过去的指示变成死板的公式。在这方面,有理由十分担心中央苏区江西的领导人现在把过去不夺取大城市的指示变成教条。

由于我们不能从这里具体地解决关于中心城市的问题,同时鉴于现在有必要提醒中国党不要机械地执行我们过去的指示,我请求,您如果同意我在这封信中所述的意见,那就把这个问题提交政治局。

从我这方面说,我建议通过以下决议:

“(1)中国共产党人不应把过去关于中国红军不宜过早夺取大城市的方针看作是教条。这个问题应该根据一般政治形势和具体

^① 原文如此。应为:毛泽东的第一方面军、贺龙的第三军团和红军第四军团。1931年11月7日第四军团编入红军第四方面军。

的军事战略形势来加以解决，中国共产党应仔细考虑形势的一切变化。

(2)同时，国民党对苏区第三次进攻的被粉碎，把一些苏区和红军部队连结起来的必要性，为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设立行政中心的必要性，以及苏维埃运动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目前已把夺取中心城市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只要有可能保住它们，至少能保住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夺取中心城市就是适宜的。最后一点要求首先夺取那些帝国主义势力最不集中和它的直接武装干预最困难的中心城市。”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米夫)

全总 495，目录 19，卷宗 244，第 13—16 页。

打字稿，副本。

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203(B)号记录 (摘录)

1931年12月21日于莫斯科

机密

听取:8.(2648)——[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就日本占领满洲给中国共产党的电报草案。

决定:8.——(1)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吸收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和库西宁同志参加,参考交换的意见,修改电报草案。

(2)事先确认,电报必须包含这样一点:中国苏维埃政府有必要向中国劳动群众发表一个宣言,号召武装保卫中国和推翻国民党。

在党的宣传鼓动中应强调中国工农和日本工农的团结一致^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58,第 7、8、10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 22 号文件。

2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204(Б)号决议 (摘录)

1931 年 12 月 27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25.(2699)——米夫同志关于解除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请求^①。

决定:由于这项请求与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有紧密联系,该问题推迟到政治方面问题解决之后再议。

听取:26.(2700)——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派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去中国的请求^②。

决定:26.——责成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和米夫同志物色一位外国同志去中国^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159, 第 6、8 号。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文件没有找到。这个行动是由共产国际领导就 П. А. 米夫对 Л. И. 马季亚尔、Г. И. 萨发罗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其他一些工作人员提出的各种政治指责作出的反应引起的。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见第 39 号文件。

2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三人小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 30 号记录^① (摘录)

1931 年 12 月 28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出席：米夫、马季亚尔、萨发罗夫同志。

3. 听取：来自上海关于农民问题(关于平分土地问题)的询问^②。

决定：将答复稿^③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商议。

三人小组主席 米夫

秘书 洛吉诺娃

① 文件上有批注：已送库西宁同志、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见附录。

[附录]

给中国复信的草稿^①

难道你们还没有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八月决议^②吗?根据这个决议,所有地主土地应立即无偿没收,并根据平均原则在苏维埃领导下在贫农和中农、雇农、苦力和红军战士中间进行分配。富农的土地也应进行分配,只给他留下劳动的份地,只要他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没收的范围不应扩大到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的自有土地。在平分土地的问题上,共产党人可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向农民解释它对农民的好处,但共产党人不应过分强调这一问题,除非农民群众自己主动提出来。苏维埃必须^③……自己的土地。同时,每个村的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还应根据贫民、贫苦农民和中农的利益具体选择^④……土地的原则。

因此,很明显,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不应过分强调实行平分土地的任务,简单地把它作为不顾当地具体条件而采用的总的口号。

记录——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39,第 241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附录——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52,第 37—38 页。

马季亚尔的手稿。

① 信的最后稿没有找到。

② 见第 69 页注②。

③ 文件上以下为空白。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应为:“苏维埃只应在基本农民群众和雇农的直接积极支持下并在拥有自己土地的贫农和中农的同意下实行这一措施。”(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252 页。)

④ 文件上以下为空白。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应为“在当时条件下最有利的分配土地的原则”。(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252 页。)

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关于反帝斗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1年12月29日^①于莫斯科

共产国际关于反帝斗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

要利用法国入侵云南省^②以彻底瓜分中国的时机,揭起群众性反帝斗争的新阶段。我们还没有收到你们关于开展反帝民族斗争的详细报告。[这一斗争的]主要口号应该是武装民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及中国的统一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号召推翻背叛民族和使民族蒙受耻辱的国民党政府。民众推翻国民党的革命行动是反帝民族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要说明,只有苏维埃中国和中国红军才能保证各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及中国的统一。苏维埃中国和中国红军乃是能够消灭帝国主义奴役、封建劳役和军阀压迫的力量。苏维埃政府应该号召全国民众起来武装保卫中国。要把罢工运动开展起来,通过你们的[工人]纠察队掌握抵制日货运动。要宣布红军征召新兵,夺取反动派的武器,开展游击战。要领导学生

① 中共中央收到电报的日期。

② 关于法国军队入侵云南的材料没有找到。在苏联报刊上曾刊登过关于法国武装部队参与镇压龙州地区(广西省)苏维埃运动的文章。(见《法国帝国主义者在帮助中国军阀》,载1931年12月6日《真理报》;《法国武装入侵华南》,载1931年12月20日《真理报》)。

运动,借助于学生在国统区的农民群众中进行鼓动宣传。要千方百计利用合法的机会进行书面和口头的宣传鼓动。要成立群众性的反帝组织,组建你们自己的武装自卫队,必要时它们还可以以军事教学组织的形式进行活动。要积极开展军阀部队中的工作,号召士兵和民众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革命战争,要尽量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特别是和日本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教学参考资料》,北京1986年版第2卷,第496—499页。

23

王明给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 书记处和东方殖民地部的信

1932年1月8日于莫斯科^①

致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书记处和东方殖民地部

尊敬的同志们：

在我从上海动身来莫斯科时，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②委托我一项任务，要我以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的名义提出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劳工救济会等组织帮助为中国罢工运动募集基金的问题。因为你们都知道，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没有任何资金来为罢工运动建立基金，而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没有一定的基金，就很难把群众性罢工运动长期坚持下去，特别是在轻工业的男女工人中间，而后者恰恰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近来，上海和其他城市组织反帝罢工时资金上的困难明显地反映出来了。

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打算建立为数100万中国元的基金(合25万美元)。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认为，通过开展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在中国苏区和非苏区可以募集到大约50万中国元，而其余部分可由红色工会国际通过广泛的援助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群众性运动来募集。

① 中共中央收到电报的日期。

② 原文如此。应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请你们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讨论这个问题,并积极加以解决。此致

敬礼

王 明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13, 第 1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24

莱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 关于在华工作的报告

1932年1月14日于莫斯科

关于在华工作的报告^①

我于[1931年]8月2日抵达上海后,在军事侦察机构人员佐尔格和波兰人约翰^②的帮助下与奥斯藤^③建立了联系。我在这里得知,施密特已不在上海,他回哈尔滨去了。由于那里出现的情况,我从阿布拉莫夫同志那里得到的关于我的工作的指示,部分已失效了。军事侦察机构的人,考虑到自己工作的特殊性,不愿再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我想等几周再进行联系,以便了解一些情况,然后再建立联系。我跟奥斯藤同志只联系过唯一的一次,这也不利于我后来的工作,因为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和组织上的细节我根本不了解。9月初,施密特同志回到上海,他在10月10日离开以前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了联系。由于种种原因,施密特未能再留在上海。牛兰夫妇^④被捕后,有一天他在上海也受到了怀疑。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但他没有工作;在“豪华”旅馆有两个

① 文件上有批注:已阅。雷利斯基和阿布拉莫夫。1932年1月21日。

② M. 3安德烈耶夫。

③ И. А. 雷利斯基。

④ Я. Э. 鲁德尼克和 И. Н. 莫伊谢延科—韦利卡娅夫妇。

匈牙利职员明显对他的工作性质感兴趣。此外,我们没有钱,因此两个人一起在那里无法再住下去。并且他在哈尔滨的企业^①也没有钱了,每隔一天都从那里寄信到上海来。10月初,我承担了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工作。我与伊思美洛夫、沃罗夫斯基^②和朝鲜人基米^③会过面。我们的会面地点是在路得大街的一个朝鲜人家里,并且每周三次我们晚上同这个朝鲜人在街上碰头交换电报。

由于经费困难,[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严重瘫痪,至少我是从同志们的谈话中了解到这一点的。伊思美洛夫对我说,9月底或10月初,党从苏区收到1万或1.3万墨西哥元。我建议同志们要严加节约,以便渡过困难时期,但是我得出的印象是,同志们大手大脚花惯了钱,似乎他们根本不知道没有钱。伊思美洛夫甚至认为,我应该从上海的苏联贸易组织那里得到钱。为了维持生计,我从军事侦察机构人员那里借了1500金[元],从格尔曼^④那里借了1000金[元]。如果说我当时写了两封粗鲁的信^⑤,那是因为我的所有问询电报都没有得到答复。我很了解家里的困难状况,任何时候都准备忍受困难,但我要求至少给我一个答复,使我了解这样的状况可能持续多久,以便能作出相应的限制和在机关里重作安排,避免发生出乎意料的暴露。

我提出的关于出版朝鲜报纸^⑥问题、关于一个日本人^⑦去日本建立新的联系问题、关于印度尼西亚人阿利明和一些印度人^⑧的

① 可能是“施密特公司”。

② 分别为:张闻天和黄平。

③ 原文如此。可能是:И. 基姆。

④ Г. 吉布列尔。

⑤ 文件没有找到。

⑥ 193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作出了在上海出版朝鲜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决定。

⑦ 何人不详。

⑧ 何人不详。

起程问题,也都没有得到答复。我不愿独自一人承担日本人行程的责任,因为我无法获得确切情报,说明这个日本人究竟是何许人,他在多大程度上能与日本共产党建立联系。我担心,他的冒失行为会给我们的日本党带来损害,何况在上海的日本警察工作得很出色。9月份,在上海有两名日本人被逮捕。其中一人是为军事侦察机构的人工作的,另一人是某个工会的工作人员。他们俩在开往上海的轮船上会面,过了几天就被捕了。当中日冲突^①激化时,我认为出版朝鲜报纸是绝对必要的,我甚至从军事侦察机构人员那里借了钱。但当我同一位朝鲜人讨论这个问题时,才弄清楚,他与朝鲜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他无法把报纸运到那里去,尽管以前他一直提出办报的问题。由此看来,暂时只好放弃出版朝鲜报纸的事。当时我给基米50金[元],让他交给一位朝鲜同志^②,好像这位同志在牛兰夫妇被捕前每月都领到这笔钱,我给他钱是为了让他重新开始工作和建立联系。

与福摩萨(台湾)的联系是由一位住在厦门的中国同志^③进行的,他现在也回上海了,因为他在那里已无法再进行工作。我们每月也付给他50墨西哥元,我已把他交给(中国共产)党调遣。与菲律宾、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建立新的联系的任何地址。

11月初,我通过上海的“时代”书店订了三份《国际新闻通讯》^④[简报]、三份《共产国际》^⑤[杂志]和三份《红色工会国际》^⑥[杂志],其中两份是英文的,一份是德文的。出版社的一位德国女

① 指1931年9月日本入侵满洲。

② 何人不详。

③ 何人不详。

④ 见第39页注②。

⑤ 见第40页注④。

⑥ 该杂志1921年至1936年用俄文和其他文字出版。

士魏特曼麦尔为书店订了这些出版物，然后由纳乌曼医生取走或者由那位女士亲自送到固定的地址，再从那里由一个朝鲜人取走并转交给党。我们在12月份收到了头几期。我订了三个月，我认为，共产国际可以委托柏林的出版社^①定期将这些出版物寄给“时代”书店，因为我离开后未必还会续订，但书店的那位女士会给党的同志们提供材料的。牛兰夫妇被捕后，共产党再也没有收到任何材料。党根本不知道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决定和决议等，这给中央同志们的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当然也不应犯错误，过多地寄给书店材料，因为警察会立即进行干预的。

由于中日发生冲突，形势变得对我们党更有利了，因为以示威游行、罢工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群众性运动，使我们的同志有可能进行公开的行动。在1931年9月26日进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有8万人参加）过程中，在我看来，我们党已无法应付。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投掷石块，喊声震天，压倒了国民党的演讲人，但我们党却未能向群众发表讲话。没有采取任何组织措施，党完全措手不及，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散发传单。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说，我们的演讲人有很好的机会融合在群众之中，不怕被逮捕，向工人阶级发表演讲。当一位共产党人^②试图登上讲台讲话时，他自然立即被国民党的爪牙们逮捕了。我们的同志试图组织自己的示威游行也未能成功。我在与伊思美洛夫例行会面时谈起这件事，但他用缺乏有才干的人来解释这一点。在这期间，我们的一位印刷工及其妻子^③被逮捕了，另一位从第二地下印刷厂来的印刷工也于同一天失踪了，党内却谁也不知道印刷厂在哪里，因为只有印刷工人知道印刷厂的所在地。过了八天，印刷工人的妻子被释放了，又

① 指卡尔·霍伊姆出版社。

② 何人不详。

③ 何人不详。

过了几天,那位失踪的印刷工人也重新露面了,这样印刷厂的工作可以重新恢复了。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状况,至少中央应该任命一个人,知道印刷厂的所在地,同时对印刷厂进行监督。

尽管有声势浩大的反日抗议运动和学生的示威游行等,但是我们党,即使在11月和12月,当某些日本棉纺厂解雇工人和关闭工厂时,也未能使这些工厂的工人参加到罢工运动中来。[1931年]11月7日由我们党在法租界组织的示威游行搞得不错,开始时只有500人参加,而过了20分钟,有2000人参加。游行者公开打着红旗和标语牌。帝国主义雇佣军和警察已有几天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在随后的一些日子里,学生运动越来越高涨。中国志愿军^①每天都公开露面,在广场上进行军事操练,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情绪日益高涨。在所有学生集会上,叫喊声淹没了国民党演讲人的声音,他们的决议都遭拒绝,而共产党人的决议都被通过。但党与学生和工人的组织联系还是不够的。学生们提出的要求和报刊上发表的共产党的要求以及党的号召都很有意义,但都没包含有关工农的迫切要求、能够把他们吸引到斗争中来的任何具体东西,原因是学生运动脱离了广大工人阶级群众。在大学和工厂里没有组织得很好的支部,没有中央工作人员和普通党员之间的组织联系,因此领导运动的是个别的共产党员,他们独自提出依我看来在政治上不尽正确也不很明确的要求。他们采取了片面的反日立场,对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作用揭露不够,号召蒋介石和广州人联合起来,而没有揭露他们的叛徒和帝国主义走狗的面目,没有要求立即停止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并把部队从苏区撤出,何况在南京的国民党代表大会^②上,对苏区的斗争问题作为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中国志愿军的目的和任务只字不提,尽管政府曾打算

① 指抗日义勇军。

② 指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把它编入某些独立兵团来同苏区作斗争。依我看来,关于与苏俄结盟的问题注意得太少,只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完全不提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尤其不提广州人在与南京的谈判中要求释放邓演达等人的问题。也不提工农的迫切要求。

我跟伊思美洛夫和沃罗夫斯基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并请他们在中央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立场,加快发表宣言,明确提出要求,以使工人们积极地站到学生方面来。[1931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周年日),我们党举行了示威游行。租界的部队和[国际]志愿军团从11月起就处于戒备状态。这一天,在所有市区的战备要地上都布满了大炮、机关枪和坦克,设置了带刺的铁丝网围栏,尽管这样,在日本工厂前还是举行了有1万人参加的很好的示威游行。参加者公开举着红旗和标语牌,有些工厂大门被人群破坏,我们的演讲人在那里发表演讲。警察和志愿军团(由俄国人组成)驱散了示威游行。这一次,工人和学生的联系比较紧密。提出了“总罢工”的口号,但没有举行。只有几个工厂罢了两三天工。日本人以解雇来威胁所有工人,工会和国民党拒绝给予经费支援,这样这次局部罢工就停止了。罢工组织者遭到了逮捕。

稍后,学潮开始具有更广泛的规模,这时党和学生之间的联系也大大改善了,一批批的学生参加了在工厂里和在驻扎在上海和吴淞的19路军士兵当中的宣传工作。后来南京也接连发生了学生的示威游行,简直使那里的一切在几天里都瘫痪了。据宋庆龄和其他与军事侦察机构人员有接触的中国人说,政府成员和国民党党员都躲起来了,甚至军队也让学生们自由进入所有政府和党的大厦,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我们党把这场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在需要的时候提出“释放政治犯”的口号,那么完全有可能成功地解救出关在南京郊区军事监狱里的政治犯。宋夫人从南京回来了,她去探视了监狱里的牛兰夫妇,并向他们转交了防寒物品。此外,她还到了蒋介石那里,与他商谈释放牛兰夫妇的事,因

为蒋曾答应过她在他可能引退时要做这件事。当然,他现在拒绝这样做,他对她说,他要把这两个人移交民事法庭,他没有别的办法。就在这一天,他下令枪毙邓演达,而广州人曾要求释放他。晚上,宋[庆龄]夫人与佐尔格进行了一次谈话,并要求派100名优秀共产党员去南京,在那里她想为他们弄来一些武器,并用政府汽车把牛兰[夫妇]从监狱里营救出来。计划可能是不错的,但我无法判断,她本人有多大勇气和毅力来实现这个计划,因为我不认识宋夫人,也不知道,她对南京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自然,这件事不可能很快组织实施,因为我怎么也未与共产党联系上。晚上十时半,我去朝鲜人的家里,但已经不能进[屋]里去了,这样我只好等待下一次会面,而当时南京的学生运动达到了顶点。稍晚些时候有一天,示威游行被部队围住,被强行拖上车运走了。第二天^①,蒋介石解除了自己的职权。依我看,宋[庆龄]夫人的计划是在对邓演达被枪杀事件极其气愤和愤怒的情况下产生的,因为她与邓演达关系十分密切,但没有认真地实施这个计划。宋[庆龄]夫人发表一份声明^②就病倒了。格尔曼离开后,夫人与费舍尔建立了联系。佐尔格带一包邮件去了哈尔滨,而夫人因病未能接见费舍尔。后来,夫人和费舍尔之间在对牛兰[夫妇]案件的下一步行动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她给他写了两封信^③,但他没有回信。费舍尔给纳乌曼医生打电话,想跟人聊一聊,这以后我就到费舍尔那里去了。夫人已跟南京民事法庭的最高法官^④谈妥,让费舍尔去南京找他,但费舍尔要等将牛兰[夫妇]移交民事法庭的正

① 1931年12月15日。

② 指宋庆龄1931年12月19日的声明,见《宋庆龄谈目前政治形势》,载《中国评论》,上海1931年第4卷第52期,第1259页;《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载《双周报刊通讯》1932年第27期,第4—5页。

③ 信没有找到。

④ 原文如此。指最高法院院长,何人不知。

式证书。此外,他想先再与汪精卫取得联系。

我们党的工会工作进行得很糟糕。在国民党工会里的活动根本谈不上。还担任一些领导职务的两名共产党员在12月被逮捕了^①。12月25日,军事侦察机构的人从美国领事馆得到消息(援引了美国领事^②与救济水灾难民委员会贝克之间的电话交谈),说12月23日举行过一次秘密会议,有23名或30名工会工作人员参加,被警察破获。参加会议的人被灌了开水,被捕后立即供出了一些中国人,第二天这些人就被枪毙了。最近几个月来,罢工和自发停工的现象频繁发生,但我们党却很少参加这种经济斗争。伊思美洛夫对我说,党内缺乏对工会工作稍有了解的干部,他们好像已经请求从莫斯科派一些工会工作者来。

沃罗夫斯基回来后,委托他改组联络机关,我在这方面帮过他忙。当时有两部无线电台工作,还有一个培养无线电报务员的学校。一部电台是跟中央苏区联系,另一部跟家里^③联系。两部电台功率是250瓦,天线架在屋顶上。无线电报务员学校还有11名学员。一名无线电工程师^④和另外几个人跟所有三个地方保持着联络。

其次,从1931年初起,上海有一位从西安来的同志^⑤,他本来要去莫斯科,但他好像或者是没有得到莫斯科的许可,或者是由于牛兰[夫妇]被捕,询问信没有寄到莫斯科。他给中央发去两封信^⑥,但谁也不知道如何把信送到那里去的。经过调查发现,他与

① 何人不详。

② A. 坎宁格。

③ 根据意思是指莫斯科。

④ 何人不详。

⑤ 何人不详。

⑥ 信没有找到。

一位无线电报务员^①有联系,而且也了解无线电台。警察局也在搜寻我们的无线电台,因此必须紧急更换地方。在法租界,警察发现了两部电台,所幸不是我们的,一部是属于冯玉祥的,另一部属于谁,我还没有打听到。在搬迁时,由于缺乏资金,找新的地方出现了很大的困难。此外,在法租界很难找到新的房子,而到英租界,中国同志不愿意去。更换人员时也出现了困难。一位无线电工程师反对搬到新的地方去,也不愿意去苏区。这位工程师必须立即撵走,因为顾[顺章]和他很熟悉。我建议撤销无线电报务员学校。因为有6名学员已经结业,3名学员还要学校两个月,2名学员刚刚开始学习。在我看来,上海的形势太不利,不能把学校再留在那里。中国同志也是这个意见,他们认为,在苏区开办一个这样的学校更好。此外,还建议更换两部电台的常备人员——报务员和译电员等,使他们相互不知道彼此的地点。另外,还应拆除天线,把功率降到50瓦。这是必要的,首先是可以降低灯管的费用(250瓦的灯管要花750墨西哥元),其次是出于保密考虑,要使无线电台更机动和更不显眼,因为这种无线电台的信号跟业余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信号没有很大差别。11月,沃罗夫斯基告诉我,搬迁工作已按上述精神进行了。

为了与苏区进行联络,使用了比较容易译出的密码,这种密码在中国电报局密码本上和政府电台密码本上都有,不能保证安全。因此在11月和12月,发往中央苏区和从中央苏区发来的关于军事问题和重要政治问题的所有电报都已停止。共产党得到情报说,所有电报都被国民党破译了。10月,向中央[苏]区派去一名信使^②带去沃罗夫斯基根据其莫斯科密码编制的新密码。12月得到确认,这位信使已到达目的地。由于最近14天,我未能见到沃

① 何人不详。

② 何人不详。

罗夫斯基,尽管多次要求,他都没有露面,我终归不知道这名信使是否正确地记住了密码,是否用新的密码继续工作了。沃[罗夫斯基]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漫不经心,对此伊思美洛夫也很不满意,因为他们有时好几天都找不到沃[罗夫斯基]。在我与沃[罗夫斯基]交换电报的过程中,他的不按时出现带来了很大危害。经常是电报好几天都放在朝鲜人那里,当我去例行会面时,发现他还没有把电报拿走。这样我就多次不得不再去找军事侦察机构的人。

只是与中央[苏]区保持着无线电联系,但迫切需要与其他地区建立联系。波兰的约翰同志和我为了与其他地区建立联系,给沃罗夫斯基编制了两套密码。向东北地区(鄂豫皖)派出了一个人^①,带着无线电装置,但他到汉口就被捕了。这个地区的一套老无线电装置在洪灾期间毁坏了。我们党在上海的仓库里有6台或8台无线电发射机和13台接收机,需要把它们送到一些地区去,但运输很困难。至于更可靠的密码,我认为,一些应由共产国际编制,因为沃罗夫斯基没有任何经验,此外,在中国土地上这种事情特别难办。

各地区提出很多军事性质的询问。例如,同志们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击退来自空中的袭击,如何改装机关枪,用它们作高射机枪,又如何选择阵地,使飞机处于交叉火力之下。这些问题我与军事侦察机构的人都讨论过,他们同德国军事顾问们^②有很密切的接触,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必要的情报,而后我把情报转告给中国同志了。军事侦察机构的人还表示愿意把德国军事顾问给政府军编写的军事指南手册转给苏区,当然条件是一定要送到[我们的]地区,否则他们就会使自己的情报来源受到威胁。我只担心,现在我离开以后,这件事不会进行到底,而共产国际的任务也应该是在

① 何人不详。

② 何人不详。

这方面帮助中国同志。

军事侦察机构的人从南京得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报,说在那里的兵工厂正在生产步枪子弹,里面只装很少一点必要的火药,这样子弹就失去射程和穿透能力,在战斗中就没有什么价值。进攻苏区的部队带着这些弹药,要把它们作为战利品留给红军。这个情报有多大可靠程度我不知道,我认为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允许自己如此浪费,而考虑到巨大的运输困难,军队也未必会拖上这种无用的物资。我把这个情报告诉了共产党,以便随后转告各[苏]区,使我们的红军知道这件事。

我的密码电报^①有很多错误,因为莫斯科方面多次要求重发。好像电报被严重扭曲了,这自然使工作变得很复杂了。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会出许多错误:这是报务员的过错还是另外什么人,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我一直是很仔细地拟订电报稿的。起先我做不到所要求的重发,因为没有建议我要保存原稿,但后来我自己设了一个秘密文档。

在哈尔滨,我跟施密特也讨论过密码,也就是电报联络。施密特同志拟电报稿一直很马虎,因此在书报检查机关检查时立即产生了怀疑。我深信,如果更仔细地起草,如果地址和发报人别写错,这样的电报是可以通过任何检查机关检查的。但是,莫斯科也犯这样的错误,例如,施密特向上海发的电报^②。我要发的信往往带有篇幅很长的附件,我根本没有足够的德国收信人地址,何况他们都在汉堡。每隔四五天通过上海邮局寄出的都是同一些收信人地址。很有必要使在华的工作有更多的联络地址,首先是各个城市里的地址。在德国则需要有柏林和汉堡以外的收信人地址。

使我很受影响的是,我在上海找不到[合成]墨水用的化学制

① 电报没有找到。

② 电报没有找到。

剂,因为有时候需要报告在[信里]很难叙述而用电报又太长的东西。我买的所有化学制剂都不管用,尽管名称都对。此外,在海关的药亭或药店里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几乎所有买化学药品的人都是俄国人,他们往往会问你,买这些化学制剂干什么用。

用双层底或双层盖的箱子夹发邮件,即使将来我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和非常危险的。我认为,必须保留照相邮件,但要组织好这种邮递,必须更多地利用哈尔滨。施密特同志对我说,他在哈尔滨有一些人可以很安全地去上海。只是要向同志们指出,是显影后寄出这些东西还是最好不显影寄出。至今,在这个问题上还不明确。

我也与伊思美洛夫讨论过送新学生去莫斯科的问题。12月,给苏区发了指示,让派这些学生到上海来。的确,哈尔滨出现一些困难,因为那里没有招生点。我离开的时候,曾打算与施密特同志协调这个问题,但未能做到,因为他处在警察的监视下。此外,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学生们是否得到了去哈尔滨或海参崴的路费和杂费。这一点必须立即通知上海的同志们。

原先的格勃乌^①在上海还存在,是由原顾[顺章]时期的人员组成的。许多认识顾的人已被捕,因此这个组织已完全丧失能力,而且对[共产]党本身构成了巨大威胁。那里有三个担任不同任务的小组^②。我劝告同志们要尽快撤销这个组织,成立新的情报机构。

至于与杀害顾[顺章]家属有关的事,那是在汉口被捕并被押到上海来的一个人的背叛行为^③。伊思美洛夫对我说,这个人参

① 指中共中央特科。

② 这里说的是:情报搜集组、反奸组和特别联络组。

③ 何人不知。据另外的材料说,杀害顾顺章家属的细节是1931年8月在上海被捕的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王世德、张崧生和蔡飞报告的。见郭华伦:《中共史论》,台北1968年版第2卷,第314页。

与了这件事,是唯一没有去苏区的人。就此问题,我劝告同志们,共产党要采取明确的立场,因为中国和英国的报纸都利用这件事来对党进行恶毒的中伤,把牛兰说成是这件事的主谋^①。中国同志的意见不一致。伊思美洛夫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这里没有什么超乎寻常的,实际上根本不值得去谈论它。但是共产党散发了传单,还登在英文报纸上,依我看来,传单上说得很不令人满意^②。

上海的同志们早就注意到间谍施特劳斯,并感到奇怪的是,鉴于吉巴尔蒂和施特劳斯有联系,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更认真地加以研究。现已确认,这个施特劳斯是为各领事馆和警察局提供情报的间谍。我认为,最好把这个情况更详细地告诉同志们。

在目前形势下,很难对我们今后的在华工作提出什么建议。我与其他同志就此事讨论了很长时间,但谁也提不出具体建议。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目前经济危机的条件下,以贸易为基础不可能做任何事,不管有多好相应的代表处。在四个办事处制定的贸易业务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对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工作来说,现在那里的形势是最不利的。如果在哈尔滨能找到带白护照的某个俄国或犹太同志,那么可能他能在俄国人住宅区开一个小铺。医师或牙医我看也是不错的。再次到那里去的同志务必尽快离开饭店和公寓,租一室或两室的住所,这在法租界的新建住宅区大量存在。在这里他们几乎可以不受监视,上午雇用两三个小时的服务员,其余时间就可以单独行动。当相应的同志有稳定的经济地位时,在社会上和俱乐部里有熟人是很好的,否则他就会很快惹人注意。还有一个先决条件是这位同志必须有真的护照,经得

① 详见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1020, 第 1—14 页; 又见《对共产党人的血腥报复(租界警察局披露的罪行)》, 载《上海曙光》, 上海 1931 年 11 月 24 日。

② 显然中共中央有信给上海《字林西报》, 发表在 1931 年 12 月 1 日。见《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 载《双周报刊通讯》1932 年第 27 期, 第 72 页。

起检查。我的护照用于旅行和其他事都很好,因为它是柏林警察局发给我的,但是在上海查询时可能会很快确认,季奥尼茨^①一家从来没有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住过。

汉学家、科学家、报刊记者等也都过时了。我想提醒注意一件事。《柏林日报》^②和《汉堡旅游报》^③经常刊登广告,聘请人员去印度和中国从事各种工作。或许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位,使我们的一位同志找到一个避难所。例如,1931年春曾通过《汉堡旅游报》聘请了两位舵手在印度的汽艇上工作。印度的这样职位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当时我还跟华莱士吵了一场,因为他没有立即派我们的一些同志到那里去。必须有一位同志每天都注意报纸上的广告。我知道,在我们的工作中不能坐等这样的机会,不过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机会出现了,而我们没注意放过了。对于美国人和英国人来说,在华的工作条件,如果没有生计,也不是很好的,不过这些国家的人还是有更多的机会找到生计的,他们要么以3000到5000墨西哥元在百老汇^④的某个卡巴莱餐馆或水兵酒吧当股东,要么在别的什么地方干事。我不能在每个单独的情况下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所有同志都有很多计划和计谋,但在最近检查时,发现有用的东西不多。

马利^⑤

全宗495,目录19,卷宗118,第9—24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K.莱谢。

② 原文如此。应为:《柏林每日商报》,1872年至1939年出版。

③ 1829年至1941年和1954年出版。

④ 原文如此。

⑤ K.莱谢。

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三人小组会议第6号记录^① (摘录)

1932年1月28日于莫斯科

秘密

出席：米夫、马季亚尔、萨发罗夫同志。

10. 听取：中国共产党纲领大纲草案^②(报告人：王明)。

决定：1. 批准所提出的大纲草案^③。

2. 责成王明同志起草纲领草案，并由他酌定吸收一些中国同志参加。

3. 确定这项工作的期限为一个月^④。

主席 帕维尔·米夫

秘书 洛吉诺娃

① 文件副本已送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О. В. 库西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执行局。

② 关于由王明起草党纲大纲草案的决定是在1931年10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见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438, 第433页)。

③ 见附录。

④ 中共党纲草案曾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1932年11月9日会议上审议过并退回加工(见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466, 第100页)。1934年7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委托 И. А. 米夫起草新的中共党纲草案(见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531, 第73—74页)。关于以后起草中共党纲草案工作的资料没有找到。

[附录]

中国共产党纲领大纲^①

导言：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1. 帝国主义时代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 (1)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
- (2)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
- (3)苏联。两个世界。
- (4)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总的斗争中的地位。

2.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 (1)外国资本的渗入及其后果。
- (2)封建主义残余。
- (3)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残余的联系。
- (4)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中国。
- (5)劳动者的社会结构和地位。
- (6)劳动群众的斗争(1911年至[19]19年—1925年至[19]27年)。

3. 中国革命的实质和任务

- (1)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
- (2)革命的动力。
- (3)革命的任务和纲领。
- (4)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前提条件。

4.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

- (1)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萨发罗夫同志。

- (2)广州时期^①的策略。
 - (3)武汉时期^②的策略。
 - (4)第三(苏维埃)时期(广州起义)^③的策略。
 - (5)革命(1925年至[19]27年)失败的原因。
 - (6)八月会议^④、[中共]中央十一月全会^⑤和[中共]中央第六次代表大会^⑥。
 - (7)1930年至[19]31年的革命危机与党。
5. 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 (1)反帝革命和农民土地革命。
 - (2)动力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 (3)中共的作用。
 - (4)苏维埃和红军。
 - (5)苏联是中国革命转变的因素。
 - (6)非资本主义道路及其纲领。
 6. 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的最终目的——共产主义
 7. 对资产阶级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派别的批判
 8. 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及其前景
 - (1)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 (2)中国革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

① 指省港罢工和广州国民政府成立(1925年6—7月)起至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政变止的时期。

② 指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发动政变起至中共与武汉国民党分裂止的时期。

③ 指1927年12月13日广州武装起义。

④ 指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⑤ 指1927年11月7日至14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⑥ 指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州那罗福明斯克区五一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记录：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66，第 7 页及其背面。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附录：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55，第 298 页。

打字稿，副本。

2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2年1月31日于莫斯科

政治委员会致中共中央

我们相信,你们会参与对日本进攻上海的反击^①,但不知道你们的参与采取什么形式。我们觉得,应作为绝对独立的力量出现。成立工人学生队伍,务必以工人为核心,以共产党为领导。要吸收一批不顾军官命令同日本人进行斗争的志愿兵。要利用机会把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最大限度地武装起来。参与反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进攻]时,党应该揭露国民党分子、中国政府和所有帝国主义者。这里我们看不出,为了更好地组织对日本人的反击号召上海工人实行总罢工是否合适,当然罢工会给反击武装入侵者造成困难的那些生产部门要除外。全面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党应该继续进行经济抵制。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22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国民党 19 路军和居民在上海和吴淞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抵抗(1937 年 1 月底 2 月初)。

2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220(B)号记录

1932 年 2 月 5 日于莫斯科

机密

听取:15. (2855). ——关于中国局势。参加讨论者: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马季亚尔、米夫、洛佐夫斯基、库西宁、贝拉·库恩、马祖特、克诺林、弗赖耶尔。

决定:15. ——责成米夫和马季亚尔同志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立即拟订关于目前中共策略的补充指示,并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批准。(电文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密电处)^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① 见第 29 号文件。

[附录]

马季亚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便函

绝密

致政治委员会：

请将中共针对上海事变^①的下一步策略问题以及中国红军下一步战略问题提交讨论。

东方书记处

[又及]建议的文本^②未来得及与三人小组成员协商,不过他们原则上是同意的。

[1931年]2月4日 马季亚尔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169, 第 37、39、228 页。

记录为德文打字稿, 亲笔签字; 附录为马季亚尔手稿。

① 见第 108 页注①。

② 文件没有找到。

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① 反战委员会给各国共产党的电报

不早于 1932 年 2 月 5 日于莫斯科^②

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哈尔滨[1932 年 2 月 5 日]以后,在扩大自己的挑衅行为,目的是要入侵满洲的西北部,他们在加强自己在华北和长江流域一带的武装力量,以便进一步攻击上海的中国部队。

要竭尽全力加强对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动员工作。组织由著名作家和学者签名的呼吁书。召开群众大会要求停止对中国的掠夺战争,口号是:“不许干涉中国!”“日本军队从满洲和中国其他地方滚出去!”“驱逐和抵制日本的外交代表!”

要利用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一切愤怒情绪,掀起对日本的敌对情绪,并组织反对其外交代表的群众性示威游行。要加强反对运输武器和弹药的运动。要采取有力的组织措施来准备由码头工人和水兵切实制止运输武器和弹药的行动。要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作集中在几个最重要的地区,并在认真做好准备后要全力支持反对运输武器和弹药的群众性运动。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日期是根据内容标出的。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652, 第 39 页。

英文打字稿, 副本。

2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不晚于 1932 年 2 月 12 日^②于莫斯科

估计到士兵群众不再服从投降的军官及一切民族情绪之高涨,必须用一切力量打入军队,在那里发展最大的工作,特别应该在集中的与日本帝国主义争斗的军队中去争取士兵群众,[将他]引导士兵与群众联合一致反对日本的侵略。必须在群众面前加紧揭破为中国民族的耻辱的南京广东政府的投降破产,与全国在我们已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革命军事委员会是革命争斗与政权的机关,它依据在工人兵士学生城市贫民群众的争斗之上。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应该成为上层的组织,保证在它里面工人骨干之决定的作用及在党的领导之下。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领导保卫中国反抗侵略者发展在民众与士兵之中广大的鼓动,刊物,宣言。在可能的地方,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用一切力量来最高限度武装工人,组织义勇军在我们的领导之下,与派坚强的工人的队伍到军队去争取军队。如果总罢工能够用来反对侵略者,那就可以组织总罢工包括在租界上的工厂在内。在农

① 此文件俄文稿译自 1932 年的中文译稿,这里发表的即是原中文译稿——译者。

② 日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文件的时间。见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郑州 1994 年版,第 360 页。

村中间——特别在战事的区域之中发展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创造农民义勇军。在鼓动中广大地宣传苏区与红军。在各大工业城市中创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他取得对士兵与工人群众真实的影响之后，采取组织全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来保卫中国的路线。全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起来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北京1991年版，第608页。

3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 书记处关于新疆工作的建议

1932年2月14日于莫斯科

秘密

关于新疆工作的建议

最近的哈密起义^①以及在土地危机加深和民族与封建农奴压迫加强的基础上农民革命情绪的高涨,提供了开展革命工作和建立革命组织的条件。鉴于中国的形势,即帝国主义者占领着中国土地和存在着帝国主义入侵大片苏区的危险,这个问题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甘肃和新疆的革命起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立了深远的后方,提供了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广阔的回旋余地。

首先,必须组织人民革命党,把各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东干族和汉族)的贫苦农民、雇农、城市劳动者和革命知识分子中的一切积极的革命民主力量联合起来。

为此要成立由7人组成的组织委员会^②……并经过短期的培训和指导工作后派往国内,务必做到:使乌鲁木齐有领导中心,保证首先在哈密和喀什有相当独立的领导组织。

党从一开始就应该有自己明确的革命行动纲领(特别是在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上)。

目前新疆有各种各样的革命组织,对这些组织需要认真加以

① 见第1号文件。

② 此处和以下各处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研究。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在克服自己的错误后才能并入人民革命党。

而对于其余资产阶级和土地占有者……各阶层的组织,则只能在反对民族改良主义、宗教复仇主义和沙文主义派别以及反对与国民党政权、封建高利贷和买办上层搞妥协的各种企图的不断斗争中建立暂时的联盟。

主要工作应按城市劳动者和贫雇农阶层的路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信^①的精神进行。在具备相应条件的地方,必须成立农民委员会和城市贫民委员会(例如,为了同高利贷剥削者作斗争、反对提高房租等),并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这一思想。这些委员会将是教育和团结革命积极分子的最初学校。

在当地无产阶级中做工作的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伊宁皮革厂、乌鲁木齐商人查内舍夫洗毛厂、阿尔泰格梅尔金农庄^②等成功举行的罢工表明,存在这方面的可能性。因此,应该在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企业、矿场、农庄等)成立地下工会支部、互助基金会,并把零散的手工业企业工人、建筑工人、杂工和失业者等联合到工会组织中来。

如有可能,还应提出在军队中的工作问题,成立革命士兵支部,为争取满足士兵的局部要求(改善居住条件、食品和服装,提高军饷,反对粗暴待遇、棍打,反对为了军官的利益在耕地、牧场剥削劳动等)而斗争。

特别希望新疆人民革命党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并使它接受中央的领导。为此,最好向乌鲁木齐派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和向

① 可能是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 1931 年 4 月 23 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信。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文件集第 3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 2 册,第 1408—1413 页;或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文版第 10 卷,第 251 页。

② 关于这些罢工举行时间的材料没有找到。

中共中央派驻人民革命党的代表。

年底前,要保证供应新疆人民革命党相应文字的篇幅达到 5 个印张的宣传品。

要特别注意建立联系(最好通过蒙古)。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05,第 2—3 页。

打字稿,原件。

31

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 执行局共产党党团局委员会会议记录 (摘录)

1932年2月14日于莫斯科

绝密

2. 关于[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驻上海中心的工作人员问题。

派加里同志^①赴上海担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的领导人。

洛佐夫斯基

全宗 534, 目录 3, 卷宗 736, 第 56、58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J. 克拉克。

3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223(B)号记录 (摘录)

1932 年 2 月 15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37. (2918).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资助《中国工人通讯》^①的征询。

决定:37.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改善《[中国]工人通讯》的开支费用并同意拨款。皮亚特尼茨基、库恩、米夫和王明同志务须在一天内决定《中国工人通讯》的工作方针问题,并确定具体拨款数额及其来源。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① 《中国工人通讯》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通讯,自 1931 年起在柏林出版,何时停刊不详。1931 年 11 月 5 日该刊编辑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写信,请求每月拨款 630 德国马克(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71 第 102—103 页;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58,第 37 页)。1931 年 12 月 31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三人小组审议了《中国工人通讯》编辑部的请求后,决定将问题提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请求给予拨款(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71,第 101 页;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39,第 245 页)。

[附录]

《中国工人通讯》问题委员会会议记录

1932年2月17日于莫斯科

秘密

出席：皮亚特尼茨基、米夫、王明、库恩。

听取：1. ——关于《中国工人通讯》的问题。

决定：1. ——(1)《中国工人通讯》必须改组。在关于中共工作、中国工农运动、苏维埃中国和红军的报道中，《通讯》应特别注意发表关于日本在满洲和长江流域一带活动的材料，注意在报刊上阐明日本人的野蛮暴行，等等。

《通讯》应更经常地出版^①(每日或隔日)，并尽可能地发行附刊，报道上海民众反日同盟^②的消息。

(2)为了组织出版工作，从中共的经费中拨出总额为2400金卢布的款项，为期6个月，按月支付。《[中国工人]通讯》编辑部应以征订费来抵补其余开支。

委员会主席 贝拉·库恩

全宗495，目录4，卷宗171，第12—13、99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1931年时，《通讯》每周出一期。

② 原文如此。指的是上海各界反日救国会，参加的有60多个团体和组织。于1931年12月7日成立，1932年2月1日被政府当局查禁，至1932年5月底在秘密状态下工作(详见《“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1986年版，第32—42、457—473页)。

3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黄平的电报

1932年2月20日于莫斯科

上海 致沃罗夫斯基^①

现答复您的第32号电^②。您说得对,全国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推翻南京政府。为了吸引更广泛的群众,暂时不要宣布它是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一部分。请将上海和苏区的工作情况报来。南昌是否真的已被红军占领?

全宗495,目录19,卷宗217a,第35页。

打字稿,副本。

① 黄平。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32年2月19日收到的电报。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495,目录19,卷宗217a,第33页)。

3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224(A)号决议

(摘录)

1932年2月21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31. (2950).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的领导问题。

决定:31.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处务委员会应由米夫、萨发罗夫同志和处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弗赖耶尔组成。批准弗赖耶尔同志在马季亚尔同志不在时为正式委员。库西宁同志应像以前一样对东方地区书记处的工作实行总的领导。

讨论印度问题时应吸收威廉姆斯^①和马祖特同志参加,而讨论中国问题时应吸收王明、格哈德^②和雷利斯基同志参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172, 第 1、5—6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Б. Д. 米哈伊洛夫。

② Г. 埃斯勒。

3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黄平的电报^①

1932年2月27日于莫斯科

密电

上海

同意号召工人^②夺取在上海中国管界内业已关闭的日本企业。这个动员群众的口号应与成立武装工人队伍和有组织地参加反日活动的号召联系起来。将[反日]同盟^③。变为工人委员会为时过早。最好在保证工人领导的条件下召开广泛的民众代表会议。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217a, 第 46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文件是在 1932 年 2 月 27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见全宗 495, 卷宗 173, 第 11—12 页)并作为对共产国际执委会 1932 年 2 月 26 日收到的黄平电报的答复。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217a, 第 45 页)。

② 黄平在电报中谈到, 这个号召是中共提出的。

③ 见第 120 页注②。

3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2年2月29日^②于莫斯科

共产党从满洲事变一开始之后,就应该号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并且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来进行这一战争^③。现在还是要如此号召,并且尽量想法武装民众,动员劳苦群众去抵抗日本。党不但不拥护而且却正相反,最无情的揭破国民党与广东南京政府,以及一切卖国的军官。这些东西解除工人、革命学生反日的义勇军,压迫反日运动,给日本帝国主义当清道夫。

提出反对蔡廷锴与这些“抗日军官”^④的个人的口号,现在是不适当的。但必须利用蔡廷锴与这些军官的一切反对民众的具体行动,与他们出卖的企图,去争取群众。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英勇的19路军士兵万岁!”

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必须着重说明国民党不去动员军队去同日本战争,却派遣军队去进攻已经脱离帝国主义羁绊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利用红军的名义告诉民众,尤其是19路军的士兵,假

① 此文件俄文稿译自1932年的中文译稿,这里发表的即是原中文译稿——译者。

② 中共中央收到电报的日期。

③ 见《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25—430页。

④ 可能是指陈济棠、张发奎、李宗仁、冯玉祥、陈铭枢,见《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1932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11页。

使没有国民党的军队进攻着苏区,红军早已同 19 路军的士兵在一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上海的进攻,并在满洲与日军进行战争了。特别要着重指出,红军将最坚决的反对日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一直到中国的完全解放。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北京 1991 年版,第 609 页。

37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①

1932年2月29日于莫斯科

秘密

王明：同志们，我只想谈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上海的战争^②，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日战争和中国的苏维埃运动。

第一个问题，即关于上海的战争，首先我们应该来分析一下，谁组织了上海的战争？谁在上海跟日本人作战？有些人^③认为，国民党在美国资本家的支持下现在在上海作战，因此上海战争无非是美国资本家和日本占领者之间的战争。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首先来看一看国民党。国民党从满洲事变开始到上海事变一直没有提出同日本作战的口号。国民党各派，从蒋介石到汪精卫都异口同声地声称，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同日本作战，因为中国太弱，中国应该服从国联的决定。就在最近，蒋介石等人还在说，他们不同意在上海同日本作战的19路军的行动。蒋介石说，这场战争只会葬送中国，这场战争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这是冒险。但是根据这一点，许多人得出结论说，蒋介石不同日本作战，而其他派别，如胡汉民、汪精卫等所谓的国民党广州派首领则主张

① 片山潜和野坂参三在会上作了关于中日冲突的报告，贝拉·库恩作了开展反战运动的报告。参加讨论的有：Л. З. 曼努伊尔斯基、А. 斯拉文斯基、П. И. 霍米亚吉、С. А. 洛佐夫斯基、М. 施瓦博娃、王明、О. В. 库西宁和吉佐。

② 见第108页注①。

③ 何人不知。

对日作战。这是不对的。现在胡汉民也好，汪精卫也好，都公开声称，他们反对同日本作战。当然，他们有时在群众的压力下口头上也说，他们主张对日作战。例如，孙科、叶夫根尼·陈^①不久前在口头上表示，他们主张对日作战，而蒋介石反对这场战争。因此，他们不得不辞去南京政府的职务。

同志们，我们不能相信这些空话。不久前，孙科和叶夫根尼·陈都发表谈话，说他们永远不会同意同日本作战，而叶夫根尼·陈在满洲事变前曾同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中日合作”的谈判^②。因此，在满洲事变时，中国人民立刻怒火中烧，直接责备国民党，尤其是叶夫根尼·陈和广州派，说他们是民族利益的出卖者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盟友。而这一情况给孙科、叶夫根尼·陈等人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造成了麻烦，民众奋起反对以孙科、叶夫根尼·陈等人为首的所谓国民党联合政府，就像以前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一样。因此，他们不可能在南京政府中站稳脚跟，不能不面对战斗的民众而辞职^③。但他们在辞职后企图用“左的”蛊惑之辞积累一些政治资本，使自己以后的反革命政治生涯免于灭亡。这是第一点。

第二，现在 19 路军在同日本作战。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他们赞成同日本作战，以便消除在自己部队中，特别是在 19 路军中的幻想，使他们不起来反对广州派的首领们。但归根到底，是谁在上海组织对日作战的呢？有些人认为，19 路军的将领们是作战的组织者。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举个例子，19 路军的军长^④蔡廷锴将军不久前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请看，中国的

① 陈友仁。

② 《叶夫根尼·陈谈日本之行》(1931年12月17日出版)，见《中国评论》上海1931年第4卷第52期，第1259页。

③ 原文如此。

④ 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各处应为：副总指挥。

《大公报》^①是怎样写他参战的：“同日本交战开始时，南京、上海的资产阶级、中国的银行家很担心，上海的战争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派代表去见 19 路军军长，并请他合作，让他把部队从上海撤走，从而停止在上海的战争。19 路军军长蔡廷锴同意这一请求，但士兵们继续同日本作战，而他也只好参战。”^②这说明，国民党首领们，国民党各派都是一致反对同日本作战的。但上海的战争毕竟在进行，那么谁是它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呢？是 19 路军的士兵、工人、贫民和革命学生。

上海的一家反帝报纸^③上说，上海现在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成立了区罢工委员会。上海在 1 月底宣布了总罢工，虽然它还不具有普遍性质，但参加的人数很多，在许多工厂里，工人们确实罢工了。随后在许多工厂里，工人们成立了义勇军式的战斗队。报上详细地谈到，这些武装队伍是如何成立的，明确指出在哪些工厂里成立的。看来，有 40 家工厂里已经成立了；在纺织厂、丝织厂，甚至部分地在码头工人、电车工人、印刷工人、人力车夫，乃至兵工厂工人中——到处都成立了义勇军。现在他们公开地进行军事训练、学习巷战等等。他们要求 19 路军从军火库中取出武器发给他们。此外，一部分义勇军已开赴前线，在后方则以游击队的形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据日本报纸消息，那里明确指出，日本军队深受中国游击队活动之苦。当日本军队企图向前推进时，他们就遭到了居民的抵抗和对他们的扫射。

这清楚表明，上海战争现在正是由工人、士兵、城市贫民和革命学生进行的。当然也不能否认，在上海的民族战争取得暂时胜

① 《大公报》为日报。1902 年至 1937 年、1945 年至 1949 年在天津出版；1937 年至 1938 年在汉口出版；1938 年至 1945 年在重庆出版。

② 天津《大公报》1932 年 2 月 9 日。

③ 指《反日民众报》，1932 年 1 月至 2 月在上海出版。

利后,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它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我们不可否认,那里有美帝国主义的一定支持,国民党也不得不派了部分的援兵。国民党企图利用这场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这场战争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那就错了。这场战争的前景有赖于许多具体条件。这场战争正在变为帝国主义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正在发展成为更有组织、更自觉、更广泛、规模更大的民族战争。还有赖于许多具体条件。首先,有赖于这场战争的领导。其次,有赖于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这场战争,比如说这场战争将确实完全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话,这是一点。第二,如果这场战争有越来越多的上海广大工人群众、千百万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参加,那么这场战争就不仅限于上海,而将发展到全国各地,至少会发展到日本军事力量驻扎的中国各主要港口。

这是一点。这场战争那时就不仅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同时也必然会发展成为反对美国、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的战争。因此,如果说现在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还企图利用这场战争,那么到那时他们就不能再利用它了,到那时他们就必然会公开反对这场战争。国民党人士清楚地意识到并在不久前公开声称,如果日本或者在中国的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取得胜利,那么他们的命运将同西夏、柴清官^①等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还能担任一些舒适的职位,帮助帝国主义来剥削和压迫中国劳动者,而如果布尔什维主义取得胜利,如果群众取得胜利,那么他们的命运就将注定,他们的命运就像上海和哈尔滨、巴黎等地的俄国白卫分子一样。因此,国民党必然会公开反对民族战争,而民众也必然会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上海的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宝贵的一课,我们可以看到,战争不仅取决于技术,而且取决于群众的参与。现在在上海作战的 19 路军不久前曾同我们红军作战,并遭到了惨

^① 原文如此。音译。

败,有几千名士兵被我们红军俘获。后来把这些俘虏释放了,他们回到了上海。现在他们坚守自己的阵地,同日本作战已一个多月。这是很宝贵的一课。第二,我们这里有红军,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有广大工农群众支持的红军,它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它不仅能够战胜国民党,而且也能够战胜帝国主义。

第二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目前的苏维埃运动。

虽然现在在中国正进行着中日之间的战争,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削弱反对红军和苏区的斗争。相反,他们现在正在加强反对我们红军的斗争。国民党现在正在进行反对我们红军的运动,因为用他们的话说,红军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盟友,它在后方摧毁国民党,这是一。第二,红军是苏联的代理人,是红色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此,国民党现在派 12 个师来反对我们的红 4 军^①,派 5 个师来反对我们的第 6 军团,等等。但在江西,国民党不得不撤退,因为在那里他们遭到了重大失败。当然,目前苏维埃运动一方面正遇到越来越困难的艰苦条件,因为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正在进行这种反对我们的运动。但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也是对国民党实行反攻和攻击的很有利的时机,因为国民党目前已受到削弱,其次国民党现在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威望,第三是全国各地,特别是在中国的主要大城市正在开展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群众反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革命情绪正日益高涨,日益扩大。我们的红军在取得对蒋介石第三次进攻^②的胜利后,正在加强和扩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利用一切机会来开展对国民党的进攻,以便扩大我们的红军及其根据地,同时向中国人民表明,在中国有真正要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共

① 指第四方面军。

② 原文如此。指胜利击退国民党军队对中国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1年7月至9月)。

和国。如果战争在我们的领导下,在我们红军周围爆发,那么我们真的能够战胜国民党,战胜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决不能认为,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目前将停止进攻,国民党将停止反对我们的运动。现在需要建立对民族战争的这种新的真正的领导。在上海出现了以民众反帝协会为代表的^①这种政权的萌芽。但这只是革命政权的萌芽。在目前时期,是谁真正在领导民族革命斗争,这就是中国苏维埃政府。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把土地革命与反帝斗争联系起来,把上海的民族斗争与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能把中国革命的两股洪流: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到那时我们就能战胜帝国主义。

全宗 495, 目录 3, 卷宗 313, 第 129—132 页。

打字稿, 经过校订的速记记录。

① 见第 120 页注②。

38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2年3月4日^②于上海

如果[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到一定日期还是不能结束^③,那么伊万诺夫^④就不必等待了。我们希望,伊万诺夫立即回来担任领导工作。也请尽快派来其他同志。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51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文件上有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的批注:送王明、米夫和马季亚尔同志阅,还让王明和米夫签字。
- ② 共产国际收到电报的日期。
- ③ 第十二次全会于 1932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15 日在莫斯科举行。
- ④ 王明。

3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266(B)号记录 (摘录)

1932年3月4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11.(3002).——就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一事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决定:11.——通过。(电文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密电处^①)

听取:24.(3014).——皮亚特尼茨基和库西宁同志关于向中国派遣埃韦特同志的建议。

决定:24.——通过。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174, 第 4—7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4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229(Б)号记录 (摘录)

1932年3月21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4. (3069). ——关于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海参崴局的问题(见[19]32年3月15日政治委员会的决定)^①。

决定:4. ——批准维经斯基同志担任海参崴局领导人^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178, 第 7—8 页。

经过亲笔修改过的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指关于成立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召集人)、И. А. 米夫、С. А. 洛佐夫斯基和 Г. 科斯坦扬组成的委员会的决定, 是为了挑选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驻海参崴代表的人选, 并同其共同制定关于改组太平洋书记处海参崴局工作的指示(见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176, 第 6 页)。

② 最初方案是: 派维经斯基同志去海参崴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

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234(B)号记录
(摘录)

1932 年 4 月 9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28. (3189). ——关于资助《中国论坛》杂志^①的问题。
决定:28. ——允许拨给一次性资助,数额为 500(美)元^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82,第 8—9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原文如此。应为:报纸。《中国论坛》自 1932 年 1 月 13 日至 8 月 13 日在上海以英文报纸形式出版。1932 年 8 月,由于印厂拒绝印刷而停刊。在找到自己的印厂后,该报自 1933 年 2 月 11 日起至 1934 年 1 月 13 日以英文和中文《中国论坛》杂志形式出版。

② 币种是根据第 67 号文件确定的。

4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236(B)号记录 (摘录)

1932年4月15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12.(3208)——中共中央关于为中国失业者募捐建立食堂的电报^①。

决定:12.——(1)指示缪岑贝格同志通过国际工人救济会开展广泛的募捐运动。

(2)责成王明同志写一篇短文在国际报刊上发表,说明中国工人因工人住宅区被毁和企业关闭所处的状况。这篇文章应包括号召中国工会以及全世界工人和工会组织举行募捐来支持中国工人并通过国际工人救济会转交给他们^②。

(3)责成贝拉·库恩同志的委员会^③向各党发出指示,把募捐运动与反战运动结合起来^④。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① 电报没有找到。

② 王明署名的文章没有找到。

③ 指反战反第二国际和反法西斯委员会。

④ 见附录。

[附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

1932年4月23日于莫斯科

秘密

致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由于中国工会的呼吁^①，国际工人救济会正在开展为上海罢工者和失业者募捐的运动。请支援这场运动并把它与反战运动结合起来。请敦促红色工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参与募捐活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84，第 5—7、101 页。

记录为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附录为打字稿，原件。

^① 见《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呼吁书》，载《国际新闻通讯》，柏林 1932 年 5 月 5 日第 20 期，第 395 页。文件可能是由王明起草的。

4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关于保密工作给中共中央的信

1932年4月16日于莫斯科^①

秘密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保密工作^②

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正采取各种手段来反对革命,而首先是反对中国共产党。近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正根据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特别加紧完善与我党斗争的方式和方法。除实行公开的恐怖手段外,国民党在帝国主义者的领导和帮助下正在广泛采用在我党内部进行挑拨离间的手法。

举几个最明显的例子:

在上海,近来常有一些专门的装甲车在街头“游逛”,搜捕“盗匪和共党分子”,在每条街上都设有专用电话,可以在5分钟内召唤警察到上海的任何地方。

在每个宾馆、浴室等地,都有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奸细。在国际租界,除了总的警察机关以外,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自己专门的同共产党人作斗争的奸细和间谍组织。

此外,在英国、日本、美国和德国成立了专门的训练班和小组

^① 1932年4月28日,该信的英译本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发往中国。

^② 文件上有批注:送萨发罗夫同志。

来培养中国训练有素的警察干部。

帝国主义顾问和主子们经常教国民党如何同中国共产党作斗争。国民党领会了其帝国主义主子的功课，这可以从它野蛮和残酷地对共产党人实行史无前例的白色恐怖中看出。

南京有一个同中共作斗争的专门机构(KK)^①，它出版几种专门的杂志(《剿共半月刊》^②、《光明之路》^③、《反日与反苏俄》^④等)来反对我党。

南昌有一个以戴西龙(音)^⑤为首的专门在苏区建立反革命集团的机构，他们在江西组织 AB 团^⑥，在福建成立“社民党”^⑦，在湘南南部成立“性问题社”^⑧，在鄂西、鄂豫皖边区成立“国民党改组派”^⑨，等等。

在上海和南京，由顾顺章、杨虎、冯菊坡等人领导，成立了出卖我党的奸细和叛徒的特别小组，传授与共产党作斗争的方法。

在北平和天津，在叛徒张凯云(音)、廖划平、潘问友等人的帮助下，张学良和阎锡山成立了专门小组和为同样目的出版刊物。

在上海和其他工业中心城市，我们的敌人十分注意派遣间谍

- ① 原文如此。看来是指 CC，即中央俱乐部，是由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于 1929 年成立的国民党内的一个派系，它控制了专门与中共作斗争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组织部调查统计局的工作。
- ② 《剿共半月刊》于 1930 年至 1932 年在上海出版。
- ③ 《光明之路》杂志于 1931 年在南京出版。
- ④ 原文如此。中文名称不详。
- ⑤ 原文如此。可能是指段锡朋。
- ⑥ 指反布尔什维克同盟(中文称 AB 团)，是个秘密的反共组织，由右派国民党分子于 1927 年在江西省建立，30 年代初期解散。
- ⑦ 指所谓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于 19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在福建省活动。详见《中国的苏维埃(文献资料集)》，莫斯科 1934 年版，第 302—303、312—317 页。
- ⑧ 原文如此，中文名称不详。
- ⑨ 原文如此，指改组派。详见《中国的苏维埃(文献资料集)》，莫斯科 1934 年版，第 405—406、409—415 页。

和奸细到生产单位。

托陈分子、罗章龙分子一直在为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效劳,出卖他们认识的共产党人,出卖事务机关的地址,等等。

帝国主义国民党机关不会抱怨自己奸细活动的毫无成效。由于广泛地进行奸细活动,它们得以给我党造成了一系列重大打击。至少去年遭破坏的经验表明,反革命派很善于利用中共组织上的弱点。警察局一方面招募党内的不坚定分子(往往是些倾向分子和派别分子),广泛利用党内的派别斗争,另一方面常常亲自采取措施煽起派别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反奸斗争就是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战斗任务。然而中共对地下机关的保密工作和组织性这种反奸斗争的决定性手段还注意得十分不够。[中共]中央四中全会^①后党所做出的某些转变还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

尽管遇到异乎寻常的恐怖,尽管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被杀害,党仍处在半地下状态,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来从组织上巩固地下机关。

迄今为止还没有明确划清党的政治组织和群众性合法组织(工会、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反帝同盟等)的界线。

至今还很少使用化名,党所有最活跃的工作人员都是以其真名而广为人知。

对干部不研究不监督,常有这种情况,领导人甚至都不知道委以重任的同志过去和今天的政治面貌。

党没有动员起来同保密工作的具体破坏者即奸细活动的帮凶作斗争。对于在宾馆或随便某个住所轻率地举行的大量集会,对于没有什么理由通过邮局发出私人信件来描述党的生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件,仍然没有受到处罚。也没有动员全体党员对奸细提高警惕,尽管党正确地 and 成功地消灭了已被揭露出来的奸细。

^① 指 1931 年 1 月 7 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然而，中国共产党工作中最大的弱点是，地下机关工作的组织方式考虑欠周，有时对技术和联络性工作漫不经心。过于集中，一个人知道很多人的地址，同许多人进行联系；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里公开积极工作的人，同时又主管地下机关，甚至掌管技术和联络性工作；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工作人员周围的机关臃肿而庞大；漫不经心地挑选技术人员和联络人员——所有这一切乃是遭致许多暴露和不必要牺牲的原因。

上海、北平、天津和其他许多城市里的暴露向党提出警告，必须大力加强巩固党的地下机关、加强从政治上挑选和考验干部的工作，全面而无条件地做好保密和防止奸细的工作。这些任务应该在党的整个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中占据中心地位。不仅要提高全体党员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在我党领导下进行斗争的广大工农群众的警惕性，同奸细活动作斗争。

产生困难的原因是党没有研究布尔什维克党地下工作的经验，在1927年以前，党不知道地下工作，当时敌人知道我们的许多在国民党内和军队内工作的人员——所有这些困难能够也应该在最短时期内加以克服。

中央应该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1)按照明确制定的计划在所有支部中开展广泛的解释工作，让全体党员了解巩固党的地下机关的措施，保守秘密，反对奸细。

(2)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组织必须经常不断地审查中央和地方地下机关的组成人员，首先是审查反战机关、技术机关和联络人员，并定期地提出改进措施的具体建议。中央和各地方应该有常设工作人员，专门负责组织地下工作、保守秘密和反奸斗争。

(3)合法报刊和谈较为秘密问题的地下报刊，应广泛阐述重大破坏事件的经验教训，并让全体党员经常了解他们在防奸斗争方面的职责和党员的保密义务（纪律是：准确而及时地完成所交给的任务，只对办事的人办事时说出所要办的事，反对每个有意或无意

泄漏党内事务的人,即使是看来并不重要的事,不要同敌对分子交往,等等)。报刊(包括传单和墙报在内)的最重要任务是广泛宣扬已被揭露的奸细。

(4)党的整个组织工作应该是在高度保守秘密和保护干部的情况下,服从于保证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取得最大范围和不断增长的主要任务:考察和审查干部要从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政治素质角度出发。吸收入党和提拔到领导岗位要防止不坚定分子和奸细混入其中;对执行党的使命要进行监督;在各种合法组织和地下组织之间要明确分清职能;在合法组织和地下组织中工作的同志之间要划清工作界限;在党的领导人和一些党员之间从避免大量各种工作和大量联络工作集于一身的角度进行明确的职责分工。

每次政治运动都要从地下机关所承担的任务能否完成的组织和技术角度加以周密地考虑和准备。必须经常不断地总结地方组织的经验,完善揭发、揭露和消灭奸细的方法。

(5)党的机构,特别是监察委员会必须坚决同破坏保密规定的人,同多嘴多舌、漫不经心和不坚定的党员作斗争。中共党内生活中的一些事实说明,敌人在同自己老相识(军队、国民党等方面)的亲密交谈中了解到很多东西,因此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保持这种联系。党也不能容忍共产党员在被捕时的卑劣行为。对于那些在被捕时,哪怕在死亡的威胁下供出党内事务的人,党也应该像对待有意的奸细那样来对待他们。一些同志对待保密问题的漫不经心态度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常有这样的事情:信件通过随便什么人传递,会面时有许多人在场并在不适合的地方。也有同志去执行一项重要使命,随身带着写满地址的纸条,本来他可以不带这些地址——所有这一切都方便警察的工作,加速了暴露,而一个同志暴露往往导致整个组织暴露。

还必须同千篇一律地重复运用某些手法作斗争,虽然这些手法根据过去的经验成功地采用过。在某地区成功确定的接头地

点,远非始终意味着第二次和第三次在这个地区的接头将是顺利的,相反,会造成第一次顺利接头地点有暴露的危险。必须争取不断完善和变化工作方法。

(6)在中共党员中间,特别是各城市的党员中间,普遍不理解在周围环境中突出的外表带来的危险性,警察发现许多共产党员时指出,他们有各种皮箱,而在居民群众中谁也没有这类皮箱,共产党员还穿着欧式皮鞋,等等。必须经常不断地解释这些细节的重要性。

(7)必须经常不断地揭露并动员广大工人群众起来反对最近在中国日益增多的厂内间谍活动,也就是反对警察机关对工人群众最危险和最有害的一部分。

本信不可能详尽叙述与开展地下工作、保密工作和反奸斗争有关的所有问题。中央委员会和各地方党组织必须通过经常研究自己暴露的惨痛教训和工作成功的经验来确定,采用何种方法可以取得最大的成功。

必须从这样一点出发,即正确安排的工作能大大减少一般在工作中不可避免要牺牲的人员的数量。

必须把保密工作不限定在党本身的范围内,而且要根据条件在合法组织、半合法组织和其他群众性组织中也采用,特别要注意共青团、赤色工会、反帝同盟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等等。

中国党对苏区的保密问题、秘密工作和反奸斗争明显不够注意。苏区的组织必须充分了解敌人奸细活动的特殊危险性和苏区本身保密的重要性;一旦从本地区撤走时要保证在各处建立地下机关,最大限度地利用苏区为其毗邻的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统治区提供直接帮助的可能性。党必须克服苏区组织机构秘密工作中的缺点,因为这些缺点不仅有利于反革命在苏区的活动,而且常常被革命的敌人用来在全国范围同党作斗争。

在巩固地下机关和反奸斗争方面的成功将取决于,能在多大

程度上把全体党员动员起来,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加强自己的基层支部和扩大与最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的联系,并能吸引这些群众积极帮助党进行地下工作,党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步骤地培养和挑选自己的干部,并监督准确及时地执行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交给每个党员的具体任务。党必须反对试图扩大利用合法机会以至违背保密规定(公开地址和人名等)并帮助警察来取缔党的地下机关的行为,还要反对右派分子试图以保密为掩饰把自己局限在机关内不与人交往、不吸收工人入党,不提拔他们,等等。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05, 第 14—22 页。

打字稿, 副本。

44

黄平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32年4月17日^①于莫斯科

从[1931年]9月到年底共收到1.03万美元(包括给青年^②的3000美元)、1000两^③和1000墨西哥元。今年已收到2.5万美元,包括3月25日收到的1.5万美元。第26号(沃罗夫斯基)^④。

全宗495,目录19,卷宗217a,第68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信的日期。

② 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③ 即银两。

④ 黄平。

45

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 朱德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2年5月3日^②于瑞金

中央

我们在[中央]苏区扩大方向和红军作战行动上分歧意见。去年年底,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沿福建、广东、江西和湖南边界上的三山^③建立苏区的计划。科穆纳尔^④反对这一计划,并说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这是规避占领大城市。我们应该在赣江两边之间建立联系^⑤并在它的上游占领最重要的城市。当然,我们应该同李立三攻占大城市的冒险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然而,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同过分害怕攻占大城市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其他委员都同样这个意见,并决定攻打赣州。

当莫斯克文^⑥来到时,毛泽东提出了在[赣]东北扩大苏区的计划,并反对攻占中心城市。毛泽东遭到反对后,暂时放弃了自己

① 电报译文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发往莫斯科。在电报俄译稿上有批注:已阅。皮亚特[尼茨基]、米夫、费赖耶尔、萨发[罗夫],还有王明的签名。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电报的日期。

③ 原文如此。指五岭山脉。

④ 王稼祥。

⑤ 原文如此。指建立赣江两岸苏区之间的联系。

⑥ 周恩来。

的计划，而我们把占领大城市的计划具体化了，并开始攻打赣州。从被围困的赣州撤退后，毛泽东认为攻打该城的行动是李立三路线的继续。

经过讨论后，毛泽东说了另一番话，说在攻打赣州的同时，应派部分部队去东北方向扩大苏区。毛[泽东]再次建议在福建、江西、浙江和安徽的边界地区建立大片苏区，并制定了十个月的工作计划^①，说今年年内不可能占领大城市，必须向其他的农村推进。这一切证明，毛泽东有一个扩大苏区的一贯方针。

毛泽东分析了政治形势后，否定了它发展的必要性，认为它是偶然的^②。因此，他从没有发生变化的形势出发，制定了长期的行动计划。这条政治路线乃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它低估了目前的形势，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员都反对这条路线。

我们紧急决定，派两个军团去信丰和南面的三南(音)^③，并派一个军团去赣江西岸[的地区]，以便加强赣江两岸苏区之间的联系，并准备进攻粤军和大城市。然而，由于缺乏资金，我们又决定扩大北部的苏区。但资金还是不够。我们又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决定派一个军团去福建，以解决资金问题。

在朋外(音)^④的第3军团始终未能解决资金问题，因此……^⑤开始向漳州(音)^⑥进攻。在漳州募集资金后，我军准备回过头来进攻广东来犯福建和江西之敌。我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显然是湘南，即湖南南部。

④ 原文如此。中文地名不详。

⑤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⑥ 原文如此。也可能是：泉州。

争,并在党的机关报^①上进行批评。

最近一次[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会议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但他没有出席会议,因为他在前线。因此,这个通报是由一些个人签署的。当毛泽东回来时,将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

签名:莫斯克文、科穆纳尔、布林斯基^②和朱德。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82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① 指《实话》杂志,1932年在瑞金出版。

② 任弼时。

46

皮亚特尼茨基给佐尔格的电报

1932年5月3日于莫斯科

拉姆扎伊^①亲收,米哈伊尔^②发。

从[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我们向你们^③转去3万美元以便转交给朋友们^④。请结算一下,你们总共收到多少,确切交给当地朋友多少。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217a, 第 84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P. 佐尔格。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③ 指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的工作人员。

④ 指中共党员。

47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和 红色工会国际的电报^①

1932年5月9日^②于上海

致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决议^③已收到。其中有关于工人斗争现状的建议：“与发生大量冲突和防御性罢工的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反攻性经济斗争正在日益高涨并占据主导地位。”^④在这个评价中没有明确指出反攻性斗争的进攻性质。这个评价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原先的评价^⑤和[中共]中央目前的评价不完全一致^⑥。期待你们尽快寄来你们的说明。在[决议]的另

① 发报人是根据第50号文件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电报的日期。

③ 指1931年12月在莫斯科局举行的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中国革命工会运动的任务》的决议。见《争取群众斗争中的红色工会国际：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莫斯科1932年版，第65—79页。

④ 见《争取群众斗争中的红色工会国际：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第66页。

⑤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工人反攻性斗争的进攻性质的文件没有找到。1931年7月31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谈到相当多的和越来越多的罢工的进攻性质。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45页。

⑥ 指《中共中央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1931年11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512—513页。

一处说“铁路员工和海员相对落后”^①，这不符合有关铁路员工和海员斗争的实际资料。我们想把这一段删掉。第 33 号(诺尔斯基)。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217a, 第 86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① 见《争取群众斗争中的红色工会国际：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第 66 页。

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240(B)号记录
(摘录)

1932年5月9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43.(3325).——关于[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冲突的
决定。

决定:通过(见附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附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①

关于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争论问题,政治委员会认为:

(1)丘贡诺夫、那利曼诺夫、奥尔林斯基同志^②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国际列宁学校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中没有给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以应有的支持;

① 文件上有批注:最后文本。

② 分别为: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

(2) 丘贡诺夫同志在校刊^①上和以前的文章^②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和不正确的提法,不能作为理由来指责丘贡诺夫同志为托洛茨基反对派或托陈反对派或对它采取调和主义立场^③;

(3) 指责普罗列塔里耶夫、克雷莫夫^④、李立三和王清^⑤右倾和为托洛茨基反对派是没有根据的^⑥;

(4) 在讨论中所涉及的一些政治问题上,过去和现在实际上都不存在原则性的分歧,可以证明实际发生的激烈争论是正确的。

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认为,继续这些争论是不能容忍的,兹决定:

1. 责成国际列宁学校管理委员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完全停止中国部的无原则争论。

2. 责成全体中国同志,无论是国际列宁学校,还是有中国同志工作的其他院校的学员和教师,友好地和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为争取中国独立和苏维埃革命而进行的斗争。

(本决定应向国际列宁学校全体师生宣读)^⑦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88,第 7、9、26 页。

记录为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附录为打字稿,原件。

① 刊名和出版时间不详。

② 文章没有找到。

③ 这些指责包含在郭绍棠和李维汉 1932 年 2 月 13 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08,第 1—15 页)。

④ 分别为:卜士奇和郭绍棠。

⑤ 李维汉。

⑥ 详见郭绍棠和李维汉 1932 年 2 月 13 日给中共中央的信和周达文 1932 年 2 月 26 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信(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08,第 1—15、44—45 页。)

⑦ 经过修改后的文本由 O. B. 库西宁、И. А. 皮亚特尼茨基、Д. З. 曼努伊尔斯基、B. Г. 克诺林签字(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88,第 27 页)。

49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2年5月16日^②于上海

请立即寄来去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③。迄今为止这个决议尚未收到,而较晚一些时候的决议,如红色工会国际的决议^④,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的决议^⑤和3月8日的指示^⑥倒都收到了。请注意这种拖延情况。第36号(诺尔斯基)^⑦。

全宗495,目录19,卷宗217a,第88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收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电报的日期。
- ③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1931年7月31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见第69页注②)。
- ④ 见第150页注③。
- ⑤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于1932年1月30日至2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详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898—1986)》,补充修订第9版,莫斯科1984年版第5卷,第378—399页。
- ⑥ 见《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共产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呼吁书),载1932年3月8日《真理报》;同上,载《国际新闻通讯》,柏林1932年3月4日第20期,第581—582页。
- ⑦ H. H. 格伯特。文件上有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的批注:阿布拉莫夫同志,为什么去年7月的决议没有寄去?另有王明的签名。

50

皮亚特尼茨基和洛佐夫斯基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2年5月26日于莫斯科

密电

致中共中央

答复第33号电^①。我们不认为有必要修改或删掉红色工会国际决议的部分内容。对铁路员工和海员斗争的评价是针对1931年的,而不是你们所依据的1932年。

(皮亚特尼茨基)

(洛佐夫斯基)

全宗495,目录19,卷宗217a,第96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47号文件。

51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2年5月27日^②于上海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会议将在不久的将来召开^③。[中共]中央已向他们发出指示,首先指出他们取得的成绩和政治路线的正确,其次指出他们的错误和缺点^④。莫斯克文的妻子^⑤到那里后向他们讲了我们的意见,[中共苏区]中央局已发来电报说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⑥。[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派科穆纳尔^⑦来[中共]中央。有些中央委员建议派另一位同志替代科穆纳尔,而伊思美洛夫^⑧自愿推荐自己。我们想知道你们的意见。至于对毛泽东的态度,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指示^⑨,你们的意见将转告给[中共苏区]

① 发报者和收报者是根据内容确定的。在俄译本上有批注:米夫同志已阅,并有王明签字。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电报的日期。

③ 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于1932年6月中旬在长汀召开。

④ 指中共中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1932年5月20日的电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220—222页。

⑤ 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

⑥ 文件没有找到。

⑦ 王稼祥。

⑧ 张闻天。

⑨ 文件没有找到。关于毛泽东的电报是在1932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189,第1、5页)。

中央局。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217a, 第 97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52

佐尔格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①

1932年5月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②

随同我们的邮件^③给您寄上尤利乌斯^④的材料。同时我们想提请您注意以下问题。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同病人^⑤和律师^⑥保持着联系。现在,您的机关重新得到改善,也就是说又重新在发展,我们觉得,您的人可以抓这项工作的时候到了。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不愿做这件事,而是因为我们的事情不是那么好,以致我们不能再轻率地把这种联系揽在自己身上。对于根据我们的意见在这里出版的报纸^⑦也是一样,您自己可以判断,它发展得很好。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指出,我们确实未从您手下代表那里得到任何帮助,而这里的线人^⑧对此事也毫不感兴趣,完全让我们自己来张罗一切。您知道这对我们这里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里是些可怜的小

① 文件已发表。见《“佐尔格”案件的新文献》,载《近现代史》杂志莫斯科2001年第2期,第134—135页。文件上有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的批注:阿布拉莫夫同志:我们能如何利用她(A. 史沫特莱)? 您对提及的问题意见如何?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③ 指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系统。

④ С. 茨维伊奇。文件没有找到。

⑤ 根据共产国际的约定术语,病人就是被捕的人,指Я. А. 鲁德尼克。

⑥ 让·温桑。

⑦ 指《中国论坛》,见第41号文件注①。

⑧ 联络员,指格伯特。

技术员。我们没有本事像政治督察员那样行动。因此,我们不能承担责任,特别是在您这里的人当中早就有一些业务精通的人的情况下。我们请求坚决解除我们这种超负荷的重担。这不是因为我们懒惰(曼努[伊尔斯基]曾经这样说过我^①,但这不对),而是因为我们的处境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些联络了。我现在至少已经相当名声扫地了。我们感到很惊讶的是,我们建议利用史沫特莱(女人)来做国际范围的报刊工作,您没有作出反应(罗伯特^②对她很了解)。相反,您却派来了一大批人,其中一部分人不是很有用,如果他们能学会点什么的话,那也需要过一两年才能对这里的条件有所了解。为什么呢?史沫特莱可以根据我们的意见多做两倍的工作,还会少花三分之二的费用。在这方面,我们想提醒您注意,她的帮助是需要的,以使用某种方式还给她应从《莫斯科新闻》^③得到的钱和她在家里翻译书稿的费用^④。史沫特莱现在没有工作,在写一本新书^⑤,没有钱用。在家里,在大城市,她有很多钱,但没人给她寄去。我们恳请您帮助给她弄些钱,这也是为了您的利益。

拉姆扎伊^⑥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573,第 13 页及背面。

打字稿,副本。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Г. 埃斯勒。

③ 指《莫斯科新闻报》,从 1930 年起至 1949 年在莫斯科出版,每周一二期。1956 年起至今每周一期。

④ 原文如此。

⑤ 可能是指《中国的命运:中国现时生活见闻》,纽约 1933 年出版。

⑥ P. 佐尔格。

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工部^①关于 远东和近东国家共产党秘密工作 状况和特务工作情况的书面报告

(摘录)

1932年6月3日于莫斯科

秘密

关于远东和近东党内的 秘密工作状况和特务工作

中国

中国在1931年年中以前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在党内反对间谍和奸细并在敌人的组织和军队中进行破坏工作的机构。在[中共]中央下面有一个所谓的特工部,四年来一直由顾[顺章]同志领导。顾有几个常任的助手,他们的工作由顾领导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该部把注意力集中在揭发奸细和“积极”与之作斗争上。此外,该部还为中央的技术工作服务,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寻找住所,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党、共青团和工会的中央全会服务,主管印刷所、文献库等等。特工部在工作中依靠相当可靠的关于敌人活动的情报,这些情报或者是通过派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组织中担任负责工作取得,或者是利用国民党阵营中的一些负

^① 报告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责同志的私人联系取得。中共特工部在国民党的一些作战岗位上有自己的情报员，他们事先告知国民党对苏区共产党的行动计划^①。该部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把全部工作过分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当顾在武汉被捕^②并供出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时，其危害性就暴露出来了。只是由于党在南京警察局里有内线^③，才得知顾的叛变，使他未能破坏他所知道的所有党组织和党的工作环节。

顾的暴露向共产党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必须根据加强保密的原则，改组党的技术工作，最大限度地区分开某些环节等等。还要立即改组整个所谓的中央特工部，并将它分为三个主要的科：(1)党的技术工作；(2)军队工作；(3)反奸斗争^④。领导这些科的是由政治局任命的三位同志^⑤。整个工作由莫[斯克文]同志^⑥领导。这些领导人彼此不知道。每个科有独立的机关、住处和接头地点。这些科的机关大大缩减了。中央书记处机关和上海省委机关^⑦和工会机关以及某些省组织也大致同时进行了改组。

机关某些环节的暴露、党中央书记向[忠发]同志的被捕和被杀害^⑧、无线电学校学员的被杀害^⑨等等，都是顾出卖的结果，这成

① 原文如此。

② 顾顺章是在1931年4月24日在武汉被捕的。

③ 指钱壮飞。

④ 必须注意到，虽然中央下面设有军事部，但是由于军事部的领导还是顾，所以实际上特工部和军事部是合在一起的(文件原有的注释)。这一论断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顾顺章是中共中央军事部的成员，但从未领导过军事部。

⑤ 参加中央特工部的有：陈云(部长)、康生、潘汉年、杨森、陈寿昌和吴克坚(秘书)。关于谁具体负责党的技术工作、军队工作和反奸斗争的材料没有找到。

⑥ 周恩来。

⑦ 指中共江苏省委。

⑧ 向忠发是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捕，6月24日被杀害的。

⑨ 无线电学校学员何时被杀害不详。

了党在反间谍反奸细斗争中的转折点。党意识到必须动员广大劳动群众同奸细现象作斗争,中央颁布了揭露顾的作用的呼吁书,此外,中央还就顾的叛变行为向各级组织发了信,拟定了发给各级组织的关于党组织工作中的秘密活动细则,其中吸取了中共当时屡次暴露的教训^①。中央号召各级党组织加强党的纪律,惩处破坏秘密活动规则的行为,直到开除出党,等等。

关于中央这些指示如何贯彻的情况我们不掌握。我们也不知道中央是否因顾的叛变只进行了一时的运动,或者党确实根据较为正确的组织原则改组了自己的工作。但是,根据近来没有发生较大的暴露以及部分地恢复和重建一些一度瘫痪的环节(联络)的这种判断,可以认为,党确实改进了自己的秘密工作。

根据特工部的提议,东方部^②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秘密活动和反奸斗争问题的信,信中指出,由于近来屡次暴露,暴露出了党的工作的主要缺点(一些个人和机构的职能不分,在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住宅里保存秘密材料,在不适当的地方举行会议,迷恋于“机构”,在市内一起游逛,大声地谈论共产国际等等),还提出了改进党的秘密活动的一系列具体建议^③。信是前几天才送到国内的,还没有关于如何被接受和怎样贯彻的任何消息。

近日将发去译成中文的关于秘密活动的小册子^④。《国际新闻通讯》上刊登了中国同志写的关于中共党内反奸细和反间谍斗争的文章^⑤,文章也将发到国内,以便在当地党的报刊上转载。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

③ 见第43号文件。

④ 见布赫奈尔·丁·约翰内斯:《反间谍和反奸细的斗争》,汉堡1932年版。中译本没有找到。

⑤ 见李清:《反对共产党内的奸细和背叛行为的斗争》,载《国际新闻通讯》1932年5月13日第40期,第1243—1244页。

没有任何消息谈到在中国的党报上如何阐明间谍活动、奸细活动和工厂里的间谍活动。总之，特工部对中共反间谍和反奸细斗争的较为经常的领导，由于近来同该国几乎完全没有联系而显得困难了。

随着联系的改善，必须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一起设法取得关于党目前组织状况的材料，并就秘密技术结构和反间谍斗争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

保密问题、正确安排反奸斗争工作问题，不仅对于国统区的中国，而且对于苏区的共产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已采取某些措施，以保证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揭露国民党、托洛茨基分子、陈独秀分子在红军队伍中和苏区居民中进行的奸细活动，等等。但我们几乎还没有消息说明，中央的这些指示如何贯彻执行（两位到这里来的同志，即国际列宁学校学生^①的报告除外，报告正在翻译^②）。在这里，特工部的作用仅限于指出苏区秘密工作问题和反间谍斗争问题的重要意义。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17，第 61—64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何人不详。

② 文件没有找到。

54

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2年6月9日^①于瑞金苏区中央局给中央的电报^②

共产国际的指示信^③中央局全体委员之间已阅。1. 毛泽东已从前线返回, 全会^④已结束, 取得很好结果, 一致同意中央的指示信^⑤, 坚决揭露了以前的错误, 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确定了当前政治工作的积极进攻方针和在江西省取得首先胜利的行动方针。在全会上, 毛泽东同志表现出很好的态度^⑥, 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 完全放弃了自己向东北扩张的意见^⑦。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2. 我们的讨论是在同志式的气氛中进行的, 只限于中央局委员之间。这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目前我们正齐心协力地执行中央的指示, 不会再有任何冲突。然而, [苏区]共青团中央局全会不同意中共中央局的意见, 把党的代表会议^⑧看作

① 莫斯科收到电报的日期。文件上有批注: И. 米夫。1933年6月9日。

② 电报副本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送交共产国际执委会。

③ 在俄译稿的边页上, И. А. 米夫在该句子旁边打了一个问号。可能是指1932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毛泽东的电报。

④ 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各处应为: 会议。

⑤ 指193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 第220—222页。

⑥ 原文如此。

⑦ 原文如此。

⑧ 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各处应为: 会议, 不是代表会议。

是在党的整个政治路线上犯了错误的代表会议。3. 接到中央冗长的电报后,显然全会完全承认了重大原则性的和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低估我们的错误。[中国]共青团中央局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待续^①。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217a, 第 109 页。

英文打字稿, 副本。

^① 续电没有找到。

55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摘录)

1932年6月10日^②于瑞金

4. ^③毛泽东身体极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队一起活动,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派他去前线策划军事行动。他也希望去前线。莫斯科文^④。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113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
- ① 收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电报副本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送往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电报的俄译稿上有批注:送东方书记处成员阅,并有 П. А. 米夫、П. И. 马季亚尔和 Г. И. 萨发罗夫的签字。
-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电报的日期。
- ③ 原文如此。
- ④ 周恩来。

56

维经斯基给福京的信^①

(摘录)

1932年6月11日^②于海参崴

亲爱的科利亚：

今天收到了你的来信^③。我想讲一下这里的工作情况和未来的前景。

根据六周来对情况的了解,我觉得,我们太平洋书记处在海参崴的工作,不仅是领导和指导远东现有工会组织的工作,而且是直接协助组织红色工会和改良主义工会内的革命反对派。整个这项工作现在应该根据远东因为发生战事而出现的完全新的形势来进行。新的形势要求我们不仅在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有新的内容,即我们在莫斯科商定并在指示信中确定的内容,而且要积极做工作,把工人组织到工会中来和到反战的团体和组织中来。

这里应该坦率地说,库特尼克同志和他以前的其他人(如阿尔维斯同志)都没有这样的方针。我这样说既是根据对材料的了解,也是根据(这更重要得多)太平洋书记处执行局成员的方针和他们的工作方法。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出版三个杂志^④上。而且杂志的内容在政治上不够突出,没有实行明确的方针来说明无

① 信的副本送 C. A. 洛佐夫斯基、Г. 科斯坦扬、И. A. 米夫和王明。

② 信是红色工会国际于 1932 年 6 月 28 日收到的。

③ 信没有找到。

④ 指 1930 年至 1933 年在海参崴出版的中、朝、日三种文字的《太平洋工人》杂志。

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与反帝斗争相结合的问题。库特尼克对文章的内容只是根据标题从表面上进行了审查,事先没有进行讨论。而主要的问题是,这些杂志是单独出版的,与太平洋书记处本身的工作是脱节的。杂志上所涉及的问题并不是在执行局会议上讨论过的问题,因此文章(除翻译的文章外)常常没有答复在当时情况下的具体的涉及该国工人利益甚至该工会利益的工会运动问题。不过这就给库特尼克在我们宣传鼓动方面的“业绩”提供了答案。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对他说得很清楚,很尖锐。

我要说在组织工作方面这里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我不知道,也许太平洋书记处不应该直接从事工会的组织工作,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但是我应当说,在我看来,我们是应该从事这项工作的,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想法。在满洲,有非常有利的环境来组织工人工会、手工业工人工会和农庄工人工会,特别是在老吉林部队^①地区和游击队地区。这里在广泛开展反帝斗争。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中国本身的1925年至1927年时期。老吉林部队的将军们不得不考虑到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他们试图使自己的军队带有民族革命色彩,并依靠民众。他们的行为与蒋介石军队和华北其他国民党军队的行为有所不同。当然,这不表明老吉林部队较之新吉林部队^②或者国民党的将领们有什么不同的社会本质,但它标志着满洲反帝革命运动的高涨。我们应该根据这种情况立即着手将工人组织到阶级工会中,并建立反帝斗争的支柱。是否有这种可能呢?是有的。虽然在道路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首先,应该在这方面给满洲的工会委员会提出相应的方针,其次必须立即亲自在这里挑选经过考验的中国同志,并派他们到这些地区去工作。太平洋书记处执行局却未曾有这样的方

① 指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前吉林省的部队。

② 指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吉林省的部队。

针。至于说到在北满的老吉林部队地区和游击活动地区的工作，我自然不能提出中共满洲州委^①和红色工会应该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这里的论点。那样做是不对的，那样做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比较容易的地方工作，而不做最主要的工作，即不在心脏地区，不在长春、奉天、锦州、大连等地区破坏日本占领制度和机构。但正是为了把主要斗争集中在那里，我们必须帮助北满的中共州委和红色工会。使它们有可能把它们的所有力量，或至少是主要力量集中在南满。此外，我们不应忘记[19]25年至[19]27年在组织群众方面的经验：我们知道，武装斗争的任何一次暂时结局，我们的主要成果就是建立革命工农的组织，这归根结底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因此我认为，目前除了政治方针以外我们还应以人员和一些资金来帮助我们在满洲的同志（州委红色工会）。应当派一些能干的同志去加强满洲州委。我知道，现在正准备从伯力派米茨凯维奇同志^②去莫斯科待命，我觉得，把他交给满洲州委对事业将是极其有利的。除他以外，这里还可以找到两三位中国同志。除了加强满洲中心的州委和工会委员会以外，还可以而且应该在这里（海参崴）物色几位毕业于苏联党校和有实践经验的中国同志，并把他们派到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地区，去组织工人工会和农庄工人工会。这将对中国的真正帮助，也是太平洋书记处的真正工作。此外，还必须寄去一些钱以便在整个满洲开展工作。过几天我将给您寄去满洲工会委员会微不足道的预算草案及其说明^③。请讨论一下并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写以上这些话是作为对太平洋书记处寄给工会委员会的信的一点说明^④。这封信也随

① 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各处应为：中共满洲省委。

② 盛忠亮。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文件全文没有找到。信的主要内容在维经斯基于1932年6月6日给红色工会国际的电报中已引用（全宗534，目录4，卷宗416，第34页）。

这次邮件寄给了您。

关于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情况,过一段时间再详告。暂时仅提几点批评意见。在我看来,人们在这里没有抓住工作中的主要东西,即很少注意与这些国家建立联系。而且联系并不是国际联络部意义上的联系(这是个特殊的事情,关于这种联系,我们单独再谈),而是通过成千上万常到海参崴国际海员俱乐部的海员,更多的是通过港口本身对这些国家革命工会给以协助意义上的联系。顺便说一句,由此也产生了我们同国际联络部联系上的特殊弱点。俱乐部不是根据战争条件在进行宣传工作。它实行的是比较和平的生活方式。至于积极的组织工作,那它是非常薄弱的。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多月前在这里组建的北方海员(中国人)委员会,纯粹是虚构的。它没有进行工作,实际上是一纸空文。最近,我向太平洋书记处执行局提出国际俱乐部的报告,并让他们说一说现时的情况和“妨碍”他们工作的情况时,才弄清楚,原来北方委员会工作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不理解组织海员的问题而不够重视这件事。目前,在最近两周来已吸收了 90 名新会员入会,现在会员总数已达 150 多名。这毕竟是对中国海员联合会的某种帮助。其次,国际俱乐部的同志犯了某种组织上的机会主义。例如,现在弄清楚了,在几个月间,我们的指导员在轮船上成立了船舶委员会,但没有建立领导它们的红色工会支部。因此,我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了解这项工作的结果,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这些船舶委员会没有落到我们的手里。这个错误是由这里采用的总的工作方法造成的,即不够注意正确加以组织的问题和工作上的表面化问题。

我这里说的都是工作中的缺点,甚至说到目前的方针。这并不等于说近来没有什么变化。但变化还很小,以至不能认为,上述所有错误都已经克服了。我正竭尽一切努力使工作尽快地按新的方式进行。但这里需要您的帮助,必须派一位坚强的中国同志以

及莫罗佐夫同志到这里来。瓦西里耶夫^①急切地想去中国。他工作得很好,跟大伙儿也很齐心协力。我想,也应该把他(作为三人中的一人)调到满洲去。瓦西里耶夫以及米茨凯维奇,在远东边区时很好地研究了满洲的情况,他们在那里将会很有好处。他们自己也很希望去那里工作。在这件事上应该说服皮亚特尼茨基和米夫同志。其次,总该给我们捎来一台胶印机吧!莫非难以理解,没有这样一台机器我们现在就无法通过中国同志去完成指示信中所谈到的那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再重复说一遍,如果不捎来胶印机,无法工作的责任就会落到尤尔吉克身上,因为[红色工会国际]书记处正式责成他从事这项工作的。第三,应该寄外汇来,过两天我将寄去开支报表,并请追加费用^②。请给予支持并寄钱来。暂时写到这里。再过7天到10天,我将准备一份关于满洲和间岛游击运动的材料。目前还只是一份草拟材料,不过是完全经过核对的。编好后我立即将副本寄上[……]^③。

今天就写到这里。如果愿意,可打印我的信,加上标题“尊敬的同志们”,将其作为正式文件。工作计划随下一次邮班寄去[……]^④

紧握你的手

格里高里·维经斯基

全宗 534, 目录 4, 卷宗 415, 第 52—65 页。

手稿。

① 杨松。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此处和以下各处删去与中国无关的部分。

④ 此处和以下各处删去与中国无关的部分。

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251(B)号记录
(摘录)

1932年6月15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26.(3498).——中共中央关于将科穆纳尔同志^①从中央苏区召回上海并派伊思美洛夫同志^②去苏区接替他的建议。

决定:26.——(1)答复中共中央,关于召回科穆纳尔同志的问题,他们应该自己酌定。至于派另一位同志去中央苏区问题,应建议中央暂时不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目前不应削弱中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97,第 14—15、17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王稼祥。

② 张闻天。

5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04 号(特字第×号^①)记录^②

(摘录)

1932 年 6 月 16 日于莫斯科

听取:33.——关于中国西部情况(报告人:波斯特舍夫同志)。

决定:33.——责成伏罗希洛夫和阿库洛夫同志审阅洛冈诺夫斯基同志的书面报告^③并将有关该报告的建议提交政治局。

抄送:伏罗希洛夫、阿库洛夫同志。

听取:34.——(1)关于满洲问题(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2)关于南京问题(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决定:34.——(1)责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加拉罕同志最终审定给斯拉武茨基同志的电报。

(2)采纳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在给斯大林同志关于南京问题的电报中提出的建议和斯大林同志答复中提出的建议(见附录)。

抄送:加拉罕同志——全部;

莫洛托夫同志——决定:(1);

卡冈诺维奇同志——决定:(1)。

中央书记

① 号码没有标出。

② 文件发表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日本(1917—1941)》,第 84—86 页。

③ 文件没有找到。

政治局会议第 104 号

记录决定:34 附录 1

最终审定稿

责成斯拉武茨基同志向大桥忠一作出以下答复:

苏联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正式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日本方面不承认“满洲国”的事实。遗憾的是,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们夏季休假而不能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而没有委员们参加是不能就此问题作出决定的,待研究后我们将告知结果。

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原则上都不拒绝承认“满洲国”的法律地位,但实际上这样的问题是不能立即解决的。从苏联政府对“满洲国”的态度上可以明显看出,事情就是这样。“满洲国”可以从苏联政府对中东铁路的政策上,从我们同意任命“满洲国”驻苏联领事的事实上以及我们严守中立的方针上(表现在苏联政府对希望通过苏联领土到马[占山]那里去的李顿委员会^①的态度上)作出判断。

责成斯拉武茨基同志同时将我们的这一答复直接告知满洲人。

责成特罗扬诺夫斯基同志将我们的这一答复通知日[本]政府。

核对无误:赫里亚普金娜

^① 指为了研究中日在满洲的冲突,国际联盟理事会于 1931 年 12 月 10 日成立的以李顿爵士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报告于 1933 年 10 月 2 日公布于众。见《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文件汇编》,莫斯科 1933 年版,第 157—169 页。

政治局 1932 年 6 月 16 日会议
第 104 号记录决定:34 附录 2

致斯大林

第一,从您所知道的可靠消息来源得知,南京决定恢复与我们的关系。南京决定同我们一起参加签订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南京认为,恢复外交关系将通过签订不侵犯条约来实现。留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官员王[承穗]已被责成以“个人意见,秘密和非正式地”弄清苏联政府的意见。显然,为执行这一指示,王[承穗]已向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司长科菲洛夫斯基提出接见请求。

第二,我们认为,南京的决定主要是由于担心我们与“满洲国”接近。恢复关系,而且通过签订不侵犯条约,其目的是阻挠我们建立我们所需要的与“满洲国”的关系。可以肯定,中国人将会把一些直接约束我们对满洲的政策条款列入不侵犯条约。

第三,我们认为,最好现在科菲洛夫斯基不见王[承穗],让王[承穗]去见远东司的一名工作人员,由该工作人员建议王[承穗],如果他有什么问题可用书面提出来。请告知您的意见。

1932 年 6 月 12 日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

莫斯科 联共(布)中央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同志:

关于南京人对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同意你们的意见。如王[承穗]提出书面意见,请用电报将副本寄来。

1932 年 6 月 13 日

斯大林

核对无误:赫里亚普金娜

全宗 17, 目录 162, 卷宗 12, 第 179—180、186—187 页。

打字稿, 记录为原件, 签字为真迹复制, 附录为经过核对的副本。

59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2年6月20日^②于上海

在最重要的苏区和[中共]中央之间已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可以用上海××^③的评论来指导军事行动。请你们派一名军事专家来帮助[中共]中央。我们还需要一名爆破方面的专家。我们可以把外国人护送到苏区,希望你们尽快派专家来。[中共]中央。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217a, 第 125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
- ① 收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解密电报的日期。
③ 原文如此。

6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2年6月28日于莫斯科

致中共中央

转发对中国形势的评价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②，对中国革命危机作出评价，认为，“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为在有几千万人口的土地上建立苏维埃和红军，这使中国在殖民地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处于首要地位。”^③在第十一次全会后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中国革命危机的发展中开辟了新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引起了反日斗争的巨大高潮，吸引了国统区的广大

① 1932年5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审议了中共中央对如何评价中国形势的咨询后，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为下次会议起草关于该问题的电报稿(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191，第1、7页)。电报的最初稿在1932年6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上进行了审议，会议责成东方书记处根据交换的意见对电报稿进行压缩和加工(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195，第一、3、42—43页)。1932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电报稿经过政治委员会委员飞行表决通过(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197，第1、9页)。1932年6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原则通过了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提交的新的电报稿，并责成O. B. 库西宁、王明和Π. A. 米夫在一天内最终审定电报稿(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00，第1、3、90—92页)。

② 全会于1932年3月23日至4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

③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35页。

劳动群众，开始时只有华北和满洲的劳动者参加斗争，现在城市小资产阶级迅速革命化，他们中的大部分群众正在摆脱国民党的影响^①。日本的行动把整个太平洋问题与瓜分中国的问题一起提上了议事日程，使帝国主义的矛盾，特别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极端尖锐化，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帝斗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武装干涉苏联的威胁大大增加了。在这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与法国帝国主义的结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们想把满洲变成武装干涉苏联的东方桥头堡。同时，日本的行动也破天荒地在广大群众的眼里揭露了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促使中国统治阵营的进一步崩溃。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最残酷的经济危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破产和饥饿、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涨和苏维埃运动的巨大胜利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些条件下后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主要在苏区取得毋庸置疑的成就的同时，必须指出我们也存在着许多弱点，特别是在大工业城市，我们的弱点比过去显得更无比地严重。尖锐地暴露出与群众，首先是与工人联系不够。在领导和开展他们的斗争上显得软弱。由于党缺乏与广大工人群众的联系，特别是通过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中的工会小组的联系，党未能保证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具有必要的无产阶级骨干。在许多情况下，远没有制止国民党政客和其他民族改良主义政客借助于虚假反对派的蛊惑宣传来控制运动，特别是控制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有效做法。党还不能将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从组织上巩固下来。由于这些缺点，我们党还不能解决目前的主要任务，即领导城市中的工人运动、群众性的反帝斗争和对国统区农民群众的动员工作，并把它们同红军和苏区劳动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

中国目前的革命形势向共产党提出了以下任务：1. 在武装人

① 以下删去了：民族革命军事行动（上海保卫战，游击运动）业已开始并正在发展。页边上作了插入符号，但没有加进去。

民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国的完整、独立和统一的民族革命战争口号下进一步动员广大劳动群众。2. 通过具体的事实始终不渝地揭露国民党的背叛行径(即事实上承认日本对满洲和蒙古一部分的占领,同意将上海地区变为中立地带,禁止和镇压反帝运动和抵制运动,派军队反对苏区而不去抗击日本人,等等)。在争取完全消除国民党对群众的影响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中,要特别注意揭露虚假反对派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客。与此同时,还应该更加广泛地大力宣传苏区的成就,提高苏维埃在广大人民群众眼中的威望。大力宣传苏联和中苏两国工农兄弟联盟的口号。3. 坚决而迅速地改组和扩大工会组织,使它们适应日益发展的群众斗争;切实执行关于工会运动的决议,特别是关于加强企业中的工作,关于组织、领导和开展罢工斗争,关于把赤色工会变成群众性工会,关于特别注意将加入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人争取过来的任务等决议。4. 必须保证切实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帝组织、工会组织和农民组织。坚持不懈地做工作,把参加合法或半合法的反帝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掌握学生运动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权。特别注意组织和领导遭受洪灾^①、歉收和战争之苦的饥饿工农们的群众性斗争。把他们争取粮食、衣服和住所的斗争与开展反帝的土地革命的斗争联系起来。加强在苏区周边地区饥民和失业者中间的工作。加强分化和争取国民党军队中士兵群众方面的工作。5. 开展游击运动并掌握游击运动的领导权。我们在满洲的任务除了建立农民委员会以外,还要渗透到所有活动的队伍中去和[秘密社团]“大刀会”组织中去,把游击队员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开始时提出抵制满洲政府的各项捐税和命令、没收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财产、游击地区的指挥人员和组织由选举产生、

^① 见第 69 页注④。

建立民选国民政权等口号。同时要加强在满洲工人中间的工作，特别是对抚顺铁路工人和矿工的工作。6. 大力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特别是在大工业城市。中共只善于依靠上海、苏区和香港这些党拥有较为坚强的组织的地方来解决自己的任务，在其他重要中心城市（武汉、南昌、长沙、广州、天津、大连、满洲）要建立严格保密的、善于聚集分散的力量并与广大群众、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建立联系的党委会，同时要在群众性斗争的浪潮上扩大合法性范围，必要时转入地下但不失去与群众的联系。7. 在苏区，中共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巩固和联合苏区，大力加强红军；加强、提高苏维埃政府和苏维埃机关的威信和工作能力。苏维埃运动的问题仍然应该是党注意的中心。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575，第 2—4 页。

经过亲笔修改的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61

琼森给维经斯基的信

(摘录)

1932年6月29日于莫斯科

秘密

亲爱的斯帝文斯同志^①：

你的满洲来信^②已阅。信很好。我已将它交给洛佐夫斯基和科斯坦尼扬同志。

请告知,你能否招募一批(5人至8人)中国同志,对他们进行培训(短期实习约3周到4周)并派到满洲去从事工会工作?请来电告知[……]^③

此致

敬礼

琼森

① Г. H. 维经斯基。

② 指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海参崴局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信(见第159页注④)。

③ 以下删去与中国无关的内容。

[附言]

您寄给福京名下关于太平洋书记处工作的信^①也已收到,但琼森和福京都没有看到,因为我没有来得及转交给他们:他们都忙于开会。奥沙[尼娜]。

全宗 534, 目录 4, 卷宗 412, 第 70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附言为 E. E. 奥沙尼娜亲笔签字。

① 见第 56 号文件。

6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06 号 (特字第×号^①)记录

(摘录)

1932 年 7 月 1 日于莫斯科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32 年 6 月 29 日

51/40. ——关于南京的建议。

1. 作为对政治局 6 月 28 日决定的补充^②,若王[承穗]提出关于条约和承认的问题,则准许科菲洛夫斯基向王[承穗]声明,在他看来,苏联政府将不反对立即无条件恢复关系,此后不侵犯条约的提出将是恢复关系的自然结果。

2. 给李维诺夫发去以下电报:

“请向颜惠庆声明,在您看来,苏联政府将不反对立即无条件恢复关系,此后不侵犯条约的提出将是恢复关系的自然结果。”

① 编号没有标明。

② 1932 年 6 月 28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1)准许科菲洛夫斯基同志接见王[承穗],如果后者开始谈条约和承认问题。科菲洛夫斯基同志在开始谈话时,应要求王[承穗]以书面形式阐述南京的意向”。(2)给报刊提供以下消息:“驻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王[承穗]请求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二司司长科菲洛夫斯基同志接见他,据王称,要通报中国政府的重要建议。科菲洛夫斯基同志已答复准许该请求”。(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13,第 5 页)。

抄送：加拉罕同志。

1932年6月30日

85/48. ——关于科菲洛夫斯基与王承穗的谈话。

给报刊提供以下消息：

6月29日，中国代表团成员王承穗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科菲洛夫斯基进行了谈话。期间就王[承穗]先生所通报的中国政府打算与苏联签订不侵犯条约并恢复苏中关系的意向交换了意见^①。

中央书记 卡冈诺维奇

全宗 17, 目录 162, 卷宗 13, 第 1、4、6 页。

打字稿, 意见, 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见 1932 年 7 月 1 日《消息报》。

63

中共中央给王明的电报^①

1932年7月14日^②于上海

致王明。三个月来我们一直没有收到钱。财政状况极其困难。希望你们尽快汇钱来。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217a, 第 154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在文件上有批注:交王明同志阅,并有王明、И. А. 米夫和 Л. И. 马季亚尔的签字。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电报的日期。

64

维经斯基给琼森的信^①

(摘录)

1932年7月21日于海参崴

绝密

亲爱的琼森同志：

你的来信^②和两份电报^③已收到。关于我这里工作的大致情况，我已在给福京同志的第一封信^④中谈了。你自然看到了。在这封信中我谈几个问题，并回答你的询问。

1. 我越来越坚信，我们应该为满洲的工作赋予头等重要的意义。广大劳动群众武装抗击日本占领者的运动正在日益发展。整个边区(东北三省)现在是义勇军、游击队、自发起义农民(“大刀会”、“红枪会”、[秘密社团]队伍)、由工人和失业者参加的零散游击队(虽然目前人数不多,但只是暂时现象),最后还有由老吉林部队^⑤(驻扎在吉林省东部包括间岛在内的王德林军)组成的所谓“救国军”^⑥等的斗争舞台。马占山军(马将军)是独立的,它依然是老吉林部队,与其他军相比受国民党影响更大。在整个这一运动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它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并日益开始

① 文件上有批注:交米夫、洛佐夫斯基。

② 红色工会国际于1932年8月2日收到电报。

③ 见第61号文件。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见第168页注①。

⑥ 由王德林于1932年2月成立,后于1933年1月撤退到苏联境内。

指向中国的反革命派,虽然后一点发展缓慢,也很不平衡。国民党人在加紧工作,要把这个运动控制起来。由于我们这里的工作薄弱(中共满洲州委^①的工作很薄弱,我们方面的工会工作也很薄弱。据曾在我们这里的州委代表^②提供的统计材料,在整个满洲,支持太平洋书记处的工会会员总共只有几百人,而党员有 2500 人)。国民党依然能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活动,把自己描绘成反日斗士。王德林以及马[占山]之类将领继续以国民党的名义不仅向农民和城市居民寻求帮助,而且公开进攻游击队和义勇军。他们同时还把群众的矛头引向国联和李顿委员会^③(附上马的呼吁书^④)。然而,有种种客观条件,使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争取对这场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并取得了领导权,因为国民党及其走卒,更不用说“满洲国”政府的傀儡,在广大群众的眼里越来越暴露出自己的面目。只是在我们工作薄弱的情况下,他们才得以用巧妙的手段使群众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他们的影响。

我讲这些是为了说明,我们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迅速弥补我们在满洲工作中失去的时间。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不够的。当然最好是我们向那里发一封指示信,指出如何进行宣传和如何在工会中进行工作^⑤。正确而完全有必要的是,我们现在要(从这里)派 10 名中国同志去满洲工作(收到你们的电报时,我们已经在这里通过市委和边区委招募了几名中国同志),但这还远远不够。最主要的是必须十分重视满洲的党组织。必须争取在满洲设立一个最有威望的中共中央机构,或者必须大力加强州委会,甚至设南满和北满两个委员会。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无

① 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各处应为:省委。

② 伯阳(即金伯阳——译者)。

③ 见第 174 页注①。

④ 附件没有找到。

⑤ 见第 169 页注④。

疑你们可以在莫斯科动员两三名受过我党教育的坚强的中国同志,并派他们到满洲去。我们可以从这里再给他们增派 10 名骨干人员(当然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但必须这样做)。加强哈尔滨和奉天的党委将对满洲的整个工作,特别是对我们建立和发展工会和工农反帝组织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这归根到底会在争夺对具有反帝民族革命战争性质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不久将译出一份由中国同志(米茨凯维奇和科米萨罗夫^①等人)编写的关于满洲形势的长篇材料,我将把它转寄给你^②。你可以看到满洲劳动群众所开展的巨大斗争的整个情景,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巨大弱点。要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问题,并争取派人到满洲去,同时允许我们向党组织提供建议和人员方面的帮助[……]^③

恳请以后不要把那些需要派到别处或者不在我们这里安排工作的人员派到这里来。派往上海的事很复杂,要把机会留给我们的工作所真正需要的人。

代问福京好

斯帝文森^④

全宗 534, 目录 4, 卷宗 415, 第 97—99、101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分别为盛忠亮和林伯渠。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以下删去与中国无关的内容。

④ Г. Н. 维经斯基。

65

中共中央给王明的电报^①

1932年7月24日^②于上海

致王明。急。四个月来我们一直没有收到钱。我们正处于十分窘迫的财政状况。在目前对苏维埃进行第四次“围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苏区的交通联系中断了,苏区本身需要经费,因此我们不可能得到苏区的财政援助。希望尽快寄钱来。不久前收到的1万美元用来救助努伦斯[夫妇]^③了,我们一点儿也没有剩下。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217a, 第 175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文件上有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的批注: 交王明同志阅, 并有王明的签字。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电报的日期。

③ Я. М. 鲁德尼克和 И. Н. 莫伊谢延科·韦利卡娅。

66

皮亚特尼茨基给佐尔格的电报

1932年7月25日于莫斯科

米哈伊尔^①致拉姆扎伊^②

据说您通过你们的机关^③收到2万美元，请将其中1万美元立即转给中国朋友^④。如果您只收到1万美元，那就将它们全部转给中国朋友，另外的1万美元，您很快就会收到。

全宗495，目录19，卷宗217a，第178页。

打字稿，原件。

①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② Р. 佐尔格。

③ 指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

④ 指中共党员。

6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264(B)号记录
(摘录)

1932 年 8 月 3 日于莫斯科

机密

听取:21(3747)。——关于给《中国论坛》^①的经费援助。

决定:21。——在鲁埃格[夫妇]^②的案子结束前,从 1932 年的备用基金中拨出 500[美元],资助《中国论坛》。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附录]

波波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第 21 项的附录

《中国论坛》[报]是在孙逸仙夫人^③和美国编辑加罗尔特·艾萨克斯领导下于 1932 年 1 月 15 日^④在上海出版的。

① 见第 135 页注①。

② Я. М. 鲁德尼克和 И. Н. 莫伊谢延科·韦利卡娅。此案即牛兰事件,从 1932 年 7 月 5 日至 10 月 14 日进行了审理。

③ 宋庆龄。

④ 原文如此。应为 1932 年 1 月 13 日。

按其内容来说,报纸倾向于反对在华的帝国主义,从道义上支持苏维埃中国并开展为释放鲁埃格及其妻子的运动。

近来,中国政府和美国领事^①方面因报纸的内容而加强了对它的严厉抨击。

在经费方面,报纸两次各得到 500 美元^②。

为使报纸有可能继续出版,鉴于即将审理鲁埃格及其妻子的案子^③,尤其有这个必要,极需再拨款 500 美元。

[19]32 年 8 月 1 日

波波夫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06,第 5—6、12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Э. 坎宁格。

② 原文如此。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记录判断,只得到一次。见第 41 号文件。

③ 原文如此。

6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265(B)号记录 (摘录)

1932年8月9日于莫斯科

机密

听取:15.(3765).——中共中央关于布勃诺娃和克留耶夫^①参加反革命组织的通知。

决定:15.——电告中共中央,我们同意对反革命分子采取最严厉的措施。至于布勃诺娃和克留耶夫,中央应该报告我们,有哪些具体事实说明他们参加了这一组织。(电报文本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密电处)^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① 分别为:庄东晓和潘家宸。

② 电报最终文本没有找到。见附录。

[附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 处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致政治委员会

在这里于[1932年]7月14日收到的电报中,中共中央通知说,在鄂西苏区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逮捕了许多农民。他们的领导人是克留耶夫和布勃诺娃。有一句没有准确解密出来的话中说,沃罗夫斯基^①参与了托派组织,克留耶夫和布勃诺娃与取消派^②和改组派^③有联系。但是这段电文也不清楚。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请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内容大致如下:

“请告知克留耶夫和布勃诺娃事件的详细情况,以及沃罗夫斯基和奥西波夫^④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对这件事暂不作出断然决定。”

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克留耶夫和布勃诺娃是很有名的人物,也是很老的党员。

从附上的鄂西苏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⑤中可以看出,他们曾同以梅塔洛夫^⑥为首的中共中央[分]局进行过政治斗争。党代表会议谴责了他们,但当时没有谈到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鉴于他们以往的工作还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搞反革命活动,我

① 黄平。

② 指托陈取消派。

③ 见第139页注⑨。

④ 朱务善。

⑤ 附件没有发表(全宗495,目录4,卷宗207,第11—12页)。

⑥ 夏曦。

们认为,事情需要作仔细调查。

1932年7月1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马季亚尔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07, 第 7、8、10 页。

记录为德文打字稿, 原件; 附件为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69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①

1932年8月16日于海参崴

绝密

致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副本送红色工会国际)2份

尊敬的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我认为很有必要跟您谈谈关于满洲的一些想法。不必再说该边区对于我们目前的工作具有何等巨大的意义。为不再更详细地来回顾这个问题，只需要列数一下涉及满洲的以下方面：从日本人占领满洲时开始，对苏战争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大了；上海事件^②以及南京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之间签订所谓“停战”协定^③以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革命派的基本策略就昭然若揭了：把全部力量一方面转向消灭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另一方面转向把满洲作为发动对苏战争的桥头堡。

然而，这一计划是在日本出现极其深刻危机的情况下实施的，在中国反帝运动进一步发展、红军取得节节胜利和满洲反帝斗争巨大高涨的条件下也有爆发土地革命的威胁。

满洲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首要目标，现在则成为准备日本内部爆炸的因素之一。因此很明显，日本帝国主义者现在正在作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米夫同志阅。把问题提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副本送C. A. 洛佐夫斯基。И. А. 米夫已于1932年9月9日看了文件。

② 见第108页注①。

③ 见《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文件汇编》，1933年莫斯科版第4卷，第131—133页。

出“英勇的”尝试,如何能尽快用火与剑控制这个国家。

但是,满洲的反帝革命运动正在日甚一日地发展。日本人不断在增加自己在东北三省的军队,目前已增加到四个师,还不算大量的预备队员。

整个满洲已被起义民众,主要是农民的运动所席卷。日本人守在铁路干线和松花江两岸,不能深入到国内。“满洲国”的武装力量(军队和警察)受广大劳动群众民族革命运动的影响而日益分化瓦解。满洲的工人、农民和劳动群众越来越清楚,除了通过武装斗争,没有别的出路可以摆脱受到日本空前压迫的处境。目前,对于满洲的群众来说,最流行和最有吸引力的口号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武装斗争。

在满洲大地上,同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武装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总人数不下几十万。这场斗争一刻也没有减弱。相反在日益加强。在日本势力范围的中心地区,即南满铁路和奉天——吉林铁路之间的奉天省^①,有农民队伍和游击队(“大刀会”)持续活动了几个月之久,而日本军队却无法对付他们。这些游击队现在已遍及 14 个县。大的县城通化已掌握在游击队手里,而其北面的城市磐石则掌握在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游击队手里。

在吉林省东部另一个重要地区,即接近朝鲜北部和我们滨海地区的所谓间岛地区,那里有 100 万朝鲜农民,由中国农民和朝鲜农民参加的游击运动正在日益发展。日本人调来了预备队,现在还在向这里调预备队,它们驻扎在边境附近(延吉和珲春地区),在疯狂备战。

最近一段时间,在中东铁路南部,长春和哈尔滨之间,游击运动也开始发展。所谓的义勇军运动具有越来越大的规模。它们的活动地区主要在奉天省的西南部。

^① 原文如此。

由此看来，几乎满洲的整个西部和间岛地区都有农民游击运动。

满洲的北部和东部仍处在老吉林军^①(马[占山]、丁超、李杜和王德林)的控制之下。由满洲军阀领导的老吉林军越来越受到方兴未艾的革命反帝运动的影响。将领们不得不考虑到广大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反日情绪，迄今为止他们仍在巧妙地应付，企图使自己的军队赋有民族革命色彩，以便保持住对反帝斗争的领导权，同时准备一旦革命运动发展成为反对本地地主、高利贷者、官吏和反动富农的斗争就将运动扑灭。近来，由于反帝运动的深入和农民游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将领们越来越难于应付，他们开始越来越公开地束缚运动，并准备镇压群众。根据张学良的指示，更确切地说是国民党的指示，在他们的军队中取消了政治部。只有王德林的军队有所例外，他没有服从这个指示。这是因为在他的地区(从穆棱站至边境站的中东铁路东部、珲春谷地和间岛地区)游击运动相当广泛，与他的军队有着直接联系，实际上越来越多地吞食这支军队(在占领初期，他的部队约有2000人，而现在已超过2万人。也就是说，他的军队靠起义农民的补充，增加了80%)。

以国民党和满洲军阀为代表的中国反革命派正在尽一切可能来阻挠反日斗争的深入，以保持自己对民众的影响。应该说，国民党在这个运动中的影响迄今为止仍然相当大。国民党的旗帜不仅在老吉林军队中，而且在许多游击队中仍在飘扬。国民党在日本占领满洲和拱手让出上海方面的叛卖行径还没有受到足够的揭露。

毫无疑问，满洲劳动群众对日本占领者的武器抵抗对于日本国内危机的加剧(顺便说一句，这是日本君主国统治集团之间直接

① 见第168页注①。

争斗的原因之一)仍起很大的作用,并使日本帝国主义者难以完成他们把满洲作为对苏战争桥头堡的任务。而且这种行动使日美矛盾越来越尖锐化,因为它促使美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只让日本占领满洲。

以上列举的这些原因可能更加推动日本帝国主义者采取对苏联的冒险步骤。

最近将出现的两个新的因素会对满洲的进一步斗争起到巨大的作用:因作战行动今年播种面积的严重不足和遍及北满广大地区的巨大洪灾。无疑随着秋天的到来满洲农村的斗争将深化。“有粮共吃”运动(农民到地主那里去,要求打开粮仓)必将具有残酷武装斗争的性质。中国的地主不仅会向老吉林部队将领们,而且也会向日本人寻求支援。地主和豪绅们会组织自己的民团,企图跟日本人和吉林的将领们一起解除农民的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在游击运动中谁的影响更大的问题,是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人和农民,还是像现在在多数情况下那样是地主和大富农——高利贷者,将对满洲的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这种情况和可能性,中共在满洲的党组织若是很强大,就能保证这场斗争取得对我们有利的结局。

但遗憾的是,必须承认我们党在满洲还有很大的弱点。

在整个满洲,仅仅有 2000 名党员。在奉天这样的大城市里,党员只有几十人。州委^①(哈尔滨州委和奉天州委)都很薄弱。县委会,即所谓的间岛和满洲东部的特别委员会,由于作战行动几乎与州委的领导完全断绝了联系。

革命的工会运动空前薄弱。在整个满洲,我们只有几百人,而在满洲有组织的工人则达 2 万之多。诚然,这些工人所参加的黄色工会和政府工会多半是上层的。这是今年 5 月份以前时期的信

^① 原文如此。

息。然而，我们党在满洲的政治影响要比关于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的组织状况的这些信息大得多。

最近两三个月，由于劳动群众反帝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高涨，我们党开始发展壮大。我们得到来自满洲东部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出，在老吉林部队和游击运动地区成立了党的组织，主要是在中东铁路干线（穆棱）和松花江下游一带。原有的党组织党员人数增加了，得到了加强，例如在延吉、宁安和琿春。党委会派了一些党员到游击队里去工作，但他们去那里以后，无人领导他们。根据他们出版的通告和小报可以看出，同志们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概念，他们提出的口号含糊不清。他们几乎不谈争取土地的斗争，不揭露国民党，不把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同反帝运动联系起来。武装群众的口号也实行得不够大胆和具体。

上面我提到我党的巨大政治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中共党员在反帝社团中和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各种同盟中的工作上。

综上所述，可以说目前在满洲有着非常有利的条件来发展共产党，扩大它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政治影响并从组织上加强这种影响。在正确的口号和正确的领导下，有可能把工人阶级迅速组织起来并领导它进行经济斗争，直接把这种斗争与国内的反帝运动联系起来。有可能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建立工人的骨干力量，并培养工人阶级来领导日渐成熟的反对帝国主义者们的民族革命战争。

为了能够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满洲所面临的这些任务，必须：
(1) 给满洲党组织提出在满洲民族革命战争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和政权问题）上的明确前景和方针，具体指出通过武装工人群众（把这个问题与经济斗争联系起来），通过给义勇军和游击队补充工人、贫雇农群众和掌握这些队伍领导权的途径来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建立工人骨干力量的工作方法。为此还必须指出要在老吉

林部队和新吉林部队^①中做工作；(2)立即毫不拖延地加强满洲的州委(哈尔滨、沈阳)，或许在东满，如在穆稜建立特委。我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首先是因为那里是老吉林部队的中心，是满洲与间岛的结合部，那里的游击运动在日益发展，而日本人打算从那里进攻滨海地区；其次是因为那里是东满大量工人群众的中心。上面我已指出，目前哈尔滨委员会与东满的联系被完全切断；(3)必须通过派遣成百上千名中国工人、受过我们远东边疆区理论和实践训练并经过考验的党员寻找帮助满洲组织的途径。我在提出这一点时，非常清楚在目前日本进行侵略的情况下实行这种措施的全部责任。然而，我以为，只要善于组织调遣和极其细致地挑选人员，这就不应给日本帝国主义者提供反对我们的任何理由。要知道，以前在我国领土上居住过的中国同志，现在既有在党组织中工作的，也有在游击队里工作的。当然，苏联不能为此承担责任。全部问题在于，在国外要使中共党员与我国领土上的组织或者某些俄国同志绝对不要有任何联系。而工作恰恰要这样来安排：中国同志到国外后不应与太平洋书记处，与任何人有任何联系。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第二条规则应该是，从这里派去的中国同志不要派到任何别的组织中去，而只能根据我们现有的相应接头地点派到党和工会组织中去。如果所有这一切都切实遵守，并极其仔细地工作，那就决不会出现任何“丑”闻。

最近，我们这里的处境非常糟糕。我们给哈尔滨州委关于革命工会运动问题的指示信^②得到了红色工会国际的同意，并且我们根据红色工会国际的指示准备了10名经过仔细审查的中共工人党员，经过相应的培训，打算逐步把他们派向东满，但在这之后，我们突然经贝尔加维诺夫同志接到指示说，莫斯科禁止派人到国

① 见第168页注②。

② 见第169页注④。

外去。现在不得不把人放走,以后要招募新的人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其实我们只是在不久前才与东满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派这些人去那里是要由这些组织安排做工会工作的。无须证明,由一些在我国经过几年实践和理论训练并非常了解要去的那个地方的情况的中国同志来组织工会,对于这个地区会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恳请您在接到这封信后立即给我作出指示,说明下一步怎么办。在革命运动正日益发展和我们当地领导如此出奇地软弱的情况下,我们实在不能拒绝派人去帮助满洲的党组织和工会。

亦请就整个问题给予答复。

致共产主义敬礼!

维经斯基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07, 第 22—30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7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①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2年9月20日于莫斯科

密电

上海

致业已到任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②

请通过[中共]中央了解一下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的指示。要特别注意工会工作。请告知您的印象和您的工作计划。请经常通报新的重要消息。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217a, 第 229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A. 埃韦特。

7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273(B)号记录 (摘录)

1932 年 9 月 21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34.(3882).——关于《中国论坛》^①。

决定:34.——(1)《中国论坛》杂志^②仍应出版。关于购买印刷厂一事应予否决。

(2)征询[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③的意见:出版杂志是否给党带来了好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13, 第 9—10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见第 135 页注①。

② 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各处应为:报纸。

③ A. 埃韦特。

72

琼森给维经斯基的信

(摘录)

1932年9月28日^①于莫斯科

绝密

致海参崴太平洋书记处

亲爱的史蒂文斯同志^②：

1. 我们很满意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海参崴局已有力地着手开展我们在满洲的工作。请告知,你们局在给满洲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③支持者的信^④中所阐述的任务已贯彻到什么程度和在如何贯彻,以及我们在满洲的运动中有什么新情况。

我们认为,非常认真地注意搜集关于满洲工人运动的信息并在你们出版的《太平洋书记处通报》^⑤上作出相应的报道,这样做是很合适的。其次,也是主要的,是根据这些信息(口头的和书面的信息)把我们对满洲同志们的建议更加具体化。

你们做得很好,你们已着手为满洲培养和派遣工会工作者。不要把远东边疆区的日本和国民党间谍所比较熟悉的中国同志派到满洲去工作,因为他们会暴露,并会暴露在当地工作的其他同志。

① 太平洋书记处海参崴局收到信的日期是1932年10月8日。

② Г. Б. 维经斯基。

③ 此处和以下各处均指中华全国总工会。

④ 见第169页注④。

⑤ 1932年至1933年在海参崴出版。

我们不知道,你们为满洲所组织的出版工作(传单、标语、小册子等)已有多大进展,也就是说,除了《中国太平洋工人》^①我们从未从海参崴局收到任何中文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海参崴局与上海是否有联系,是否与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至少就主要问题)协调工作。如果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或无法做到这一步,那么我们建议太平洋书记处海参崴局通过我们发信给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这件事需要立即办[……]^②

向太平洋书记处全体同志致共产主义敬礼!

你的琼森

全宗 534, 目录 4, 卷宗 412, 第 96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太平洋工人》杂志于 1930 年至 1933 年在海参崴出版。

② 以下删去与中国无关的内容。

73

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2年9月30日^②于瑞金

中央苏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2年]9月29日收到你们的指示电^③

1. 目前在北部战役中我们消灭了乐安和宜黄的敌人。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但在宜黄胜利后分散了部队,这是很大的错误。结果我们未能消灭从西面来的陈[诚]、罗[卓英]和吴[奇伟]增援部队,并遭到他们的攻击。随后,我们的部队集结在一起,撤退到[中央]苏区,受到一些损失。

2. 我们的红军撤退到宁都休整。目前在江西有以下敌部:吉安的第11师,吉水的第14师,永丰的第13师,乐安的第90师,宜黄的孙连仲和第5师的一个旅,还有抚州的另一个旅;许克祥、毛炳文和李云杰[指挥]的三个师[驻扎]在南城到南丰一带,第52师在吉安附近;处在敌军两翼的陈[诚]部和罗[卓英]部妨碍进行[作战]行动并与处在赣江西岸的红军第16军和第8军有交火。

3. 我们的战线^④采取了以下计划:考虑到目前敌人依靠战略

① 电报译文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发往莫斯科。文件上有批注:送米夫、克诺林、王明阅。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已阅。

② 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32年10月12日至16日收到电报。

③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531页。

④ 原文如此。指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委员。

据点先向湘鄂赣交界区以及赣东北苏区进攻,并准备大规模地进攻中央苏区,红军在准备作战时,必须以师为单位分散驻扎在国统区,深入到乐安、宜黄和南丰之间二百里^①,以便进行群众工作,准备好战场等等^②。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不同意这个计划^③之后,又补充了一点,一旦敌第5师返回赣东北,红军就向宜黄进攻^④。换句话说,分散兵力的最初计划仍将有效,并被认为是积极进攻的计划。

4. [中共苏区]中央局一贯反对这种分散兵力的计划,并认为这里存在着对目前形势估计不足,红军不明白在宜黄以西分散兵力的错误。根据中央局的意见,如果第5师返回赣东北,红军就应该立即开始向乐安的敌部进攻,使他们来不及做好作战的准备。然后必须消灭南丰的敌人,以及从西边进犯的敌部,以便打击敌人的最薄弱处,创造新的形势。如果不可能向乐安进攻,那就应该坚决攻打宜黄。占领宜黄后,就应反击从西边来的敌部,以避免落入包围圈的危险。或者应该从南丰和乐安向国统区挺进,给各地的敌人以打击,使各地忙于作战,而红军则利用一切机会来消灭各部敌人。

我们坚决反对分散我们的兵力去做群众工作。这使敌人有可能向我们进攻,招致红军的失败,导致重犯[以前]在宜黄所犯的错误。何况这种分散兵力的做法意味着只是在敌人全面进攻时才开始作战,这就不是旨在与其他苏区联成一片的进攻方针。这个计

① 中国长度单位,约等于0.576公里。

② 见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1932年9月23日给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中央的电报(《周恩来军事文选》1998年北京版第1卷,第183—185页)。

③ 指苏区中央局1932年9月25日给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的电报。见《任弼时年谱》1993年北京版,第190—191页。

④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1932年9月25日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189—191页。

划的实施将是一大错误,并将造成更大的困难。然而,前线的同志们坚持分散兵力的计划,认为这是积极进攻的策略。

5. 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他的扩大苏区到……^①东部^②山区的机会主义路线仍在继续,他常常试图加以实施,忽视党的领导,而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而不是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虽然莫斯克文同志^③在那里,但他实际上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活动。因此,我们在上一封信中指出了我们领导工作中的困难^④。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的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后方[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工作。

6. 中央局四位委员——布林斯基^⑤、顾作霖、邓发和项英今天^⑥出发去前线召开中央局全会^⑦,会上将讨论[中共]中央的指示,并解决前线与中央局之间的争论问题以及前线在组织问题上的争执。我们坚信,[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希望中央在上述诸问题上给予[新的]指示。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217a, 第 248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指赣东山区。

③ 周恩来。

④ 可能是指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信, 标明日期为 1932 年 8 月上旬。见《任弼时年谱》, 第 187 页。

⑤ 任弼时。

⑥ 1932 年 9 月 30 日, 见《任弼时年谱》, 见第 193 页。

⑦ 指 1932 年 10 月上旬在宁都举行的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 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 第 528—531 页。

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①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2年10月3日于莫斯科

上海

致中共中央

答[19]32年9月27日第106号电^②：

鉴于王明很快返回，你们不认为派赵容作为你们的代表是合适的吗？请速告你们的意见。请说明能否派伊思美洛夫去苏区或者至少保证他在上海的安全。克雷莫夫学业尚未结束，我们派李维汉、罗季丰(音)^③等人去取代他担任这项工作。

东方书记处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235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电报上告知，中共中央很大一部分机关人员处于危险境地，赵容(康生)和伊思美洛夫(张闻天)特别受到威胁。电报中还请求立即调克雷莫夫(郭绍棠)回中国(见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233 页)。

③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75

中共中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①

1932年10月7日^②于上海。

你们^③应该弄清楚以下问题：

(1)目前的形势要求我们依靠现在的根据地，采取强有力的防御措施，同时准备进行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战，消灭尽可能多的敌军，争取敌军广大的动摇与失望的士兵群众，以及居民群众，扩大苏区，与其他红军部队建立联系。这种积极进攻的路线，是最有力的防御方法。重复去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我们无法扩大和巩固苏区政权。因此，我们必须向毛泽东及其纯防御战术的拥护者指出，他们没有充分看到国内力量对比有利于革命的巨大变化，以及南京政府的进一步削弱，这是因为满洲游击战在发展，军阀战争与国民党内部冲突在增加，经济危机扩大，结果国统区群众性罢工斗争与农民暴动高涨，特别是国统区中党的力量、影响和积极性增强了。

-
- ① 电报英文稿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发往莫斯科的。文件上有批注：送曼努伊尔斯基、米夫同志。亦送别尔津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П. 米夫[1932年]10月22日。电报中文稿(发表时)与英文稿有所不同，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542—544页。
- ② 日期是根据第76号文件确定的。在中国发表的电报文本上错误地定为1932年11月上旬(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542、544页)。共产国际收到电报是在1932年10月16日、19日和20日。
- ③ 电报中文稿上是“我们”，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542页。

(2)根据这个路线,我们应该清楚了解第四次“反苏维埃战争”^①中的力量对比。虽然南京政府在政治上削弱了,它的军队中士气低下,充满了不满,但我们不应忽视,他们得到帝国主义者极为重要的帮助,在数量上与武力上要比我们强大得多。

存在着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的很大危险,红军中保留着有害的游击主义残余,如表现在轻视军事战略的作用上,这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与苏区土地之丧失。但主要危险是过高估计和夸大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是纯防御路线。

(3)我们认为,蒋介石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对江西的大举进攻,但他正在加速这一准备,其主要进攻方向,看来是由江口向丰城推进^②。

我们须采取一切方法来阻止敌人。我们必须集中部队给敌人最薄弱地点以最有力的打击,同时在别的地方以有效的方法发展和布置我们的部队,来创造更广大的防线,击破敌人的进攻,消灭与解除敌人的武装。必须在其他地区组织诱敌战,去阻止敌人,使其不能集中大的力量来进攻我们。我们应该时刻保证可能后撤的路线。

(4)进攻的时间和方向,可以由你们自己决定,只是此前要仔细研究各种条件和进行必要的准备。

至于与毛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再重复一遍:请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要在党内、红军内和群众中宣传积极的路线^③。争取党和红军中的干部,使他们相信纯防御

①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② 原文如此。中文稿上是:“在吉樟之间”。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543页。

③ 中文稿上是:“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543页。

路线的错误和危险,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①。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②,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目前采取这一步骤,会给红军和政府造成严重的后果。要保证领导的一致。这是斗争成功的前提。速发给我们补充信息,不要等到[一切]事实既成之后^③。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253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中文稿上是：“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② 在苏区中央局 1932 年 9 月 3 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告知,打算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让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工作(见第 73 号文件)。

③ 中文稿上为：“勿使我们处于是已成事实的后面”。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544 页。

76

埃韦特^①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②

1932年10月8日于上海

通过信使

皮亚特尼查^③：

还没过多久又要向您报告明确的具体情况了。此外，在组织同我们这里的朋友们的会议时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尽管人数不多，但不能立即与所有人一起召开会议和讨论，而只能与一个或两个同志交谈，这件事不仅给工作造成困难，而且不大可能说清各种倾向、意见分歧，等等。

1. 给我的印象是，我们这里的朋友们对工作认真而努力的。但还有很大的缺点。对政治事件作出反应不够，过于迟缓（参加反日抵制运动和组织广泛的反帝战线过于迟缓和过于软弱；不善于也未能在[1932年]9月18日即满洲被占领一周年时把群众引上街头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对制定苏区正确政策的领导不够坚决，部分原因只能说是联络不能令人满意；在上海以外地区、在一些大城市和重要地区，发展党的工作努力不够；在采取重大步骤来组织我们的工会时表现得有些“谨慎”，对罢工斗争领导不够；

① 报告人是根据第90号文件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送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瓦西里耶夫、库西宁、洛佐夫斯基、别尔津、青年共产国际、萨发罗夫、王明、马季亚尔、И. 米夫。[1932年]11月13日。

③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迄今刚刚开始开展失业者运动和组织一月份失业者日活动)。除此以外,尽管已多年实行恐怖,但在保密问题上还表现出很不小心谨慎,刚不久前党的军事工作领导人被捕^①。计划被取消,关于部队和游击队人数的情报、敌军(特别是19路军)中联系人的地址被停用。

另一方面,也取得一些成绩。征收党员运动将继续进行。在上海,党员人数已增加一倍(有150个支部、3000名党员)。在组织赤色工会方面正采取重大步骤(成立纺织业工人工会,准备在上海把烟草工人和铁路员工组织起来,已提出成立上海码头工人工会的问题)。

最近,我们将借助于学生,着手在其他重要城市进行积极而有计划的工作。

2. 对我们的第四次“围剿”。企图在湖北地区消灭我们的力量没有得逞。我们和主力部队一起成功地突破了包围。最近我们又取得了一些战绩(夺取了新洲)。但这方面的问题依然严重,原因如下:我们的损失相当大。我们的很大一部分部队被打散,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聚集起来。据现有报告,我们部队的人数从2万缩减到6000。在一些暂时被白军占领的地区,我们的苏维埃组织被消灭了,如同我们的部队被驱散一样,迫使我们采取较低级的游击斗争方式。

蒋介石大力“吹嘘”自己的战绩,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也害怕离开自己的基地进行远距离追击。把土地归还给原先的所有者将进一步削弱国民党。许多富农怕返回自己的地方。目前出现一个问题:敌人的下一步打击在什么时候和向什么地方,我们如何进行反击。

^① 何人不知。

三个星期以前，召开了白军将领会议^①。公开宣布，下一步进攻目标是江西的红军主力。

关于我们的策略问题在江西省的领导中引起了重大意见分歧。毛泽东主张防御策略，反对目前发动任何攻势。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他建议撤退到山区去。

江西党的领导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实行进攻策略，我们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了保证对敌人进攻的反击，必须撤销毛泽东前线总指挥的职务，对他进行公开批评并谴责他的错误立场。只有在这些决议通过后，才能告知这里的中央。

这里的中央主张进攻策略，但反对撤销和公开批评[毛泽东]([1932年]10月7日交换的电报你们已经收到^②)。

[3]我的意见是：(1)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总方针是错误的(过分强调防御的有效性，躲到山区去等等，幻想在现有基础上似乎有可能从经济上得到加强，尽管目前存在着15万甚至更多白军的进攻威胁，同时怀疑进攻的能力，等等)。

(2)江西领导采取进攻策略的政治方针是正确的。必须保证对这一方针的普遍承认。必须说服毛泽东相信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并尽可能地采取和善的方式。

(3)在这方面，看来没有进行任何尝试。在[事先]未做准备和未告知我们的情况下，做出了撤销职务和公开批评的决定。不用说，对问题的这种态度在目前会向敌人暴露我们的弱点，不用尽所有其他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认真做准备[更不用说得到您的同意]，是不能作出这种决定的。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所以我们反

^① 原文如此。显然是指1932年6月12日至15日在蒋介石领导下于庐山召开的五省“剿共”政治部的会议。

^② 见第75号文件。

对决定的这一部分。要求消除领导机关中的意见分歧,反对目前撤销毛泽东的职务。我们要使他改变观点。

4. 如果我们试图由此来干预军事行动的领导,甚至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做缺乏一切前提条件,而且由此进行干预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我认为,必须进行认真的准备来反击白军的进攻。没有进攻的策略方针,也就不可能有积极的防御。我们这里的朋友们^①认为,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在近期内给敌人一个沉重打击以取得局部的胜利,可能有助于大规模地瓦解白军的一系列兵团。但如果让敌人不经战斗继续修筑道路和工事,那么我们在防御时就会陷入敌人的后方,就不能从防御转入进攻。

因此我将建议:积极准备防御,以便在最近对我们有利的时机转入进攻,相应地,如果白军方面很快向我们进攻,那么我们要善于由防御转入对敌人的反攻。同时应该在其他领域开展破坏活动。选择时机和方向应是当地领导的事。

5. 关于转向广大群众的问题,必须看作是加强苏区的重要部分。一方面,同反革命和一切有组织的反革命团体和派别进行最残酷的斗争,另一方面,形势(不仅是苏区的经济落后,而首先是白军对它们的封锁和战争)要求对中农、小手工业者等等作出一定的让步。这些让步应该有助于建立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反对白军的最广泛统一战线,有助于提高我们在斗争中特别需要的一些产品的产量。这就要求采取强硬手段来巩固工人和半无产者的一切成就。但同时也应该创造可能性(考虑到工人們的善意,支付较高的报酬等),在生产某些东西(武器和弹药、军服、某些器具等)时进行加班加点的工作。其次必须对公用事业和社会性工作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制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劳力不足控制在一定

^① 指中共中央委员们。

范围内。过分机械地贯彻劳动法中关于学徒工的条款，导致手工业者在有技能的领域停止安置帮手，结果是，今天就可以感觉到最重要行业的熟练工人十分缺乏。通过加强清一色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干部，同时又吸收半无产者阶层加入工会的办法来把苏区的工会变成[真正]工人组织的情况也是如此。不使用雇佣劳动的小手工业者也可以加入工会。必须禁止剥削他人劳动力的剥削者入会。今天我们这里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半无产者分子的宗派主义方针和对剥削者的机会主义态度，这取决于当地的条件。当然，比例起着很大的作用。

建立小手工业者劳动组合的问题几乎还没有着手研究。给小农提供一定信贷帮助的问题也起着很大作用。

在今天，这是从各个方面来加强我们的战线的实际内政措施。我们要求党执行这些任务。苏区青年代表会议也要讨论这些问题（当然还有其他问题）^①。我知道，您收到这封信时，有些问题已经过时了。但由于这些问题以后还会存在，所以我认为向您谈一谈我的意见是合适的。

关于李顿[委员会]的报告^②问题：寄上我[19]32年10月4日代表[中央]给党写的信的副本，以及就开展反对这个报告的运动提出的建议^③。在这封信中阐述了我们的方针。党已经具体贯彻了一些建议。立即发表了呼吁书^④，召开了群众大会，我们在整个工作中也将广泛利用这个报告。信是在报告发表后立即写成的，只确定了一些最重要的任务，以及在目前形势下的斗争方针。

① 关于召开代表会议的资料没有找到。

② 见第174页注①。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498—501页。

我将通过另一个渠道^①经常简要地向您报告最重要的事件，
并请您也通过提出建议和作出指示的方式给予支持。

代行职务者^②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07, 第 49a—50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① 即通过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

② 原文如此。

7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第 278(B)号记录
(摘录)

1932 年 10 月 15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30. (3987).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因在中国屡遭逮捕将[中共]中央从上海迁至苏区的建议^①。

决定:30. ——暂时不作出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和组织部应再一次认真地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

听取:32. (3989). ——关于孙逸仙夫人^②请求允许她在赴欧途中在莫斯科停留以庆祝十月革命十五周年(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密电处电报^③)。

决定:32. ——满足请求。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曼努伊尔斯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17, 第 9—10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宋庆龄。

③ 文件没有找到。

78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2年10月16日^②于上海

我们和你们的代表^③认为,为了帮助中央苏区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并消除那里的冲突,应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去那里一段时间以督察他们的工作。伊思美洛夫和波戈列洛夫^④表示愿意前往。你们是否同意,请答复^⑤。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217a, 第 247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
- ① 发报人是根据第 79 号文件确定的。文件上有王明的签字和 П. А. 米夫的批注: 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П. 米夫[19]32 年 10 月 17 日。
-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电报的日期。
- ③ А. 埃韦特。
- ④ 分别为: 张闻天和秦邦宪。
- ⑤ 见第 79 号文件。

7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2年10月27日于莫斯科

密电

上海中央

请详细告知中央苏区的意见分歧。我们一无所知，因此不可能对派政治局委员去那里的事^②表示意见。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294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发报人和日期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确定的（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18，第 5 页）。

② 见第 78 号文件。

80

王明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932年11月2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①

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请求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帮助我们解决以下对于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1)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②向我们提出了联合苏区和进一步加强红军的任务^③。这样做的必要性是毫无疑义的。但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动进攻,应该掌握哪些中心城市和如何持续进行下去,以便解决把单独的苏区联合起来,把分散作战的红军部队联合起来和开展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活动的任务。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既要考虑到国际形势,也要考虑到国内局势,还要有军事战备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其次,在发动进攻时,应该寻找这样的方向,使我们既能保持住新占领的领土又能避免过早地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瓦西里耶夫同志。

② 见第132页注③。

③ 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33年版第3卷,第175页。

与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力量发生冲突。而这就是说,最初实行进攻的方向要在帝国主义者的力量最不集中和它们的武装干涉最不易进行的地方。

关于进一步扩大苏区的方向问题,现在在中国领导同志中间引起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主张(以师为单位)所谓把我们的武装力量分散在国民党地区的计划,等待敌人的进攻并在居民中进行群众工作。而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大部分委员把毛泽东的策略称为防御性策略,担心重犯去冬的错误,即红军失去良机,没有利用业已取得的胜利,没有展开广泛的进攻,因此主张较为积极的进攻策略^①。

对此问题,中共需要并期待着你们的指示。

(2)关于中共在满洲的工作问题。中共在满洲的总的政治和策略任务已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所确定^②。现在的问题是具体如何执行这些任务。除了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干部外,主要的困难还在于中共中央几乎没有能力领导满洲的工作,而满洲党委则没有能力同各地方组织进行联系和对它们进行日常领导。因此需要联共(布)在建立联系方面和在派遣在远东工作的合适同志方面给予帮助。

(3)关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问题。根据一般政治上的考虑和由于骇人听闻的恐怖,党的领导中心几乎没有可能在上海存在,因此提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党在上海的机构并将中央迁往中央苏区的问题。

(4)关于派中国飞行员去苏区的问题。中国红军的主要军事技术弱点之一是没有航空部队。据一些信息说,红军从敌人那里缴获了12架飞机。但那里没有飞行员和机械师,不能利用这些飞

^① 见第79号文件。

^② 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速记记录》,第3卷,第168页。

机。在苏联领土上有中国的飞行员和机械师。中共中央已几次向联共(布)中央提出请求,派一些中国共产党员飞行员到中国中央苏区来^①,但迄今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以上就是我受中共中央委托向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提出的问题。我只是提出这些问题,没有阐述赞成或反对这样或那样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所有理由,希望我能有机会口头上更详细和更全面地向你们说明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

请尽快将这些问题提交讨论并让斯大林同志参与解决这些问题。致

布尔什维克式的敬礼!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 王明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575,第 5—7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秘密会议第 153(B)号记录 (摘录)

1932 年 11 月 10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4. (808). —— 缪岑贝格同志关于向满洲派特别委员会和在上海召开反帝大会的信^①。

决定:4. —— 总体上采纳缪岑贝格同志的意见。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反战委员会具体拟订这个问题,如果它认为有必要,也可邀请缪岑贝格同志到莫斯科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曼努伊尔斯基

全宗 495, 目录 3, 卷宗 343, 第 1—2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文件没有找到。这里指远东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大会于 1933 年 9 月 30 日在上海举行。详见《中国论坛》, 1933 年 10 月 4 日上海第 2 卷第 11 号, 第 1—9 页;《远东反战反法西斯蒂大会会刊》, 上海 1934 年版, 第 83、197 号文件。

82

中共中央^①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②

(摘录)

1932年11月11日^③于上海

[中共苏区]中央局举行了[全体]会议^④,并同意中共中央的指示^⑤。莫斯克文^⑥负责前线的一切军事问题,毛泽东因病已回到后方[……]^⑦。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276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 ② 文件上有批注:送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米夫同志、王明;有 П. А. 米夫、Л. И. 马季亚尔和王明的签名;还有批注:已送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同志。
 - 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电报的日期。
 - ④ 见第 210 页注⑦。
 - ⑤ 见第 75 号文件。
 - ⑥ 周恩来。
 - ⑦ 以下删去关于中国红军作战行动的未经校订的内容。

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第 282(B)号记录

(摘录)

1932年11月15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7. (4067). ——关于汪精卫的出访^①。

决定:7. ——责成马尔蒂、萨发罗夫和王明同志就汪精卫出访一事起草给德共、法共和格尔穆特^②的电报,要求组织抗议中国白色恐怖的运动,并把它与鲁埃格审判案^③联系起来(电文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密电处^④)。

责成马尔蒂和杜克洛同志为《人道报》写一篇文章^⑤。

听取:11. (4071). ——贝拉·库恩关于给远东反战大会指示^⑥的建议。

决定:11. ——中国、日本、朝鲜和满洲的代表应该参加上海的大会。

① 汪精卫于1932年10月21日赴德国“治病”并于1933年3月14日回到中国。关于汪精卫出访的原因见张同新:《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哈尔滨1988年版,第49—56页。

② Г. 季米特洛夫。

③ 见第192页注②。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安德烈·马尔蒂:《欧洲上空飞来的一只不祥鸟》,载1932年12月11日《人道报》。

⑥ 见附录。指远东反战反法西斯大会(见第227页注①)。

至于印度和菲律宾的代表,应该邀请他们参加,但只能在可以保证有权威代表权的情况下。

同意冈野进同志^①关于成立内部委员会来领导大会筹备工作的意见。

责成贝拉·库恩同志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一起最终审定指示信,并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委员的飞行表决批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曼努伊尔斯基

[附录]

对远东反战大会的指示 机密

1. 远东反战委员会的行动将以在上海(必要时在澳门或马尼拉)召开国际会议的形式进行,大约在1933年3月中旬举行^②。会议将由一个派往满洲的由欧洲著名作家组成的委员会来筹备。

2. 召开会议的动议将由国际[反战]委员会[巴黎]以发号召书的方式提出。该号召书将在执行局第一次会议上通过(斯特拉斯堡,1932年12月^③)。这个动议将得到宋庆龄领导下的上海筹备委员会的支持……^④为了加强该委员会将派去……

3. 斯特拉斯堡执行局会议的号召书应包含以下口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反对与帝国主义勾结。反对国联和与国联勾结。反对旨在镇压群众的经济斗争、反帝防御斗争

① 野坂参三。

② 大会于1933年9月30日举行。

③ 国际反战委员会执行局扩大会议于1932年12月21日至24日在巴黎举行。

④ 此处和以下各处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及其社会意向的白色恐怖。支持反帝革命斗争。

4. 会议的主题是中日冲突。远东国家中参加的将有：中国与“满洲”、日本和朝鲜。

(方案：讨论整个太平洋战争问题，吸收所有有关国家参加，包括印度在内)。

5. 派往满洲的委员会将由欧美著名作家组成。人选是：德莱塞、辛克莱、巴比塞、纪德、舍伊纳赫将军、彼尔西乌斯上尉等人……

其中一位同志将以秘书的身份担任委员会内的组织工作。

委员会大约于1933年2月前往满洲，其路线有待拟订。

6. 如同阿姆斯特丹会议^①一样，参加会议的应有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以及在群众大会上和部队中选出的代表等。务必保证直接从日本来的代表参加会议，即使他们只能在半合法的基础上前来，并在会上讲话。

7. 必须注意使会议按其性质成为非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活动。参加的依据应是国际委员会^②的号召。不容许机械地从组织上排斥不受欢迎的人(陈独秀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可能还有印度国大党代表和罗易的支持者)。在这类代表可能到达的地方，要以来自这些国家的精明强干的代表的行动来抵消他们的活动。在会议上必须跟他们的论点进行公开的思想斗争。

8. 需要对其加以组织和同其举行会议的人物和团体如下：

欧洲(除前往满洲的代表外)：各大国[反战]委员会代表，在华的外国记者(史沫特莱等)。

苏联：远东的著名作家(特列季亚科夫、皮利尼亚科夫^③……)。

① 指1932年8月27日至29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反战大会。

② 指1932年成立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委员会。

③ 原文如此，应为：皮利尼亚克。

中国:单个人士(见单独名单^①)。

所有反帝组织的代表。

大企业的代表。

在中共各重要地区举行的群众大会的代表。

苏区的代表。

满洲各重要地区的代表

游击队的代表。

[在中国开展筹备和选举代表活动期间,必须首先争取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具有强有力的代表资格。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必须阐明邀请信上没有提到或者简单阐述的要点和要求(赞成进行革命解放战争、反对国民党卖国行径等等)。中共面临的任务是利用这次活动开展广泛的合法或半合法的群众工作。]

日本:单个人士(见单独名单^②)。

农民协会、东京电车工人工会、合作社员工会、失业者同盟、建筑工人工会的代表。

大企业的代表。

(在日本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必须成立日本反战委员会。在上海会议开幕前,那些不能去上海的日本代表应召开日本反战会议,与上海会议互致贺电。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指示另发)。

朝鲜:左翼作家。革命侨民,民族革命者团体。

9. 经费开支:会议和远东代表们的经费开支应靠募集当地的资金来解决。只对满洲委员会和欧洲其他必要的代表团给予资助。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21, 第 5—6、8—9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名单没有找到。

② 名单没有找到。

84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32年11月21日^①于上海

亚洲人^②已到达上海。他是为布兰德勒派工作的，并用比佐尔特笔名为德国右翼报纸写文章^③。第70号(库尔特)^④。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217a, 第 281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电报的日期。

② Г. 缪勒。

③ 文章没有找到。

④ H. H. 格伯特。文件上有皮亚特尼茨基的批注：“送米夫同志。怎么回事？”并有 П. А. 米夫的答复：布兰德勒没有跟我商量过亚洲人这次外出的事。П. 米夫。
[1932年]11月23日。

85

多尔夫给萨发罗夫的信

1932年11月25日于塔什干

秘密

萨发罗夫同志：

在确定新疆正在发展的革命运动的口号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帝国主义者试图利用民族运动达到武装干涉的目的；
- (2) 封建宗教上层企图控制民族运动，领导这个运动，提出一些宗教的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口号以及民族沙文主义的口号，挑动民族与民族相互之间的仇恨，同时保持封建奴隶制剥削的整个体制不受触动；
- (3) 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充当封建领导的尾巴；
- (4) 新疆目前没有能够领导运动的革命政党；
- (5) 目前称得上的主要民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满族、东干族、吉尔吉斯族——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
- (6) 近年来在劳动群众状况不断恶化和封建奴隶制剥削不断加强的基础上土地冲突在增多。

首先必须提出建立领导整个民族运动的人民革命党的问题。

口号：

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地主的压迫。

政权归劳动者。

争取成立各少数民族享有广泛自治权的人民联邦共和国。

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苏维埃中国和中华民国境内一切革命组织结成联盟。

对东干人提出与甘肃革命运动联合起来的口号。

土地要求：

废除劳动农民对高利贷者和剥削分子的一切债务。

取消一切捐税和劳役。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没收所有地主和官吏的土地，将它分配给劳动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

根据农民大会的决定没收教会和瓦库夫^①的土地。

一切水利(灌溉)系统、牧场和饮水设施收归国有。

没收大封建主、官吏、高利贷者和大商人的财产。

没收大封建主、官吏、高利贷者和大商人的牲畜，将它们分给劳动牧民。

为城市劳动者提出：

降低房租。

实行8小时工作日。

实行劳动法。

废除对高利贷者和剥削者的债务。无偿地归还当铺里典当的财物。

靠没收地主、大商人、投机倒把者和高利贷者的粮食储备来救济饥民。

调整价格。

对于富农：

在严厉镇压发动反革命行动的一切图谋的同时，使之保持

① 瓦库夫、瓦克夫(阿拉伯语)，指穆斯林国家中通常以捐赠或遗赠的形式给清真寺以及学校或慈善团体的不动产。

中立。

对于喇嘛：

暂时利用一些愿意帮助革命运动的汗；从肉体上消灭那些拼命反对革命运动并有背叛民族利益污点的汗；使其余的汗保持中立。

多尔夫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07, 第 55 页及其背面。

打字稿, 副本。

86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满洲形势的报告

(摘录)

1932年11月28日于莫斯科

秘密

王明同志在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①

同志们：满洲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阐述这个问题，我们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首先，我们缺少党内方面的材料。我们有的党内材料大约只是今年5月份的。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占领满洲我们不可能得到全面的材料。因此，在今天的报告中我只能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这就是我们情报部门的材料和外国资产阶级

① 报告重新修改后以文章的形式发表。见王明《关于满洲形势和日本对华新的进攻》，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3年第4—5期，第8,17页；这里刊载的是关于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状况报告中的基本上没有收入文章或作了大量删节的部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1932年12月2日会议上讨论王明的报告（会议速记记录没有找到）后，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于1932年12月5日作出决定成立由王明、B. Я. 阿瓦林（阿博尔京）、B. E. 瑟索耶夫、郭绍棠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在王明的报告和讨论的基础上起草关于满洲问题的信（见全宗495，目录154，卷宗466，第110页）。委员会起草的信的初稿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1933年1月2日的会议上进行了审议，会议责成原委员会吸收Г. H. 维经斯基参加，根据讨论的情况和提出的意见重新加工提交的信稿（见全宗495，目录154，卷宗502，第1页），亦见第99、143号文件。

报刊的材料[……]①。

现在我来讲一讲我们的红色游击队。我们的红色游击队还远远不是满洲游击运动的决定性的和主要的力量。迄今为止还没有这种力量。根据各种情报,我们已有在穆……②、琿春等县有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情报,大约只有4000人。

有一些共产党员在王[德林]、马[占山]等的某些部队里工作。但是,我们的基层支部和政治机关至今还不起独立的政治作用。满洲的游击运动现在处境艰难。这种状况是由于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的革命领导造成的。在南满和马[占山]等部队中的大多数士兵至今还处在国民党的影响之下。而这些部队的领导人在相应的条件下往往准备出卖自己的基层部队。

这些游击队的物质状况很艰苦。他们得不到粮食、军人装备等方面的及时援助。不仅在外满而且在内满③都是这种情况。因此,不仅老吉林部队掠夺居民,而且甚至有些游击队也不得不采取这种掠夺手段。

此外,我们的党组织不仅在自己的游击运动中没有起到领导作用,而且在其他游击部队中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因此,现在满洲的游击运动面临着很大的危险,危险就在于,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领导状况,游击队的物质状况还是这样,那么这些队伍必然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攻下崩溃瓦解。这是跟中国国内问题密切联系着的。众所周知,日本自始至终都不满足于只占领满洲的计划,它企图把自己的行动扩展到中国,首先是到华北,然后到湖北、广州等地。据最近消息,我们可以看到,……④

① 以下删去报告中关于满洲经济和政治形势以及非共产主义游击组织的部分。

② 原文如此。可能是穆棱。

③ 原文如此。

④ 何人不知。

急于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他的政策是否会成功,这一点后面再说,蒋介石现在也公然倾向于向日本投降。整个这种情况无疑影响到满洲的游击运动。因此,满洲的命运、满洲游击运动的命运和抗日运动的命运现在都将通过所有这些力量的直接冲突来决定。要看哪个阶级将取得对满洲游击运动的领导。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即国民党将以自己的影响控制这些部队,如果这些部队将处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那么这就是失败的前景。相反,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能够掌握这一事业的领导权,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为广泛发展满洲的游击运动和把满洲的革命运动进一步提到更高的水平,即在满洲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准备条件。

在现阶段,首先应该解决领导权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对满洲党的工作做一些检查。共产国际和我们党中央在满洲问题上的总的策略方针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反对人民革命^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的独立自主。我们主张武装抵抗满洲的日本帝国主义。至于我们现在应该实行的策略方针,那就是在满洲建立广泛的反日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此外,我们应该指望进一步的阶级分化,以便为进一步发展满洲的革命运动准备条件。正是从政治委员会和东方部^②的这一策略方针出发,以及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的决议^③,应该制定在满洲的基本策略路线和基本策略任务。这些任务你们大家都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我们党内大家都正确理解这些任务。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最初就是在我们党中央对满洲政权的性质也没有足够的认

① 指国民党的国民革命。

② 原文如此。应为:东方书记处。

③ 见 П. 米夫主编:《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以中国为例)》,莫斯科 1934 年版,第 316—321 页。

识。那时我们党提出了在满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根据这一点,提出了我们过去在华南和华中提出的口号,即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后来与共产国际商量这一问题后,中央改变了自己的错误策略,拟订了共产国际所指出的正确的策略方针,正确的口号和任务。

然而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在满洲和其他党组织内还存在着在满洲问题上的右的和“左”的倾向。直到现在有的地方还在讨论,现在在满洲是否要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在湖北的一部分组织中还存在右的取消主义情绪。它们把满洲的游击运动看作是反革命性质的运动,是土匪性质的运动,是没有前途的运动。我党中央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既同右的倾向又同“左”的倾向,即同妨碍党在满洲游击运动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

现在我来具体谈一谈党在满洲做了什么工作。首先,我们党中央在满洲事变一开始就派了巡视员去帮助各地党的工作。其次,中央采取了加强和改组党委会、区委会和支部的措施。然后召开了北方五省的代表会议,也邀请了满洲代表参加^①。第四,中央派了相应的干部去满洲工作。第五,中央开展了支援满洲游击队的运动,为义勇军募集了物资。第六,中央采取了在中国、朝鲜、日本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之间建立联系的措施。第七,苏维埃政府专门发表了支援满洲游击运动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呼吁书^②。中央还发表了关于同日本作战、关于准备抗日作战行动等问题的专门呼吁书^③。

① 指 1932 年 6 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各省党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革命运动(包括游击运)、进行土地革命、成立华北苏区等一系列决议。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335—397 页。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可能是指《中共中央为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告民众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189—192 页。

“现在在满洲我们有什么新情况呢？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不完全材料，满洲组织中的党员约有 1500 到 2000 人。但是，这些党员的质量，他们的政治水平很低。糟就糟在满洲以前没有进行过革命，它没有经受过 1925 年至 1927 年的革命磨炼，因此满洲的党员不懂得许多最起码的政治问题。从满洲来到[国际]列宁学校的同志们的例子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同志当中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为什么入党的。其中有一人^①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我 13 岁时和哥哥一起到了满洲，大概在那时入了党。”这不是个别情况。看一看中央巡视员最近的报告^②，你们就可以在那里看到证明这种情况的许多例子。

按社会成分来说，满洲的组织也很弱。那里大约有 200 名工人，有一部分是士兵和海员，其余绝大部分都是农民，特别是朝鲜人，还有知识分子。在最重要的企业，例如在铁路、矿山等企业，在中东铁路上，我们约有 20 名党员，在呼海铁路上约有 77 名党员，在平奉铁路上约有 35 名党员，在南满铁路上有多少党员不知道，在……铁路^③上约有 30 名，在抚……铁路^④上约有 15 名，在哈尔滨铁路上约有 120 名。

在满洲我们有州委^⑤领导整个工作。在州委的直接领导下，有南满、北满和东满委员会，还有哈尔滨和奉天边区委员会^⑥。现在在穆……^⑦也成立了委员会，但那里有多少党员，我们不知道。我们有的材料是五六月份的。

① 何人不详。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原文如此。

④ 原文如此。可能是：抚顺。

⑤ 原文如此。应为：省委。

⑥ 原文如此。应为：特委会。

⑦ 原文如此。可能是：穆棱。

哈尔滨的赤色工会联合了大约 80 人。按成分说,这是一些铁路员工、烟草工人、榨油工人、印刷工人等等。虽然哈尔滨工会联合会已经建立,但实际上是空的,这个机构不是经工人群众选举产生的,而多半是由党组织任命的一些党员组成的。奉天铁路上有多少工会会员,我们不知道。

根据我们的材料和国民党报纸的材料以及来自满洲的同志们的信息,反帝社团^①是个群众性组织。但是,那里多数成员是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士兵,这个组织是合法的还是半合法的,是由谁领导的,等等,这些我们都不知道。至少我们可以说一点,有我们的同志在那里工作。

关于农民组织,我们也没有详细材料,有的只是一些关于“红枪会”、“大刀会”的材料。是否还有其他形式的组织,我们不知道。

根据这一切可以看出,我们在满洲的运动规模是何等的巨大。我们看到,党落后了,因此必须加强满洲党的工作。加强满洲党的工作是我党头等重要的任务。

我想特别谈一谈我们满洲党组织的主要错误和特点。首先,我们对满洲的形势估计不足。满洲委员会在自己的决议^②中公开表明了这一点。它不了解,也未意识到满洲现在的形势,对满洲工作的意义估计不足。因此,它与其他一些党组织,如哈尔滨区委会,公开反对示威游行,甚至反对保卫苏联的口号。

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5月1日,我们一位同志^③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问题、关于满洲形势问题的讲话。召开了中东铁路职工的专门会议。我们的同志号召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讲话结束时号召起来保卫苏联。这以后,区委把这位

① 原文如此。应为:北满反帝同盟。

② 指的是哪个决议不详。

③ 何人不详。

同志召去并对他说，他违背了苏联的外交政策，他的讲话可能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他不应该说保卫苏联，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革命口号。

满洲党组织犯了一系列策略上的错误。它不懂得也不善于贯彻反日、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和很困难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在满洲的形势在某种程度上不像我们在1925年至1927年广州革命时期^①的那种形势。在形势上有一定的差别。相同的地方首先是满洲目前的阶级分化还不充分，其次，在满洲现在全体人民都具有反日情绪。正因为如此，形势也给建立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考虑到满洲直接毗邻苏联这一情况。满洲聚集了从原沙俄逃出来的大量白卫分子。

形势的不同之处是，我们在这里不能实行像我们在广州时期所实行的那种统一战线策略。我们在广州时期是如何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呢？我们也不是从上层实行的。例如，那时我们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我们在军队里工作，我们在政府机关里工作，我们同国民党订立了具体的公开的政治联盟，现在不可能这样做。我们看到，马[占山]在自己部队里取消了政治部。马[占山]和[李]杜……^②在他们的部队里坚决反对工人共产化。根本谈不上像过去同国民党实行的那种政治联盟。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我们在满洲还不具有足够大的阶级分化，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农民的组织还不是真正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另一方面，那里的地主、军阀和资产阶级还控制着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作斗争的途径。现在只有打破这一反日同盟，我们才能在客观上抑制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需要

① 见第106页注①。

② 原文如此。应为：王德林。

通过另一种途径,即加强群众性反日革命运动的途径来进行活动。指望像文……^①那样摇摆不定和不可靠的分子将是错误的。因此,应该根据形势小心谨慎地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以争取真正包罗广泛的工人群众。

在我们的农民游击队中和我们能够掌握的那些队伍中,我们要进行真正广泛的工作来建立统一战线。然而,在贯彻这一策略时,不仅要考虑到整个满洲的形势,而且还要考虑到有我们一定影响的一些地方的形势。在这个问题上,迄今满洲组织还没有灵活的策略态度。

第三个主要错误是,满洲党^②不理解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结合起来的必要性。这一点从州委针对五一事件所通过的决议^③中可以看出。这里也明显地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机会主义态度。只希望合法地进行工作。满洲省委坚持认为,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结合起来非常困难。然而,这个问题对满洲来说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里现在掌权的是日本的刺刀,并且处境要比过去艰难得多。各种各样的挑衅行为在日益加强。无疑,那里必须加强我们的秘密工作,并把合法工作与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结合起来。在有同情我们和不反对我们的游击队的地方,我们应该合法地进行工作,但事先必须保护好地下机关以准备革命。这将是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工作方法。

第四点也是最严重的一点,这就是实践中的机会主义。我举几个非常令人气愤的例子。当一位中央巡视员^④在4月底或5月初到满洲委员会检查中央关于开展五月运动的决定的执行情况时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应为:党组织。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何人不详。

发现,本来中央是为地方党组织制定这个运动的计划,但当中央巡视员去检查区委、省委和支部执行这项工作的情况时却发现,在哈尔滨,无论区委还是支部都不知道中央的决定。连省委也不知道。在这方面没有进行任何实际工作。

省委同来自支部的一些同志计划在印刷工人和其他工人之间举行罢工。但是,他们只派一名同志去跟这些工人联系。整个支部却对罢工一无所知。当然,结果是任何罢工都没有搞成,罢工根本就不可能。

在实践中这类机会主义的事例很多。有许多决定,但决定没有贯彻执行,简直就是消极怠工。

第五,我们对工会工作和游击运动有一种不能容忍的取消主义态度。我给你们举出这样一个情况:共产党员不愿意,甚至干脆拒绝在工会里工作。哈尔滨区委直截了当公开声称:“我们要选一些什么也不会做的最差共产党员,派他们去工会工作,因为那里不能工作,而又需要工作。”^①

对游击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在中央巡视员^②到哈尔滨以前,省委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来与游击队建立联系。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士兵们试图与党组织联系,而我们的党组织却拒绝与他们联系,完全消极地对待这项工作。这些事无疑说明党组织脱离群众。

最严重的错误是不正确地对待国民党和其他反革命组织。在哈尔滨省委的决议^③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国民党的不现实说法。我们的一部分党员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例如,哈尔滨组织的一位区委委员说,孙逸仙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它们之间没有任何

① 引文出处不详。

② 何人不详。

③ 文件没有找到。

差别。铁路支部的一些同志不愿意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不愿意揭露国民党及其反革命角色。

省委在黄色工会中没有进行任何工作。在这方面的实际工作中马……^①的残余还很强大。例如,5月1日省委和哈尔滨区委决定按地区举行示威游行,并在一些工厂里召开群众大会。为此,省委、区委和工会委员会都派了代表,成立了委员会,拟订了计划,但以后什么事也不做。

呼海铁路的一名工人^②在调运马[占山]部队时拒绝工作。结果这位工人被判处枪决。党组织决定组织对这起枪决事件的抗议活动。县委知道这件事,但铁路支部一无所知。连支部委员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里举行示威游行。

这说明支部脱离群众,工作不协调。迄今为止,我们在支部的工作中还可以看到这样或那样的倾向。满洲委员会在反倾向残余的斗争中本身不理解也不知道它们的实质,因此满洲的工作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关于满洲工人组织的缺点我已经说过了。其中有:(1)缺乏革命经验和不善于估计形势;(2)组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都很差;(3)缺乏对满洲问题的具体领导。地方上的组织没有得到省委的领导,×××委员会^③与中央没有联系。现在必须掌握满洲游击运动和抗日运动的领导权。为此首先需要加强满洲的党组织。

现在我想谈一谈几个具体的、政治方面的和组织方面的问题。总的策略任务已经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为满洲组织完全正确地确定了^④。但是必须把这些方针加以具体化。例如,第

① 原文如此。

② 何人不详。

③ 原文如此。

④ 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速记记录》第3卷,第168页。

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取得抗日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我们如何把目前处在反动领导者影响下的领导权夺取过来，通过什么途径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结合起来，通过什么方式把群众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并组织阶级的游击队。

为了切实保证对游击运动的领导，首先需要加强我们党在满洲群众中的工作。需要建立真正群众性的工会组织。为此需要利用已有的经验来具体制定满洲工人群众的需求。需要建立真正群众性的抗日团体、义勇军、“红枪会”等等。第三；需要通过群众组织，通过工会、共青团和抗日团体来动员失业者和有工作者，培训他们组成游击队。需要事先在他们中间进行大量的政治工作，使他们脱离与我们格格不入的群众组织的影响。

必须制定哈尔滨、中东铁路、奉天兵工厂等工人的经济要求。他们的口号是：1. 及时发放工资，以银元发放工资，而不是毫无价值的纸币；2. 反对解雇中国工人；3. 反对工贼和白卫分子；4. 反对在工厂、矿山和铁路上实行警察制度；5.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枪杀和逮捕工人。

其次，我们必须为农民和饥民提出具体的要求。必须提出能够争取这些群众的要求。在我看来，必须提出这样一些要求：1. 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满洲国等的财产，以救济饥民；2. 没收日货以救济饥民；3.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农民的土地；4. 免去捐税租金等；5. 反对给满洲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缴纳税金和收成；6. 要求地方管理机关为饥民和难民提供食品、衣服和住所；7. 反对建筑铁路、机场等方面的强制性劳动；8. 反对枪杀工农的反动军阀；9. 减租减息。

这些就是为农民群众和饥民们提出的大致要求。此外，必须为满洲的少数民族、为蒙古族人等提出专门的要求。这里大致需要提出这样的要求：(1)组织游击队，武装反对满洲国和日本占领者；(2)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汉族和蒙古族之间的民族纠纷。

坚决为进行中国革命和游击运动而斗争；(3)揭露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帮凶并竭力将蒙古地区^①变为日本地区的汗……^②的叛卖行径；(4)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反对成立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统一蒙古国的反动图谋；(5)反对高利贷的息金和劳役，没收土地以保障中国劳动者的劳动权利；(6)废除给王公贵族的税金，揭露他们的叛卖嘴脸；(7)满洲独立。

我想提请你们注意：满洲国也提出满洲独立，争取脱离中国等口号。因此，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蛊惑性口号相对抗。此外，我们的口号应该有助于我们与满洲居民建立联系，以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还必须为满洲的朝鲜族农民和劳动者提出专门的要求。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煽动汉族和朝鲜族之间的斗争，并企图保住间岛^③。在朝鲜族中间，阶级分化很大，所以也需要考虑到农民对土地和收成的要求。

关于朝鲜的劳动者，我现在还不能具体地说什么，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与朝鲜问题专家交谈。我请在座的同志们发表看法并就这个问题补充自己的意见。

我们必须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开展广泛的解释工作。在这项工作中应该考虑到1925年至1927年的经验，指出国民党的叛卖行径，通过具体事实说明军阀们如何掠夺和枪杀工人、农民和一切具有革命情绪的人。应该揭露国民党关于帮助满洲、关于它对满洲独立的口号等的蛊惑性宣传。

要特别注意解释苏联的和平政策。遗憾的是多数居民很少了解我们的和平政策。要开展广泛的运动来解释苏联的这种和平政策的真正意义和真正好处，要说明苏联的工人和农民是他

① 指内蒙古。

② 原文如此。应为：蒙古王爷。

③ 可能指间岛地区。

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中的唯一可靠的支柱。

最近，苏维埃中国在满洲的影响大大增加了。因此，我们需要广泛宣传苏维埃中国在土地问题上、在反帝斗争中的成绩和成果，以便使劳动者清楚地知道，他们应该与苏维埃中国携手并进去争取自身的解放。因此，必须在满洲和苏维埃中国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这不仅对满洲现时的发展，而且对将来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党应该帮助满洲的游击运动，并把它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党应该合法地和非法地进行动员和组织群众工作，派义勇军去满洲，并给义勇军以物质支援。

要向全中国表明，我们党是跟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斗争并揭露国民党的蛊惑宣传和诽谤的唯一政党，国民党硬说共产党人是国民革命的叛徒，而红军只是在破坏国家。苏区的苏维埃政权正在开展广泛的运动来支持和声援游击运动，并从物质上给予游击队以帮助。我们党和我们政府给上海寄去约 1 万美元，这在上海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同情和很大的震动。这以后我们党在上海开展了广泛的募捐运动来为苏区购买一架飞机。现在募捐运动已经顺利结束，准备再一次开展这样的运动来为中国红军和苏维埃中国购买第二架飞机。如果我们能分出哪怕一小部分钱给游击队，那么这就会引起巨大的同情。游击队等待着帮助，我们要为他们组织这种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

为了实行所有这些措施，首先要加强我们满洲的党组织。要在那里建立坚强的、独立的和有首创性的省委。此外，还要在各地，在南部、北部和东部以及一些游击部队中建立党委会，这些党委会应该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应该善于在革命发动方面执行党对满洲国的策略和政策，等等。一句话，需要培训大批的干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苏区来进行。现在需要培训这样的干部，他们真正能够帮助党，并具有 1925 年至 1927 年的革命经验，能够以

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进行工作,能够加强和巩固我们的党组织、我们的游击运动以及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工作。

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我们才能真正争取到抗日运动的领导权,才能胜利地跟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争取中国的独立。这里不要忘记,保卫苏联问题,开展反战斗争问题等等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取得在满洲的领导权,那么这将会巩固和加强我们在满洲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影响,而这将强有力地推动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和组织上的巩固。此外,如果我们能在这里取得成就,那就将意味着在保卫我们苏维埃革命、苏维埃中国方面有大的转折。如果这项工作有助于提高劳动群众的革命情绪,那么我们就能对帝国主义构成真正的威胁。如果群众和共产党一起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决定性的反击,那么就不会存在苏联的武装干涉^①问题了。因此,现在满洲问题不仅对于中国来说是个重要的问题,而且同时对于朝鲜、福摩萨(中国台湾)、日本共产党等等来说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应该认真地和切实地提出满洲问题,并立即采取实际措施来解决我们在满洲革命运动本发展阶段所拟订的那些极其复杂和困难的任务。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72,第 114、138—154 页。

打字稿,未经校对的速记记录。

^① 原文如此。

8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 苏区中央局^①第一号军事指令

1932年11月29日^②于上海

第一号指令

怀着满意的心情收到你们的电报^③。请以后也要积极而协调地贯彻自己的方针。向你们提出以下建议：

应以第10、12军和中央军^④的联合力量继续进行有力的进攻。

如在目前形势下能够迅速而较少伤亡地攻下抚州，那就要进攻这座城市，运出所有粮食储备，将无产阶级力量争取到红军方面来，不采取长期防御战术，继续进攻白军第90师和第14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团军第3军团应掩护你们开阔的左翼。

如果占领抚州要付出巨大损失并只有在长时间包围之后才有可能，那么你们就不应占领抚州。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团军的主力应返回来对付第90师和第14师，以便在援兵到来之前将它们消灭在乐安地区。第12军应该掩护主力向抚州推进，而第10军

① 收件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电报的日期不晚于1933年2月10日。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原文如此。指第10、12军团和中央集团军。

应在信江南岸的已占领地区固守,并以快速的攻击把敌人兵力引到自己方面来。

为了将来能保证行动的统一,必须在各种情况下保证我军与赣东军团的固定和可靠的联系。

请每周不得少于一次向我们提供有关我方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准确信息。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指望得到具体的指示。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07, 第 62 页。

德文打字稿, 副本。

8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第 284(B)号记录

(摘录)

1932 年 12 月 3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19. (4139). ——中国问题。

决定:19. ——采纳王明同志的建议,将中共中央、[中国]共青团中央和赤色工会总理事会^①从上海迁往苏区,在上海只留下这些机构的全权代表。

责成米夫(负责人)、王明和瓦西里耶夫同志拟订给中共的必要指示^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戈诺林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23,第 5—6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原文如此。指中华全国总工会。

② 见第 94 号文件。

89

中共中央和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2年12月5日^②于上海

致政治委员会。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③征求你们对以下问题的意见：伊思美洛夫^④处境很危险，因为到处都在搜捕他，其他领导同志也受到威胁。有两种可能：一是派他去北平，那里他不出名，但他反对这样做。二是派他去中央……^⑤区，这他愿意。目前[去那里]的旅途上有危险。急复你们的意见^⑥。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271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文件上有批注：送皮亚特尼茨基、米夫和王明同志，并有上述人员的签名。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电报的日期。

③ A. 埃韦特。

④ 张闻天。

⑤ 删节号是原有的。应为：苏区。

⑥ 文件上有批注：政治委员会复电 1932 年 12 月 5 日发出。电报没有找到。

90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2号报告^①

(摘录)

1932年12月初^②于上海

机密

驻华代表^③致米哈伊尔^④(通过信使)

一、关于政治形势,作为对其他材料的补充

1. 法西斯主义: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建立了法西斯团体——“蓝衣社”^⑤。该组织有3000人。其宗旨是:到国民党第五次代表会议^⑥时,使党完全服从于蒋介石,并确立他更加严厉的独裁。为此,老的将领们必须受到更加严厉的监督,而军队必须成为法西斯军队;在国民党内部取消一切派别。整个组织也必须置于蓝衣社的监督之下。现有的领导体制应由党的唯一的领袖取代(像在孙逸仙时期那样)。蒋介石在中国应扮演墨索里尼的角色。该组织提出以下国家社会主义口号:

① 文件上有批语:送米夫同志。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报告不晚于1933年2月10日。

③ A. 埃韦特。

④ H. A. 皮亚特尼茨基。

⑤ 蓝衣社成立于1932年3月,于1938年4月解散。

⑥ 指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召开。

(1)土地改革(“to equalize the ownership of land”^①)。

(2)与外国侵略者作斗争,反对不平等条约。

(3)发展工业(为此目的向外国借贷;其中一部分用于维持法西斯组织)。

(4)“取消劳资纠纷”。

(5)加强军队并在实行全面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改编军队。

(6)男女平等,等等。

派蓝衣社成员到意大利和德国研究这些国家的法西斯运动。

2. 南京和广州之间的矛盾。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十二月全会^②表面上不会作出任何实质性改变,但是加强蒋[介石]的地位是有保障的。在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广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虽然在同一个纲领下)。广州派的代表看来不会参加全会。他们提出了含有以下条款的纲领:1. 反对日本(基本上是蛊惑性的)。2. 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消灭红党。3. 不与苏联建立任何联系。

11月,蒋[介石]向广东派建议立即集中现有一切力量联合进攻江西的中央苏区。迄今为止,广东派的立场是:同意进攻,但在进攻开始前应调整南京与广州之间权力分配的“内部问题”。除了这两派之间旧的矛盾外,又出现了英帝国主义(对广州有很大影响)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央政府确定的30%的大米进口税加剧了矛盾,因为广东进口大量的大米。

由于上海保卫战^③而闻名的19路军已被彻底改编。部分激进士兵被枪决(几百人),一部分左翼军官被逮捕,一大部分士兵被强制复员回乡。为这支军队募集的大批资金,尤其是在国外募集

① 英语:“平均地权”。

② 指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于1932年1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

③ 见第108页注①。

的，多半都被挥霍掉了。现在这支军队与其他白军没有任何差别（至少可以说，由于未发军饷引起了不满情绪，有做工作的条件）。

3. 我们在江西地区的形势。从我们的形势受这些矛盾的左右程度来看，它表现为：

(1) 由于现有的矛盾，敌人的大举进攻应不会早于1月底2月初。

(2) 应该承认这种对我们不利的可能性，即要估计到蒋[介石]和广州力量联合进攻的可能性。这种进攻可能会在2月发生，未必会更早。我们正试图搜集更确切的情报。

(3) 在目前的力量配置情况下，敌人从四面八方发起这种联合进攻会使我们处于困难境地。

(4) 我们的方针应该是，要改变目前力量对比状况，使之对我们有利。我们在历次战役中都遵循这种观点；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取得一些巨大胜利，但都是局部胜利，没有改变整个局面。这种改变只有在消灭敌人大部分有生力量、突破敌人在江西的水路防线^①并随后占领南昌（同时给福建、广东和湖南的敌人以坚决反击）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与我们的其他地区协调行动和建立牢固的联系，发展我们在中国其他中心城市中的力量和那里的[革命]运动。不动调所有力量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我们地区的社会分布^②为毛泽东的策略主张（避免大的战役，退到山区，分散军队等）建立了基础。这种策略在敌人本身还没有任何坚定的斗争计划，还没有从四面八方集中部队来对付我们时不是那么危险的。但这种策略早已过时，今天，问题是这样摆着：要么是前进，要么是顺从不久将来的前景，被迫后退到比较广阔的地区去进行游击斗争。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关于苏区的政治问题我已报告过了^①。

4. 反共斗争。恐怖在继续,丝毫没有减弱。在白军从我们手里夺过去的地区,凡是不能获得村长和过去的富农地主支持的人都被枪毙了。村庄也被部分烧毁。经常进行搜捕,首先是在上海。最近两个月来,大约进行了200次逮捕,被捕者中有一些是省(党)委负责人。试图通过逮捕来瓦解企业中的支部。据说从南京派来了200名新密探。由于青年组织书记^②的叛变,试图寻找[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很大一部分被捕者往往被引渡给南京当局^③;在那里遭到拷打,部分转到敌人方面,更多的则被枪毙。

实行恐怖的同时,正在寻求另一些斗争方式;根据政府在1931年的许诺,要在三个月内用军事手段消灭共产主义,但这个企图破产了,根据不久前蒋介石的说法,消灭共产主义,三分是军事,七分是行政^④,由于害怕土地革命可能在其他重要地区和一些省里爆发,现在在政府人士当中,在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报刊上,越来越公开地提出土地革命的问题。我们将坚决揭露敌人的这种蛊惑宣传,这是不难做到的,因为在从我们手里夺去的地方,地主和富农都回来了。

“改良派”的最重要思想在《人民论坛》^⑤(汪精卫的[机关报])上作了如下阐述:1. 俄国农民之所以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是因为邓尼金不承认革命所引起的所有制方面的变化。中国农民和俄国农民没有差别。2. “毫无疑问,在共产党控制的地

① 见第76号文件。

② 袁炳辉。

③ 指引渡在上海国际租界和法租界内被逮捕的人员。

④ 原文如此。应为:政治。蒋介石在1932年6月12日至15日在庐山召开的五省军事指挥员会议上曾谈到这一点。

⑤ 《人民论坛》月刊于1931年至1941年在北平出版。

区,农民得到了一定的经济上的好处”。3. 土地革命蔓延的危险存在于所有重要省份,干吗还要等到所有大土地所有者都被赶走或消灭呢? 4. 共产党人到处彻底摧毁一切所有制形式等,而试图恢复 *статус кво анте* [б еллум]^①引起一片混乱、惊恐和残酷斗争。5. 不改变对农民的政策,就会出现“两年战争”等;6. 如果说中国早年的军阀制度只是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那么现在“农业中国的整个经济生活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对全国来说是致命的危险”。^②

由此得出了以下结论:

1. 承认在从共产党人那里夺取过来的所有地区由革命所引起的所有制方面的变化,目的是克服农民对白军的恐惧心理。

2. 任命各省的“观光委员会”来研究土地问题,并应制定以下方面的建议:(1)重新分配土地,把农民私有者组织起来,等等。(2)发展农业种植(施肥等)。(3)发展手工艺、手工业等。(4)给予低息贷款。

这些建议多少也为蒋[介石]法西斯组织所采纳。

“简言之,如果土地问题不能解决,那么无论是蒋[介石]的政府,还是其经济体制都不可能存在。”

我们将十分认真地注意这种鼓动宣传并给以揭露。同时敌人的这些努力表明,农村的形势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存在着加强在这方面的工作的必要性。

5. 关于党和青年^③在上海的人数等的材料以及关于全国的材料将在附件^④中提供。

① 原为拉丁语:战前现状。

② 见蒋廷黻:《共产主义与土地问题》,载《人民论坛》1932年上海版第3卷第9期,第313—317页。

③ 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④ 附件没有找到。

最后对一些较为次要的问题说几点意见。

(1)《中国论坛》^①。我们已把一家小印刷厂并入美国^②，几周后就将重新定期出版杂志。至于能维持多久，这是另一个问题。

(2)“亚洲人”(布兰德勒分子海因茨·缪勒)在这里，不过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他偶然得到一份《中国工人通讯》^③，这是作为信息材料发到欧洲、美国和给一些新闻记者的。他依据这个机关报给布兰德勒集团拟了一份报告说：“中国党的政策是灾难性的；党把共产主义赶到了江西山区”^④，等等。可能会把他驱逐出去，使他感到害怕。但由于他没有钱，又丢了护照，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对于他所采取的步骤，我们几乎都一清二楚。现在只有一种明确的危险：他在街上会偶然碰到我并认出我来。

3. 书店^⑤将根据收到的指示^⑥停办。有哪些供应物资的办法，我们还没有研究。这将会很难[……]^⑦

※ ※ ※

一、总的工作计划

1. 坚决提出苏区的问题

(1)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处于防御状态。敌人在江西省沿赣江的战线未被突破之前，我们的主要地区依然被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交通干线分割为两半。时刻存在着我军主力部队被包围的危险。敌人能够以等待策略来阻止我们主要地区的扩大

① 见 135 页注①。

② 原文如此——译者。

③ 《中国工人通讯》是中共中央的新闻通讯，于 1930 年至 1935 年在上海出版。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可能是“时代”书店。

⑥ 文件没有找到。

⑦ 以下删去带有许多空白处的关于苏区军事形势的部分。

并利用大量兵力来对付我们较弱的地区。敌人的弱点及其阵营的内部矛盾至今妨碍发动主要攻势，至少推迟了进攻。

我们正在利用这种形势。在克服了毛泽东的消极和模棱两可的方针（“到山区去”等）并在闽东北成功地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之后，我们已投入我们的主力来对付南昌和抚州（江西）防线的敌第22、23和24师，并坚决地歼灭了他们。关于1000支步枪，10挺机关枪和800名俘虏的事已电告了^①。我们希望以后也要坚持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方针，以便为夺取和守住南昌以南的城市创造前提条件，并在今后的胜利作战行动中尝试突破敌人在江西的水路防线^②，并击溃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有自由空间和大范围协调我们的力量的密集地区。

12月国民党将召开全会，这就是说敌人大的作战行动可能在1月份。

(2)同时在苏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提出政治问题。除加强红军和群众组织外，首先摆在面前的是经济政策问题。对地主和富农的无情斗争应与进一步区别对待中农和手工业者等联系起来（这里说的是有区别地应用劳工法、征税、信贷、鼓励劳动组合和共耕社的一系列条款，以及水利政策，组建畜力站等）。要求彻底克服苏维埃机关和群众中的官僚主义。必须限制国家在劳资纠纷中的仲裁活动，只限于仲裁一些重大事件，即如果通过罢工手段来解决就会给作战行动和经济带来很大损害的重大事件。应该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以满足工人和劳动法的要求，并组织从工会和党的方面来领导群众的这种斗争。目前，仲裁法庭的作用是必要的并已由法律^③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

③ 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该法于1931年11月在全国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见《中国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1931—1934）》，莫斯科1977年版，第84—98页。

确定。这已经导致了一些罢工(其中有 700 名船夫罢工约 10 天^①), 并可能削弱工人对苏维埃的信任。

2. 克服革命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性。我们已着手制定在上海以外的重要中心城市的工作计划。加强工作的最大困难是在广州和满洲。在满洲, 我们的邻居^②几乎吞噬了所有优秀的力量, 使他们离开了党的工作, 从而终止了年轻力量的自然补充进程。我们在汉口的阵地很薄弱, 但我们将加强当地的团体。北京^③和天津从保持与满洲、大连和朝鲜联系的角度看很重要, 而为保险起见, 我们建议你们派伊思美洛夫^④到那里去一段时间。他本人不愿意去, 宁愿去苏区, 但无疑可以说服他。我们已发电报征求你们的意见。

3. 工会、罢工等等。必须更加有力地提出在党的帮助下建立我们的(非法和半合法)工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成绩不大的原因, 不仅是实行恐怖, 而且是关于只能在国民党工会中做工作的宗派主义错误方针。对罢工的领导(少数例外)很软弱。必须克服党内的一种观念, 似乎罢工是个别事情, 最多派两三个同志到那里去就可以了。必须提出失业者及其争取得到补助的问题。

4. 要更认真地注意自发的农民运动。除了在闸北和蕻溪(上海附近)的发动外, 没有党的领导。杨各河(距南京 60 公里)和济河豪(音)(山东省)爆发了大规模的行动, 但其发展过程与我们没有联系, 也没有我们的领导。在杨各河, 成千上万农民包围了城市, 破坏了那里的政府大厦, 销毁了税务单据, 释放了 200 名犯人, 烧毁大约 10 幢企业主和豪绅的房屋。暴动的原因是反对新的赋

① 罢工情况不详。

② 指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的工作人员。

③ 原文如此, 应为: 北平。

④ 张闻天。

税。后来有6名农民作为“共党首要分子”被枪毙。在暴动期间有7人死亡和几十人受伤。同样的原因导致了济河豪的暴动。那里组建了一支游击队。暴动被镇压后，济河豪街头有94名参与者被处决。

5. 广泛的反帝运动。必须克服在这个问题上的落后状况。开始以各种名称成立委员会和社团（“反李顿委员会”^①、“支援满洲义勇军社”^②）。为镇压运动，政权机关下令解散了所有“社会团体”。我们参加了抵制运动并试图掌握领导权，这方面工作还很薄弱。建立学生团体的行动在日益加强。曾两次试图派志愿者到满洲去。一个由60人组成的团体，顺利地由上海出发到了南京，但在那里被驱散了，一部分人被逮捕[……]^③

7. ^④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⑤。目前我们正提出[讨论]第十二次全会的决议，并将它具体落实，特别是有关中国和日本的部分。

8. 党机关的安全。已开展同被捕后的叛变行为作斗争的运动。别的且不说，青年组织的书记已被开除，并将发出指示，说明（在狱中）应如何表现。以往掩饰这类事件（叛变行为）的做法具有涣散人心的作用。

9. 党的中央机关。根据领导人^⑥的信息，现在机关内约有100名同志（大多数人薪水很少）。这个数字包括相当多的联络、印刷、保卫等机关的人员。关于党的组织状况的材料，随这次邮班

① 成立于1932年10月上海。

② 原文如此，指1932年春在北平成立的支援东北抗日斗争社。在国民党当局压力下于1933年被迫停止活动。

③ 以下删去有关朝鲜、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内容。

④ 原文如此。

⑤ 见第38号文件注③。

⑥ 可能是：秦邦宪。

寄给您^①。材料非常重要。请立即把它交给一位绝对可靠的中国同志去翻译。我们来不及翻译后赶上这次邮班。

10. 邻居^②。给我们派来一位邻居。他暂时在这里按自己独特的题目在加工材料。可能稍后我们要把他派到苏区去。他那个局^③把他置于我们的管辖下,财务方面也由我们管。我想,您是同意对问题的这种提法的。

同时还给您带去我们分部^④的大量材料,但必须加以翻译。请您不要把这些简短的报告看作是详尽无遗的。

※ ※ ※

1. 预算问题。请告诉我们,1933年的最大数额是多少?其次,我恳请尽快多寄点钱来。我们分部^⑤只收到1932年数额的一部分。由于追捕和青年组织工作人员的叛变,必须改组机构,这带来了更多的开支,因此我们现在处于困难的境地。而工会已经有两个月一文莫名了。我建议您每两个月让信使带一次钱来,他返回时可以带走邮件。

2. 住宅问题。我们通过中国人租到开会用的可靠住宅越来越困难了。几个月来,我们不得不取消四套住宅,相应地这些住宅也是被敌人取消的。在许多情况下,整个工作停了下来,自然也增加了费用。

请考虑一下,是否能派两名美国人,或许德国人到这里来,唯一的目的是留在这里,租套住宅,从事民间职业活动,这样可以保障更大的安全。我首先想到的是医生、牙医等,党员,但不担任领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 O. 布劳恩。

③ 指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

④ 指中共中央。

⑤ 指中共中央。

导职务。在柏林有一位女医生，她可能很合适从事这种活动^①。或许在美国也不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当然，必须给这些人支付大约 150 美元，以使他们能够创造合适的条件。实际工作的收入将是相当低的。可能过一段时期，这些费用可以降下来。这样安排工作可以保障长期的安全，如果说的是这类职业的代表的话。请电告我们，您是否同意这个建议。

3. 律师问题。温桑建议派一名律师到这里来，主要是为我们工作。我跟我们分部讨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们确信，这是一个必要的问题。

先决条件是：(1)他必须是真正的美国公民，精通英语；(2)曾在美国当过律师；(3)必须是[我们的]同志，但他的党籍应不为人知；(4)必须具有美国大学、律师事务所等的介绍信，这样在这里容易找到律师的工作；(5)必须准备每月付 200 到 250 美元在这里居住，找个中国的伙伴，尽全力[在法庭上]替我们的事业辩护，并尝试寻找其他的同行。不能支付更高的数目。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危机，美国共产党或许能够找到这样的人。但这必须是个认真严肃的人，而不是轻浮的人。

亦请电告我们您对这个建议的意见：同意或者不同意。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07，第 56—59、63—66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① 何人不知。

9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25 号 (特字第×号^①)记录

(摘录)

1932 年 12 月 10 日于莫斯科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32 年 12 月 4 日

32/26. ——关于中国问题。

1. 如果中国方面重新提出签订不侵犯条约的建议,答复如下:这个问题可以在实际恢复外交关系之后解决。

2. 与中国互换恢复关系的照会后,不反对中国大使在我国全权代表去中国赴任前到莫斯科来。

3. 在共同商定建立领事网以前,要求现在就允许在上海^②、北京^③、张家口和^④……设立领事馆,理由是在苏联的海参崴、海兰泡、伯力和赤塔已有中国领事馆。

抄送:李维诺夫同志

① 号码没有标出。

② 以下用手写加上了:天津。

③ 原文如此,应为:北平。

④ 以下删去了广州。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 目录 162, 卷宗 14, 第 24、26、29 页。

打字稿, 原件, 签字为真迹复制。

9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会议速记记录

(摘录)

1932年12月11日于莫斯科

秘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速记记录

库西宁:同志们,请允许继续进行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执行情况^①的报告。先从东方开始,然后再听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书记处的报告。请米夫同志发言。

米夫:同志们,我一开始就不得不预先说明,一系列国家将从我的报告中消失[……]^②。

在我今天的报告中我想主要谈谈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我们地区书记处的工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也是因为在全会召开前夕我们能给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发出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的决议相一致的指示^③,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来谈一谈,这些党是如何贯彻我们这些

① 关于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决议的问题是在1932年11月29日、12月11日至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会议上讨论的。在1932年12月11日的会议上П. А. 米夫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工作报告。在讨论时发言的有Д. З. 曼努伊尔斯基(发言没有发表)和王明。

② 以下删去与中国无关的内容。

③ 见第60号文件。

指示的。先就中国说几句。

我们实际上有两个中国：苏维埃中国和国民党中国。而共产党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把国民党中国的运动与红军的斗争结合起来。任务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除了解决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全国性问题，即建立新的政权，组建红军并进一步加强红军，扩大和联合苏区，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土地政策、劳动法等这些极其重要的全国性问题外，还必须解决和结合在国民党地区广大劳动群众的日常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过程中争取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日常细致工作。

在这个国家里有哪些情况呢？我不描绘整个情景。我只想列举一些实例，来说明中国共产党近来的活动。在中国，工人罢工运动无疑在高涨。1931年有77.3万人参加罢工。我想中国在罢工运动方面占全世界第一位。1932年9个月中参加罢工的有826630人。如果同志们感兴趣，我可以列举每月的数字，提供有关中国罢工运动更为详细的材料。我只想提出以下看法：我们在那里的罢工运动无疑在高涨，大批大批的工人参加了罢工斗争。

我还想谈谈中国工人运动中的新的特点，因为它提供了极丰富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为其他兄弟党所效法。首先，我想指出斗争中的顽强精神。我们有许多一而再再而三罢工的事实。例如，开滦矿工^①，1931年有4万人举行了五次罢工，结果使工作日从10小时降到9小时。1932年又举行了两次罢工。

1931年英美烟草公司(上海)有7000人举行了三次罢工。这一年，头一次罢工有7000人，第二次只有几个车间。

法国城^②的电车工人举行了三次罢工——5月、8月、10月。

我可以更多地举出这些例子，但都说明中国无产阶级在其斗

① 指唐山(河北省)开滦煤矿工人。

② 指法租界。

争中表现得无比顽强。工人们不最后争取到满足自己的要求,就一次、两次、三次地举行罢工。

我想提请你们注意的第二个特点,对中国来说这是新的特点,工人们开始自行实现自己的要求。例如,1932年上海印刷工人的罢工,更确切地说是印刷厂工人的罢工。他们举行了两次罢工,然后有组织地自行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而企业主无论怎样试图打破这种自行实行的制度,都没有取得成功。无论是通过工贼,还是以逮捕相威胁,企业主都不能打破和反击工人阶级的这种攻势。

其次,我想谈谈一个对中国来说具有典型意义的特点,这就是工人们在反击企业主、国民党政府、在华外国巡捕和军队的野蛮恐怖的罢工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暴力方式。工人们在罢工时现在不离开工厂。顺便说一句,矿工罢工时就是这样。他们把经理人员拘捕起来,在有些罢工中我们还看到这样的情况:经理人员、企业管理人员被驱赶到罢工人群当中,从而解除了警察和军队的武装,因为它们为了不伤及或危害这些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和企业老板而不能开火,也不能驱散罢工人群。

此外,我还想谈一谈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在中国已有几次罢工,工人们选举了群众性的罢工委员会。有一次选出了200人的罢工委员会,另一次选出了150人。初看起来,这是个十分臃肿的机构,难以完成领导罢工的任务。实际上,在中国过去常有这种情况,罢工委员会往往遭到逮捕。如果它不是多半由黄色工会代表或者国民党黄色工会代表组成,那么它领导罢工就是为了出卖罢工。在对于中国来说出现了新的情况下,一旦选举出群众性的罢工委员会,警察就难以同这个罢工委员会作斗争,因为要逮捕200人或150人的罢工委员会要比逮捕5个、7个、10个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难得多;另一方面,黄色工会官僚的叛卖角色也难以扮演。无论如何,中国的这一经验已开始推广,目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最后,我想指出的一点是,我们在中国的罢工斗争是在反帝斗争的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相当数量的罢工都具有明显的反帝性质,如在奉天、抚顺、鞍山;在闻名的上海保卫战^①期间日本企业中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罢工持续了两个月,直到上海保卫战结束。许多罢工都是这样,工人阶级成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反帝斗争的先锋队。

我想提请注意的是罢工斗争和失业者运动的联系。这段时间,我们有许多事实表明,我们的共产党开始认真地做组织失业者群众和领导他们斗争的工作。今年11月,上海印刷工人举行了成功的发动;有6000人举行罢工,要求给失业者发补助。上海有13条轮船的水手举行了有组织的罢工,有组织地要求让他们回到船上去,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山东省业已关闭的矿井有1万采煤工人举行了罢工。他们占领了这些矿井的管理处,要求恢复部分矿井的工作,后来还是恢复了。另外,我们在上海的失业丝织工人^②召开了代表会议,代表们代表了2万丝织工人,这次会议是在9月份在我们领导下召开的。最后,我们在无锡,这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丝织工业中心,那里有1.5万丝织工人失去了工作,他们开始夺取工厂,对关闭企业表示了有组织的抗议,最后争取到部分补助金,部分地恢复了工作。

同志们,为了结束关于国民党中国的话题,我还想指出几个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成就的实例。在国统区,共产党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举两个地方:南京和上海。

在南京,我们在10月份有800人,11月份有1500人,在上海,最近两个月(10月和11月)我们党组织的人数增加了5倍。这是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人干部无疑增加了,支

^① 见第108页注①。

^② 原文如此。应为:丝织工业工人。

部和在支部中工作的同志们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这必然会大大改善整个支部的工作。

如果说到国统区的工会工作,那么在这里有了向好的方面的很大转变。在上海,这两个月我们的工会会员增加了8倍。9月18日,举行了吸收新会员的运动(9月18日是满洲被占领一周年)。提出了工会会员人数增加几千人的计划。稍后我们接到报告说,这个计划已超额完成,达到2000人。9月11日,在上海举行了纺织工人代表会议,有120名工人参加,代表了上海39家大型纺织企业。大多数代表是无党派人士。会议完全是在我们的领导下进行的。成立了赤色纺织工会,现在联合了上海的纺织工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向苏区、向红色工会国际的致敬电^①,还有相当一部分代表声明愿意加入共产党。共产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的公开演讲受到了热烈的称赞。

同志们,尽管工作条件极端恶化,尽管在国统区遭到警察的迫害和骇人听闻的恐怖,我们党最近在总的反帝高潮的背景下,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在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相应指示和第十二次全会决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关于苏维埃中国的情况说两句。目前情况是这样:国民党军队——68万人正在同苏区作斗争。主要是:国民党的兵力集中在武汉周围。在那里,国民党人挤走了我们的部队,这之前我们的部队对武汉形成了包围圈,在一个地方两面相距只有30公里,有的地方是45或60公里。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他们在那里没有消灭我们的有生力量。我们的同志在那里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他们没有跟敌人的优势兵力交火,而是向后撤退,把部分领土让出来,这只是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确实,我们的红军没有遭受人员和物资上的损失,这一点现在资产阶级新闻记者、观察家和在这

^① 文件没有找到。

方面消息相当灵通的记者们都不得不给以确认,鄂豫皖苏区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江西的许多苏区,近来我们的部队展开了顺利的攻势,向北推进,已接近长江流域地区,向东朝福建方向进军。最近在中央苏区应当说取得了很大成绩:第3军和第1军成功地与第10军^①联合起来,这样江西南部广大地区与该省东北角的苏区就连在一起了。所以在苏区联合、苏维埃化方面近来我们还是取得了毫无疑问的成绩。我不向你们一一列举第1军和第3军最近占领的据点。我只想指出一点,即苏维埃运动现在正转向中国过去从不知道苏维埃运动的地方。今年年初,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中国红军第24军团。现在又在中国北方即在甘肃省和陕西省交界区建立了第26军团,这是1932年10月的事。这个红军第26军团占领了许多县,(算起来)9个县^②,它有3支大的部队和27支小的部队。

其次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江苏省,其主要城市是上海,在这个省里有中国的首都南京……^③,10月24日有3000农民举行了起义。他们进攻当地政府机关,释放了47人,销毁了区法院里的所有官方文件,等等。在中国北方建立新的苏区的有关事实,同志们可以从我们的报纸上了解到,因此我不再就这个题目展开谈了。我想在这部分里提出一个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前景有关的很重要问题。这是与苏区的经济政策和军事战略方针相联系着的。

同志们,大概你们记得,过去我们谈到苏区,谈到它的经济状况时,总抱怨那里存在着剪刀差——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差别^④。情况是:苏区的农产品很多,但运不出去,其价格比国统区低得多,平均低三分之二,而工业品的价格则比中国工业中心

① 此处和以下各处都应为:军团。

② 原文如此。

③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④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三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2册第1149—1150页。

城市的价格高出一两倍。现在情况有所改变,但不是向好的方面变,而是向坏的方面变。首先,应该注意到国民党对苏区实行的经济封锁。过去苏区与国统区的经济往来是相当容易的,而现在则要困难几十倍。国民党对于跟苏区经商的商人不惜采取各种镇压、枪毙的手段,而这种封锁产生了效果。如果说过去不管怎样总能把一些工业品带到苏区来,而现在可能性极少,即使运来一些也不能满足苏区居民的需求。另一方面,整个这段时间中国红军不得不坚持诱敌深入的策略,这是中国红军取得成功之原因。由于采取这一策略,红军得以粉碎蒋介石的头三次征讨。红军把敌人引诱到自己领土深处,在那里游击队就开始行动,进行包围,切断国民党部队之间的联系,切断辐重车队,国民党军队的大批士兵受到革命化农民群众的影响,红军最终得以歼灭国民党的军队。但这导致最近两年来战争始终在苏维埃领土上进行,一切破坏都落在了苏区工农的肩上。土地不能播种,即使播下种子,也不能收获,如果有收获在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下也会被毁掉。简言之,如果说以前我们工业品不足,那么现在还要加上明显的农产品缺乏。同志们,这种状况就把中国红军今后斗争方向问题提上了日程,这个问题显然也是我们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最近不得不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引出了另一个对我们的经济政策作一些必要修改、纠正的问题。无疑,我们不得不对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手艺人、商人(当然我主要是指小商人)作些让步,是在税收方面,在工厂法(我指的是关于学徒的相应法律条款^①)方面的让步,另外还在一些问题上作出让步,目的是

① 看来是指 1931 年 11 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关于禁止雇用 14 岁以下童工、14 至 16 岁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4 小时、16 至 18 岁青工不得超过 6 小时、他们的工资以全日计算以及童工和青工劳动保护补充措施的条款。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784—788 页;又见《中国的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1931—1934)》莫斯科 1977 年版,第 87、89—91 页。

为了活跃当地的手工业作坊工业，促使它发展，以便加强和活跃内部的贸易。否则未必能解决苏区这一严重的经济状况。我现在只是提出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显然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

在满洲，我们的游击运动有巨大的发展。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那里的群众性游击运动有巨大的发展，在我们的面前已不只是一些将领、各种集团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事实，而且也有反对日本占领者的群众性游击运动在发展的事实。现在那里有 3000 人到 4000 人的武装军队，完全处于我们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近来，我们在那里的党组织有了发展；特别是在今年 5 月以后，党组织改善了与工农群众的联系、与游击运动的联系，例如在王德林部队里，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而王德林本人也不得不同意将他部队里的整个政治工作交给共产党人来做，不得不同意在他的游击部队里成立共产党支部。诚然，稍晚些时候，我们的支部已不能在那里公开存在，我们的工作也不能通过政治部机关公开进行。但毫无疑问，在这个时期，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共产党人在那里取得了相当巩固的阵地，现在就利用这个阵地来扩大和从组织上加强我们在游击部队中的影响。

对我们来说，严重问题是统一战线问题，是反帝斗争中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而且显然我们不得不对各种游击联队、对各种起义组织采取不同的态度。如果说我们可以同将领马[占山]和丁超签订作战协议，而不能实行比这更进一步的统一战线，那么在对王德林、对“大刀会”、“红枪会”等的态度上，我们则可以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上走得远一些，不仅可以从下层来这样做，而且也可以部分地从上层来这样做。毫无疑问，在这里中国党需要提出一系列口号，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日本占领者。其中的主要口号已在第十二次全会决议^①中提出，但必须加以补充和具体化，以便作为

① 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速记记录》第 3 卷，第 168 页。

联合和动员满洲广大劳动群众同占领者作斗争的行动纲领。这项工作是与满洲以外的工作联系着的。最近我们党已做了一些工作。党成立了支援满洲义勇军的社团,为国家的空军募了捐,我们希望党还要善于利用这些组织来加强自己与群众的联系,加强自己在反帝斗争中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如果总结一下我们在中国的工作的话,那么无疑中国党近来在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方面、在组织罢工运动和领导这种罢工斗争方面和在黄色工会工作方面,在加强自己的赤色工会方面,以及在反帝斗争中和苏维埃运动中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方面、在建立红军和联合苏区方面,特别是在第十二次全会以后,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并正坚定不移地沿着实际贯彻第十二次全会有关决议的道路前进……^①

由于我的时间有限,最后我要指出,中国党和日本党都还没有收到第十二次全会的决议。它们不知道这些决议的一词一句,但无疑他们在实际上贯彻这些决议不比其他党差。

王明:米夫同志已经谈了我们党在执行我们全会决议过程中取得的成绩。我只想谈两点:我们党目前工作中有哪些主要的缺点,我们党近来采用了哪些新的方法才使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要检查我们的工作,就应该从国内存在的革命形势出发。还在几个月以前,共产国际和我们党中央就认为:在中国,出现了苏区和非苏区革命运动联合的趋势^②。在中国,革命形势正在发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十二次全会的决议确定了我们党目前时期的任务。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见第60号文件。这个观点,王明在1932年9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发言时也谈到了(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33年版第1卷,第156—157页;《王明全集》,莫斯科1984年版第2卷,第347页)。

使我们党能把中国苏区和非苏区革命运动联合起来的主要政治口号,就是进行反对日本和世界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捍卫中国完整、独立和统一的口号。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这个运动联合起来所通过的主要桥梁,就是中国各大城市,首先是武汉、长沙、南昌、广州、九江、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工人的群众性革命斗争,这些大城市一方面同我们的主要苏区交界或者靠得很近,另一方面也是向南北两方运动联合的过渡^①。

注意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应该认为,尽管我们在工会运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能在武汉、南昌、长沙、广州、九江等城市中认真的群众工作。而这些城市正是我们从红色工会运动的角度来看应给以重视的主要据点。

其次,为了切实执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为了加速苏区和非苏区革命运动联合的进程,当然还需要加强我们的红军,加强国统区在推翻国民党和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方面的群众工作。但与此同时,还需要比迄今多几十倍地加强在满洲的群众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承认,迄今为止满洲的工作还是我们工作最薄弱的部分。满洲在进行群众性的游击战,那里在发生暴风雨般的起义,然而我们只有不多于4000到5000红色游击队^②。在一些游击队里,有我们的党组织,但他们很薄弱,工作能力不强。在一些大城市里,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非常薄弱。尽管那里成立了群众性的民众抗日团体,但迄今为止,除几个地方以外,我们未能领导这个群众性运动。

因此,我们现在首先要加强我们在武汉、广州、九江等大城市中的工作,以便加速革命运动和(苏区和非苏区)革命运动联合的进程。我们必须加强满洲的工作,以表明我们是领导华南和华中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应为:红色游击队员。

苏维埃运动的唯一政党,是能够领导满洲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唯一政党。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加速中国的革命形势转变为全国范围的真正的顺利的苏维埃革命。

现在我想指出近来我们工作中的新方法。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最近几年来,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成功地运用了联共(布)的胜利经验。现在,[中共]中央正在加强在各地的实际具体领导。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派了许多巡视员到各地去:满洲、上海、南京以及苏区。这些巡视员用新的方法进行工作,不是像过去那样,不是采取听取报告和参加会议的方式。我们的巡视员现在是直接参加当地的实际工作。两三个月来他们帮助进行工作,从而看到了当地党组织的整个工作状况。此外,[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完成党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决议的每项具体条款的口号。根据这个口号,[中共]中央经常检查对[中共]中央关于苏维埃运动、关于领导罢工斗争、关于吸收党员、共青团员、工会会员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成员以及关于其他问题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这里需要谈一谈不仅从上面,而且从下面开展自我批评的问题。我们[中共]中央的中央机关刊物^①刊载了在支部、工会和区委等组织中工作的同志们关于党的教育问题的大量来信和文章,不仅对上海群众工作的缺点进行了批评,而且对苏区的缺点和成绩也进行了批评。有时还对决议和传单等上面的不正确提法和口号等进行了批评。

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现在看到上海和一些苏区党内生活非常活跃。在苏区和上海现在正在广泛地运用在革命突击运动和革命竞赛基础上动员群众的方法。今年第三季度,通过实行革命突击运动在吸收党员、共青团员和上海赤色工会会员方面取得了一

^① 看来是指1931年至1933年在上海出版的《红旗周报》。

定的成绩。

如果同志们看一下我们的刊物,如《斗争》、《支部生活》或《列宁生活》^①,那么就会发现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关于一些具体问题,如关于某次罢工的教训、关于苏区斗争的教训、关于招募运动的教训、关于某些错误以及关于支部、区委、工会的工作等等的具体而生动的文章。

中国现在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践中运用的这些新的方法,有助于我们党不仅在苏区,而且在非苏区,以及在工会运动中取得成绩。

我完全同意米夫同志关于现在需要认真研究苏区的一系列问题的讲话。这就是经济政策问题、劳动问题、土地问题等等。例如,现在在苏区,在土地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例如,近来我们看到,那里的手工业工人在土地革命后,由于在分配土地时因家庭人口多,分得了很大的份额,现在实际上已变成了中农,一部分甚至变成了富农。

根据这一点以及其他因素,例如现在在苏区没有足够的粮食,更不用说工业品了,我们就应该采取具体措施,以便不仅要养活我们的红军,不仅要保证对它的粮食供应,而且也要加强我们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

在工会运动中和在工人问题上的情况也是这样。有些地方机械地执行我们的劳动法^②。例如,有些地方的雇农和农民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供给衣服、棉被等等,这些东西农民是没有能力满足的^③。

① 这里指的是在上海出版的刊物《斗争》(1932年至1934年出版)、《支部生活》(确切的出版时间不详)、《列宁生活》(1932年至1934年出版)。

②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782—794页;又见《中国的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1931—1934)》,第94—98页。

③ 原文如此。

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向我们苏区的党组织提供帮助。

必须认真研究满洲问题。东方书记处已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但需要有步骤地继续下去。必须注意每一个新的现象，以使我们能够及时掌握满洲运动的领导权^①。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348，第 4、6—16、48—52 页。

打字稿，经过校对的速记记录。

^① 文件上有附言：王明。已校阅。[19]32 年 12 月 22 日。

93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①1932年12月19日^②于上海

致政治委员会。我们建议在上海留一名[中共]中央的代表，一名总会^③的代表和一名负责联络的同志，并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局来领导整个联络、印刷、无线电和情报工作。他们必须脱离当地的党组织。只是其中一人应与上海党组织每周或每两周联系一次。[中共]中央的一名代表将被派往湖北^④。也派一些同志去其他省加强省委会。我们决定，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代表将是斯拉文^⑤，并立即派赵容^⑥去你们那里作为我们的新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青团以及总会的其他成员，包括伊思美洛夫、波戈列洛夫、梅尔库洛夫^⑦和陈云逐渐地去中央苏区。我们建议在[中共]中央迁至中央苏区后召开第五次全会^⑧，以便总结近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并确定目前的主要任务和苏维埃运动的策略。

① Д. З. 曼努伊尔斯基、О. В. 库西宁、Е. М. 雅罗斯拉夫斯基、П. А. 米夫、Л. И. 马季亚尔和 Г. И. 萨发罗夫看了电报的俄译稿。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电报的日期。

③ 原文如此，应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④ 黄平。

⑤ 李竹声。

⑥ 康生。

⑦ 分别为：张闻天、秦邦宪、王云程。

⑧ 指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于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

你们的代表^①已同意。等候你们的意见和指示。[中共]中央。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217a, 第 287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① A. 埃韦特。

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草稿^①

1932年12月21日于莫斯科

1. 基本上同意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核心的决定^②。
2. 为了加强上海中心,除斯拉文^③以外,建议利用不久前派去的不为警察侦探所熟悉的米茨凯维奇和阿尼西莫夫同志^④。
3. 中共中央五中全会^⑤只应在王明到来后召开,他应是这次全会上主要报告人之一^⑥。
4. 除赵容^⑦外,有必要再派一名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后者必须是中央苏区局组成人员,应在王明同志回去后再来^⑧。
5. 我们的代表^⑨应留在上海帮助[中共]上海中央局。

① 文件上有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的批注:送政治委员会。[19]32年12月27日。在1932年12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电报最终文本,没有找到。

② 见第93号文件。

③ 李竹声。

④ 分别为:盛忠亮和汪盛狄。

⑤ 见第281页注③。

⑥ 最初文本上是:主要报告人。

⑦ 康生。

⑧ 针对第4条有批注:没有收到报告。

⑨ A. 埃韦特。

米夫、王明、马季亚尔、萨发罗夫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573, 第 20 页。

米夫手稿, 亲笔签字。

9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①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2年12月22日于莫斯科

密电

上海中央

王明能否直接去香港。你们能否从那里把他及其夫人^②送到中央苏区？请立即回复。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217a, 第 288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孟庆树。

96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①

1932年12月27日^②于上海

致米哈伊尔^③。

同意[中共]中央的意见,我们建议将中央委员会的以下人员组成交给[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政治局由13名委员(其中两名不在国内^④)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第1号波戈列洛夫^⑤,第2号伊思美洛夫^⑥,第3号赵容(未来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第4号陈云,第5号沃罗夫斯基^⑦,第6号莫斯科文^⑧,第7号布林斯基^⑨,第8号项英,第9号邓发,第10号毛泽东,第11号jungend^⑩,第12号王明,第13号斯皮里多夫^⑪。

书记处由6人组成:第1、2、4、6、7号,书记:第1、6、8号。

-
- ① 文件上有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的批注:交米夫和王明同志阅。请他们提出意见。并有王明和米夫的签字。
-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电报的日期。
- ③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 ④ 王明和康生。
- ⑤ 秦邦宪。
- ⑥ 张闻天。
- ⑦ 黄平。
- ⑧ 周恩来。
- ⑨ 任弼时。
- ⑩ 原文如此,德文:年轻人,即中国共青团书记,当时是王云程。
- ⑪ 原文如此,应为:斯皮里多诺夫,即张国焘。

改组将在[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全会上进行^①。全会应增补10名新的[中央]委员。请尽快电告你们的意见和[可能的]变化。我们建议将来用代号而不用姓名。第85、86号(库尔特)^②。

全宗495,目录19,卷宗217a,第290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见第281页注⑧)。

② H. H. 格伯特。

97

皮亚特尼茨基^①给格伯特的电报

1932年12月31日于莫斯科

上海。

致库尔特^②。瓦格纳^③应去苏区。行前发给他每月200元^④的薪金和去苏区的旅费。在那儿他应从当地朋友们^⑤那里领取薪金。请在你们的报告中告诉我发给他的确切数目。

全宗495,目录19,卷宗217a,第291页。

打字稿,原件。

-
- ① 发报人是根据亲笔改写的字迹确定的。
 - ② H. H. 格伯特。
 - ③ O. 布劳恩。
 - ④ 何种货币没有标明。
 - ⑤ 中共党员们。

98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①的摘录1932年12月^②于上海

党内总的状况

由于不断逮捕和领导人叛变,形成了令人压抑的局面,可以说是某种沉寂——既无罢工,又无示威游行。工人是怎样对待所有这些叛变行为的呢?这无疑会妨碍我们开端良好的招募运动。我认为绝对有必要考虑一下在保存许多文件的房子里开会时进行武装抵抗的问题。在两名青年书记^③被捕时打开了五所房子。刚才我得知久蓬^④和工会领导人^⑤会晤的那所房子,以及我和书记^⑥谈过话的那所房子都被监视起来了,虽然这两所房子是不久前刚租的。几乎所有青年团领导同志都被捕了,而与我们有联系的党员同志遭到警察追捕,随时都可能被在这里积极工作的15名奸细出卖。你们看,情况是很严重的。总之必须迅速改变工作。

① 收信人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确定的:归还给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书记处。П. 米夫。信的全文没有找到。

② 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1933年4月9日,П. И. 马季亚尔、П. А. 米夫和Г. И. 萨发罗夫看了这封信。

③ 胡盛鹤和袁炳辉。

④ Д. Ж. 克拉克。

⑤ 黄平。

⑥ 看来是指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

尽管青年书记^①认识我,我的情况还算好。小伙子^②和久蓬应该召回,因为他们既会给我们也会给党造成危害。我认为,绝对需要只派有经验的、认真严肃的和小心谨慎的同志到这里来。遗憾的是,这里的人不够谨慎,这可能带来灾难。

艾尔文^③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9, 第 71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胡盛鹤。

② C. 茨维伊奇。

③ H. H. 格伯特。

99

王明给库西宁的信

1933年1月7日于莫斯科

尊敬的库西宁同志：

1. 请您尽快阅读和审定这封信^①。它已为东方书记处通过作为基础，并决定应由您最后审定。随后我们将译成中文，寄往满洲。

2. 请您拨冗与我谈一谈中共的一些重要政治问题。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你的王明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5, 第 1 页。

手稿。

^① 指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组织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1933年1月5日(见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5, 第 2—48 页), 最后文本注明日期是 1933 年 1 月 6 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 第 21—45 页)。

10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①

1933年1月10日于上海

全中国的民众们!

日本帝国主义在英法帝国主义及国际联盟的公开援助之下,已经开始侵入华北,这是帝国主义强盗更进一步的完全瓜分中国及奴役整个中国的侵掠。帝国主义强盗侵掠的加强造成了和平居民的整批残杀、城市和乡村的毁灭,以及痛苦与饥荒的增加。上海与满洲的惨状,在大部分的中国土地上,极残酷的重复着。

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中国成千成万的士兵死在敌人的枪炮之下。国民党军阀们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断向后撤退,从而促使日本及其帝国主义者更进一步的侵略。同时国民党用一切力量镇压国内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阻挠建立反帝的武装义勇军。

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阀和政客,解释他们罪恶的卖国勾当的理由之一,就是说中国苏维埃的存在,使他们不能动员一切力量来进

^① 宣言的俄文缩简本发表在《东方和殖民地。红色工会国际东方殖民地分部简报》莫斯科1933年版第1卷,第13页;《中国苏维埃纲领性文件》,莫斯科1935年版,第95页;在瑞金发表的宣言文本有所不同并注明日期1933年1月17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457—458页)。

行国防，蒋介石不愿意与日本军阀作战，而用 80 万大军去进攻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的中国工农。

但是中国民众愿意自己保卫自己。许多部队与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反对屠杀自己的兄弟姐妹，赞成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开始了解，只有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斥国民党的解释是愚笨的谎话，他们想用这些愚笨的谎话在全国民众面前掩盖自己的卖国行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再一次提醒中国民众，我们在去年 4 月已经号召全国民众与我们一起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①。而蒋介石对于这一号召的回答是动员一切军队来进攻中国工农，而不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中国民众宣言：在遵守下列最简单但对切实组织和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必要的条件之下，中国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立作战协定，来共同武装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出版言论之自由等)；(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我们号召中国民众及士兵，拥护这些要求，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

^① 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20日)》(见《红旗周报》1932年5月15日，上海第40期，第1—3页；《中国的苏维埃(文献资料集)》，莫斯科1934年版，第454—456页)。在瑞金发表的文本在文字上有较大的改动(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36—638页)。

更加广泛地开展武装民众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者民族革命战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

委员会主席和工农红军总司令

朱 德

《苏维埃中国》，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3 年版，第 91—94 页。

10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3年1月16日^①于莫斯科

致中共中央抄送共产国际代表^②

由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一个研究小组拟赴满洲和河北去研究日本的作战行动^③。打算在上海召开有中国、日本、朝鲜和菲律宾代表参加的合法的反战大会^④。最好吸收一切真正的民族革命人士参加。应该允许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和国民党的工会(参加大会工作),条件是它们真正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领导的斗争。还有正式通知,在中国,(进行会议的)筹委会领导人是宋庆龄^⑤。请告,不邀请国民党领导人参加能否召开合法的代表会议?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36(1933 年发文), 第 11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① 电报译出的日期。

② A. 埃韦特。

③ 1932年11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派(研究)小组的决定(见第81号文件)。

④ 见第227页注①。

⑤ 这一消息仅在1933年2月见诸于报端。见《反战委员会(研究)小组赴满洲》,1933年2月11日《真理报》。

102

维经斯基和琼森给洛佐夫斯基 和科斯坦尼扬的信

(摘录)

1933年1月16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洛佐夫斯基和科斯坦尼扬同志

在满洲已经持续一年零几个月的战争和游击运动,为争取工人阶级在满洲抗日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向我们兄弟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些任务。

应当说,没有我们(苏维埃远东)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看来将会继续大大落后于因反帝运动高涨而在东三省出现的有利条件。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中共的这种落后状态:满洲被占领初期,东三省党组织张皇失措,大大落后于自发形成的反帝抗日组织和联盟,对国民党的揭露软弱无力、不充分。组织铁路运输工人、矿工、水运工人、农业工人等方面的工作令人不能容忍的薄弱。满洲党组织这样落后的主要原因是领导工作很弱、很不够,缺乏具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党员干部,以及满洲党委会之间因战争彼此失去了联系,州委(在哈尔滨)^①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

我们可以从海参崴给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提供一些帮助。我们已经在帮助它,但现在需要把这项工作扩大一些。我们从海参崴

^① 原文如此。指中共满洲省委。

提供的帮助表现为：早在1932年7月^①我们就以太平洋书记处的名义就抗日斗争问题、参加和领导反帝同盟问题，以及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工作安排问题等给哈尔滨党委会（委员会下属的职工委员会）作出了详细的指示^②。

我们在满洲东北部（即目前王德林部队所在地）与穆稜、琿春和延吉的党委会取得了联系，转发了书报材料（大量的小册子和传单），并与王德林在琿春的一支部队的政治部领导人^③建立了联系，通过此人不仅向东满的党组织转发了书报材料，而且还转发了在日军士兵中散发的日文传单。我们还在满洲通过中国的党组织散发了大量关于李顿委员会^④报告的小册子和关于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满洲国”作斗争的小册子^⑤。当然，做这些事情时，在纸张和印刷方面都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不在我们的印刷厂印刷）。

但是，整个这项工作还做得不够。现在多数老吉林部队将领^⑥已被日军击溃，而为这些将领所利用的、同时又为他们所抑制的、有时甚至直接被这些地主和军阀的代表所镇压的游击运动，无疑^⑦将会有很大的发展机会。即使在初期，击溃这些将领的抗日队伍也会对游击运动产生不良影响（指运动低落），但毫无疑问，今后靠吸收广大起义农民和失业工人以及部分地直接吸收生产岗位上的工人，抗日斗争将会更加扩大。而在新形势下，当由于反对“满洲国”的将领们的背叛（他们由于自己的过错很容易被日本人击溃，因为他们执行投降政策，不让群众抗日运动发展，相反却镇

① 原文如此。应为：6月。

② 见第169页注④。

③ 何人不详。

④ 见第174页注①。

⑤ 小册子没有找到。

⑥ 见第168页注①。

⑦ 原文如此。

压这个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让满洲广大群众知道这一点),争取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变得容易得多的时候,中共在满洲的工作问题就是决定性的了。满洲抗日斗争的进一步高涨与发展 and 工人阶级在这一斗争中的领导权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性和坚定性。出于这些想法,我们认为有必要从以下方面帮助中国共产党:

1. 把在苏联远东呆过多年,在我们这里受过理论和实践教育的中国工人党员调到满洲去交由中国的党委会任用。这样经过精心考察、非常忠诚的工人党员至少有几十名。他们多半是从华北(山东)或者满洲来到我们这里的。他们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我们这里都不^①,把他们调到满洲不会引起任何议论。

2. 继续并扩大我们在书报材料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②

最后,我们要在勘察加、库页岛的优秀日本工人当中招募 15 人到 30 人到我们的莫斯科学校去学习。同样在满洲也要这样做,从那里也可招募 15 人。此外,还应从轮船上挑选 5 名朝鲜人和 5 名中国人,派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学习,一年后再派他们回去工作。

维经斯基,琼森

全宗 534,目录 3,卷宗 907,第 7—10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下面一个词辨认不清。根据意思是:为人所知。

② 以下删去与中国无关的部分。

103

马季亚尔给库西宁的便函^①

1933年1月25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库西宁同志

由于沃罗夫斯基^②同志被捕和被害,必须提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委员们注意以下情况:

沃罗夫斯基同志于[19]31年8月4日回中国。

[19]32年4月22日中共中央报告说,[中共]中央决定派沃罗夫斯基同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去湖南和湖北^③。

[19]32年2月27日^④政治委员会提出让沃罗夫斯基同志留在上海,此事已通知[中共]中央^⑤。

[19]32年5月21日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报告说,已决定派沃罗夫斯基去满洲^⑥。

[19]32年5月27日政治委员会决定:反对通过派往省里的方式将沃罗夫斯基调离领导岗位^⑦。

① 文件副本送皮亚特尼茨基(见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422,第 11—13 页)。

② 黄平。有关沃罗夫斯基被害的消息是不准确的。

③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74 页)。

④ 原文如此。应为 1932 年 4 月 27 日。

⑤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86,第 6 页)。

⑥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89 页)。

⑦ 文件没有找到。

[19]32年6月6日[中共]中央报告说,并未打算将沃罗夫斯基调离领导岗位,他的出差是出于党的工作的考虑,同时指出,沃罗夫斯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摇摆不定,不久前沃罗夫斯基未经[中共]中央允许去澳门会见妻子^①,沃罗夫斯基不会保守秘密^②。

[19]32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报告说,沃罗夫斯基同志已返回,委托他在[中共中央]工运部工作。但是沃罗夫斯基认为,工运部和一般党团^③相同,[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这种看法,并批评了他^④。

[19]32年9月6日[中共]中央报告说,中央工会部^⑤被撤销,沃罗夫斯基在中国劳动联合会^⑥[共产党]党团工作。

[19]32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报告了湖北苏区的反革命阴谋,有党员克柳耶夫、布勃诺娃^⑦参加,而且补充说,沃罗夫[斯基]吸收了许多……^⑧加入党组织。电报的这一部分错乱了^⑨。我们的询问^⑩没有得到答复。

[19]32年9月11日^⑪[中共]中央报告说,政治局讨论了秘密活动问题,并给予沃罗夫斯基以严重警告处分^⑫。

后来,沃罗夫斯基被派往华北去巡视工作。

[193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还不知道沃罗夫斯基同志被

① 埃·鲁特。

②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107 页)。

③ 指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共产党党团。

④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120 页)。

⑤ 原文如此。指的是中共中央工人运动部。

⑥ 原文如此。应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213 页)。

⑦ 分别为:潘家宸、庄东晓。

⑧ 文件中空缺。

⑨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155 页)。

⑩ 见第 68 号文件。

⑪ 原文如此。应为:1932 年 10 月 11 日。

⑫ 见第 93 号文件。

捕,此事发生在[1932]年12月14日。这一天收到电报,建议[中共]中央转移到苏区^①,还建议伊思美洛夫、波戈列洛夫、梅尔库洛夫^②、陈云同志离开。对沃罗夫斯基没有采取措施。

通过从中国回来的同志^③那里得到的口头信息,可以确认,除了这里指出的问题外,在[中共]中央的同志们和沃罗夫斯基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而且中央不是始终都正确。

从上述列举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的一批同志一直试图让沃罗夫斯基离开[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转移到苏区时,没有打算让沃罗夫斯基转移,经常对沃罗夫斯基提出各种指责,而这些指责不是始终都得到了证实。尽管政治委员会多次指示,不能通过派往省里的办法让沃罗夫斯基离开领导岗位,但沃罗夫斯基还是被派到省里去了,而[中共]中央并未向政治委员会报告。同时,应该注意到,沃罗夫斯基被派往天津,他在那里学习了几年,那里有许多人认识他,那里没有合适的秘密机构。

我个人有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中央,或者更确切地说,上海的部分党的领导成员:

(1)在派遣沃罗夫斯基同志问题上考虑得不够周全。

(2)无视政治委员会的指示。

我十分担心这些行为出于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考虑。

马季亚尔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61,第 5—7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 93 号文件。

② 分别为:张闻天、秦邦宪、王云程。

③ 可能是 C. 茨维伊奇。

104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3号报告^①

1933年2月7日于上海

驻华代表^②的第3号报告

致米哈伊尔^③

随这次邮班给您寄去一份详细的和部分十分具体的材料。请您特别注意关于军事形势的报告以及来自鄂豫皖^④苏区的消息。作为对此材料的补充,我将提出一些看法,可以使人在对整个材料没有进行研究之前有个总的印象。

1. 日本的侵略。占领热河[省]的行动没有遭到真正有组织的反对,因此应预料到旧戏会重演:政府和将领们消极怠工,并把国家拱手交给敌人,某些作战部队遭到惨重失败,军事集团和国民党则竭力以这些部队的斗志等等来掩饰自己的罪恶政策。毫无疑问,日本不仅要占领热河,而且要占领包括北京^⑤和天津

① 文件上有皮亚特尼茨基的批注,紧急用俄文译出五份,并把一份俄文稿送米夫同志。文件的俄译稿上有标注:皮亚特尼茨基于[1933年]4月21日收到。关于收到信和材料的电报于[1933年]4月19日发出。他们在军事策略问题上的方针与我们的不一致。但是,我们的电报作了答复。米夫。[1933年]4月21日。这里指的是第112号文件。

② A. 埃韦特。

③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④ 文件没有找到。在这段的边页上有一个标注:应该分开写。

⑤ 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各处应为:北平。

在内的黄河以北整个区域,此外,日本在异乎寻常地加强它在汉口的武装力量,并在市内的一些地方有步骤地修筑工事。可以断定,日本政府打算像在1932年进攻上海那样来进攻汉口。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巨大利益为日本提供了重新同英国讨价还价的条件,其基点是:日本得到在黄河以北区域的行动自由,换取(日本)承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特殊利益和它“撤出”汉口,日本是上海一些地区有无限权力的主人,这些地区的情况明显表明,这种撤退将是什么样子。

2. 英国的意图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肯定会把日本过于深入渗透到河北和长江流域看作是对其利益的危害和威胁。英国希望能保障自己的利益,认为最好是进一步瓜分中国,并且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它施展策略手腕,以保持它在华中的地位,并加强在西南的地位(与美国和日本抗衡)。英国一直支持广州集团同南京的斗争。它从庚子赔款^①英国份额中提供四百多万英镑的贷款用来完成粤汉铁路450公里的修筑工程,其条件是把粤汉线与广九线连接起来。这将会保证英国通过亚洲大陆与香港、汉口等地的直接联系。其次,英国支持建立西南委员会的计划,该委员会涵盖广东、广西、贵州和四川各省,目的是建立一条在同一个中国傀儡政府管辖之下由西藏到缅甸再到香港的不间断路线。在这里,英帝国主义的利益与法国在云南和广西的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

部分铁路贷款应用在粤军的现代化上。这些意图的实施将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些省份引发一些军阀战争。目前,在西南各集团之间当然连遥远未来的什么团结都谈不上。但是存在一些倾向和目标,随着南京“中央”政府不可避免的进一步削弱,将会以更加明

^① 指的是中国应付给英国和其他列强在1899年至1911年义和团起义过程中所受损失的赔款。

确的形式表现出来。日本傀儡政权在华北的建立,和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由于一些因素所致南京政府的被推翻,将会使这些帝国主义的计划具有非常具体的表现形式。因此,没有必要谈论革命的潜力和这种事态发展的后果。

3. 民族抵抗。政府的活动仅限于政治家和将领们发表一些声明,号召进行积极的斗争并表示准备同日本作斗争,以及对军队作一系列的调动,把它们集结在(一些地区),这种调动是很不够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健全的理智相背离的。普遍存在着对军阀军队在对日斗争中遭到惨重军事失败和被歼灭的恐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时政权的最主要基础不仅要被动摇,而且由于革命的影响和吸收很大一部分失望和饥饿的士兵加入土地革命的队伍,以期扩大现有的苏区并建立新的苏区,大部队也将不可避免地要瓦解。远离斗争舞台的广州集团可能进行更多的蛊惑宣传。

偶尔能够遇到一些暗示,即日本向外蒙古和西伯利亚的渗透会引起苏联和中国的联合行动,并希望在这场斗争中得到美国的支持。“官方的”中国所设想的就是这样一幅情景。只是在一个方面存在着一致的意见,这就是在抗日之前,必须消灭红军。但问题在于,谁应该守卫前线。

下级和中级军官中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说这些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那么,他们毕竟还是有一点强烈的反日情绪、隐隐约约的反帝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央政府和广州政府军队中的年轻一代军官尤其是这样,而在各省军队中的军官这种情绪却要少得多。这里在进行辩论,有时还向政府提出抗日的要求。有过这种情况:基层作战部队(直到团)的指挥官与(我们)党建立了联系。但这种情况很少。

士兵基本上要分为两类:绝大多数人参加军队是出于物质上的考虑,他们既不愿意同日本作战,也不愿意同我们打仗。大

部分省籍军队以及部分其他军队正是由这样的人员组成的，加之由于敌人在他们中间不大进行政治工作，并且军队几乎从未获得过薪饷，而往往不得不靠征用品来生活等，所以可以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进一步涣散和在近年来事态发展的影响下的局部瓦解上。

对于另一部分部队（粤军部队，19路军以及中央军部队^①）需要作出另一种评价。它们系统地受过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灌输，借助巧妙的伪民族主义词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卖身投靠的官吏，但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先决条件：“消灭赤匪”）对它们进行过改造。由于它们大部分还处在国民党军官的影响下，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是更加危险的敌人。它们的革命化问题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需要利用民族的屈辱、（国家的）分裂以及政府和国民党的日益降低的威信。

中国各级政府不断压制各种群众性反帝组织和群众的积极性，自然使组织工作变得困难了。毋庸置疑，轰炸山海关在群众中引起的反响要比轰炸上海小得多。如果日本把自己的计谋仅仅集中在占领一个热河省，那么无疑这会比占领满洲遭到的抵抗小得多，遭到的强烈抗议少得多。甚至在一些地区的抵制运动（且不说义勇军运动）会大大减弱，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其他地区抵制运动进行得更加轰轰烈烈。但是，应当把目前的十分不够的抗议运动浪潮看作是暂时的现象。

很清楚，目前我们在善于思考和解释自发的、各色各样的反帝情绪以及群众的斗争决心方面，在把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城市贫民等的经济利益与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巧妙而牢固地联系起来并越来越成为民族革命斗争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方面能走多远，则取决于党的力量和能力。

^① 原文如此。指南京政府的军队。

4. 党的状况。首先我应该说,必须对党所经历的困难有充分的认识。例如,与德国[共产]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从它一成立时起,由革命形势开始到目前为止,没有经历过一个合法或半合法的时期,而这个时期除了一些消极方面外,也有一个积极方面,即便于从工人群众中培养干部。1927年以前的时期只是为党在这方面的活动奠定了基础,即使是这样,当时采取的方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正确的。反动势力或许比在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使为贯彻正确路线而准备群众基础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当然,党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并有了苏区。但是,这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不能取代在其他重要领域培养工人干部的工作。党已经多年不能讨论党内的重大问题了,不能在成功与失败的基础上通过交换意见和批评,包括来自普遍党员和党的工作人员方面的批评的方式来检验自己的经验了。

然而,这意味着,基层组织缺乏领导。这也意味着,许多领导同志在迫不得已和必须秘密进行活动的条件下,没有表现出他们在另一种环境中可能表现出来的那种积极性和才能。抽象地对待具体问题和忽视其他问题,这是许多同志由于处于这种环境而产生的最大缺点。

但是也有一些腐蚀的征兆,需要以极大的精力来与之作斗争。我指的是大约在两年前开始在领导层中出现的情绪:一个人在被捕时应该怎么办?他将“招供”,也就是出卖吗?在党的领导干部中间传播的叛变流行病,从顾[顺章]到共青团书记处的多数成员,直到沃罗夫斯基^①(现在可以认为这99%是可靠的),绝不能用“中国式的严刑拷打”来作解释。应更加深入地寻找其根源:(1)对革命问题研究的不够;(2)领导干部中吸收新的人员,特别是工人,做的很不够;(3)向党掩饰了过去叛变的情节,把这种行为看作是在

^① 黄平。

严刑拷打面前生理上弱点的表现；(4)对意志薄弱和性格软弱的人不适合在中国严格秘密状态条件下担任领导工作缺乏明确的认识，甚至对以前可靠的，但性格不够坚强，现在很快衰退的人也缺乏明确的认识；(5)一方面是敌人非常讲究的斗争手段，屠杀和以死亡相威胁，提供以叛变为代价赎买生命的机会，利用叛徒来达到其宣传和离间之目的，而另一方面是党同这些手法斗争不够；(6)以前叛变行为的腐蚀性影响和党在自己的队伍内和在群众中采取防范措施不够。

这种丑恶现象并不是那么容易根除的，这种状况起着致命性的作用。如果党不进行果断的内部工作，同时加强各种防范措施，这一祸害将来也还会腐蚀党的机体。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这些问题并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我想，您就领导问题所作的决定^①只会带来良好的效果，虽然在某一方面可能暂时行不通。

5. 党的政治工作。过去和现在摆在首要地位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争取保留和扩大苏区的斗争。山海关遭轰炸后，党同共青团一起立即发表了呼吁书^②并开始加强(抗日)运动，尽管做得还不够。1月11日大量散发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联合声明^③，产生的影响要比党的呼吁书大得多。这个声明分寄给了中国和外国的报纸，部分报纸刊登了这个文件的详细摘录。在一段时间里，声明成了各阶层居民讨论的重要对象。我们建议党围绕声明中提出的问题开展长期的运动。目前，这个问题又被推后了一些，在相应的形势下最好重新采取类似的政治措施。

① 见第94号文件。

② 指的是1933年1月7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和进攻华北告全国民众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6—11页)。

③ 见第100号文件。

根据党的领导提供的材料,到目前为止,党已向义勇军队伍派去了10名有经验的同志。有华北义勇军的8名代表来到上海,他们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响应,经过长时间的寻找跟党建立了联系。由于政府暗中破坏和支持不够,义勇军运动正经受着危机。

其次,党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在工厂、学校和地区建立了具有反帝性质的组织和小组。我们的影响很大;始终同各种同情我们的派别的代表一起进行领导。在上海(也是根据党的领导提供的材料)有1万名成员(我个人对这个参加组织人员的数字持怀疑态度)。

我们已着手筹备在上海召开反帝代表大会^①。在北平也将组织这样的代表大会。将尽量尝试半合法地举行这次会议(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让缪岑贝格组织^②的合法组织者来进行由缪岑贝格、巴比塞、宋庆龄等人筹备的上海反帝大会。我们在电报^③中已提出了这个要求)。

工会工作丝毫没有得到改善:曾出现过好的转机(建立纺织工会),但没有带来明显的转变,相反,会员人数又减少了。提出的将烟草工人、码头工人等组织起来的计划^④没有执行;黄色工会中的工作没有得到加强。在许多企业发生了罢工,但比去年要少些(详细情况您可以在寄给亚历山大^⑤的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中看到)。

把上海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的尝试,登记了2万名失业工人,并举行了几次规模不大的示威游行。工会机关和失业工人领导人遭到多次逮捕,但党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够,也导致了这个数

① 见第227页注①。

② 指世界反帝、反殖民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同盟(1927—1935)。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A. 洛佐夫斯基。文件没有找到。

字的减少。我得知您在起草关于中国失业问题的决议^①，我们希望不久能得到这个决议。

6. 党的组织。吸收党员运动，特别是在上海，取得了一些很大的成绩。但是，党不善于稳定住再次吸收的党员。应当说，1800名新党员中有700名又失去了。逮捕行动使部分联系中断了，这也是失去新党员的原因。但主要应归因于政治工作做得不够、没有正确对待新党员和吸收他们的方法不对。在上海，六七月间区委^②成员就遭到三次逮捕。

与汉口的联系很糟糕，又中断了。在广州没有组织，而只有联系。与江西和四川苏区的联系相当好，也就是说，可以很快联系上。现在与鄂豫皖老苏区的联系又恢复了，在那里敌人从我们手里夺走了大片土地。

即使冒着暂时削弱上海工作的危险，也要立即抽调约15名同志到湖北苏区等地和四川苏区去工作；此外，尤其应从四川和陕西派一些同志到四川苏区去。与改组领导机构有关的加强[苏]区[党的]委员会的工作也需要主要从上海派遣一些同志。

7. 苏区的工作。主要是对因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所形成的局势施加影响。我建议您参阅一些除含有军事性质的建议和指令外，还含有我们作出的一些政治方面的指示的军事报告^③。不言而喻，我们从来不能给自己提出从这里领导战役的任务；但是，有瓦格纳^④在，还是能在一些紧迫问题上提出某些建议、警告和指示的。当然，当他本人在那里时，这项工作可以进行得好得多（此事正在安排中）。我用另一种方式再重复一遍上次我已给您写过的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看来指的是市委。

③ 例如见第87、90号文件。

④ O. 布劳恩。

江西情况^①：当赣(江)和抚(河)掌握在江西敌人手里时，中央苏区的局势将仍然是危急的。主要任务不应是占领南昌，而应该是突破抚(河)防线，然后向赣(江)推进。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取得行动自由，不可能将苏区连接起来，不可能占领该省和多少扩大一些中央苏区。不解决这个任务，我们就会始终受到这样的威胁：敌人通过联合进攻(敌人正在狂热地为实行这种进攻做准备)又迫使我们回到游击斗争方式上。

我们同已经抵达那里的党的领导人很认真地讨论了这些问题，过去我们在这方面也曾对他们施加过影响。取胜的先决条件是克服旧的游击思想意识和方法，在有利时机利用各种力量。我们以前的活动未能使战略形势变得对我们有利，但打乱了敌人的计划，瓦解了他们的一部分力量，毫无疑问，更多的是做了克服消极逃避斗争的工作，而不是总是争论。目前的形势要比一年半、两年前更困难了，因为敌人到处都修筑了十分牢固的工事。

至于鄂豫皖苏区，您可以从苏区省委的报告^②中得到十分详细的信息。早在1932年10月8日，我曾向您报告过我们遭到失败的情况，谈到了敌人从我们手中夺走较大一片苏区土地，并迫使我们又采取较为低级的游击斗争方式，虽然他们未能消灭我们的武装力量^③。从收到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的领导机关和指挥员很轻易地把很早建立起来的并搞得很好的苏区让给了敌人，为的是，如他们所说，“保存军队”(就这个问题我们将起草决议，吸取相应的教训)，而现在我只报告以下各点：

(1)对敌人没有作认真的评估，因此对击退敌人的进攻准备不够。

① 见第90号文件。

② 原文如此。文件没有找到。

③ 见第76号文件。

(2)优势兵力的进攻迫使我们进行长期的防御和战斗。这种情况以及粮食不足,有大量伤病员,不仅没有战略方针,而且也没有统一的战术,引起了恐慌。

(3)向安徽西北部撤退后,白白地浪费了18天,为了弄清方向,毫无目的地前进和后撤,恶化了军队的状况。

(4)为了保证自己的“行动自由”,第4军团^①司令部决定放弃苏区。事情怎么会发展到作出这样决定的地步?是在谁的影响下作出的?出于什么考虑?抱着什么目的?这些问题大概是搞不清楚了。

(5)毫无疑问,起初只是考虑暂时放弃领土,还希望很快就回来,因为1932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第4军团司令员^②的无线电报,其中顺便谈到:我们已占领土北(音)、林州等地,现在决定返回老区——黄安和麻城(湖北东北部)。

(6)但是这次行动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恐怕不能认为,它受到了敌人优势兵力的干扰。应该说,由1.3万步兵组成的装备和组织良好的军团,由于具有较大的机动性和集结能力,与能在边远的地区同它作战的军队相比,很快就感觉到了自己的优势。然而,鉴于追击部队人数众多,又农民虽然同情但却消极地对待过往的红军,所以该军团留在河南想必是不可能了。因此,可以认为,关于撤到陕西的决定在行军过程中就酝酿成熟了。

(7)该军团在陕南没有滞留。放弃领土的理由我们一直不清楚,但是,在这里问题不在于敌人优越兵力的进逼,而大概是在于干旱而缺少粮食。最后,在四川,由于发生军阀战争、省内敌军疲惫和哗变,以及居民的积极支持,该军团得以占领约1万到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着手实行苏维埃化。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

① 这里和以下指的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② 张国焘。

[19]33年1月15日在通江召开。

(8)湖北、(河南和安徽)省委于11月底作出红军暂时从苏区撤离的决定,当然,他们也没有认识到采取这一步骤的全部意义,没有得到关于第4军团意图的通报。当他们明白犯了错误时,已经太晚了。该军团带上了无线电台,过了数周后得以与中央苏区恢复联系。然而,与留下的武装力量失去了任何联系。

(9)存在的危险是:如果四川的敌人加紧进逼,第4军团将开始进行新的“旅行”。这种危险性特别大,因为(从省委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取消派在军团中占据着重要职位。这个问题应该认真加以分析。应该派遣优秀的党员干部到军团中去。

(10)基于这种情况,应该更加认真地提出捍卫业已夺取的并已经苏维化的地区的问题。红军的撤退会带来政治上的损失,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离开业已苏维埃化的地区,而且还因为不仅这个地区的工人和农民,还有这个地区以外的工人和农民会失去以往对我们的信任,因为红军撤离后,他们会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任凭白色恐怖的蹂躏。重复[这种行动]必然导致我们力量的涣散,甚至可能瓦解我们的军队。

(11)省领导的文件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过去方针的错误。留下来的同志和军队有很大的功劳,他们重新组织已经弱得多的部分军队和游击队进行抵抗。我们对第4军团领导同志的批评应该力求向他们说明他们的行动和方针的错误,向他们说明正确的路线。现在把一切过错都推到他们身上那是错误的。但同时必须加强军团的政治领导,对其领导组作成一些变动。

(12)撤离的消极方面我已在上面指出了。河南东南部的苏区已被消灭。其他地区也部分地分散了,城市和交通线已落入敌人手中,我们对长江流域和汉口的直接威胁暂时被消除了。另一种坚定的策略(尽管很早以前曾采用过)或许会带来另一种结果(我要指出,问题不在于占领者暂时夺取汉口,而在于扩大和加强苏

区,采取坚决与敌军作斗争的方针,以便粉碎它的大部队,而不是等待它把这些部队集成拳头并转入进攻)。

(13)这个错误可能造成的积极附带结果是:对未来斗争的宝贵教训:首先,克服或者至少减少我们队伍中采取不正确的政治和军事策略的可能性;保存和加强目前的苏区,收复敌人从我们手中夺去的土地,并将进一步扩大这些区域;在四川建立苏维埃,可以掌握和占据该省较大部分区域。这会为长江流域的新战役开辟前景并建立新的根据地(诚然,不应忘记四川省有近30万的白军。迄今为止,有两个师转到了我们方面。见2月1日军事报告中我们的指令^①)。

我现在把这个简略而概括的分析寄给您,为的是大致地向您通报我们和党将采取的立场。

最后有一个请求:我觉得,在关于发展前景的问题上没有意见分歧。在目前中国急剧变化的形势下,需要考虑到革命的巨大潜力。但是,我的意见是:如果想要切实地评估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东西,认清敌人的弱点,就不应过分夸大我们的力量。如果《工人日报》^②(美国)在纪念广州公社周年日的文章中说,似乎我们手中掌握着拥有一亿人口的四分之一土地,那么这样的说法就大大超出了宣传所允许的夸大范围。显然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实际上拥有不到报纸上所说的一半,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剩下四分之一,或者更少。对形势的乐观估计表明,在所有苏区总共有1200万到1500万居民^③,虽然我们之中没有人想到只从这个角度来估计我们的力量 and 我们的潜力。但是,我请求您施加影响,使今后报刊对现实情况作出更切合实际的描述。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49页注③。

③ P. 杜平:《英雄的广州公社五周年》,载纽约1932年12月12日《工人日报》。

※ ※ ※

附言:请用电报确认是否收到这份报告和材料。此外,请不要忽视,我们非常需要经常得到您的帮助以及电报指示和重要情报。

(报告结束)^①

艾尔文^②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9, 第 21—29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埃韦特附言为德文打字稿, 亲笔签字。

① 原文如此。

② H. H. 格伯特。

1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国 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军事指示

1933年2月13日于上海

绝密

给第4军团的指示^①

1. 据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最新情报,敌军的部署是这样:

(1)中央政府军队:第65师已抵达万源,第1师仍在陕南,第44师正开赴鄂西。

(2)第29军田颂尧将军的第4师在嘉陵江边。第1师和第2师将沿右翼经包宁向巴中推进^②,第2师推进到广元以南,第3师位于中心,即包宁以北。

(3)杨森将军第20军的两个旅被派往遂宁,应向蓬安以南推进。

(4)第21军部队向重庆以北推进(第6师在东安<音>,第1旅在大竹和楚<音>)^③。

(5)第28军部队在万山、凉山和开江。

2. 有消息说:

(1)关^④的红色游击队在凉山和开江附近。

① 文件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关于1933年3月5日中国苏区军事形势的报告的附录六。报告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应为:正向……推进。

③ 原文如此。地名不详。

④ 原文如此。人名不详。

(2)贺龙第2军团的一部在四川和湖北边界的成滨(音)地区;第2军团的主力正战斗在湖北与湖南的边界(鹤峰、桑植)。

(3)川军中有起义,南部、东川以及汉中附近勉县(在陕南)有农民起义。

3. 急需预先提醒你们避免犯这样的错误:

(1)不要将你们的基地迁到大巴山。你们的基地应在南江、通江和巴中地区一带,这几座城市应该作为你们的中心和立脚点。

(2)不要相信投诚你们方面的四川军队。对他们应坚持我们以前的指示,即应把他们化整为零,补充到我们的正规部队中去,并从政治上改造他们^①。对于投诚我方的土匪也应该坚持这样的策略。

(3)不要放弃军事战役。你们已经失去了时间,为了防止敌人联合进攻,应立即着手扩大已经夺得的土地。

4. 为此目的,我们建议你们采取这样的策略:

(1)通过并入部队而得到加强的第四军团的主力,应立即向第29军右翼展开有力的进攻,以便占领包宁,如果地形和总的条件允许渡河^②向该城以东推进的话。

(2)与此同时,应该竭尽全力在四个方向开展游击作战行动:广元,陕南,万源和巴中以南(绥亭)。应认真动员农民群众并把他们武装起来,哪怕用最简陋的武器,以便立即投入战斗。

(3)要与凉山的关的游击队和成滨的贺龙的部队建立联系。关应该同你们合作,把第21军和第28军的部队引到绥亭以南。贺龙的部队应向万源推进。

(4)要派一些穿平民服装的同志到第29军士兵中做政治工作,特别是在南部和东川地区以便组织哗变。

① 原文没有找到。

② 河的名称没有说明。

5. 如果这一战役你们未能取胜,要尽一切可能在居民的积极支持下保卫已占领的土地,特别是南江、通江和巴中诸城市。放弃这个新的区域,就像你们放弃鄂豫苏区一样,将是政治上的错误和有害的战术方法。要记住,现在你们找不到比四川东北部更有利的条件。

6. 立即电告你们决定的详细情况。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59,第 55—57 页。

打字稿,副本。

106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国际联络部^①的电报

1933年2月18日于上海^②

急。

[中国][共产]党和工会^③根本没有经费,这是很危险的。请尽快以最迅速的方式寄一大笔钱来。第27号(库尔特)^④。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54(1933年收文),第279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收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文件的时间是1933年2月19日。
③ 指中华全国总工会。
④ H. H. 格伯特。

10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鄂豫皖苏区的军事指令

1933年2月21日于上海

绝密

对军事形势的指令 (鄂豫皖苏维埃边区^①)^②

I

在国民党第四次“围剿”^③时我们所犯的错误

1. 党和军事指挥部在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之初,对于敌人的力量与计划是估计不足的。他们没有看到这次“围剿”具有决定性意义,其目的在于彻底消灭苏区。他们对于红军最初的胜利估计过高,这些胜利实际上只具有局部和策略^④意义。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指挥部没有充分使群众做好进行军事战斗的准备。特别是他们没有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动员,使他们积极参加作战。保护稳固的苏区不仅仅是红军(常备军和游击队)的事

① 此处和以下各处指的是苏区。

② 文件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1933年3月11日报告(见第109号文件)的附录。1933年3月10日,指示作某些修改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给鄂豫皖省委(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07—117页)。

③ 此处和以下各处指的是国民党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④ 中文本上为:战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07页。

情,而应该是所有劳动群众的事情,就是说,应当发展成为民众的战争。只有在这种群众的基础上,才能战胜数量上和技术上占优势的敌人力量。

2. [1932年]8月11日和16日在黄安附近取得胜利之后,本应当去努力追击被击溃的敌人部队。无论哪一个胜利的进攻,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已经消灭了敌人。只有无情地追击[敌人],才能取得胜利。红军不去这样做,反而退却了,并使被击溃的敌人有可能去整理自己的部队。^①这可以说是重大的策略错误。

3. 敌人的用兵计谋,主要的就在于:

(1)以三方面(西南方、北方和东北方)进行集中的进攻,以包围苏区。

(2)占领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路线,以打破通盘的苏区,使其成为许多彼此互相隔离的小苏区。

红军曾企图用到处打击敌人的方法击破这一计划。这便造成了无计划地进行战争,^②弄成在苏区周围与各种敌军部队进行“逃跑竞赛”(“不定战略”和“迂回作战”理论)。红军击溃了敌人的许多部队,但未能完全击溃敌人任何一个部队。

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集中一切常备的兵力,去反对一批敌人,直至把这批敌人最后彻底消灭,并用游击队袭击、牵制、政治分化等方法,去约束和削弱敌人其余的进攻部队,直至红军的主力不能转向另一个战场为止。这样我们便能够顺利地利用红军具有的优势,占领国内交通线。

4. 最初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以及没有充分动员群众,弄成

① 中文本上没有下面一句话。

② 中文本上没有后半句话。以下应为:弄成在苏区周围之很大的行军。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08页。

自己的反面^①：这表现在对敌人估计的过高、领导干部的动摇和红军行动完全没有道理的消极，给敌人赢得了近三个星期的喘息时间（从9月中旬起），使他们得以利用这些时间来实现自己的集中进攻，而没有遇到我们重大的抵抗。人们推测说，似乎红军不能长时间作战，以此来为上述消极性作辩解，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正表明对我们革命武装力量的机会主义的不信任。相反，进行猛烈的或胜利的作战行动的一切先决条件，都在我们方面：敌人几次被我们击溃^②，失去了数千步枪，他们的战斗精神降低了，而我们的战斗精神提高了，群众给了我们物质上的支持。可见，这种消极行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5. 由于所犯的一切错误，第4军^③在整整一个月的疲惫行军后，失去了黄安和麻城老苏区的充分物质基地，终于落入了白军的包围圈^④。这是“不定战略”^⑤和“迂回作战”的结果。但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也不应作出哪怕是暂时放弃苏区的决定^⑥。应当学会把有常备军的基本苏区与游击区区分清楚。前者是我们的政治和物质的基础，应当尽一切可能加以保卫，而且军事策略始终应具有进攻的性质。后者依军事上的必要，可以暂时放弃。在目前情况下，党、苏维埃政府与军事指挥部准许或决定红四军无目标地撤离，无疑犯了严重的^⑦错误。

① 中文本上为：相当的慌张。

② 中文本上以下为：他们遭了几千死伤。见《指战员文集选集》第9册，第109页。

③ 此处和以下各处都应：红四方面军。

④ 中文本上为：由于上述一切错误，在十月间在麻城和黄安老苏区中行军疲惫之后，红四方面军遂处于极困难的地位：受白军包围和没有充分的物质积蓄。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09页。

⑤ 中文本上为：战术。

⑥ 中文本上下面一句为：这样的决定，反映了领导中的取消主义的情绪。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09页。

⑦ 中文本上以下为：政治错误。

6. 在清醒地估计现状^①的情况下,党应当指出,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目的已经部分地达到了:

- (1)鄂豫皖苏区已被包围;
- (2)敌军已部分被击溃,虽然敌人还未能把它们真正恢复;
- (3)苏维埃政府的主力也就是第四军的基本队伍被排挤出其根据地,并彻底撤离这个地区的战斗;
- (4)重要的城市和交通路线,都掌握在国民党军队的手里。

另一方面应当指出,农民由于了解了白军,越来越转向苏维埃政权,游击运动……^②,我们正打算造就常备红军的新干部^③。在采取正确策略^④情况下,我们不仅能保卫保留着的苏区,而且也能扩大和联合这些苏区,这就是说,转入对国民党部队的反攻。

II

目前的军事形势

7. 与去年相比,中国的革命危机还在加深。这迫使国民党派出大部分武装部队去对付苏区,而直接放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至于详情是这样:

8. 四川。第四军依靠农民的革命暴动,已开始川东北建立新的苏区。南江、通江和巴中诸县城掌握在第四军手里。川军两师已被我们击溃,一旅投诚^⑤。与川东游击队的合作正在恢复。

① 中文本为:根据鄂豫皖苏区的现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09页。

② 此处和以下各处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③ 中文本为:他方面应当指出,在苏维埃政府统治下,及国民党军队的痛苦的教训之后,农民是大大地倾向我们方面的,游击运动正在生长造就着常备红军的新干部。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09页。

④ 中文本上为:战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10页。

⑤ 中文本为:川军两师已被我们击溃,一团投到我们方面。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10页。

敌人在集中川军第 20、21、28 和 29 师部队以及陕西、湖北两省的军队^①，但至今他们还未能取得丝毫的胜利。

这样，第四军完全脱离了鄂豫皖省委的权限范围^②。

9. 鄂西和湘北^③。以汉口以东为根据地的贺龙第 2 军团，完全被击溃了。现在在湘鄂边境和川鄂边境与湖南和湖北的军队（约三个师）进行顺利的作战^④。

10. 江西和福建的中央苏区。在 12 月和 1 月的进攻过程中，红军不但能够保住老苏维埃领土，而且能够夺取抚[河]与信[江]之间的新区域，并与赣东北第 10 军建立联络。我们在那里的军事力量增加了。现在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之下，又开始了国民党的新的“围剿”，蒋介石集合了优势兵力^⑤。这次“围剿”可以认为是第五次“围剿”，因为它是在完全新的政治形势下，部分是在新的领土上，按照新的计划，用改编过的军队在新的战线上展开的。

中央苏区对第五次“围剿”做了准备并进行了反攻。

11. 革命的农民暴动和较小范围的游击战争存在于陕南，鄂西北、山东和苏北。

12. 至于湖北、湖南两省（安徽暂放一边）其余苏区的情况^⑥，需要指出下列各点：

① 中文本为：敌人集中川军和陕西湖北两省军队的大部分的力量。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110 页。

② 中文本为：红四方面军再不属于鄂豫皖省委的权限而由中央直接领导。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111 页。

③ 中文本为：湘鄂西。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111 页。

④ 中文本为：以汉口之西为根据地的贺龙第二军团完全被扰乱了。现在在长江南北进行顺利的作战。（镇坪，鹤峰，五峰）。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111 页。

⑤ 中文本为：集合很大的兵力。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111 页。

⑥ 中文本为：关于留存着的鄂豫皖苏区的环境。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111 页。

(1)苏区及其红军的根据地完全建在华阳山(即鄂豫边界的山脉)上,部分是在其南北支脉上。这些地理条件提供了天然的保护,使国民党军队难以深入。另一方面,缺乏便利的道路、稠密的人口和物力资源,也就是说存在各种不便我们武装力量进行改组、联合^①和发起进攻行动的情况。

(2)敌人不但包围了我们的苏区,而且掌握着所有重要据点,这些据点以前是我们的基地,这就是黄安、新集^②、金家集(音)和商城。敌人占领麻城至光山^③的道路,把黄安以北的南西苏区隔离起来^④。此外,敌人在黄安苏区腹地建立了坚固的据点,占领了黄安、河口和七里坪重要据点。这种部署使敌人可以逐步侵入苏区并将其摧毁,虽然它也造成敌人力量的某种分散,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加以利用。

(3)国民党军队的人数已经减少:75师和76师开到河南北部去了,83师开到武汉去了^⑤。此外,在国民党的报告中也未提到58师和新编20师。这样一来,除了当地军队之外,敌人留下总共7至9个师。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我们的压力。

13. 国民党对苏区的进攻仍在继续,^⑥只是在最近他们采取了新的形式(摧毁乡村,消灭物力资源,灭绝农村人口等),如不遇到充分的抵抗,就会缓慢的,但确实要彻底消灭还存在的苏区。面对这种情况,如果空喊准备与帝国主义进行直接战争是当前最迫切

① 中文本为:增加。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11页。

② 中文本上没有下面的地名。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12页。

③ 中文本上为:麻城——黄安。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12页。

④ 中文本上为:把商城以南的苏区(赤南)与黄安以北的主要苏区隔离起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12页。

⑤ 中文本上为:10师和83师开到江西去了。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12页。

⑥ 中文本上下面一句是:也绝对不是农民所估计的,他们已完全陷入失败地位。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12页。

的任务,那是完全错误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努力地继续和国民党军队作斗争,保持现有的苏区和恢复以前的苏区^①。

III 目前的任务

14. 基本的任务就是:

(1)保护与巩固剩下的苏区,首先是鄂东北的苏区,肃清国民党的地方的和常规的军队。

(2)使这些区域复归为一个完整的苏区。

(3)扩大现有的区域和逐渐恢复过去的苏区。

这些任务只有在集中力量进攻敌人一个据点的情况下才能解决,而不是采用全面游击战争的方法。为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动员苏区所有居民,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武装他们,把各种独立单位联合为一个军,并且按照固定的作战计划行动。

15. 为了领导整个这项活动,必须立即组织隶属于省委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应是……^②

此外,在这个委员会中应该有原 12 师师长……同志,他在最近将到你们那里去。

16. 武装力量的改组,应当这样进行:一切常规武装和组建的部队(74 师,75 师,第六独立师,光山、罗山、麻城、黄安和黄陂等地的独立师)都归并到 25 军里去。所有这些部队都应该进行改编,以使 25 军由三个师组成,每师应有三个步兵团,每团至少应有 1000 人。重机关枪和过山炮(如果有的话)以及野战炮应当组成

① 中文本上下面一句是: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扩大苏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112 页。

② 删节号是原有的。

师里的单独队伍。总之,25军至少要有1万支步枪^①和现有的重武器。这样的改编使我们拥有常规作战能力的军队,用这个军队,我们可以顺利地完成进攻性的任务。

17. 我们认为在河南东南部组建新28军,在目前是不适宜的。初期最好是拥有一个装备和组织良好的军,而不是分散我们的力量。如果28军已经存在,那么无论如何不应当拿25军的力量去加强28军。

18. 一切其余的武装力量(赤卫军、少先队^②等)应当组成游击部队;如果在25军中应该争取有常规武器^③(步枪、轻重机枪、野战炮),那么在游击队中没有常规武器,就应该应用一切辅助性武器。拒绝使用大刀、匕首、剑、火枪等是很大的错误^④,这些武器就是在目前条件下也是农民手中很有用的武器。

19. 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建立政治部。政治部的任务如下:

(1) 在苏区内外的劳动居民中进行政治工作,动员劳动群众加入红军和游击队,以便不断扩大我们的武装力量。

(2) 在红军士兵和游击队中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工作,吸收新的战士并领导我们武装力量队伍中的党组织。在缺乏大量训练有素的干部的情况下,你们应该特别争取使指挥员尽可能成为党员,不但能够对战士进行军事领导而且也能够进行政治领导^⑤。

(3) 在国民党士兵中进行广泛的政治瓦解工作。这种工作应

① 中文本中为:一万至一万二千步枪。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14页。

② 原文如此,应为:少年先锋队,下面中文本上还有:民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14页。

③ 中文本上没有下面括号内的句子。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14页。

④ 中文本上为:政治上的错误。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14页。

⑤ 中文本上为:在红军兵士与指挥员和游击队中进行努力的政治工作,必须特别趋向于使红军指挥员入党并且使他们不但在军事而且在政治上去指挥他们自己的下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14—115页。

始终集中在我们的常规军所攻击的那些敌军中。为进行这种工作,必须集合训练少量的干部,即专门为完成这项任务培训的同志。偶尔把这些同志中的一些人派到敌人的某个部队中去。在那里,他们从士兵个人的迫切需求问题(扣发军饷和供应不足等)和民族问题(中华苏维埃政府声明、日本进攻热河等)出发来进行工作,并尽可能建立小的非法的党支部^①。对战俘的工作应重新安排(不要遣散回家,而应进行彻底改造,在后方加以利用,枪毙国民党的顽固信徒)^②。

20. 因为没有全面的情报,当然我们不能从这里作出详细的作战指令,因此下面提出的指令只带有一般指导性质。你们完全可以根据近几个月来的情形加以改变。

(1) 改编后的 25 军应当首先歼灭七里坪的敌军并巩固这个据点。

(2) 要重新夺取和巩固河口。

(3) 在消灭鄂东北我们苏区重要据点上的敌军之后,25 军(包括至今尚未编入的上述师在内)应当转入进攻在黄安的国民党第 13 师以夺取现处苏区中心的这个城市,在敌人以后的每一次进攻中都要尽最大可能去守住这个城市。

在我们第一战役的三个连续阶段中,游击队应该:

(1) 借助佯攻牵制敌人在宣化店、新集、麻城,黄陂的卫戍部队,以阻挠他们投入战斗。

(2) 通过不断袭击敌人的部队和运输纵队,以及破坏电话线、桥梁和道路的方法,使敌人无法利用黄陂、麻城和黄安间,光山、七

① 见第 100 号文件。中文本上没有这段话。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115 页。

② 中文本上没有这段话。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115 页。

里坪和黄安间,以及罗山和宣化店间(鸡公山)^①的交通线。但是我们要明确指出,这些游击行动不应动用我们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我们军队的主要力量始终应用于解决每时的作战任务。

21. 应根据第一次战役的结果来组织对新集敌 89 师的反攻。这次反攻的目的是:夺取光山与麻城间的道路,把黄安与麻城东北的苏区同商城以南的苏区(南赤)^②连接起来。

(1)这次进攻也应由 25 军集中起来的力量进行。

(2)地方游击队应在这个阶段的战斗中千方百计地削弱宣化店,麻城,黄陂和光山的国民党卫戍部队,阻止他们参与夺取新集的战斗。

22. 28 军和驻在南赤地区的红军,在这两次作战行动中应竭力骚扰金家寨和商城的 58 师和 80 师。为支援对新集的进攻,28 军的一部分还应向新集进军,以组织和支援这个城市以东的游击队。

23. 至于将来的作战行动,现在还不能详细确定,要等这前两次作战行动的结果。

总的来说,首先要建立^③一个连成片的苏区,所用的方法是有目的地扩大东方的苏区(25 军和 28 军联合并进一步在数量上和技术上加以完善),消灭商城区域的敌人^④。在我们西南边界上(即对宣化店,铁路,黄陂和麻城)不断地进行军事行动,在我们看来,足以击溃敌人的进攻,如果他们想进犯我们业已恢复的区域的话。

① 中文本上没有括号内的地名。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116 页。

② 中文本上为:(赤南)。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116 页。

③ 中文本上为:恢复。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116 页。

④ 中文本上接下来是:在我们西及南边界上(即对宣化店,铁路,黄陂和麻城),此刻只要保持现有的区域和打破敌人侵入我们领土范围内的一切企图,就完全够了。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117 页。

24. 至于转入反攻的时机,则不要拖延。改组 25 军,不能作为推迟的因素,因为春季月份总的形势是最有利于我们进攻的。江西、四川、鄂西等地之战,以及日本人推进的危险牵制了国民党的所有部队,国民党现在要加强在河南和湖北的卫戍部队有很大的困难。在我们看来,如果你们能够迅速而坚决地去进行所提议的作战行动,那么你们会有很大的机会夺回在河南和湖北的老苏区,并能在国民党将来进攻时保持住这些区域^①。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9, 第 42—54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中文本上为:我们完全相信,你们有很大的机会去恢复鄂豫皖的苏区和保持这些苏区,在将来去反对国民党的军队,如果你们现在能够充分迅速和坚决去执行我们所提议的军事行动的话。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117 页。

108

布劳恩关于中央 苏区军事形势的书面报告

1933年3月5日^①于上海

绝密

对苏区军事形势的总体印象^②

在这里的三个多月时间,我力求整理出一份大家都能看得懂的有关我们苏区和红军军事状况的报告,并对它们的军事行动实行统一的和系统的指导。取得的成果可以根据自1932年12月初定期和较准时发出的情况报告作出判断^③。因为我最近要离开这里(去中央苏区),加之经常见到对我们力量的夸大报告,我认为,最好从1933年3月开始,情况报告^④要附上对实际力量对比的简要概述,并对去年以来我们苏区军事形势发生的变化作出说明。

1. 过分夸大必将造成对真实情况的错误概念

(1)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上说(见1933年1月18日《国际新闻通讯》^⑤):“目前我们已拥有26个

① 日期是根据第105号文件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送别尔津、皮亚特尼茨基、洛佐夫斯基并让萨发洛夫、马季亚尔、王明、安德烈(C. 茨维伊奇)了解。И. 米夫,1933年5月22日。

③ 见第90号文件。

④ 文件没有找到。档案中只保留了两份附件。见第105、107号文件。

⑤ 见第39页注②。

军,15个独立师^①及一些其他部队,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许多倍^②,在军事技术方面,如果不计空军和重炮部队^③,可以说我军与国民党军队相差无几了……国民党第88、30和31师已向我军投诚。”^④

(2)齐华同志在《国际新闻通讯》(1932年12月29日第108期,1932年12月20日第106期等)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写道:

在华北(保定地区)建立了一些稳固的苏区,第4军^⑤有兵力3.5万人,已胜利推进到陕西省^⑥。江西中央军团(红21、3、5军)及红10军有兵力15万人,占领了许多城市,其中包括乐安、宜黄、龙南、邵武。夺回了洪湖地区的苏区。红4军和红2军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向四川胜利推进。在鄂豫皖根据地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⑦。

(3)同时,反复出现这样的材料,说中国的苏区已占据中国六分之一的土地,有人口5000万到6000万^⑧,而纽约的《工人

① 原文如此。这里和下面指一些独立师、旅和团。

②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1932年9月2日)上的讲话的正式发表稿中是:“几倍”,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速记稿》第1卷,第145页。

③ 在王明讲话的正式发表稿中是:在军事技术方面,红军比国民党部队较弱,但除了空军和重炮,即炮兵,我们红军已达到国民党部队的水平(见同上)。

④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上的讲话,载《国际新闻通讯》,柏林1933年1月8日第7期,第246—251页。

⑤ 原文如此。这里和下面应是:红四方面军。

⑥ 齐华:《华北苏区的发展》载《国际新闻通讯》,柏林1932年12月20日第106期,第3398页。

⑦ 齐华:《红军反蒋介石“围剿”斗争的胜利》,载《国际新闻通讯》,柏林1932年12月29日第108期,第3455—3456页。

⑧ 见E. 约尔克、O. 塔尔汉诺夫:《中国苏维埃运动》,载《中国问题》1931年第6—7期,第18页;《国民党五年反动统治下的中国苏区》,上海1932年版,第23页。

日报》已把这些数字扩大到占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有人口1亿^①。

显然,我们在这里碰到的不仅仅是夸大宣传的问题。以下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1)去年夏天认真地讨论过占领汉口的问题。

(2)甚至在这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不核实具体情况,也持这种观点,因而需要根据详实的材料对其加以驳斥。

2. 目前苏区土地面积(人口及军队人数)

表 1

	地 区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百万)	军人数量	
				最少	最多
1	中央苏区	300×200	3.5	30000	35000
	江西—福建	150×70			
	中央军团(第12、10、11、 22、21军),各独立师	100×50			
2	赣西南,第8军	100×50	0.5 ^②	2000	3000
3	赣西北	100×50	0.5?	3000	4000
4	湘鄂边,第2军团 ^③	120×70	0.5?	2000	3000
5	鄂豫皖,第25、28军	100×80 50×20	0.5—0.7	10000	20000
6	四川,第4军团	120×90	1—1.5	10000	15000
	合计	112800	7	57000	80000

① 见第104号文件。

② 原文如此。

③ 指红二方面军——译者。

这些数字基本上是准确的。如果算上苏区之外 50% 暂时处于我们影响之下或我们影响还不够稳定的地区, 即我军暂时占领的地区或游击战地区及其相应的人口, 则总面积将达到 17 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将达到 1000 万。与拥有 400 万平方公里领土和 4 亿人口的 18 个内陆省份相比, 以上面积仅占 1/24, 人口只占 1/40。由于不是工业区, 且城市的数量较少(大多是中小城镇), 因此苏区的人口密度很低。主要的根据地是山地农业区, 这里的人口密度仅为平均密度的 1/3 到 1/2。在上表所列出的地区中, 只有在 1、5、6 地区可以认为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 其余地区是有争议的。

3. 我军兵力的具体分布

表 2

军队	地区	军人数量	敌军兵力	备注
中央军团	赣北	1000	在江西的国民党中央集团军(第 11、14、90、23、24、27、28、8、10、43、52、59 师, 第 32 独立旅, 共计 10 到 15 个师, 15 万人)	兵力对比为 1:7 但约半数以上的国民党军队为守备部队, 加之为我游击队作战行动牵制, 实际兵力对比为 1:3
第 1 军团	(基地—黎川)	6500		
第 3 军团	北到信江	5500		
第 5 军团	西至抚河 ^①			
第 10 军	赣东北(信江以北)	1600	第 21、6、53、55、73、79 师, 第 36 旅	重组第 11 军
	金溪、鲁南 ^②	2400		

① 原文如此。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交的关于 1933 年 4 月 1 日前中国苏区军事形势的报告, 这里指的是信江北岸地区及抚河与信江之间的分水岭地区(见全宗 14, 目录 1, 卷宗 59, 第 72 页)。

② 原文如此, 可能指全南(音)。

续表

军队	地区	军人数量	敌军兵力	备注
第 12 军 (加第 7 步兵师) 第 22 军	资溪、光泽、 泽宁 ^① 、泰 宁、黎川	1800 1000? ^②	第 61、56、78 师 (及第 19 路军中 的其他部队)	敌精锐部队
第 21 军, 第 4、5、8 独立师	瑞丰 ^③ 乐安、 宜黄	1500 近 1500	中央集团军部队 (第 43、23、11、27 师)	仅进行游击 活动
第 8 军	赣西南	2000— 3000	国民党广东第 1、2 路军的部队,第 23、28 师(第 1、2 师) ^④	游击活动
第 16 军	赣西北	3000— 4000	第 16、26、86、62、 63、77、50、18 师	敌军训练较差, 主要是湘军。 游击活动区。
赣南和闽 西南的其 他地方武 装	赣南和 闽西南	最多时 2000— 3000	福建:第 19 路军 (新编第 60、49 独 立旅,第 2、4 独立 旅,第 78 师—— 1/2) ^⑤ 赣西南:广 东第 1、2 路军	敌人占据很大 优势

① 原文如此,可能指建宁。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应为:南丰。

④ 原文如此。

⑤ 原文如此。

续表

军队	地区	军人数量	敌军兵力	备注
第 2 军团 ^①	五峰， 鹤峰， 清平(?) ^②	3000	第 19、34、44 师	仅是从敌方获取的情报
第 4 军团 ^③	四川 (南江， 通江， 巴中)	10000— 15000	第 29 军(第 1、2、 3、4 师)，第 21、 28、20 军的部队， 第 1、65 师	详见军事形势 报告 ^④
第 25 军 (第 74、 75 师， 第 6、第 5 独立师)	鄂东 (红安)	6000—7000 (16000— 17000)	第 13、30、31、3、 15、68、80 师 7 到 9 个师，有 6 万到 8 万人	详见军事形势 报告 ^⑤
第 28 军	豫东南	3000—4000		

由此可见，我们又得出了我们在表 1 中计算出的最大数字 8 万。

至于赣闽中央苏区，根据投诚者的供述所整理的国民党对红军人数的统计材料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当时有第 9 军、第 8 军和第 16 军，总兵力为 62300 人，30600 支步枪，160 挺机关枪^⑥。而在其他地区，我们没有获得来自国民党方面的详细材料。以上数据引自苏区党组织的报告和红军部队代表们的报告。

① 这里和下面均指红二方面军——译者。

② 原文如此。应为：桑植——译者。

③ 这里和下面均指红四方面军——译者。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文件没有找到。

⑥ 文件没有找到。

此外,还有各种小规模游击队,他们受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但不受我们的监控。例如,在直隶^①,四川、河南、山东、广东等省,游击队的总人数几乎超过二三千人。

上述红军部队总起来说抵抗敌军不少于 60 个师,当然各师人数、组织、装备、战斗素质^②等不尽相当(这里不包括战斗力薄弱的常设守备部队及所谓的“民团”)。敌军总数约为 60 到 70 万人,目前闽赣两省就占其中的一半,即 35 万人,而且是经德国教官进行过一些改编的最精锐的部队(南京政府^③、第 19 路军及广东部队)。

敌我双方的绝对兵力对比都是在 1:6 至 1:10 之间,而实际兵力对比,因不计算不参与作战行动的敌军(守备部队和讨伐军),则可确定为这些比数的一半。

至于武器装备,我们红军实际上只有步枪和很有限的机枪,弹药数量也很少,即使在决定性的战斗中,每支步枪分到子弹也很少超过 10 到 15 发。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火炮,即便是轻型火炮也没有。缴获的野战炮,由于没有炮弹和缺乏经验,未能派上用场。战壕白炮也是如此,如在河南和湖北,我们缴获 20 门战壕白炮,但从未使用过。可见,红军不得不依然使用冷兵器与敌人作战,这就加大了攻克敌人防御工事的难度。关于这个问题我还要专门来谈。

在敌人方面,武器装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其机枪和火炮的配备程度已接近现代军队的水平(1 个营有 1 个机枪连;1 个师有 1 个炮兵营;1 个军即由几个师组成的兵团,有 1 个炮兵旅)。敌人使用空军进行侦察、轰炸和给养,尽管规模不大,约有 3 架飞机,但已成为惯例。因而不太危险的数量优势,由于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变成了质量方面的因素。举个例子来说,驻守在赣西南的不特别

① 原文如此。此处及以下应为河北。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应为:南京政府军——译者。

强大的广东第2路军,有2个师、2个炮兵营、1个工兵营,总兵力约1.8万人,步枪1万支,就有轻机枪324挺,重机枪81挺,7.5厘米^①野战炮66门,战壕臼炮33门,另外还有1个空军小分队。各种精良武器与步枪之间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

4. 1932年至1933年的战果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作出一些重要修正,但由于部分地涉及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材料是不完整的。

(1)占领城市。这项任务不止一次地给红军提出过。1932年初还写进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②,并见诸于最近几个月的一些具体指示中。实际上,红军确实占领了相当多的城市。

江西红军不仅占领了《国际新闻通讯》中提到的那些城市,而且还占领了福建的福州,邵武、金溪及江西北部 and 福建的其他城市。但红军没有控制住其中的任何一座城市。这些城市仅在我们手中几天,直到商品和钱款被运出,其后又重遭洗劫,而后又被更强大的敌军部队占领。中央军团甚至得到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专门指示,进行这种实际上的游击行动。面对我们苏区经济基础的局限和敌人的严密封锁,这常常是获取以后进行战争所需物资的唯一出路。但占领城市和十分重要的是将这些城市纳入苏区,这样的结果并没有得到。直接的政治效果也微不足道。

我们在鄂豫皖老苏区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我们苏区的边界都毗邻重要的交通线(铁路、公路)和城市。为了保障我们根据地和红军的供给,曾一度占领许多城市(罗山、黄常(音)、珊瑚山(音)、陈阳关(音)、光泽、吉水等),但这些城市一个也未苏维埃化,未纳入苏区。

① 原文如此。应为:75毫米。

② 指1932年1月9日通过的《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34—47页。

近几个月来,坚决采取了真正占领城市、将其苏维埃化和守卫城市的方针,但根本性转折还没有发生,原有的倾向仍在起作用。

(2)“苏区扩大了许多倍”。我认为,这里应该把那些在政治、行政和军事方面由我们控制的真正苏区,换句话说,真正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地区,与那些红军暂时占领或者只是游击队基地的地区区分开。后者的行政管辖权仍然掌握在敌人手中。如果承认这种划分方法,那么可以说,在闽赣部分地扩大了我们的根据地,并在四川建立了新的苏区。但与此相反,在鄂豫皖即在具有更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损失很大(而在领土方面可能损失更大)。在表1中我还列入了那些无疑有争议的地区(第8、第16军和第2军团作战范围),这些地区已比较早地(部分地区已多年)处于红军的控制之下,并部分地实行了苏维埃化。但将第4军团由湖北经河南、陕西到四川的急行军过程所经过的地区列入有争议地区,那是个错误。因为从当时提出的关于第4军团情况的报告^①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这些地区根本没有尝试开展革命活动。

(3)洪湖。我在这里只能重复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失去了长江流域的这个重要苏区。那里既没有苏维埃政权,又没有红军。应该认为第2军团暂时受到了很大削弱,被瓦解了。它由一支常规军变成了游击队。至于该军团的驻地(这里又是根据国民党的材料,因为没有较直接的联系),约1000人在桑植地区,约2000人在五峰—鹤峰地区。

(4)鄂豫皖苏区。省委很详细的材料^②不会使人对1932年国民党对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在这里也取得了较大的局部胜利再有任何怀疑。绝不能说这次行动被彻底击溃了。即使算上游击队攻占的有争议地区,苏区的面积和人口也减到了原来的三分之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文件没有找到。

一到四分之一(面积由3万平方公里减少到9000平方公里,人口由200多万减少到50万到70万)。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线,甚至包括位于未失根据地中心区域的一些城市和交通线都落入了敌人手中。我正规军主力——第4军团,被排挤出这个地区并彻底退出保卫者行列。似乎向我们投诚的国民党师团现在变成了我们曾占领过的城市的守备部队。

(5)与此相联系,还要说一下第4军团。第4军团向陕西和四川的“胜利推进”实际上是撤退,在撤退中长时间受到国民党第1、第44、第65师的围追堵截。第4军团避免与这些敌军交战,第65师除外,该师被击溃。第4军团进行了许多战斗,主要是与民团作战,并多次突破敌军的阻挡。实际上,第4军团在为“夺路”而战,只是到了川北才停下来,并着手建立新的苏区。

这就是一些重要的修正。

5. 关于交战双方的战术

[1]国民党在同苏区的斗争中利用其在数量上和技术上的巨大优势,制定了系统的既定战术,去年该战术在鄂豫皖已给它带来了局部的胜利,并在对中央苏区发动新的攻势的时候还被它运用到较大的范围。该战术的主要内容是:

(1)对苏区实施经济和军事封锁,对邻近白区的所有贸易活动进行限制,加强邻近城镇和战略要地的设防。如果说经济封锁不是特别有效,那么防御工事则具有很大意义,强行攻占十分困难,因为红军和游击队没有任何技术装备^①。可见,这种战术可以大大阻止现有苏区面积的扩大。

(2)夺取苏区外围地区以及部分苏区内的重要交通线,修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道路,沿交通线逐步修筑堡垒(如在江西境内的赣江、抚河和信江沿岸)。占领城市(自然是有城墙的),同时在城

^① 原文如此。

外构筑 20 个混凝土机枪碉堡并铺设铁丝网加以防护,还有炮兵给以支援,这种情况又会给红军造成新的困难局面。

(3)敌人将其兵力划分为守备部队和突击部队。这样,虽然一方面他们的作战兵力削减了 50%多,但另一方面,我们几乎不可能将自己对敌军的战术胜利扩大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胜利,因为红军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有足够数量的新敌军保卫的防御工事。

[2]即便在组成了正规部队并以老苏区为根据地的地区,红军也还未完全摆脱游击战的思想 and 作战方法。这就使得红军能够轻而易举地夺取一些新的地区和防御较差的城市,但也很容易很快失守。他们回避决定性的战斗,不去强攻设防的据点。在这方面已有明显的转变,但还远远不够。

[3]每一种战术方针肯定都有自己优势的一面,但各种不同战术方针的冲突实际上会导致这样一种状况:即使红军取得许多局部胜利,但迄今为止它们很少能取得决定性的战略优势。

6. 某些政治因素

我不想就此结束报告而不谈那些会给我们苏区和部队带来巨大道义优势,并且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会提供重要机会的政治前提。毫无疑问,这些政治前提是存在的,并将与日俱增。但是,为了对它们作出正确评估,需要对当前军事形势的真实情况作出描述,以便根据双方实力的具体对比,提出相应的任务。

(1)土地革命在许多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它常采取的方式是在当地及其周围地区开展游击运动,如在直隶、山东、江苏、陕西、湖北西部、河南、四川等地。上述省份的许多地区发生的农村逃亡、抗缴捐税及土匪活动,成了土地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预兆。

(2)国民党无力解决的民族问题,因日本人的行动而造成了白军内部强有力的瓦解趋势。热河和华北事件^①完全可能以整个编

^① 指国民党将领的投降主义政策。

制的国民党军队的瓦解而告终，这必然导致这些军队的部分革命化，至少将牵制一大批国民党军事力量。

(3)目前，国民党军队的瓦解已达到不小的规模。军队哗变已摆上议事日程(甘肃的第14师，四川的部队；江西的第21师；被认为是蒋介石精锐部队之一的第83师等)，但是由于我们党没有做强有力的瓦解工作(从白区到敌后)，这些哗变除具有地区意义外，还不具有别的意义，而且容易被镇压下去。我想提醒的是，在白区，我们党仅与11个师建立了联系，而且仅在其一半中起了作用。这段时间做了一些工作(与甘肃第14师，第21、第6、第24师和第19路军建立了联系)。但与我们的能力相比，影响太弱了。

(4)一些军阀集团之间的矛盾，使它们无法协调行动，所以不能发挥数量上和技术上的巨大优势。国民党军阀彼此钩心斗角，产生消极情绪(江西—福建和四川)，所以我军在一个战线上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是可能的。

(5)在被国民党占领的苏区，公然采取了反动的复辟方法(将土地归还地主，催缴租赋，捣毁庄稼，消灭整个村庄及其居民)，这为新的暴动、新的游击战和恢复苏区创造了前提，至少在农村是这样。

在这里我不分析整个政治形势，而只提及那些在战斗中对我方取胜有直接影响的因素。尽管在力量对比上不太有利，但毫无疑问，这些因素足以使我们在实行适当的战术情况下取得巨大的胜利。

瓦格纳^①

全宗514，目录1，卷宗759，第28—41页。

打字稿，副本。

^① O. 布劳恩(李德)。

109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4号报告^①

1933年3月11日^②于上海

机密

驻中国代表^③的第4号报告

我先谈谈其他材料。您将收到关于[中国苏区]3月初军事形势的详细的、具体的和准确的报告^④。我请您稍后尽可能将这个材料改编成教学材料。随该材料附上瓦格纳的报告^⑤,这个报告提供了目前我军兵力的准确数字。尽管我们认为用来做宣传是合适的(虽然这里的说明应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但必须使我们自己都看得很清楚。尽管我已经提醒过党的领导不要作出不可信的夸大,但在就(巴黎)公社周年日写给法国共产党的信中,还是讲苏区人口有1亿^⑥。就算这个数字大致准确,那么每个人都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二百万人的红军能够和应该在什么地方呢?我也无需向您说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和处于现有装备的状况下,20万人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涉及我们的苏区和武装力量。关于未来的政治和革命潜力及前途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如果我们能广泛开展群众工作,表现出更大的组

① 收件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于1933年5月9日收到该报告的。

③ A. 埃韦特。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即O. 布劳恩(李德)的报告。见第108号文件。

⑥ 文件没有找到。

织才能(在白区这是一个薄弱环节),加强苏区的防御,根据情况的变化,利用一切机会转入反攻,那我们的潜力是很有利的,前途是光明的。

关于一些重要事件,我们已通过我们的朋友们^①电告您了。但愿这些电报您都及时收到了。接下来我想请求您将军事材料的副本转交给邻居们^②。

1. 关于一般政治形势问题。在最近的报告^③中我们曾推测,南京方面在热河只对日本侵略军佯攻,同时暗中破坏真正的抗日斗争,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南京连一点儿抵抗的样子都未做,临阵脱逃的国民党将领^④的背叛行为,使战争以失败和军队的实际解散而告终。湖北军队受命解除了从热河逃出来的士兵的武装。目前在防止解除武装方面未取得实际效果的情况下,我们作出指示,要在从热河撤出的军队和北方省份的军队中,开展广泛的鼓动工作,反对将领们的背叛行为及南京政府的消极态度,反对解除武装,争取实行我们的民族革命人民战争路线。

由于战争失利,全国的危机异常尖锐,中央政府的威信,特别是蒋介石的威信继续下降。蒋介石迫于国内日益增长的压力,不得不免去自己监护的张学良的职务,让其离开与江西红军作战的地区,并自任北方“总司令”一职。显然,蒋介石不想真正抗日,而更多的是想保持住自己日益削弱的政治影响,并尽可能将自己的影响扩展到北方。但这些目的均难达到,因为日本很快就要推进到黄河以北地区,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和其指挥官的背叛不可避免。那时蒋介石要比这以前负有更大的责任。因而他夸口在两个

① 指中共上海中央局。

② 指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

③ 见第104号文件。

④ 如汤玉麟。

月内(5月1日前)消灭江西红军和苏维埃的计划也将破产。

现在已明显表现出以下一些趋向:(1)在封建阶级和部分资产阶级人士(包括知识分子)中,以投降换取同日本媾和的分离主义意向在日益增长。(2)西南省份(从广东到四川)的紧密合作,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并为各省军阀集团的利益服务,逐渐采取反对南京政府的方针。西南委员会发表的关于向北方派遣抗日远征军的各种郑重声明,不必认真对待。早先提到的要派往北方的6万“精锐”部队,现在减少到4000人。(3)英国向南京和广州不断施加压力,以迫使他们在“暂时”放弃已被日本占领的省份的基础上与日本媾和。英国想把日本限制在中国北方,因为它把日军的进一步推进看作是对自己利益的威胁和革命的现实机会。但这些打算也注定要失败。(4)最重要的趋向是,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反帝的民族革命热情不断高涨,尽管至今这种热情还未找到一种合适的组织形式,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认识,至今党也未能切实加强领导。

2. 反帝工作。我们给党提出要利用一切合法和半合法的机会,广泛开展反帝工作(当然,是在充分保证党的干部和领导人安全的情况下)。3月8日,在上海召开了一些反帝组织和义勇军组织的代表会议(有65名代表参加),成立了联合组织(保持各参加组织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取名为“国民御侮自救会”(英文是 people Anti-imperialist and Self-salvation Association)。在组织方面,这件事不应给以过高评价,但是如果我们正确地采取行动和加以领导,这个组织的发展和建设潜力是很大的。孙中山夫人^①是主要发言人,她的讲话几乎被几家报纸逐字逐句刊发^②。她和会

^① 宋庆龄。

^② 如《宋女士痛斥背叛者》,载《中国论坛》,上海1933年3月27日第2卷第3期,第10—11页。

议都号召为以下基本要求而斗争：(1)80%的军队和所有飞机都用于抗日。(2)武装民众，组织义勇军。(3)(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民主权利，释放政治犯。(4)停止进攻苏区。我想，这篇讲话的最重要部分您已经收到了。我们还打算在其他城市召开类似会议，扩大组织。还需要充实优秀的领导干部和组织者。

其次，《中国论坛》^①又改为每月出版两期（现在出的是第2期^②）。该刊影响很好，因为重要文章除用英文刊发外还有中文版。就其内容而言，除了存在政治上的不准确和错误提法外，还不够具体和通俗。但这种状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改善。南京政府迅速要求美国领事^③停止出版该报纸，这一要求目前已遭拒绝。

在过去的报告中我向您通报过成立“民权同盟”^④的情况，在我们的影响下，该同盟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并在报刊上有力地揭露了敌人的恐怖活动和刑讯逼供等行为。这些做法逼得曾是该组织成员的一些反动派出来反对，所以该同盟开除了北平的教授胡适。

3. 上海的罢工。目前，合同制码头工人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在我方的巨大影响下，这种情绪可能导致发动和罢工。此外，人力车夫和苦力对中间人的剥削也有很大的不满。有两家橡胶制品厂由于爆炸和火灾造成近百人死亡，大部分是女工。因此，我们再次提出了劳动保护、经济要求、保险以及死者家属救济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这还没有成为上海全体工人的行动。迫于压力，企业主向每位死者的家庭支付了350墨西哥元的赔偿金。

官方的统计提供了以下罢工情况：

① 见第135页注①。

② 第2期于1933年3月1日出版。

③ ㉟. 坎宁格。

④ 原文如此。应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底1933年初成立。见陈漱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1985年，第49页。

罢工时间	1932 年	1931 年
罢工次数	54	56
参加人数	16969	10227
罢工天数	89865	37405

罢工原因：

- 21 次——为提高工资
- 7 次——为改善一般劳动条件
- 4 次——为缩短工作时间
- 12 次——反对恶劣待遇和解雇等
- 3 次——声援其他企业的罢工
- 7 次——其他原因

罢工结果：

- 7 次——完全胜利
- 11 次——部分胜利
- 30 次——没有结果
- 6 次——中途停止

在全部罢工中只有 6 次是通过仲裁法庭解决的，其余均通过直接谈判解决。

1932 年参加罢工的企业有：9 家纺织厂、7 家丝织厂、2 家卷烟厂、4 家印刷厂、4 家中国主导报纸、3 家中国医药商店；此外还有邮局、中国电报局、外国电缆协会、电话局、中国无线电管理局、“通用公共汽车”公司。这次统计只涉及国际租界，而不包括法租界以及上海中国地区的许多罢工和部分规模较大的斗争。

很明显，整个去年，这种趋势在持续增长，多数情况下谈的是工人的要求。工会工作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并没有利用一切机会

来组建我们的工会(各种名称的)和在国民党工会中开展工作。但是,仅仅根据近几个月的材料,就提出罢工运动转入低潮的论点是不对的。

4. 在上海的党。我曾报告说,1932年底征集党员运动取得很大成绩之后,党员数量和共青团员数量又大大减少了。根据党的领导机关的报告,经过新一轮的征集党员运动,这个损失已得到弥补并略有增长。约有2000新党员,所以现在在上海约有4000名党员或更多一点。关于共青团员人数的材料还没有,有报告说,已经恢复到去年的水平或略有增加。因为一些负责的领导同志从一个组织转到另一个组织,以及共青团的六名领导人变节都属于这一时期,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一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安全问题依然很严峻。1932年,上海市警察局逮捕了约250名同志(大部分是领导人员)。除最近逮捕的以外,今年大约也是这个数字,80名同志移交给了中国当局。103个秘密接头地点暴露。在一所住宅,仅文件就被搜出一千多份,诚然,其中大部分不是特别重要的文件。至今具体的作战指示未落入敌手,正在采取强有力的防范措施。

政治工作还很薄弱,基本上局限于宣传鼓动(传单、报纸、集会),示威游行很少,且组织得不好。在企业 and 失业者中的工作很薄弱,很少与群众的日常需求联系起来,对急速发展的事态反应迟缓。

5. 国民党的第五次进攻。我想请您看一看有关军事形势的材料^①,其中含有我们的一些重要指示^②。所以,现在我只谈以下情况:当敌人仅处于发动广泛进攻的准备阶段时,我们就进行了顽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105、107号文件。

强、有效的尝试,以使战略形势变得对我们有利。我方取得了一些很大的战术上的局部胜利,但在中央苏区并未改变对我们不利的战略形势。夺取抚河上设防森严的南丰城的尝试,经过五天的战斗最终受挫(我方有300人牺牲)。我们应该进行这种尝试,以夺取比较有利的防御阵地,并为突破敌人的抚河防线奠定基础。从这次失利(无论如何不能把它看作失败)中,我们对近两个月的形势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详细的指令您将会在关于军事问题的材料中看到)。在这里,我只想根据我们同党的领导产生分歧的程度来谈这个题目:我们建议,在预期国民党很快就要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在三四月份期间,我军不要包围和强攻敌人设防森严的城市(除非国民党军队发生了相当大的分化等),而要利用我军主力在野战中战胜敌军(所有这些都具有具体的指示)。

这里的领导同志们^①认为,这是放弃党的“进攻路线”,是退回到不夺取任何城市的解决办法。这种立场恰恰表明,他们不能迅速而有效地适应正在变化的要求。尽管同志们比较容易相信这一点,但在一定的情况下,任何迟缓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在目前情况下,之所以没有产生这种后果,是因为敌人由于各种复杂情况延缓了行动,而江西的红军领导根据情况采取了比较正确的行动。现在运用的战术带来了后来在战术上的重大胜利。(在乐安和南丰之间地区,全歼敌第52师和59师部分,俘虏近万人,包括指挥部、2000支步枪等,以及10万墨西哥元)。当然,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夺取敌人设防的城市,因此应该再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但不是每天,不是任何时候,而要视情况而定。另一方面,自然必须采取措施,以使必要的和临时的战术改变不被毛泽东等人的错误路线用来只进行游击战。您从给四川及鄂豫皖苏区的军事指示^②中可

① 指中共上海中央局。

② 给四川的军事指示没有找到,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指示见第107号文件。

以了解到,我们现在已经向这些地区下达了夺取一些城市的具体任务^①。但是无论如何目前不能让我们江西的兵力束缚在敌人的防御工事上。

我们还作出指示:现在放弃一直实行的释放被俘士兵的策略,必须对他们进行基本的政治改造,以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红军队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用来从事后方的工作和根据形势的严峻程度加强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6. 其他:已为鄂豫皖苏区拟定了政治指示。针对日本进攻热河,共产党和共青团已向全国发出了呼吁^②,还通过了给党组织的指示^③。

报告结束^④

又及:关于一些小问题我将另写信给您^⑤。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59,第 59—63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① 见 1933 年 3 月 15 日《中央给鄂豫皖苏区党省委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138—159 页。

② 指 1933 年 3 月 3 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与华北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96—101 页。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原文如此。

⑤ 见第 117 号文件。

110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

1933年3月15日于上海

绝密

政治委员会：

答复你们第29号电^①。

我们已派遣宋庆龄女士去南京。尽管她有一些关系，但也没能与沃罗夫斯基^②见面。请作更详细的指示。我们应否提出让沃罗夫斯基同意与国民党合作，但不要出卖自己原来的同志^③？（库尔特）^④。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54（1933年收文），第267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黄平。

③ 1933年3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电报中说：“关于黄平一事，你们可以采取以下行动：南京政府到处宣扬说，黄平已被释放，但我们经过多方努力，也无法查明他是否真的获释。目前国民党不让任何人与他见面，即使那些在欧洲和美国享有公众舆论信任的人物。我们不能相信，黄平签署了脱党声明，我们认为这是国民党企图涣散工人队伍。”见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6（1933年发文），第51页背面。

④ H. H. 格伯特。

11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①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3年3月18日^②于上海 秘密 急件

中央苏区：

1. 我们收到了你们本月15日和16日的电报^③。我们认为形势严峻，请采取一切措施发动群众，立即派遣所有地方力量（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奔赴相应的前线。

2. 东北战线：

(1) 我们同意你们关于让中央军团进攻敌人右翼的决定。

(2) 同时，第21军、第4和第5独立师应开始从右翼和后方进攻敌第2和第3梯队。

(3) 广昌守备部队应加强并坚守到最后一刻。

3. 东南战线：

(1) 下达命令向驻扎在清流和连城的敌军发起反攻。

(2) 同驻守上海的敌人部队展开积极的游击战。

(3) 汀州守备部队应加强并坚守到最后一刻。如有必要，也可从瑞金调新编模范师第1团到汀州。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5月23日收到文件。这份文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交的关于1933年4月1日前苏区军事形势报告的附件之一（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759，第72—81页）。

③ 文件没有找到。

4. 至于第 11 军,你们可根据具体情况加以使用。有两种可能:

(1)如果广昌告急,可派往那里。

(2)如果我们能成功地把敌人阻挡在广昌城下,则第 11 军应向泰宁、建宁及其南部的敌 19 路军右翼发起攻势。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59,第 82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11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3年3月19—22日于莫斯科

绝密

我们总体上同意[中共]中央于[19]32年10月16日转发给中央苏区的指示^②，需要补充的是，在解决军事战术问题时应遵循以下一些原则。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巩固我军的有生力量，加强（政治和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加紧组建红军队伍。将相邻的苏区连成一片的方针并没有取消，但要建立和具备几个新

① 1933年2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讨论了C. 茨维伊奇和王明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后，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简短指示（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359，第1—2页）。1933年2月21日，政治委员会基本上通过了指示草案，责成И. А. 米夫和王明进行最后校订，并交И. А. 皮亚特尼茨基批准，然后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成员（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32，第4—5页）。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一书中（第257—259页），电报日期为1933年3月，发报人错误地写成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② 见第73号文件。

的根据地,使政府军难于同我们对抗。我们积极评价第4军主力向四川转移。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要争取攻占苏区内成为反动巢穴的中心城市,从内部开展行动。对于大城市,在有足够兵力和可能性的情况下要采取包围战术,以瓦解敌人并将其赶出苏区,但不能以我们有生力量的巨大损失为代价。必须建立秘密活动机构和游击队,在我军撤退时它们应开展工作和进行斗争。继续加强军政领导。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加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担任当负责工作。

你们应高度重视苏区的经济政策问题。认真研究和制定相应的指示。请考虑我们提出的以下设想。恶化的经济状况迫切要求进一步明确和修正我们在发展和鼓励生产、活跃市场和商品流通方面的经济政策和专门措施。无重大原因,要避免重新分田,特别是在老区。分田之后农民应当拥有固定的土地,只没收那些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富农的生产资料。要针对雇农制定临时规定,并对中农和富农的雇佣条件加以区分。以往给富农提供份地的条件依然有效^①,不能把这理解为禁止富农出租和买卖苏维埃管制下的土地和雇佣劳动力。地方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应特别重视播种、收割问题,在有可能的地方也要重视社会工作。要加强预算纪律和节约工作,尽可能防止我们的货币贬值。要鼓励手工业生产和贸易活动,这应该在税收政策和为手工业企业徒工和工人制定的临时规定上有反映,同时要记住,社会立法和工会工作等都应符合经

^① 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31年7月31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未参加反对苏维埃武装斗争的富农,只应得到自耕的份地,但不能分好地,同时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过去种过的地,今后仍自己耕种。”(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51页)。实际上这个决议是1931年8月26日通过的。

济实力和红军斗争的利益。开展工会在保护工人利益方面的工作,支持和组织工人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禁止罢工,但不一定都采取罢工形式,所有直接涉及生产和红军斗争利益的重大冲突,应吸收企业主和企业工会代表参加,由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劳动机关解决。要杜绝劳动机关的官僚主义,他们在解决矛盾时不仅要从该工人团体的利益出发,而且要从红军及苏区的整体状况出发。要比过去更加重视合作化运动的建设。我们在苏区的政策应反映出苏区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条件与国统区的根本差别,它应为我们在国统区鼓动和宣传苏维埃政权思想提供材料。只有让农民看到苏维埃政权比国民党政权的优越,他们才会拥护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政策在红军经过或未驻守的地区,应带有最大的演示性质。请告你们对以上几点的意见。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48—50 页。

亲笔修改过的打字稿,原件。

113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的电报^①

1933年3月27日^②于上海

绝密

齐默尔曼于1933年3月22日抵达,收到了1万元^③,转给中国共产党5000元。(库尔特)^④

全宗495,目录184,卷54(1933年收文),第263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3月28日收到此电报。
③ 未指明是何种货币。
④ H. H. 格伯特。

11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①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3年3月28日^②于上海

中央苏区：

1. 西南各省在广东集结了不少于2万人的新军。据报道，这些新军将参加北方的战役，但很有可能被派往赣南。4月底召开的西南政治委员会会议将作出最后决定。无论如何你们应该采取措施开辟西南战线，建立(前线)司令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2月底的电报^③中已经指出，你们应该在粤赣两省边界上将兵力再增加1000人，以对抗广东军队。

2. 我们同意你们本月28日电报^④中所通报的有关北方战线的决定。但由于敌人在乐安—宜黄和崇仁地区集结了大量兵力，你们务必不让自己陷入不利境地。

3. 至于共产国际最近的一份电报^⑤，我们认为，当前它不应该对我们的军事战术作出根本性的修改。在我们看来，该电报是出

① 发报人是根据第123号文件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于1933年5月23日收到文件，这份文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交的关于1933年4月1日前中国苏区军事形势报告的附件之一(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759，第72—81页)。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见第112号文件。

于这样的考虑:万一敌人取得重大胜利,我们必须保存和加强我军力量。而我方取得胜利时,我们应一如既往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始终尽最大努力使我军主力不受威胁。我们请你们与毛泽东密切合作,但要注意完成我们的军事工作,使之不受大辩论和摇摆的干扰^①。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9, 第 82—83 页。

英文打字稿, 副本。

^① 对第 123 号文件中第三点作了少许文字上的改动。

115

维经斯基给琼森和福金的信

(摘录)

1933年3月29日于海参崴

秘密

致琼森和福金同志

尊敬的同志们：

1. 在上一封信中^①我已通知你们，白阳同志已到我们这里，他是满洲区委^②执行局委员，去年来过我们这里。白阳是区党委职工委员会领导人。他带去了我们关于满洲工会工作^③问题的指示信，在去年8月的区委全会上讨论了这封信。白阳同志到来后，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他走后，由于满洲发生了战事，你们知道，我们与哈尔滨失去了联系。我们只与东满及间岛还有联系。我们同穆棱、琿春及其他地方的中共组织保持着联系。他们的信使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向那里的组织发送中、日、朝文的材料，其内容你^④是知道的（我在莫斯科时给你看过）。

1月初，当中东铁路又恢复运营时，留姆金^⑤和其他几位临时需要过境的中国同志和积极分子来到我们这里。他们中有些人已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此处及以下均指满洲省委。

③ 见第169页注④。

④ 原文如此。

⑤ 程道南。

经返回,而留姆金和另外两位同志^①将在这几天返回。

这样,我们现在可以根据他们带来的报告(这些报告已从中文译成俄文,将与这封信同时用单独纸袋寄给你们^②)检查满洲的工作,并与其领导人仔细讨论所有问题。虽然我们还没有起草信件对满洲的工作作出评估并为今后的工作发展作出指示,因为所有报告只是不久前才翻译完(白阳是3月9日到的),但是我认为,现在就有必要就整个问题与你们简单交换一下意见。恳请你们认真地熟悉全部材料,而且还务必让米夫和王明两位同志了解一下这些材料,并告诉我你们对所谈到的问题的实质的看法。近日我将和瓦西里耶夫^③同志一起找白阳、留姆金再谈一次话,之后将单独写信给米夫和王明。信的副本也将寄给你们。

从报告和与同志们的谈话中得知:

(1)整个过去一年,是满洲广大民众反帝、反日情绪急剧高涨的一年,而党和工会却未能充分地利用这一点。我们脱离了民众。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党组织缺乏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并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方针。我这里说“主要”,是因为占领者对一切群众组织和一些革命者实行残酷的恐怖主义,这当然给城市反帝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但镇压毕竟不能解决问题。有足够的事实证明了群众的英雄气概,他们在寻求领导来同日本人和满洲国作斗争。我们的党组织不是在所有反帝组织中开展工作,不是建立各种名称和各种形式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的群众组织,而是转入很深的地下,从那里单纯地宣传组建满洲苏维埃。

过去的一年,国民党在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官吏、小店主和手工业者等)的眼中更加暴露了面目。群众凭经验更加

① 何人不详。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扬松。

确信，国民党的将领们及其来自旧吉林军^①的追随者们，是叛徒和投降日本分子，群众在寻找真正的革命领导者。而我们满洲区委的同志们与这些群众未能找到共同语言，未提出早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决议^②中就已指出的旨在同日本侵略者和满洲国的军事殖民统治作斗争的口号。

满洲组织的工作在未作出彻底转变来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的决议和中共中央最近一封信^③中的指示之前，就不能指望满洲在什么方面的工作会有改进。在这方面，好在我带来了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此信已翻译成中文，是从满洲来的中国同志们在这里起草的，信将带给满洲区委。但我应该说，从与白阳同志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满洲组织的工作方针现在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看来，有些同志会坚持己见。例如，白阳承认中共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但他不认为，满洲党组织工作的落后是由于方针错误造成的。他更加强调整缺乏干部，强调中共中央下达指示太迟。然而早在去年6月，我们（太平洋书记处）写的信就指出，有必要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争取我们在其中的领导权（见我们的信）。白阳是区委领导人之一，看来代表了整个区委的意见（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在他的这种情绪下，要把组织方针迅速改变到正确方面来，希望不大。然而我们打算通过说服白阳和其他同志，耐心和坚持不懈地争取满洲组织的转变。

留姆金同志对这个问题持另一种态度。他理解中共中央的方针，在穆棱地区的实践中，无论在反帝斗争方面还是在工会工作方面，都做了一些积极的工作。最近，我们想把他派往穆棱，再从那里去哈尔滨。问题在于，他不是是一个很坚定的人，我们不相信，他

① 见第168页注①。

② 见《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革命中的战略与策略（以中国为例）》，第316—321页。

③ 见第99号文件。

能足够坚定顽强地贯彻党的方针,因为他本人不相信这一方针的正确性。白阳稍晚些时候将去哈尔滨,他们两人(如果白阳最终支持中共中央的方针的话)将实行必要的转变和提出实际的工作。这样一来,你们可以看到,我还在去年提出的并从那时起不厌其烦地在一些信^①中和在莫斯科时反复提到的问题,即加强满洲党的领导的问题又变得更加突出了。我认为,这样的時候,在满洲未建立起党的坚强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无论如何都必须争取做到这一点。

(2)在工会工作方面,满洲委员会实际上极少组织企业工人,也很少领导经济和政治斗争。这里除了主要问题(即不善于将工人争取日常要求的经济斗争与反帝斗争结合起来,而这是由于[宗派主义]党组织在反帝运动问题上执行了总的错误方针)之外,哈尔滨同志们缺乏工会工作经验,而一些同志根本害怕与工人群众接触,也起了很大作用。

从这些报告中你们可以看出,在一些场合我们的同志没有走在斗争工人的前列,而且明显在阻止他们,在行政当局代表及其代理人面前根本沉不住气。在工人的自发斗争中,由哈尔滨总工会派去的我们的同志,与工人们找不到共同语言,因为事先未作国内总形势和工人状况的说明工作。我们在全满洲仅有几百人在企业里。确实,在目前条件下,他们不仅是工会成员,而且是积极分子,是先进工人。但问题是,在他们周围没有建立起工人的比较广泛的群众性的合法组织。看来,至今还没有着手做这项工作。根据同志们的讲述,日本人完全捣毁了满洲的国民党工会和其他黄色工会。在这种情况下,摆在我们面前特别迫切的问题是,寻找不经官方允许就可把工人群众组织到某种群众性组织中去的办

^① 见第 56、61、72、102 号文件部分章节。

法。在给区委的信^①中,我们将详细谈谈所有这些问题,还要对过去的工作进行相应的同志式的批评(……)^②

此致

敬礼!

斯蒂文斯^③

全宗 534, 目录 4, 卷宗 466, 第 20—21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该文件是 1933 年 6 月底起草的(见第 137 号文件)。

② 以下删去与中国无关的内容。

③ Г. Н. 维经斯基。

116

中共苏区中央局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 (摘录)

1933年3月30日^①于瑞金

江西中央局的电报

1. (辨认不清)

2. 为加强我们在闽西的兵力,防御广东和福建敌军的进攻(因为这里是他们的主攻方向),我们建议在第12军^②[驻地]东南方向组建一个新的军团。重新组建的第30军要加入一个模范团、业已组建的第3和第10师、部分少年先锋队和其他模范支队。我们的第7、第9模范师应同以上部队协同作战。

因此我们在采取行动时,首先将发起向广东军队和第19路军的进攻(他们企图从上杭、永定、连城、武平等地进攻汀州),加强闽西苏区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入反攻。

3. 广东军队暂时还未从那里对我军实施积极的进攻,但我们在那里的力量极为薄弱。我们应该加强刚组建的第6独立师,将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5月23日收到该文件,它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交的关于1933年4月1日前中国苏区军事形势报告的一个附件。

② 原文如此。应为:军团。

其扩编为军^①的规模,也就是不少于1500人,并在地方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新的独立师。所有这些支队都应置于赣南军区司令部的指挥之下,以共同保卫苏区并在粤赣边界展开积极的游击战。

4.[1]我第11军^②应返回金溪—资溪地区,同闽北独立师一起保卫该苏区,并在孝冈、抚州方向开展游击战,要与中央军团协同作战。我第10军^③应留在信江北岸。

在瑞金,除模范师第1团和在东南地区作战的一个团^④外,要尽快组建模范师第2和第3团。

[2]除保证对所有战线上作战行动的强有力领导外,还应加强作战动员工作。革命军事委员会必须转入敌后,同时要建立军事委员会。为指挥中央军团及东南军团,要组建司令部。赣南的所有军队应隶属于赣南军区。

[3]关于划分军区一事我们已经给你们发过电报^⑤。但是,目前我们应该组建赣北和赣南两个军区的司令部,加强闽西军区和会昌—安远—武平军分区。

[4]我们应逐步按新的体制组建军队,这个新体制包括以下措施:(1)组建模范师;(2)在红军的学校里开始按新体制授课;(3)根据现有的可能和条件,开始改组一些军团,扩展和改革红军学校的工作。除扩大高级干部班外,还必须特别注意加强培养特种部队。

[5]动员群众加强红军。除继续招募志愿者外,我们还要把有步骤地将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的所有团和营及模范支队纳入红军的工作置于我们注意力的中心。我们应特别借鉴最近将少年先锋队第2团的两个连整建制纳入红军的经验。在这方面,我们将遵

① 原文如此。应为:军团。

② 原文如此。应为:军团。

③ 原文如此。应为:军团。

④ 未注明部队番号。

⑤ 电报没有找到。

循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①，在少年先锋队的每个支队成立司令部，以便在少年先锋队成员中加强军事政治工作。我们在每个军区都成立了工农武装部。

[6]加强对战俘的工作。我们从最近两次胜利^②的被俘人员中，吸收了 6000 人加入我们的军团。

[7]组织小股游击队，在苏区周围开展游击战。加强在白军士兵中的工作，扩大侦察工作，等等。我们将在开赴前线后根据具体条件提出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就能制定具体的建议。

希望你们能就这些问题尽快给予指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第 83—84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① 指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关于少年先锋队的信，1931 年 12 月通过，中国方面于 1932 年 6 月 1 日收到。见《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北京 1985 年，第 447—454 页。

② 看来是指红军部队于 1933 年 3 月初在宜黄县和江西黄陂地区所取得的两次胜利。

117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3年3月于上海

亲爱的米哈伊尔^①：

我想简要地向你谈谈几个小问题。

(1)我有一个紧急请求：在挑选每一位代表时，请施加您的影响，以便使派到这里来的同志具备地下工作经验或者是经过充分审查的。这较少涉及对技术的掌握，而是要求一个人要善于保住自己脑袋，不胆怯和在这种情况下不张皇失措。我之所以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同元蓬^②共事的经验。

目前，我们为这里的局势所做的工作还没有受到过分的威胁。的确，联络有时中断，但在多数情况下，由于采取了预防和保护措施，很快就能恢复。当然，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我请求您，对每一个可能夸大描述危险程度或“我们的疏忽”的做法，都要设法根据其实际表现，即试图为自己的马虎和怯懦作辩护来对待。

(2)德国的事态发展^③迫使我向您表示：我随时乐意准备去那里工作。至于那里现在是否适于和是否具备条件来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只能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领导来作决定。

我不要求迅速作出决定。我理解这里工作的重要性 and 意义，

①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② ДЖ. 克拉克。

③ 指德国希特勒上台。

我也愿意在这里再工作一段时间。但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声明在目前情况下准备到德国工作。

(3)几个月前我曾建议向我们这里派几个人,使他们在这里租房安家等等。此外,我还建议从美国派一位律师来^①。我请您对此事不必过多费心。来一位律师,在当前形势下,对上海来说只具有一定的地方意义。当然,最好拥有两套与党无关的住宅。但我也很清楚地意识到风险的程度。如果偶然出现一个人,一旦发生什么事,他害怕胆怯,那么最后对我们只会有害。如果您认识德国的一个人,他能合法地在这里住下来并从事专业工作,那就太好了。若是合适的人能无畏惧地完成不十分危险的工作,这样的住所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4)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必要购置一部与党无关的自己的无线电接收机。为此我们需要得到您的批准和帮助。

(5)请您下达指示,在所有电报中不要称呼我的名字,而始终只称“代表”。

此致

敬礼!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9, 第 70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① 见第 90 号文件。

11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1933年4月2日于上海^①

机密

中央苏区中央局：

我们同意你们上月30日电报中^②提出的基本原则。至于细节，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根据我们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我们建议：

1. 不要用持续很久的战斗束缚住中央军团，以便战胜在乐安、宜黄和崇仁躲进战壕里的敌人的抵抗，而要设法在防线之外战胜敌人的有生力量。考虑到敌人兵力集结在南丰附近，在中央军团的右翼，所以必须尽快将其消灭。

2. 由于泰宁和建宁周围的形势仍很危险，需要把第11军^③派往资溪—金溪地区，恢复那里的力量平衡，然后我们才能把该军调往北部地区，而第12军和当地部队将掩护资溪—金溪地区。

3. 在东南和西南战线上，不要进行决战，而应消耗敌人，通过在重要战略据点的抵抗以及前面所说的积极游击战来阻止敌人向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5月23日收到文件，这个文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交的关于1933年4月1日前中国苏区军事形势报告的附件之一（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759，第72—81页）。

② 见第116号文件。

③ 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均应为：军团。

前推进^①。

二、不要过高估计你们最近一段时间的战术胜利。我们仍处在战略防御阶段。这意味着,我们还未强大到能让我们的部队去强攻躲进战壕里的敌人。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首先是在开阔地带。

三、为发动我们在江西的战役攻势,先应完成以下条件:

1. 在北方,至少还必须进行两次类似上次那样的对敌人有生力量的成功打击^②,以便全面监视敌人的行动,获得行动自由,并在想要掌握主动权时就能掌握主动权。

2. 要把前面所说的组建东南和西南战线以及相应司令部的工作进行到底。必须增加那里的兵力,不应以减少我军在北部地区的力量来实现,任务是使我军在那里的高涨积极性,能遏制住福建和广东武装力量的推进,因为我们不能去冒减少我们根据地的风险。

3. 训练特种部队:

(1)炮兵。这以前我们已有训练有素的突击连,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斗过程中缴获敌人的火炮,包括弹药、马匹和火炮班,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的炮兵支队。对战壕白炮、重机枪和其他武器装备也是这样做。

(2)继续组建工程营和化学连,准备同我们的步兵密切配合,将来对设防地区和城市实施进攻。化学战要设置烟幕(用点燃的生竹子、湿草、麦秸或粪肥)来掩护我军的进攻,挡住敌人的机枪眼和火炮观察哨位,使敌人对我军的主攻方向发生误判。

至于工程设施,则要利用竹梯、斧子、长矛和集束手榴弹、装有炸药的罐头盒,以及其他材料和手段来对付敌人工事上和城墙上

^① 见第114号文件。

^② 看来指的是红军部队于1933年3月21日至22日在江西省宜黄县所取得的胜利。

的固定地点。

(3)在我们进攻敌人堡垒之前,应及时将游击队派到敌军后方和敌军密集地区,进行破坏和瓦解敌军活动(捣毁交通线、电报和电话线,破坏机场和空军基地,烧毁后勤供给基地,袭击司令部)。他们还应协助我们的侦察行动,并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间进行政治工作。

我们要强调,如果未完成上述条件,实施由战略防御转入全面进攻则为时尚早。

四、先想到完成上述这些条件,以及对敌人有生力量不断进行有效打击的结果,我们也在考虑着手解决大约两个月后的进攻问题。在晚些时候我们将用电报发去我们的计划。

五、组织措施

1. 福建和广东两省的边界应是东南战线和西南战线之间的分界线。

2. 组建近 3500 人的西南战线作战军队,司令部设在会昌,根据你们的建议,组建工作应在 4 月底之前完成。

3. 组建近 6000 人的东南战线作战军队(正如你们建议的,包括瑞金模范师第 1 团和所有独立支队),司令部先设在瑞金,然后设在汀州,应同时进行。要尽快组建模范师。派往汀州的第 1 团应在那里进行训练。

4. 革命军事委员会应留在北部地区,直到三条战线的所有司令部组建工作结束。晚些时候可以将其迁往首都。同时,在瑞金只设立军事委员部,以便完成动员、训练、伙食、供给和进行政治工作等方面的任务。

六、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走自己的路,任何时候都不要破坏军事纪律。没有任何完全相同的部队,而只有领导指挥的统一和协调行动的统一,以及对少年先锋队的军事训练。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中最为成熟的人员,应当经常被派到红军学校和军士

培训班去学习,并把基层整个建制的支队都纳入正规军。此外,要特别注意用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来从政治和体力方面加强游击小组。也应当训练和使用他们进行侦察和瓦解敌军的工作。

七、训练

1. 目前,你们只组织一个模范师,但这个师人员要满编,要有技术装备,由最优秀的战士组成。这个过程大约到5月中旬应完成。你们要物色教官,在后方与红军军事学院密切合作进行经常性教学工作;这是以后定期向前线派遣培训好的后备力量的来源。

2. 技术支队的全部培训过程应不少于两个月。在制订我们的进攻计划时,可以补派那些指定给模范师的人去学习。

八、政治工作

1. 在从技术上装备我们常规军的同时,应当进行强有力的和系统性的瓦解敌军的工作。你们要培养最有能力的政治工作者、年轻人和游击队员,并根据未来的作战计划将他们派到不同地方。在作战行动开始前的两个月内,他们应在相应的战线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的。

2. 不要释放战俘。在把他们纳入我们部队时,必须把他们按不超过1:3的比例分散到我们的士兵中间。不要把他们分配到未在俘虏他们的战线上战斗过的支队中。要把训练有素的专家(军官、军士、炮兵、机枪手等)作为训练营和学校中的教官来使用,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督。不应把作战部队和司令部中的负责工作委托给他们。

3. 给每个司令部和高级支队(师、军)的指挥官配备一批政治工作者,直接对战俘进行政治教育工作和在重新占领地区的居民中进行宣传工作。在部队向前推进时,他们应留在后方,领导重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然后返回(自己的司令部)。

4. 根据以前提出的条件重新发表抗日斗争《宣言》^①，并在敌军部队、战俘和敌后居民中进行宣传。也要利用国民党军官的声明^②。

其余事项按你们电报中建议的那样并根据以前的决定办。所有谈及的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革命军事委员会都应严格保密。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9, 第 85—87 页。

英文打字稿, 副本。

① 见第 100 号文件。

② 指 1933 年 3 月 24 日八名国民党军官发表的声明, 见《国民党指挥官的支援》, 载《中国论坛》, 上海 1933 年 4 月 13 日第 2 卷第 4 期, 第 9—10 页。

1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

1933年4月3日于上海

绝密

我^①已把你们关于军事战术的电报转给了中国共产党^②。我们的意见是：

1. 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在同国民党进攻的斗争中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整个联邦^③苏区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上个月果断进攻的结果。

2. 总的说来，我们不能采取诱敌深入到苏区然后将其消灭的战术，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苏区还是太小了。如果我们失败，当地老百姓就会对我们失望，我们就会丧失补充红军队伍的可靠来源。

3. 我们把我军的机动性理解为常规部队和从后方打击敌人的游击队的联合行动。这种战术可以使我们在苏区之外顺利作战，避免重大损失。

4. 保卫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老区，同时我们要在被动员起来的当地居民的帮助下，继续坚决追击敌人。在安徽、河南和湖北各省都有过这种作战经验。总的说来，在进攻城市和设防严密的战

① A. 埃韦特。见第123号文件。

② 见第112号文件。

③ 原文如此。应为：中央。

略中心时……^①，使用抵抗战术……进攻我们的阵地^②。正是依靠这种战术，在最近两个月内，我们歼灭了[敌人]5个师。

5. 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你们的意见可能在领导层中引起分歧，并影响[协同]工作。我们同意你们关于毛泽东问题和一般政治问题^③的指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54(1933 年收文)，第 257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此处和以下各处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原文如此——译者。

③ 见第 112 号文件。

120

艾萨克斯^①关于宋庆龄同黄平 1933年4月6日^②谈话情况的报告

1933年4月7日^③,地点不详

绝密

致共产国际、亚历山大^④、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
黄平事件^⑤

宋庆龄女士同黄平的谈话

当司法部长罗文干来到宾馆^⑥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⑦的代表团见面时,除了苏吉(孙逸仙夫人)外,他拒绝同任何人谈话。苏吉希望有个证人,就坚持让杨铨同她一起去。他们去了罗文干的住处。在谈了同盟的所有要求——释放政治犯,有礼貌地对待监狱中的犯人,取消刑罚,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释放5名在押犯(罗登贤、廖承志、于文华、陈赓和陈淑英),不将他们送交军事法庭——以后,罗文干说,这些犯人在国民党手里,国民党有权控制一切,甚至司法部,所以这不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他曾替他们求情,但国民党说,他们希望把犯人留下来,他们同犯人谈话,想迫

① 作者是根据第123号文件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晚于1933年5月19日收到文件。

④ C. A. 洛佐夫斯基。

⑤ 显然是A. 埃韦特起草的。

⑥ 指南京的“扬子江”饭店。

⑦ 见第345页注④。

使他们为国民党做工作。这时，苏吉把话题转到了黄平案件上，并表示希望同他见面。罗文干说，黄平从未在他的掌控之下。国民党控制一切，甚至司法部。苏吉对此提出抗议，并说司法部应是独立的。罗文干说，他一点也不了解黄平的情况，但苏吉请他帮忙让他们见上一面。罗文干叫来自己的秘书^①，吩咐他帮助安排一次见面。秘书犹豫不决，看来他不想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他反对这件事，而是由于害怕国民党。他说，黄平不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而是住在一个私人寓所里。苏吉仍坚持同他会面。

当汪精卫来到宾馆看望代表团时，苏吉在提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关于其他问题的一般要求之后，又提出了黄平的问题。汪精卫回答说，黄平还活着，身体很好，他将尽量安排苏吉与黄平见面。他答应当天晚上就安排见面。但是晚上过去了，却什么也没有做。就这样，苏吉也毫无办法。但次日早晨（4月6日），汪精卫的一个秘书^②通知说，一个叫常仲昌（音）这类名字的人^③，将在上午11点左右到宾馆来，带她去见黄平。11点过一会儿，有人敲苏吉房间的门，并问在哪里可以见到代表团。当苏吉打开门时，看见前厅里站着几个男子，苏吉接待了他们。当时他们中的一人说，他们把黄平带来了。苏吉提出抗议，说要求允许她去见黄平。说话的这个人差不多和黄平一样高（椭圆脸，戴眼镜，牙齿很白，像动物的牙齿一样），他凶恶并嘲弄地微笑着。他看上去28到30岁。他对苏吉说：“我接到了把黄平带到您这里来的命令，我应服从命令。”

苏吉问：“黄平是哪一位？”

这个人指了指在场的一个人，苏吉看到，此人完全符合对黄平的描述。

① 何人不详。

② 何人不详。

③ 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各处应为：张聪（见第398页注②）。

苏吉说：“我要求所有人，除了黄平之外，都从房间出去。我想单独同他谈话。”

刚才说话的那个人做出了很气愤和恶狠狠的样子，回答说：“不行，我按照命令把他带到这里来，并且我接到指示，不能把他一个人留下。他完全可以自由谈话，并自行回答任何问题。”

苏吉坚持说，如果黄平是个自由的人并且能够说话，那么她就应该与他单独交谈。她对说话的那个人说：“我要让您的上司汪精卫知道，您否认我有同黄平交谈的权利。”

该男子勃然大怒。最终，他和苏吉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杨铨试图干预。杨铨请求大家离开房间，黄平除外，对此卫队长^①断然拒绝，杨铨于是请另外两个男子离开，其他所有人也同他们一起离开了。大家都走了，除了一位姑娘，苏吉的一个女友^②。

苏吉问卫队长：“您是谁？”

他回答：“我叫林康。”^③

苏吉说：“请把您的名字写下来，还有您的地址。”

这个人不太情愿，但还是写了。他写得很慢，清晰地写出“林康”这个名字。

苏吉说：“我要求您离开房间。汪精卫对我说过，如果黄平是个自由人，我可以与他谈话，而您说他是自由的，那他可以和我自由地、单独地谈话。”

林康说：“我们不能把他留下来，因为他的揭发，共产党想杀害他。他的生命处在危险中。我们应该保护他。”

苏吉说：“我不是共产党员。这一点您非常清楚。我到这里来不是要杀黄平。您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害怕把他和我留在一起吗？”

① 身份不详。

② 身份不祥。

③ 原文如此。可能是林刚。

林康冷潮热讽地蛮横地笑着说：“因为您是国母，我们将为您做一切。我们甚至可以把所有背叛自己党的共产党员都带到您这里来，而他们很多，可给您带来与他们见面的快乐。但我接到严格的命令，不能离开黄平。”

他和苏吉之间的争吵又持续了很长时间，苏吉最终也未能和黄平单独谈话。苏吉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带来自己的女友，这时这位姑娘走近林康，试图用与他交谈的方法转移其注意力。但林康恰好坐在苏吉旁边，眼睛始终不离开苏吉，用最厚颜无耻的方式盯着她的手、脚，同时观察着也坐下来的黄平。

苏吉转向黄平用英语对他说：“您是黄平吗？”

黄平没有看她的脸，虽然她希望这样。他低下头，表现出一副很沮丧和受压抑的样子。他用英语回答说：“是的。”

苏吉说：“您是在上海圣乔治大学^①学习过吗？”

黄平说：“不，是在洗礼教教会学校。”

这时林康插话，对苏吉说：“您可以随便问他，他有权准确回答您实情。”

这时苏吉明白了，林康懂英语，她说：“您会英语，是吗？”

林康说：“是，我懂英语、法语和俄语，尤其是俄语。我可以做所有的翻译。”

苏吉由此明白了，他不懂德语。这时她转向黄平用德语对他说：“您是沃洛夫斯基^②吗？”

他慢慢低下头，小声地用很差的德语说：“是的，我就是。”

苏吉说：“听说，你出卖了自己的党，这是真的吗？”

黄平（避开她的眼睛）说：“是，这是真的。”

这时候杨铨走进房间，把其他人留在门外。

^① 原文如此。指的是圣约翰大学。

^② 黄平在苏联时使用的俄文名字。

苏吉用英语对黄平说：“您身体怎样？”

黄平说：“我身体很好。”

苏吉说：“您的气色很不好。”

林康恼火地说：“他的身体现在很好。但一开始，当他刚从天津来时，身体不是这样，因为他在天津被捕时，曾企图触电自杀^①。”

苏吉(问黄平)：“这是真的吗？”

黄平低下头以表示确认。

林康说：“这以后对他照顾得很好，他得到了好的伙食、好的衣服，他的住处也很好。我只是觉得，由于突然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他精神上感到痛苦。”

苏吉凝视着黄平，尽量迫使他看一下她的眼睛。但黄平极力回避她。

这时林康又说起话来：“孙逸仙夫人您自己应当明白，一个具有政治历史的人，突然改变自己的信仰，是多么痛苦的啊！”(这句话是用恶毒和嘲讽的语调说出来的)

苏吉指出：“没有人会突然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只有在长期确认这些观点不对之后才会改变。一个人只有在有人用刑罚强迫他改变政治观点时才会感到痛苦。”

林康说：“啊，那么您就问黄平，他是否是自愿作报告，在报纸上答记者问的，等等。您问他，在处于党中央控制时，他是否受过刑罚？”

黄平抬起头，看了看苏吉，然后看了一眼林康，又看了看苏吉，说：“在来这里之前，林康先生对我说，我可以说我想说的一切。我自愿召开了新闻记者招待会。我承认了自己加入共产党的错误。在这样混乱的社会状态中，一个人很难辨清是非。国民党给我两条路供选择。我选择了第二条路。”

(很明显，第一条路是死，他对她说了这一点。)

① 原文如此。

黄平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几乎哭了。他的样子是那样不幸，以至于苏吉以为，他现在就要嚎啕大哭起来。他全身颤抖并摇晃着。他不想正眼看一下苏吉，为了自卫，他看着杨铨。

苏吉看了一眼林康，问：“是否允许他看报，是否允许他与外界保持联系？既然您说，他确实是自由的，保护他只是为了提防共产党人，那么他应该有这些权利。”

林康说：“为他提供了一切可能。”

苏吉说：“那么怎样解释，他的妻子^①并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黄平突然看了一眼苏吉，然后又低下头，说：“因为我不喜欢写信。好久以前我在报纸上看到过，您组织了民权保障同盟。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组织，我高度评价同盟派自己的代表来看望我。”

苏吉(对林康)说：“怎么解释，您现在不让他看报纸？”

林康说：“允许他看一切他想看的東西。”

苏吉说：“黄平，您是怎样度过自己的时间的？您做什么事情，读书吗？”

黄平说：“我没有读书的爱好。我的身体需要休息。我请求国民党为我提供三个月的休假，这期间我就可以决定，我能用什么方法帮助改造中国。按职业说，我是一名机械师，我想重返技术工作岗位。”

苏吉(对林康)说：“党对他的请求做出了什么答复？”

林康说：“事情还在研究阶段。”

苏吉(对林康)说：“您在南京这里做什么工作？”

林康说：“我为外交部做翻译工作。我是在苏俄接受的教育。以前我曾是共产党员。”

苏吉说：“您早就是国民党党员了吗？”

① 3. 鲁特。

林康说：“我是民国13年加入国民党的。后来我在北平被张学良逮捕，蹲了六个月监狱，后来有人干预才被释放……”^①（他继续说自己的事情。苏吉不再听他说。她极为愤怒，因为十分清楚，黄平是作为犯人而被带到她这里来的，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他们迫使他说的；他试图对她说些什么，但不能说。）

苏吉（对林康）说：“您说，您在监狱中呆过。这样，您应该知道犯人所受的痛苦。您应当同情黄平和其他政治犯，并关注他们，使他们不受刑罚。我们的政治犯所具有的才能很少见，需要加以保护，以拯救中国。”

林康说：“啊，是的，我知道，我知道！您可以问黄平，难道我不同情他，不好好对待他？”

黄平说：“是的，常先生对我很好。”

（苏吉捕捉到了“常先生”一词，她明白了，黄平是在告诉她，这个人姓常，不叫林康，但苏吉做出未察觉到这一点的样子。当黄平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抬起头，凝视着苏吉的眼睛。她用眼神默默地回答了他。）

苏吉（对杨铨）说：“我试图与黄平谈话，但我完全明白，他不能自由地与我交谈。这是徒劳的。他是囚犯。如果您想跟他谈话，那就请吧。您可以向他问您想问的问题，但对我来说，再继续向他提问题绝对是徒劳的。”

黄平耷拉着脑袋，而“林康”（姓常的）恼怒地说：“黄平先生绝对是自由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苏吉（气愤地）说：是的，在您在场的情况下！我应当告诉您，民权保障同盟对他的政治信仰完全不感兴趣。我们只是想知道，他是否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是否遭受过刑罚或不好的待遇，他所做的一切是否是被迫的。同盟只对这些感兴趣。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

(苏吉说这些话是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苏吉转过身去,由于愤怒而显得激动。

杨铨转向黄平说:“不要因为现在的处境而悲观。您首先要恢复健康。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林康”(常)讥笑地说:“就这些吗?”

苏吉说:“是,就这些。”

黄平和“林康”(常)起身走向出口。黄平走路的样子完全像是一个疲乏无力的残废人。他站不直。当他还在房间里向门口走去时,苏吉生气地大喊一声,对自己的女友和杨铨说:“瞧,他是怎么走路的。我们应当把这个情况告诉同盟!”

“林康”(常)转过身来,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一样说:“您可以问黄平,自从他来我们这里以后,他是否受过不好的待遇。您问他!”

苏吉气得不知说什么好。她什么也没有说。谁也没有说话。

苏吉说了以下情况:她知道,在黄平被带走后,他受到了残忍的毒打。挨打不是因为自己说的话,而是因为他的所有行为,这种行为十分清楚地说明,他是一个囚徒,是一个处于绝境的人。与黄平见面之后,苏吉难以入睡。她说,她只想到武器,如果她有武器,她就会用力把它拔出来。她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场面。

(他们走了之后,杨铨告诉苏吉,门外站着的那两个人同他聊过,他们对他讲,和黄平一起在房间里的那个人,是常先生。他们说,在中国,大家都承认国民党拥有最高权力,但是民权保障同盟不承认这一点。苏吉还得知,黄平有一个弟弟^①,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工作,由于他的干预才挽救了黄平的性命。)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442, 第 26—35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何人不详。

12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3年4月7日于上海^①

致中央苏区

一、蒋介石返回江西,原因是:第一,不想抵抗日本人发起的新攻势;第二,因为不久前我们在江西取得的胜利^②。他们将作出新的努力来恢复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二、我们在东北战线的任务是:

1. 破坏永丰、乐安、宜黄和南丰地区敌人的后方。
2. 把敌军从上述设防的地区诱骗出来,并在开阔地带将其全歼。

三、为此我们建议:

1. 第22军^③在南丰地区组织一次佯攻,并借助不断的破坏活动,切断南丰与南昌之间的交通线;
2. 第4独立师在宜黄地区行动;
3. 第5独立师在崇仁地区行动;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5月23日收到文件,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交的关于1933年4月1日前中国苏维埃地区军事形势报告的附件之一(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759,第72—81页)。

② 见第366页注②。

③ 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各处都应应为:军团。

4. 第 21 军在乐安地区行动,并切断乐安与永丰之间的交通线;

5. 约 1000 名中央军团战士在永丰附近组织一次佯攻;

6. 中央军团的主力在乐安以南集结,派一些小分队到永丰、乐安、宜黄和南丰附近进行侦察,并准备对敌人的移动部队实施突袭。

四、现在不应进攻设防坚固的据点。除中央军团外,我们的任何一个支队都不应参加决战。但是中央军团应跟踪敌人的移动部队并坚决将其歼灭。

五、请刻不容缓地和详尽地向我们通报情况,至少一周两次。

六、现通知你们,我们又在准备一份苏维埃政府和军事委员会驳斥国民党谎言的声明,国民党说什么似乎日本在帮助中国红军。^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59,第 87—88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① 指 1933 年 4 月 15 日发表的《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卷,第 470—473 页;《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载《中国论坛》,上海 1933 年 5 月 4 日第 2 卷第 5 期,第 2—3 页;《苏维埃中国的战斗宣言》,载《在国外的东方》,塔什于 1933 年第 5 期,第 105—106 页。

122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1933年4月5日中国苏区军事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的补充

不早于1933年4月7日于上海^①

秘密

对1933年4月2日军事形势报告的补充^②

截至1933年4月5日

江西——福建

一、我们力量的改组

本应在4月份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会,鉴于进行持久的、需要全力以赴的战斗而被无限期推迟^③。代替这次会议,5月初将在东北战线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④。在日程中专有一项是军事形势。作为对我们1933年3月10日电报^⑤的补充,中共中央局寄来了军事工作问题决议案,标明日期是3月30日(见附录1)^⑥。

① 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5月23日收到文件。

②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出的关于1933年4月1日前中国苏维埃地区军事形势的报告。文件未发表(见514全宗,目录1,卷宗759,第72—81页)。

③ 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见第281页注⑧)。

④ 原文如此,应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此次会议于1933年6月上旬在宁都举行。

⑤ 文件没有找到。

⑥ 文件没有找到。

在1933年4月2日的复电(见附录2)^①中,强调了以下几点:

1. 目前,我们在中央苏区还在继续进行战略防御。要继续在“开阔地区”打击敌人。

2. 夏天将发起攻势,目的是突破封锁我们地区的工事地带,坚决扩大我们的根据地。这取决于今后的胜利和广泛的准备工作。主要条件是:

(1)建立哪怕是最起码的军事技术。

(2)强化和全面进行政治准备。

据最新消息,我军事力量已出现不断增长的较为有利的局面。如果能像预计的那样切实将6000名俘虏编入我部队,那么再加上4月底之前对内部资源的动员,并考虑到我们机动力量的总数,将不少于4.5万人。

二、东北战线的状况

由于1933年3月21日在乐安以南地区取得的胜利,根据[1933年]3月29日的补充电报^②,全歼了敌第11师、第9师一个团和第59师唯一一个未被打败过的团。共缴获:6000支步枪,几百万发步枪子弹,90挺机枪(?)^③和100多支自动左轮手枪。

敌人继续撤退,现在(除在南丰的第8师)敌人部署在永丰—乐安—宜黄—南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赶来增援的部队有从赣江来的敌第43师部队和(从华北返回的^④)第57师部队。敌主力(第9、10、14、90师)部署在乐安以北,而第6师部署在崇仁。其他方面见“兵力部署”(4月1日报告的附录3)^⑤。

中央军团利用已有的战绩,从3月25日起继续攻打乐安,但

① 见第118号文件。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原文如此。

④ 原文如此。

⑤ 文件没有找到。

由于该城设防非常坚固,未能将其攻下。中央军团为此伤亡 600 人。对各据点的佯攻已展开,为的是把敌人从防御工事中诱骗出来,将其歼灭在“开阔地带”。(见附录中的 1933 年 4 月 7 日指示)^①。

蒋介石于 1933 年 4 月 3 日来到江西,在我们看来,这不会对我们有利的总的形势带来实质性变化。相反,我们寄希望于政治角逐的进一步激化,由于这会延缓广东军队策划的进攻,因此会更加改善我们在福建的处境。

三、红 16 军^②

红 16 军在赣江方向作战(正在尽力渡过赣江)。国民党第 32 独立旅被派去增援湖南军队,与红 16 军作战。

四、第 10 军

根据中共中央 1933 年 4 月 3 日^③的电报判断,第 10 军在贵溪城下集中了 3100 人(按从前的资料,它的组成人员还少得多),以攻击国民党第 83 师。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59,第 89—9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 121 号文件。

② 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各处应为:军团。

③ 文件没有找到。

123

埃韦特^①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年4月8日^②于上海

绝密

第5号报告^③

一、总的政治形势

1. 正在尽最大努力使南京和日本达成直接协议。以麦尔斯·兰普森为代表的英帝国主义在狂热地做这方面的工作。日本驻华大使内田康哉在为日本提供“喘息机会”创造根据方面进行活动。迄今为止,谈判尚未结束对根据的试探阶段,因为日本坚持要让南京“正式”承认它的占领,但南京政府不敢这样做。由此引发了日本后来在河北的行动。从北美消息来源得知,考虑到南京政府的处境,现在在试图达成哪怕是非正式的协议,但很值得怀疑的是,日本现在是否会同意这样做^④。投降的危险性很大。主张“抵抗和谈判”的运动在有步骤地进行。首先,这是旨在蒙骗人的辞藻,其次,这是现实的策略。最近,日本要在察哈尔省假造“独立运动”,目的是为入侵内蒙古奠定广泛的基地,并准备将来进攻苏联后贝加尔地区,占领这一地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孤立海参崴,切断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贸易通道,从而为自己的“北方政策”打下

① 作者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5月19日收到文件。

③ 文件上有批注:送皮亚特尼蒋基、别尔津、洛佐夫斯基,并向王明、萨发罗夫、马季亚、安德烈(C. 茨维伊奇)了解。И. 米夫,[1933年]5月23日,东方书记处。

④ 日中停战协议于1933年5月31日在塘沽签署(见第458页注⑨)。

基础。

一位英国上校^①从西藏来到新疆,要把突厥伊斯兰教徒组织起来。尽管南京政府竭力闭口不谈所有这些情况,但报刊上还是刊登了几篇令人惶恐不安的文章,谈到这些受帝国主义鼓动和组织的起义倾向的危险性^②。

2. 最近几周(自我3月报告以来)^③,南京政府的状况大大恶化,国民党内部矛盾在迅速加剧,以下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

(1)26名广东首领(包括胡汉民以及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将军)发电声明,不同意南京政府关于召开国民党非常全国代表大会,以确定宣布“宪政期”日期的决定。“南京政府没有执行以前的决定”^④。南京政府受到攻击是因为它抗日不力,没有为义勇军提供资金,没有采取可行措施消灭共产党。这场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蒋介石现在还依靠蔡廷锴(19路军军长)。有实例说明:蔡廷锴收到了陈济棠从广州发来的要求调动“军队”北上抗日的命令。蔡拒绝服从命令,理由是,只有南京才能给他下这种命令。“北伐”的欺骗行为,很明显是出于陈济棠关于19路军“经江西”北上的决定。结果完全是死胡同。

(2)蒋介石迫于外部压力,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于3月份北上。他的对手们希望,抗日“斗争”会很快将他消灭。他亲自前往,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北方的地位,还因为,他在反对红军的斗争中没有取得任何成绩。现在他返回江西将更加损害他的威信。直接原因是,他企图将日本在北方不断推进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而为自己保住同日本进行谈判的角色。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在与国

① P. 绍姆贝格。

② 文章没有找到。

③ 见第109号文件。

④ 原文如此。

民党大量部队的公开战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些胜利在敌人阵营内引起了惊慌和白军战线将领之间矛盾的加剧。恐怕不能认为，现在蒋介石能够完成他在几个月前未能完成的事情。

他想把冯玉祥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尝试遭到了失败。冯玉祥给他去了一封信，建议他进行自我批评，把武装力量（少数除外）的指挥权交给他的政敌，并且煽动性地要求在抗日斗争中使用80%的军队和军费预算，还要求释放政治犯和给予出版、言论和集会自由^①。

同时，南京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在增大。宋子文与蒋介石在为蒋军拨款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与汪精卫的矛盾依然如故，尽管汪精卫搞机会主义。

(3) 国民党内部的许多矛盾还由于帝国主义实行的政策在加剧，变得越来越难以克服，因此，除国民党之外建立其他政党并吸收它们参加政权的倾向正在加强。国民党的破产是显而易见的，民众对它很失望。由于蒋介石在发展他的法西斯集团^②，所以国民党的形形色色分子都倾向于建立其他政党。

(4) 尽管蒋介石向北方派了约300名法西斯分子去做政治工作，而国民党为了同样的目的还从南京派出了1000人，但他未能加强自己在北方的权力地位。在与北方将领们角逐的同时，广州人胡汉民也向北平派去了几名代理人进行反蒋工作。

二、对红军的进攻

(见随这次邮件寄去的详细军事报告和地图以及我们的指示。)^③

① 指冯玉祥1933年3月30日给蒋介石的信，见《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1986年第2册，第538—539页；《冯玉祥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载《中国每周评论》，上海1933年4月1日第64卷第5期，第168页。

② 见第255页注⑤。

③ 见第111、114、118、121号文件。地图没有找到。

1. 江西的形势变得大大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过高估计一些重要的战术胜利,因为不利的战略地位依然如故,和以前一样不得不考虑敌人所作的巨大努力。但是,在长时间内,我们第一次能够现实地考虑在今后有利发展情况下(像近几个月内所发生的那样,再搞几次快速打击,改组和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等等)我方转入进攻的可能性。我们希望,两三个月以后我们能着手解决一些比较重大的任务。我们击溃了敌人5个师,其中两个半师实际上被消灭了。战利品很多,有武器、弹药、油、盐等等。我们打破了敌人的计谋,迫使其重新部署主要兵力。俘虏人数可以确定为1.6万至2万人。我们不再执行先前的释放俘虏的策略。有6000名俘虏正在编入红军中。被歼灭的第52和第59师的8名军官(其中包括指挥官),发表声明拥护苏维埃政府反对国民党,我们正广泛利用这份文件来瓦解白军(声明附后)^①。我们打算利用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作为交换对象。当然,目前他们不适合交换。

你们从我们的指示中可以看到,我们在符合具体情况并与我军力量增长相适应的可能范围内,提出一些任务。我们一直提醒同志们,不要使自己陷入不利局面,不要太远离开自己的地盘,等等。正如在上一份报告^②中指出的,我们曾试图攻占设防严密的南丰城。虽然没有成功,但正如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表明的,结果是好的。据此(尽管这里的中国同志们好像不理解),我们在最近两个月采取了集中兵力在“开阔地带”进攻敌人有生力量(避免强攻敌人的堡垒)的方针。对乐安的进攻(3月底)是根据当地指挥部的倡议进行的。但是,不能把未攻下这座城看作是失败。我们在大力开展游击斗争,但同时也在发展有战斗力的军事单位,并使游击

① 附件没有找到。8名国民党军官1933年3月24日的声明已发表,见《国民党指近官的支持》,载《中国论坛》,上海1933年4月13日第2卷第4期,第9—10页。

② 见第109号文件。

战与我们最重要的军团的有计划的战役协调一致。我们绝不能忽视失败和发展不利的可能性。但我们认为,在巧妙和有力地使用我军力量的情况下,胜利将在我们方面。至少在最近三个月是这样(这几个月,敌人竭尽全力,经数月准备后发起攻势。我军兵力不足,且中央苏区的领导比现在更为薄弱)。

这些总的看法已被军事报告证明是正确的,我提出来是为了谈谈你们最近的指示^①。至于政治指示,我没有任何意见。指示完全符合党的领导所承认的路线,当然对这条路线还贯彻得很不好。

不过你们的指示还包括军事战术部分,是对[中共]中央 1932 年 10 月给中央苏区作出的指示的答复^②。我请你们再不要对当时过于笼统的指示发表什么意见。我们早已进入了具体行动和对其施加影响的阶段,这方面的材料你们是有的。现在是 1933 年 3 月,考虑到急剧变化的形势,再来援引 1932 年 10 月提出的建议未必有意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愉快的方面是,正当取得一系列胜利的时候,你们的电报被立刻转给了党和中央苏区,结果在大发动之时出现了大辩论的危险。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给我们 1933 年 3 月 28 日的一个指示^③加上了对你们电报的以下解释:“至于共产国际最近的一份电报,我们认为,当前它不应该对我们的军事战术作出根本性的修改。在我们看来,该电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万一敌人取得重大的胜利,我们必须保存和加强我军力量。而我方取得胜利时,我们应消灭敌人,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谨慎,使我军主力不受威胁。我们请你们与毛泽东密切合作,但要注意完成我们的军事工作,使之不受大辩论和摇摆的干扰。”

① 见第 112 号文件。

② 见第 75 号文件。

③ 见第 114 号文件。

我们已经给你们发去关于你们指示^①的电报,所以我只提以下几点意见:

(1)我们的地区太小,不能遵循将敌人较大部队拖入陷阱的战术。我们应尽可能地进行大的战斗,或者在我们地区外围,或者在敌占区。由于敌人切割了我们的地区,控制着交通线和重要城市,我们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将防御工事和基地向纵深推进。况且,如果敌人暂时占领我们的地区,他们在离开时会把它洗劫一空。在物质方面,这会削弱我们作战的能力,而在道义方面,我们离开团结一致的苏区,使之完全失去了防御能力,这会损害农民对我们的信任。在没有表现出保守主义,也就是没有死守每一寸土地并且表现出最大灵活性的时候,我们应像以前一样,动员群众与军队一起保卫我们的地区。

(2)我们的地区几乎都是山区。在不放弃山区有利地位的同时,我们应设法逐步掌握江西的几条重要河谷。或早或晚我们应掌握目前处在敌人手中的赣江河道和抚河河道。

(3)目前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力量束缚在浪费许多时间的围攻和包围上,因为这会大大降低我们对敌人有生力量的打击能力。

(4)敌人在人数和技术装备上的优势迫使我们进行经常性的战斗,其结果不是总能事先预计。有时我们损失很大(南丰战役中有1000到2000人伤亡,乐安战役中有600人伤亡),但我们更多地弥补了损失。由于我军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战术,我们将部队扩充了几千人。我们将始终把保存和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我认为,在审阅所有材料和研究报告时,你们将会确信,我们坚持的军事战术总的来说是正确的、灵活的、积极的,是考虑了全部条件的,并逐渐引导到更高的形式。但是,你们的指示会减缓这一发展进程,会助长错误的倾向。

^① 文件没有找到。

最后，恳请你们能始终将这样内容的电报发给我们。

我们在江西取得的战果可以归纳如下：

2月初：在金溪附近歼灭敌第5师一个多旅，缴获4000支步枪。

3月初：在乐安附近消灭敌第52师，并击溃敌第59师；抓获1万名俘虏，缴获2000支步枪和军款，并俘获整个司令部。

3月底：在乐安以南，击溃第11师、第9师，以及第59师的残部，抓获6000名俘虏，缴获6000支步枪和上百万发子弹、200挺机枪和自动左轮手枪。6000名俘虏目前在被编入红军。

4月初：在宜黄和乐安之间歼灭1个团，缴获500支步枪和10挺机关枪，抓获160名俘虏。

第19路军至今被我军牵制。政治工作得到了加强；我们坚决着手做改组和巩固的工作，改善了部队之间的合作，并采取行动加强红军的技术装备。

今后的战术：主动进攻敌人的有生力量。

前景：在建立必要的前提条件后，夏天从防御转入进攻，扩大地盘，与赣西红16军和红8军建立联系。

(5)在鄂豫皖，我军在苏区重新转入进攻，由于敌人在1932年夏天所采取的攻势，苏区的领土大大缩小了。我们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当然，这些胜利的意义还不是很大。这方面的详细情况，以及关于贺龙部的状况和力量，见军事形势报告^①。

(6)在四川，我们第4军团^②又表现出“躲进山里”不进行应有的抵抗、不充分扩大和保卫已占领的地区的倾向。

(7)在广西—湖南交界地区，2月份发生了农民暴动。根据现有的消息，有1万多人参加。2/3是土著居民，1/3是汉人。在最

^①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759，第72—81页。)

^② 原文如此。应为：红四方面军。

近一次暴动中,土著居民(农民)首次与汉族农民组织了联合进攻。运动的导火线是反对高赋税、高租金,反对独断专行,等等。两省都派出了军队,运动被镇压下去。

4月7日,在浙江省余杭地区^①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骚动,一直持续到现在。5000名农民进入城市,焚烧了政府主管农业部门的一些房屋。导火线是引入进口蚕茧,这必然是提高捐税的根据。随后发生了武装冲突,政府推迟执行拟定的措施,准备镇压农民运动。

三、党的工作

1. 敌人散布谣言,说什么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江西的红军,党开始同敌人的诽谤活动作斗争。为了使国民党难以实施其计谋,[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军事革命委员会^②再次发表宣言^③,建议在众所周知的条件下并考虑到目前的局势和国民党军官发表的声明^④,采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作战行动。

2. 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一些反帝性质的地区代表会议。反帝组织还很松散,不具备很大的活动能力。上海出版一种反帝报纸^⑤,每周出版两次。

3. 目前正在准备举行中央苏区执行局(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日程如下:

- (1)军事形势。
- (2)我们的经济政策。
- (3)苏维埃工作。

① 原文如此。应为:县。

② 原文如此,应为:革命军事委员会。

③ 宣言发表于1933年4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470—473页。

④ 原文如此。可能指8名国民党军官在1933年3月24日发表的声明(见第392页注①)。

⑤ 指《反战新闻》,1933年在上海出版——译者。

由于国民党的进攻,会议将在靠近前线的地带举行。[中共]中央全会^①不可能在5月底以前召开,而可能在更晚些时候举行,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局势的发展。5月20日之前你们还能用电报向我们发来指示和建议。关于其他工作,详见最近的一份报告^②。

四、工会和罢工

1. 上个月,在重要领导同志当中又有人被捕和工会机关部分遭破坏,对工作产生了不良影响。被捕的人中有全国海员工会书记^③,他现在是中共中央驻国统区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④的代表。这位同志表现得很好,我们通过党和工会等组织展开了大规模的(营救)运动。至于罗登贤同志,我们救他性命的希望不大。但我们还是请你们尽最大的努力。

2. 3月份发生了一系列小型罢工运动(由于是单独进行的,因而意义不大,参加者有造船工人、遮篷生产工人、缝纫工人、纺织工人等)。

1933年2月在上海发生了以下罢工行动:

时 间	罢工次数	参加人数	天数
1933年2月	11	1398	770
1932年2月	5	862	91

现寄去说明党的工会工作情况的材料和报告^⑤,请转给亚力山大^⑥。

① 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见第281页注^⑧)。

② 见第109号文件。

③ 廖承志。

④ 原文如此。应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⑤ 文件没有找到。

⑥ C. A. 洛佐夫斯基。

五、黄平(沃罗夫斯基)事件、鲁埃格^①事件(即牛兰事件——译者)。

1. 4月6日宋庆龄会见了黄平,并在奸细(原共产党员)^②在场的情况下,同他进行了交谈。有详细的“谈话”记录。请看一下文件^③。已搞清下列情况:

(1)这确实是黄平,神情沮丧、意志消沉、活着的僵尸。

(2)他失去自由,而在狱中,如果他不为国民党工作,就受到死亡威胁。他遭到拷打,首先是电刑。

(3)他没有坚持住,为了挽救生命,他背叛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在含有攻击党的内容的声明上签了字^④。

(4)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向宋庆龄表明自己对党的忠诚,虽然他应该知道,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放弃他。为了党的利益,必须从沃罗夫斯基的政治叛变中作出结论,强有力地攻击国民党的恐怖行为和严刑拷打制度。

谈话记录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请将它转交给亚力山大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

2. 与此相联系我要告知,“民权斗争同盟”^⑤已具体干预了一些事件,提供了辩护人,在报刊上广泛开展了公开的宣传运动,等等。这在长时间内,第一次打破了完全消极和听天由命时面对逮捕、拷打和枪杀的可恶制度,这种制度在党内曾占据统治地位,并且直到现在仍没有根除。

3. 鲁埃格和他妻子的状况很好。但是,试图采取释放他们的

① Я. М. 鲁德尼克和 И. Н. 莫伊谢延科—韦利卡娅(见第 192 页注②)。

② 陈漱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 1985 年,第 49 页。

③ 见第 120 号文件。

④ 黄平 1933 年 1 月 6 日发表的声明刊登在 1933 年 1 月 24 日的上海《晨报》上。

⑤ 原文如此。应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见第 345 页注④)。

国民党内各色人物所作出的承诺,暂时还没有结果。详细情况你们可以从《中国论坛》编辑^①的报道中了解到。

六、结论

还有一个我不愿涉及的问题:为开展工作,党和工会需要一大笔钱,比现在得到的要多得多。你们能否增加资助,首先是定期把钱寄来?中国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组织能否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执行委员会得到点什么?请电复。

由于需要加倍小心,我以后将只寄材料或者将寄出中文材料。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59,第 92—104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① Г. 艾萨克斯。

1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①

1933年4月11日于莫斯科

绝密

上海

致代表^②

回复您1933年4月3日发来的电报^③。

我们重申我们先前就军事战术问题所作的指示^④。不应把指示理解为,我们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防御立场^⑤。当需要采取反包围的措施时,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实施进攻行动。我们提出的战术,绝不是以失掉我们的苏维埃基地为前提。相反,[是要]巩固基地,建立新基地,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联合相邻地区,但决不能以红军大部队被歼灭为代价。我们不明白您对这一问题的询问。政治委员会。

① 文件于1933年4月11日经由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和黑克尔特组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飞行表决通过,并在4月15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获批准(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40,第80、83页)。

② A. 埃韦特。

③ 见第119号文件。

④ 见第112号文件。

⑤ 在俄文电报稿中删去了:“在敌人优势兵力进攻的情况下,应使用诱敌深入到我们地区的战术”(见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6(1933年发文),第64页背面)。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36(1933 年发文), 第 64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1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非常会议第 307(A)号记录

(摘录)

1933 年 4 月 21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16.(4624)——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文件草案。

决定:16——通过^①。(1933 年 4 月 20 日飞行表决:克诺林、黑克尔特、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附录 1]

王明给中共中央的附信^②

秘密

现给你们寄去:1. 原则性的基本条款草案,中国共产党必须从这些条款出发,提出为消灭帝国主义、中国封建主、资本家和国

^① 见附录 1—3。

^② 信的草稿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起草的(见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368,第 12 页)。但是,根据皮亚特尼茨基的建议,决定以王明的名义发出此信。而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通知说,关于民族问题的文件草案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起草的(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41,第 154 页)。

民党政权对中国非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而斗争的问题^①；2. 关于这一斗争在满洲、内蒙古、甘肃和华南的近期任务的建议草稿^②。我提请中国同志们特别注意所寄材料的非常初步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工作，不仅是收集、审查和修改实际材料，而且要十分明确地提出具体的民族问题。我强调一下，中国共产党应当考虑到，争取消灭对非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的斗争，应看作是整个中国反帝和反封建革命的一个从属部分。每个民族运动都将具有和已经具有反动的或者进步的色彩，这取决于它如何对待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如何对待中国的国内革命。

必须让中共中央组织对上述问题的广泛研究和讨论，以便起草中共中央的必要策略决定。

王明

[附录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中共 民族政策总原则的建议

东方地区书记处的草案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原则性态度应当确定如下：

1. 从民族问题的角度来说，中国国情的最主要特点是：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剥削之下。特别是在目前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在吞并中国一个又一个的地区（满洲、热河），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者重新直接瓜分的危险。帝国

① 见附录 2。

② 见附录 3。

主义强盗正在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和中国军阀集团的统治，把中国分割成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努力为自己的吞并计划寻求支持，组织由各民族的封建和买办—高利贷分子所支持的反动分离主义运动，这些民族至今（在多数情况下，并且现在仍然是）受到中国地主、军阀、政府机关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压迫。

2. 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中国劳动人民，正在以苏维埃运动有为先锋队，为争取国家的独立、中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为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统治而斗争。中国这个封建官僚制国家，是在中国封建主和商业高利贷资本奴役许多非汉族人民，尤其是边远地区人民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继续实行对中国非汉族人民的野蛮民族压迫政策。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在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必然将彻底消灭汉族对非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的压迫。

中国共产党在为争取民族自决权而斗争，直到国家把所有遭受汉族有产阶级压迫并在它们的策划下又受到帝国主义奴役的非汉族人民分离开。中国共产党正在为消灭债务奴役和高利贷束缚，以及为消灭中国许多地区由于民族压迫所造成的土地侵占行为而斗争。中国共产党为自己提出的直接任务是：在完全保证非汉族劳动人民的语言权利、在苏维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权利、对土地的耕作权利等条件下，吸收他们参加苏维埃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3. 在为正确地、革命地解决对待非汉族人民的民族问题而斗争时，中国共产党应当首先注意到（蒙古族、回族、朝鲜族、傣族、彝族、满族等非汉族人民），他们在中国边远地区（满洲、内蒙古、甘肃、贵州、云南）居民中占大多数，并形成了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西部的地区少数民族。

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国民党反革命政策的各种调和态

度,都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苏维埃运动原则不相容的。中国共产党应当毫不留情地同它们进行斗争,揭露它们,并具体揭示,为什么它们助长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和分裂政策及巩固反革命的国民党统治。

与此同时,在反对各种民族压迫和沙文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应当把非汉族人民的群众性民族运动(这种运动是由反帝反封建斗争及苏联和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榜样唤起的,反映了与中国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追求民族自决的进步愿望),同由当地封建和封建神权上层所组织的、在某种程度上充当帝国主义吞并计划传播工具的反动运动明确地区分开来。

在支持前一种运动并扩大和加强中国苏维埃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对它的影响的同时,党应该开展反对第二种运动,反对封建反动头目和帝国主义头目俘虏非汉族劳动群众的斗争。

在提出内蒙古以及满洲和新疆的民族问题时,应特别考虑到后一种情况。在提出内蒙古民族自决的口号时,尤其应该坚决同泛蒙古主义思想作斗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和散布这种思想,是为了占领内蒙古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并打着建立统一的蒙古国的幌子去抢占苏联的领土。日本帝国主义依靠反动的封建集团和封建神权集团,竭力要把蒙古地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变成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桥头堡(呼伦贝尔叛乱^①和谢苗诺夫骚乱等)。因此,应当考虑到,内蒙古地区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满洲)和革命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结合点,这就需要无条件地把内蒙古的革命运动同一切反革命的和帝国主义的企图区别开来,并同这些企图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在新疆的民族解放运动方面,应当注意到,在这里,帝国主义非常想

^① 发生在1928年8月,见卢基亚宁:《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蒙古和中国,1911—1946年的相互政治关系》,莫斯科2000年,第140—142、183页。

利用,而有时还煽动民族主义运动,这不仅是为了使新疆从中国脱离出来,把它变成殖民地,而且也是为了建立入侵苏联的新桥头堡。这里,特别需要同反动的泛伊斯兰主义作斗争,它是封建反动集团和封建神权集团的工具,而首先是英帝国主义计划的传播工具。

4. 在受到帝国主义奴役和处于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压迫之下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应当为争取彻底和无条件地消灭一切公开的民族压迫和不平等形式,以及一切封建等级残余和奴隶制残余、债务奴役等进行斗争,因为它们都与民族不平等、对非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的奴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应当捍卫无条件地实行民族平等的义务,在苏维埃管理机关内承认一切民族群体和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保障各省、州和地区的自治权,对于一切民族群体和少数民族,法庭和学校都使用当地语言,并根据劳动居民的意愿划分出单独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应当坚持必须在苏维埃民主的基础上,对在方言、历史和社会生活条件方面有所不同的所有地区,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

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的苏区政策中,针对苏区不同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折不扣地实行下述原则:苏区应当是民族自由和平等的典范。中共党员应以帮助者和建议者的身份组织、团结和教育不同民族的劳动人民,当然,应避免任何大国命令的表现,要在每个场合从根本上杜绝这些现象。

在提出这些口号时,中国共产党应特别注意对待:(1)华南和华中的那些操不同方言的汉族居民。在实行大国主义的国民党所强制推行的国家语言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那里方言的差别使这些居民在文化生活方面处于不平等地位。特别是在同国民党企图强行推广人人都应使用的国家语言的这种做法作斗争的基础上,必须坚定地支持地方语言和方言,并用这些语言创造新的拉丁化文字。如果这些措施受到先进革命群众的支持,如果这些措施的

实施有助于广大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高度发展,使他们更迅速和更全面地参与革命运动,那么这种新的拉丁化文字就必然会替代已成为中世纪遗毒之一和在各种场合从文化上奴役群众的工具的象征文字。(2)所谓的“客家”,即那些不是本省出生,而从中国其他地区迁入(通常是在几代以前)的居民群体。由于氏族和同乡关系的显著残余和省内方言的差异,“客家”人处于“外来人”地位,即与当地基本民众相比较的不平等地位。这种社会生活条件和语言条件的不平等,经常受到反动分子的挑唆和利用,他们竭力把阶级斗争纳入“客家”人即外来人和“本地人”即当地基本居民之间的斗争轨道。广东的“客家”人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从历史上一直占据那里的一些相邻的县,那里的剥削阶级,无论是所谓的“本地人”,还是“客家”人,都制造、清除和利用他们之间的不和。

5. 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广大群众面前揭露国民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反革命的和封建强制的政策,这种政策甚至比1911年^①宪法更反动。在南京宪法^②中只字未提中国的各民族,而国民党竭力对中国存在成千上万的革命的非汉族居民这一事实保持沉默。南京政府成立蒙藏事务委员会,目的不仅是要扼杀中国的其他民族,而且要扼杀国民党仍认为是自己的一个“省”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委员会与大清王朝时的蛮人事务委员会——“立法院”如出一辙。

(1)国民党在帝国主义者的领导下,利用全国民众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地主和商业—高利贷资本对其他民族群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剥削合法化,实行税收掠夺,组织纯封建性的军事流放,从肉体上消灭其他民族群众。国民党残酷镇压其他民族群众对独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12年。见《1911—1913年辛亥革命文献资料集》,莫斯科1968年,第181—186页。

^② 指1931年6月1日的临时宪法,见《中国年鉴》,上海1934年,第466—468页。

立民族生活的任何觉醒,强行推广汉语、汉族教育和国民党“文化”,即儒家学说与空洞的孙逸仙主义的混合物。

(2)国民党将自己的奴役政策建立在广泛收买各民族集团的封建买办分子的基础之上。国民党采用蒙古王公代表大会的方法,把有影响的王公贵族任命到省政府中,把国家扼杀民众的事务重新委任给他们,还试图收买伊斯兰人民运动的个别领袖,采用封建的做法,同其他民族的领袖拜把兄弟,让其他民族群众的封建上层人物的代表到中国中央大学和国外大学接受教育,以期在不顾国民党的反对起来追求自己民族生活的其他民族群众队伍中造就自己的国民党知识分子。

(3)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国民党唆使受压迫的人民和少数民族互相残杀,支持一些民族的封建买办集团,赋予他们一定的靠牺牲其他民族利益的特权,以换取由他们实行国民党的压迫政策。特别是在华南,必须同这一政策作斗争,因为那里除汉族居民外,还有一些密集的群体,即所谓的穆斯林,以及傣族人、孟族人、彝族人等。

6. 那些封建的、买办—高利贷的、神权—教派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民族上层人物,为了永远保持自己的反动统治,打着民族旗号,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庇护下,企图剥削“自己的”民众,我们必须同他们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在甘肃,回族军阀依靠宗法残余,尤其是依靠回教的影响,竭力在人民群众中扮演民族利益保护者的角色,而实际上经常出卖人民运动,扮演刽子手角色。在内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下,企图建立自己的泛蒙古国,同时利用国民党的施舍来巩固自己目前的地位。在华南,云南其他民族的军阀和“土司”^①利用民族不和来加强自己的封建军阀统治。在新疆,封建教

① 有两种意思:(1)民族领袖,氏族首领。(2)控制当地少数民族的官吏们。

权的上层分子试图通过提出宗教口号和泛伊斯兰主义口号来控制
和领导民族运动。

反对民族压迫及对非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不平等的斗争，总的
口号应该是：打倒帝国主义统治；打倒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独立
的中国万岁；中国各族人民的劳动联盟万岁；争取实行民族自决权
直至民族分离（争取建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甘肃回族人民共和
国）；争取在华南按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愿成立民族苏维埃共和
国；争取新疆的独立自由；争取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与苏维埃中
国结成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
阶级反革命进行斗争；中国各族人民的全面平等万岁；同苏联的友
谊和兄弟联盟万岁。

[附录 3]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近期任务

一、满洲的民族问题

历史上存在的满族人在几个世纪期间基本上在满洲与汉族人
同化了。只是在河北、新疆和其他一些地区，还保留一些能够要求
民族独立的满族人小群体。但是，目前他们与满洲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那里的满洲人几乎已不复存在。在中国取得胜利的苏维埃政
权，考虑到现存的所有特点，将根据中国共产党总的民族政策，为
这些居民群体提供一切条件。

日本帝国主义的谍报机关用“满洲人民”这个臆造的称谓来称
呼满洲的中国居民，他们在俄国白卫分子的支持下，建立以原满洲
大清王朝的败类溥仪为首的、独立于中国的“满洲国”。这是日本
帝国主义用来掩护其吞并满洲的幌子。

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各族人民真正自决权的同时，应当全力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三千万汉族居民,以及与汉族人共同生活的满洲少数民族——朝鲜族人、蒙古族人和通古斯族人的奴役。

满洲最大的少数民族——朝鲜族人,绝大多数是由分成制佃农和佃农构成,他们支付固定的实物租金,是日本帝国主义经常施展阴谋和血腥投机的对象。

近二十年来,有步骤地从朝鲜土地上排挤走朝鲜农民的做法,尤其促使贫困的朝鲜农民大量涌入满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朝鲜农民的土地,支持这种移民,并企图直接或间接地利用朝鲜人来实施自己在满洲的帝国主义计划。

朝鲜族人民以及蒙古族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在现阶段的任务,应从同日本侵略者和满洲国的这一总的斗争任务出发。总的口号应是:汉族和朝鲜族、蒙古族等居住在满洲的广大人民群众联合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这就是转为日本服务并承认日本统治的汉族、朝鲜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压迫者和剥削者。

各民族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当地走狗的革命斗争中的兄弟般联合,将为所有受迫害的人们带来解放和美好的生活。汉族、朝鲜族、蒙古族劳动人民联合进行反对日本占领者的游击斗争,联合抵制日本当局和满洲国政府的税收和命令,建立经选举产生的保障少数民族一切权利的人民政权,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汉族、朝鲜族、蒙古族走狗的企业、土地和财产,坚决揭露汉奸走狗的叛徒角色,拒绝给日本、汉族和朝鲜族地主缴纳各种租金,甚至拒绝偿还债务。在间岛地区建立经选举产生的朝鲜族人民政权并与朝鲜的革命运动结成兄弟联盟。在提出最后一个口号时,应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把间岛地区合并到朝鲜的办法来侵吞这一地区的反动企图。

在满洲的蒙古族地区,应当提出专门的口号:反对汉族地主、富农和商人占领土地,反对把土地让给汉族富人、蒙古族王公和寺

院,反对以牺牲蒙古族和汉族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在他们当中做交易;在这些地区,无论在土地耕作上,还是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自己生活水平上,蒙古族和汉族劳动群众都要友好合作。

二、蒙古族问题

蒙古族是原内蒙古地区,即宁夏、绥远、察哈尔、热河以及西南满洲(呼伦贝尔、洮南—索伦地区等)居民中的大部分。汉族的殖民统治是这些地区出现民族压迫的决定性因素,在一些地区(察哈尔、热河南部和满洲的东南部),深受汉族殖民统治排挤的蒙古族人民,总共有二三百万人,他们已变成了少数民族,在许多方面被汉族同化了,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成为汉族地主的佃农、雇农和债务奴隶。

在那些没有被汉族同化的蒙古族居民区(宁夏、绥远、察哈尔北部),他们完全保留了或部分保留着自己的落后经济形式和社会经济结构,蒙古族劳动人民所遭受的三重压迫是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个特点。在这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还有美帝国主义和西欧帝国主义的压迫,它们在银行、贸易公司和占有大片土地庄园的天主教堂里拥有立足点),与汉族军阀、地主和商人—高利贷者的统治、与在许多地区还保留着政权的当地封建—神权上层人物(王公、督护使、副都督)的统治结合在一起。近些年来,由于中国本土发生了尖锐的土地危机,汉族的殖民统治尤其有所加强,殖民地化把蒙古族人从土地上赶走,把蒙古族的牧场变成了耕地,把土地、森林、咸水湖变为汉族人的私有财产。

只是从事矿业和盐业开采的工人,以及与债务奴隶区别不大的、人数较多的雇农阶级,代表了当地的无产阶级。

对蒙古族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剥削,在许多地区已经引发了民族革命斗争,首先是反对汉族统治的斗争。汉族殖民地化的统治,寺院势力的被破坏,对中层封建剥削阶级(拉姆、台吉)原先

所具有的特权的剥夺,这一切使劳动群众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有可能参加反对汉族统治的民族斗争,这在许多地区至今仍时有发生。但是,高层封建—神权剥削人士(王公贵族和头领)通常不参加这种民族斗争,他们是帝国主义者和汉族剥削者的直接同盟者,在经济上也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应力争单独地把雇农、贫农和劳动人民组织起来,在有可能的地方建立基层党组织。

蒙古族民族运动的主要地区是绥远省,只是今天,那里的殖民地化才特别尖锐地引起了那些在东部地区过去就有的发展进程。在这一地区,民族革命斗争发展中的有利因素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的统治还不巩固,因为过去蒙古西部是被十月革命推翻了的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其他地区,与中国北部接壤的内蒙古民族革命的胜利都是巨大的革命因素。在绥远省,运动几乎席卷了整个南部(鄂尔多斯),而在其中的一个地区(蒙古乌石旗)则建立了人民政权。

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承认它的国家分离权。但是,在宣传这一原则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应坚决同反动的泛蒙古主义思想作斗争。这种思想是日本帝国主义手中的工具,企图用来把内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境内的蒙古族居住地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内蒙古的民族自决直至国家分离只有通过与世界帝国主义而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通过与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才能实现。在这个斗争中,要与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保持紧密的联盟,因为只有苏维埃革命才能保证蒙古族劳动人民真正的民族解放和自由的国家生存。

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蒙古族问题上应提出的最新口号,首先应当是动员蒙古族群众与汉族劳动群众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渗透,尤其要反对日本对热河的侵占,对察哈尔的入侵。

中国共产党应在蒙古族牧民中间开展工作,组织游击队,反对满洲国和热河的日本占领者;应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在汉族和蒙古族之间挑起民族内讧，争取同中国革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结成兄弟般的联盟。中国共产党应揭露班禅喇嘛的叛徒角色，他是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蒙古独立，要把蒙古地区变成日本殖民地的工具。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应不断地揭露国民党的叛徒角色，因为它企图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利用蒙古族群众不断增长的反日情绪来加强自己的反动影响，声明“保卫”热河和察哈尔，制造同日本侵略作“斗争”的假象，而实际上是把内蒙古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应揭露章扎胡图和塔（音）、白云梯以及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其他叛变者的叛徒角色，他们是国民党的直接走狗，在民众反日情绪不断高涨的条件下加强了活动。

在与汉族统治进行斗争方面，蒙古民族革命运动总的政治任务应该是：彻底消灭汉族的封建高利贷压迫和军阀压迫，建立蒙古人民革命政权。实际上，这一任务应通过以下形式来实现：没收通过掠夺性剥削从蒙古牧民手中转到汉族商人和地主手中的大批牲畜；取消军阀的税收和高利贷奴役，没收被汉族剥削者据为私有的盐湖，最后没收大片的汉族人土地（以及属于天主教堂的土地），也一定要保障在殖民地化的蒙古土地上受剥削的汉族农民和雇农的劳动权利。与此同时，还要组织群众起来进行斗争，反击和终止国民党殖民机构或一些军阀、地主和商人继续侵占土地的行为。

在与当地上层剥削者的斗争方面，近期的任务应当是：不向王公、督护使、副都督交税；不偿还记入王公账上的旗的债务；揭露王公贵族的叛徒角色和剥削本质，因此只能采取实际措施消灭当地上层剥削者（王公、头领、大台吉）的封建统治；没收大片封建领地，消灭等级不平等、农奴制、封建义务、连环担保等等。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应与部分地反映了群众的民族利益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紧密的联系，同时揭露该党封建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性，他们经常打着泛蒙古主义口号把斗

争引入反汉族斗争的轨道,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而有时还受挑唆。在蒙古族民族革命斗争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应广泛依靠鄂尔多斯“都古伊伦”式的群众性革命组织,以及利用“乞讨队”之类的各种组织,这些都是失去土地的蒙古族农民和汉族农民共同的、自发的和无组织的斗争的最初形式。

三、甘肃的民族问题

甘肃、陕西和宁夏的非汉族居民是回族人,他们占甘肃西部和西南部及宁夏地区居民总数的大部或一半。在甘肃其他地区和毗邻的陕西地区也有相当多回族人,总人数约为四百万。许多回族人还居住在新疆和云南,在河北、河南和其他省份也有一些分散的回族居民。

回族人外表上与汉族人不同,信伊斯兰教,而实际上与汉族人混居,经济生活相同,方言比较接近,社会生活条件相似。

回族人的主要区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汉族封建主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殖民地。这表现在:(1)汉族军阀通过各种税收、货币欺骗和军阀的苛捐杂税等方法掠夺回族人民。(2)汉族资本在商业和高利贷中占据统治地位。(3)回族居民被排挤到最差的土地上,汉族地主或企业主—转租人(宁夏地区)手中集中了很可观的、常常是大片的土地,与回族农民对抗。而通常在汉族和回族地主手中聚集着约75%的土地,这些土地由农民和雇农在苛刻的剥削条件下耕种着,保留着最顽强的封建残余。(4)法庭和学校由汉族人控制,他们使回族民众生活在屈辱、无权和黑暗之中。

汉族之所以能在这些地区进行统治,只是因为得到了当地封建主的支持,因为他们不仅在回族和汉族群众之间,而且在回族居民和其他民族(库库诺尔、蒙古族)之间推行挑起纠纷的政策。

一方面由于甘肃将隶属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变成国际帝国主义矛盾冲突的舞台,另一方面由于军阀无政府状态和国民党国家体制崩溃的加剧,甘肃的回族军阀(尤其是五大军阀,即马鸿宾、马

鸿逵、马麒等所谓的“五马”)大大加强了自己在省内的地位,集中掌握了大片的新土地,并在某些地区(河州、宁夏)及在大商业高利贷资本队伍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或重要地位,同时在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联合压迫其他少数民族(库库诺尔)方面也占据主要或重要的地位。这些封建军阀在许多地区都剥削汉族农民。

这一进程导致许多回族军阀卷入到汉族军阀的内部争斗中,并加剧了他们自己队伍内的争斗。

所有这些意味着,回族人民群众受到的压迫极其深重,最终爆发了1928至1930年间席卷甘肃和宁夏全省的大规模起义^①。

此外,以下情况也证明了回族人民群众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1)回族人民群众试图组织自己的军队(宁夏、甘州、兰州),与当地军阀对抗,并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内蒙古和新疆的人民革命运动建立联系;(2)赤贫如洗和饥饿的农民的自发性运动广泛展开。但这些情况尚未导致有组织的民族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对待回族民族问题的整个政策,首先应从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利益出发,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利益出发。中国共产党应特别注意民族运动有被国民党、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民族上层分子用来反对中国革命和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服务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应努力把回族群众的民族运动变成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一支强大队伍,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不遗余力地支持回族群众反对中国国民党的压迫;根据下述口号对回族劳动群众实行正确的政策;始终让这些群众认识到,他们在民族问题上受到的奴役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在全中国的统治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样才能保

^① 见马茨扬:《甘肃的回民起义》,载《中国问题》杂志,莫斯科1929年第1期,第380—402页;B. 维什尼亚科娃:《1929年的中国农民运动》,载《中国问题》杂志,莫斯科1930年第2期,第178—180页。

证这些群众获得解放。

在回族运动的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应提出以下最近的口号:反对压迫回族群众的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拥护与中国革命、与汉族劳动群众、与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和青海及新疆的被压迫人民结成兄弟般的联盟。拥护建立回族民主人民共和国,反对回汉军阀、反对当地各民族的地主和高利贷者。拥护把贫农组织起来,废除一切卖身契约和债务,消灭债务奴役制度和等级不平等。拥护进行土地革命。

鉴于存在民族压迫,地方封建—神权(乌列木)^①和封建—军阀的上层人物正在利用自己的民族势力和伊斯兰宗教偏见,以及直到目前为止,阶级分化还比较弱等情况,我们必须认识到,甘肃省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在真正革命的基础上团结劳动群众,不仅反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而且反对当地现在以“五马”为代表的封建反动上层分子。只有当民族解放运动在此基础上开展起来,并在成立了回族人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阶层的独立组织,以及在回族劳动群众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条件下,民族解放运动才能转为公开的和自觉的反对所有民族的地主、高利贷者和封建官僚的斗争,才能转入土地革命,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接近中国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并最终建立回族人民共和国。

与甘肃和宁夏的运动任务相联系,中国共产党应提出关于加强陕西工作的问题。从农民革命运动的规模上看,陕西在1911至1912、1926至1927年间处于显著地位,现在在使甘肃从华中苏区分离开。巩固和发展四川的苏维埃,对于甘肃的民族革命运动也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应加强自己在宁夏、兰州、甘州、天水、河州、平凉的组织,在这里的回汉族工人中间(呢绒厂、机械和军械作坊、一些

^① 乌列木:伊斯兰教神学家,在伊斯兰教国家担任法官职位。

市办企业等),以及在可观的手工工场无产阶级中间开展工作。中国共产党应当在回族农民和雇农中间进行工作,与秘密团体(哥老会)中的贫农、中农分子建立联系并使之接受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影响,还要在回族军队的下层士兵中开展工作。

针对建立回族人民党的意图,中国共产党应采取以下立场:党应无条件地支持真正民族革命分子的各种分离行动,促使他们团结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反对封建反动上层及其卖国政策。同时要记住,只有把民族解放斗争同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为争取自身迫切利益,而首先是争取从地主和高利贷者手中夺取土地而进行的斗争联合起来,只有建立共产主义组织,才能保证甘肃革命运动的顺利和独立的发展。

考虑到宗教在回族居民中所保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应特别谨慎地对待群众的宗教偏见;中国共产党应同那些将站在革命方面,也就是将在行动中贯彻执行运动的基本口号,而不妨碍群众的独立政治组织的教派和宗教团体建立联系,并在它们中间做工作。

三、华南的民族问题

对居住在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非汉族人民,中国共产党应当首先考虑到:(1)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民族受到汉族军事封建剥削者和商业高利贷剥削者最野蛮的压迫,近一百年来,又加上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剥削,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正是把南方省份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这些民族在民族方面是无人过问的,从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角度来说他们很少为人所知;(2)正是这些民族及其被唤醒了的民族革命意识,是现阶段中国民族问题的最重要因素。因为一方面,这些民族在许多地区与发生迅猛的苏维埃运动的地区有接触,另一方面,这些民族是国外民族(缅甸人、泰国人、北部越南人)的分支,这就决定了有可能在执行正确民族政策的基础上扩大苏维埃运动,并直接影响那些作为英、法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的桥头堡的相邻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命运。

这种状况要求中国共产党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民族在民族觉醒中的细微情况,尤其要仔细研究他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民族革命觉醒的一些表现,因为不这样,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革命中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民族策略。

我们所了解的一些情况,使我们能够就这些民族作出以下一些最基本的结论:

(1)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居住着一些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其他民族(总人数约为几千万),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表现出民族觉醒的现实迹象,这些民族可能在中国人民本身的民族联合过程中被同化,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保持了中国的封建割据,中国人民还不能结成统一的民族。

(2)他们中间,按民族划分已经知道有几个大的民族群体,在历史上以及现时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他们都已经声明要求民族独立。在现阶段,这些民族是:傣族,居住在云南、广西、贵州和广东省(约700万),并且是泰国和缅甸居民的大部分(约1300万);苗族,居住在贵州、广西、湖南和广东(海南岛);彝族,居住在云南、四川、贵州(以及缅甸);瑶族,居住在广东、广西、云南;最后还有回族。

(3)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民族由于遭受残酷的压迫和欺凌,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很低,这一共同点把这些民族(回族除外)联合在一起。在这些民族聚居并与汉族居民隔绝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制度和自然经济成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游牧业和垦荒农业。汉族地主霸占土地,然后剥削被他们夺去了土地、沦为半农奴性质的佃农或者雇农的各族群众,这些构成了民族压迫的基础。与回族和蒙古族不同,这些民族在社会经济制度上的特点是,仍保存着相当多的奴隶制残余。但这些地区的主要剥削者早就是汉族军阀——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他们伙同当地的奴隶主和“土司”(当地的掌权者)一起瓜分政权。这些“土司”原来是部落的

普通首领,后来获得汉族的官衔,成了汉族统治的工具(在许多地区,“土司”还从汉族占领者中任命,他们成了“已归顺”的民族地区的世袭地方官)。

(4)民族的无权地位、民族敌对情绪的被点燃,使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处于完全非人的生存环境,加重了对这些民族的无限度的剥削。帝国主义的渗透和资本主义影响的增长(贸易、矿山开采、农业和畜牧业商品化、林业等),大大加速了这些民族原始封建宗法和奴隶制度的瓦解进程,更加加重了劳动群众的艰苦状况。

(5)所谓中国南部的回族居民主要集中在云南省。按其社会经济制度,这个民族与苗族、傣族、彝族等民族有很大的不同,处在较高的发展水平上,而且它的封建商人上层经常同国民党一起以云南其他民族的压迫者身份出现。

(6)在19世纪的一些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中,在1911年和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中,以及在目前的苏维埃革命中,中国南部的其他民族过去和现在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始终是积极的革命力量(例如,苗族、瑶族、回族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在19世纪70年代的云南起义中、在1926年至1927年的农民运动中和在广西西部、海南岛等地的苏维埃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对这些民族的政策中,首先应该考虑到,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分散,许多地区(湖南、广东、广西)其他民族群众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该是中国南部省份苏维埃运动的直接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这些省份的民族政策的主要特点在于,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不仅是带领其他民族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而且要在那些同汉族劳动人民携手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其他民族群众中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最后,在已经取得胜利的苏维埃地区,也要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

中国共产党对尚未直接参与苏维埃革命的南部和西南部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应该建立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总的原则基

础之上；即提出在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中和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实现民族自决的口号；始终要根据这些地区的整个特点和各族群众的革命发展水平，坚定不移地支持各族人民反对汉族剥削的斗争；争取使这些民族的群众不再受剥削、不再受其封建富农上层人物的思想影响；争取使各族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和民族剥削者上层人物企图利用民族矛盾来获得自己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最近的和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制定出对南部和西南部各主要民族的民族政策的具体纲要。对于云南、四川和广西部分地区的民族(傣族、彝族和所谓的回民)来说，由于这些地区距离苏维埃运动中心比较遥远，还由于许多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帝国主义利用民族矛盾来反对苏维埃运动的很大危险性，这项工作需要很多时间来进行充分的研究和采取必要的准备措施。而对于毗邻苏区和红军的那些地区(广东、湖南、贵州、广西部分地区，即主要是所谓瑶族和苗族的地区)来说，则要在尽可能充分考虑这些地区的具体情况和革命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民族政策的具体纲要，实际贯彻执行这一纲要应是中国共产党在近期所要完成的直接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区的口号应该包括：在运动还不拥有足够巩固的贫农和农民革命中心的民族地区，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在运动已经可以直接依靠贫民组织和劳动农民的支持的地区，建立劳动者苏维埃。此外，还应提出没收汉族地主和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当地上层人物的土地的要求、彻底消灭奴隶制和等级压迫的要求、早在1925至1927年间自发地向各族人民提出的消灭“土司”的口号和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权利和法律方面真正完全平等的口号。

在居住着其他民族群众的苏区和正在实行苏维埃化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应坚定地遵循以下原则：民族完

全平等，富有同情心地对待群众的民族和文化生活特点，与汉族的各种大国主义表现和民族不平等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保证其他民族劳动人民可参加苏维埃、红军以及党、工会和共青团的领导机构工作。正确的民族政策可以而且也应该保证苏维埃革命的扩大和深入，将中国南部各族群众的新的后备力量吸收到革命中来；可以而且也应该成为在其他民族居民占多数的地区和其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部分地区建立新的苏维埃基层组织和扩大旧的苏维埃组织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

中国共产党在执行自己的民族政策时，应尽可能每时每刻都考虑到，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生活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法国、英国和其他殖民地强盗在等待着中国的最终分裂时刻，期待着把自己的殖民地统治从印度、缅甸、北部湾地区（越南北部）扩大到西藏、四川、广西、广东、海南岛、云南和贵州。帝国主义的走卒和传教士早已开展工作，以取得对这些地区某些民族群体的影响，其目的是使这些群体及其领地脱离中国，把它们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应当同与当地封建主联合在一起的帝国主义走卒们所实行的这种分化政策相对抗，提出自己明确的阶级政策，旨在解放其他民族的劳动群众，使之与中国革命结盟，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四、新疆

从民族问题的角度看，新疆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个省是汉族的殖民地，受军事—封建的掠夺和剥削方式所控制。而按照人口比重来说，汉族人只是这里居民的少数。新疆的主要民族是维吾尔族（几乎是居民的 $\frac{2}{3}$ ）、蒙古族、柯尔克孜族、东干族和满族。居民的这种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多民族组成，被居统治地位的殖民者集团所利用，挑起民族纠纷，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汉族压迫的加强、妄图把新疆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进攻苏联的桥头堡的帝国主义者，而首先是英国、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日益活跃、由于世界经

济危机而日益加剧的结构危机、当地农奴主剥削和奴役的加强,这一切极大地加重了劳动群众的艰难状况,他们自发地寻求摆脱危机的革命出路。

中国共产党应在新疆建立自己的立足点,同时要协助组织由新疆劳动人民最先进的革命代表组成的人民革命党。

中国共产党无条件地承认新疆各族人民拥有自由国家分离的权利,并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压迫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占领和干涉计划。至于具体行动纲领,则应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必须着手进行的工作所取得的实际经验来制定。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41, 第 7—8 页(记录为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全宗 495, 目录 3, 卷宗 285, 第 25—42、108—112 页(附录为打字稿, 副本)。

12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
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 15 号记录

(摘录)

1933 年 4 月 28 日于莫斯科

秘密

1. 听取：中国反帝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报告人：王明同志）。

决定：责成王明就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问题起草简要的指示^①，其中建议：

[1]重申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②。

[2]在实行广泛的反帝斗争统一战线事业中，加强我们工会和青年组织的活动。

[3]为成立救国会和动员最广大群众同干涉者作斗争起草基本纲领。

在这个指示草案中，应当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口号具体化。

这个指示草案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审议。得到批准后，在其基础上制定更详细的指示^③。

2. 听取：关于新疆的工作（报告人：多尔夫同志）。

① 对此决定有批注：“已完成。”

② 指第 100 号文件。

③ 见第 128 号文件。

决定:[1]开始为新疆制定行动计划。为此,成立由萨发罗夫、王明、多尔夫和阿赫马托夫组成的委员会,责成他们在两个月内准备好草案。一个月后必须听取委员会关于工作进展的报告。

[2]认为派一个由新疆同志组成的小组通报情况以及同起义组织、最先进的革命分子和农民建立联系是合适的。责成米夫同志、科捷利尼科夫同志和多尔夫同志组织派遣这个小组。

(1)责成科捷利尼科夫同志和瓦西里耶娃同志为招收 1933—1934 学年大学生制定一个详细的建议。在一周内提出建议^①。

(2)通过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殖民地部组织获取日常情报。

(3)通过相应的组织,改进对到苏联国营农场做季节性工作的打短工农民的工作。

主席:米夫

秘书:马丘什金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502,第 75—76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以下有批注:“已完成。”

127

皮亚特尼茨基给格伯特的电报^①

1933年5月8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在1933年上半年,中国青年^③总共应收到5385元^④。请立即拨款,并标上已拨出的金额。

中国共产党每个月应收到7418元。米哈伊尔^⑤。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6(1933年发文),第69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收件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 ② 密码译出的日期。
 - ③ 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 ④ 货币名称不详。
 - ⑤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1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 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3年5月9日于莫斯科

上海中共中央：

为进一步开展反帝斗争和加强我们在这一斗争中的领导作用，根据统一战线策略，我们建议：

1. 重新发表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民众的宣言，准备在先前所提的条件下进行联合的武装斗争^②，同时，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进一步进攻和国民党的进一步投降（热河、蒙古和华北部分地区失守，准备放弃北京^③和天津等地）的事实。号召民众和国民党部队，不顾国民党的意志和禁令，根据我们建议的精神行动起来，坚决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者。

2. 以中华全国总工会、我们部分工会和职业团体的名义，向国民党工会、工人俱乐部、兄弟姐妹会和同乡会以及所有无组织的工人建议，组成联合斗争的统一战线，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

① 文件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3年5月9日非常会议上通过的（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43，第17—18页）。文件上有皮亚特尼茨基的修改和批示：可以寄出。皮亚特尼茨基。电报的中文译稿稍有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由中共上海中央局于1933年6月15日作为党内文件下放，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37—238页。

② 见第100号文件。

③ 原文如此。应为：北平。

整,保障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建议在下列口号下进行具体的联合行动:反对解雇,反对降低工资和要求提高工资,要求减少工作日,由国家和企业主为失业工人提供补助,立即释放政治犯,武装人民,坚决有效地武装抵抗日本干涉者。

3. 掌握主动权,首先利用工会,在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基础上,根据以下行动纲领组建全国民众“救国会”^①:(1)批评国民党的卖国行为,批评对国联和美国抱有的有害和无望的幻想,同时强调,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劳动群众联合、统一和组织起来,才有民族反击的力量和战胜帝国主义的保证。(2)全国民众必须起来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3)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参加作战行动、游击斗争和破坏活动,积极援助反日宣传,在群众监督下抵制日货,为义勇军募集资金,等等。(4)依靠兵工厂、军用仓库和从国外运进的武器武装民众。(5)在开展群众运动基础上,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卖国贼和汉奸的所有财产和商品,用于解放战争。为此,要停止支付对日赔款、债务和利息,建立累进所得税。(6)全面中断与日本的关系,动员所有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参加对日战争,立即停止对苏区的进攻,停止军阀之间的内讧。“救国会”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和半合法的机会,吸收像宋庆龄、胡愈之这样的人士参与合作,在工厂、农村、学校、兵营和机关建立自己巩固的基层组织。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78—79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1936 年 5 月 31 日在上海成立。

12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 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313(Б)号记录 (摘录)

1933 年 5 月 15 日于上海

绝密

听取:19(473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中东铁路形势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草稿。

决定:19(4732)——(1)同意以电报草稿为基础。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进行压缩,并请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审定^①。

(2)责成王明同志根据电报精神写一篇文章,在国际报刊上发表^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45, 第 29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见第 130 号文件。

② 对决定 19(2)有批注:“王明已阅。”(见王明:《苏联和中国的工农联盟万岁!》,载《王明文集》,莫斯科 1985 年第 3 卷,第 53—57 页;《共产国际》,莫斯科 1933 年第 6 期,第 29—33 页)

13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不早于 1933 年 5 月 15^② 日于莫斯科 秘密

上海[中共]中央：

关于中东铁路问题，党应该开展群众性的解释运动，发表基本上是以下内容的宣言：

苏联是世界上唯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是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在成立最初，苏联就坚决废除了沙皇政权的帝国主义政策，放弃了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把中东铁路变为商业性企业，建立了共同管理机构，并且不止一次建议中国政府向苏联收买铁路^③。南京政府不仅不遵守与苏联签订的所有平等条约和协议，而且在 1929 年，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和为其利益，企图占领中东铁路。现在，南京政府和所有地主资产阶级和军阀集团，对日本侵略者不进行任何抵抗。同时这些集团还拒绝履行对中东铁路的义务。他们自己不去保卫中国，而像以前一样去充当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利用中东铁路问题来挑起日本对苏联的战争。我们党在揭露国民党的罪恶政策的同时，要号召中国劳动群众不顾卖国的国民党政

① 文件上有皮亚特尼茨基的修改和批示：“可以发出”。电报中译稿有不大的文字改动，1933 年 6 月 15 日由中共上海中央局作为内部文件下发（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239 页）。

② 日期是根据第 129 号文件确定的。

③ M. C. 贾丕才：《苏中关系》，莫斯科 1958 年，第 241—246、262 页。

府的意志,坚决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当中国劳动人民在闸北英勇抵抗的时候,全世界劳动人民都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我们相信各国劳动人民支持我们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苏联坚定不移地在为争取和平和避免世界大战而斗争。苏联提议把中东铁路卖给满洲国,是为了打乱帝国主义的计划。中国劳动人民清楚地知道,继续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苏联,是为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所有劳动人民的利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在捍卫中国的独立,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者时,也要收复热河和满洲,收回中东铁路,并且要阻止帝国主义把满洲和华北建成进攻苏联的桥头堡。保卫中国和苏联!为苏中劳动人民的兄弟联盟而战!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85—86 页。
打字稿,原件。

131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3年5月中旬于上海

秘密

亲爱的皮亚特尼茨基：

请您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谈谈她在中国今后的工作。迄今为止，不仅我们，而且我们的邻居^①都没有使用她。应当改变这种状况。最好是这样解决问题：让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得到一些文学方面的长期任务，这可以保证她在这里呆下去，并像从前一样，可以利用她为中国做一般的工作。如果您认为这合适，那您肯定就能给我们提供某种帮助。

此外，我请求您帮助她：(1)与苏联文学界建立联系；(2)让她能在高加索休息几个月，同时她想在那里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此致

敬礼

您的 埃韦特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59，第 104a 页。

德文手稿。

^① 指工农红军第四局工作人员。

132

青年共产国际给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电报^①

1933年5月17日于莫斯科

绝密

中国共青团中央：

利用一切力量广泛宣传中共抗日统一战线的行动纲领^②。在青年会议上，在工会、学校、抵制组织和体育组织中，要结合经济要求提出联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建议，同时揭露反动首领的暗中破坏。要培训去休假的大学生开展农民运动。要开展军事训练，向市政当局提出要求并在适当条件下夺取武器、房屋和场地，争取自己教官的选择权和宣传自由。要使现有的军事训练革命化。请本着党的行动纲领精神在士兵当中组织有力的宣传活动。要加强北方的工作。

青年共产国际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88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1933年6月15日电报中译稿由中共上海中央局作为内部文件下发，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40页。

② 见第128号文件。

133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米夫的信

(摘录)

1933年5月21日于海参崴

致皮亚特尼茨基和米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们：

1. 近日，我们收到了中共满洲区委的信^①，信中同志们告知，我们由这里转去的[中共]中央的信^②，在区委执行局和满洲其他地区党组织内部进行了讨论。这封信被复制多份并发给党和工会的积极分子进行讨论和研究。根据满洲区委的报告判断，看来，中共中央的信确实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的决议^③并结合中国战争的进一步展开和包括东三省在内的全国革命反帝运动的高涨，给满洲的同志提出了正确开展工作所必要的原则性的和组织方面的指导方针。可以认为，我们满洲的同志们知道，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去年党和工会组织不仅没有利用出现的有利条件来开展群众性的组织工作，而且相反，比满洲被占领之前更加与世隔绝和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看来，关于我们参加反帝和反日统一战线问题及在统一战线中争取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同志们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99号文件。

③ 见《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以中国为例)》，第316—321页。

已经开始提出并在认真加以解决。现在还很难说,他们将在实践中如何开展整个这项工作,因为我们这里还不相信,党组织的领导层能很快转变到新的方针上来。从我们这方面讲,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同志们开展工作,尽管在现时条件下与满洲联系非常困难,我们还是通过人员或比较定期地通过信件,与他们保持联系。满洲区委已作出的一项组织决定,将使我们更容易与他们联系及帮助他们:满洲区委决定成立东满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管辖间岛、穆棱和松花江下游地区。

由于满洲区委的工作开始更大规模地展开,所以必须从物质上帮助他们。需要指出的是,在满洲目前条件下,中央对地方机构的领导可主要通过人员的指导来进行。无论是旅程,还是相应的秘密住宅,都需要大量的经费。其次,由于采取了新的工作方针,必须通过秘密刊物更好和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鼓动和宣传。因此,我们支持满洲区委关于为此项工作为他们拨经费的请求。我们认为,每月应给满洲的工作拨 200 美元。请批准这笔款项并指示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海参崴站把钱交给我,再由我转交满洲。

2. 我在莫斯科期间^①,曾决定在满洲招收 20 人(最好是工人)去莫斯科学习,在堪察加—萨哈林半岛招收 10 至 15 名日本工人,在朝鲜招收 5 人。满洲区委通知说,他们准备从 7 月份开始派遣人员。我们已经通过国际俱乐部^②的日本教官通知堪察加半岛有关招募的条件。现在,为此必须给我们寄来相应的经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可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得到这些经费。请现在只给来自满洲的人员寄来 200 美元和 1 万苏联卢布,以便他们购买海参崴到莫斯科的火车票和食品。这些钱是供

① Г. Н. 维经斯基自 1932 年 12 月底至 1933 年 2 月中旬在莫斯科。

② 指海参崴的国际海员俱乐部。

20 人用的。……^①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经斯基

全宗 534, 目录 4, 卷宗 466, 第 29—30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以下删去与中国无关的部分。

134

王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3年5月23日于莫斯科

绝密

中共中央：

请停止在报刊上公布有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或工会小组的企业名称。在不具备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不应重复“合法的招募运动”，要代之以真正单独地有步骤地招募那些在日常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的最优秀的工人积极分子。在有大量支部的大企业中，要在这些企业的车间、班组和各个部门组建党支部。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我们生产支部今后遭破坏。

王明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91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135

维克多^①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②

1933年6月2日于上海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同志^③和弗雷德^④同志建议戈登同志(美国驾驶员,生活在美国,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认识他)乘坐在上海购买的飞机到我们地区去。飞机价值约8千到1万元^⑤。在上海购买飞机不惹人注意,因为在那里这是常事。

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如下：

遗憾的是,从这里派一名欧洲同志到我们地区去的委托至今未能完成,而且总的来说,也看不到什么希望,因为即使对中国人来说,这样做也会有许多困难和危险。相反,飞机能容易地和不被发现地“误入”我们的地区。我们中的一个人会和戈登一起飞。这样,我们在那里将有一个我们中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在我们的地区使用飞行员和飞机进行侦察活动等(目前在我们的地区没有一架飞机)。

埃韦特同志和弗雷德同志指出,这个建议应看作是绝对现实

① 身份不详。

② 文件上有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的批示：“送别尔津同志”，以及身份不明的人的批注：“已送别尔津。”

③ 姓名被勾掉,根据后面阐述的内容来判断,指的是A. 埃韦特。

④ M. 施特恩。

⑤ 货币名称不详。

的,它的成功是有保证的。他们请你们认真研究这一建议并告知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看法。戈登同志在军事机关工作,如果允许的话,他肯定准备完成这一任务,然后将我们的地区工作。

我受委托与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本人谈一下这件事。

维克多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59,第 105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13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
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316(B)号记录
(摘录)

1933 年 6 月 3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37(481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派遣赖安同志去远东国家挑选大学生事宜的建议。

决定:37——批准^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48, 第 25、27—28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1933 年 5 月 21 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派遣赖安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工作。Г. И. 萨发罗夫在给政治委员会的信中写道:“东方书记处请求赖安这位唯一一名来自欧美的同志来该处工作, 他已经对殖民地工作有所了解, 当过指导员。我们的建议是, 把赖安同志留在东方书记处一段时间(3 到 4 个月), 然后派他去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工作, 目的是恢复联系和指导。然后他可以在上海工作”(见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46, 第 1、3、237 页)

137

维经斯基给琼森的信^①

(摘录)

1933年6月6日^②于海参崴

绝密

亲爱的琼森同志：

有几个问题写给你，我一定要得到你的答复：

1. 我从莫斯科回来后(2月底)，太平洋书记处的工作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日本人占领了中东铁路的东段直到边境一站，现在很难与满洲保持联系。但是，开展满洲工作的必要性和我们对那里同志的帮助却更加增大了。因此，我在这里对这项工作付出了很大的注意力。已经做了以下一些事情：根据中共中央的来信^③，具体就从满洲收到的报告和材料与三位同志(白阳、留姆金^④和科瓦尔斯基^⑤)开了会。这三位同志在会后被分别派回满洲。前两位同志已经在那里，我们已收到他们的来信^⑥，根据来信可以看出，在哈尔滨举行了会议^⑦，并研究了全部材料和我们在哪里讨论过的问题。他们还通报了一些具体的组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洛佐夫斯基和科斯塔尼扬同志”。

② 红色工会国际是在1933年6月17日收到信的。

③ 见第99号文件。

④ 程道南。

⑤ 中国姓名不详。

⑥ 文件没有找到。

⑦ 指1933年5月14—16日在哈尔滨举行的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

织措施,例如,在穆棱组建满洲党委东方局和领导这一地区工会运动的相应机构。第三位同志还未告知自己已经到达。这几天我们一直在等待他的来信,希望他一切顺利。此外,我们最终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从这里派遣中国同志的问题,我们已经向满洲派了五名同志^①,其中三人根据与满洲委员会的商定,专门从事工会工作。最近,我们还准备派遣几个人。资料只发送了两次。我现在要用新的方式提出发送图书资料的问题。我想,在相应机构的协助下,在两处地点,只通过中国同志来做这件事。因为需要我们帮助发送图书资料的情况越来越多,尤其是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游击运动和许多城市中的反日运动会活跃起来,党和工会的群众性工作也要大力加强。我认为,能否安排好图书资料发送工作,将不仅取决于我们,甚至不完全取决于我们,而更多地取决于满洲的党组织。他们给我们写信说,他们同意我们的建议,将派人到相应的联系点。

我们现在才起草太平洋书记处给满洲总工会的信。过几天你会收到这封信^②的。我们之所以不急于起草这封信,是想从同志们那里得到些信息,我们在这里已与这些同志们进行了商量,要使信的内容尽量更具体些。根据同志们的要求,我们在信中还提供了宣传材料。

这就是关于满洲的所有情况。结论是:了解了我们太平洋书记处给满洲的信后,要立即用电报简要地把你们的意见发过来,而写信务必要写得更详细些;必须让红色工会国际预算委员会给我们拨来经费,关于这个问题我再单独写一封信^③……^④。

① 何人不详。

② 文件没有公开(见全宗 534,目录 3,卷宗 907,第 31—57 页)。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以下删去了与中国无关部分。

祝好。等待你的回信。

斯蒂文斯^①

向果利亚^②问好。请他不时写信来。

又及：希望你们两个人记住，秋天之前我将提出返回莫斯科的问题。

全宗 534，目录 4，卷宗 466，第 31—32, 35 页。

打字稿，原件，最后一项建议、签字和附笔为手迹。

① Г. Н. 维经斯基。

② Н. А. 福京。

13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皮亚特尼茨基^②的电报

1933年6月10日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③：19路军司令蔡廷锴建议，通过廖夫人^④与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进行谈判。他同意与红军一起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和南京。我们将谨慎行事。苏维埃政府已发表致19路军呼吁书^⑤。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54(1933年收文)，第 221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发信人根据内容确定。

② 文件中有批注：发给别尔津同志。

③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④ 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

⑤ 指的是 1933 年 5 月 28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福建省和广东省白军士兵的号召书。

13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6月21日^②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③:[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地区的北方军队中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南京三个师的推进,我们目前的处境很危险。为了阻止受共产党影响的军队被解除武装和干部被清洗,我们试图实行以下方针:加强在北方的工作,撤出军队,不投入战斗,加强在山西省方面的影响并准备将北方军队逐步转为红军。我们将在南京军队中进行鼓动宣传,以使它们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主要口号是:“打倒北京^④和南京的叛徒!”“反对解除武装!”“武装民众!”“驱逐国民党军官!”“组织向南京进军!”“推翻叛徒政府!”。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54(1933 年收文), 第 210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 1933 年 6 月 22 日收到文件。

③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④ 原文如此。应为:北平。

14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①

1933年6月24日^②于莫斯科^③

致政治委员会代表：

请向中国同志了解一下，冯玉祥分子^④是否已与他们讨论了共产党员在冯玉祥控制的地区开展工作的问題。现在非常担心的是，冯玉祥与日本人有联系，因此对他要倍加小心。最好不要与他有任何联系。请告知中国同志的意见。不应当与第19路政府军司令^⑤进行任何谈判。当他真正开始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斗争时，才有可能建立统一战线，而现在谈判会成为陷阱。建议您不要与任何人直接进行谈判。您应当从中国同志们那里获得信息。如果他们与什么人进行谈判，那么他们只能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进行。在各种重要情况下，他们都应与您商量，而您也应告知我们。总的来说，您应该只限于同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志保持联系。

① 文件是由И. А. 皮亚特尼茨基、О. В. 库西宁、В. Г. 克诺林组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成员于1933年6月13日以飞行表决方式通过的，并于1933年6月27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得到批准（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51，第1、3—4页）。

② 电报解密的日期。

③ А. 埃韦特。

④ 冯玉祥的支持者。

⑤ 蔡廷锴。

关于飞行^①的建议,我们认为是不现实的。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108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见第 135 号文件。

141

埃韦特^①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7月2日^②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③：关于冯玉祥的问题，我们支持你们电报中所阐述的立场^④。中国共产党不与他保持正式联系，但有一个同志在他的军队中积极做工作^⑤，通过他来保持联系。我们希望，由于革命运动已经开展起来，冯玉祥士兵的起义将会使苏维埃地区扩大。我们认为，19路军司令^⑥的建议是不严肃的^⑦。我们已建议[中共]中央谨慎行事。待续^⑧。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54(1933 年收文)，第 197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发报人是根据第 140 号文件确定的。
 -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 1933 年 7 月 3 日收到电报。
 - ③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 ④ 见第 140 号文件。
 - ⑤ 可能是赵延清(音)。
 - ⑥ 蔡廷锴。
 - ⑦ 见第 138 号文件。
 - ⑧ 续电没有找到。

142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7月7日^①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②。中国共产党、工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财政状况极其困难。请增加预算。请尽快答复。代表^③。

全宗 405, 目录 184, 卷宗 54(1933 年收文), 第 188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 1933 年 7 月 8 日收到电报。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③ А. 埃韦特。

143

对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委和全体 党员的信《关于满洲的状况和 中共的任务》的说明^①

1933年7月14日^②于莫斯科

在华北五省代表会议关于满洲问题的决议^③中以及中共中央早些时候就满洲问题通过的文件中存在着很多严重的策略错误。我们希望,党的各级机构在本信的基础上重新检查自己的策略,并根据这一原则重新规划自己的工作。

[中共]中央相信,满洲党组织依靠新的策略方针,积极开展工作,一定能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5, 第 61 页。

中文印刷稿, 清样。

①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的中共中央 1933 年 1 月 26 日给满洲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的信所作的这个说明没有在中国发表。在中共中央 1933 年 6 月 9 日的说明中, 没有对在满洲问题上的策略错误的批评, 但谈到在反日、反帝斗争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 必须采用信中的策略方针,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 第 44—45 页。

② 日期是根据排字工人的记号确定的。

③ 见第 240 页注①。

144

维经斯基给洛佐夫斯基和米夫的信

(摘录)

1933年7月14日^①于海参崴

绝密

亲爱的亚历山大^②和米夫同志：

收到了你们7月7日的电报^③。我认为有必要阐述一下自己对整个问题的看法。

1. 远东的事态发展确实要求我们在工作中非常小心谨慎和保持足够的警惕，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你们的电报的[……]。^④

3. 现在谈一下“太平洋书记处收缩”的问题。看来，这应意味着：

(1)减少出版活动(不以太平洋书记处的名义出版秘密小册子和抨击性作品)；

(2)限制以太平洋书记处名义出版官方呼吁书和宣言；

(3)停止通过我们秘密渠道散发书籍(这里当然不包括通过非苏联轮船上各国海员散发书籍)；

(4)停止派人去国外；

① 红色工会国际书记处于1933年7月31日收到文件。

② C. A. 洛佐夫斯基。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以下删去与中国无关的部分。

(5)停止在国外建立新的联系和扩大旧的联系；

显然，收缩并不意味着：

(1)停止准备书籍以备将来进行必要的和可能的散发；

(2)停止根据从满洲、朝鲜和日本寄来的资料，以及到我们这里来的人作出的指导，来具体研究工会运动；

(3)停止从满洲、朝鲜和日本招募和派遣工人去莫斯科学习；

(4)停止为海员出版中文和日文的报纸^①。

一句话，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收缩”一词的意思的话，那么它意味着，太平洋书记处只应在我们的领土上做工作，因为它可以做工作，也就是说因为国外将需要它给以帮助，但它自身不应在国外组织工作。

如果上面所说的是对的，那么这里只需留二至三人（中国同志、日本同志和朝鲜同志各一名，也可以只留中国同志和日本同志各一名），而为了领导他们则需从地方党组织中专门抽出一个人来，或者从莫斯科派一个人来。应该保留这样一个小型组织，以备过一段时间出现重新开展工作的可能性。

4. 至于太平洋书记处那部分较为秘密的工作，即与满洲党委会和工会的联系，以及与朝鲜的联系，则这些联系可以转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海参崴的代表^②。通过这个代表处接待和派遣从国外来学习的学生。

恳请立即答复我这封信，以使我能够对太平洋书记处实行正确的收缩，使我们暂时的被迫退却不致造成我们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工作完全停止，因为这里有开展这项工作的可能性，且十分需要帮助革命的工会运动以及我们兄弟的中国党和日本党。

① 报纸名称不详。

② 何人不知。

斯蒂文斯^①

全宗 534, 目录 4, 卷宗 466, 第 36—38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Г. Н. 维经斯基。

1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① 给格伯特的电报

1933年7月17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致库尔特^③：请电告，您是从谁那里得到法郎和3000元的^④。

今年，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每月给中国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拨出1500元。5月底，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通过邻居^⑤给您寄去5000元作为1至5月的费用。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现在无法邮寄^⑥。请告地址，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将从欧洲或从美国把钱转汇过去。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6(1933年发文)，第124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电报解密日期。

③ H. H. 格伯特。

④ 货币名称不详。关于收到钱的文件没有找到。

⑤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国外处的工作人员。

⑥ 原文如此。

14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 325(B)号记录

(摘录)

1933年7月21日于莫斯科

机密

听取:6.(496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派遣普罗列塔利耶夫同志^①回国工作的建议。

决定:6.——征求中共中央对派遣普罗列塔利耶夫同志回国工作必要性的意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附录 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便函

绝密

致政治委员会

附上东方书记处 1933 年 7 月 16 日处务委员会会议第 23 号记录摘录以及干部部鉴定,东方书记处请求派遣普罗列塔利耶夫

^① 卜士奇。见附录 1。

同志回国工作。

东方书记处书记：米夫

附录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 1933 年 7 月
16 日处务委员会会议第 23 号记录摘录

秘密

5. ——杂事：(1)普罗列塔利耶夫同志关于派遣他回国工作的申请。

5. ——(1)认为派遣普罗列塔利耶夫同志回国工作是合适的。为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将其交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审议批准。

核对无误：马秋什金

附录 3

切尔诺莫尔季克给米夫的便函

1933 年 7 月 16 日

绝密

致米夫同志

兹向您报告，叶甫根尼·安德列耶维奇·普罗列塔利耶夫同志，即卜士奇（中国人），我们对他进行了审查，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没有任何有损他的名誉的材料。

切尔诺莫尔季克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54, 第 3—6 页。

记录为德文打字稿, 原件; 附录 1 和附录 3 为打字稿, 原件; 附录 2 为打字稿, 经过核对的副本; 亲笔签字。

14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326(B)号记录

(摘录)

1933 年 7 月 27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26.(5002)——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问题。

决定:26.——(1)批准康生同志作为代表,允许他参加政治书记处和主席团的会议。

(2)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王明同志回国的建议。^①至于他的行程,这个问题应由皮亚特尼茨基、库西宁和米夫来决定。

(3)同意中共中央关于李立三返回苏区工作的建议。^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54,第 24—25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关于王明回国的问题,从 1932 年起,中共中央不止一次地提出过,特别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 1932 年 10 月 25 日收到的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见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7a,第 259 页)。在莫斯科和上海之间随后的电报往来中,讨论了派王明到中央苏区去的具体途径。如,见第 95 文件,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分部 1933 年 1 月 6 日、1 月 21 日、3 月 27 日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54(1934 年收文),第 311、296、260 页)。

② 文件没有找到。

148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6号报告^①

1933年7月28日于上海^②

致米哈伊尔^③：自我上次报告后，已过去差不多四个月了^④。我还不认为有必要向您详细阐述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因为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在电报中^⑤向您通报了。而到您那里去的党的新代表^⑥，对所有问题都很了解。他的报告会给您提供大量信息^⑦。我只挑出一些情况谈谈，何况随本次邮件给你们寄去了大量英文和中文材料^⑧。

1. 总的政治形势。近几个月来，对于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来说，形势大为恶化。在北方地区南京向日本投降^⑨，人们对此极为失望和消极。以前对南京政府的直接反抗是不大的。但今天形势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① 文件上有批注：“马季亚尔同志已阅并已向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转告”。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8月19日收到文件。

③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④ 见第123号文件。

⑤ 见第139和141号文件。

⑥ 康生。

⑦ 见第153号文件。

⑧ 文件没有找到。

⑨ 指1933年5月31日在塘沽(天津以东)签署的日中停战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在日本和中国军队之间建立一个包括河北省东北部(从长城直到北平和天津)的非军事区。详见：《现代史文选》第1卷，莫斯科1960年版，第642—643页；《中国年鉴(1936年)》，上海1937年版，第176页。

(1)蒋介石未能成功地利用日本人为他提供的喘息时机来反对红军。

(2)他未能建立对各派集团的领导权。矛盾在加深,反对他的力量在增长。

(3)各地人们越来越理解到,“军事停战”,对日本来说,只不过是准备新的进攻的幌子,日本将提出新的苛刻要求。

(4)按蒋介石的精神搞好北方地区的团结,还远未实现。

关于第一点:请您参阅附有我们一些重要指示的详细军事报告^①。敌人在使用比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手段,全力准备第六次进攻^②,最近几个月,他们就要开始发动对中央苏区的进攻。最近几个月,广东军队也给我们制造了一些麻烦,进攻我们在江西南部的地区,并占领了一些城市。目前,我们暂时使他们停止了进攻,但完全有可能,当国民党在江西北部取得胜利的时候,广东的进攻将会恢复,当然这种进攻不是为了与南京合作,而是为了在争夺中国领导权的斗争中,消除苏维埃这一障碍。蒋介石正在准备的进攻,应当引起特别的关注。尽管我们竭尽全力,最终还是未能摆脱僵局。而敌人的工事和人数反而有了增加。我们现在正试图用我军的大范围协同行动,来部分地占领抚河和赣江沿岸一线,并尽可能消灭敌人大股部队。只有在达这一目标后,较为轻易的防御和稍许扩大中央苏区才会成为可能。暂时还很难说,我们的计划能否成功,因为目前仅处在实施的初始阶段。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武器的缺乏(目前我们的指挥部也承认)说明以前的数据过分夸大。加之在个别作战地区,我军粮食供给也很困难。

困难经常导致产生与总体政治军事需要相对立的“军事观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小组政治领导之间的分歧,以及就我们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这里和以下指的是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所建议的每一项重大措施同中央军事小组政治领导发生的持续不断的争论、他们要保留不相称的大兵团(达2.2万人)的意向——所有这一切,都妨碍作出一些必要的和迅速的決定。这些困难说明了许多问题。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但我认为,近期我们摆脱中央苏区所处困境的希望不大。如果我们能够击退敌人的第六次进攻,那么由于其他地区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我们或许会走出在敌人强加给我们的需要有牢固战线的“阵地战”。

四川省的形势较好。我们的第4军团^①(从湖北经湖南和陕西急行军来到四川)取得了新的、无疑是巨大的胜利。即使敌人更多的兵力对我们发动目前可以预料的行动,我们现在的处境也比我们在四川取得初步胜利后更有利。我们拥有更多的领土;在四川省的偏远地区还拥有所谓的游击区;土地革命在不断扩大;与一切联合的愿望相反,敌人阵营中正面临着分化。这一切都说明,在一年内,我们可以在这个省建立起比江西目前的基地更有意义的基地和地区等。在这个地区党的领导很薄弱,加强领导有一些困难,因为各地都提出了提供领导干部的要求,而在北方情况更糟糕。

详细情况请您参阅关于四川问题的军事报告^②。

在这些报告中^③,您还会找到关于其他较小地区的重要信息。(关于贺龙,您会找到一些中文的东西^④,而在我给党的信^⑤中,有对贺龙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某些行动方面提出的建议。例如,在出现困难的时候,他们把许多人斥之为改组派,并把他们枪决;做政治工作不够,对农民采取了宗派主义态度。还有许多其他的方

① 原文如此。这里和以下应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原文如此。指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文件没有找到。

面。)已给他寄去了指示信,信根据我的信的精神,分析了争论的问题。“他”控制的地方有10万居民。

关于第二点——矛盾不断发展的问題:尽管所谓“西南委员会”与广州这个中心,没有在任何问題上取得一致的观点,但是反对南京的情绪却在日益增长,这种情绪也促使事态逐渐向建立一个希望统治全中国的新的中央政府方向发展。这些人士对利用红军反对南京政府或至少对不进攻红军有过某种摇摆。但这种情绪未能抵挡住占上风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消灭江西、福建和湖南的红军是跟南京全面提出政权问題的前提。我们曾通过电报向您报告过,19路军司令蔡廷锴试图与我们建立联系^①。这件事没有带来任何后果。联系未能建立。相反,在我们的战斗行动中,我们给了19路军部队以警告性的打击。我们早就制订了对这支部队的专门号召^②。

广州和南京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表现在不断地败坏蒋介石的名誉上,目的是要在将来同南京集团的部分人建立反蒋联盟。

“西南委员会”对所有重要问題都确定了政治上的、非常严格的限制规定:(1)抗议“军事停战协定”^③。(2)把“哗变”的北方舰队并入广东舰队。(3)对北方的冯玉祥给予政治上的支持以及少许财政上的支持。

蒋介石在江西与我们的斗争不取得较大的胜利,他的处境就会更加困难,而推翻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些情况,迫使我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为了削弱中国,英国在挑唆广州。同时广州也有意摸日本的底(陈友仁)。

关于第三点——日本的进一步推进:在北方的个别战略地区,

① 见第138号文件。

② 见第443页注⑤。

③ 指1933年5月31日在塘沽签署的日中停战协定。

中国军队处在日本的监督之下,这使得这种推进在将来更加可能。日本不得不暂时停止推进,目的是为了巩固已有的地区(热河还没有完全在日本人手里),和避免过早地在争夺北方的斗争中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严重冲突;日本总参谋部内对下述问题存在分歧,即现在是否适宜向蒙古和苏联方向推进,或者先再占领中国几个地区。无法预言日本最近要发动的直接行动,但是今天已经很清楚,它要占据“长江以北”地区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势力范围。

关于第四点——北方的问题:请您参阅关于北方的材料(部分是英文的,更详细的是中文的^①)。在这里,我只想简要说明一下中心问题。以下是前言:我们已电告您,党已经非正式地与冯玉祥进行了接触^②。事态发展与中共河北省委最初通报中所讲的有些不同。省委特科向张家口派了几个人^③,这些人原来政治上不可靠,他们主要是根据北平特科领导^④的指示行事,很快就受到了冯玉祥的影响,而更糟糕的是,他们用机会主义思想影响我们党的领导机关。我们用最严厉的方式坚持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特科不应发表任何政治指示,只有省委、中共中央代表才可以;撤换特科领导;召回与冯玉祥保持联系的人,如果可能的话,用可靠的人替换他们;把提供情报的人的活动与党的工作和其他群众工作明确划分开;根据具体指示,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群众工作上,等等)。从中共上海中央局驻北平代表^⑤的第15号报告中^⑥可以看出,这些措施已经部分实施。自然,在这里,无论我们还是中共上海中央局,都不对冯玉祥抱有任何幻想。我们的目的是,提前得到有关现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141号文件。

③ 何人不详。

④ 何人不详。

⑤ 孔原。

⑥ 文件没有找到。

有意图的情报,对某些动摇的军官施加影响,首先是利用短暂的合法机会来进行大规模的群众工作。尽管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这种错误由于北方同志的经验不足而加重,他们大部分不具备过去国民党时期的经验),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得了成效:

(1)在一些部队中建立了基层党组织、群众性的士兵反日组织、士兵学校和政治学习班;向义勇军派去了宣传员,等等。

(2)张家口的工人被动员起来了(铁路工人、五金工人、失业者和苦力)。我们所犯的错误您从文件中可以得知。积极的结果是:取消了铁路上的国民党工会,解散了国民党党部,初步建立了在我们影响之下的铁路工人工会组织;组建了五金工人武装纠察队;举行了群众大会和代表会议(我们正在全力与某些“党员”参加将领会议和市政管理会议的这种卑鄙行为作斗争)。正在筹备人数众多的工人、士兵、群众组织等代表会议。

(3)对张家口两家报纸立场的影响^①。

当然,我们关心的是进一步扩大这项工作的基础,使这项工作摆脱机会主义的摇摆,加强起义前的领导。

因此,我来谈谈主要问题。我们不指望敌人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时间。由于我们的影响迅速扩大,冯玉祥在几个星期以前就对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他反对给予士兵建立组织的权利,并对两家报纸实行监督。

由于忽视我们早在几个月前发出的关于严格划分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指示,现在存在着反革命向我们的组织和干部发动突然进攻的危险。在以前的基础上完成工作,只能持续不长的时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办?7月27日我们曾给您发去以下电报:

“致政治委员会:由于我们在张家口的影响增大,冯玉祥开始

^① 指的是1933年出版的报纸:《民众日报》和《老百姓报》。

对我们采取行动。他反对我们在军队中的组织。革命运动被毁灭的危险在增加。存在着两种可能性:(1)着手组织士兵起义,在张家口工人总罢工的背景下,建立新的苏区,但不建立我们无法保持的张家口公社。(2)撤退并转向秘密工作。我们的意见是:着手准备尽可能在8月底9月初举行起义。

据党的通报,军队在瓦解。5000名士兵处于我们的直接领导之下。部分军官中动摇情绪明显。无产阶级站在我们方面。农民中的工作进行得薄弱。党的领导薄弱,我们正在加强它。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代表了解这些情况。请过两天电告您的意见^①。8月初我们要作出关于起义的具体指示。代表”^②。

对此应作以下补充:在忠于南京的北方军队中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迹象。发生了多次哗变。造反的志愿兵抢夺粮食,抓捕前来镇压他们的士兵,并将自己的人数扩大到2000人,转向义勇军。

如果我们能在暂时还没有发生公开决裂的情况下,把同张家口势力的斗争转为同南京—北平势力的斗争,那么这会是有利的,我们也会这样做。但问题是,这能成功吗?因为冯玉祥已在与各方搞幕后谈判阴谋。

既然冯玉祥正在准备对我们进行打击,那我们现在就想在比较小的范围内着手准备士兵起义,制定相应的口号。同时,或者在士兵起义后,我们马上着手举行张家口工人和铁路职工的总罢工,在完成这一任务的情况下,先控制住其他部队并解除其武装,然后向西南方向(湖北和陕西边界)推进。

随着新编红军的出现和新的苏区的建立,出现了把有不满情绪的和分散的部队,以及义勇军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可能性,有可

① 见第151号文件。

② A. 埃韦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在1933年8月2日收到电报的(见全宗495,目录184,卷宗54(1933年收文),第159页)。

能给予农民运动以武装支持,并极大地影响矿山地区。

如果党的通报属实(关于全面骚动,关于“直接领导”5000名士兵和在其他部队中的影响),则计划将会成功。当然,风险是很大的,但有这种前途。即使不可能立即建立新的苏区,但红四方面军的推进毕竟表明,有这么多个士兵的集团是可以突破的,而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可以建立新的苏区或者巩固现有的苏区。

我们现在正在制定具体的指示,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将等到收到您对上述电报的答复后再给党发出这些指示。但我们不能等太长时间,可能将不得不与党一起自担风险地行动。

现在就党的问题和其他问题作一些通报:

1. 12月11日在中央苏区将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①,因此共产党已经开始进行宣传工作。我把当地党的刊物上将发表的文章的草稿寄给您(发表时有稍许改动)^②。请您作出指示,以便在我们的国际报刊上和《国际新闻通讯》^③上对大会作些报道。党准备从白区派出30到50名代表。当然,如果新的进攻牵扯我们的全部力量,则大会有可能延期。

2. 我们将在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之前举行中共五中全会^④,而在近期只召开政治局会议。9月初以前您还可以给我们发来指示,我会很欢迎的^⑤。

3. “反战大会”^⑥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由于压制任何合法的反帝运动和宣传,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已经以筹备委员会的名义

① 中央苏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瑞金举行。

② 文章没有找到。

③ 见第39页注②。

④ 见第281页注⑧。

⑤ 见第163号文件。

⑥ 见第227页注①,第83、197号文件。

发表了由宋庆龄签署的宣言,^①这个宣言也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发表了。我不得不抱怨,我们对代表团的政治可靠程度、对谁是代表团的真正领导、谁决定国际代表团的组成等情况了解得不多。您应该明白,我不能合法地监督这个代表团的每一个工作阶段。

大会的前景很渺茫,因为民权同盟^②总干事被杀^③和威胁要处罚其他积极分子之后,所有动摇的自由派分子都表现得惊慌失措,大部分人拒绝参加任何工作而一部分人退出了组织。宋庆龄表现得很好,仍与我们合作。

4. 罢工和工会工作。工会工作因领导人不断被逮捕和缺乏干部及经费不足等原因而困难重重。最好有一名代表专门研究这些问题,并定期寄来预算经费。最近几个月,多少在我们的影响下,罢工次数有了很大增长。我已请党发来对事件的详细述评。因此,我只讲一些最为重要的事件。新的罢工浪潮5月份在上海达到了最高峰:

地区	罢工次数	工人人数	损失的工作日
租界区	10	4901	31073
中国地区	6	14471	75535
1933年5月总计	16	19372*	106608
1932年5月总计	16	6809	21082

* 其中约1.5万名棉工业工人,要求恢复每周四天工作日,这一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满足。随后几个月的可靠统计数字我无法向您提供。

6月27日,上海1000多名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合同制度。每一元钱雇主得80分,而工人只得20分。工人要求相反的

① 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载《中国论坛》,上海1933年8月6日,第2卷第9期,第8—9页。

② 原文如此。应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见第345页注④。

③ 指杨杏佛(杨铨),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被杀害。

比例。因为罢工没有扩展到其他港口城市，所以这次罢工取得了不大的部分胜利。

6月14日，在北平，由于士兵粗暴地对待一名电车工作人员，电车厂工人宣布举行为期两天的抗议行动。工人们要求惩治肇事者，厂方向他们作出了承诺，当然，没有兑现。

6月底，广州海员工会宣布“中国海运公司”海员总罢工，以抗议几个月前发生的粗暴对待中国海员、解雇船上烧茶水男孩的事件。罢工持续了几周，席卷了公司在广州、汕头、北海和海口的所属船舶。广东当局出于民族主义考虑采取了克制态度。胜利微不足道，未能使被解雇的工人回来。

随着丝织业季节的开始，工人们立即恢复了要求恢复他们以前工资的斗争。自7月5日至7月10日，大部分开工的纺织厂都举行了罢工，并胜利结束。在其中的一个试图取消协议的工厂中，罢工得以顺利继续。工人以下的要求得到满足：

- (1)把女工工资从每天0.4元提高到0.8元。
- (2)每周为所有工人补加0.2元。
- (3)每隔20天补加一天工资。
- (4)职员、苦力、学徒工每月得到补加2元。
- (5)得到工资20%的奖金。

第二和第三条只适用于季节性月份：8月、9月、10月。其他条款自7月1日起生效。这个工业部门的状况在日益恶化。

1931年	106个工厂	48676名工人
1933年7月	54个工厂	23836名工人

其次，在上海最大的卷烟厂（英美烟草公司）也举行了罢工（约9000名工人参加），取得的胜利不大。原因是：实行了非全工作日的集约化。

发电厂：有 1000 多名工人罢工，反对解雇 100 多名工人，反对惩罚激进的工人；要求为因工死亡工人的家庭赔偿 2000 元。消极抵抗，7 月 3 日，英国经理粗暴地驳回了工人的要求，叫来警察；把白俄分子带到企业充当工贼。罢工无果而终。

7 月 25 日，3000 多名“申新”棉纺厂的工人宣布罢工，抗议惩罚他们的一个工友。24 小时后罢工胜利结束。

7 月底，在我们的影响下，爆发了天津纺织企业 5000 名工人的罢工。70 人被捕，动用了大批军警。

所有这些行动都表明了中国工人的坚强斗争意志和强大的团结精神，尽管有恐怖行动和国民党工会老板的出卖，但他们仍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发动。

当党在它的这一最薄弱方面的工作得到改善时，则可以取得更多的胜利。

农民运动：我不想重复总的来说已经众所周知的事情和关于四川的通报中已经说过的事情。很重要的一点是，目前在我们有有条不紊的工作还很少涉及的地区，农民运动已具有很大的规模。

6 月初，在黄河以北（济南）爆发了 1 万人参加的农民起义。共投入三个旅来镇压他们，结果 600 人被杀，1000 人被捕。报刊把这次运动描绘为宗教狂热病的表现。但是，真实原因是农民拒付捐税。在斗争过程中农民一时占领了一些县，解除了军队的武装。

另一个也被镇压下去的农民运动爆发于福建省南安地区。6000 名农民冲向税务局，要求取消提高的土地税，他们解除了警卫的武装，捣毁了税务局，打死三名国民党职员。

如果我们能坚持住并不受大的损失击退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如果我们能加强我们在四川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影响北方的士兵群众和义勇军，分化他们并引导他们进行斗争，从他们中间分离出一个巩固的核心，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新的基

地,那么同所有其他事件和运动总起来看,我们在明年就能向前迈出一大步。

全宗 495,目录 1,卷宗 759,第 109—114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

149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①

1933年7月28日^②于上海

致米哈伊尔^③。我认为,非常需要增加中国共产党、工会和青年^④的工作预算。元的贬值使工作状况变得极其危险。工作日益增多。来自苏区的资金未必还能得到。你们寄来的款项,很大比例被我们花掉了。另一部分用于工资,这也是(朝鲜等国)需要的。请尽量考虑我对共产党的请求^⑤的支持和整个工作的重要性。

代表^⑥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9, 第 108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文件上有批注:谁收到了这个报告? 马季亚尔同志已阅,并已向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讲述。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这个文件是在 1933 年 8 月 19 日。

③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④ 指中国共青团。

⑤ 文件没有找到。

⑥ А. 埃韦特。

15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第 327(B)号记录

(摘录)

1933 年 8 月 3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9. —(1)责成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和米夫同志,吸收王明和康生同志参加,讨论党的领导的组成问题^①,如果在委员会中没有任何不同意见,那么它的决定将看作是政治委员会的决定。

(2)批准召开党的五中全会^②,建议确定以下议程:

[1]总的政治形势。

[2]党的群众工作和国民党地区的反帝斗争。

[3]针对国民党的第六次“围剿”^③,党在苏区的任务。

(3)责成上述委员会,根据康生同志的意见,起草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④名义发出的电报,并报政治委员会批准^⑤。

责成委员会还要研究向苏区派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可能性问题。

(4)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在一个月期限内

① 指中共中央领导的结构和人员组成问题。

② 见第 281 页注⑥。

③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④ A. 埃韦特。

⑤ 文件没有找到。

向中共中央转交所有未发去的文件。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以后只起草关于中国问题的简短文件,以确保更迅速地转达。责成阿布拉莫夫、米夫和王明同志制定一些改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联络机制的措施,并提交政治委员会下次会议批准^①。

(5)在主席团(1933年)8月17日会议上将听取康生同志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55, 第 6—8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 153 号文件。

15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①

1933年8月9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②

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冯玉祥想把蒙古人民共和国拖入挑衅行动,以便给日本人提供占领张家口和转向内蒙古的借口,我们认为,在张家口,组织站到我们方面的冯玉祥部队起义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在客观上会变成不可思议的挑衅行为。请采取一切措施阻止起义。

我们建议:第一,让冯玉祥所熟悉的积极分子转入地下,如果需要的话,要离开张家口。请把他们派到中国内地去。把冯玉祥不熟悉的积极分子派到张家口去取代他们。第二,让在军队中和在张家口隐蔽较好的党的委员会留下来领导士兵、农民和工人的工作。政治委员会。

收到此电报后,请尽快确认。

① 文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3年8月9日非常会议上得到批准(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56,第4页)。在电报俄文稿上有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的批示:“立即发出并检查是否收到。”

② A. 埃韦特。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36(1933 年发文), 第 138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152

李竹声给皮亚特尼茨基和王明的电报

1933年8月11日^①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②和王明。我再重复一遍^③，我们的财政状况很危急。7月我们只收到61900法郎和2000元^④。我们不得不停止联系和把机关人员压缩到最危险的极限。光是党每月就需要不少于4.3万^⑤，青年^⑥需要1417^⑦，此外，还有工会。绝对需要给予明确的答复。

斯拉文^⑧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54(1935年收文)，第148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的日期。
 - ② H. A. 皮亚特尼茨基。
 - ③ 李竹声的前一份电报没有找到。
 - ④ 货币名称没有说明。
 - ⑤ 货币名称没有说明。
 - ⑥ 指中国共青团。
 - ⑦ 名称没有说明。
 - ⑧ 李竹声。

1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会议第 60 号记录

(摘录)

1933 年 8 月 17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139)——关于中国形势。报告人:康生。讨论参加者:瓦尔加、马季亚尔、瑟索耶夫、小芽(音)^①、库西宁(见速记记录)^②。

决定:1. ——康生同志的报告存档待查。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同东方地区书记处制订以下文件:

(1)关于[中国]形势和[共产]党的近期任务。

(2)关于党在国民党地区和在苏区的群众工作,特别是关于群众性的反帝工作。

(3)关于对阶级敌人的第六次“围剿”^③的胜利反击。给中共

① 吴克坚。

② 鉴于篇幅很大,文件没有发表。会上讨论了康生以书面形式提出的报告。参加讨论的有 E. 瓦尔加、Л. И. 马季亚尔、B. E. 瑟索耶夫、小芽(吴克坚)和 O. B. 库西宁。康生致结束语,见全宗,目录,卷宗 172a,第 5—100 页。康生的报告后改写成文章发表,见康生:《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 1933 年第 9 期,第 18—35 页;《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 1933 年第 25 期第 10—18 页。

③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①寄去材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附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执行局附注

不早于 1933 年 9 月 22 日^②于莫斯科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 60 号记录附注,第 1 点: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没有制订,只发去一份电报。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密电处保存的 1933 年 9 月 22 日发出的第 2888 号电报稿^③。

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172a,第 1—3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见第 281 页注⑧)。

② 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③ 见第 163 号文件。

15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①

1933年8月17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②。请在会议^③上贯彻以下方针：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瓜分中国，因此我们赞成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民族革命战争。瓜分中国已经开始。不仅日本、法国等在进行，而且军阀也在进行。这些军阀是日本在华北的代理人、英国在广州的代理人、美国在南京的代理人和国际联盟在上海的代理人。会议也应该表示反对这种瓜分方式。要像对待叛国的党、反对中国人民的党那样对待国民党、对待它的所有派别。如果从政治角度看有可能的话，要引导马占山和李杜将军(进行反击)，要批评他们，因为在满洲他们没有武装民众，而是解除民众的武装。绝对需要从组织上巩固会议的政治成绩。要利用欧洲代表团成员，在反帝大会上举行会见。要要求群众进行监督，组织群众抵制日货，建立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日货抵制岗哨。会议开幕前必须出版一日的报纸^④。要组织出版远东委员会(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固定的通报^⑤。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A. 埃韦特。

③ 指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代表会议(见第227页注①)。

④ 见《反战新闻》，上海1933年8月29日第1期。

⑤ 定期出版物没有找到。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36(1933 年发文), 第 144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15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中央苏区的电报^②

1933年8月18日^③于上海

致中央苏区

1. 你们最近的电报^④表明,我们在对形势的总的理解上没有分歧。但有些方面应该再强调一下,特别是现在,形势可能变得更有利一些,应该研究第二、第三阶段^⑤行动中的某些变化。

(1)击溃 19 路军左翼和粤军进攻其右翼的停止,给我们提供了把尽可能多的兵力向北调动的机会。

(2)在北面这里,敌人最强的兵力是在它的右翼赣江一带(约有 8 个师)。敌人也可能从吉安地区采取行动。在抚河以西敌军中心地区,也可以看到军队的大量集结。

因此,结论是:我们应该在敌人开始进攻之前歼灭其较薄弱的左翼。这个任务应该在 9 月中旬以前完成。那时我们才能占据有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附录 1,指 M. 施特恩报告的附录(见第 173 号文件)。归机密中国文件。И. 米夫。(1933 年)10 月 26 日。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时间是 1933 年 10 月 22 日。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可能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以前建议中分析的红军反国民党例行“围剿”的行动阶段。相应的文件没有找到。

利阵地，阻止敌人在中路和右翼的图谋。

2. 我们预先建议：

(1) 在闽西南不采取主要行动。只在武平、上杭、龙岩、长汀地区进行游击活动。像 34 师这样的正规力量将集中在后方，准备对敌军的任何行动进行快速反击。主要目的不是捍卫占领的土地，而是不断地使敌人的有生力量精疲力尽。如果在这种军事行动中，我们必须放弃连城，那我们就不再向这里投入新的力量来收复它。

(2) 关于对广东行动的战术。由游击队把敌人牵制在长汀和安远地区，而我们的 22 师将集结在我们的右翼，即信丰东北某个地方。

(3) 以汀州—会昌地区为基地的工人师，将暂时作为 34 师和 22 师的后备力量。

(4) 所有其他部队，特别是模范师，应准备加强我们北边的兵力。我们认为，8 月份向清流地区顺利推进，进而再和少共国际师一起向北推进，到 9 月中旬就会使我们拥有两个新的强大的师可以调动。这两个师将是东方军^①和中央军^②最近的后备力量。从 9 月初起，归化、清流地区的驻防任务将交由我们的一支独立部队负责。

(5) 我们考虑到，由 3 军团和 19 师组成的东方军已在北上的路上，在它的右翼有 20、21 独立师作相应的掩护，避免遭到来自沙县和延平^③的敌人的进攻。任务是在 8 月剩下的日子里与我们在兴国的力量相配合打败将乐、顺昌地区的 56 师。如果来自兴国的

① 东方军即 1933 年夏建立的兵团，包括 3 军团的主要部队和 7 军团 19 师。总指挥是彭德怀，政委是滕代远。

② 中央军团（或中央军）包括 1 军团、第 10 军和 4 个独立团。

③ 原文如此。现称南平。

力量能把顺昌守备敌军引诱出来,那就更容易把它歼灭。

20、21 独立师将继续掩护翼侧,佯攻延平并在东部其他战场展开攻势。

如果我们想赢得足够的时间在敌人发动大的攻势之前摧毁其左翼的话,上述行动最迟到 9 月初应完成。

3. 从 9 月初起,我们要完成的第二阶段的行动应该是:

(1) 东方军迅速在邵武歼灭第 4 独立旅,到 9 月中旬把所有补充力量集中在邵武、光泽、资溪地区。

(2) 20、21 独立师在光泽、顺昌、贵溪三角地带通过积极的击佯攻掩护右翼。这项任务完成后,我们认为第二阶段就结束了。

(3) 在东方军占领邵武的同时,我们中央军团要尽一切可能牵制蒋介石的中路和右翼,使他无法准备进攻。最后,第二阶段结束时,应留下一小股力量(5 军团),在永丰、吉水地区与敌人相对峙,而中央军团的所有其他部队应向抚河附近的宜黄地区转移,准备在第三阶段同东方军团一起行动。

4. 如果敌人右翼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必须改变中央军团的最初计划,我们建议对第三阶段作出如下变动:

(1) 20、21 独立师将继续向东北方向进军,推进到信江。

(2) 东方军要猛追敌第 5、第 6 师,将其击溃并毫不迟疑地经过金溪向进贤方向推进,先遣部队甚至要尽可能快地抵达进贤。

(3) 这决定东方军能否抵达金溪,为尽快歼灭敌人的左翼,1 军团要迅速向抚河以东转移,转移的时间和地点将取决于中路敌人的行动。

5. 第三阶段的下一个目标,即使在作出上述变动的情况下,也还是抚州城,但是进攻抚州的前提条件是彻底歼灭左翼敌人的有生力量。

但是现在描述进攻抚州方式的细节和由那里开展第三阶段的途径还为时过早。

不过,如果我们在9月击溃敌人的左翼,那么他们的攻势即使在中路和右翼展开,也会失去作用,势必要重新进行改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目标是,在10月份再歼灭四五个师,这要在我们的能力限度之内。

6. 当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时,我们就能在其他战线发起攻势。

我们可以从北面调来我们的大部分力量,把它们集中在西南地区进行新的冬季战役。

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拟订冬季战役前景的时候了,以便你们能够开始做准备工作,如向我们将来采取行动的地区派遣地下宣传员,在那里建立游击小组等。

冬季战役将从进攻信丰、赣州方向上的广东的左翼开始,以占领赣江左岸,加快同8军团汇合,为进军湖南和江西西部开辟道路。

这场战役需要三四万机动部队[官兵],而留下的部队将承担守住我们老地盘的任务。

鉴于要进行冬季战役,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我们应该在零都地区着手组建新的8000到1万人的部队。这些部队的训练工作要在明年初结束。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9, 第 130—131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15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中央苏区的电报^②

1933年9月2日^③于上海

致中央苏区

1. 我们赞成你们准备在赣东北采取依次进行的行动,目的是:

(1)用20、21独立师掩护东方军外侧。这些师将把敌79、55、4和21师牵制在贵溪以东,从而直接支援我们的10军团。

当20、21独立师抵达崇安、浦城地区时,它们也可以用小股部队(闽北的一个独立团)在东南方向实施佯攻,用这种方式把敌人牵制在建瓯,并尝试同政和的土匪建立联系。

(2)在顺昌和将乐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被占领之后,东方军,如上所述,在20、21独立师掩护下,要在邵武、光泽、资溪一线击退三四个师,而所有其他部队(我们的6、13和20师)向黎川以西金溪方向出击。它们的行动应在东路纵队出征几天之后开始。

无论如何占领邵武的行动不应延误这两个兵团配合完成它们

① 发报人是根据第173号文件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附录3指M. 施特恩报告附录(见第173号文件);归机密中国文件。1933年10月26日。П. 米夫。

③ 莫斯科收到文件时间是1933年10月22日。

的共同任务：歼灭敌人第 6、第 7 师。我们西面（黎川）的兵团应该挫败敌人避战的企图，渡过抚河，堵住可能从南城—南丰地区出动的敌军的去路。东路兵团的任务是：不让敌军向金溪以北推进。在黎川到资溪、金溪地区没有彻底摆脱敌人力量之前，我们的下一步行动将会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认为，这项任务应在 9 月份的三周内完成。

2. 我们还想预先提出在第三阶段^①可以采取以下行动的设计。请在军事委员会里和同相应的军队指挥员斟酌一下，是“赞成”还是“反对”，并把你们就此作出的明确决定电告我们。

(1) 我们认为，在歼灭敌第 6、第 7 师和敌人向这里调动其所其他部队并顺利清剿黎川、资溪、金溪地区之后，以及在我们把我军的活动地区扩大到东乡和进贤之后，如把敌 79、4、55、21 师牵制在东部和东北部，我们就可以转入主要战役的下一步。按我们的想法这一步是：东方军团和中央军团联合行动，进攻南城和宜黄之间的敌军，目的是：

- (2) 便于东方军团西渡抚河；
- (3) 在南城、宜黄、抚州三角地区歼灭敌有生力量；
- (4) 突破南城和宜黄之间敌设防地带的左翼；
- (5) 我军固守抚河，然后根据敌人的进攻阶段，视情况或向西北或向东南继续我们的作战行动。

3. 为此：

(1) 东方军只作出进攻抚州的姿态，这个时候准备用四五个师的兵力在浒湾和东馆（抚州和南城之间）地区渡河。目的是突然进攻宜黄方向的敌军（敌 67、11、59 师）。东方军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抚河以西，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中央军团的行动。

(2) 中央军团，为了协调行动和摆出先向乐安，后向宜黄的进

^① 指红军实施反国民党“围剿”计划的阶段。

攻姿态而向东转移后,将等待为东方军在宜黄地区渡河选定的时刻。在这里,1军团要及时摆脱敌人,中央军团留下14师和独立团后,要引诱宜黄敌人作战,同1军团一起出人意料地从南面攻打南城。

东方军和中央军团的作战行动在时间上必须准确协调好,以使它们在从相对的方向向前推进时,在实施共同任务的战役中汇合。它们的共同任务是:先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占领南城和宜黄的防御工事。如果我们不能在突然发动的攻势中拿下南城,那我们就必须在歼灭敌人在宜黄地区的有生力量之后把它拿下,因为占领南城对于我们以后的行动很重要。

(3)我们的14师和独立团将在乐安和宜黄之间(对敌97、9和43师)采取行动,它们的作战行动也要和上述行动协调一致。这些部队主要从西南方向发起攻击。

(4)这个时候向北转移的第3师,将在西面由南丰向南城推进,目的是同1军团一起行动。

(5)15师将作为预备力量留在广昌西北。

4. 无论我们能否占领南城和宜黄,我们都必须歼灭敌人在这个地区的上述师团,以便给他们的进攻造成威胁,同时始终在敌人的抚河一侧积极活动。如果敌人在这个时候发动攻势,我们的任务可能还比较容易完成,因为对敌人防区范围内有生力量的进攻,切断敌人后方同西面防区之间的联系,可以给敌人造成很大的影响,打乱他们向我地区推进的种种打算。从浒湾到南城的抚河和再向南,我军应该固守。如果我们占领这个阵地,一旦需要时我们就能在任何方向采取行动。我们掌握南城周围的地区,北到浒湾,南到南丰,西至宜黄和乐安,我们就不必担心在我们后方的河流。

有两个问题需要预先作出回答:

(1)在一年的这个时候从技术上能不能渡过抚河;

(2)我们实施佯攻和掩护的部队能否不放过可能从抚州方向

出现的军舰。

当然,准备工作应该在(游击队等)行动开始前很久就进行。行动本身应该是突然发起的。

5. 为了阻止敌人做准备工作,你们应该交给我们 16 军团一项特殊的任务:从西北方向骚扰南昌地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59,第 128—129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没有签字。

157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9月7日^①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②。[1933年]9月1日的报告。我们在福建的作战行动可以认为结束了。顺昌和将乐已被包围,它们的攻克几乎是注定了。我们在从邵武向东北方向挺进,进入蒋介石军队的翼侧。在延平缴获4艘轮船、大量的盐和一些步枪。我们的地方武装控制着福建从连城到顺昌的地区。

待续^③。(库尔特)^④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54(1933 年收文), 第 126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
-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电报的日期。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③ 续电没有找到。
④ Н. Н. 格伯特。

15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非常会议第 333(B)号记录

(摘录)

1933 年 9 月 9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30.(5169).—中共中央关于科穆纳尔^①同志前往苏联的电报^②。

决定:30.—答复:如果身体状况允许他完成这样的旅行,我们不反对他来这里^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60,第 6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王稼祥。

② 指 1933 年 9 月 5 日从上海发出的电报(莫斯科 9 月 7 日收到),电报中询问是否同意受重伤的王稼祥去莫斯科治疗(见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158 页)。

③ 同日,即 1933 年 9 月 9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李竹声发电报,说“同意科穆纳尔来这里,如果他的身体状况允许他进行这样长途旅行的话”(见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158 页)。

15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中央苏区的电报^②

1933年9月12日^③于上海

1. 要知道,我们还有两周时间用来结束福建、赣东北地区的作战行动。为了守住已在福建占领的土地,最好在闽浙边区建立以崇安、浦城、松溪地区为主要基地的广阔的游击区。在这里,游击队的任务将是:

(1)阻止福建军队向西北的任何推进;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从上述基地威胁建瓯、屏南、古田地区。

(2)援助我们的第10军团,牵制敌4、55和79师的行动,同时阻止它们向西推进。

建立这个游击基地的工作要迅速进行,以便把敌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福建,晚些时候当我军在抚河上采取行动时,要把敌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浙江。占领邵武之后,第1独立师应推进到那里,开始实施建立游击基地的任务,同时还要使政和的土匪适用于实现我们的目的,要建立地方武装,等等。

(3)为了保卫连城、永安、延平以西的地区,可能光有34师和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附录7指M. 施特恩报告附录(见第173号文件),归机密中国文件。1933年10月26日。И. 米夫。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时间是1933年10月22日。

地方武装是不够的。因此应给工人师的一些部队提出保卫大石溪左岸地区的任务。

2. 至今敌人还不清楚我们主力部队的真实意图。我们将继续采用上面提出的措施隐瞒我们的意图。同时我们向西北运动还会造成这样的印象：我们的目标是南昌。我们要想方设法使我们的先头部队尽快抵达东乡、进贤地区。这个行动本身完全可以阻止敌人的进攻，或敌人已开始进攻可暂时加以阻止。如果我们能适时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取得我们所能争取到的所有优势，以便于我们的主力部队在南城、宜黄周围完成艰巨的任务。

3. 下面就针对蒋介石的进攻应采取的措施和战术谈几点建议。

(1) 在我们的几份电报中已就如何从技术上和战术上防敌空袭^①给你们提出了建议。现在谈谈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

[1] 应向城市居民充分说明空袭的危险性，同时要避免夸大。夜间空袭不大可能。要在开阔的地方、在附近的山坡上找隐蔽所，这是对付炸弹、燃烧弹或毒气弹危险的最好办法。预警系统、消防队、不拥挤的独立分散的隐蔽所等，要准备好并就地地进行试用。食品要分散保存在安全的地方，远离有发生火灾危险的建筑物。

[2] 机关人员应安排到靠近中心城市的小村庄去，或者城郊不引起怀疑的地方。学校应安排放假。

[3] 内部县的武装力量要驻扎在大居民点式的营房里，并要特别强调进行露天分散训练。这一点特别涉及到军校^②，它将在瑞金、会昌、雩都地区开始进行分散演练，它的人员将作为我们南部部队的预备队。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可能指红军中央军政学校和中央苏区其他城市的高级军事干部学校。

[4]我们的地方防空部队要经常变换阵地,要在山顶上和沿着通向我们中心的河流、谷地进行伪装。机枪、火枪,甚至老式枪筒,在这里可能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5]至于我们的作战部队,要向前线的每一个战士详细说明隐蔽的一般规则,要利用周围环境,避免集中在一处,等等。对付毒气弹轰炸的最好办法,是进攻敌人后方力量,进行肉搏战,更换宿营地等等。要实行严格的纪律,把张皇失措消灭在萌芽中。

4. 敌人打算广泛利用兰衣社人员^①,这些人穿便衣,带着特殊任务试图向我们内部地区渗透。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需要城乡劳动群众同地方当局进行合作。这就是说:

(1)要把这种情况和每个人有责任不向村里的陌生人提供信息,不隐藏这种陌生人等告诉村民;

(2)要建立少年先锋队巡逻小组协助地方当局,逮捕可疑分子,等等。

5. 在前线地带的农村里,应加强地方武装。

6. 据现有情报,敌人准备在进攻时使用以下战术:进攻部队的第1梯队将由不小于营的团组和支队组成,许多穿便衣的兰衣社人员将被编入第1梯队的支队,在分组推进后执行自己的任务。这些支队的任务将是确定我军位置,引诱我军作战。与此同时,还会有更大的兵团从后方出现,像钳子似的从两翼绕过第1梯队发起攻势,试图出现在我们部队的两翼和后方,以便把它们击溃。

知道了这个战术,我们就应采取相应的行动方案:

(1)在敌人队伍中穿便衣的,应该是我们专门的神枪手射击的目标。

^① 见第255页注⑤。

(2)但是,我们应该让敌第1梯队部队向前推进几里^①。在这个时我们将迅速在两翼运动,以便出人意料地迎击敌主力部队。在先歼灭敌第2梯队之后,再以小股部队击溃其第1梯队,而我们的其他师团,或者追击敌人,或者从翼侧包抄,渗透到敌人的后方,或者如果敌人在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就投入新的兵力,重新占据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战场两翼的隐蔽阵地,以便切断敌军在主战场上的进攻路线。

(3)敌人把第1梯队和第2梯队的战斗只看做是初步行动。他们的第三梯队即最强大的梯队,将在经过夜行军之后的次日早晨开始行动。由此可见,敌人正确地估计到,他们的第1、第2梯队部队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在第一天的行动中也消耗自己的力量。在我们处理战俘、战利品和由于打胜仗而丧失警惕的时候,敌人的第3梯队,即最强大的梯队,要在第二天的战斗中把我们的战绩化为乌有。

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的兵力不多于一两个师,并且在第一天全部投入了同敌第1、第2梯队的战斗,那么当天夜里就应该摆脱敌军,向新的战场运动,我们可以从那里出色地打乱敌人第二天的计划。敌人将不得不重新开始派遣新的侦察队伍和火力校正队伍(第1、第2梯队)。如果敌人不这样做,那么他们的第3梯队就会陷入我们的圈套。

7. 上述战术意见,只适用于我们决定留下来主要进行防御的地段。它们不能完全运用于我们要集中力量进行我们自己拟订的决战的地段。后一种情况将完全由前线指挥官来决定。

在福建取得一些胜利之后,我们将对第三阶段所面临的事态充满信心。我们将通过适时进攻敌人的左翼然后进攻其中路的战术来粉碎敌人的攻势。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而付出的代价是,我们

^① 见第209页注①。

要允许敌人的右翼和其中路部队向我们的领地推进,那我们将准备这样做。在延缓和阻扰敌人向赣江推进之后,我们就能确保在抚河上的胜利,晚些时候,这次胜利还会发展成在赣江上的胜利。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59,第 135—137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16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334(A)号记录

(摘录)

1933 年 9 月 15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34(5204)——中共请求组织运动制止对苏区的战争的电报^①。

决定:34——责成贝拉·库恩同志开展广泛的运动。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和中国同志给贝拉·库恩提供必要的材料。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通知中共中央,它的建议被采纳,近期将开展运动^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61,第 1.5a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 162 号文件。

16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334(B)号记录

(摘录)

1933 年 9 月 15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36(520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给中共五中全会的指示草案^①。

决定:36——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把指示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立即发给[中共]中央^②。军事部分先给专门研究军事问题的一些同志看看,然后发给[中共]中央,并指出,这不是指示,而只是建议,最后决定应由[中共]中央自己作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61,第 8—10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 281 页注⑧。

② 见第 163 号文件。

162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3年9月19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中共]中央。根据中央苏维埃政府的请求^①，我们在开展反对美日英干涉苏维埃中国、反对瓜分中国的运动。请不断寄给我们材料。请向苏联政府通报。

王明、鲍斯^②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163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指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3 年 9 月 6 日发表的呼吁书，见《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 1933 年第 28 期，第 22—24 页。

② 康生。

16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3年9月22日^①于莫斯科

绝密

致上海代表^②

为不使全会^③负担过重,请只讨论以下问题:1. 总的政治形势;2. 反第六次“围剿”^④的任务;3. 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请作出简短通俗的决议。以前关于军事战略、经济政策和工会政策问题的电报仍然有效^⑤。

要在反帝团体里建立无产阶级骨干力量,在企业里开展群众工作,在作战行动中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要揭露广州人通过反日蛊惑宣传掩盖其为英国人效劳的行径。

在满洲,无论如何要把铁路工人、运输工人组织起来,要在奉天、大连、抚顺、鞍山、哈尔滨的大型企业里和军事建筑工地上建立革命工会。

在国民党统治区,尽管在上海和在北方取得了部分成绩,但工会工作还是最薄弱的方面。在黄色工会中,决议多,工作少。在赤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确定的。

② A. 埃韦特。

③ 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见第281页注⑧)。

④ 指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⑤ 见第112号文件。

色工会中,会员比党内的党员还少。要提出这样的口号:谁不在工会中工作,谁就不是革命者。责成每个党组织制订出具体的工会工作计划,并对完成情况经常组织检查。要对准备和举行罢工以及掌握自发行动的不足之处进行具体的批评。苏区的工会组织应该吸收每个工人参加,并克服实践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错误。

在闹饥荒地区,要提出建立夺取储备、分配救济委员会的口号。

在汉口、广州,要重建党的组织,实行进一步的教育,提拔工人干部。需要有充满活力的、有首创精神的、干练的、具体的领导。需要同主要的右的危险和“左”的倾向作斗争,不仅在提法上,而且在实际的事情中,在工作中。政治委员会。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171 页。

打字稿,原件。

164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①的电报

1933年9月23日^②于中央苏区

绝密

1. [9月]18日,我军在青山附近打败了龙城(音)旅唐^③的几个团,缴获400多步枪、8门重型火炮、13门阵地炮和600箱子弹。

由于与驻扎在沙县的34师相邻的我13师,在宁洋和永苏(音)之间采取行动,福建的敌人惊恐万状。

因此他们提出了我们在最近的电报中通报给你们的那些建议^④。

2. 蒋介石下令他的5、6、95和24师(总共15个团)或按另一些材料说,他的3、6、79和97师集结在南城和水馆(音)地区,准备向建宁推进。我们的部队现在试图借助地下爆破破坏顺昌城墙并准备武力夺取将乐;在顺昌和在将乐都有很多粮食。两天前,刘和鼎命令他的部队出城,但恰恰在这时他接到了蒋介石关于派遣增援部队的电报。因此他取消自己的命令,并像以前一样进行防御。占领顺昌和将乐后,我们将向东前进,迎击蒋介石军队。

① 收报者是根据内容确定的。文件上有批注:附录5指M. 施特恩报告的附录(见第173号文件),归机密中国文件。II. 米夫。(1933年)10月26日。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3年10月22日。

③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④ 指19路军领导关于同红军领导签订停战和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协议。文件没有找到。

3. 我们的 1 军团还在永丰和吉水之间活动。

波戈[列洛夫]^①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9, 第 1266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① 秦邦宪。

16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中央苏区的电报^②

1933年9月23日^③于上海

致中央苏区

1. 试图在包围三天之后占领顺昌的想法受挫,其意义比一般的攻击失利更大。意义在于,有围墙的城市,即使只有一个团或一个旅守卫,也还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很大障碍。顺昌的抵抗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的突然发动和迅速推进的战术失去了作用,而这些行动是我们制胜的主要因素。顺昌的这次抵抗对于19路军和邵武、金溪等地的守备部队也有一定的心理上的影响。

2. 我们应该吸取教训:(1)要尽快占领顺昌和将乐,并给予蔡廷锴61师和补充部队以打击,然后向延平西北发起攻势。(2)这个时候不要使用东方军主要力量解决其他重大任务;这就是说,在我们未拿下顺昌和将乐之前不要进攻邵武。当然,这并不排除在邵武周围进行战役的准备,因为这些战役是孤立邵武守备部队,切断它同外界的联系和阻止它得到增援和供给所必需的。(3)在游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附录六指M. 施特恩报告的附录(见第173号文件),归机密中国文件。П. 米夫。(1933年)10月26日。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3年10月22日。

击战术上要表现出更多的想象力,可以把敌人部队引诱到没有堡垒防卫的空间,并以突袭方式将其歼灭之。

3. 我们在上一份电报^①中建议用崇安地区的游击行动掩护右翼,这对于以后牵制福建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4. 少共国际师和模范师应该从南部转移到北部广昌和建宁之间的某个地区,作为重新部署的第一步。

5. 34师不要参与永安地区大的行动,它只限于保卫我们的领地。只有游击部队应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性。

6. 我们在南部武平方向的部队也应坚持这样的战术。如果有必要采取行动,防止粤军可能向前推进的话,那么最适当的做法是从雩都朝信丰方向采取行动。在雩都地区建立新的预备队很重要。

7. 以后几个月,应该作出最大的努力,在与我们领地相邻的地区千方百计发展游击战术,以便在我们保持各兵团力量不受触及和准备采取大规模联合行动时,利用突袭优势干扰和延缓敌人的行动。

因此,莫斯科文^②关于允许中央军团在西部活动一段时间的意见是对的,何况东方军团在其部队抵达金溪之前还要完成很大的任务。但是这里也有危险:如果敌人从北面来,也就是说,如果敌人能在我们两个军团之间加很深的楔子,那就会阻碍中央军团快速向东推进,与东方军团采取联合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答复是:向东进军不要太早,但也不要太晚。

同时,两军在它们相应方向上的行动应该是很积极的。

8. 据现有情报,从南京来的87师已抵达南昌。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9, 第 127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见第 159 号文件。

② 周恩来。

166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的电报^①

1933年9月26日^②于中央苏区 绝密 特急

1. 9月24日,蒋介石命令集结在湾山(音)的4个师开始向黎川推进;它们应该在26日抵达黎川。

2. 他命令现驻扎在崇仁的14、54师立即开始向南城推进。

3. 刘和鼎部1个团已到达顺昌东北的邓首(音),属19路军的毛维寿和陈^③的师团,约11个团,已到达沙县并在向西芹和青州推进,唐^④的师团,约有5个团,在经宁江(音)、兆古(音)向同一方向进军^⑤。我们军事委员会给中央军团发去新的命令。此命令我们将单独电告你们^⑥。请尽快答复。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在文件上有批注:附录8指M. 施特恩报告的附录(见第173号文件),归机密中国文件。И. 米夫。(1933年)10月26日。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3年10月22日。

③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④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⑤ 下面有一句话意思不清,因为文件中这句话的结尾未破译出来。

⑥ 同日,即1933年9月26日,由秦邦宪签发了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说明了上述命令,命令中鉴于敌人行动的变化,给中央军团提出了新的任务:立即结束在它活动地区的战役并重新进行部署以打击向黎川推进的敌军(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759,第138页)。

波戈[列洛夫]^①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9, 第 138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① 秦邦宪。

16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3年9月27日于上海

1. 同19路军的谈判应尽快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结束,特别是在与签订停战协定有关的军事问题上。鉴于(19路军)部队集中在沙县,而在北面的决定性事件在迫近,我们不能丧失时机。目前19路军没有能力发动攻势。过了一定期限,在改编结束之后,如果我们还没有在反蒋斗争中取得成绩的话,19路军就可能对我们构成威胁。同时我们不能由于19路军的集中而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另一方面,现在同这支军队作战,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也不会比我们在北部可能蒙受的损失多。

2. 始终存在着19路军不执行停战条件的很大可能性。无论他们诚实与否,但他们一直在寻求好处。现在他们力求做到以下几点:(1)在同我们的斗争中争取喘息机会;(2)改编和训练自己的军队;(3)如果我们处境恶化,他们将全力反对我们。但是,如果总的形势将对我们有利的,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执行停战条件。

3. 因此我们应该争取得到最多的东西,要迅速做到这一点,不要成为无休止许诺的牺牲品。

我们应该以反建议答复19路军提出的关于让我军撤出一定

^① 发报人和收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地区的建议：如果他们把粤军撤出福建，我们愿意讨论这个建议。粤军在福建的逗留迫使我们留在目前的阵地上，只有在粤军撤出福建之后，我们才能着手撤出自己的军队。

我们可以在以下条件下就临时边界问题进行讨价还价：

(1)19路军集中在连城、永定地区，不会遇到来自我方的障碍；(2)我们将严格遵守连城、永安、大石溪、开口、浦城一线南北20至25公里宽的非军事区的规定，条件是对方也应遵守这个规定；(3)我们可以允许19路军1个师留在沙县，但是福建省或其他省的任何其他军队不得进入这个地区。我们保留对在这些地区的军队(19路军除外)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4)我们准备同19路军积极合作，同日本人、陈济棠和蒋介石作斗争，而在19路军最近的行动方面，应转向浙江地区。

4. 如果19路军确实认真地提出了建议，那么在這些建议之后就應該有行动。这样，保密问题^①本身就会迎刃而解。我们从自己方面许诺在谈判时绝对保守秘密，并要求谈判结束时马上就有行动。我们给19路军作出决定的期限到10月5日。

5. 关于事情的政治方面，我们不必太担心。我们要强调你们列举的所有条件，但不把它们作为签订停战协定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争取到释放俘虏和停止封锁，对于开始来说，这就足够了。如果我们为群众争取到成立组织等权利，那就更好。所有其余的东西，我们应该自己去争取，要在他们的地区组织自己的工作，包括在他们后方组织游击队，从而双重保险自己不会被出卖。

你们不是始终都能同我们交换电报。但我们不怀疑，在进行这种重要的和艰难的谈判时，你们会表现出智慧、灵活性和能力。如果我们的工作进行得正确，那我们将拟订出把19路军战士争取

^① 这里说的是，19路军代表建议为该军同中国红军领导的协议保守秘密。

到自己方面来的办法。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01, 第 4—6 页。

打字稿, 副本。

16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3年9月29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中共中央，抄送代表^②

我们一再强调，我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指示，如何决定由[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想法供你们决定。

至于中央苏区，我们认为，你们干扰敌军在赣江和抚河之间集结的计划是正确的，而对19路军的战役是很完美的^③。对战役的任何领导都应该是如此严格集中的领导，以使8军团和16军团的作战行动针对敌人的交通线。我们认为，粤军和南京军队联合进攻时，8军团应该在粤军后方活动。蒋介石由北向南进攻中央苏区时，16军团要在九江至南昌的铁路线上活动，这样能够破坏敌人后方的工作，吸引敌人的预备部队。10军团不应向南推进，一旦南京人采取积极行动，要全力向抚州运动。中央苏区的主力不应参与阵地战，它们应该进行运动战，从两翼实行夹击。中央苏区要有预备力量，以对付任何突然袭击。考虑到蒋介石后方防御薄弱，你们必须把自己的行动与红军部队的行动结合起来，尽可能广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A. 埃韦特。

③ 指1933年八九月间所谓由中央苏区红军中选出的东方军向闽西的挺进。

泛地开展积极的游击运动,组织破坏活动,破坏敌人后方工作,干扰敌人有步骤地准备实施打击和其前线部队实行佯攻。这些任务可以通过在南昌至九江铁路地区 and 抚州地区建立由当地怀有不满情绪的居民阶层组成的小股游击队(100到200人)来完成,而无论如何不能依靠红军正规部队来完成,因为他们(在兵营里、在火车上、在铁路机车车库里和在火车站上)采取更广范围的果断行动,会引起蒋介石指挥部的特别注意。

破坏活动、铁路工人的怠工和在居民中进行的广泛宣传工作,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游击队在行动中取得胜利,打乱敌人后方的正常工作,从而便于中国红军完成主要作战任务。

要组织侦察活动,使敌人每个师都处在我们的经常监视之下,而任何一个兵团的推进都不出乎我们指挥部的意料。至于瓦解敌军的工作,务必要渗透到蒋介石的技术部队中去和同红军作战的有技术装备的部队中去。在四川,不要停止作战行动,要在自流井工人当中广泛开展工作,目的是发动武装起义。为此要利用已建立抗税军的农民的不满情绪,这将有助于你们在协调贺龙军队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军队行动的情况下,集中打击成都。贺龙要纠正他在他的地区对方针的曲解,要巩固他的地区,同时也应该帮助扩大四川苏区。在中央苏区建立突击师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个经验也要推广到其他军,特别是第4军。在西北,可以由26军团和在我们影响之下的冯玉祥部队组成新的军团。借助这个军团可以建立新的地区,或者同老的苏区合在一起,条件是不违背我们关于张家口问题的指示,遵照我们8月19日^①第142、143号电报行事。

如果可能的话,要在安徽和河南加强作战行动,以诱使蒋介石的部队离开江西。

^① 原文如此。应为:8月9日。见第151号文件。

必须对每个党组织提出这样的任务：要在白军中，特别是在蒋介石军队中，有步骤地做工作。

要做好一切准备反空袭，至少要使用一些机枪来反击，还要反化学袭击，哪怕用原始的防毒办法也好。要从坚定的党员中、同情我们的最可靠的工人和失业人员中挑选一些人，渗透到蒋介石的（空军、坦克、炮兵）部队中去，组织暗中破坏和鼓动官兵转到红军方面来。必须派一些同志到新疆军队中去做工作。

在满洲、热河和察哈尔的游击战争中，继地主资产阶级军阀领导遭到失败^①之后，出现了新的形势。要讲清楚，军阀的失败是由于拒绝武装群众，特别是武装工人和农民和不想派他们参加游击队造成的，以便通过[在群众中]灵活大胆地做工作来争得我们的领导权。在注意到农民中已发生分化的同时，必须坚决地提出建立农民委员会、农民纠察队的问题，在城市里建立反日行动委员会，惩办卖国贼，积极抵制和破坏满洲国当局和日本人对工人和农民所采取的措施，群众拒绝交税、还债和交地租的问题，在游击队占领的地方建立经选举产生的民事和民众机构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通化至吉林铁路以南和在奉天、吉林两省^②交界处开展游击战是有益的。

请确认此电是否收到和译出。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177—182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指冯玉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失败。

② 原文如此。指辽宁和吉林两省。

16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中央苏区的电报^②

1933年9月29日^③于莫斯科

致中央苏区

1. 军事委员会采取的措施^④完全符合业已出现的危急形势。其他的建议和批评现在看来都不合时宜。因此作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的出发点,我们考虑的是10月2日之前可能出现的形势,这与我们部队完成军事委员会命令的情况和敌人的行动有关系,是可以预见到的。

2. 我们应该明确承认的第一点是,我们不得不在这个时候放弃最初拟订的长远计划,以消除因蒋介石采取的第一步行动而出现的直接危险。

东方军主力部队自愿后撤,这意味着失去了在福建的主动权。这次行动的突然性包含着危险。我们的行动基地在泰宁、建宁地区。该地区虽然整个战略地位很好,但在它的翼侧和后方还是有一些不利方面。(56师在邓首<音>、顺昌和将乐,19路军在将乐以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在文件上有批注:附录9指M. 施特恩报告的附录(见第173号文件),归机密中国文件。(1933年)10月26日。И. 米夫。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3年10月22日。

④ 见第504页注⑥。

南)。邵武也会很快成为敌人来自赣东北的补充力量的基地。

其次，从10月初起，我们进入战略防御阶段，这个阶段可能持续四五个月，直至我们恢复行动主动权。即使我们顺利和及时地抵达资溪、金溪地区，我们在进入这个新的持久防御阶段时的基本条件也不会是很有利的。在顺昌附近的耽搁是其主要原因。

3.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得出：

(1)军事委员会命令中规定的新措施，应该在最短时间内在黎川以北地区带来决定性的胜利。否则来自邵武、邓首(音)、顺昌等地的危险就会增大。这就是说，需要严格节省时间和减少转移。如果转移了，这应该是寻求最短时间的战斗，否则转移就是不合理的。顺昌的教训说明，现在必须避免包围有围墙城市中的有生力量。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行动应该旨在，在敌人尚未到达目的地之前拦击他们的部队(他们的目的地基本上都是有围城的城市)。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指即将在黎川周围进行的战斗。如果我们能在很短时间内在黎川战斗变成很大的胜利，那么蒋介石以后的行动就会更加谨慎。这之后我们可以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推迟和避免战争，以赢得时间进行持久防御。

(2)为了消除东方军新基地周围地区的不利方面，我们应该尝试尽可能用我们61团和独立部队的兵力击溃在邓首(音)的56师的部队。

如果对顺昌和将乐的包围已经解除，那还应该切断它们的守备部队同邵武和延平的联系，使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如果敌人无法给它们运送弹药和给养，早些时候在这里就有可能歼灭它们。

(3)我们20师的工作很重要。它应该尝试进一步向北推进，开始时要避免同敌军发生战斗。它还应该同我们在贵溪的一个营和在东北的其他部队建立更密切的相互配合行动。

(4)我们越是向北和向东扩大我们的基地，主要基地的防卫就

越容易。因此,崇安、松溪地区的游击部队要同我们 10、11 军团的作战行动联合起来,这是为牵制可能在一两个星期内到达邵武的敌人两三个师,我们应该做的最起码的事情。我们甚至还冒险地建议你们,派出能够经过金溪地区潜入东乡地区的游击队,从这个方向干扰敌人。所有这些行动,都是让敌部队离开主要基地。主力部队进行防御,若没有所建议的游击行动配合,那注定是错误的。

(5)东方军在迅速完成力量集中之后,为了作战应该沿着福建省边界向黎川以北推进。如果能够按时进入资溪地区,再从这个地区转向西和西北,那就会对作战更加有利。

(6)鉴于争夺黎川的战斗不能推迟,新命令中对中央军团的作战部署是正确的。不然,当敌人从乐安、宜黄地区开始向前推进时,它的位置可能很容易受到打击。在黎川受到的威胁未解除之前,中央军团应该坚决掩护南城以南和南丰以北的抚河扇形地区。

(7)在吉水和宁都之间山脉的南坡上,要构筑两侧有火力点的防御工事。动员在军队领导下的几营工人,这很重要。还未能作为战斗力量加以利用的新作战预备队,应该继续在上述山脉地区进行训练。不要放弃用最简单的武器武装它们。

(8)训练和组建工作已接近完成的所有其他预备力量,应该集中在广昌地区。我们能够从南面和西南抽出的所有力量都要派到这个地区,以造就新军队的骨干。

4. 对 19 路军的策略应该是:

(1)把游击队放在它的后方。

(2)通过进行初步的非正式的谈判利用各种手段迷惑它,同时作出努力从内部瓦解它。

(3)要表示出不同它的部队作战的愿望,并在它最近归还的土地上自由确定边界,如果说这是为它的和解付出的代价的话。

现在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它作战。拿像样的力量去对付它,

无谓地阻止它向前推进,这意味着我们白白地浪费力量。最好让他们推进到明确划定的地点。我们可以暂时放弃这支军队,而不是试图以某个地方还急需的不相等的费用和力量来阻止这支军队。我们应该推迟同 19 路军算账的时间。

5. 对广东:要在极其严格地节省力量的情况下坚决地进行防御,并要派游击队到他们的后方去。

6. 请把对东方军团和中央军团作战力量的基本统计材料、对广东即将集中的力量和南部力量的基本统计材料,以及每个军团中一支步枪的平均弹药数量电告我们。

请向我们通报变化情况。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9, 第 139—140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170

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国民革命军 第 19 路军司令部的建议给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报告^①

1933 年 9 月^②于上海

19 路军的建议(1933 年 9 月)^③(编译自中文)

I. 阐述李济深和陈铭枢将军的具体建议的材料,是由他们的主要代表朱(小北)先生送到我们这里来的:

“1. 我们承诺接受共产党的所有建议。

2. 我们的建议包含在(今年)2 月前我们所通过的政治纲领中,因此我们可以说,不只是现在[而是很早以前]我们就想实施我们的建议。

我们知道,我们的政治立场,不仅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不接受,而且连桂军也不接受。但我们相信,只有革命的共产党支持我们。因此我们向共产党派遣了代表,以便签署双方之间的协议。我们希望,这两个革命组织能成为统一的革命力量。我们方面将不动摇地接受共产党的建议,此外,我们绝对不是消极地接受。对于我们来说有两点考虑:一是我们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二是我们想实现我们的政治目标(政治纲领附上)。

① 文件起草者和收件者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 1933 年 10 月 22 日。

③ 文件上有批注:归机密中国文件。П. 米夫。(1933 年)10 月 26 日。

3. 现在共产党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作为初步条件。我们真诚地赞成革命,因此我们首先要在实践中实行我们的政治纲领。然后请共产党派代表到福州来讨论具体问题。

4. 为了实行我们的政策,必须做好对付南京政府的战备工作。然后我们在福建建立政府。我们将宣布建立新的政府。我们将废除现在的国徽和国旗。

这样一来,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回答我们以下两个问题:

(1)在我们发表声明之后,共产党是否派代表到福州来进行具体的谈判?

(2)共产党对我们的政治纲领有什么想法?

5. 不久前在闽西和闽北一些县发生的令人伤心的事件(指红军的进攻——译者^①),促使 19 路军公开声明如下:

(1)19 路军从来不想占领汀州,这不仅是因为它不想对苏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而且也是因为从军事角度看这样做是不明智的。19 路军还没有愚蠢到为给陈济棠将军把守广东大门而去占领汀州的地步。

(2)虽然在闽西和闽北发生了令人伤心的事件(这是真实情况),但是 19 路军真诚地希望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并且不将对红军采取任何大的进攻行动。

闽北,这是 19 路军进攻南京军队的主要通道。(在这方面)延平县对它来说很重要。因此 19 路军必须得到红军的理解和取得红军在备战反击蒋介石进攻方面的帮助。否则这不仅会造成共产党的误会,而且会使事态发展进程复杂化。要知道,正是为了备战反击蒋介石的进攻,19 路军才希望得到在闽北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附言:我们希望,我们能知道对上述问题的决定结果。在福州

^①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和在香港,人们都知道,南京已把第2、第5和第9师派到闽赣浙交界地带。此外,南京的舰队同时也被派到[福建水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错过时机,南京就会在备战方面取得优势。而这将阻碍我们革命运动的发展。

II. 关于建立新政府的声明[目的是:]

1. 说明中国社会是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的‘半封建社会’。说明,对于中国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2. 说明中国的苦难和黑暗是由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和宋子文造成的。

3. 说明蒋[介石]和宋[子文]的错误。

4. 说明中国的唯一出路是进行反帝反蒋斗争。此外,国民党已经死亡。

5. 说明[中国的]反帝运动应该同国际反帝运动联合起来。

6. 说明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危险和对中国[实行]国际监督的危险。说明建立我们政府的必要性。

7. 公布我们政府的最低纲领。

8. 宣布我们政府准备同任何反帝力量签订协议。

9. 宣布我们政府希望同任何革命政府(如外蒙古政府和瑞金苏维埃政府)和苏联[政府]进行合作。

10. 说明所有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凡不愿当帝国主义忠实奴隶的人都应站出来支持我们的政府。

III. 最低政治纲领

1.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用平等的条约取代不平等的条约。

2. 外国公司的所有财产、外国资本和外国文化团体的财产可能被没收,它们的行动,如果违背我国人民利益的话,可能受到限制。

3. 新老外国贷款将分为两类。一类贷款将完全不再偿还,而另一类将视情况并在合理的数额内给以偿还。偿还导致国家崩溃

的政治贷款，那是不负责任的。

4. 对年度收入[实行]自我监督^①。

5. 对出口贸易[实行]监督。

6. 废除国民党专政和[现]政府的统治。凡在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反革命分子支持下生存的人都不应享有政治权利和宪法赋予的权利。

7. 承认国民有自决的自由，以使他们能够在国内自由地进行合作和联合。

8. 维护公民的生存、信仰自由、言论、集会、游行、结社、出版等权利，释放政治犯。

9. 实行普选制。

10. 取消残酷的和非法的捐税。

11. 立即将可耕地转给农民，以期逐步将土地转为国家所有。

12. 银行、交通工具和一些重要工业部门应由国家控制。

13. 国家资本应用于资助发展农业。农业应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

14. 生活必需品应由国家在大家都能买得起的市场上出售，此外，我们应该揭露不诚实的商贩。

15. 严厉谴责放高利贷行为。

16. 应起草劳动法。必须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劳动者组织应受到政府的绝对保护，政府应帮助它们发展。

17. 必须着手实行普及教育。

18. 必须立即颁布组织义勇军的规定。应把群众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政府应帮助开展反帝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

※

※

^① 原文如此。可能指提出收入报告。

我们的“联络员”^①指出：

(我们的)代表请求紧急答复以下问题：

1. 你们如何评价我们宣布的政治纲领？它是否正确？它是否也坚持了中国苏维埃政府纲领的精神？

2. 他们请求红军，在 19 路军为了准备同蒋介石作战，开始把力量集中在延平地区时，撤出延平。

3. 我们希望，在 19 路军[同蒋介石]开战不久，中共将派来代表来讨论同 19 路军联合作战的具体协议。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01，第 1—3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文件预先告知有以下内容的介绍信

1933 年 9 月 11 日于香港

尊敬的先生：

下面署名人有幸通知您，张文勋(音)即朱小北[朱蕴山]、梅龚彬、彭尧雨(音)[彭泽湘]先生是我们进行谈判的全权代表。望您能同他们讨论涉及协议的任何问题。如能友善相待，将不胜感激之至。

您忠实的(签名)李济深
陈铭枢

^① 胡爱公(音)。

171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8号报告

1933年10月1日^①于上海

绝密

驻上海代表^②发来的第8号报告 致米哈伊尔^③

随这次邮班给你们寄去关于军事形势的报告^④和几份文件^⑤。请注意19路军采取的措施以及我们在8月初下达的关于准备起义的指示^⑥(从对张家口以前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的评价角度看,这些指示是不寻常的,但在那个时候根据收到的指示把它们取消了)。

1. 在一般政治方面,对最近一次报告^⑦没有多少东西可补充的。国民党向日本全面投降的倾向在加强,恐怕不能怀疑,在最近的将来,日本不仅要在北方采取进一步的步骤,而且还试图使南京在表面上依附于它。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3年10月22日。在文件的俄文译稿上有批注:2份,归机密中国文件。1份送别尔津,1份送洛佐夫斯基。1933年10月25日,П.米夫。(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759,第141—147页)

② A.埃韦特。

③ И. А.皮亚特尼茨基。

④ 见第173号文件。

⑤ 见第155、159、164、165、167、169、170号文件。

⑥ 见第151号文件。

⑦ 见第148号文件。

至今国民党集团得以把内部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南京向广州作出了让步,如果广州保证积极参加即将对红军的讨伐,南京同意把国民党代表大会^①延期到1934年召开,并答应提供从美国获得的一部分贷款^②。当然,说联合那是错误的,但有可能,在财政上遇到很大困难的广州,为换取财政援助,不得不作出暂时的让步,这会造成彼此协商一致全面谅解的印象,并会大大加重江西苏区的困难。

目前,只有在我们同蒋介石的斗争取得一些重大胜利的情况下,它们的矛盾才会迅速暴露出来。

2. 即将到来的军事进攻。对它的评估,你们将会在军事报告中看到。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央苏区最艰难的时期还在后面。敌人的军事实力是很强大的,他们同我们作斗争的经验大大丰富了。并且在其他地区,对于敌人来说,出现了比较平静的局面,于是他们决定先整顿江西,而不考虑在另一些地区对他们不利的形势。在敌人初期进行强大攻势的情况下,可能要丧失土地,而且即使是暂时丧失土地,也始终意味着摧毁农村、毁灭收成、带走未被消灭的老百姓,等等。何况敌人还控制着河流和重要交通干线,这给诱敌深入造成了困难。

如果说我们置所有这一切于不顾,不陷入悲观主义,那首先是因为我们中央苏区有相当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政治工作;是因为我们不仅从质量上而且从数量上大大加强了党和军队;今天,除了我们同志在军事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外,还作了比以前多得多的军事斗争任务的协调工作,并协同完成了作战任务。

3. 同蔡廷锴(福建19路军)的谈判。既然从寄来的文件^③中

① 指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见第255页注⑥)。

② 1933年美国向南京政府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用于购买棉花和小麦。

③ 见第167、169、173号文件。

可以看出谈判的方针,那我们就只谈几点意见了。不久前,你们已预先告诫我们不要同蔡[廷锴]联系。现在我们关心的是:

我们击溃了 19 路军很大一部分部队,并深入到福建腹地,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为了更做好迎接蒋介石进攻的准备。在最近几个月,我们不打算继续进攻 19 路军,若是它真要向前推进的话,我们也只好放弃大部分重新占领的土地,因为我们没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来进行保卫。

所以我们对同 19 路军停战感兴趣。我们对停战感兴趣的第二个原因带有较为一般的性质:19 路军和红军之间停战会给国民党士兵留下很深的印象等等。在政治上我们只会赢得好评。不言而喻,这绝不意味着我们真的要达成协议。当然,我们考虑到欺骗的可能,但这没使我们感到出乎意料,而在军事方面,与以前状况相比没有任何变化。

把 19 路军向我们发出的呼吁只看作是欺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做法。19 路军中沽名钓誉的“现代”军阀,愿意成为将来发展中国的有力因素。这支军队在上海战役^①后被调到福建,处在蒋介石和陈济棠之间及苏区和海洋(日本)之间,(在政治方面)也受到压制。最初,福建人民欢迎 19 路军,将其视为解放者,现在则憎恨这支军队。因此我们把这支军队的领导试图同我们达成协议的行为看作是软弱的表现,当然,同时也看作是克服这种软弱性的尝试。

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加深 19 路军、蒋介石和广东三者之间的矛盾。红军将在停战基础上进行谈判(不排除提出政治要求),而党因此能始终保持着行动自由。

如果蒋介石战胜我们,取得一些胜利,那么 19 路军也会毫不迟疑地起来反对我们。如果胜利在我们方面,那么谈判的结果可

① 见第 108 页注①。

能形成对我们很有利的局面。

4. 中国北方。在北平,由于逮捕行动,我们遭到了惨重损失,给我们的联系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同张家口联系完全中断。让接受我们影响的部队起义并撤到晋冀边区建立新苏维埃根据地的方针取消后,事态发展更加混乱了。首先是能够吸引怀有不满情绪的、变得激进的士兵和志愿兵的中心没有了。局部分化开始了。敌人赢得了很多时间来准备采取行动,解除这些部队的武装。

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些军官肯定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日本代理人。但对士兵和志愿兵作这种推测,那是错误的。我们的工作应该是使他们接受我们的影响,并派出我们的部队去反对解除武装(不过早打出红旗)。现在完成这项任务肯定比以前更困难。在后面有日本人,而前面有国民党军队,我们有被击溃的危险。

我们的工作在继续。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早就同我们合作的吉鸿昌军长也在其中。恰恰是在他的部队中我们有主要影响。我们在方振武部队中的影响比较弱,方可能是日本的代理人。

根据最近在一些部队中的统计,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的有:

第18步兵师中有800名战士、450支枪;

第3骑兵师中有300名战士、200支枪;

第5步兵师中有800名战士、300支枪;

第2步兵师中有1000名战士、700支枪。

现在在张家口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工作很薄弱,因为大部分同志都离开了这座城市。

5. 上海。正如常有的这种情况一样,由于几个月前发生的对省委主要领导人的逮捕和用弱得多的同志取代他们,工作变得更差了。同一系列支部的联系中断了,因此组织的数量大大减少。我不认为,现在在城里有2000多名党员,虽然准确的数字难以取得。

上海的罢工斗争相当频繁。党的影响很大,但在多数情况下,是在斗争爆发之后才表现出来。8月份的官方统计数字是这样的:

地 区	罢工次数	罢工人数	损失日数/人
外国租界	6	244	1121
中国领地	5	8585	54254
总计	11	8829	55375
1932年8月	10	2357	2171

关于罢工的详细材料(包括在上海范围以外发生的罢工),现在定期在《中国论坛》^①杂志上发表,这份杂志你们现在能按时收到。

在码头工人当中,我们成立了组建工会的筹备委员会。

6. 领导同志向我们通报说,斯特拉霍夫^②在党的机关刊物《斗争》^③上采取了错误的机会主义方针。由于编辑的纵容,没有预先防止发生这种行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译稿。根据口头的通报,对我们的方针进行了以下的严重歪曲:

(1)在中国,决定的因素是军阀战争。

(2)国民党反对我们的主要手段是封锁。

(3)从物质上说^④,国民党可以在三个月内消灭苏维埃,但它不冒同我们进行武装斗争的风险。

(4)美国提供的贷款,没有规定用于进攻。已经采取措施反击这些观点^⑤。

① 见第135页注①。

② 瞿秋白。

③ 《斗争》(见第279页注①)。

④ 原文如此。意思是:从力量对比角度看。

⑤ 指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瞿秋白的《我对于错误的认识》一文(载《斗争》杂志1933年10月15日第56期)中说,他在1933年7月至8月间出版的《斗争》杂志第49—52期上发表一些短评,其中阐述了指控他的那些观点。

7. 简单谈谈反战会议^①。代表团糟糕的人员组成简直不可想象。这在我们的人也可以合法地发表演讲的国度里,或许是可以容忍的,但在这里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带来的益处与付出的努力不相符。马尔利把更多的注意力用到了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上。他的发言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发言,而加米尔顿讲了愚蠢的和有害的东西。另一些人都很消极,瓦扬-古久里除外。当然,我们加强了鼓动工作,但代表团在会上未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我不指责瓦扬-古久里,因为鸟类市场难以控制。作出更多的努力可能在一些场合会堵住某些演讲者的嘴,也会造成难堪。我们成功地举行了规模不大的秘密代表会议,有来自国内各地的60位代表参加。发言稿、决议、号召书等将由瓦扬·古久里带给你们。最重要的材料我们将大量出版,并开展进一步的工作^②。

但是需要注意以下情况。国际反战委员会应该派人到上海来做合法的鼓动工作。瓦扬-古久里举行一些会议,有听众一千到四千人。这里完全有可能由一位同志在较长的时间里进行鼓动工作,就像艾萨克斯在出版方面所进行的那种鼓动工作。若最终能把人派出来,那也不会发生什么更严重的事情。在我看来,最好的条件是以下几点:

(1)此人应是党员,最好是法共党员,有知名度,可以合法旅行和发表演讲;

(2)他将以国际[反战]委员会代表和“使者”身份来这里,并且是很好的鼓动家;

(3)他有充分的准备来根据这里的情况正确地提出战争问题;

(4)他可以同宋庆龄和中国反帝人士保持联系,还可以在组织方面给他们提出建议,并且不时去印度支那。

^① 指远东反战反法西斯大会(见第227页注^①)。

^② 《远东反战反法西斯大会会刊》,上海1934年版。

这是个建议,你们应该讨论一下实施这个建议的可能性。不言而喻,需要严格分担我们的工作和这类活动。请告你们对此的意见。

代表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59,第 162—164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

172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3年10月1日^①于上海

秘密

亲爱的米哈伊尔^②！最后^③是很重要的事情：向四川派人问题。

瓦格纳^④到达后，我们想往四川派个人去。我们需要给那里的苏区派一位懂政治的好专家。这个问题现在提出来显得更为重要。任务积累得越来越多，而过几个月后，斗争会变得比现在要困难得多。弗雷德^⑤不能去那里。我认为需要把有战略思想的同志留在上海，以保证进行必要的协调。

再有，为完成一些任务我们还需要一名技术工作人员，我们已经通过另一个渠道向您报告了这些任务^⑥。请给我们答复。

代表^⑦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59，第 140 页反面。

德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 1933 年 10 月 26 日。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③ 这是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 8 号报告见第 171 号文件的补充部分。
④ О. 布劳恩。指他到达中央苏区。
⑤ М. 施特恩。
⑥ 文件没有找到。
⑦ А. 埃韦特。

173

施特恩关于中国红军在 1933 年 8、9 月 间的军事行动进程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1933 年 10 月 1 日^①于上海

关于 1933 年 8、9 月间军事形势的报告

这个时期,我们几次给你们寄去了关于重大事件的报告,所以我们这个报告不会补充很多新的东西。在这个报告中,我们要在对一些事件作出更有条理的叙述的基础上对形势作出评价。

1. 福建战役

对事件的阐述

8 月初,3 军团 3 个师总兵力 8000 人在福建的突然出现,改变了总的形势,使之变得有利于我们了。现在可以承认,我们当时不完全清楚这场战役的规模和范围。总的来说,这场战役至今进行得是正确的,显示出我们年轻的指挥员是有本领的领导者。尽管天气炎热和快速行军一时使大约 1500 名战士丧失了作战能力,但剩下的 6000 名士兵通过肉搏战还是夺取了归化和清流。同时俘虏 1000 多名带枪的士兵,缴获几十架机枪和许多其他军用物资。第 4 福建师损失 2000 多名士兵。约有 1000 名地主被抓获和消

^① 日期是根据第 172 号文件确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报告的时间是 1933 年 10 月 22 日。

灭。我们有 180 名战士阵亡。

尽管成功地占领了上述城市,但我们疲劳的部队未能彻底歼灭被击溃的第 4 师。它的部分部队及时向西南 19 路军 78 师驻地撤退了。

如果我们的第 3 模范师从汀州地区向前推进,像我们拟订的那样,参加这场战役,那么敌人就来不及撤退了。但是第 3 模范师未能出动,因为广东人从南面向我们的主要中心地区压了过来。由 3 个广东师组成的一个楔子插入到汀州和瑞金之间,使我们无法从这里调出部队。

计划中规定,(在对 3 军团实施打击的同时)要对武平方向的粤军进行辅助战役。我们做这个打算是为了把敌人吸引开,使之离开中心地区。但对这场战役只能投入很少的兵力,因此这场战役在击溃粤军两个团之后很快就遭到了挫折。还有一点:按照计划,3 军团在占领归化和清流后应急转北上。但是来自南面的威胁和 3 军团的有限战绩,促使指挥部对计划作出了第一次改动。何况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酷暑的折磨和进行了疲劳的转移。因此,对计划作出改动是好的。

2. 攻克连城

曾问过上海,能否转为南下而不是北上。上海表示同意,指出了进攻方向并为战役确定了 10 至 12 天的期限^①。因此在 8 月的第三周,在前述连城以南和东南的战斗使 3 军团接近龙岩之后,连城陷落了。(因报告是凭记忆写的,消息和日期中可能有错误)

在连城的战斗中,3 军团指挥部出色地证明了自己机动作战的能力。敌人的师团被引诱到开阔地区,被击溃,受到追击,几乎被彻底歼灭。攻克连城是对我们的奖赏。我们的军队(从这里起我们也有了由 3 军团指挥的 19 师)能够在战斗中和追击中承担艰

^① 文件没有找到。

巨的任务，并在整整一昼夜期间再次投入战斗，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进行的。奖赏是 19 路军的第 78 师几乎被彻底歼灭（主要残余部队的一小部分掉队者除外），并且第 60 师的部队同样吃了苦头。（我们及时地电告了战利品和 4000 俘虏）也间接地制止了广东的进攻。

如果不是给我们的军队下达了期限，不是我们要返回解决北面的任务（我们想在北面打扰蒋介石准备发动的攻势和打退他的进攻），我们还可以从这次胜利中获得更多的东西。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允许自己这样做。唯有一个命令，领导不得不服从，这就是军队的疲劳。连城战役后，只好组织 5 天休整。但是过了整整 8 天，才得以采取北征行动。

3. 3 军团开赴闽北

从附录一^①中你们可以知道，上海对战役继续进行是怎样的意见。在第二条中说，按照上海的意见，军队已经向前推进了。但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军队只是在第二天才出征。至少要途经沙县沿大石溪行进，在 8 月的第四周，3 军团同 19、20 和 21 师（后面两个师是游击部队，有 1000 多人），总兵力约 1.2 万人，名为“东方军”，才抵达顺昌、将乐地区。

这两座设防城市坐落在大石溪上，我们的主力部队是在顺昌以东渡过这条河的，敌人几乎没有发现，而为了掩护右翼，20、21 游击师在延平附近采取了向尤溪、水口、古田方向的佯攻。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地拿下了位于延平以西 15 里的窑沟（音）城。在这里有丰富的战利品落入我们的手中，有食盐、粮食、江轮和钱。保护翼侧行动组织得很好，正是这次行动引起了福建的恐慌，当局和资产阶级迅速向福州，甚至向上海逃亡。在这次战斗中，敌人不战交出延平，在这座城市的郊区出现了我们的小股队伍。

^① 见第 155 号文件。

但是我们的主力未能出其不意地俘获 56 师在顺昌和将乐的两个旅。一开始就实行了真正的围困,为了炸毁城墙,放置了地雷。从第一天起这两座城市就被四面包围;冲锋的准备工作至少用了两周时间。因此可以指望在 9 月 10 日攻克这两座城市。

这个时候东方军部队在顺昌和将乐城下无事可做,只能部分地用于其他战役。向邵武、光泽方向派出了侦察队伍;20、21 师得到了某种增援,切断了敌人为解救 56 师可能进行调动的路线,等等。

这时 19 路军在做什么呢?

78 师被歼灭和连城失守后,除了少数部队外,19 路军的所有军队都集中在永安、漳平、宁洋高原,以夺回连城。粤军也向永定集结,以便从那里向连城运动。但是,当 8 月 25 日红军顺路渡过沙溪,而几天之后出现在延平城郊时,它们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19 路军同自己的 60、61 助攻师和两个独立旅匆忙北上,以挽救局势。19 路军夺回了由薄弱的游击队驻守的沙县,但是接下来的北上之路,无论是大石溪以西还是以东,均被切断。我们的东方军已经采取措施在下矛(音)和尤溪地区迎接 19 路军的这些部队。没有纳入东方军的薄弱队伍继续驻守着连城。因为 19 路军的部队还在北面活动,暂时这座城市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沙县以北再次发生了激战,东方军取得了胜利。19 路军一个旅被击溃,19 路军只好停战。

在后来的事态发展过程中(细节我们省略不说),19 路军不得不把部分部队投放到位于延平和福州之间的水口,因为我们游击队的战绩表明,我们的目标是占领福州。各处报纸大肆叫嚣,传教士逃跑了,福州充满了逃亡者,他们在这里也呆不住。轮船公司抬高利润。恐慌如此之大,以致连军事当局整个一周都不知道延平是不是在红军手里。只举一个例子:据说尤溪和古田已被红军拿下,并由红军坚守着。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至少应该

感到遗憾的是,尤溪不在我们手里,因为那里有装备相当好的武器库,很有用处。但是在延平以东,我们的军队缴获了丰富的战利品:8艘满载军事装备的小江轮(见附录二)^①。为搬运战利品,需要1万名搬运工。

因为我们已经提到附录二,所以需要指出,在北面,蒋介石的师团还停留在原来的阵地上。我们的中央军团时而击溃它们的某个团或者某个旅(例如,87师在永丰地区的一个旅,87师在南丰和南城之间的一个团)^②。

概括起来,可以说,到8月底福建的战绩是这样:敌人在福建的7个师和2个独立旅中,有2个师和1个旅被歼灭,而其余部队多多少少都有重大损失。

4. 9月初的事件

8月底在马尾(福州附近),有两艘日本巡洋舰抛锚。英国驻东京大使^③同日本人讨论福建局势。8月29日,在福州停泊场已有英美法旗子飘扬。美国领事^④同福建省长蒋光鼐商讨如何对付红军问题。宣布实行戒严和实行极其严格的检查。福建军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驻守在沙县附近,另一部分驻守在水口、古田地区,保卫福州。恐慌减弱。

福建在8月份经受的震荡,再次引发了农村的游击运动。有报告说,在德化(福建东南部)和政和(福建北部)发生了暴动。在这两处暴动中,说有600到2000人的土匪集团。

蒋介石从浙江派一个师到福建,已抵达浦城。还有中国海军

① 中央苏区1933年9月5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759,第132页)。

② 秦邦宪1933年9月6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759,第132页)。

③ 托马斯·M. 斯诺。

④ 戈尔敦·JL. 伯克。

来到福州。在福建士兵和蒋介石海军之间发生了冲突。

日本人开始在福州地区组织自己的匪帮,得到了来自福摩萨的土匪的增援。在南方,陈济棠(广东)对自己的军队进行了改组,目的是要派3个独立师去汕头,来自那里的报告说,当地共产党人活动频繁。第5广东师也被派到福建(永定),以缓解19路军的处境。

所有这些事件部分地解释了19路军驻上海代表提出的“和平建议”^①。

当19路军第一次绕道通过中间人找到党时,我们轻易地摒弃了这个建议。我们作出了模棱两可的答复,因为一开始我们想击溃它的右翼。这之后可以同它进行谈判,一方面,要利用它来反对蒋介石和反对陈济棠及帝国主义者,另一方面,要取得行动自由,继续作战。19路军的建议可能是个卑鄙的花招。但有可能,这个建议的提出也是19路军的艰难处境使然:它在战斗中损失一些师团,其余部队士气在瓦解,损失了军事装备,根据地缩小了,有游击队和日本匪帮在它的后方,无论粤系集团还是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都在觊觎福建。显然,19路军至少想争取到喘息机会。我们可以不仓促行事。

5^②. 赣东北近阶段任务的提出

整个时期,上海和苏区领导之间交换意见没有发生磨擦。上海没有强迫或强加任何东西。我们对他们通报的这样或那样的步骤进行了讨论或作出了评价。“命令作风”,其实,这只不过是为了简短而采用的“电报作风”。我们知道你们不久前的提醒^③。不言而喻,有时也需要施加更为有力的影响。

① 见第170号文件。

② 原文如此。

③ 文件没有找到。

在我们写这个报告的时候,9月2日电报中提出的任务(附录三)^①还没有完成。已经过了一个月,可能还要过一个月(才能完成),那时蒋介石进攻的基本准备工作已经结束,进攻可以在任何一天开始,这就要求我们对我们的目标作出大的改动和限定。尽管如此,我们想在基本方面坚持既定的目标。我们这里以及那里的同志(比较一下附录四中他们9月16日的答复)^②都把这看作是迎接进攻的最好办法。另一种意见,即使我们知道了,那也晚了。我们9月2日的电报,与前一份报告中所阐述的计划相比较,表明一点:放弃了规定中央军团由永丰经崇仁来打击抚州(江西)的方案。在目前形势下,谈不上这一点。我们在几个月期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动摇敌人的右翼。现在我们在寻求更容易的方案(见附录三中第三条)。这个方案也与我们还不能完成的一定前提条件有关系。

至于南城,它只是根据地理上的考虑选做目标的(因为目标是消灭有生力量)。看一看江西的自然地理图,就很容易明白。在这里,抚河向东拐,形成一个套儿。从北面不难把这个套儿系紧。在南丰和这个套儿南岸的南城之间,我们5军团的独立团已在几周期间相当顺利地采取了行动。因此,如果所有前提条件(见同一附录的第二和第三条)都具备的话,那么完成以东方军和中央军的联合进攻来消灭南昌、抚州、宜黄、南丰(江西)地区的敌人的任务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在最坏的情况下,可以渡过抚河向东退却(对于中央军来说也一样)。此外,在翼侧保留我们军队的基本力量,在我们看来,这是保卫江西地区的最好办法。如果敌人还是向我们地区纵深推进,那么在我们手中有沿着福建边

① 见第156号文件。

② 莫斯科文(周恩来)1933年9月16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759,第133—134页)。

界向南走向的山脉从翼侧作掩护。加之福建方面的后方,由于8、9月份取得的胜利已有一半的保证。我们的计划就是这样。

6. 前提条件的创造

出现一个困难,即我们东方军在顺昌和将乐遇到了顽强抵抗。困难在于,我们因此失去了时间,并且在继续失去,而蒋介石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准备。

由于顺昌和将乐还没有攻克,东方军不能离开这个地区,而此时19路军也不再动荡了。9月14日,我们19师强攻顺昌未果。它没有做好进行巷战的准备,阵亡100多人,撤出了战斗。在9月18日至20日期间,在受到一个月包围后,被围困的56师师长下令突围(这无疑等于歼灭这个师),但蒋介石通过无线电命令取消突围令。这样一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再次发动强攻。在附录六中我们对顺昌受挫作出了评价,并请同志们作出相应的结论^①。此外,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外部地区的游击活动上,要保存正规部队,在可能遇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地方避开战斗。必须尽可能不在广东和福建战线采取积极行动,用最少量的部队挡住敌人。

歼灭敌80师的3个团(我们已及时电告你们),我们在南丰和南城两个团出击,通过作出不大的努力逼退敌军(第8师),使之退入碉堡,不敢再出来,这些都属于创造进一步的前提条件。的确,江西敌人在9月份有避免进行大战役的总的倾向,这也是因为蒋介石想一下子给我们以打击,不事先浪费力量。9月18日,我们再次在沙县以东同19路军作战,在那里击溃敌人1个团,缴获400支枪、8挺机枪、13门阵地炮和600箱军事装备。我们的34师(未纳入东方军)向永安推进。遗憾的是,一周多时间,局势未发生任何变化(见附录五)^②。至于蒋介石计划向建宁投放3个师,

^① 见第165号文件。

^② 见第164号文件。

这只有在我们结束顺昌和将乐的战斗时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对空袭时的行动作了什么指示，你们可以从附录七^①中看出。

属于为完成计划创造前提条件的，还有及时给相邻地区的红军作出的指示，以使他们根据我们在主要地区的任务采取行动。

在江西西部，红8军和红16军^②（总兵力4000到5000人）在8、9月间攻打了北面的修水与铜鼓和南面的上犹。攻打前两个城市是为了靠近九江、南昌铁路线，而攻打后一个城市是为了把赣州的粤军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两种情况下，至少达到了这样的目的：阻止了驻扎在赣江边的敌军进犯中心地区。我们在江西西部的军队能否完成自己的任务，到10月份才能看得出来。如果不把时而从万安县对遂川采取一些袭击行动的游击队算在的话，那么赣江战线几乎从内部就完全暴露了，这些游击队试图同驻扎在（江西西部）宁岗县内的古城和大陇的红军建立联系。在直接靠近赣州的地方（茅店、梅林等地），也有游击小组在给驻守在赣州的粤军布置工作。远在广东西北部连县附近的地方，有红军游击队，粤军虽然几次采取讨伐行动，但也未能战胜他们。在（广州铁路线上）英德地区的游击队，在8月份被打散了。（广东）东江上五华地区游击队的活动也被削弱了。

中心地区形势间接地得到缓解，也是因为贺龙军队和其他军队把湖南敌人的大量军团牵制在远离赣江的地方。在贺龙无法留在（鄂西）五峰和鹤峰的根据地之后，除了现在冲向四川边界的部队外，一些部队也出现在湘西澧县、石门和慈利地区，它们吸引了敌人的大量兵力。敌人对贺龙的恐惧，可能应归因于他的名字而不是他的实力。中国报纸上报道说，8月25日，贺龙的另一支部队占领了沙市以西长江边上的松滋。好像他从这里渡过长江北上了。

^① 见第159号文件。

^② 原文如此。应为：军团。

鄂豫皖地区已在几个月期间顶住了敌人的强攻。还报道说,红 25 师和其他独立军团在 8 月份占领了汤家汇和大佛山(位于豫东商城以南 80 里^①处)。时而又报道了对皖西边境城市的袭击。但所有这一切对江西目前形势产生的影响却很小。

赣东北 10 军团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援,它在广信、铅山、德兴、贵溪、元山(音)地区,牵制了敌人 4 个强大的师团,这些师如果介入抚河上的主要战役,会彻底摧毁我们的计划。10 军团处境困难,但是它成功地向浙江和安徽边界方向采取了突击行动。9 月中旬,它攻打了浙江的开化并解放了这座城市。当敌军发起反攻时,同它在城外进行了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报纸上报道说,城市又被夺回。实际上基地是德兴(江西)和婺源(安徽)周围地区。所有其余地区都有敌人队伍渗透。为了减轻 10 军团的处境,由东方军向崇安地区(闽北)派遣了游击队,但敌人对此作出的反应是,从一个浙江师中调一个精锐旅到了浦城。

7. 对 9 月底江西形势的评价

综上所述,不难想象中央苏区红军所经受的巨大困难。敌人为了发动新的攻势所集结的兵力,超过了迄今为止它能集中的所有兵力。为了直接从北面发动攻势,做好战斗准备的,有第 1 梯队的 22 个师、第 2 梯队的 12 个师和作为直接预备队的 5 个师。参加征讨的还有几个新的师团。至于技术手段,如航空大队、坦克和装甲车,在这方面敌人已经达成所做到的最大限度。已准备好的规模巨大的攻势可以随时发动。

短暂的间隙,即 8、9 月份,我们用来巩固在福建的地位。遗憾的是,我们在这里的力量未能达到经过努力所能达到的程度。例如,拥有 2 万人的军队本应在敌人进攻开始前出现在它的翼侧金溪、资溪地区,从而迫使敌人改变选定的进攻方向。在顺昌、将乐

^① 见第 209 页注①。

地区的进攻受挫之后，我们的军队停留在邵武以南，恐怕不能指望它们在敌人进攻开始前继续向北推进。考虑到这种情况，必须开始对地区实行积极的保卫。现在我们想到以下几点：

(1)阻止敌人向前推进，在伸展在吉安和宁都之间的黄山山脉的北坡设伏，迫使敌人作战。中央军的独立团应在这里活动。我们内线部队中训练不够和武装较差的新的预备队应从后方支援他们。必须动员工人队伍挖战壕。

(2)应该由已有一定作战能力的预备队在抚河上广昌那个地方组建一个新的军团，从地区内线部队中选出的兵团和尽可能从南线撤出的兵团，可作为其骨干力量。这个军团现在处于组建的开始阶段，其人数可达1万到1.2万。

(3)东方军(4个独立师，总共5000到6000人)应该尝试继续向北推进。

(4)中央军5个师中的两三个师应该向南城和南丰之间扇形地区的抚河突破，以便同东方军和新军团的机动部队配合作战。

总的来说，近8到10个师，总共3到4万人，分三组，是能够在进行积极保卫的过程中实现在抚河上的总目标的。这是从9月底起和在10月上半月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以后能否加大力使数量对比变得有利于我们，这将取决于闽南和赣南的形势。在最好的情况下，广昌军团能够达到计划的数字。

8. 我们正准备以通报四川、陕西和华北的情况来结束这个报告时，中央苏区发来了最近的报告(附录八)^①。

我们不谈四川的情况，因为那里的形势一直是有利的。我们对上面提及的电报作了答复(见附录九)^②。

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敌人的进攻是根据9月24日的命令

① 见第166号文件。

② 见第169号文件。

开始的。这以后3个师从南城出发向黎川方向推进。还有两个师来到南城,可能它们要在前3个师之后行进。这些师同已经在这个地区的两个师合在一起,已经有7个师。如果进攻令是在24日下达的,那么它们与我们所担心的相反,在9月26日还没有到达黎川。

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的指示是符合形势的,不该迟到^①。

只有一点是不能原谅的,这就是在顺昌浪费了很多兵力,并且未取得任何成果。本应要么拿下它,要么离开它。犹豫不决导致在这里失去了两周时间,这些时间本来最好用在继续向北推进上。

急于停止在福建其他地方的战役,致使敌人在这里也加快了向前推进的速度。19路军在一段时间内曾建议我们缔结和约,后来它要西进,这种侵略性威胁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对自己新立场的解释是,我们不客气地歼灭了他们的一个团,甚至是在谈判的时候。现在可以从19路军那里期待什么呢,最近一些日子就能看出来。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给他们一部分占领的土地,而不是在他们身上耗费力气。可能通过这样的途径能够缓解他们的立场。19路军回到以前的地方,能够重新找回“丢掉的脸面”。从自己方面来说,我们现在可以只用地方部队来迎接它的这次推进,向它的后方调动游击队,并尝试瓦解它。

9. 概括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

(1)10月1日,我们的军队将处于不是十分有利的地位来反击敌人发动的攻势。

(2)我们应该在最初计划的第二阶段还没有进行到底的时候放弃这个计划。

(3)迅速歼灭向黎川推进的敌人,或许还可以回到最初计划上,并吓唬福建的敌人。

^① 见第504页注^⑥。

(4)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很快发生,那么就得准备进行四五个月的顽强防御,为此,根据业已形成的局势,就不得不选择沿着福建边界由北向南延伸的山脉作为最主要的行动地区。

附言:在局势快发生变化之时,瓦格纳于9月26日^①到达了首府^②。

弗雷德^③

全宗514,目录1,卷宗759,第120—126页及126页反面。
德文打字稿,原件。

① O. 布劳恩(李德)。

② 指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③ M. 施特恩。

1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3年10月7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中共中央,抄送代表^②

你们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的建议,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③。我们从你们的名单中取消了候选人卢福坦和罗登贤。最好让朱德和顾作霖进入政治局来代替他们。为明确起见,我们重复一下政治局组成人员:莫斯克文^④、项英、布林斯基^⑤、波戈列洛夫^⑥、赵容^⑦、廖陈云^⑧、张国焘、毛泽东、王明、伊思美洛夫^⑨、邓发、朱德和顾作霖。[中共]中央书记处可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1933年10月3日会议上研究了中共领导组成问题,会议决定责成由O. B. 库西宁、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王明、康生、П. А. 米夫、Л. И. 马季亚尔和Г. И. 萨发罗夫组成的委员会起草答复草稿。如果委员会成员意见一致,则认为它的决定是最后决定(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64,第7页)。

② 即A. 埃韦特。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周恩来。

⑤ 任弼时。

⑥ 秦邦宪。

⑦ 康生。

⑧ 陈云。

⑨ 张闻天。

以由三人组成,但考虑到要到各处去,我们建议由以下五人组成:莫斯克文、项英、王明、张国焘和波戈列洛夫。请尽快讨论并告诉我们,你们有没有不同意见或新的建议、补充人选或其他人选,你们是否认为中央组成需要增补新的有威信的军队和苏维埃领导人。请电告。政治委员会。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36, (1933 年发文), 第 192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175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①

1933年10月10日^②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③。从10月初起,形势完全变了。[1933年]9月22日,敌人占领了中央苏区第二座大城市黎川。敌人11个师集中进攻[中央]苏区。由于错过了时机,我们在顺昌的军队,经将乐向前推进,避开了战斗。由5个师组成的东方军试图向北推进,先进攻敌人第2、第3梯队,阻止敌人由黎川向南发起的攻势,并要在那里等待中央军3个师靠近,把敌人逼到抚河,打击敌人第3梯队的翼侧。敌人在各处活动积极,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我们的位置是有利的。你们第184、185、186^④电报译得很清楚,我们同意电报中的意见。10月5日(库尔特^⑤)。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54(1933年收文),第90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在文件上有批注:根据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指示,已送别尔津同志。1933年10月11日。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的日期。

③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④ 部分见第168号文件。

⑤ Н. Н. 格伯特。

17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给李竹声的电报

1933年10月12日于莫斯科

密

致斯拉文^①。抄送代表^②。我们很担心，你们是否充分做好了反击第六次“围剿”^③的准备，是否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应有的注意。你们向我们报告说，你们不能购买和发出必要数量的防毒面具^④。你们的答复不能令我们满意。请说明，能否小批量的购买和发出。如果能，请开始购买并把价钱告诉我们。

请弄清楚并尽快告知，能否购买几架飞机，特别是歼击机。有否希望委托可靠的飞行员把这些飞机从空中提供给苏区？

你们没有答复能否购买和向苏区发出药品的问题和为在苏区组织生产防毒面具上海能给予什么具体帮助的问题。我们重复一遍，为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可以拨出专项经费。东方书记处。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194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李竹声。

② A. 埃韦特。

③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④ 指 H. H. 格伯特 1933 年 10 月 5 日发给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见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54(1933 年收文)，第 97 页)。

17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中央苏区的电报^②

1933年10月14日^③于上海

致中央苏区

1. 在10月3日和5日之间以及7日和8日的最近十天里,敌人几个师的先遣队被我军牵制住了,出现了比较有利的条件,但我们未能打击周浑元第3纵队或罗卓英第5纵队的主力部队,这些有利条件未能加以利用,结果严重局势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现在,当樊嵩甫的第2纵队和赵观涛的第1纵队的部分部队能够打击我们的右翼和后方,而陈诚的第4和第6兵团向东南推进的时候,这个机会又错过了。

2. 按照你们第15号电报^④的说法,如果我们停留在敌人集中向前推进的5个纵队的内线,几天之内局势将会恶化。选择撤退解决不了问题。既然我们的有生力量还没有受到触及,这种选择应该彻底抛弃。如果我们不能说服建议采取这种过早步骤的人,我们不仅会丧失行动自由,而且会使更大的计划受到威胁。因此,

① 发报人是根据电报内容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附录1和弗雷德报告的附录。指M.施特恩的报告(见第194号文件)。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1月21日。

④ 文件没有找到。

我们应该再次积极尝试打破敌人的计划。如果这种尝试还不成功,那时考虑撤退问题还为时不晚。

3. 下面我们简要地说明一下应由贯彻执行的人全力以赴实施的计划。我们完全相信,[实施计划的]代价可能是暂时失去黎川以南几块不大的土地。但是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在需要采取果断的和毫不迟疑的行动的时候,革命军事委员会就要采纳这个计划。

目的:

- (1)创造新局面,恢复行动自由。
- (2)改变敌人主攻方向,把敌军从中央苏区引开。
- (3)实行运动战,以赢得时间。
- (4)突破进攻者内线,击溃赵观涛或樊嵩甫纵队。

(5)争取同我赣东北军队实行积极配合。这些行动是计划的第一部分。时间约两周。兵力是东方军的主力部队。

计划的第二部分:完成计划第一部分最后阶段的东方军和 10 军团的联合力量,急转西进,迅速向抚河推进,总的方向是在南昌和抚州之间,将根据 11 月初出现的形势行事。所有其他部队的行动是对东方军战役第一部分的补充,它们应该是:

(6)1 军团向抚河东岸移动,同 19 师和 20 师一起作为一个兵团采取行动,完成这里的任务。

(7)在乌江的中心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军团,那里的 14 师作为所有向抚河以西活动的独立团的骨干力量。

(8)加快建立广昌军团。

(9)只要有可能的地方,都要建立游击队。

在(6)、(7)、(8)、(9)点中指出的行动,是与计划第一部分同时实施的,虽然是防御性的,但其主要目的是赢得时间和积蓄补充力量。尽管如此,这些行动应该积极实施,但要避免过早的冒险。

如果我们受到情势所迫,需要付出代价,那么在我们实施整个

计划的第二部分之前,也只有领土应是我们付出的代价。^①

4. 如果提出的所有措施将同时付诸实施,那么即使最近几天局势可能有很大变化,即使晚些时候 1 军团的部队同它右翼的 19 师和 20 师,以及它左翼的 3 师和 5 师一起利用以下几周时间进行运动战,以避免同敌人强大部队发生战斗,并离开它们向东北方向运动,即使这将意味着暂时丢掉一些领土,我们最终还是能够靠联合力量大量地挽回损失。那时我们还能够回到最初的六月战役计划^②中所拟订的第三阶段任务上来。

5. 在 1 军团到达泰宁地区之前,战役指挥部将设在 3 师和 15 师。晚些时候将设在 1 军团。

6. 据情报说,敌人每月将得到 3000 到 5000 瓶三氯硝基甲烷毒剂和一定数量的空投燃烧弹供应。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0,第 161、162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下面略去了第 4 点,其中详细说明了上述各点中提到的行动。

② 见第 148 号文件。

178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 中国红军状况的情报

不早于 1933 年 10 月 14 日^①于莫斯科

关于中国红军状况的情报(1933 年 10 月 14 日)

蒋介石对中国红军发动了第六次“围剿”^②。整个准备工作是在 4 个月期间进行的,基本上是打着认真准备进攻江西和福建两省中央苏区的旗号。

中央苏区的状况

中央苏区占有 45 个县连成一片的土地,人口有 1100 万。

在这个地区,有许多地方在 1928 至 1929 年间断断续续存在过苏维埃政权,而作为稳定的连成一片的苏维埃土地,该地区已存在三年。各处都消灭了封建地主剥削,进行了平分土地。由于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和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集中管理货币流通,制定国家预算和建立国家收入的固定来源(土地税、工商税、内部借债等),现在红军的供给也集中了。政府企业(缝纫厂、武器修理厂等)完全服从于为红军服务的要求。此外,红军的部分粮食和军服取自老百姓的捐献。经验表明,在一些县,这种捐献的规模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时期)。

① 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但是,中央苏区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尽管在消除李立三主义之后,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正确的方针,鼓励发展苏区经销生活必需品的小私人商业和(从事纸张、木材、编制品、茶叶、樟脑等生产的)小手工业,但是输入苏区的货物还是多于输出,并且两者都蒙受了敌人封锁之害。

而这种封锁,特别是经常在苏区土地上进行的作战行动,又造成一个主要困难,即粮食不足。虽然有组织地和掀起很大高潮地进行春播,但在第一季稻谷收成(6月)之后,在苏区就感觉到大米缺口很大。除了南面几个县因干旱作物死亡之外,秋季收成还是不错的。在苏区边境上直接进行战事的地区,以及在毗邻的福建和江西国民党地区,都发生了饥荒。

在整个苏区土地上,有不间断工作的统一的邮电服务网。

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利用每一个紧张时刻加强他们的破坏活动。在第五次“围剿”^①时期,各种反革命集团的活动有很大加强,而且在它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过程中查明,秘密的农民组织(在福建省和赣东北尤其经常遇到)由客观反映广大农民群众不满和愤怒情绪的组织变成了狭隘的帮会式的典型反革命组织。第六次“围剿”^②时,他们的活动还会加强。苏区的革命群众在已经形成了统一组织的政治保安总局机关的领导下,正在同反革命集团作斗争。

反击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时期,苏区无产阶级显示了高度的阶级觉悟。在1932年第三季度,中央苏区的工会组织向红军提供了3000名工人,而到1933年5月1日又提供了1万名,从而大大加强了红军的无产阶级干部队伍。此外,在为红军动员新战士的工作中工人领导了其他群众组织,组织了对红军战士家庭的帮助,

①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②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积极参与开展农业运动。在帮助红军的口号下,工人提高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做公债发行工作,等等。在苏维埃中国总共有 220 多万赤色工会会员,其中一多半在中央苏区。

江西和福建两省的力量对比

在中央苏区有以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首的中国红军优秀部队。在中央苏区和与它毗邻的地区(8 军团和 16 军团的地区^①)的 18 万红军中,有 11.4 万战士,而在中央苏区红军战士达 10 万。

由于最近红军取得一些胜利,它的政治思想状况可以认为是好的。革命群众积极支援红军,红军同老百姓的联系日益得到加强。标志之一是出现了大量跟随红军的自愿辅助队(运输队、卫士队、洗衣队和缝纫队)。在第五次“围剿”时,苏维埃政府发出号召后,赤卫队迅速发展起来,毫无疑问,在蒋介石第六次“围剿”时期也会出现这种特有的现象。

在蒋介石“大规模”进攻开始之前的力量对比情况可以从以下表格中看出:

军队名称	数量		人数	武器					
	师	旅		步枪	轻机枪	重机枪	火炮	炸弹发射炮	飞机
中央苏区红军(不含 8 和 16 军团)	—	—	100000	9000		1090	40	157	6
南京、广东和福建军队	—	—	440000	318700	1050	2255	720	570	70

① 原文如此。

这个表格不含红 8 军团和红 16 军团,以何键(湖南军阀)为首的西部战线在同他们作战。何键有 16 个师和 2 个旅,15 万人,部署在赣江以西的湖南和湖北南部。这条战线的主要任务是同红 8 军团和红 16 军团地区的苏维埃运动作斗争。

上面列出的表格表明,国民党军队人数比中央苏区红军人数多 3 倍,技术上的优势更不用说了。

在评估国民党军队时,还需要考虑到,现在在反中央苏区战线上的国民党军队中,有在第五次“围剿”中被击溃的 12 个师(第 5、9、10、11、14、25、27、52、59、79、90 师和粤军第 7 师),虽然他们得到了补充,但还不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只能起到守卫城镇的作用。

反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集中在 3 个兵团中:第 1 兵团有 31 个师,30 万人,部署在南昌、抚州、吉安地区;第 2 兵团有 8 个师,6.3 万人,部署在赣南(赣州、安远、南康地区);第 3 集团军有 6 个师,7.2 万人,部署在福建,其中 3 个师在延平地区,2 个师在龙岩地区。

随着蒋介石对军队的调动,北方兵团(南昌、抚州)原有兵力达 21 个师,现又增加了蒋介石的 10 个师。在这些师当中,蒋介石投入了他最可靠的师团(第 1、25、87、88、89 师),这些军队去年曾在湖北同红 4 军作战,并在同红军的斗争中表现得最有战斗力。

根据这种分组,蒋介石将在广东军队和福建军队从南面和东面同时发动进攻的情况下从北面给以主要打击。但后者的积极行动将取决于蒋军北方兵团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

中国红军的行动

红军指挥部决定,首先要防备 19 路军从东面进攻,确保苏区安全。彭德怀红 3 军团同 19 路军的战役进行得很迅速,也很顺利。红军彻底歼灭了第 78 师,抓获俘虏 6000 名,缴获步枪 4000 支、重机枪 80 挺、自动火枪 180 支、左轮手枪 500 支、步枪子弹

200万发、机枪子弹80万发、自动火枪子弹90万发、左轮手枪子弹5万发、长波电台1部、短波电台2部、电话机80部、大米30万斤和许多药品。

此外,在这个地区还击溃粤军第7师、新编2师第4旅(1名旅长和2名团长被击毙^①)和福建的马鸿新(音)旅。

同19路军的战役进行之后,红军指挥部决定占领江城(即南城),以便在蒋介石发动攻势之前在江城地区建立强大的兵团,从翼侧威胁蒋介石的作战部队。为此建立了两个军团,即东方军和西方军。东方军由整编3军团(19、20和21师)、两个重新组建的师(第5师和第6师)和红4军的第13师组成;西路军由红1军团和红5军团组成。

东方军的任务是:集结在邵武地区和攻打江城。西方军的任务是:集结在宜黄和抚河之间,同东方军一起占领江城。

对于红军来说,初步的战果是不错的。西方军击溃了第80师的3个团,抓获俘虏4000名,缴获步枪2000支、重机枪27挺、轻机枪35挺、火炮8门、大功率电台2部。东方军在水口地区打败了国民党第56师,缴获装载火炮和弹药的驳船8只。

蒋介石想防止红军的进一步进攻,自己于1933年9月24日转为进攻黎川(新城),击溃了小股掩护部队(红军的3个团)并于1933年9月28日占领了黎川城。蒋介石用11个师分三个梯队攻打黎川。

鉴于蒋介石转入进攻,红军指挥部不得不停止继续执行以前确定的任务,直至消除敌军在黎川地区的突破和歼灭敌黎川兵团。为了消灭这个军团,红军指挥部从西方军调来3个红军师,从广昌调来2个少共国际师。给东方军提出的任务是:不对黎川进行反攻,而向北运动,打击正在进攻的敌黎川军团的后方。东方军现在

^① 何人不详。

集结在邵武城以西。最近几天将对突破黎川的敌人展开作战行动。建宁、泰宁、广昌等城在紧急构筑防御工事。

结论

1. 对黎川的进攻是蒋介石对中国红军第六次“围剿”的开始。这次“围剿”与前几次“围剿”相比较,无论在作战方面还是在物资保证方面都准备得更精细。向江西投入 10 个师,其中有 5 个最可靠的师,这就使蒋介石有可能分出由第 20、21 和 22 师组成的强大机动军团从北面发动攻势和必要的守备部队守卫设防的地区和城镇。

2. 敌人的进攻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中国红军的展开和集中,红军指挥部认为,这次进攻的开始不会早于 10 月 10 日至 15 日,但红军具有高度的机动性,能够迅速地对部队作出相应的重新部署并占据最有利的地带。同时在巧妙地利用独立的游击队开展敌后活动的情况下,成功地反击对中国红军的第六次“围剿”将是有保证的。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8,第 11—17 页及 17 页背面。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179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①

1933年10月20日^②于中央苏区

发自中央苏区

收到你们[10月]14日电报^③后,军事委员会^④在[10月]18日进行了讨论,并得出以下总的意见:

1. 我们同意计划中的主要建议,即全力以赴向北进攻的打算和[想法];但由于计划是建立在放弃内线作战和绕过敌人翼侧向前推进的基础之上的,军事委员会不能同意这个计划。我们军事委员会认为,现在在保存我们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全力保卫我们的主要地区。因此我们认为,将我们85%的有生力量绕过敌人翼侧推进和放弃内线作战,这种战术是极其危险的。

2. 对于你们计划中的各种建议,军事委员会基本上得出了以下看法:(1)如果实行这个计划,那么我们85%的有生力量必将被敌人切断同中央地区一些县的联系;现在敌人已在将乐和邵武构

① 收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文件上有批注:附录2指M. 施特恩报告的附录(见第194号文件)。

② 上海收到文件的时间是1933年10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时间是1934年1月21日。

③ 见第177号文件。

④ 指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筑工事,目的是要切断我们向内或向外推进的通道。(2)我们的主要县几乎都将无法设防。第23号电报(这是对最近未译出来的电报的重发……)^①。

(第23号电报的续电):

(3)黎川、广昌以南的一些县、对我们有重要意义的泰宁和建宁将会丧失。现在敌人采取构筑工事步步推进的战术,将很难收复它们。(4)把所有独立团合并为一个师,明显会削弱赣江和抚河之间地区的游击行动。这是不对的,这明显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②。(5)在两周内组建广昌军团是不可能的,因为第29师和工人师是南部战线唯一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师撤走,南部战线将完全没有设防;至于第34师,如果它留在闽北牵制敌人,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决定是否把它撤走。在所有这些师中,每个师都约有1000支步枪;实际上要组建一个新的军团,这些力量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动员军校学员,这会导致培养指挥干部的工作完全停止,并且在目前会对我们的军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6)如果我们想连续向北推进到敌人的翼侧,然后歼灭他的整个左翼,那就必须拿下像金溪、贵溪等这样严密设防的地区。

3. 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同意上述意见。瓦格纳^③同志只是解释了你们的电报,但没有积极坚持执行这个电报。

4. 军事委员会的具体决定是:既然暂时不存在敌人直接进攻的危险,而周^④、薛^⑤纵队在行军中和在资溪桥地区修筑工事,我们应该全力歼灭它们。军事委员会10月18日命令中包含的具体措

① 原文如此。

② 不清楚,指的是共产国际的哪个指示。

③ O. 布劳恩。

④ 原文如此。可能是周浑元。

⑤ 原文如此。可能是薛岳。

施,我们单独作了通报^①。第 19 师和第 20 师还在北面活动。

波戈列洛夫^②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0, 第 163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秦邦宪。

18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电报^①

1933年10月20日于莫斯科

绝密

[中共]中央转中央苏区。

看了你们关于决定歼灭敌人黎川兵团的通报^②，作为建议，我们提请注意以下两点：第一，我们认为，你们决定在主要战线上利用第10军是正确的。必须加快它向南推进的速度，以便它在关键时刻能猛攻在主要战线上作战的敌人的后方。第二，我们认为游击队在敌人纵深和防卫很差的后方成功地开展行动具有特殊意义。请把它们派到正在进攻的敌人的后方、辎重车队的地方和基地去。在金溪、贵溪、光泽、信江流域地区活动的游击队，最好归东方军指挥部统一领导。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206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发报人是根据电报内容确定的。

② 文件没有找到。

1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电报

1933年10月24日^②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③和东方书记处。我们尽快发出药品。如果你们寄钱来,也可以大批量发出。鉴于严密的封锁,不可能大量地或大批量地增加防毒面具的发货。燃烧弹和空中机枪扫射此时此刻对我们来说要比毒气更危险。购买飞机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一个同志^④在机场,可以利用他。

蔡[廷锴]告知,原则上他同意我们的建议^⑤。他的代表^⑥去了苏区首府^⑦和上海。已有几个星期他[蔡廷锴]未进攻我们的部队,尽管我们的部队已调去对付蒋介石。他将有可能经欧洲然后经福州、延平发出大量的军事技术装备。我们将在10月底随第一个信使经海参崴发去邮件。

-
- ① 发报人是根据电报内容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的日期。
③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④ 何人不详。
⑤ 指关于同19路军签订协议的建议。见第183号文件。
⑥ 陈公培。
⑦ 瑞金。

请电告密电是否已译出。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54(1933 年收文), 第 82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182
王明和康生给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摘录)

1933年10月27日于莫斯科

中央政治局诸同志：

很久没有写信给你们，其主要原因就是过去许多信件，或者是经过许久时间中途退回，或者是中途失落。现在据说有极大的保证可以将信件送给你们，所以我们才决定写信给你们，但是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此信你们能一定收到，所以我们在这信中只是说到一个主要的政治的和策略的问题，其关于组织方面的问题、秘密问题，只有在完全证实你们收到此信之后（希望你们收到此信后很快告诉我们），然后再写信给你们。

关于反日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①

自满洲事变发生以后，我们的党便马上提出三位一体的口号：（1）以武装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保障中国的国家独立与领土完整。（2）推翻国民党卖国政府是顺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3）只有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真正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力量^②。将近三来事变的

① 本部分稍作编辑改动后纳入中共中央1934年4月20日发给各省、县、市委的秘密信中，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91年第10卷，第248—259页。

② 见第22号文件。

发展完全证明我们这个基本策略的正确,但是国民党经常提出各种武断欺骗的口号来对抗我们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所谓“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关于这点,不仅我们懂得,我们的敌人也懂得。所以国民党无论在实际上做了许多卖国投降的事件,但是在口头上自始至终它总是尽力企图表示它能担负“抗日救国”的责任。将近三年来我们斗争的困难也恰在这里!谁到底是真正能够完成“抗日救国”的责任?群众只有在实际斗争经验中,才能认识和相信。现在如果将满洲事变以来,把我和国民党在这个中心问题上斗争的过程作一个简明概括的总结,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斗争曾经过三个主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九一八到北大南下示威团到南京示威时——这个时候,我们在群众中鼓动的中心口号是:人民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中心口号是:要求南京政府实行对日宣战。国民党想在这个口号之下,在群众中散布国民党能够抗日的幻想。国民党在这个中心口号之下的具体行动是尽力鼓动群众向南京请愿,尽力垄断群众会议,宣传组织反日义勇军,宣传抵制日货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经过九二六上海群众大会和示威,经过10月3日、5日闸北国民党公安局五区与反日群众的冲突,经过工人学生公开要求武装和广大(泛)组织反日群众运动,经过群众真正实行的广大(泛)抵货运动,特别是经过北京、山东、武汉、上海、南京等处十万学生在南京示威后,国民党一步一步地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的口号收回,把国民党的各个部分口号也在群众面前揭穿,尤其是对南京十万学生的大屠杀,把国民党压迫反日运动的真面目完全暴露了。于是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被迫自己揭穿假面具,他们公开宣布对日作战与否人民不得过问,公开宣言政府并未准备对日作战,并公开宣布禁止一切反日请愿、罢工、罢课、示威等行

动。国民党在这一时候企图用铁血政策公开镇压反帝运动，这样就使我们的口号在群众当中得到进一步的认识，也就是我们的口号在群众中第一步的胜利。

第二个阶段从上海战争^①到苏维埃政府发表联合对日作战宣言^②时，南京屠杀并没有镇压(下去)反日运动，上海工人、学生对于南京屠杀给了强有力的几年没有的几万人抬棺游行的大示威，在一月间个别日本纱厂经济罢工转变为全沪西日纱厂的反日总罢工^③。日本占领上海的消息和准备，引起了全国民众——首先是上海的工人、兵士热烈的反抗，在全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之下，在全上海工人和民众反日运动蓬发展的条件之下，在我党政治口号影响和实际工作推动之下，爆发了上海工人和19路军兵士武装保卫上海的英勇战斗行动。上海战争中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能够给这运动以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骨干，以及没有夺得这防卫战争军事上的领导权。上海战争中军事领导权还保留在国民党军阀手中的这一事实，就形成了国民党有可能利用上海抗日战争作为投机宣传和政治资本的条件。广大群众在开始时不能完全了解国民党出卖上海战争，妨碍上海战争，捣乱上海战争的一切事实的真相，所以国民党在上海战争时和上海战争后，又开始大大宣传国民党是“民族英雄”的口号，国民党针对我们“武装抗日必先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提出“抗日剿共并重”，但“对外必先对内”的口号。国民党企图将上海防卫战争失败的责任，加在C. P.^④和红军的身上，国民党拼命宣传红军捣乱抗日后方，所以要抗日不能不先“剿共”，四

① 见第108页注①。

② 见第100号文件。

③ 罢工在1932年4月进行。

④ 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见第293页注①。

次与五次“围剿”都是在这口号之下进行的,我们的党和红军以及苏维埃政府为得揭穿国民党这些骗人的口号,曾经采取过不少的办法和行动(如对日宣战^①、发表对日宣战动员令^②、援助上海罢工、反对上海协定^③等等),但是国民党这个武断宣传的口号,真正在广大民众面前揭破只是在我们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发表统一战线的宣言和实行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之后。这一宣言是我们的党和红军、苏维埃整个发展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文献,它得到在中外报纸上最普遍的登载。它得到了中国广大民众对真正愿意武装抗日的红军、苏维埃的热烈同情,它使国民党许多军队发出停止“剿共”和北上抗日的要求,它在实际上逼得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不得不自己揭穿“抗日剿共并重”的假面具,逼得蒋介石不得不发表公开的训令说“在剿共期间,绝对不能言抗日”^④,这样一来使我们党的口号在群众面前得到更进一步的胜利。

第三个阶段从蒋介石公开发表训令禁止抗日起到现在——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国民党不愿抗日的真面目完全暴露了。国民党提出的主要口号是:“专力剿共,力求建设”。国民党在这种口号之下,公开承认现在抗日的不可能,所以不可能的主要理由,除所谓“赤匪”捣乱外,就是大叫中国太穷太弱太没有国防力等等。在这一口号下,国民党就举行航空救国运动,募捐救国运动,宣传所谓实业建设计划,尽力企图表示国民党好像真正实行卧薪尝胆,以便将来完成抗日救国的责任。群众对国民党的这些口号如何呢? 极大多数的群众已经认识国民党不愿抗日的真面目,但是对于到底怎样进行武装抗日战争? 进行抗日战争有否胜利可能? 尤其是用

① 《中国的苏维埃》(文献资料汇编),第454—456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91年第8卷,第636—638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91年第8卷,第647—645页。

③ 《九一八——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397—399页。

④ 指蒋介石1933年4月10日在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的讲话。

什么具体办法解决抗日战争各种最具体的问题(如兵力,武器、军需,领导机关、民众武装等等)尚存疑惑。在这样时候我们党的策略也就应该更进一步。我们的党,除了继续努力揭穿国民党一切武断宣传的欺骗外,首先必须给广大民众一个共同的非常具体的、非常简单明了的对日作战行动纲领,没有这一步办法,将使群众觉得党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空洞,将使不能找到真正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出路。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今年夏天我们才就这方面的问题给了中央一个具体的提议^①。但是提议的文件太短了,以致不能使同志们对这一文件在目前的重点政治意义、策略作用和具体运用的方法得到立刻完全的了解。从目前党的工作和反帝运动各方面事实看来,都显然证明我们关于这个策略的提议并没有拿到广大群众中去运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却非常迫切地需要广大(泛)地非常灵活地具体运用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如果这策略能彻底地深入地进行,那末我们相信不仅能使非苏区反日反帝反国民党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走到更高的阶段,同时也能使敌人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行动受到极大的打击和达到更快的崩溃。因此,我们就把原来关于这个问题起草的一个文件全部抄送给你们,并且附带提出一些我们对实际上执行这个策略的许多问题的意见,来作为你们的参考。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

民国二十年^②九月十八日,因为张学良和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很容易地把我们的东北三省占去了。民国二十一年^③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我们上海闸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即 1931 年。

③ 即 1932 年。

北,但是因为上海工人、19路军兵士、贫民、苦力、学生们英勇的武装反抗,所以日本没有能够占领我们的上海华界(闸北、南市、吴淞等等)。去年1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山海关,2月间占领了我们的热河,在以后几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占领了我们的察哈尔,实行进攻绥远,并且利用它的走狗军队企图完全占领我们的北平、天津、河北全部以及黄河以北的各省份。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想用武装力量来实行民国四年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①,它并且用流亡政策来开始实现田中内阁的所谓对华的积极政策(即完全占领全中国及把全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②。

因此,现在全中国的民众不管是汉人,或是其他民族(蒙古、回族、西藏、苗、瑶等等)都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生死的关头,他们都有受帝国主义轰炸、枪毙、斫杀、拷打、强奸、侮辱的危险,他们都要更加受冻、受饿、受穷、失业。他们将要受到和高丽人、台湾人同样的悲运。他们将要受到和在东北三省三千万兄弟姊妹、热河千百万兄弟姊妹同样的牛马生活的痛苦。

中国人民在自己痛苦的的实际的经验当中,已经深刻地觉悟到:要想依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来抗日救国,已经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了,要想依靠美国或国际联盟出来帮助反对日本,也只是一种幼稚的蠢笨的思想,因为大家都晓得,美国和国际联盟,什么具体的办法也还没有拿出来,而且大家都晓得,就作为美国和国联能拿出一办法来反对日本,那么与中国民众一定也不会有什么好处,这只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办法罢了!由此可见,中国人民只

① 为取得对中国的统治,日本于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的21条要求。1915年5月(除一般政治要求外)许多要求被中国政府接受。

② 见田中首相1927年7月25日向日本天皇提出的关于在满洲实行积极政策的奏折。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1年第33—34期,第47—62页。

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换言之，就是中国人民自动地对日作战，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所公认为唯一的正当的方法了。的确，这是中国人民自救救国的唯一出路，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为保障我国国家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战争，换言之，这是使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当亡国奴的神圣战争。

然而因为我们对于组织和实行这个正义的民族战争，没有一个共同的具体的纲领，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是散漫的、无计划的、不能集中的。所以因此也就不能成为强有力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拿已有的具体事实一看就明白了。比如说，我们的反日义勇军、反日救国军、反日游击队，虽然在东三省与热河同日本强盗打了许多仗，虽然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英勇地实行了各种各样的反日斗争（反日罢工、罢课、示威、反日宣传、抵货等等），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不但没有能够把东三省、热河和察哈尔收复回来，并且简直还不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们继续的进攻。因此，我们认为目前有绝对必要提出几点最具体最根本的办法来，作为我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共同行动纲领。我们提出下列各点：

1. 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中国的陆军常备军在数量上比全世界任何国家（都）要多些，除警察、民团、商团不计外，我国人民平均要养活三百万人的军队。海军和空军虽然还比较薄弱，但是人民为得养活他们花了很大的经费，特别在最近几年，海军和空军的开支，比以前大得多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因此，人民完全有权利要求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一切战争，然而大家都知道，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仅仅靠我们的军队是不够的，所以必须：

2. 全体人民总动员——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可以用志愿军的办法,将来要逐步地实行征兵制,要立刻成立广大的千百万人的群众的反日民众义勇军(工人反日义勇军、农民反日义勇军、学生反日义勇军、职员及自由职业者——医生、教职员、新闻记者等的反日义勇军,同样要组织商人的反日义勇军),并且要使他们到前方和后方对敌作战。此外,必须组织广大的人民的参战组织(如供应粮食队、交通队、救护队、破坏队、宣传队等等)。很明显,要想这样做,那就必须:

3. 全体人民总武装——为达到这一点,必须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立刻把全国兵工厂、军械处、火药局已有的、正在制造的和将来制造的各种武器(步枪、机关枪、手枪、炸弹、迫击炮、大炮、子弹、飞机,甚至土炮、土枪、长枪、大刀等等)完全发给人民反日义勇军,以便实行武装训练,并直接对日作战。如果谁不愿意将武器自动发出来,那么人民只有自动地去拿这些武器。如果这些还不够,那么就要想办法筹款向外国购买,但是大家都要知道,对日作战,这还不够,所以我们还须要:

4. 立刻设法解决抗日军费——在战争一开始时,我们提议采取下列办法解决经费问题:

(1)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银行、工厂、矿山、铁路、轮船、大商店、日债等等,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经费,因为日本在华投资,已经超过日洋二十万万,就等于中国大洋四十亿元以上,停付日债一切本息(这又是一笔大款)。

(2)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

(3)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

(4)实行征收财产累进所得税。

(5)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以及一切同情中国人民的人士当中,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如果这些办法都实行的话,至少可以保证第一个时期的对日

作战经费。如果将来还感觉经费不够时，我们还可想出其他的办法，来保证对日作战的经费，以便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

此外，在对日作战时，我们还需要强有力的集中的领导机关，因此必须：

5. 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这是全国人民抗日的总领导机关，这个委员会的各界代表，是由各团体（各界反日会、反日义勇军等）在全体代表大会上或会员大会上选出来的。在各省由各界反日团体选出各省的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各县、各城市、各乡镇、各区，成立县、市、乡、区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轮船、乡村、兵营、学校、公司、商店等等组织反日会分会和反日义勇军及其他反日队伍。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有权力解决和支配与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有关系的一切事件，此外，为保证对日作战的胜利，我们还必须：

6. 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首先是要联合高丽、台湾、内蒙古和日本代管的各岛屿的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同样要联合在日本国内进行英勇斗争反对日本天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工人、农民、兵士、知识界等等，以便共同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我们公开向全世界宣言：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对日作战表同情援助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国家和民族，我们都认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朋友。同时对于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的或者学日本强盗行瓜分中国的国家，我们把它们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伙伴。我们将它们视为中国人民之敌。

我们上列六点，虽然还不敢说是包括了组织反日战争一切必要条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条件是基本的、最具体的。只要能够做到这六件事情，我们就能够实行对日作战。我们号召一切中国同胞——一切愿意过人的生活，不愿意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的

同胞,立刻在工厂、矿山、铁路、学校、乡村、公司、商店、兵营等等地方,举行谈话会、露天大会、代表会等来讨论我们这个武装抗日纲领^①,并且立刻实行起来。首先要实行组织反日会、反日义勇军,实行组织援助东北义勇军募捐委员会,并采取各种方法为本纲领推行全国而斗争。

我们完全相信,如本纲领能见诸实行,则结果不仅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继续进攻,不仅能收复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和一切失地,而且我们能够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中华民族反日神圣战争万岁!

大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华人民救国御侮会

发起人

赞成人

签名

这个文件的目的是,主要的有下列几点:

1. 给全国民众一个明显的具体的容易懂的对日作战的行动纲领。

2. 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

3. 尽可能地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的可能,以便在实际的群众斗争上来揭露国民党卖国的真相,在事实上将反日斗争和反国民党的斗争联系起来,因此,目前应当用下列方法把这一纲领广大(泛)地传播和发展出去。

[1]由宋庆龄及其他有可能参加的一切所谓名流学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自由职业者等等(人越多越好,不要

^① 指全中国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筹备委员会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的中国人民抗日基本纲领,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91年第10卷,第681—686页。

尽是色彩浓的^①，要尽可能的找到灰色的^②，甚至平时是反动的，只要他同意这斗争纲领的——甚至如马占山、蔡廷锴等，只要同意这纲领)共同签名作为这纲领及委员会的发起人和赞成人。

[2]尽一切可能将这个纲领在一切公开半公开的秘密的报纸、杂志刊物上发表(党报及党所领导的报纸刊物，要在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报纸刊物登载以后再发表)。

[3]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刊物上发现这纲领以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立刻发表宣言，表示赞成和拥护这一纲领，说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自始至终主张人民武装抗日，主张一切军力用来对日作战，因此号召全国民众和国民党一切军队立刻接受这一纲领，立刻停止一切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停止军阀战争)，以便集中全力，共同武装抗日。

[4]把这一纲领印成小册子(最好的，让宋庆龄等具有公开身份的人去印)，公开地广大(泛)地散发，并在各工厂、学校等地方，公开地用谈话、会议、研究等方法讨论。

[5]在一切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刊物上，发表一切补充和发挥这个纲领的文章(如具体研究中日两国土地财产等等的对比，研究抗日军费、武装作战计划、民众组织、军事组织，以至战争中的粮食、运输、交通、民众参战等等)，利用刊物、报纸、戏剧、文学、歌谣、故事广大(泛)地宣传上海战争、满洲游击战争、俄国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战争，1775年至1783年南北美反英的独立战争的各种经验，反复证明，反日战争只要有广大民众参加，前途胜利是有保证的。

[6]在各地讨论这纲领时，就要立刻形成组织上的结果。最好这种组织能包括全工厂的工人、全学校的学生、教职员等，用这些

① 可能指左派人士。

② 可能指中间力量代表。

组织的名义立刻发表宣言传单,表示拥护这个纲领,组织宣传队、募捐队,实行活动,并且尽一切可能用各种组织的名义(从革命的组织,一直到各种的组织——如律师公会、黄色工会、东北同乡会等等)发宣言、通电,向南京及其他地方政府要求:

(1)立刻停止国内战争,动员一切海陆空军北上抗日。

(2)立刻发给人民武装。

(3)停付日债一切本息,将这笔款子发给救国御侮会,作为抗日军费。

(4)立刻真正抵制日货和没收日货等等。

关于这些运动的一切活动,不要怕群众与国民党发生了关系,相反的要利用各种机会动员一切的团体到国民党的一切政府及商会等机关发生直接交涉和冲突,使群众在直接与国民党的斗争中,认识国民党及大资产阶级卖国的真面目。比如在广大群众的公开的大会上或代表会上,不要怕商会、国民党党部、政府当局等代表参加,而且要在这些会上提出能够揭穿他们假面具的直接要求,如有钱的出钱,有粮食的出粮食,有枪的出枪,并规定出钱出粮食的比例,出枪的地方及日期。如果国民党商会等代表,当时在群众压迫之下口头的答应了,那么,就要立刻组织群众跟着他们要去。

(7)要用一切的力量使这纲领及环绕在这纲领下的一切文件传达到兵士中去。首先是在“剿共”前线和后方的部队中,必须使这运动在兵士中得到很大的响应,须时刻记得:没有广大士兵的革命化,所谓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及苏维埃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是不可能的。必须利用上海战争时的经验,用广大民众的反日情绪来影响士兵(士兵在路上走及店中买东西时,组织老太婆、小孩子、工人、学生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为什么打自己人时,打得非常吃紧,却不敢去打日本)。组织与士兵及与下级军官有关系的一切人写信给他们,请他们吃饭、谈话,来鼓动他们反日及反对内战的情绪,最好能做到在兵士群众中起来要求北上抗日的

行动。

此外,在实行这个策略时,要防止两方面不正确的倾向,一方面要防止误解为减低阶级斗争和减低反国民党斗争,实际上恰恰相反,正确地实行这个策略是在实际上加强阶级斗争、加强反国民党斗争;另一方面要防止我们许多同志和同情分子惯用“左”倾词句的情绪,而企图将这纲领马上修改成为非常红(激进)的。要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在群众斗争有了广大发展时,我们有一切的可能逐步提出更加“左”倾更加激进的纲领来补充。^①

王明 康生

未整理的专藏文件,中文手稿,副本。

^① 下面略去信的附录部分。

1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0月28日^②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③。[1933年]10月24日^④19路军和红军代表^⑤在汀州达成以下协议：1. 彼此停止对对方的军事行动。2. 取消(对中央苏区的)封锁。3. 在19路军控制的地区，释放政治犯，保证结社、出版等自由。4. 协议生效后，以19路军名义发表反帝反军阀蒋介石宣言。5. 互换代表并保证他们的安全。6. 生效前保守秘密，不发表关于双方协议的文件。补充协议是：关于双方反蒋行动的单独协议和贸易协定。协议在批准之日生效。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54(1933年收文)，第76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的日期。
③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④ 原文如此。应为：10月26日。指中央苏区和19路军代表1933年10月26日签署的关于停战和反日反蒋的临时协定，见《现代史文选》，莫斯科1990年版第1卷，第643—6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570—571页。
⑤ 分别为：徐名鸿、陈公培和潘汉年。

18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3年10月29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①。在我军缴获的战利品中,也有药品。最好在组织向苏区发送药品之前,询问[红军]指挥部,他们特别需要的是什么药品。请告诉我们,你们购买药品需要多少钱。能否不整套而是分件发出防毒气面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36(1933 年发文), 第 210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① A. 埃韦特。

18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中央苏区的电报^②

1933年10月30日^③于上海

致中央苏区

1. 我们研究了你们据以不接受我们10月14日电报^④中所提出的建议的理由。我们得出结论：面对不可避免的一仗，你们将再次作出尝试改善我们的处境，这之前，你们还想冒险在黎川以北打一场大仗。

我们的建议，毫无疑问，正如你们所感觉得到的，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向敌人的行动敞开了我们的交通线。不过请记住，我们建议我们的部分部队暂时转向东北，并不想让我们85%的兵力离开内线作战。只有约35%的兵力用于外线行动，而其大部分应从内线采取行动。这两种办法能够带来的成绩，要比能从你们的选择中期待得到的战绩更大。更何况敌人进攻的暂时停止为我们提供了在进入决战之前歼灭其第2纵队的机会。

2. 我们建议中的第二点是这样一个论点：我们保持对蒋介石作战的主动权，广东敌军和福建敌军就不会采取行动。为此我们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附录2a指M.施特恩报告附录(见第194号文件)。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1月21日。

④ 见第177号文件。

应该争取取得哪怕是部分胜利也好,并且越快越好。如果在10月份取得一些胜利,我们就可以暂时冒险地从南面向广昌地区调动第34师、工人师和一些小股部队,在那里它们可以完成一般预备队在打大仗时要完成的任务。在不担心广东和福建敌军来犯的情况下,可以把三四千射手集中起来。一旦敌人采取行动,让这些预备队集中起来迎敌也不会为时太晚。

3. 军校学习暂停:

我们认为,危急的军事形势必然对常规的学习有很大的影响。危急的形势要求作出最大的努力来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参加战斗。请想想喀琅施塔得,当年俄共(布)代表大会的代表都被动员起来向反革命发起了攻势^①。

4. 至于我们关于第14师和一些独立团的建议,我们觉得,你们没有对这个建议作出正确的解释。我们始终提醒你们要特别注意发展游击力量。我们指出了途径和如何利用地方力量为三个师建立干部结构,我们想打好基础,一旦我们进行机动作战的部队不得不回到内部地区,我们要顽强地保卫自己的地盘。

5. 现在很难对形势作出判断,因为缺少来自你们那里的必要通报。你们最近的第23号电报,标明日期是10月20日,10月28日才收到^②。

看来,10月底,你们将会在资溪桥地区的某个地方与周^③和薛^④的纵队接触。你们10月18日的计划提出的目标是,所有各种部队分三路返回北线,这个计划含有两种可能性:(1)或者让一路部队暂时转向东北去对付敌第2或第1纵队,而实际上是派另

① 指派部分俄共(布)十大参加者去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

② 见第179号文件。

③ 可能是周浑元。

④ 可能是薛岳。

两路部队去对付周的纵队,最后进行决战,当一路部队到达敌人后方时,将转向西行;(2)或者你们决定把所有三路部队都投入同周的纵队的战斗。第二个方案是很大胆的决定,只有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6. 总的战略形势要求我们,不要寻求过早地进行决战。我们需要马上做什么呢?这就是取得部分胜利,歼灭敌人两三个师。这会促进敌人营垒内部的瓦解并使我们做好迎接更大战斗的准备。这样的部分胜利会给广东和福建的敌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准备打大仗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几点:

(1)突破敌人外部翼侧;(2)建立广昌军团;(3)把10军团的兵力重新部署在靠西的地方;(4)14师支援的中心地区的游击行动,积极向东和东北方向运动;(5)零都的军团转移到吉安对面的地区,作为控制这里可能出现的局势的力量;(6)赣西的部队向南昌至九江铁路线推进;(7)争取更多地瓦解敌军,在反日斗争方面提出新的建议等。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蔡廷锴的反日反蒋声明,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怕在11月下半月进行决战。

7. 我们的建议不意味着干涉革命军事委员会共同一致的決定。形势不允许长时间的讨论和拖延。你们在当地,应该根据你们的判断行事,并要考虑我们的建议。没有必要像你们在你们最近的电报中所做的那样,直接或间接地把我们的建议说成是某种与共产国际的建议相对立的东西。

8. 为使我们了解前线的形势,请把所有其他与战役或重要政治问题无直接联系的电报暂时放一放。

还需要通报敌我兵力总的部署情况。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0, 第 164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186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0月30日^①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②。中央苏区告知：借助于蔡[廷锴]，我们预计将通过……^③发运弹药。需要做好准备。请立即将钱寄来。代表^④。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54(1933 年收文)，第 71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
 -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 ③ 原文空缺。
 - ④ А. 埃韦特。

187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0月30日^①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②。为避免发生意见分歧,请不要让无线电发射机担负过多的关于形势变化情况的通报工作。请把你们提出建议的电报只发给我们,不要发给[中共]中央。代表^③。10月28日。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54(1933 年收文), 第 72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③ А. 埃韦特。

188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0月30日^①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②。请紧急寄出5万元^③。有购买弹药的可能性。中央苏区开始生产最简单的防毒面具。必须利用当地的材料。许多事情取决于您的决定。10月28日。(库尔特^④)。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54(1933年收文),第69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③ 货币名称未说明。

④ Н. Н. 格伯特。

189

埃韦特给中共中央的信^①

1933年10月^②于上海

致中央苏区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给你们寄去了五中全会的决议草案^③。其中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作出全面的分析，而只是有所涉及。如果所有问题都作详细的分析，那文件会太长和太臃肿。不过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扩充某些部分或作改动或使之更具体，你们可以这样做。

① 文件上有批注：列入机密中国文件。1934年1月27日。И.米夫。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1月21日。

③ 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见第281页注^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起草的中共五中全会决议草案，标明日期是1933年10月中旬，可能是以信件的形式通过信使寄出的。(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810，第173—189页。)晚些时候给中共中央寄去了由埃韦特署名的信件(文件没有注明日期)，含有对草案稿的修改意见。(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810，第170—172页。)在这封信的开头说：“亲爱的同志们，给你们寄去对你们已经收到的全会决议草案的一些修改意见。指出的所有[按行修改的]页码与英文稿是一致的。”把草案和对它的修改意见同中共五中全会1934年1月18日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相比较表明，远东局草案的所有基本论点都以稍许简化或概括的形式和作了部分修改地纳入到这个决议中了。见《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莫斯科1981年版第2卷(1927—1937)第4册，第178—207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91年版第10卷，第23—49页。

我们想提请你们注意这样一个情况：关于我们苏区土地政策的最重要部分是引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前的文件^①。虽然在老的苏区和中央苏区重复这个文件的必要性可能不是很大，但对于新的地区来说普遍是很需要的。我们应该作出认真的努力来宣传这个明确的并适合于目前时期的方针。当然，在决议的某些部分中你们应该考虑到全会召开时的形势。我们认为，至少需要把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某些任务提到首位。到准备召开全会时，形势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向好的方面或向坏的方面变化），那时这个部分需要作很大的修改。但不管怎样，最好在这个决议中，不只是集中在反六次进攻^②的任务上，而要分析反对一般进攻的问题，因为目前的进攻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以至全会举行以后。

当然，你们将决定在12月份能否举行全会，还有苏维埃代表大会^③。这基本上取决于军事形势。在这些问题上你们有充分的自由，你们不要用以前拟订的任何期限把自己束缚起来。一旦全会能够举行时，最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决议，以便向全国的党组织下达有威信的指示。

最好就诸如中国共青团的任务等专门问题也作出简短的单独决议。再有，必须就我们电告你们的问题^④为苏区准备秘密决议。

① 根据草案这部分的内容判断（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810，第179—181页），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31年7月31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相应的部分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2册，第1479—1480页；《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51—252页。

②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③ 指中国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见第465页注①）。

④ 文件没有找到。

请电告你们打算对草案作出的重要改动。
致以革命的敬礼!

吉姆^①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0, 第 169 页。
英文打字稿, 副本。

^① A. 埃韦特。

190

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3年11月2日^①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②。第一,通过蔡[廷锴]购买需要的武器装备,我们认为不合适,因为收到定货后形势可能发生变化,他可以把我们的全部定货据为己有。我们建议立即从他那里购买重型火炮、飞机、防毒面具和药品。第二,请告诉我们,说的是什么元?是墨西哥元还是美国纸币?眼下要求的款项^③将寄给你们,但要过许多时间之后。必须让中央苏区立即为购买这些东西弄到或借到钱。候复。

米哈伊尔^④。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211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解密日期。

② A. 埃韦特。

③ 见第 198 号文件。

④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191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①

1933年11月3日于莫斯科

王明：我们认为，上海反战大会^②不仅对于反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而且对于远东都具有很大的意义。例如，我们现在从日本同志那里得知，在上海反战大会的影响下，日本爆发了保卫^③这次大会和反战方面的大规模运动。这次大会对于保卫苏维埃中国也具有很大的意义。实际上这表明，如果说帝国主义者帮助国民党，那我们的朋友来到上海，表明他们帮助中国苏维埃、中国人民反对日本的进攻。因此这将便于我们反对国民党向日本的投降行为等等。尽管存在代表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但我们还是知道，代表团，特别是我们的法国同志（他们实际上是这个代表团的领导人），善于在所有代表当中切实地实行统一战线，一致地做工作。

还应该指出，我们党善于把代表团的秘密活动和合法活动结

① 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代表会议结果问题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3年11月3日会议上作了研究（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69，第1页，第197号文件）。

② 见第227页注①，第83号、197号文件。

③ 原文如此。意思是：声援。

合起来^①。因此我们得以虽然不是同全国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但还是同上海广大的学生和知识界取得联系。我看了报纸^②，虽然只是一期，但那里说，许多过去没有联系的工人组织，现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铁路工人、军工厂工人、电力公司工人都参加了这次反战大会，还参加了示威游行，并在上海欢迎代表团。这表明，反战大会帮助了我们在工人当中所做的工会工作。这对于我们以后在上海和全国工人当中的工作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代表团在反战大会上提出的这个任务，在代表团和我们党组织的协助和积极活动情况下完成了。

贝拉·库恩：这是在中国。要注意其他国家有什么情况。

王明：我认为，我们的第一个不足是巴比塞^③同志没有来。在大会召开之前，那里众多的知识分子组织成立了很多欢迎巴比塞的委员会和协会，因为他在中国知识界很有名气，中国报刊作了很多关于巴比塞、关于他的生平和关于他的活动的报道，说巴比塞很快就会到来。而事实上他没有来。这有点伤害知识界和新闻界的心情，因为他们很想迎接巴比塞。

其次，在会议上没有日本和美国的代表团。这是在远东和在中国活动的两个很重要的方面。如果说日本代表没有出席是因为迫害和恐怖，那么美国代表缺席则是很大的不足，说明美国党在这方面做工作不够。

第三，我认为，我们、我们党组织和代表团同黄色工会中的工人群众联系不够。例如，在上海，有一个很大的黄色邮电工会组织。他们有合法出版物、合法报刊等。如果我们打算同他们取得联系，召开会议或举行大会，这可能是可以做得到的。那里有我们

① 除了公开会议，代表大会还举行了秘密会议（见第 171 号文件）。

② 见第 478 页注④。

③ 安里·巴比塞，法国作家。

的革命工会反对派党团,并且工人情绪高涨。如果同这些工人取得联系,这会对暂时还参加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人具有更大的意义。根据我们的材料和瓦扬·古久里同志的报告^①可以看出,我们在这方面不够注意吸引黄色工会的工人。以后要纠正这些不足之处,并要更加深入到工人中间去,把他们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和黄色工会的伪善。

还有一个不足,这就是我们尝试同帝国主义驻上海的军事力量建立某种联系不够。这不是很难的事。因为我知道,外国海军陆战队、海员,每天晚上有很多人上街,光顾茶馆、饭厅和小吃店,如果我们去咖啡店,就可以见到他们,同他们交谈和举行小型群众会议。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在上海有专门的外国咖啡店,那里每晚都有外国水兵、海员在跳舞。但是,看来这项工作,要么没有做,要么做得很少。这些不足,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克服。

我们的具体建议,即我们以后在这方面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第一,我认为,在中国方面,我们应该通过以下途径巩固我们的成绩。我们应该加强我们在上海的反战委员会,除了吸引地下的和诸如宋庆龄等半地下的人士参加外,还要吸引广大公开的人士、新闻记者、教授、教师、学生等参加,以便使我们的委员会以后在行动中有更多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机会。

第二,我们建议世界反战委员会^②向上海派常驻代表。这位代表应来自合法国家^③,最好是法国或美国的同志。他在那里可以公开活动并同公开的和半公开的人士建立联系。

第三,我们建议在上海创办固定的机关刊物,一方面使用英

① 文件没有找到(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69,第 2—17 页)。

② 见第 231 页注②。

③ 原文如此。意思是:来自西方国家。

文,另一方面使用中文^①。这位代表应该是这个机关刊物的正式领导人。与此同时,还应挑选一些同志,他们应该一起工作。

第四,我们建议,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反战委员会的协助下,不仅同上海的反战组织而且同中国所有其他城市的反战组织建立更多的联系,以便从中国内部和外部一起采取行动,在这些城市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学生当中建立反战委员会,使我们的活动能够在全国展开,首先是在那些我们有很大可能做这方面工作的地区。

我们还建议效仿美国建立中国人民之友协会。现在我知道,在美国已经开始组织这样的协会。我们建议世界反战委员会掌握这件事,以便在所有国家,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建立这些协会。

我们已经谈到,我们现在就建议代表团立即发表告参加这个大会的所有人士和组织书,向他们和中国人民表示敬意,对做了很好接待工作的人表示感谢,与此相联系,要从自己方面说明今后在欧洲和美洲的行动,还要说明自己关于反战委员会和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所有组织今后行动的愿望,以便扩大自己在中国的活动。这(从代表团方面)将对中国的反战组织、对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反战人士具有进一步的影响。我们应该全力帮助代表团起草这样一个正式报告,收集系统的资料、具体的数据和事实,以使报告比李顿的报告^②更有说服力。最好在我国的同志协助下,马尔利^③和所有社会民主党代表以自己名义撰写关于苏维埃中国和满洲抗日战争的文章和小册子,以驳斥苏维埃中国和满洲游击运动的谎言和诬蔑。这对美洲和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和自由资产阶级报刊将具有很大意义。

我们还表示希望,今后要让我们参加这项工作的法国同志回

① 原文如此。意思是用英文和中文出版。

② 见第174页注①。

③ 英国自由党人士。

国,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法国党应该给有经验的瓦扬·古久里同志时间,使他能更多地同国外的所有中国人士取得联系,使我们的工作变成经常性的、系统的,而不是暂时的、突击性的。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69,第 18—22 页。

打字稿,未经校对的速记记录。

192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康生的电报

1933年11月4日^①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②和老板^③。[中共]中央告知：1. 同意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组成人员，但是我们建议还设三名候补委员，即斯拉文^④、科穆纳尔^⑤和刘少奇。书记处，由于[在中国]缺少王明，我们建议在前线的张国焘和莫斯科文^⑥参加。在首府^⑦只有波戈列洛夫^⑧。项英出席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因此我们还建议伊思美洛夫^⑨和廖陈云^⑩参加书记处。请电告……^⑪。代表^⑫。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54(1933 年收文)，第 63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
 -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 ③ 康生。
 - ④ 李竹声。
 - ⑤ 王稼祥。
 - ⑥ 周恩来。
 - ⑦ 指瑞金。
 - ⑧ 秦邦宪。
 - ⑨ 张闻天。
 - ⑩ 陈云。
 - ⑪ 原文空缺。
 - ⑫ A. 埃韦特。

19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①给中央苏区的电报^②

1933年11月6日^③于上海

1. 我们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初的命令^④作出的兵力部署,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如果我们根据这些命令采取行动,那我们定能在11月间取得对敌第2、第4师的部分胜利,并能用缴获的武器武装我们新部队的3000到4000人。

那时我们能否在东方发起决战,这将取决于形势。对敌我兵力对比的准确估计(还是7:1)必然促使我们作出很谨慎的结论。如果在敌人营垒内不发生大的慌乱并伴有部队的大量瓦解,那东方的决战就应该推迟,或者我们应该再在什么地方寻求决战机会。

2. 在斟酌决战的时机和可能性时,我们想在这里简要地提出未来战略方针的几点初步原则,而这个战略方针会根据现在所期待的11月行动的结果来采取。

下面的计划决不能干扰目前的行动,这些行动暂时还要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上述决定实施。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附录5,指M.施特恩报告附录(见第194号文件)。

③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附注确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5月21日。

④ 文件没有找到。

我们知道，提出建立在尚未出现的形势基础之上的计划是有冒险性的。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避免在需要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候发生误会。

下面我们讲的只是初步的原则，更详细的计划将在你们仔细考虑这些初步想法并取得你们的同意之后提出。

3. 初步的原则：

(1)保卫我们地盘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在外围同敌人兵力对峙来使敌人失去主动性。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还有可能回到从内部的直接防御上。不管我们在外部地区的行动有多大成功的希望，我们都应及时为此做好准备。在这方面，10月的战役是成功的，即使没有以我们取得很大的胜利而告终。

(2)11月的任务依然是：不给敌人以主动权，此外，在东方战场要击溃敌人二到四个师。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中明确指出了这两个目标。

(3)有一个问题：我们能否根据11月行动的结果直接在那里寻求决战机会？在这一点中我们已经谈到赞成或反对这样的决定的一些论据。

应该考虑到的另一些因素是：在东部，我们会遇到敌人集结的主要兵力，要使敌军受到很大的打击，这始终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个个击破，这是代价很大的行动，要蒙受很大的损失，因为敌人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分成几个进攻纵队，使用难以接近的工事中的预备力量。

(4)蒋介石企图找回在10月失去的主动权，把吴^①的纵队再向南调动，而周和薛^②的纵队将试图在金溪、黎川地区拦截我主力部队。由于敌军的这些行动，我们很可能丧失几大块地盘，回到直

① 可能是：吴奇伟。

② 可能是：周浑元和薛岳。

接防御上,我主力部队不再在外部进行积极作战。如果我主力部队留在外部,蒋介石将试图分割我军,使其一部分去对付来自广东的敌人,而另一部分去对付沿海地区。(有迹象表明,蒋介石和日本人已达成协议,一旦我们被赶到靠近沿海一带,蒋军将同日本海军陆战队一起采取行动。)

(5)11月的形势能给我们提供赞成或反对在东部进行决战的另一些论据。但是,在分析我们的能力时,我们应该考虑到,19路军是一个很令人怀疑的因素,它准备在我们处境困难时掉过头来反对我们。

(6)广东敌人的备战工作在全速进行,在物质上得到了一些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这些工作可能在11月完成,并能开始北上。

(7)一旦西南军阀集团对南京的政治攻势恢复,在军事方面,我们在南方的力量将首先面对广东的进攻。在这样的力量格局下,19路军会暴露其真实意图,向汀州推进,而何键的湘军以及他的广东盟军,将会比现在更积极地赣江战线反对我们。

4. 基于以上所述和期待我们11月战役最可能取得的结果,我们建议,我军在取得相当大的战绩(在东部歼敌三四个师),使蒋介石在一定时间失去主动性,但还不足以作为我们在东部主动进行决战的基础的情况下,要作出如下部署。

军事部署:

(1)在抚河以东,12月将部署**东方军**,包括第5和第7军团、第10军团、游击队和地方武装,所有这些力量作为一个战略兵团在集团军指挥员和兵团革命委员会的指挥下行动。这个兵团将承担与执行以前决定的“第三阶段”有关的所有任务。

(2)**中央军**将包括9军团,加上现在在中心地区活动的游击部队和在组建中的新的部队。领导和东方军一样。其任务主要是在游击队采取积极行动和在对敌进行侦察的情况下实行防御。

(3)**南方军**,包括3军团、22师,早些时候还有第8军和南面

所有其他部队。领导和其他兵团一样。任务是重开战役，出击粤军的西翼侧，把粤军和湘军分隔开。为此3军团要在良口地区的某个地方渡过赣江并先在西北方向发起战役（同东方军一起——见下一点）。稍晚些时候南方军改变方向向南，同自己的22师配合作战，该师将在南面从零都到信丰的方向上推进。最终目的是摧毁粤军的西翼侧和占领到山口的地区。

(4)在3军团渡赣江的同时，1军团在万安地区某个地方也渡赣江，同3军团一起在西北方向采取行动。

晚些时候，削弱湘军之后，1军团一方面同我们在赣西北的部队建立联系，一方面作为西方军向北扩大作战行动，以便开辟通向南昌至九江铁路线的道路。

5. 上述计划，将为从渡赣江时算起约过两个月之后在北方进行的决战创造先决条件。这场战役将在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配合下进行。这期间南方军将为将来对付粤军的行动准备条件。

6. 应该作出决定：3军团或1军团应纳入西方军。最后我们的东方军约为我们所有兵力的20%，中央军约为15%，西方军约为35%，南方军约为25%，预备队约为5%。

7. 最后：在我们还没有让我们的10军团，然后相应是8军团和16军团直接进入我们的作战领域之前，过早地试图进行决战会有太大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在不明情况，没有顺利解决问题的前景时，在东方继续向前推进。所以，如果我们想在1934年初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的话，那么在12月的适当时候采取新的措施则可以认为是必要的。计划就是这样。

李宗 514，目录1，卷宗810，第167—168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194

施特恩关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报告^①

不早于 1933 年 11 月 8 日^②于上海

弗雷德^③的报告

我们在 10 月份寄去的电报^④，只不过是图例形式对本报告进行说明的材料。对军事形势的综述还需要作出一些政治性的评论。

一、蒋介石营垒中的强弱方面

蒋介石司令部内的种种说法，肯定会成为公众议论的内容，从中可以得出，无论在中国其余地区发生什么情况，南京在江西作战期间都不会放弃拟订的计划。敌人完全清楚，这场战役对于南京来说意味着一切，所有其余的事情都取决于这次战役的结局。

我们也清楚，江西是否存在拥有自己武装力量的红色区域，这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整个一系列问题中的根本问题。江西冬季战役的结局将直接影响华南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对比，间接影响这两种力量在整个中国的对比，甚至影响整个远东局势，影响对苏战争的尖锐问题。

现在有哪些可能性呢？这里在 10 月份形成了怎样的局面呢？

① 文件上有批注：归机密中国文件。П. 米夫。(1934 年)3 月 20 日。

② 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莫斯科收到文件的日期是 1934 年 1 月 21 日。

③ M. 施特恩。

④ 见第 175、181、183 号文件。

1. 蒋介石的目标

早在9月底进攻开始之前，蒋介石本人对这次进攻的结局并不很乐观。南京当局在政治上经受不了重犯以前进攻的严重错误。由于这个缘故才采取目前的备战方法，伴随这次进攻在报刊上开展了谨慎的宣传运动，提出了进攻的近期目标，确定了在几个月期间实现这些目标的步骤，直至实现最终目标，然后是凄楚的结局——这些就是现在即在10月中旬可以指出的进攻的突出特点。

正如已经说过的，蒋介石不指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和很快消灭红军。但是他希望在冬季能大大削弱红军的力量和减少红色区域，并期望眼下被从四面八方围困起来并与相邻地区失去任何经济联系的其余地区，不再构成什么严重的威胁。

一旦实现了他的计划会有哪些后果呢？

会巩固蒋介石的威信，加强他在长江流域的权力；同时削弱广州进而英国在华南的影响。蒋介石会按照或违背19路军将领的意志吞食19路军，这是短暂的幕间剧。在蒋介石的背后主要有在财政上和政治上拥有无限权力的浙江银行集团的支持，而手中掌握着福建的港口，他不一定要把事情弄到同广州集团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步。在蒋介石取得这种成绩的背景下，广州离开英国的支持就站不住脚。关于自愿投降的幕后谈判将会开始。这些都意味着日本将在华南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在浙江银行背后有日本资本的支持，而且福摩萨和福建也伸手可及。无需谈华北就可以看出，今天日本控制蒋介石已比当年在满洲控制张作霖更容易了。这个被控制的蒋介石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无价之宝，因此他也可以从日本人那里得到更长期限的宽恕。而且也无需提醒蒋介石要对苏联采取有利于日本的行动。日本可以自愿放弃治外法权，以从内政上巩固自己的附庸并在长江流域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统治地位。从而可以削弱美国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地位，而目前它们对整个中国的影响却受到美国经济地位的左右。中国像一匹听话

的马,可以把日本拉进“泛亚细亚”。这个口号将是日本毫无怨言地用来推动封建的、军阀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中国的强大地区向前发展的唯一“思想”。应该承认,如果日本拒绝接受中国虚假的自愿行动,那么这个“思想”可能有一定的吸引力。黄郛在北京被责成制造在同日本解决问题上会取得成绩的假象,认为问题一定会在北方顺利得到解决。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江西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不应该有什么干扰。从江西到参加对苏联的远征并没有多远。

因此江西斗争的结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 对于蒋介石来说障碍是什么?

但是蒋介石的这个目标无法完全实现。下面将分析一下妨碍他这样做的因素。

广州怕蒋介石取得胜利,19路军司令部还有更多的理由,他们的自负要大大超过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两者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要战胜红军是如何之困难。即使他们清楚,蒋介石有可能最后取得胜利,但不管怎样他们知道,战胜红军者将会在军事方面丧失作战能力和被大大削弱。因此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自己不和红军作战,至少在最初不和红军交手。晚些时候会出现更有利的机会。参加决战和以后同丧失战斗力的战胜者作战。

(1)广州。在10月中旬就很清楚,广州方面至少现在对红军没有构成任何严重威胁。以后的情况将取决于斗争进程对红军是否有利。南京也不想承担不介入同红军斗争的耻辱,因为有些人认为同红军作斗争是神圣的职责,不介入会使它在这些人面前遭到很大的损害。当在议事日程上提出广州有无穷的军事能力时,广州有可能参战。它不太参与广东边界上或土匪和暴动者后方的作战行动。因此认为广州集团中的陈济棠试图为了蒋介石实行蒋介石的方针,那是不对的。陈斗争不认真,因为他本身想成为远在广东范围之外的蒋介石。他爱护自己,回避

角逐。因此在广州，蒋介石没有盟友。广州在散布自己战胜了红军的谎言；当前线沉寂下来的时候，路透社抛出材料，报道了对付红军的各种计谋，并把事情描写成这样：实际上只有他们（广州）取得了对红军作战的真正胜利。但对红军来说，关于广州，只能说是明天的重要对手，不管目前军事行动的结局如何。

(2)19路军。19路军的情况有些不同。上海战之后，蒋介石让19路军驻扎在贫穷的福建，当时那里充满了红色游击队。19路军无法休整，不得不进行斗争，即对付省内的农民和红色武装。它这样做了，但越来越感到如坐针毡。它从本省得不到多大好处。广州本可以好好地利用盟友，但它不能为养活军队支付足够的款项。19路军不定期从广州得到的30万美元的月补贴，未能帮助解决所有问题。此外，陈济棠试图让19路军成为归属他指挥的军队，而不想让它成为与自己并驾其驱的独立盟友。因此与广州的友情很冷淡。因为同样原因，同南京的关系也不是很好，此外，南京更有危险性，因为它更强大。19军每月从南京得到50万美元，没有大笔税收收入，过着食不饱腹的生活。每月赤字超过30万美元。当8月份红3军团进攻19路军时，它处于完全孤立状态，后方还有强大的农民游击运动。19路军曾向广州和南京吁求援助，但援军没有马上到来。而当援军到来时，则是这种情况：陈济棠占领了闽南的永定，实际上已开始向厦门方向推进，蒋介石却没有准备，他答应派5个师增援，应由薛岳指挥。但19路军司令蔡廷锴能期待从这位将军那里得到的，只有被削弱、免职，甚至是赶出军队。就这样，事情发展到向红军提出众所周知的停战媾和建议。暂时避免了来自红军方面的威胁。19路军将领们还向汀州红军那里派出代表；已签订临时协议^①。红军期待从中得到什么，很清楚。

^① 见第183号文件。

19 路军是被削弱了的军队,它既不想听命于广州,也不想屈从于南京。在仍由它控制的福建地区,游击队数量增多;在这个省份的其余地区(现在它可以不特别费力地从红军那里夺回来),它会同更大量的游击队遭遇。被 19 路军切断收入来源的福建地方当局,现在又抬起了头。19 路军中的骚动在持续,只是由于同红军的谈判而有所加强,并采用了政治瓦解的形式。红军借助于散发传单、做解释工作等方式从下面进行的瓦解工作开始产生效果。

然而就是在这种状况下,这支军队还是中国最后一支这样的军队,即使其将领同日本实行妥协,也是会绝对服从的。在其他帝国主义者当中,19 路军引起其兴趣的,只能说是美国人。但他们很谨慎,因为他们不想把蒋介石推向日本的怀抱。由此可见,福建的将领们别无选择,只有等待在有可能从军事上削弱蒋介石的情况下来加重自己的分量。而在这以前红军不去激怒他们。他们作出了关于他们赞成革命、关于他们作为“社会民主派”最靠近中国共产党人等许多这类声明,想以此使红军离开自己。

如果红军有更多的时间来消灭福建的敌人,那么福建将领们的这种花招就决不会停止。而红军由于没有选择余地,不得不局限于做瓦解 19 路军的工作和对它进行游击战,以及尝试突破封锁。红军同意进行的谈判,应该看作是瓦解敌军工作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这种紧张状态说明蒋介石期待从 19 路军和从广州那里得到什么。由于没有钱把南方和东南方的力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两个兵团靠小钱是填不饱的),蒋介石需要这样来同红军作战,使他在消灭红军之后不是太被削弱地出现在福建和广东的边界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同红军作战就不能达到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得到加强的目的。

3. 作战方法

上述情况对蒋介石选择同红军的作战方法是有影响的。在不介入或只是有节制地协助广州和 19 路军的情况下,蒋介石不能指

望消灭红军。要么他应该率领强大的部队由福建和赣江上游(向赣州方向)推进,出现在红军和闽赣两省军队之间,要么指望红军向赣西和湖南突破,停止在原地没有希望的斗争。这也会把他拖到湖南,他会在那里面临准备新战役的任务,而广州和19路军则可以开始进行他们所谓途经江西的“北伐”。

(1)湖南何键将军饱受在那里活动的红军的袭扰,求之不得他们的军队进攻他的省份。现在这种恐惧和在很大程度上与广州相似的想法决定了他的“政策”。他也许是蒋介石的盟友,但有一定的限度。当他受广州的唆使倾向于在当时允许19路军部队经过他的省份时,他经受了他们对蒋介石的价值的检验。(部队应开赴汉口,在“抗日”口号下,开始进行广州反蒋的北伐。当只有两个团靠近湘南并为广州造成困难时,何键变得更听蒋介石的话了。)尽管如此,在蒋介石的盘算中,他还是个未知数,一旦蒋介石在江西被削弱,他可能站出来同广州联合反蒋。因此有一个要求修改蒋介石计划的因素。

(2)德国顾问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必须遵守远没有说完的各种策略手段,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也不可能是他实际上所需要的人。德国军官也许在改编和训练军队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但在战略计划方面,他们对任务的理解过于简单。他们只是军事技术人员,而不是军事政治人员。德国顾问当然会意识到,在江西对红军采用骑兵式进攻是不可行的。他们指示军队在夏天进行训练,这就是证明。不过德国人把红军和白军的纯军事力量(按士兵数量加更优势的技术和火力装备、飞机等是1:8到1:10)加以比较后确信,蒋介石应尝试突破红军的地区。但是蒋介石比德国人更了解江西和在它之后的省份(福建、广东、湖南),因此他知道,突破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东西。他认为,根据各种预测,突破可以取得成功,但为此他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此外,红军最终是会被打散的,

那时斗争就永不会结束。因此蒋介石想把红军的地区置于包围圈内,看他们在碉堡包围情况下怎么办。一开始他想在地区边缘建立对他有利的新的政治据点,并把它们变成在军事方面难以接近的地方。他想对红军地区实行严密的封锁,并在战斗展开时,尽可能占领一些地方,如果不是广州,那么至少也是福建和湖南,以便对红军的战役不是在他争取在华南建立他的统治地位之初进行,而是在其结束之时进行。

因此在10月的战斗中就十分清楚地看出了以后战役的性质。这种性质看来是这样的:讲求方法,小心谨慎,近期目标应确保他蒋介石的胜利,而这些目标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方面都预计在较长时期内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实现。

4. ^①现在我们来谈一个新的问题:谈谈蒋介石需要的时间和经费问题。需要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哪怕是简短的分析,因为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蒋介石的作战方法。

作战方法对蒋介石军队和随员的影响

(1)蒋介石领教了10月战斗是多么的艰苦和其效果对他来说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他放弃了在1933年圣诞节以前战胜江西红军的希望,这些都是事实。他对黎川的进攻没有完全击溃红军。他们还在他的翼侧,在赣东北和福建。他也知道在红军和19路军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他推测发生的事情要比实际发生的多得多。红军的传单有意作出明显的暗示,蔡廷锴在进行比停战问题更多的谈判。蒋介石猛扑黎川,是想实施他在红军和19路军之间加楔子的第一阶段计划。在这里,他的基地是南城和抚州,从那里开始有几十个师被牵制在唯一一条交通线上。虽然在资溪、金溪地区有强大的红军,这些基地的确未受到直接威胁,但是他们对交通线的影响是很现实的。考虑到这一点以及福建的形势,自然

^① 原文如此。

得出结论：在未弄清楚福建情况和未把红军从交通线北面挤走之前，需要在黎川停留一段时间。因此在10月，黎川兵团留在原地未动，战斗在黎川以北进行。从那里下来的伤员络绎不绝，据路透社报道，几乎把抚州和南城的医院床位全部住满。10月中旬，黎川城郊的一些红军部队敢于转入反攻，几乎攻到了城门口。这个行动以及游击队从西岸向南城以南10公里处公路的进攻，迫使蒋介石三思，因为游击队进攻时，他的由两个团组成的纵队被打散，蒙受了损失。于是他下令停止继续向黎川方向推进，等候以后命令。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但在报刊上以蒙蔽舆论的方式散布这类消息，说什么朱德在翼侧采取了巧妙的行动，暂时成功地阻止了进攻。同时暗示，实际上大的进攻似乎还没有开始，它在11月初才开始。

这些情况对军队和随员有怎样的影响呢？

如果想战胜红军，就必须向士兵支付缺欠的津贴。即使士兵站着，不取得对红军的战绩，钱反正都源源不断。说江西战役开支每月是2500万元，这不会错。据判断，要在圣诞节以前结束战役那是不可能的，相反，蒋介石在谈论预计要进行三年多的斗争。

(2) 前线的新建议

率蒋介石中央兵团驻扎在北方永丰和宜黄之间的陈诚将军，到10月中旬没有向前推进一步。尽管那里与他对抗的三个红军师行为比较消极，甚至在知道中心地段的红军只留下四个游击队而把全部主力集中在抚河上的战斗中时，中央兵团也没有向前推进。只是到10月20日才开始出现中央兵团想开始推进的迹象。但这些迹象十分微弱，以至红军领导完全可以暂时不对其作出反应。

在黎川方向沉寂下来的情况下，前线上发出了需要提出新建议的声音。虽然不完全有把握，但可以推测，这些声音来自陈诚。

建议把黎川的军队撤离抚河西进,同中央兵团一起在西岸包围三个红军师并把它们消灭,这个建议更像是批评:并可能被蒋介石认为是谁都不会提出的批评:而这是德国顾问们的计划,蒋介石根据上述理由没有同意。不能让福建听从命运的摆布,当时红军的主力在黎川的东北部。除此之外,大约在10月15日,三个红军师从这里消失,其中两个师出现在黎川城郊(黎滩河)的东岸。好像10月下半月的作战过程,证实蒋介石营垒内部有分歧。在上海传言说,各方都有点儿道理。对领导层提出的问题应该有答复,应该在答复中寻找真理:谁应该和应该怎样为江西的长期战事提供军费,战争的结局将是红军的惨重失败,但不是他们的彻底消灭,同时在这场斗争过程中,南京的军事实力也将被大大削弱并失去战斗力。即使把全部美国贷款^①花到这上面,这笔款项还是不足以抵偿军费开支。结果还是一样:南京的军事瘫痪。

(3)对蒋介石周围一些人的怀疑

我们来谈谈宋子文和上海银行家们。蒋介石的微弱乐观和前线10月事件的结果,为他们的严重悲观主义提供了理由。

宋子文带着钱从美国回来后,好像在南京要展开一场美国和日本影响的暗中竞赛。日本在北方施加的压力(方振武和吉鸿昌事件^②、中立区土匪等)好像比美国的贷款(的压力)要大得多。蒋介石不得不向日本人屈服(给北平的训令、黄郛的代表权)^③。他稍敢造反,就会(像悬空的人)被立即撤掉日本的支柱,直接跌入南京宋子文集团,而该集团试图限制蒋介石的独裁行为。

① 指1933年美国向南京提供的5万美元贷款。

② 指1933年10月政府军按照日本驻华北当局的要求和他们一起对方振武和吉鸿昌部队的反日行动的镇压。

③ 可能指南京不激化同日本的关系的指示,尽管日本向华北推进。1933年10月,国民党北平政治委员会主席黄郛本着南京的指示精神同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代表进行了谈判。

宋[子文]不在时,蒋介石得以诱使汪精卫追随日本。这样一来,南京的实际政策与美国和国联从中国所得到的东西再也无法一致。对于中国外交代表在美国和欧洲的说法,蒋介石立即毫不含糊地本着亲日的精神作了纠正。最后,赖赫曼博士的在华使命也是为了美国 and 国联从日本的控制中夺得南京,如果顺利,就和蒋介石一起来完成,如果不顺利,那就不让他参加。

结果是,应该为前景不太乐观的战争支付费用的各方,都不情愿这样做。而如果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那他们希望至少要有更多的发言权。

这些人士在小心地观察,南京政府的内政基础如何在越来越明朗的亲日政策中逐渐缩小,而如果一切都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就会出现南京在对外政策上的孤立。为了在中国保持同日本的平衡,英国人和美国人最终一定会把其他买办吸引到中国来。

同两名得到中国军事部长允许乘飞机去新疆的日本军官的争吵,确实没有在报刊上广泛传播,但是很明显,某种类似的事件却传得很远,甚至首先用来反对苏联。

因此,向江西提供钱财的人士利用这种情况作为向蒋介石施压的手段。对江西战役的批评,现在既来自与日本和蒋介石相对抗的政界人士,也来自与他们相对抗的财界人士。这些人不把南京武装力量视为独裁者个人的事情。他们想使军队摆脱他个人的控制。如果这些武装力量对于南京的命运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在这个冬季就不应该在江西使用它们。这些人明白,江西不是玩物。这就是我们对白军营垒内部派别的理解,其明显表现是宋子文的引退^①。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尽管存在蒋介石在各个方面所经受的困难,但蒋介石也决

① 1933年10月,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务。

不会被消灭,他必定会尽一切努力来对付我们。

(2)只要在南京反日的人士开始明显起作用,那么蒋介石最终投靠日本的行为就会更加公开。为此后者既要给钱,又要往这种贷款上附加“21条”^①。

(3)如果说现在在进攻中明显有一定的喘息时间的话,那么很快它就会重新猛烈地开始。如果在蒋介石营垒中发生不利于他的变化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大战役之间的喘息时间就不会持续很长。

(4)在评价把蒋介石推上战场的因素时,虽然说他有种种困难,但可以说,红军还是处于受威胁的情势之中。

下面尝试从纯军事角度分析一下这种情势。

二、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的新组织措施

1. 在目前的进攻中,具有长远影响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即蒋介石不应该怕造成自己的牺牲。如果他造成了自己的牺牲,则可以用来作为进行宣传和在其周围的不同人士当中对将领施加影响的手段,进而可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伴随以前进攻所发生的那些瓦解现象。我们强调“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正如后来所证明的那样,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只有在严格遵守让从将军到排长的所有军官都承担相互责任(这也是蒋介石的新措施)的情况下,当蒋介石在对红军的斗争中显示出初步的成绩时,才能够消除瓦解现象。如果不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所有这些旨在保证胜利的措施,在红军的打击下只会加快瓦解进程。以前的情况怎样呢?蒋介石从来未让自己的嫡系部队参加对红军的斗争,他始终利用自己潜在竞争者的部队来对付红军。因此结果是,尽管损失惨重,但他本人最后在军事方面还是得到了加强,当然是与他的兵团指挥官们相比较而言,有些指挥官在军事方面曾有足够的力量有朝一日夺取他的政权。今天他应该使用他的嫡系部队,否则他不容易鼓动他一半的

^① 指1915年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21条扩张主义要求(见第566页注①)。

兵团独立指挥官去作出牺牲。兵团指挥官也始终力求珍惜自己的军队，促使其他军队去作战。削弱邻居自然意味着加强自己的兵团，因为它在价值上提高了。很清楚，这影响领导的团结，影响实行长时期的大规模计划。这就是德国顾问们的计划中的主要失算之处。

德国人只计算在黎川战线上作战的师团数量，而现在他们感到惊奇的是，尽管在黎川有4个师，在南丰郊区有4个师，在金溪的第2梯队有5个师，在南城和硝石之间的第3梯队有8个师（最后这个梯队部署在南城和黎川之间的半路上），为什么还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呢！

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蒋介石个人的师团在哪里？那么答案很简单。蒋介石个人的师团在预备队，即在第3梯队里，在第2梯队里不多，在第1梯队里根本没有。这样的兵力分配表明，蒋介石把承担牺牲的必要性算计到了何等程度。

2. 相互责任措施

在一道军事命令中大致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个排向红军投降或者它不援助处于困境的相邻的排，那么这个排的排长就有可能被处决。如果连长、营长等直至师级将领置相邻的师和团于不顾，让他们听天由命，那么他们同样有可能被处决。根据战地法庭的判决，如果不仿效在战场上以身殉职的营长的榜样而向后方逃跑的话，他们也可以被处决。营长如果将团长置于战场上而不顾，等待他们的也是同样的命运。只有坚持“到底”，也就是让红军把自己打死的那些军官，才能避免被蒋介石枪毙的命运。说起来容易呀！在健康的军队中，这种命令和对它的执行也可能有助于加强总体战斗意志，但是，在蒋介石的营垒中，这种残暴的措施在没有取得初步战绩的情况下，只会起破坏性作用。在蒋介石未遇到大的抵抗而占领黎川之后，就缺少这样的战绩。

10月中旬，在黎川和北线之间的第3兵团被打得四处逃窜，

并在资溪、金溪地区向后调动。驻守在黎川的一部分部队常常受到来自南面的压力,红军几乎从南面冲到了黎川城门口。除了赣东北师团的行动外,整个进攻行动暂时中止了。而这毕竟是蒋介石所有机动武装力量的三分之二。如果现在蒋介石想实行处决令,那么他此时就应该这样做,而且按照相应的解释,他应该从自己做起。

3. 数十个师依靠一条交通线

九江至南城道路的延续是乡间土路:(1)一条沿赣江河谷通向吉安;(2)一条经南城往东南到福建。在这两条路之间应修一条换防用路(乡间土路),作为三角地带的基础把吉安和南丰连起来。眼下在吉水和南丰之间有红色游击队活动,而在乐安以南驻扎着强大的红军兵团,所以南丰从技术上说不会受到攻击。而修路是在宜黄、乐安、永丰堡垒地带以外很远的地方。只要压路机不压过南丰至吉安一线,那就只能允许在赣江或抚河的两翼分别采取行动,要么一翼采取行动,而另一翼应派到前面去。在抚河一侧的进攻已开始(现受挫)。

现在蒋介石应该做什么呢?是重新让抚河上的一翼采取行动还是在赣江一侧重新组织力量?或许现在就在沿着泥泞的道路移动中心,但从技术上说这是很难实现的,而在战略上则是与他把红军包围起来的计划背道而驰的。很可能是第一种做法,即重新让抚河上的翼侧采取行动。而且可能不得不让这一翼向东南和向西面红军驻扎的地区推进(陈诚选择的计划)。

为了不在东翼侧遭遇主力部队,他的师团还要长时间依靠乡间土路向南城行进,现在他的师团就集聚在这条土路上,好像在细小枝条上的一串串熟了的葡萄悬挂在葡萄藤上。红军的最近目标是在这里分别歼灭它们。并且红军的任务不是从下面开始行动,而是尽可能接近中心,即更靠近南城、抚州地区。如果说由于蒋介石大量集结兵力,红军的行动可能不会完全成功,那么它将足以使

蒋介石集结的兵力不能移动，而红军的主力则可以在赣东北自由行动并在任何时刻回到南城战线。南城、抚州地区，这是蒋介石进攻的脉搏。虽然蒋介石通过路透社于10月25日宣称，与红军的损失相比，他的损失多三倍，尽管如此，他还是胜利者，但是事实表明，在中心地区歼灭80师的三个团，给陈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第5、第6和第96师在黎川以北的失利，则是在抚河一侧停止进攻整整一个月的原因（正像现在官方所承认的）。至今损失的对比是很糟糕的，确定为1：8，因为红军抓获了4000名俘虏并缴获了武器，其余的是住进南城医院的伤员和在黎川城下的战死者。

4. 南京军队的组织和训练

德国教官在设想山地战时，对士兵进行了刻苦的训练，模拟山地战，让士兵借助绳索登山，等等。但是师团还没有怎么利用学到的东西来向前推进。它们陷入抚河谷地，山上被红军控制。组建的师团也是为了进行山地战，这表现在由8000人到1万人的一个师组成了各有4000人到5000人的两个师。实际上这样做是对的，但无论在组织方面还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在团、营、连各级都没有多少变化。

现在每个师和每个团都有侦察队，三分之二成员是穿老百姓服装的谍报员。老百姓同情红军，不太提供信息。红军及时采取了对策。

约有20本小册子和专门为江西下达的训令，分发给了军队。在这些材料中，除了塞克特和他的德国司令部的著作外，还有生活在两千年前的中国经典作家的著作。这种做法以及在牯岭开办的军官学校是否很有益处，还没有得到证明。

5. 飞行员、化学和装甲车

集中在南昌的飞行中队（确切的组成你们可以从其他消息来源得知），借助南城和吉安的机场，每天能一次，最多两次用12到16架歼敌机和轰炸机轰炸红色地区。轰炸机每月有3000颗炸

弹,主要是燃烧弹。毒气弹灌满了三氯硝基甲烷。尽管在大后方的生活中有精神上的压力和其他不便,但迄今敌人用空军取得的成绩并不多。红军在认真着手建立消极的对空防御,并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地点已经这样做了。地区划出了对空防御区,学校已关闭,机关楼房外面做了伪装。食品已放到安全的建筑物里;在山坡上挖了避弹所,组织了消防队,向居民说明了行为规则,白天应该在外面,不集中在一处,警报信号系统报告险情。实行积极的防御,规定建立22个对空射击排,每个排有三挺机枪,部分排是固定的,部分排是机动的,其中10个排已在发挥作用。远程射击的瞄准镜不够用。后方的空间保卫,责成组织起来的青年负责。顺着同时也是道路的河流和谷地,在远离村落的山上,架设了高射机枪。

红军战术的制定,也考虑到来自空中的危险。至于主力部队,它们在闽北的大片森林里活动,森林是天然屏障。行军和转移在夜间进行,白天在各处埋伏着守候敌人,伪装得很好。军队得到命令:为了避免暴露,不得射击飞机等。

据瓦格纳^①报告,7月底由这里下达的所有指示都得到了正确理解并已付诸执行。敌人的每个飞往红色地区的飞行员都要投五颗炸弹。我们得到报告说,飞行员不知道应该往哪里投炸弹,因为他们无法发现相应的目标。因此投下的炸弹多半落到河里、山谷等地。据敌人报纸报道,有两架飞机在试航时坠毁了。

从所说的情况来看很清楚,化学炸弹危险性较小,因为在森林里和山地上,有风从山谷里刮过来,秋天常带有轻微的旋风性质,很少出现危险的毒气集中现象。要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投下大量的炸弹,不是一个飞行大队所能做到的。当然这只涉及三氯硝基甲烷。而其他种类毒气,现在敌人未必使用。

① O. 布劳恩(李德)。

由于没有最好的防毒面具,军队拿到了4万个由浸透了盐水和苏打水的棉花做成的防毒面具。如果有足够的原料,还可以制作4万个。如果有钱的话,还需要购买2万个防两三种其他毒气的防毒面具。可以在这里的市场上购买。当然,因此会出现运输问题。

已经很清楚,从空中对军队的威胁,不是毒气弹,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关枪。后方应该更加提防燃烧弹和炸弹。考虑到这一点,军队不能给自己提出执行有可能被机关枪从空中击中的任务。其中包括必须避开争夺城镇和居民点的战斗,因为在那种情况下需要暂时放弃伪装。顺便提一句,红军知道地面和敌飞行员之间的密码联络信号,一旦需要,可以适当加以利用。

在发出对空防御指令的同时,还制订了防备同装甲车、坦克和浅水重炮舰作战的建议。在多数情况下,道路的普遍泥泞可以防御装甲车;坦克还没有使用。可能还没有自动推进坦克。至少这种危险性很小。

三、10月的行动和战役

尽管9月2日在永丰城郊的赣江上,敌80师的3个团被缴械,但蒋介石的行动还很平静。9月,红军还同19路军进行了战斗,遇到驻守在顺昌和将乐的56师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战役的结束时间整整推后了两个星期。

蒋介石广泛展开的进攻所取得的唯一初步战绩,是9月26日由突击兵团(第5、第6和第96师)占领了黎川。但是其战绩只在于获得了很重要的阵地,即纯领土上的战绩。红军在这里避开了战斗。

1. 占领黎川完全证实了蒋介石的进攻方向,之前红军就很有把握地猜到了。

蒋介石的兵力由8个兵团组成,从东到西是这样部署的:

兵团	指挥官	师团番号	打击方向
东翼侧 第 1 兵团	赵观涛	4,80	从东北进攻金溪
第 2 兵团	樊嵩甫	53,79,87	从东北进攻金溪
第 3 兵团	周浑元	5,6,96	黎川
中央 第 4 兵团	吴奇伟	11,67,90	沿抚河西岸
总指挥 第 5 兵团	罗卓英	14,59,94	作为第 3、4 兵团 的第 2 梯队
陈诚 第 6 兵团	李延年	3,90,47,97	做中心和预备队
西翼侧 第 7 兵团	李默庵	10,83	赣江方向
第 8 兵团	唐云山	89,92,93	赣江方向

警备队有：第 8、23、27、47、79 师。

总共有 28 个师，直接用于在抚河和赣江之间地区同红军的战役。没有计算在内的有长江东北的 3 个师、福建除 19 路军之外的 2 个师、江西西部和湖南的 10 个师等等，这些军队也在蒋介石的指挥之下。

如果根据这些军队同蒋介石的联系程度把他们做个区分的话，那么可以分成：(1)嫡系师，(2)联系密切师，(3)间接隶属师，分类情况如下：

属于第一类的有：第 3、11、67、14、94、49、9、80、59、4、10、83、87、89、52 师。

属于第二类的有：第 43、8、96 师，第 32、33 独立旅。

属于第三类的有：第 46、90、24、21、79、5、6、53、55、27、85 师。

除上述师团外，湖南、福建和广东的武装力量组成单独一类。

2. 黎川失守后，红军急于迎击蒋介石在东翼侧的进一步攻势。福建战役迅速收缩。围困顺昌和将乐的行动停止，尽管这两个城市很快就会陷落。在 10 月 7 日以前，红军在抚河东岸黎川以北歼灭敌 96 师，解除了它的独立部队的武装并俘获一名旅长。

与此同时,在硝石、枫岭地区(黎川西北约70里处^①),它们缴械和歼灭了敌先遣团(可能是24师)。在夺回主动权的战斗中,红军取得了这些有所预计的战绩,之后他们想占领资溪桥以北更好的翼侧防御阵地(从10月4日起又在红军手中),即吉山(音)和岩新(音),以便同西岸军队一起向硝石方向推进。同时打算从南面攻打黎川。

10月8日,发动了攻打硝石的战斗^②。未等总司令下达命令,部署在西岸的部队(一军团)就提前发起了攻势。这样一来,红军的东方军在未来来得及弄清情况、加强翼侧和使后方有保证之前就被拖入了战斗。这场血战的结果,你们已从我们的电报^③中知道了。一句话,成功地歼灭了第5和第6师的三个团,作为战利品缴获了2000支步枪、2部无线电接收机和装备等,再次迫使96师逃窜。而红军的东方军在右翼受到来自东北方向的压制,不得不停止已取得一半胜利的战斗,以击溃敌人从翼侧对它的突然进攻。东方军的损失(死伤1200人)和西方兵团积极支援的延误,毫无疑问对司令部10月10日撤退令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尽管当时战斗结局未定,但还是下达了这道命令,这道撤退令正赶上东方军部队还在硝石以北的阵地上,而这时西方兵团正威胁着敌11师和67师。

在下达撤退令的同时,上海收到了关于敌人采取新的行动,包括敌第1和第2兵团接近金溪和资溪桥的消息^④。

在附录一中,我们复述了上海的答复^⑤。关于下令撤退还是不撤退好,当时在发出的电报中反复进行了斟酌,这从附录二中,

① 见第209页注①。

② 原文如此。据其他材料,是1933年10月7日。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见第177号文件。

即从10月20日的答复^①中可以看出。事实终究是事实,红军从硝石地区撤出,转移到东南方向的黎川高地,在那里停留几天,准备进行防御,但他们感到惊奇的是,敌人没有进攻。

据悉,敌人也撤退了,至少是两个兵团(第2和第5兵团),以前它们是黎川地区的两个梯队。

现在红军重新下令北进。攻势应在10月18日开始。上海建议在对敌第3和第5兵团采取行动之前,先摆脱敌第2和第1兵团,指挥部没有接受^②。但是红军的西方兵团根据同上海的协商,在向抚河东岸集结。到10月20日,兵力对峙格局如附录三^③中所述。

从中可以得出,敌人在从黎川地区撤出第2、第5兵团(只留下两个团作为警备部队)后,从东北撤回第1和第2突击兵团并让它们靠得更近些,还把第4和第6兵团从西北转移到南丰地区,以便以全面包围的态势回击红军可能对黎川发动的攻势。

上海预先对进攻黎川发出了警告^④,在比较沉寂的情况下过去近两周时间之后,歼灭敌东路兵团的时机业已错过。现在只能研究针对敌第5兵团的措施了。

10月25日歼灭一个旅(可能是79师的)并抓获1000名战俘。

在附录四^⑤中反映了10月28日的军队部署。

粗略的勾画明显表明,从10月中旬起,在敌人营垒内,旨在恢复主动权的兵力部署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同时已经认识,而且一些报纸在简讯和社论中也作了讨论,蒋介石以前的战绩很令人怀

① 见第179号文件。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文件没有找到。

疑。司令部的报告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大的进攻”还没有开始。好像在最近几周就会开始。毫无疑问，进攻将重新开始，不然放弃进攻就等于承认失败。

据说，蒋介石在10月份的伤亡损失约1万人。不包括被红军抓获的3000战俘和其他再没有集中起来的溃散兵团。但是把红军的处境描绘成没有多大危机还为时过早。

很晚，即过两周多之后，我们才得到消息，说红军指挥部根据上海的建议，想在11月初发起战役^①。它想用第5、第3和第7军团8个师（其中3个师很弱）的兵力击溃敌东北一翼，试图把金溪兵团引诱到开阔地带。1军团和重新组建的9军团的部队这时应给敌人在西岸的两个主力兵团造成威胁。这两个兵团之一（以前是第3兵团）还是由周浑元指挥，而另一个简称为薛（岳）军团（其部分是原第5兵团）。1、9军团在达到目的之后应再上西岸，进攻原第4兵团的师团。

3. 这个报告，我们是从10月20日到今天即11月8日断断续续撰写的，最后我们想对抚河东岸红军今后的发展前景作出评估，以此作结束。

考虑到与红军相对抗的敌军占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优势地位，很难设想红军近期能在东岸取得决定性的战绩。敌军在休整和改组之后将能够重新掌握主动权。在日常的小规模战斗中，选择适当的时机，红军是能够打败敌人的，而且敌人在这次失败中的损失会大大超过红军的损失。然而这种消耗战，只有在敌人营垒中军队发生更严重瓦解的时候，才会给红军带来胜利的前景。可是眼下还很少有这种瓦解的迹象。那怎么办呢？

出于这些想法，11月7日上海提出了新的解决办法（见附录

^① 文件没有找到。

五^①)。

你们从中可以看出,新的解决办法只是作为一种尝试和初步轮廓提出来的。它也取决于11月战役结束后出现的条件。在战役结局不利的情况下,只好采取这种解决办法(方式可以改变)。红军人数少、武器差,这促使我们想到前线一出现一两个月喘息机会就应该采取的步骤。10军团,然后是8军团和16军团,暂时不直接与敌主力接触,寻求决战太冒险。考虑到拖长了的防御行动在削弱,又不存在取得有利结局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逗留在东边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采取新的解决办法,那么也许会出现这样的危险:红军部队的撤离促使敌人在东部和中部更加猛烈地向前推进。

为了使新措施取得全面的效果,红军需要有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准备时间。在西方没有取得效果之前,可以靠在东边和中央留下来的力量支撑这个危机时期。也可以推测,在12月份,广东可能进行打击。试图在东边抵抗这种打击,而旁边有19路军这个令人怀疑的因素,那太危险。因此只有上海指出的解决办法才行。我们一收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它对所提出的解决办法的态度的报告,就电告你们。我们也请你们研究这个建议并告知你们的意见。到12月中旬还有时间。

全宗514,目录1,宗810,第148—160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

^① 见第193号文件。

195
埃韦特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电报

1933年11月10日^①于上海

绝密

致东方书记处。购买药品，先急需3万元^②，重复一遍3万元。代表^③。1933年11月6日。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54(1933年收文)，第60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

② 货币名称未说明。

③ A. 埃韦特。

196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1月14日^①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②。我们不能向[中央]苏区借钱。您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寄来25万美元?小批量采购我们找意大利公司^③。我们遵守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同时继续保持同蔡[廷锴]的关系。寄出[军事物资]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下,我们在遂亭(音)收到300万墨西哥元,但是,由于数额巨大,为避免冒险起见,这些钱已以转账的形式汇到上海。代表^④。11月11日。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54(1933年收文),第57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③ 公司名称不详。

④ А. 埃韦特。

19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343(B)号记录
(摘录)

1933 年 11 月 15 日于莫斯科

机密

听取:17(5419)—贝拉·库恩同志关于上海反战大会成果和评价的决议草案^①。

决定:17.一给野坂参三和王明同志看决议草案,然后交由王明、野坂参三、贝拉·库恩和皮亚特尼茨基审定^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附录]

机密

关于上海反战大会成果和评价的决议

1. 上海反战大会的积极成果是:开展了广泛的工人、知识分子

① 见第 227 页注①。

② 对决定第 17 款的批注:“今天已送皮亚特尼茨基。[1933 年]11 月 19 日。贝拉·库恩。”

和学生运动,不仅包括工人阶级的进步阶层,而且也包括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特别是在上海,渗透到一系列企业中,这以前我们的运动完全没有在这里出现过,或者很少出现;吸引和动员了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士,以前他们与反战运动没有任何关系。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围绕反战大会开展的运动不只是局限于上海,而且传播到许多遥远的省份。大会的准备工作和大会本身清楚地向中国民众显示了国际团结精神;大会促进了对苏维埃中国的宣传,而在选举大会代表过程中实行了比较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强调指出,中共机关在组织大会时表现得很积极。

在日本,成立了统一的反战委员会,有共产党拥护者和社会民主党成员以及改良主义工会成员参加;在大会筹备过程中,除了其他工作,还第一次公开举行了反战群众大会。会议筹备过程向左翼改良主义工会的渗透进行得特别顺利。为筹备会议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间举行的募捐活动采取了相当大的规模。

2. 虽然筹备会议的总的政治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必须说,委员会在巴黎和在上海所做的会议筹备工作是不够的。

作为特别的不足,必须指出这种情况:无论是日本代表还是美国代表都没有参加大会工作。会议对华北和满洲的影响也很小。国民党的拥护者,特别是国民党工会成员只有很少量的代表。筹备工作很明显的弱点还有,报刊宣传运动在中国开展得很晚。印度支那代表团的工作做得不够。代表团不想同在华的帝国主义军队和水兵接触。

3. 为了评价大会在远东以及在欧洲和美洲国家的效果,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执行局的共产党党团应当在以下方面进行活动:

(1)上海民族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作报告运动,要特别重视华北和边境苏区以及十九路军占领的地区。作报告运动应追求的目的是:筹备省和地区反战运动代表会议,建立常设委员

会,吸收来自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城乡贫民队伍当中的广泛反帝斗士参加。

(2)必须根据发表的大会材料在日本组织作报告运动。在日本一定要建立反战运动民族委员会,吸收所有反对日本好战派准备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人士参加。

必须在美国、加拿大、中美洲和南美洲广泛宣传会议的成果。

(3)在澳大利亚、荷属印度^①、印度支那和菲律宾,近期必须建立民族委员会,作为将来在这些国家进行工作的牢固支柱。

国际委员会必须同所有这些民族委员会保持经常的和积极的联系。最好在上海用英文和中文出版远东反战委员会的公开刊物。

(4)在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以及在其他欧洲国家,代表团应在报刊上和会议上组织广泛的宣传运动,而且在运动期间,应在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最有效地利用代表团中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吸引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和平主义人士参加保卫中国,使之免遭帝国主义瓜分的运动和特别是保卫苏维埃中国,使之免遭反革命干涉的运动。

4. 远东的整个鼓动工作,应该在太平洋地区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瓜分中国、保卫苏维埃中国使之免遭干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苏联远东准备反革命战争等口号下进行。需要很清楚地说明国际联盟在支持蒋介石方面的作用。在广泛宣传上海会议决定的同时,还必须认真宣传日本共产党人的反战活动。凡有可能的地方,都要在国际委员会和其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中国之友组织。鼓动工作应首先针对日本帝国主义,针对它的远东宪兵角色和对苏联的反革命战争发动者角色,但同时还必须指出日本和美国军事工业之间的联系。

^① 印度尼西亚。

5. 国际委员会应以通常的方式向议会提出要求,调查军事化学工业从日本向国民党的供货中获取的利润。国际委员会共产党团应该仔细研究代表团的报告。国际委员会应该保证散发报告,特别是在日本。为此需要尽快发表日文报告。除报告外,还必须尽快发表瓦扬·古久里和英国代表(加米尔顿)的报告。

6. 大会决议应用三种语言(法语、英语、德语)在《世界战线》杂志^①特刊号上发表。其他群众组织的报刊也应积极支持这场宣传运动。

7. 必须根据这些指示,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英美书记处和东方书记处协商后,给美国共产党和上海下达特别的指示,以便按照贝拉·库恩委员会^②的方针开展宣传运动。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70, 第 6、9—13 页。

记录为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附录为有校对手迹的德文打字稿,原件。

① 期刊没有找到。

② 见第 136 页注③。

198

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3年11月18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①。我们把钱分几部分寄去，暂时总共5万美元，重复一遍5万美元。我们建议只从蔡廷锴那里购买，货到我们地区后付清。在外国公司那里购买，向苏区供货无保证。我们不知是否需要冒险。米哈伊尔^②。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6(1933年发文)，第226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A. 埃韦特。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19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①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3年11月18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②。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向第4和第2军^③转告以下意见,但只以建议的方式:第2和第4军要阻止蒋介石军队向万县的推进,并要使敌人的炮艇丧失活动能力。力求通过沉下驳船和顺流放逐涂上树脂并燃烧的木排来拦截航道。为了同炮艇和轮船、同敌军作斗争,要隐蔽部署火炮和机枪。要使用电引爆的漂浮水雷。要组织侦察,以使我部队对敌陆战队的登陆不感到意外。在继续集中我兵力时,要提出歼灭刘湘21军团和占领成都谷地及省府的任务。这项任务要求我军,在军队从西面和游击队从南面支持抗税斗争和组织自流井采盐工业区工人和成都市本身工人采取行动的情况下,从北面给敌人以集中打击。我们依然认为我们在四川的斗争具有特殊的意义。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6(1933年发文),第227—228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A. 埃韦特。

③ 原文如此。指方面军。

200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①

1933年11月22日^②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③。在中央苏区,广州政府代表^④已开始进行停战谈判。您的代表^⑤的意见是:友好地协商解决(粤军)从赣南撤退问题、暂时停止作战行动问题,不涉及封锁问题。代表可以从这方面给中央苏区下指示。相反,弗雷德^⑥反对讨论[粤军]从赣南撤退问题。我们没有时间了,问题是重要的。请在10日内电告您的决定。代表。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54(1933年收文), 第 47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① 文件上有批注:“根据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指示,已送别尔津同志。11月23日。”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

③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④ 何人不知。

⑤ А. 埃韦特。

⑥ М. 施特恩。

20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3年11月23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①。从您的电报^②中还看不清楚,广州人是否准备在实际而不只是口头上进行反对日本人和蒋介石军队的武装斗争,或者仅仅指取消封锁和恢复贸易关系。也看不清楚,他们是否想抽出力量用于可能同19路军进行的斗争。应该让19路军司令部知道同广州人的谈判,并力求通过它弄清楚促使广州人同我们谈判的动因。如果广州人意在反对19路军,那我们就不该同他们谈判,以期不削弱19路军反日反蒋的立场。若是这种担心没有必要,那我们应提出暂时停战的以下条件:停止作战行动,取消封锁和从赣南撤出粤军。如果最后一项要求有造成谈判破裂的危险,作为非常措施,我们可以同意粤军撤到广东边界,并在广州人现在在江西所占领的地区建立中立区,但不能占苏区土地。为了不致因同军阀的妥协而损害我们在群众面前的威信,苏维埃政府应该以红军斗争和改善苏区居民经济状况的需要来全面解释自己参加谈判的做法。我们担心,日本帝国主义者可能试图利用福建事变作借口来进行干涉。为防备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准备群众运

① A. 埃韦特。

② 见第200号文件。

动和防御日本干涉者的组织。必须加强共产党人在福建工人、农民和军队中的工作,并利用合法的条件,如工会、农会、反帝协会等。向那里派遣反战大会^①代表团是否合适? 政治委员会。

请确认收到这份电报的所有编号。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36(1933 年发文), 第 233—235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① 看来,指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会议(见第 227 页注^①)。

202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1月24日^①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②。从11月中旬起,我们在福建同南京军队发生了冲突,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如果福建采取反南京步骤,您是什么意见?您是否同意苏维埃政府建议蔡廷锴靠自己的力量组织不叫红军而叫人民革命军的工农武装?我们有人,但没有武器。这些力量应该同红军和福建军队实行合作来对付南京的进攻。江西的形势在复杂化并要求有反对现在没有进攻我们的力量的行动自由。在福建,工作得到了加强。关于其他问题的报告,每天都会发去。11月20日。代表^③。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54(1933 年收文), 第 42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③ А. 埃韦特。

203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1月27日^①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②。已有两个月时间我们同弗雷德^③的工作进行得很糟糕。他要求采纳他的政治提法,理由是作战需要。他以否则他无法工作,他不想向中国同志暴露我们的分歧为借口,不接受对他的提法作出的任何修改。如果我们不想停止工作(?)^④,不想承认弗雷德的政治权威,那我请求您尽快发来一份电报,把他的工作限定在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一定]领域。代表^⑤。11月25日。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54(1933 年收文), 第 36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
-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
 - ② H. A. 皮亚特尼茨基。
 - ③ 即 M. 施特恩。
 - ④ 原文如此。
 - ⑤ A. 埃韦特。

204

李竹声给红色工会国际的电报

1933年12月10日^①于上海

绝密

致红色工会国际,抄送老板^②。

为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全国]工会联合会执行局。我们主张你们派代表来领导这项工作。斯拉文^③。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54(1933 年收文),第 20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

② 康生。

③ 李竹声。

205

施特恩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3年12月16日、25日于上海

亲爱的米哈伊尔^①同志：

你在电报中告诫我们，不要把争论提到中国同志面前^②，根据你的电报，我可以作出判断，阿尔图尔^③同志也向你通报了我们的争论^④。请接受我的保证，我未向他们提过争论问题。阿尔图尔同志和我在日常工作中的一些原则性的策略问题和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本来不应该造成特别不健康的气氛，因为有最高领导机构^⑤，它能给我们指出谁是谁非。只要作出通报就行了。但是，当阿尔图尔同志认为这是对他威信的威胁，是我在“设计独特的方针”时，他就认为可以对反对论者采用各种手段。这种手段很像吵架，很像小政客伎俩，因此分歧的实质被抹煞，整个争论在滑入我们党内特别盛行的那种轨道（常常是两个人）。

小的争吵我不谈。我从实质性问题谈起。

1. 我认为（也不仅是我认为），阿尔图尔同志对地下工作的起

① H. A. 皮亚特尼茨基。

② 指皮亚特尼茨基 1933 年 11 月 28 日给埃韦特和施特恩的电报，其中除提出这个要求外，还建议把重大分歧提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解决（见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250 页）。

③ A. 埃韦特。

④ 见第 203 号文件。

⑤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码要求漫不经心,令人不能容忍。他说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实在令人讨厌。一天,当我要求重新查看案卷并提出具体建议时,我得到了这样的回击:他真不知道我该到哪里安身。这是否意味着在希普卡一切都平静呢?绝对不是。文件仍然散落在全城,私人住所都成了档案馆。

2. 阿尔图尔同志不喜欢别人的倡议,而自己在有时间的时候也不提出问题。然后紧随事态发展,常常作出不必要的解释。在这个工作范围(提问题),这是我的主要过错。如果我鼓足勇气向他(而不是向别的什么人)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不可避免就要被泼上一瓢冷水。说什么不要管非自己份内的事。这是政治问题,而你只是军事专家,等等。

我就中心城市的党组织问题、工会工作问题和反帝组织问题提出的批评尤其使他感到恼火。从地方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夏季月份,工作是怎样在急剧减少,组织成员数量是如何在急剧下降。本来需要采取措施,但阿尔图尔同志没有及时作出反应。他对事情的这种态度引起了我的批评。他自尊心很强,批评不可避免要演变成冲突。

3. 在对福建事变所采取的实际措施问题上,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他还在同 19 路军进行谈判的阶段就主张公布文件^①。当福建成立政府的时候,他又想向报界抛出文件。我的观点,简单地说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布文件只对蒋介石有利。在对福建首领的性格和口号不抱任何幻想的同时,把 19 路军推向敌人营垒,毕竟是错误的。至少需要等到它和蒋介石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因此党对福建事变作出评价,应本着这样的精神:这次事变是由国民党的腐败造成的,福建首领是国民党的残余,民众不能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左”

^① 指公布中央苏区和 19 路军代表 1933 年 10 月 26 日签署的关于停战和反日反蒋的临时协定。见第 183 号文件。

的词藻，等等。福建的党组织应该得到在新形势下如何行动的具体指示，这就是：争取释放犯人，把力量放到农村去，就地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我们的纲领，并在土地和生产工具问题上从下面采取主动。要把游击运动同土地分配问题联系起来，成立农民委员会和农民赤卫队等等。

至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政策，我认为，需要继续实行合作政策，促使 19 路军同蒋介石作斗争，同时要继续从下面实行联欢政策，以便有保证来对付首领和将领们的两面派手腕。本着这种思想，我在有阿尔图尔、米尔顿^①同志和我参加的会议上表示反对公布协议或会谈情况。至少事先不征询江西中央的意见不要这样做。

阿尔图尔同志把我的观点说成是“国民党路线”并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中国论坛》^②刊出了他以党中央名义同记者的著名谈话^③，为此，现在这里的政治局^④委员和江西的同志都在骂他。他们骂他是因为有一些有害的说法，是因为公布（虽然是模糊地公布）现有协议的这种做法^⑤，还因为他以中央名义谈话未通知任何人。“谈话”摘录刊登在各资产阶级报刊上，引起了党内人士的困惑不解。现在中央局向省委发出通告^⑥，表示不同意“谈话”，并在党刊文章中猛烈抨击一些有害的说法。江西中央发出电报，禁止公布文件^⑦。

① T. 赖安。

② 见第 135 页注①。

③ A. 埃韦特以“中共领导和负责成员”名义同记者的谈话，见《共产党谈对福建的看法》，载《中国论坛》，第 3 卷，上海 1933 年 11 月 30 日，第 3 卷第 1—3 页。

④ 指中共上海中央局。

⑤ 见第 211 号文件。

⑥ 文件没有找到。

⑦ 文件没有找到。

4. 从阿尔图尔同志近几个月的整个行为中可以看出,他不了解福建问题,还以独裁者派头远远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这对我同他的关系和共同的工作产生了影响:除阐述在军事问题上的观点外,他不让我参与处理问题。但是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现阶段,把军事问题同政治问题分开,这是非常荒谬的。一般说来,政治和军事是没有界限的。而在这里,现在任何军事问题,90%都是政治问题,或者相反。

他不让我参与处理问题后,未经我同意,擅自答复江西关于同广东谈判问题的电报^①。第二天他向我作了通报。我列出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同广东进行谈判的理由。简言之,我的理由是:第一,广东不是一个整体,而且由于发生福建事变,陈济棠和军队中的那些站在接近福建立场上的集团在进行争斗。我们同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这本身就是帮助他巩固地位。谈判的事实会对我们同福建的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福建在寻找机会指责我们,因为同我们的“结盟”,使其他省的那些它指望在宣布独立时得到其支持的人士疏远了。福建把它同我们的“亲密”关系看作是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枷锁^②。第二,我们从同陈济棠的停战中得不到什么便宜,因为在粤军内部与个别反陈济棠将领发生争吵时停止游击行动,这仅是陈济棠力求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东西。我们还不能从广东战线上撤下力量投放到北方,因为在那里只留下了很少的兵力。帮助巩固陈济棠的地位,这对我们不利。我反对进行停止游击行动的谈判。至于从赣南清除粤军的问题,这在广东阵营内部重新进行人员安排、陈济棠使用前线部队来制服军中刚愎自用的将领和军中可能出现竞争者的时期,恰恰很容易通过采取游击行动来解决。不是谈判而是游击行动,使我们有可能收复赣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应为:在同帝国主义者关系中的枷锁。

我坚持要求向您通报,说明赞成和反对的理由。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发了“中国之谜”电报^①,当然,除了您过一段时间作出的答复^②,他不能期待得到别的答复。

然而需要对广东问题作出明确的决定,因为我们同江西商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需要有具体的答复:对广东我们打算怎么办?不知道能否得到您的答复而等待,这意味着失去采取行动的合适时机。

当我起草几份关于作战计划问题的电报草稿时(计划中本着我所说的精神说明了广东问题),每次阿尔图尔同志都驳斥我的观点。电报或者没有发出,或者他把电报的意思改成相反。当我们收到您的答复时,阿尔图尔同志如果愿意,就能读出答复是与他的观点不一致的。然而直到现在,他也不放弃自己的立场,他将您的电报转给江西时加上了这样的附注:“政治委员会的答复为你们提供了机动作战的可能性”^③。向哪里机动?具体怎么做?在阿尔图尔同志蛮干的时候,从他那里是等不到答案的。

(好在,近日收到了电报,说同广东的谈判不进行了^④,想必陈济棠在广东达到了目的,他不再需要同我们“媾和”了。)

同广东的谈判事件对我们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很糟糕的影响。已谈不上同我集体讨论问题了。在一周间谁也不到我这里来,谁也不注意我是否上班,他们以此来“惩罚”我。我不再参与工作了。

总之,说真的,我不理解阿尔图尔同志在同国民党派别谈判问题上的“方针”。他把所有派别等量齐观。宋[子文]的代表^⑤来了,他不作特别选择就进行谈判,得到关于广东(要谈判)的信息后,他也表示赞成。当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发生争论时,他以我没有

① 见第 200 号文件。

② 见第 201 号文件。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何人不知。

始终如一为“理由”猛烈抨击我。说什么为什么我曾主张同 19 路军谈判,而现在却反对其他谈判。

这有很大的不同:一开始我们打击 19 路军,后来开始就停战问题进行谈判,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很合算,谈判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我们提出的。同其余军队的情况就不是这样。我们不能同周围所有军队讲和。否则我们就是死路一条。

5. 现在我来谈谈最近几周我们“集体工作”的一些方法。出现了四川问题。信使送来了报告,要为四川的组织起草信件、提纲和任务。期限 10 天,因为信使要返回。

阿尔图尔同志不同我讨论问题。我不知道他同米尔顿同志在起草信件,我也写一封信作为讨论的基础。晚上,在要把信交给中国同志的前夕,阿尔图尔同志把他的作品送给我,让我阅读和提意见。

第二天,在阿尔图尔、米尔顿同志和我之间指定一人整理这封信。会上,我的意见像往常一样遭否决。没有什么理由,就是这样。我说这是用棍棒敲脑袋的办法让你信服,这种办法,他用起来越来越不客气。他说:“这你不明白。这是非布尔什维克观点,等等。”表面上好像他是十全十美的人,而我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的人。米尔顿同志唯唯称是或者沉默不语。似乎因为我在 6 月份写给四川的通告^①被党采纳了,并且据四川组织认为,这个通告有助于活跃工作和纠正以前的错误,所以我虽然没有出息,但是谈到四川问题,我能比米尔顿同志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米尔顿同志是个新手,还不可能了解四川的情况。不,我没有被吸收参加起草通告工作。我的意见和补充都被否定了。

有米尔顿同志参加起草的信件,交给了中国同志审阅^②,他们提出的批评是无法反驳的。信被他们否定了。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文件没有找到。

我坐在这里开会。考虑到纪律,我没有权利说明,中国同志反对信的理由几乎同我在我们预备会议上提出的批评完全一致。

此外,信的三分之二内容是什么也不说明的空话,有一个地方,信的作者建议四川省委迁到苏区,从那里领导全省的组织。我认为,这个步骤会葬送一些成绩,这些成绩已开始体现在四川国统区革命力量的日益增长上。

如果作者的这个建议是根据同江西中央的比较提出来的,那么我认为我有责任在这里就这个问题表明自己的意见。

不错,去年中央无法继续留在上海。因此决定去苏区,这是正确的。中央在江西的存在大大加强了对苏区的政治领导。但是也不要装着看不见中央的离开给中国国统区工作带来的消极方面。而这个地区现在还太大,以致不能认真考虑整个问题。中央局在上海是很薄弱的;有两名工作人员,其中一名即斯拉文^①同志,病得很厉害,需要治疗。中央局不可能具有中央在省级组织眼里享有的那种威信。而中央太忙于苏区的事情,会对白区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会出现危险的脱节现象。我一点儿也不想以此来批评中央局的工作。小伙子们工作很好,斯拉文同志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很坚强的工作人员。但还是有危险的脱节现象;更不要说一些地方组织中的某些人在蛊惑性地利用中央(局)离开的情况了。因此我认为,不应该唆使四川省委离开国统区。这种愿望在这个省的各级组织中都有,省委离开会带来很不好的后果。

6. 回到对我们的工作和关系的评价上,我应该谈谈在收到您告诫不要争吵而要工作的电报之后情况有什么变化。应该说,关系一点儿也没有改变。

例如:我起草了给江西的信,提出了如何指导福建组织在新的条件下的工作,苏维埃政府对福建要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为红军和

^① 李竹声。

同福建白区交界地区游击队提出什么样的任务等的建议^①。

我把草稿提交阿尔图尔同志讨论。他看了几遍,没有找到可找碴儿的地方。我提请他注意草稿中关于“福建是苏区暂时阻止帝国主义干涉的缓冲区”这个不妥当的提法。我说,我认为这个提法需要认真加以讨论和修改。

第二天,阿尔图尔同志把我叫去。我的草稿不予讨论。有他的新草稿。如果他这样做不是采用粗暴的蛊惑手法,也许不必为此见怪。但每一次(这次也一样)他这样做都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而只是使用“棍棒”。然后从草稿中抽出一些段落,加到他的新草稿中,没有特别的逻辑联系。得到的结果常常是胡说八道。

当中国同志讨论我们的建议时,我怎么能他们在他们面前保持沉默呢?我能说出在我们预备会议上被阿尔图尔同志“否定”的那些建议吗?

好像按照纪律我不该这样做。所以我没这样做。但我应该承认,遵守纪律很难。我怎么能得到机会让党了解被阿尔图尔同志轻易否定的那些建议呢?

在齐心协力的工作气氛中,这不会成为任何问题。在讨论中,我会说出自己的观点。同志们会分析,接受或否定,这就完了。

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程序,阿尔图尔同志会认为是同他的论战。我不打算这样做,以避免发生摩擦;但我深信,这样做与事无补。我觉得,最好是自己承担受您训斥或其他处分的风险,而不是消极地同中国同志坐在会议上。

7. 信最后写得很长。“集体”工作的“经过”有许多小的争吵,这些争吵对问题的实事求是方面有很大影响,谈这些争吵也许不值得。另一个问题要求最近加以解决。这里的中央局和江西的中

^① 文件没有找到。

央强烈地批评了阿尔图尔同志提出的党的五中全会决议的草稿^①。这次我出席了会议，一句话也没说。

阿尔图尔同志把我排除在工作之外，看来，他希望我不仅不参与，而且也不知道在“政治战线”上发生了什么。

阿尔图尔同志常威胁我说：“我给你一个嘴巴”或者“我禁止你参加中央局会议”。如果对他的这种作风也不抱怨，那就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得不到更广泛的通报，我怎么在自己的领域工作？

很清楚，没有这种通报，我的工作就会化为乌有。

当阿尔图尔同志说，他没有义务向我“作报告”时，表面上看他是对的。实际上这是在侮辱我。我不侵犯他的权利，而是要求仅从合作的角度可以作出的通报。在几周期间，他对我采取了通常对政治上不受信任的人所采取的那种做法。对我的直接提问，阿尔图尔同志对此故不作答，或者暗示，我确实未得到他的信任。

由此得出怎样的结论呢？即使情况不这么紧张，我也应该立即离开这里。在国外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人物”。

但是我仍认为，我在这里不是多余的。我想，如果您征求意见的话，中央局会确认我的这个看法的。我还想，若是中央局知道阿尔图尔同志和我之间发生的事情，它早就会向您提出解决不健康局面的问题了。我还想，中央局和任何别的公正的同志，都会建议制止阿尔图尔同志“我行我素”的这种胡闹作风的。

我讲这些，尽量做到客观，我认为，阿尔图尔同志不懂集体工作的方法，他不知道什么是自我批评。

只有您的干预能使他摆脱“独裁作风”。

否则，我不相信能建立起正常的工作关系。我肯让步就可以取得相反的结果。如果所有这一切还这样继续下去，他不作改变，那看来最好是派另一个同志来取代我的位置。在这个同志到来之

^①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0, 第 173—189 页)。

前,我努力遵守纪律,避免继续发生摩擦。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弗雷德^①

1933年12月16日。

附言:我发现,我在这里一会儿写“您”,一会儿写“你”。请原谅。而我的俄语在不在家的这些年变得很蹩脚了,也请原谅。

附录:此信第6点中谈到的信的草稿。

邮班离开前,我同阿尔图尔同志谈了话。我向他报告了此信的内容并让他了解了我的报告。他给家里写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了解他的政治报告的内容。但这并不那么重要。我从最近这次谈话中得出的印象是,以后我们之间的工作可以进行,如果不很顺利,那至少摩擦比这以前要少些。从我这方面将尽力争取较好的互相谅解。

弗雷德

1933年12月25日。

全宗514,目录1,卷宗759,第175—180及其背面。
手稿。

^① M. 施特恩。

206

赖安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信^①

1933年12月21日^②于上海

亲爱的同志们：

我想告诉你们，我基本上同意（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上海劳工联合会^③的地位和工作以及省委^④和上海劳工联合会在江苏革命工会运动中的迫切任务的信^⑤，尽管其中有大的疏忽和对一些至关重要的任务强调不够。由于这种情况和鉴于我刚刚开始在这里熟悉具体环境和问题，我仅就一两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1. 第一，对于目前时期上海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经济斗争的性质的几点主要看法。最近六个月在上海，工人经济斗争领域的革命高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人阶级更广泛阶层的战斗精神明显提高并采取了行动，特别表现在自发性地扩大罢工运动上（虽然最近六周罢工斗争有一定的削弱），有6万多工人参加，其中包括一些重要帝国主义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大罢工和电力、海运、纺织、烟草、丝织等部门的大

① 文件上有批注：米尔顿（T. 赖安）的信，归机密中国文件。（1934年）3月26日。II. 米夫。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1月19日。

③ 原文如此。这里和下面应为：上海总工会。

④ 指中共江苏省委。

⑤ 文件没有找到。

罢工；(2)罢工持续时间增加，在烟草、丝织、电力等部门争取部分和个别要求的斗争常常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经济罢工；(3)其他形式的群众性行动在发展，有10万多工人和失业工人参加，包括铁路工人、码头苦力、人力车夫、国家邮电工人、市政公共汽车和电车工人等；(4)数百名新的无产阶级积极分子走到了斗争的前沿，他们表现出极大的革命主动性和同不断加强的资本家和国民党的攻势的顽强斗争精神，尽管他们要各种手腕和有背叛行径，并且也不管国民党工会领导的愿望如何。

同时我们应该指出，总的来说，最近上海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还没有达到在目前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那样高的政治水平；目前的经济斗争，基本上还是分散的，没有纳入反对企业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政治行动轨道。其原因主要是：在这种情势下，省委和(上海劳工)联合会脱离了群众自发的并在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未能组织、领导、扩大和深化或有效地影响罢工斗争并开展失业工人的广泛斗争行动，在组织上这个时期蒙受了很大损失。另一方面，首先是因为党和革命工会存在弱点和处于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危险状态，国民党工会和其他黄色工会人员才得以实行蛊惑性的策略，而当他们无法通过谈判、调解和向工厂领导、社会事务局、市政府和国民党党部请愿，以及对工人和他们的斗争首领实行法西斯攻击来扼杀群众的主动性和自发罢工积极性时，他们又能自己出来引领罢工，彻底搞垮罢工，就像在电力、烟草等部门斗争中所做的那样。

必须更彻底地搞清楚这种情况，并把最本质的方面和结论更尖锐地提到党和(上海劳工)联合会面前。

2. 坚决建议在(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决议中和诸如不久前关于工会工作给江苏省委的信^①的实际指示中，更明确地指出和说明

^① 文件没有找到。

党和革命工会的主要弱点，以便作为中心问题更清楚地分出重要的、迫切的和基本的任务，以及应该完成任务的准确期限和每项任务应如何具体完成，而不是仅仅列举党和革命工会的各种缺点、弱点和倾向，和几乎把它们摆在一个水平上，也不是把一系列最高任务和最低任务混为一谈；这样做是为了把党和革命工会的全部注意力更有效地集中在现在应该抓的主要环节上，为了迅速实现工厂和工会工作的决定性转变，实现对工人和失业工人争取局部要求和普遍要求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组织工作和独立领导工作的决定性转变。

特别应该更迅速地把省委、区委、地委和支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以下问题上：

(1) 支部和工会小组以及每个党员和革命工会会员在工厂、码头等地和在失业工人当中的实际日常工作和特殊任务，特别是在如何同群众建立广泛密切的联系，如何在工会中和通过工会而在基层，即在工厂里、在失业工人当中和在各种统一战线行动委员会中建立、指导和发展群众工作等方面的实际日常工作和特殊任务。

(2) 大胆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将其作为发展反对国民党、反对第六次进攻^①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广泛群众性政治行动，以及准备决定性革命战斗的主要杠杆，在此基础上，准备和领导争取工人和失业工人最迫切要求和权利的局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3) 有步骤地大规模地揭露政府以及国民党工会人员、第三党^②、托派等的政策和手腕；在国民党群众性工会中开展经常性的和有组织的工作；孤立黄色工会首领，使工人摆脱他们的影响，参加具体的群众工作，加入战斗的统一战线组织和工会中的革命反对派小组。

①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② 指当年中共文献和书籍中通用的由蔡廷锴所建的组织的称谓。

这些问题也应该加以讨论,并在革命工会的委员会和小组中根据它们的具体任务和活动予以解决。

3. 最后谈谈经济和政治总罢工的组织问题,即你们中央的报告和信中未提到的日常迫切任务。鉴于中国总的政治形势和上海的具体条件,要提出在一些具体企业组织争取局部要求的斗争任务、协调和扩大局部罢工和游行的任务、把多数起码的经济斗争形式提高到更高政治水平的任务、把每次群众行动同反对国民党和第六次进攻,反对帝国主义者,争取群众对红军和苏区的积极支持的斗争结合起来的任务,同时必须与日常群众工作在广泛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广泛开展相适应,直接向党员和(上海劳工)联合会成员以及整个工人阶级提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努力在一些部门准备和组织总的经济罢工以及政治罢工的任务,并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把工人的所有群众性行动纳入到总的群众性政治罢工轨道。

至亲切的问候!

米尔顿^①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9, 第 181—182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T. 赖安。

207

康生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①

1933年12月21日于莫斯科

秘密

康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在红军的斗争中、在反帝斗争中和在伪满洲的工作中帮助了中国党。东方地区书记处很少给中国党发长篇的决议，但经常发简短的指示，在实际工作中给以帮助。在这项工作中的一个不足之处是，中国党很少收到关于国际问题的材料。这里有国际性质的困难，但东方地区书记处提供不够。

贝拉·库恩：上海局^②出版这些东西，通过它能提供吗？

康生：能。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398，第 80 页。

打字稿，未经过校对的速记记录。

① 1933年12月21日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研究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和各部支持各国党工作的问题，以及书记处和各部监督各国党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的问题（见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398，第 52—53 页）。

②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

208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3年12月22日^①于上海

机密

致米哈伊尔^②

尽管我不想干预我职权范围以外的事,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您注意弗雷德^③和代表^④之间的关系,最近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常变得很紧张^⑤。

中国的严重形势要求共同友好地工作,而实际上不是这样。当然,这里的同志们发现了这种情况,这有损于我们的威信。因为我很了解弗雷德、瓦格纳^⑥和代表的性格,所以我觉得,和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把军事问题同政治问题分开。

在我看来,如果可能的话,您应向这里派一位有威望的、不会轻易受他们影响的人,因为关系是可以改变的。此致

敬礼!

艾尔文^⑦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信件的日期是1934年1月19日。

② H. A. 皮亚特尼茨基。

③ M. 施特恩。

④ A. 埃韦特。

⑤ 见第200、203、205号文件。

⑥ O. 布劳恩。

⑦ H. H. 格伯特。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759, 第 183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20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3年12月23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①。答复您11月24日的电报^②。人民革命军可以建立,如果在这个军队里,自下而上的领导权将掌握在红军司令部手里,并且19路军司令部给它提供武器的话。政治委员会。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6(1933年发文),第263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A. 埃韦特。

② 见第202号文件。

210

布劳恩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①

1933年12月23日^②于中央苏区

瓦格纳^③的复电

1. 目前无法答复你们的问题,因为:(1)我收到电报^④一天后,革命军事委员会要举行会议进行讨论;(2)发报机的工作太繁重。

2. 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对你们的态度是很细心的。他们很细心地研究你们的每一个建议。在会议上讨论了你们的计划^⑤。尽管计划被否定了,但他们仔细认真的态度没有改变。

3. 总计划的原则被采纳了。在(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强调(有必要)指出,我们将来的策略也应该是把西面作为进攻的方向。(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同意的是对敌军状况的估计、重新部署的时间和动员要求。他们指出,在一两个月内,我们的主力部队暂时留在北线。

① 文件上有批注:备下一个报告用。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5月14日。

③ O. 布劳恩。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文件没有找到。可能指最初在193号文件中拟订的,而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建议中展开的计划,要在江西北部发起进攻南昌的战役,红军其他部队同时向湖南突破。

4. 拒绝计划的原因,在(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说明^①。在以下问题上我们发生了特别尖锐的意见分歧:

(1)建议中的作战地区远远超出了你们在总计划中所说的范围,特别是向北和向南昌方向远远超出。

(2)考虑到我们的状况,严格限定的期限实际上是无法执行的。

(3)这使我们在东北的力量(漏掉一个字,可能是“削弱了”——译者),把东北地区变成了不直接设防的地方。

(4)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你们给扼制敌军的各军团,即 1 (?)^②、7 和 9 军团提出的任务无法完成。

5. (中共)中央决定把你们的计划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交给莫斯科,因为你们坚决要求不加改变地在限定的时期内实行计划。这不妨碍革命军事委员会本身的决定。(这个决定预先向你们作了报告^③)。向莫斯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在提出的建议和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中共)中央认为,一般说来,上海和这里领导的合作没有必要通过莫斯科来进行,因为我们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工作的。

6. 对目前形势的评价:(1)敌人在北方暂时取消了其进攻方向;当然,他们的军队还在一步一步地推进并在每个占领的地区安营扎寨。(2)最近进攻的军队在向福建推进。(3)我们没有歼灭敌人一两个师。(4)虽然(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想采取非常措施,但动员的困难没有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提出了最小的进攻目标,不放弃主要的苏区和“北方敌人的动向”(中文的

① 见第 179 号文件。

② 原文如此。

③ 文件没有找到。

准确意思可能是：“保持对北方敌人的防备”——译者)^①。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月战役的决定是：将1、3军团集中在永丰地区，并派遣工人师和23(可能是二、三——译者)、11、13独立团一起去乌江以南和以北作战，消灭敌93、92、27和13师的部分部队并收复苏区。第5和第9军团要把敌人兵力牵制在抚河以东。我们争取使我们的右翼以设防的地区为依靠。如果我们不得不放弃泰宁，我们将占领建宁作为右翼的支柱地区。7军团将留在东北作战。

希望你们告诉我你们对这个决定的意见。

瓦格纳

全宗514，目录1，卷宗818，第24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原文如此。

211

中共中央给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33年12月27日^①于瑞金

绝密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19路军不愿意公布我们同它签订的协议^②,更希望不要急于拿出关于购买武器、交易量、交换各种商品的各种协议的证据。为了避免关系破裂和改善我们的军事状况,同时利用我们的战绩在斗争过程中得到较好巩固的情况,也为了工农的利益,我们满足了这些要求。但是突然你们驻上海的代表^③未经我们同意,甚至未通知我们驻上海的代表^④,以我们党负责人名义接受《中国论坛》^⑤和其他外国报纸^⑥记者的采访^⑦,讲述了同19路军签订的秘密协议和互不侵犯协议,并且在通报时犯了许多错误^⑧。所有这些使我们处于很困难的境地。

请你们作出指示:不应再发生这类事情,就各种重要政治问题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

② 见第183号文件。

③ A.埃韦特。

④ 盛忠亮。

⑤ 见第135页注①。

⑥ 报纸名称不详。

⑦ 见第205号文件。

⑧ 见第278号文件。

作出最终决定之前,必须同我们协商。12月23日。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54(1933 年收文), 第 4、7、9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212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2月27日^①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②。代表^③对[中共]中央关于接受记者采访^④的电报^⑤的意见。

我已经声明,这种事不会再发生。接受记者采访是因为需要尽快不失时机地在报刊上进行鼓动宣传以建立联系才发生的。谈话中所犯的错误可以通过逐步地说明党的观点加以纠正,不宣布不同意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也不进行论战,这是[中共]中央所要求的。我没有要求公开对立的意见,不过对手也知道对立的意见,知道所公布的党的观点。他们将告诉群众。为了我们的利益,需要以这种谨慎的方式向群众、哗变士兵和19路军作出最低限度的通报。认为这个举动本身和所公布的立场可能导致关系破裂,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关系破裂取决于[事态]发展,如果福建同广东和广西神通一气,关系破裂就会很快发生,否则在蒋介石取得成绩情况下,他们就会非常谨慎。我们不期望福建以目前的形式长时期存在。寄去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电报的日期。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③ А. 埃韦特。

④ 见第205号文件。

⑤ 见第211号文件。

文件。12月25日。

请发电报来(收到的电报没有结尾)。12月23日。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54(1933 年收文), 第 6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21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350(B)号记录

(摘录)

1933 年 12 月 27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40.(5550)—红色工会国际建议派贝克同志(美国)到上海从事工会工作。

决定:40.—采纳这个建议(飞行表决:皮亚特尼茨基、洛佐夫斯基、克诺林、黑克尔特、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74, 第 7、9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丛书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页数=656

SS号=12054667

出版日期=2007.9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原书定价=298.00（共五卷）

主题词=共产国际 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料 中国
1931 1937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料 中国 1931—1937

参考文献格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第13卷. 北京市：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09.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多尔夫给马季亚尔的信（1931年9月18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3号（特字第×号）记录
（摘录）（1931年9月2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
180号记录（摘录）（1931年9月22日）

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1931年9月22
日）

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1931年9月23
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4号（特字第×号）记录
（摘录）（1931年9月2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85
号记录（摘录）（1931年10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85
号记录（摘录）（1931年10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86
号记录（摘录）（1931年10月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87
号记录（摘录）（1931年10月1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满洲问题的非常会
议速记记录（1931年10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非常会议第121（A）号
记录（摘录）（1931年10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91
（ ）号会议记录（摘录）（1931年10月2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92
（ ）号记录（摘录）（1931年11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93
（A）号记录（摘录）（1931年11月1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扩大会议速记记录（摘
录）（1931年11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常设反战委员会关于满洲问
题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1931年11月15日）

米夫给斯大林的信（1931年11月2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03
（ ）号记录（摘录）（1931年12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04
（ ）号决议（摘录）（1931年12月2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三人小组（处务委员会
）会议第30号记录（摘录）（1931年12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反帝斗争问题给中
共中央的电报（1931年12月29日）

王明给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书记处和东方殖民地部
的信（1932年1月8日）

莱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关于在华工作的
报告（1932年1月1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三人小组会议第6号记
录（摘录）（1932年1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
的电报（1932年1月3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20
（ ）号记录（1932年2月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反战委员会给各国共产党的
电报（不早于1932年2月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不

晚于1932年2月1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新疆工作的建议 (1932年2月14日)
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执行局共产党团局委员会会议记录 (摘录) (1932年2月1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23 () 号记录 (摘录) (1932年2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黄平的电报 (1932年2月2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24 (A) 号决议 (摘录) (1932年2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黄平的电报 (1932年2月2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2年2月29日)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1932年2月29日)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32年3月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26 () 号记录 (摘录) (1932年3月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29 () 号记录 (摘录) (1932年3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34 () 号记录 (摘录) (1932年4月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36 () 号记录 (摘录) (1932年4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保密工作给中共中央的信 (1932年4月16日)
黄平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32年4月17日)

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5月3日）

皮亚特尼茨基给佐尔格的电报（1932年5月3日）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电报（1932年5月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40（ ）号记录（摘录）（1932年5月9日）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2年5月16日）

皮亚特尼茨基和洛佐夫斯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5月26日）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1932年5月27日）

佐尔格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2年5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工部关于远东和近东国家共产党秘密工作状况和特务工作情况的书面报告（摘录）（1932年6月3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6月9日）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摘录）（1932年6月10日）

维经斯基给福京的信（摘录）（1932年6月1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51（ ）号记录（摘录）（1932年6月15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4号（特字第×号）记录（摘录）（1932年6月16日）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2年6月2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6月28日）

琼森给维经斯基的信（摘录）（1932年6月29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6号（特字第×号）记

录（摘录）（1932年7月1日）
中共中央给王明的电报（1932年7月14日）
维经斯基给琼森的信（摘录）（1932年7月21日）
中共中央给王明的电报（1932年7月24日）
皮亚特尼茨基给佐尔格的电报（1932年7月2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64（ ）号记录（摘录）（1932年8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65（ ）号记录（摘录）（1932年8月9日）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2年8月1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2年9月2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73（ ）号记录（摘录）（1932年9月21日）
琼森给维经斯基的信（摘录）（1932年9月28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9月3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10月3日）
中共中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2年10月7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1932年10月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78（ ）号记录（摘录）（1932年10月15日）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2年10月1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10月27日）
王明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32年11月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第153（ ）号记录（摘录）（1932年11月10日）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摘录）（1932年11月1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82（ ）号记录（摘录）（1932年11月15日）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2年11月21日）
多尔夫给萨发罗夫的信（1932年11月25日）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满洲形势的报告（摘录）（1932年11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号军事指令（1932年11月2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84（ ）号记录（摘录）（1932年12月3日）
中共中央和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1932年12月5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2号报告（摘录）（1932年12月初）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5号（特字第×号）记录（摘录）（1932年12月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速记记录（摘录）（1932年12月11日）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1932年12月1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草稿（1932年12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12月22日）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2年12月27日）
皮亚特尼茨基给格伯特的电报（1932年12月31日）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的摘录（1932年12月）

王明给库西宁的信（1933年1月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1933年1月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1月16日）
维经斯基和琼森给洛佐夫斯基和科斯坦尼扬的信（摘录）（1933年1月16日）
马季亚尔给库西宁的便函（1933年1月25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3号报告（1933年2月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军事指示（1933年2月13日）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的电报（1933年2月1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指令（1933年2月21日）
布劳恩关于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书面报告（1933年3月5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4号报告（1933年3月11日）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1933年3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3月1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的电报（1933年3月2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3月28日）
维经斯基给琼森和福金的信（摘录）（1933年3月29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摘录）（1933年3月30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3年3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3年4月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1933年4月3日）

艾萨克斯关于宋庆龄同黄平1933年4月6日谈话情况的报告（1933年4月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4月7日）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1933年4月5日中国苏区军事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的补充（不早于1933年4月7日）

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年4月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4月1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307（A）号记录（摘录）（1933年4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15号记录（摘录）（1933年4月28日）

皮亚特尼茨基给格伯特的电报（1933年5月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5月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13（ ）号记录（摘录）（1933年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不早于1933年5月15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3年5月中旬）

青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电报（

1933年5月17日)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米夫的信(摘录)(1933年5月21日)
王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5月23日)
维克多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3年6月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16()号记录(摘录)(1933年6月3日)
维经斯基给琼森的信(摘录)(1933年6月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6月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6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6月24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7月2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7月7日)
对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的信《关于满洲的状况和中共的任务》的说明(1933年7月14日)
维经斯基给洛佐夫斯基和米夫的信(摘录)(1933年7月1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给格伯特的电报(1933年7月1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325()号记录(摘录)(1933年7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26()号记录(摘录)(1933年7月27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6号报告(1933年7月28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3年7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27()号记录(摘录)(1933年8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8月9日）

李竹声给皮亚特尼茨基和王明的电报（1933年8月1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60号记录（摘录）（1933年8月1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8月1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8月1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9月2日）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9月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333（ ）号记录（摘录）（1933年9月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9月1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34（A）号记录（摘录）（1933年9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34（ ）号记录（摘录）（1933年9月15日）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1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9月22日）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1933年9月2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9月23日）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1933年9月2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9月29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司令部的建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报告（1933年9月）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8号报告（1933年10月1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3年10月1日）

施特恩关于中国红军在1933年8、9月间的军事行动进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年10月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10月7日）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10月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李竹声的电报（1933年10月1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10月14日）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中国红军状况的情报（不早于1933年10月14日）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1933年10月2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电报（1933年10月2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电报（1933年10月24日）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摘录）（1933年10月2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0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3年10月2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3年10月30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0月30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0月30日)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0月30日)
埃韦特给中共中央的信 (1933年10月)
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3年11月2日)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1933年11月3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康生的电报 (1933年11月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3年11月6日)
施特恩关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报告 (不早于1933年11月8日)
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电报 (1933年11月10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1月1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43 () 号记录 (摘录) (1933年11月15日)
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3年11月1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3年11月18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1月2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3年11月23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3年11月24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11月27日）
李竹声给红色工会国际的电报（1933年12月10日）
施特恩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3年12月16日、25日）
赖安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信（1933年12月21日）
康生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1933年12月21日）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3年12月2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
电报（1933年12月23日）
布劳恩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1933年
12月23日）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3年12月
27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12月2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50
（ ）号记录（摘录）（1933年12月27日）